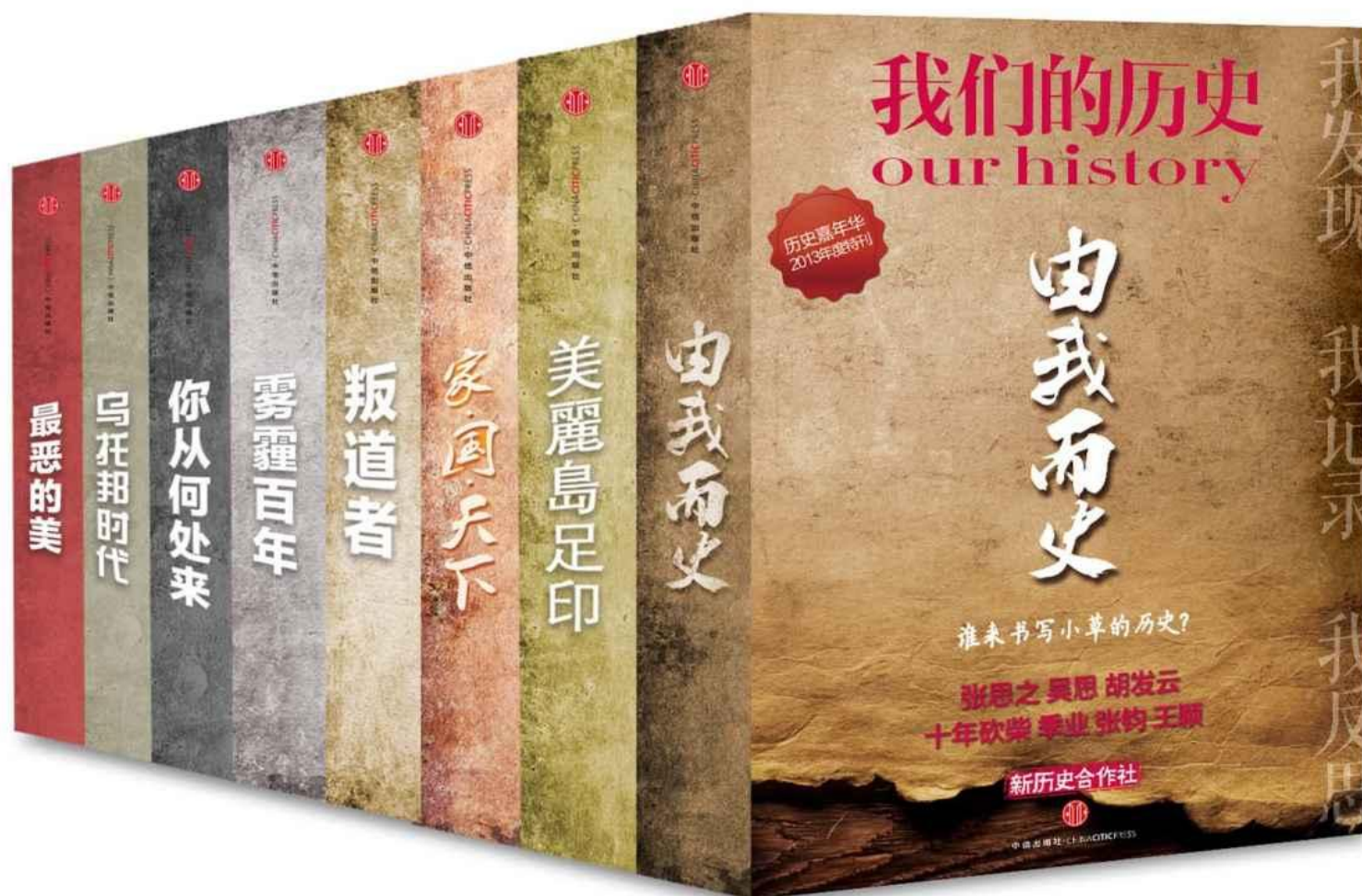


《我们的历史》全合集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目录

[由我而史](#)

[美丽岛足印](#)

[家•国•天下](#)

[叛道者](#)

[雾霾百年](#)

[你从何处来](#)

[乌托邦时代](#)

[最恶的美](#)

我们的历史 our history



由我而史

谁来书写小草的历史？

张思之 吴思 胡发云
十年砍柴 季业 张钧 王颖

新历史合作社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我发现
我记录
我反思

出品：新历史合作社
总第8期

主编：唐建光
副主编：杜兴
内容总监：谭昊
责任编辑：潘晶
主笔：庄秋水 杨东晓 刘永峰 毛剑杰 何书彬
图片编辑：卫超
封面设计：刘杰

市场总监：夏茉茉
高级产品经理：郭婧
品牌推广经理：石晓倩
产品经理：赵凌子
行政专员：刘美玉

唐建光 (tangjianguang@vip.sina.com)
杜兴 (duxing722@163.com)
谭昊 (edutanhao@163.com)
潘晶 (racine93987@hotmail.com)
庄秋水 (zhangling0301@126.com)
杨东晓 (cnydx@163.com)
刘永峰 (13671399840@163.com)
毛剑杰 (maojianjie999@hotmail.com)
何书彬 (yurangqiao@yahoo.com.cn)
卫超 (dawei781022@126.com)
刘杰 (jieliu1998@sina.com)
夏茉茉 (cskbzhy@126.com)
郭婧 (guojing0416@gmail.com)
石晓倩 (ziyeshiwodi@163.com)
赵凌子 (yikubaobao@163.com)
刘美玉 (422646834@qq.com)

关注我们：

新浪微博: 我们的历史-OURHISTORY

腾讯微博: 我们的历史

公众微信: 我们的历史

编辑部 010-57423216

产品部 010-57423217

市场部 010-57423218

传真 010-84084564

公共邮箱: ourhistory2013@sina.com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8号

关于我们

我们的历史

our history

“我们的历史”是新历史合作社推出的历史产品品牌。由这本数字杂志开始，您将会看到以“我们的历史”为统一品牌的网络产品、图书产品、活动产品、纪录片、电视节目，以及微信、微博等多种媒体形态呈现并传播的历史内容。

从纸张到电子，从文字到影像，从眼睛到心灵，无论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的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新历史合作社

我们关注历史，我们致力传播；我们执着真相，我们求索答案；我们回望过去，我们前瞻未来。

这是一个专注于历史记录与传播的同人平台，欢迎您的关注、参与和加入。

联系我们：

新浪微博：我们的历史-OURHISTORY

腾讯微博：我们的历史

公众微信：我们的历史

编辑部 010-57423216

产品部 010-57423217

市场部 010-57423218

传真 010-84084564

公共邮箱：ourhistory2013@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8号

目录

[历史，始于“我”](#)

[父亲的“交代”](#)

[发现土地的秘密](#)

[反思历史始于疑](#)

[在历史的苍天下](#)

[最后一个“托派”](#)

[谁来书写“小草”的历史？](#)

[我的历史观：五栋楼的故事](#)

[国家记忆2013·致敬历史记录者 致敬名单](#)

[中国故事](#)

历史嘉年华2013年度特刊

由我而史

张思之 吴思 胡发云 十年砍柴 季业 张钧 王颖

谁来书写小草的历史？

历史，始于“我”

“‘我’是一个个体，‘我’是一个严肃的个体，‘我’是一个高贵的个体。”

2013年11月17日，“国家记忆2013——致敬历史记录者”盛典上，86岁的张思之先生在即席演讲中，声如洪钟，震聋发聩。

这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却是张思之先生耗尽半生得出的结论。数十年在烽火中辗转，在运动中沉浮，身无以自主，心不自我。直到运动结束，由此生之种种波折厄运，他才发现，“我”这样一个个体，原是可以这样独立于世、独立于史的。

此时年已半百的张思之，由疑而始，思考自己的道路与信仰；由我而史，回望自己的来路与去向。

在这个意义上，“我”——以及每一个个体，才是自己的主人，才是历史的主角。而历史，正是由“我”开始。

作家胡发云，在20多年前整理父亲遗物时，突然“发现”了自己的父亲，以及父亲的家族，使他对父亲，对自己的亲人，以及对他原来信以为真的历史，有了新的认知。而这些发现，却是始自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次又一次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材料。

发现历史，往往就是从一个个的疑问开始，它有时竟来自于不经意的一句话。一句“以前咱们家也是这样的高墙大院”，揭开了土地的秘密。扬州中学高中学生王颖，从一位已故长辈的故事中，发现了课本中不曾讲述的“土改”史。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化，到他们这一代，那段历史早已由暴风骤雨，演变为娱乐游戏“斗地主”。

而在另一面，到了王颖这一代，历史固然可以成为游戏，但也不再是课本上的标准答案。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经历去反思，通过档案材料去求证，经由父辈的足迹去追寻。只有历史回到“我”的身上或身边，才有了态度和温度。

即使是专业的历史工作者，历史的发现，也是一次次求索之旅。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的编导季业，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首席记者张钧，他们通过对个人历史的寻找和记录，为百年风云提供了生动脚注。

无数个个体经验汇聚而成的历史潮流，成为历史学家思考的起点。而历史学家的思考和建构，同样也是一次次超越自己的探索之路。从最初的历史教育形成的唯物史观，而至血酬史观，而进化史观，而儒家史观，直至造化史观，吴思历史理论“造楼”的历程，也是自我进化与净化的历程。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当事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应是历史的记录者和书写者，这是新历史合作社自始坚持的理念。“历史嘉年华2013”以“我写我历史”为主题，从名人到普通人，纷纷登台分享“我的历史”。作为“历史嘉年华2013”及新历史合作社年度特刊，我们将看到的这一组文章中，有文学家之手笔，有治史者的反思，也有中学生的探寻，但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不再将自己淹没于历史洪流之中，掩藏于宏大的叙事之下，而是作为“一个高贵的人”，记录自己的生命轨迹。

正如王鼎钧先生在答谢“国家记忆2013——致敬历史记录者”时所言：“国家记忆有共同的记忆，有个别的记忆，融合起来是兼容并包的记忆，是无私的记忆，是天下后世都能接受的记忆，是万古千秋不受淘汰的记忆。”

由是，历史，由我而始。

父亲的“交代”

要是没有后来一次次的交代材料，父亲便永远地消失在天翻地覆后的历史烟尘中了。

文/胡发云（作家）

1991年深秋的一天，父亲过完他的虚岁八十大寿两个多月之后，兀然离开了我们。

当时父亲身体尚好，没有任何要烦劳我们的地方，在我们忙碌的时候，还可以帮我们做一些家务照看一下孩子。他突发脑溢血的当天上午，还去邮局买了报刊，然后登上我们家附近一座刚刚建好但还未通车的立交桥，从高处看望这个日益变换着面目的古城。回家路上，父亲顺便买了我最喜欢吃的鲜河虾——那天下午，我结束了一个多星期的笔会回家时，父亲正坐在厨房门口的一只小椅子上，将河虾的长须一一剪去，准备晚上做一道他拿手的油焖虾。就在那天下午，他斜依在自己的床上进入了昏睡并在第二天中午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去世，让我顿时有了一种空洞的感觉。第三天，办完父亲的后事，送别了一拨又一拨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邻里故旧，听了许许多多他们对于父亲的回忆与赞颂，我走进他的房间，关上门，一下就闻到了他的气息。屋子里一切都是原样。只在那个梳妆台上方，在母亲的遗像旁，又添了一帧他的遗像。这只梳妆台和另一个大衣柜，是抗战前，他新婚家具中的两件，欧式风格，硬木的，很重。武汉沦陷后的一段混乱时期，家里被乱民进入过，拿走了很多物件。这两样大家具，大概因为太重而被留下，只把大衣柜上的水晶玻璃镜卸走了，大衣柜下面的一个抽屉也被卸走了——进入者大概要用它来装一些小零

碎吧。直到我懂事，大衣柜的柜门上，还贴着一张花鸟画遮丑。那个被拿走的抽屉，也一直留着一个方方的空洞。

站在父亲那通达宁静的遗像前，我放声痛哭了一场，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嚎啕大哭。

我一辈子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四十二年。我曾在一篇关于亲情的文章里这样写过：从我记事起，到我自己也成了父亲，于我来说，父亲已和家里那些老式家具一样，成为一种极熟悉也极惯常的存在。如同我不曾想过我从何处来一样，也不曾想过他将到何处去。我以为我们会这样一直过下去。面对父亲死亡给我的打击与震撼，我才感觉到，他对我是如何重要。而那数十年温厚祥和的日子是如何珍贵。这是任何一个伟人英雄的死都无法比拟的。对于一个给了自己生命的人，对于一个从襁褓中开始守护你，直到你成家立业依然牵挂着你的人，怎样的感谢与敬重都是不为过的。

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想写写他，要动笔时，才发现他一生中，那一段于他，也于我们这个家族有着关重要关系的历史，我几乎是一无所知——那就是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他在这一段风云际会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的生活经历。他从来没有说过其间的任何一件往事，也没有让我们看到一点和这段往事有关的物件、照片或文字。仿佛那是一段从来不曾存在的岁月。

父亲其实是一个热爱生活并兴致勃勃地记录生活、保存生活的人。一张电影票，一份演剧说明书，连外出旅行的公交车票、公园门票，都会收藏起来。看一次排球联赛，他会将各队出场队员姓名，各场比赛的比分都一一记下，甚至家庭购物，他都会认真记下流水账——这些文字，常常成为我日后写作的资料。他也给我们讲过许多他年轻时候的游历或奇遇，北京的风情，西安的吃食，在庐山爬好汉坡，在大西北熬鹰，坐羊皮筏子渡滚滚黄河，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看那种豪华赌场的赌徒们打“苏哈”一夜输掉万贯家产，在大沙漠骑马掉队遇见狼群，被它们团团围困在一个小沙丘上，天色渐黑，直到烧完了随身带的所有可以燃烧的东西，才被赶来的同伴们救下，有时也会讲到几

件他一生中很得意的奇特医案，但那都是发生在平民身上的故事……他坚决地回避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一段岁月。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搬迁新居。清理父母的各类遗物时，发现了和父亲那一段岁月有关的东西——在一只破损不堪的牛皮纸袋里，装着厚厚一摞纸质不同、墨迹各异的材料，那是1949年后，父亲在历次运动中的自传、履历、交代材料或认罪书。好几次，我读着读着，不忍再读下去。这个一生都那么自尊自持、淡定从容的人，会写下这么多自污自辱的文字。如果说50年代的自传尚还客观、冷静、抱持着分寸，到了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认罪书，就不忍卒读了。那是他自1949年来的二十年中，第一次被隔离审查，那时候，我们兄妹三个已经插队去了，家里只有多病的母亲和刚上初中的小弟。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最高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我的历史罪恶活动全面交待

我是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干了一段长时间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替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蒋帮卖命效劳,残酷地镇压人民,镇压革命,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罪人,解放以后,党和革命人民对我宽大处理,没有将我治罪,还给我工作,这是我最难忘的大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阶级地位,生活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近十多年来由于我没有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极其严重,剥削阶级思想意识依然存在,並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这次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革委会和革命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我的罪恶历史进行审查和揭发批判,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对我极大的帮助,极大的教育,极大的挽救,使我思想上逐步有所提高,认识到我过去反党反人民的罪恶确实是严重的,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只有老老实实地把以往的见不得人的罪恶历史彻底地进行交待,低头认罪,争取党和革命群众对我从宽处理,才是我唯一的出路。现将我在国民党反动派

训练第九期受短期军医训练三个月,课程为内外科,七七事变后,我们学习期满,仍回伪军单位。

1937年下半年伪政府为对抗抗日在武汉成立防空司令部,兼作防毒演习,我也参加过演习,防毒演习是公开地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的,由傅英先经手主办(傅英先曾在南京伪防毒训练班学习过,他回汉后担任伪武汉市防空司令部防毒组组长)那时我也参加过帮助他作一些防毒器材的准备工作,防毒演习的内容是以动物(狗兔)作试验,将动物有的戴上防毒面罩,有的不戴,放置在有玻璃的纸箱中,通过毒气后,观察防毒面罩的效果。

1937年12月伪武汉警备旅改编为伪陆军第185师,我被调至该师1092团医务所当一付佐(上尉)军医,1938年夏旅部办着茨训练班我讲3几课,1938年下半年日寇逼近武汉,我于9月间随伪部队开赴咸宁,金牛镇前方,伪部队与日寇接触后被打垮,我同伪1092团医务所军医主任杜家瑞、徐军医(名字记不清)等随着溃退的伪部队步行到长沙。

我在伪武汉警备旅第二团医务所工作时,上面曾发给每个连队一把长指挥刀,平时都不佩带,只有在旅部召集全旅检阅时才佩带,平时是放在家中,我随伪部队离开武汉时,没有将刀带走,武汉被日寇沦陷后,我父亲将刀埋在家中地板下,1955年我父亲将房子卖掉,在出卖房屋办理各项手续时我均未过问,以后我父亲曾对我说过,新房主在修理房屋时将那把指挥刀挖出来上交了,当时未引起我的重视,以为上交了也就罢了,所以一直未向组织作交待。

我到长沙后住的三天内我到了我妹夫胡叔居,我爱人杨曼云(在日寇将要逼近武汉之前我二弟胡家铺在伪军医第33卫生

父亲所以数十年来一直保留着这些取辱底稿，我想大约是为了安全，他必须在不同运动不同背景下，保持自己叙述或交代的前后统一，唯一不同的是，他对自己“罪恶历史”交代得更彻底，更细致，以至许多微不足道或纯属私人生活的细碎往事，都不断地被挖掘出来。他对自己的批判也在一次次升级，一次次加入新的政治语词，以符合运动的需要。至于为什么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已宣布放弃阶级斗争，他自己也进入耄耋之年，还依然保存着这些屈辱的文字，是他有意想留给我们，还是他没有完全相信，这些东西是永远也用不着了，就已不得而知了。

为了认识父亲，我不得不一次次背负沉重，强忍痛楚，将父亲在一次次愈来愈强大的压迫与恐惧中，为了自身和家庭的安全写下的那些文字读下去，这件事断断续续用了我好几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又沿着父亲文字的线索，四处搜寻它背后的历史真相。最后，我终于从这些文字中读到一个壮丽温婉令人激动怅然的家族故事，一个时代大变迁，大震荡中的汉口人家的命运。

我见到父亲最早的一份履历，是1955年写的，查阅了一下，当时正值审干运动。可以看出，当年的父亲，已经学会了一套“新中国”的语言，并按照新时代的价值观来进行陈述。他在自己1949年前所服务过的许多机构前，都加上一个“伪”字——“伪一四五后方医院”、“伪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伪测量学校”（但略去了“军政部”、“中央陆地”等字眼），包括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惨烈屠戮破坏，并导致胡家背井离乡从江西迁徙到武汉的张献忠，也用了这样标准的革命语言“……胡家瑞，男，1913年9月3日出生。湖北省武汉市人。祖籍江西，在张献忠领导农民起义时迁来武汉居住。我祖父胡远盛年青时自行耕种小块土地，到老年时因所种田地靠近铁路线被当时铁路局购买去了，因此改业经商，在汉口开设振丰织布厂，数年后由于生意不好而停业，购置平房数间靠收租金过活。1915年患脑充血逝世。”

这一些文字中，父亲大约考虑到祖辈的土地、财富、社会政治态度等敏感问题，在叙述中都做了趋利避害的陈述，也让我知道了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在新政建立之后，毁掉了那么多旧时代的照片——因为照片上可以透露太多的信息。后来，我向亲戚们征集了许多胡家老

照片，询问了许多胡家往事，并实地走访了祖父辈的故居，看到了许多父亲未曾充分表述的情况。父亲说的曾祖父的“小块土地”，据我的大表姐说，在今天汉口闹市区的京汉大道上，紧邻当年最繁华的中山大道。20世纪初，张之洞修筑京汉铁路，征购了我曾祖父那块土地。曾祖父用那笔钱款，在汉口的发祥地——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居仁门长堤街购买了四处房产，自住一处，分给我祖父兄弟三人各分得一处，余下的现金，也做了这样的平分。这样，才有了后来我祖父兄弟三人投资碾米厂、织布厂等商业活动。2008年，我找到长堤街安定巷口的祖父故居，一个多世纪后，虽然进行过多次修葺改建，但原来的木质框架结构大多还在。临长堤街的两层楼房有两个门面宽，向安宁巷内延伸约二十多米，占地约二百多平方米。现在这块宅基地上已经住着十多户人家。我又找到附近祖父哥哥的故居，现在是我的远房堂兄胡发青的遗孀及儿子一家居住。他们说，1949年后，当年老屋的院子被房管所盖了公房，近些年，他们在老屋的宅基地上翻盖了这栋三层楼新房，占地面积也有近百平方米。



作者的曾祖父在二十世纪初

祖父一代，是胡家最后一代诗书耕读的传统生活者。他们自治自得的日子，突然间就被一次世道变迁兀然打断了，而他们的儿女们，

却是如鱼得水地进入到一种新的生活中。祖父那一辈，应该是怅然又平和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但是纲常尊严，生活习性都不允许他们也像子女那样改变自己。记忆中，祖父春夏秋冬所有的服饰，没有一样是洋装，甚至连中山装都没有。一直到他老人家上世纪60年代82岁去世，永远是传统的长衫长裤布袜布鞋，即便在武汉的酷夏中，也绝不穿短衫短裤。我父亲那一代，则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很快西化了，与祖父相反，他们留下的民国照片中，看不到一件中式服装。



1951年作者三叔一家和祖父胡传茂的合影。这样的旧时打扮，胡传茂坚守了一生。

祖父那一辈在这样一次大的社会转型中，是无奈的失败者和出局者。几次不成功的投资之后，他们都退回到个人的传统生活中。记得我母亲多次开玩笑说，你爷爷兄弟三个，一个玩鸟玩了一辈子，一个钓鱼钓了一辈子，一个玩蛐蛐玩了一辈子。母亲说的钓鱼的那一个，就是我祖父，七八十岁的时候，还会坐了火车到临近乡下去钓鱼。

但是，他们都将自己的子弟，培养成了最早的一批现代武汉人。满清到民国，两代人完成了一次天翻地覆又温文尔雅的历史转型。

“我父亲胡传茂出生于1881年9月7日。幼时在私塾读过4年书。成年后随祖父种地和经商。自从我祖父去世以后，曾做过猪鬃生意，一度和朋友合伙在硚口汉正街杨家河开设碾米厂，因为各股东意见不合而退股，并曾在旅舍和板厂当过店员。近多年来因年老体弱没有工作。我父亲一生胆小谨慎，闲暇的时候喜欢钓鱼，从来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



年轻时的胡传茂

“我兄弟姐妹共5人。姐妹各一，均已婚。弟二人都是医务工作者，二弟胡家镛现在汉口江汉区工会工厂联合保健站当医师，三弟胡家庆现在汉口市二医院当医师。我们兄弟姐妹因居住分散，平时很少

会面。我爱人王剑华浙江嘉兴人，初中文化，曾当过小学教员和店员，现在家中料理家务。目前我有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很年幼。

我是1919年2月间进汉口桥口惠民亭私立辅德小学读书，于1925年毕业，继续到汉口汉正街至公巷天主堂内进然中学读书，至1929年8月毕业后，由我堂兄胡家骥介绍到汉口鄱阳街天主堂医院学习班学习，当时因该医院学生名额已满，调至该院医师郑香亭诊所学习。1930年夏季，郑医师到上海开业并兼办牛奶厂，我也随同继续学习。”



抗日战争开始以前的胡家瑞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是武汉最好的一段时光，是史说“黄金十年”的顶峰。我父亲兄弟姐妹五人陆续立业成家。父亲和二叔都当了医生，三叔正在学业攻读之中。祖父在丧偶数年之后，放下了独自养育一群儿女的重担，除自己有房产及租金，还可以安享儿女之福了。但是，遥远的北方，一直暗涌着不祥风云，“九一八”之后，中国大地一直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父亲在自传中写到：“1935年11月，我考入武昌武汉警备旅第二团当司药，后来调为军医。1937年6月，我被保送到南京伪军医署军医学校军医训练班第九期受医务训练。七七事变，训练班于8月间结束，我仍回汉到原伪部队工作。1937年12月份，武汉警备旅改编为伪陆军第一八五师，我被调至该师一〇九二团当一等佐军医。1938年10月中旬，随伪部队开到咸宁县金牛镇前方与日寇作战，被打垮后，伪部队向湖南溃退，我到长沙后没有赶上伪部队，即随伪军署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我二弟胡家镛及女友，妹胡淑君，妹夫洪锦麟，爱人杨曼云都在该卫生船舶工作，他们是在我离开武汉的前一天送一批伤员到长沙的，我到长沙后找着了他们）。才知道二弟胡家镛又返回武汉去接另一批伤员了。”



这是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武昌解放路，该照片从蛇山天桥上拍摄。从1952年至1983年，作者胡发云在这一条路上住了31年，度过了整个幼年、童年和青少年。于作者而言，许多店铺都记忆犹新。这条最繁华的路段上，连同几百米远的民主路，起码有五、六家书店。

一部艰苦卓绝碧血汗青的武汉保卫战，在父亲的自传中变成了这样简单平淡的数百个字。在十多年后清队中的几次交代材料中，父亲对这一段历史有过更加详尽的描述，虽然里面充满文革的意识形态语言，但是从中我依然读到了那个民族危亡故园飘摇的气息。

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中国的危局日渐凸显。淞沪血战三个月，11月12日上海失守。一个月后，南京沦陷，日寇屠城。民国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是许多军用物资、工业设备、大学的图书仪器和各类人才都还滞留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重要机关以及主要的党政军要员们也已移驻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

军事、外交、经济与文化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也转移到了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日军攻克南京之后，紧接着就制订了进攻武汉的军事计划。1938年7月初，华中派遣军的兵力由徐州会战后的3个师团增加到14个师团，占当时侵华日军总兵力的百分之三十多，配备各型飞机300架，各型舰艇120艘。意图毕其功于一役，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完成对全中国的占领。

一场惨烈的血战即将开打。父亲在南京军医学校受训返汉，立即投入到防空防化演习培训中，父亲在1969年3月清队运动的隔离审查中写到：“1937年下半年，反动政府为了假抗日，在武汉成立防空司令部，并作防空防毒演习，我也参加过演习。防空演习是公开地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的……旅部办看护训练班，我讲了几次课。”

作为武汉保卫战的亲历者，父亲一定知道，那段日子，武汉上空发生过什么事情。但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那八个月中，血洒长天的武汉大空战。但正是父亲的这些交代，引领我去撕开了重重历史帷幕。作为一个在武汉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人，我居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家乡曾发生过中国二十世纪最大规模也最壮烈的空战。没有提到那些年轻的空军飞行员在敌我军力悬殊的搏杀中，一批批献出自己美好的青春，也没有提到无数的父老乡亲在大轰炸中血肉横飞家产毁尽……艰苦卓绝的武汉保卫战就是从一场空战开始的：“1938年2月18日中午，武汉城区响起了尖锐的空袭警报声，日军驱逐机26架掩护轰炸机12架正向武汉飞来。驻防汉口王家墩机场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代大队长李桂丹率29架苏制E-15、E-16战机升空迎击，在武汉上空与敌机英勇激战，击落敌机14架。其余日机狼狈逃窜，未能进入武汉市投弹。中国空军损失飞机4架。大队长李桂丹、分队长吕基淳、飞行员李鹏翔、巴清正、王怡5位勇士血洒长空。”（《武汉保卫战之二——武汉上空的鹰》）

父亲在交代中写到的“金牛之役”，也是一场可歌可泣的悲壮战歌。金牛镇，古称黄石、大冶，江夏，咸宁、鄂州五县通衢之地，是扼控

武汉南大门的要冲。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进攻安庆起，至10月25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止，历时约4个半月。日军前后投入武汉作战的兵力达35万余众（是时，日本全国陆军的总兵力约90万人），中国参战的部队则更达130个师，约100万人。会战时间之长、参战兵力之多、规模之大，是八年抗战期间任何一次战役所不能比的。父亲当时所在的185师，正是武汉保卫战结束之前，殿后作战的一支部队。军史上有着这最后一役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记载：“罗卓英指挥武昌以南金牛方面的作战，掩护各军撤退，整个武汉城区只留卫戍部队一个旅（第185师第545旅）的正规军作象征性的抵抗。至10月24日，以中山舰对日空战直至沉没，宣告了武汉失守。这天，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汉口市市长吴国桢宣布：‘保卫大武汉之战，我们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之能事，我们的最高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我们于人口的疏散，产业的转移，已经走得相当彻底，而且我们还掩护了后方建设……’同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关报《扫荡报》分别发表了告别武汉的社论。”

26日，日军第9师团攻占了贺胜桥，切断了粤汉铁路，但是，此时中国守军已经撤到了湘北及鄂西地区，日军企图在武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未能得逞。

武汉保卫战开始前数月，父亲让自己的妻子杨曼云，妹妹胡淑君，二叔胡家镛的女友（我至今没能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后来的家庭变故，家族对她颇有怨艾）及妹夫洪锦麟进行了三个月的战地看护培训，进入战时的一个特殊机构——军政部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这是战时通过水路救治运送伤病员的舰船医院。武汉保卫战中大量的伤病员，都要通过长江水运到湖南。在日军掌握制空权的形势下，这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我记起小时候，他们几位长辈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数次谈到在长江行船时，遭遇日寇飞机大轰炸，有一次他们前后的轮船都被炸沉，只有他们那一艘得以幸免。只是我并不知道那是一艘国军的医疗卫生船舶。父亲在金牛之役结束之后，步行到长沙，多方打听，找到已经护送伤病员抵达长沙的妻子，妹妹，二弟女友。但得知二弟胡家镛在这危难之时，再次返回武汉去接尚还留在那里的最后一批伤兵，那时，武汉地区大部分已被日军占领。第二天，适逢长沙大火，全城火光熊熊浓烟蔽空，整个长沙变为废墟。

短短数月间，父亲兄妹数人，宁静温馨的都市生活，兀然陷于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战火中。那时，年岁最长的父亲25岁，二弟的女友尚未满二十。我的表姐曾听长辈说，考虑到这一路颠沛流离风餐露宿会有许多的不便，父亲和大家商量了一下，给二弟胡家镛和女友匆匆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婚礼是在一个庙里办的。在父亲文革中另一份交代中，写到是在当时作为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临时驻地的长沙金刚禅院找到这几位女眷的，那么表姐说的庙，大约就是这金刚禅院了。一个战火狼烟颠沛流离中的战地婚礼，没有酒宴，没有洞房，只有漫漫长路，等待这几个年轻人继续跋涉。



胡家瑞兄妹三人广西汇合

父亲的履历中继续写道：“在1939年2月间派我到广西兴安大溶江镇伪军政部第一四五后方医院当一等佐军医，担任重病室与伤员室内科主治工作。同年8月被迫参加该院全体员兵集体入国民党，几个月后每人发给一个党证（解放时我将它烧掉了）。当时我对政治是模糊的，只知道搞医务工作。”



胡家瑞战争年代使用过的部分医疗器材，包括输液瓶、听诊器探头等等。椭圆形铜质注射器消毒盒上还可以看见“德国制造”的字样。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的堂姐，也就是二叔胡家镛的女儿从广州来汉省亲，我问起父辈的往事，她告诉我，她那儿有一张照片，是我父亲、二叔、小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杨曼云，还有已经挺着个大肚子的她妈妈的合影。我问，肚子里是不是你？堂姐说，是她的哥哥，比她大三岁，在她出生前就死掉了。因为这个哥哥的早夭，她父母亲感情有了裂痕。母亲怨恨父亲，一个当医生的，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

住。她母亲一度情绪异常，常常和二叔争吵。生下堂姐不久，她独自一人去了重庆，在舞场里和一个英国人好上了，不久和那个英国人一起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英国。这样的一次私奔，对于胡氏家族来说，是一个逆天的恶行，也是一次奇耻大辱。后来，以至数十年后，堂姐的生母多次要求回来探望女儿，都被我祖父等坚决地拒绝了。她们最后见面与和解，是在上世纪末。

战时药品紧张，即便是自己的亲人，也不能随便动用军用药品的。但是二叔的妻子一直不能原谅这一点。

这个悲剧也发生在我父亲身上。1940年冬天，他年轻柔弱的妻子杨曼云，在两年多的跋涉辗转辛劳困顿后，因病不治去世。这是父亲一生中，对他打击最大的一件事。其后数十年中，父亲从没有再提起过这件断肠往事。在他的交代材料中，有这么几句淡淡的文字，但我读得出他从未遗忘的伤痛：“1940年冬我爱人杨曼云因病去世，由于夫妻感情的关系，当时对工作不起劲，想离开大溶江镇，于1941年3月间请准长假离开医院，于1941年夏季到达重庆后，找到了我爱人的哥哥杨圣诚处闲居。”

堂姐回到广州，给我寄来了那张极其珍贵的照片。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让他们在这样一个阴郁的秋天相聚了。照片上，我父亲他们五个都穿着便装（或许正是这一点，让这张照片得以保存到现在的）。面容消瘦，神色阴郁，衣衫也远不如往日讲究。一点也看不出劫后重逢的欣喜。杨曼云静静站在父亲身边，这大约是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我曾在我三叔家看过她一张战前的照片，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斜躺在草地上，纯净又快乐的样子。

杨曼云去世的时候，应该很年轻。她还没来得及生孩子。

九年之后，我母亲要生我的前些天，做了一个梦。梦里杨曼云来到她床前，神色悲戚，对我母亲说，看你多好啊，有了家，又要有孩子了。然后久久无语。我母亲将这个梦对我父亲说了。父亲沉吟半天说，这个孩子生了，不管是男是女，就叫云吧。于是，我的名字，就和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性有了关联。这个女人跟随我父亲，在战火中

流离半个南中国，最后把年轻的骨骸，埋在了西南边陲一个叫大溶江镇的陌生地方。也埋葬了父亲战乱之中最珍贵的一段恩爱。

“抗日战争胜利，医院随兵役部办理结束。我于1946年元月被调至白市驿伪第四军官总队第一大队为队员兼医务所主任，1946年3月由过去的同事唐健民介绍我进重庆北碚伪中央测量学校校医院当二等正军医（中校）。该校在1947年秋迁到苏州。”

父亲调往苏州，这个美丽的江南文化名城，从此与我有了生命联系。

父亲一生喜爱艺术，1940年，刚到广西大溶江145后方医院的时候，父亲曾和小姑父一起，组织了一个京剧社，为那些伤病员和医务人员演出。**父亲去黑头，姑父去小生**。我们小的时候，偶尔会听到他们一起唱唱老戏。

父亲在另外一篇交代材料中写了，到了苏州之后，很快爱上了苏州评弹。闲暇时光，常去各个书场听书。当时我母亲在评弹艺人张月泉工作室（原文如此）工作。母亲的任务是到各个书场听书，将其他评弹艺人的好段子，好书目默记下来，回来后整理成文，供张月泉参考或使用。（母亲的这段经历，她生前也从未对我们说起过。）就这样，在书场里，他们相识相爱了。1948年春上，他们结婚了。我算了算，我应该是在苏州孕育的。

顺便说一声，查阅父亲在苏州中央陆军大地测量学校资料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之父吴忠性，和父亲曾是同事。一个是校医，一个是教官。只是前者在1949年后进入共产党军队，而我父亲当年婉谢了让他留在共产党军队医院的请求，乘舟东下，回到故乡。

父亲最后写到：“1948年9月调至汉口洞庭街兰陵路口伪军医署第二休养总队当二等正医务主任。1949年2月该伪总队奉伪军医所的命令向重庆迁移，先搬到湖南衡阳，到衡阳后总队以下的几个组改为大队，1949年5月伪总队分数批迁重庆，有的走水路，有的走陆路，我同

总队部的一部分职员和眷属是第一批乘火车到柳州转搭汽车于7月抵达重庆。11月重庆解放前夕，该队总队长金克明逃跑了，总队部大部分同事不愿意走等待解放。重庆解放后，我们随着伪军医署所在解放军二野军事代表赵文怀领导下办理清点移交物资，并在二野卫生部学习队学习三个月，于1950年3月呈请批准返籍。蒙二野派船并发给生活费等回汉。”

这二百多字，其间又有多少风雨飘摇荡气回肠的经历？1948年9月，整整十年之后，父亲回到了三百年来先人居住的故乡武汉。带回了他的新妻，和新妻腹中的孩子。那是他动荡半生之后的第一个孩子。我曾见过一张胡氏家族在那年冬季的全家福照片，年近七旬的祖父端坐中间，父辈兄弟姐妹五个及其配偶子女依次前后左右排列。长辈们指着照片上我母亲隆起的肚子对我说，那就是你。那是自1938年那个离乱之秋十年后，全家人的第一次团聚。

那一年父亲已经35岁。父亲依然在为那些伤病员工作，但这一次的伤病员，是在中国人的自相厮杀中流血负伤的。

1949年1月8日，我在离祖父家不远的普爱医院出生。那是一家建于1864年的教会医院，也是湖北省最早的西医院。据说那一天，蒋介石在武汉黄浦路官邸召见孙科、张群、张治中，商讨最后的和谈事宜，并令外交部长吴铁城知会美、英、苏、法四国驻华大使，请其协助完成和谈，未果。13天之后，老蒋黯然下野。于是，便有了父亲履历中交代的“伪总队奉伪军医所的命令向重庆迁移”——几乎重复了十年前那一条护送伤病员艰难西撤的路线。那是1949年2月，我刚刚满月。这次西撤历经五个月，7月到达重庆，11月底二野大军进入重庆。父亲是有机会去台的，他当时已是休养大队负责人。但是他放弃了，守护着全队设备药品还有那些伤病员等待一次历史的大更迭。父亲也是可以进入共产党的军队医院的，但是他也放弃了。正如他说的，他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认为治病救人，悬壶济世，是医生的天职。他后来才知道，有一些人，哪怕是保家卫国浴血杀敌的手足同胞，也是不可以被救治的。救治他们，就等于是他们的帮凶，是人民的敌人。这些在文革中成为组织和群众对他说得最多的批判用语，后来也成为父亲对自己罪行的批判用语。

一段漫长的军旅医生生涯终于结束了，十多年战争的腥风血雨也停息了。父亲卸甲还乡。他当年拿着二野军代处发给的批文与路费乘舟东下时，大概没有预料到，其后十多年中，还有着那么漫长的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在等待着他。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照片，是父母和幼年的我。这张照片一直都在家里的：母亲穿着旗袍高跟鞋，抱着我。父亲长裤衬衣，侧后站立。父母脸上都是安宁幸福的微笑，一点也没有另一种危险与苦难逼近的感觉。倒是不到一岁的我，眼里充满疑惑和思虑，和那种年龄很不相符。



十个月的胡发云和父母摄于1949年最后的重庆。这是胡家瑞最后一张身着军便装的照片。

一直到我弄清了父亲那长长一段历史之后，我才发现这张照片是在重庆拍的，仔细看，父亲穿的是夏季的军便装，肩头还隐约看得见肩章扣带。这是父亲唯一一张和他军旅生活有关联的照片。他所有其他物件都毁掉了，照片，手枪，中正剑，各种可能会带来麻烦的衣物和用品，还有他及他的亲人们所经历的一切。我想，要是没有后来一次次的交代材料，父亲便永远地消失在天翻地覆后的历史烟尘中了。

父亲的叙述中，多次提及“请假”、“请调”、“请辞”，说明了当年国民革命军机构中的技术人员，是拥有很大的职业选择权的。当年，不论在日占区还是在大后方，作为一名年富力强的医生完全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样式，甚至留在沦陷的武汉，也依然可以过好自己的日子。我的三叔胡家庆在日寇逼近的时候，因为尚未成年，和祖父一起留在了武汉，数年后也成为一名医生，从日据时期，一直到1949年后，他是我父亲兄弟三人中生活得最富裕也最安稳的。这只能说，十四年的军旅生涯，是父亲自己的选择。这也是我们从未听到父亲对他当年的选择悔痛不已怨天尤人的原因。

父亲从中学起，读的就是教会学校，工作初期，也是教会医院。一直给他各种专业教育和提携的天主堂医院医师兼太和医院院长郑香亭先生，也是一位天主教徒。我不知道父亲是否也曾是一名教徒，或有宗教信仰。但是从他一世的作为，对待人生命运的态度，我看到他内心的光。

发现土地的秘密

历史是关于“故乡”的回忆，故乡是快乐和痛苦交织的土壤，有人，有土，有情，有天。如果历史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专利，那么它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都算不上，仅是一架阴森的骷髅。

文/王颖（扬州中学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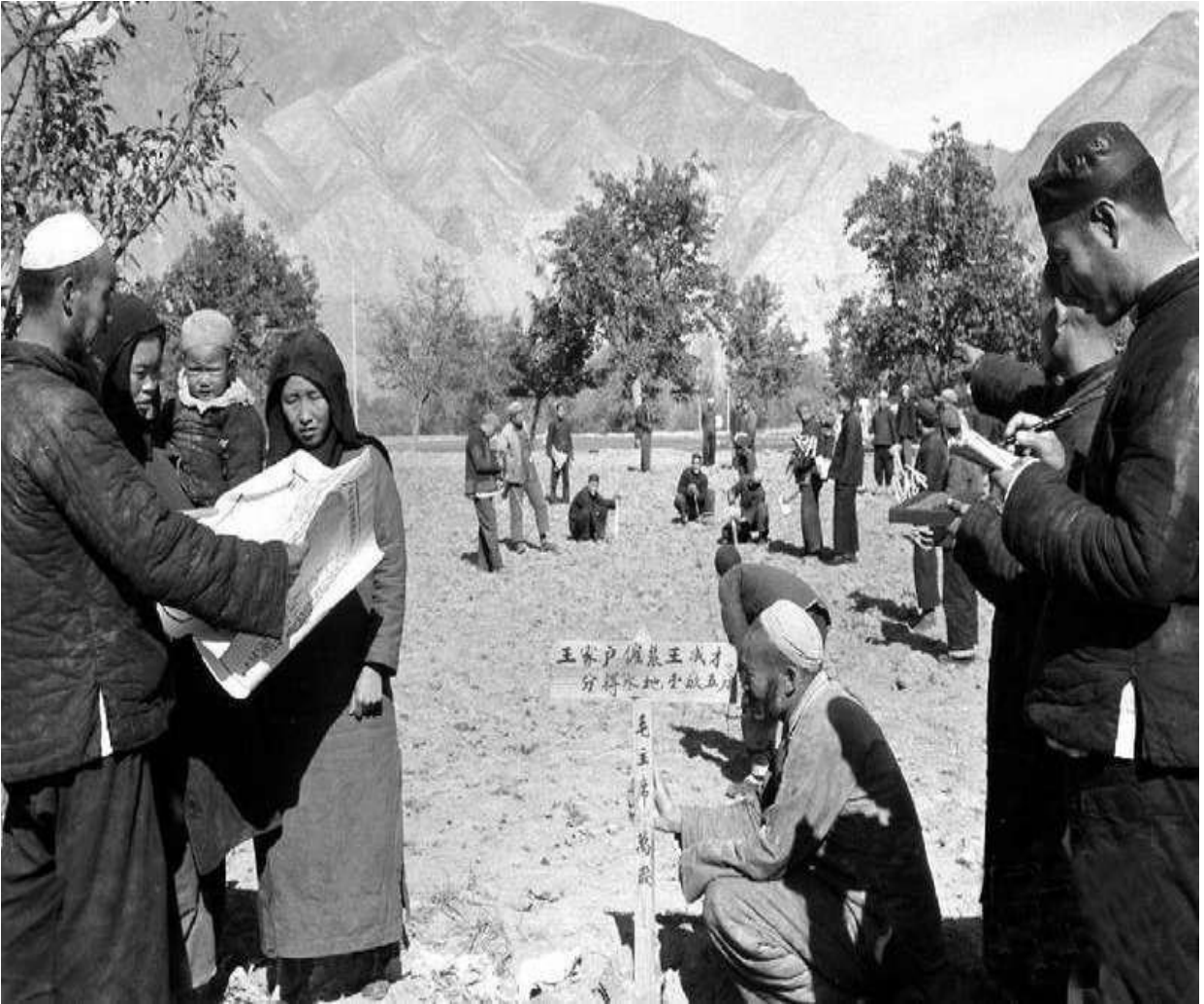
（编者注：王颖为江苏省扬州中学高中学生，2012年，她以《土地，土地》一文参加了“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并获一等奖。王颖从母亲的一句话中，开始了好奇的探究和发现，并通过亲人的访问和乡人的调查，发现了一段与己相关却从未听闻的历史。这是一个发现土地，以及发现人与土地生死关系的故事。）



王颖在新历史合作社举办的历史嘉年华2013活动现场进行主题演讲



1951年11月至1952年2月，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团西南第一团工作人员赴川西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图为川西彭县升平乡农民在土改中斗争地主的情形。



1951年，青海省经过土地改革，无地、少地的各族农民分到了75.248万亩土地。图为民和县川口区的回族、汉族农民在分好的土地上插地标。

找到“土地”这个切入点，看似巧合，实非偶然。

与那块土地直接相关的人，是我的外婆。外婆走得早，年幼的我尚且对生与死没有准确的概念，关于“外婆为什么会死”这个问题，妈妈的回答是外婆命苦，再不愿往下说。直到一次和我逛东关街，她指着路旁的青砖墙告诉我：当年你曾外祖父家房子外的围墙也有这么高。藏在心底就要遗忘的问题涌上了心头：外婆怎么会命苦？我曾祖父是做什么的？那所房子现在哪里去了……

当得知曾外祖父是“地主”时，心里有些小虚荣，未想到祖上竟有此光辉。顿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飘飘然之感。转念又想到历史书上“打土豪、分田地”等内容，“地主”可不就是周扒皮之类的混蛋恶霸，是咱人民的敌人嘛，一丝嫌恶搅合进来，真是万分纠结。对待“地主”的心情如同现代人对待“土豪”，羡慕和嫌恶兼而有之。

曾外祖父家男丁多，多产的粮食可以卖不少钱，他用卖粮食的钱来买土地。越近年关，曾外祖父家就越热闹。来卖地的同庄子的农民，大都分为两类：一是家中实在是田少人多，再勤恳也余不下粮；二是家中土地充裕，自己好吃懒做。这就解释了土地的分配最终难免走向兼并的原因，因为生活要的不是土，而是土里生长出的“银子”，没有钱，只能卖地。这样生动而符合逻辑的解释，教材上是不会出现的。曾外祖父打发了农民之后还要应对骂开来的妻子，家里虽然田多，日子并不充裕。

同是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曾外祖父怎么就能多产粮食呢？母亲说大概是因为他的精明，人家要卖地给他，他不会当面答应，当天晚上会偷偷地跑到地里去走一圈。一个资深的老农民，通过步数就能大概判断出这个地是不是足够大，他还会偷偷地拿地里的土回家试种，看这个土地是否足够肥沃。

母亲的话向我描绘的是一个善良的老农民，为帮助别人才拥有许多土地，却因这些土地被误解，被欺凌。我从主观上相信我的母亲，同情我祖辈不幸的遭遇，有一种叫不平的心情会悄然滋生。我不知道向谁去申诉，不知道除了家人之外还有谁愿意听这个故事，不知道还有谁还记得这些故事。

于是我选择将此事逐渐淡忘，如果没有“中学生写史大赛”，不用几年这件事就会被我彻底遗忘。当我的老师将大赛宣传片播放出来时，曾外祖父的故事一下子就从记忆里跳出，故事与大赛的要求那样吻合。我想这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个回归记忆，追寻真相的平台。尽管时间很紧迫，我已下定决心要参加。

真实的故事与小说最大的不同，就是完全不用苦思冥想出人物的姓名、年龄、性格特点。这让写作变得轻松不少，很多时候，是故事本身在牵引着自己走，而不是用键盘生硬地敲打故事。历史本身就顺应着事件发生的逻辑，虚构的细节是无法和事件节点相吻合的。就以我外婆为例，曾外祖父去世前对外婆说：“这辈子，要找最穷最穷的人嫁。”外婆生于1946年，曾外祖父去世时她正好20岁，正是嫁人的年纪。

人物以及视角的选择困扰了我很久，初步曾外祖父周登发定为主人翁，还是有点犹豫。毕竟周登发这个人物太小，既不是参与长征的红军，也不是共产党的地下专员，更不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充其量是一个受害者，但受害比他更严重的还大有人在。然转念又想，既然是受害者，便是真正经历过那段历史。中国的历史多是写帝王将相，小老百姓像是历史汪洋中的一粒细沙，渺小得无法找寻，殊不知，一粒细沙再小，也是来自于人来人往的沙滩之上。有人处，便有历史。曾外祖父家，不过是那个时期一类人的小小缩影。这里，仅当我是用一粒沙代表了一片沙滩。

初稿当真是满怀热情一气呵成，拿去交给老师，又被退回修改。自己再读，确实有不少的人称错乱，事件与事件的联系不清晰。再问母亲，她能提供的信息也很少。为了将断点的圆圈画完整，我找到了我的舅公，也就是曾外祖父的大儿子。向舅公说明了来意，他没有向我讲述，而是告诉我最好不要写这篇文章。又提到“抓起来”“政治”等字眼，或许是“叛逆”在作祟，我本着“反正我说的是真话，没什么好怕的”这一想法，等到了舅公的妥协。

从舅公的讲述中，我不仅得知了曾外祖父兄弟俩的确切姓名，还纠正了“地主”“富农”的出现时间。长时间以来，“土改”和“文革”因其悲剧性如同糨糊般混淆在我脑中。早在土改之时，曾外祖父就被扣上了地主的帽子，好在“土改”虽然没收了大部分土地，最后还分得了18亩，一家人的日子勉强过得下去，真正的苦难到文革才开始。

半夜里，家里突然闯进了一群庄子上的农民，曾外祖父周登发和妻子、弟弟周登宝和孩子们都被这群人赶到了院子里，一部分农民留

在了院子里，看着周登发他们，剩下的农民浩浩荡荡冲进屋子，厨房里的碗筷有的被抱走，有的直接被摔在地上，房间里的脸盆架倒了出来，铜盆落在地上，不一会，又被人捡起，拎在手上出去了。家里预备过年的咸鱼咸肉被提了出来，几个人哄上一抢便没了。两三个人正扯着一团大红毛线，周登发的小女儿刚想哭喊，她的母亲就已捂住她的嘴巴，她闷闷地叫了几声，在砸抢之声中渺不可闻。连曾外祖父套在脚上的鞋子都没有放过。

地主是要批斗的，曾外祖父的弟弟周登宝挡在他前面，周登宝道：“老大，一根油条你我都一人一半，今日的祸我也替你分担。你只照顾好嫂嫂和侄子们。”周登发只能看着弟弟被那群人绑着，脱了外裤，站在冷水桶里。一盆一盆的冷水从周登宝的头顶浇下，水桶里的周登宝，双腿发抖，浑身哆嗦，嘴唇也是青紫。到天亮时，周登宝才被人从冷水桶里捞出来，双腿已走不了路。

我看见舅公的手因患帕金森综合征而颤抖，这一切让我觉得难以置信。以往对“文革”的印象仅来自于文学及影视作品，苦难也只是那些角色的苦难。我从未想过这同时期的故事离我这么近，痛得像后脑被人狠狠敲了一棍。

在我动笔修改的那段期间，舅公一个下午连续打了四个电话给我，反复提醒我写作要注意尺度，甚至一度想让我放弃。我可以理解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他们后怕的心理，也感受了一个长辈对后辈的关爱。我知道那篇文章的意义不在批判，我更相信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年代。

“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毁了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解决了封建制下人身对土地的依附，给与人身自由，促进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这是网络上对土改主要意义的概述。土改的重要意义是不能否认的，没有彻底的土改，农民还是没有土地，地主仍然可以随便剥削，农村的生产力得不到解放，政权无法有效巩固。很多人都把地主的形象定义为“周扒皮”这一类恶霸混蛋。但实际上土改时很多的“地主”“富农”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智慧、努力挣下了自

己的家产，由于在土改之中被划定了成分，导致自己，乃至全家人一生的痛苦。

在电脑上敲完正文的最后一个字，文章的标题也有了。不需要任何修饰语，我打出“土地，土地”四个字。两声“土地”像是悲叹，像是呐喊。土地二字朴素而沉重，仿佛有压迫感从面前袭来，很快又消失了。反复浏览着修改稿，像是完成了一个重大的使命。我从容交稿，此时获奖与否已不再重要。

在此之前，若问我历史是什么，我会很老实地说，它仅仅是一门高考学科，每个事件都是公式般的背景、经过、意义、影响，背熟它们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历史是和记忆相关的学科，历史教科书是一个与过去建立联系的方式。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的途径：摄影、录音、纪念馆……对中学生来说，参与以家庭为单位的写史，无疑是最为快捷轻松的方式。一旦参与进来，就像换了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平时看不见的、广阔生动的世界。无意识的，我们成为历史的一员，可以近距离感受历史的脉搏和心跳。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历史是关于“故乡”的回忆，故乡是快乐和痛苦交织的土壤，有人、有土、有情、有天。如果历史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专利，那么它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都算不上，仅是一架阴森的骷髅。不可否认小人物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他们也是历史的弱者，一只无形的手捂住他们控诉的口，留下一把把辛酸的血泪。我们要做的，是从家庭开始，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故事。在时间的沙海中寻找历史的碎片，将它们拼接完整，这是我们后来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国可亡而史不可灭”，由个人的记忆，到民族的记忆，再成为国家的记忆，这才是我心中的历史。

土地，土地

文/王颖

一抔新土

越近年关，老周家的门头就格外热闹。

周登发看见妻子变难看的脸色，意料之中，还是去开了门。

进来一个同庄子的农民，又是来卖地。这些农民大都分为两类：一是家中是实在田少人多，再勤恳也余不下粮；二是家中土地充裕，自己好吃懒做。

周登发答应买下那人的一亩半的土地，拿了现钱出来，打发了农民离开。妻子见人走远，开口就骂：“又买！买了你种的完？”周登发无奈：“家里不是人多么，更何况他们也要现钱来过年，到年关了，我不买他们的地，不是把他们逼死么。”妻子瞧了周登发手上的钱袋，越发气恼：“家里的钱哪里不是一分一分卖掉粮食挣来的？外面多了那么些田，家里日子却过得紧巴，说出去都觉得好笑！”说完进了屋，狠狠甩上了门。

周登发无奈，这种争吵，每隔几天都要来一回。

冬日里入夜极冷，周登发多裹了件外衣，走在空荡荡的田埂上，还是冻得发抖，他清晰地听着牙齿碰撞的声音。

布鞋踩在冻硬了的土地上，每一步都直直的，周登发口中数着步数，呼出的白气弥散在空中。转了弯，还是在这家的地上，沿着田埂继续走，一圈走了下来，周登发略略算了下，统共是有一亩半的大小，放下了心。

周登发瞅着这片夜色下的土地，仿佛看见了第二年秋天丰收的景象，到时遍地金黄，收了粮食卖掉，家里多了一份收入，日子也可以宽裕些。黑暗中，周登发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欣慰的笑容。

第二日，家中的花圃有了松过的痕迹，小女儿弯下腰，发现新鲜的土壤中埋下了一粒粒的种子。周登发带了弟弟周登宝和大儿子来到花圃旁，说道：“这是那几家地里的土，咱们先试种，看看土质，再决

定明年种什么。”周登宝笑道：“大哥这几天晚上冒了天寒出去就是为这个？”周登发点头，摸着老大的脑袋：“老大要记住，土地是咱农民的根，马虎不得啊。”

小女儿方才两三岁，听不出个所以然，只大略知道土地是个好东西，有土地，他们一家才有饭吃，才能把米借给别人，才能买得了物件。想着可以买东西，又高兴地蹦跶到别处玩了。

1950年，那些新土，那些可以帮着农民过冬，那些承载着周登发希望的新土，将他和他的家人带入了苦难的深渊。

周登发和周登宝两家总共有六十多亩地，队里来了人，只说他们家的地超过了这边人家的平均数量，多出来的部分全部要充公，另外，根据多出来的亩数算，他们一家会被划分成半地主（富农）。

妻子趴在周登发的腿上只是哭，一直哭，声音越来越小，再没有劲力大声骂喊。

半根油条

半夜里，家里突然闯进了一群庄子里的农民，周登发、妻子、周登宝和孩子们都被这群人赶到了院子里，一部分农民留在了院子里，看着周登发他们，剩下的农民浩浩荡荡冲进屋子，厨房里的碗筷有的被抱走，有的直接被摔在了地上，房间里的脸盆架倒了出来，铜盆落在地上，发出金属的嗡鸣，不一会，又被人捡起，拎在手上出了去。小女儿才4岁，只以为自己在做噩梦，恐慌地躲在母亲身后，双手抓住母亲的裤腿，仍在不停颤抖。家里预备过年的咸鱼咸肉被提了出来，几个人哄上一分便没了。两三个人正扯着一团大红毛线，整齐放在箱子里的毛线，现在杂乱纠缠，那些人更加分不开，只得狠狠地骂。小女儿认得那团毛线，是母亲预备给自己织毛衣的，她刚想哭喊，母亲就已捂住她的嘴巴，她闷闷地叫了几声，在砸抢之声中，更加不可听闻。

领头的人拿了搜出的余粮钱，走到周登发跟前，弹弹纸钞：“就这么点？”周登发配合地从地上站起，不发一言，他知道，这是要搜身。

那人从周登发的胳膊向下，一路拍打，没有任何收获，有些悻悻，看见周登发脚下的鞋子，顿时来了精神。周登发看着那人发亮的眼光，脱了鞋子，赤脚站在旁边的地上。那人倒提一只抖抖，什么都没有，一脚将另一只也踢远了。

那年的冬天，格外的寒冷漫长，一大家子十几口人，蜷缩在小小的房子里。

那群人来时，小女儿往里缩了缩，见他们要带走父亲，立刻和哥哥跑了出来。周登宝挡在他们的前面，对那群人说道：“我哥哥身体已经不好，我代替他去。”周登发一把拽住周登宝，周登宝道：“老大，一根油条你我都一人一半，今日的祸我也替你分担。你只照顾好嫂嫂和侄子们。”周登发双眼闪着泪光，看看孩子们，又看看妻子，松开了抓住周登宝胳膊的手。

周登发只能看着弟弟被那群人绑着，脱了外裤，站在冷水桶里。一盆一盆的冷水从周登宝的头顶浇下，伴随着哗哗水声的是人们高兴的呼喊。水桶里的周登宝，双腿发抖，浑身哆嗦，嘴唇也是青紫。到天亮时，周登宝才被人从冷水桶里捞出来，双腿已走不了路。

中午，周登发被抓了去，戴上高高的大帽子，和庄子里其他几位地主富农一起，拖到了搭好的台子上。大队干部涨红脸，把右手举得高高的呼喊：“打倒地主阶级！”“打倒万恶的地主分子周登发！”围观的人立即跟着呼喊口号，声浪阵阵，似要刺穿他的耳膜，他将头放的很低，身后的棍子更容易地敲在他头上，一下又一下，五官因疼痛而扭曲。

周登发被压制着，沿着队里划分好的路线走在村庄之间，头上的高帽尚未摘去，胸口还挂着“地主分子周登发”的大牌子。周登发不知道群众为何这么激动，吵吵嚷嚷，他也无心细听，就是这些人卖过地给自己啊，多么好笑。他喉头苦涩，咳嗽咳岔了气，脚步略一停顿，被人从后面狠狠推了一把，踉跄一大步。

一块烧饼

周登发一家，没有能够入社。

周登发会比平时起的更加早，他要去城里拉灰，回来为土地施肥。车内的灰沿着他走过的路慢慢洒下，流成身后地上的细细长线。车，他可以推得很稳，但他们家的土地被分在别人的田中间，连平稳直达的田埂都没有，拉灰的木车只能在土路上颠簸，像一个不驯服的小兽。

到了中午，周登发吃不了大食堂，又不愿耽误时间，每天早上在衣服里放一块黄烧饼，那烧饼由体温捂着贴身放了一上午，竟是温的。他就站在路边上啃，也不喝水。同一个庄子的人，每看到他灰旧的衣服前襟张着，都知道他怀里揣着块烧饼，必是今日的午饭，脸上便会挂着怪笑。不知从何时开始，“周登发”和“黄烧饼”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一个笑话。

当弟弟周登宝告诉周登发那些“地主”“富农”也可以申请入社时，他却有些犹豫。他问弟弟：“公社里的生产不是要换成工分？”弟弟点头，他想了下：“这几年人民公社里的情况也不是太好，大家在一块，积极性都不高啊。我一样的种地，拿工分换到的东西却少了，日子不是更难过么。”弟弟指了指院子内的小侄女，说道：“哥，你不入社，孩子上学怎么办？家里到现在还没通上水电，水可以从外面井里打，电怎么办？”

周登发最后还是打了入社申请书。

日子并没有好起来，自己的小女儿逐渐长大，作为富农的子女，她成分不好。平时在家门口玩就经常被歧视，每当知道大人们都告诫自己的小孩，不要和自己的女儿这群人玩在一起的时候，周登发只能将哭泣的女儿抱入怀中安慰。周登发没有想到，自己入了社，孩子读书也只能读到小学，没有初中高中可念，更不用想分配工作。

周登发终究因为不甘心气坏了身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黑五类”被提出来重新批斗，周登发的病终是熬不过去，没等得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在1968年便撒手去了。临终之前，周登发把女儿叫到床

边，看着自己的最小女儿，无力说道：“我以为可以让你母亲、兄弟们过得更好，结果终是让你们跟着我受苦，是我害了你们。我们现在是穷，但穷……是好事……”他抬手帮女儿擦去眼泪：“我有罪啊，不能看着你出嫁了……”周登发浑浊的眼中突然流下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在枕巾上。抄家、批斗、嘲笑……这一件件事情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发生的，胸中闷闷地疼痛还是那么深刻。周登发声音哽咽：“老七，只记住，一定一定要找最穷最穷的人嫁！”

小女儿哭倒在周登发床前，再抬眼时，周登发已驾鹤西去。

历史感悟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很多犹豫。第一，便是题材，我选择了土地改革。在多数人的印象中，什么“地主”、“富农”这类名词，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才出现。实则不然，中国近百年来总共有三次土地改革，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第二次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次便是离现在最近的，也是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1950年土地改革。周登发，也就是我的曾外祖父所经历的，正是第三次土地改革。然而文化大革命发生在1966年，远隔了整整16年。

第二个犹豫便是人物以及视角的选择，初初将曾外祖父周登发定为主人翁，还是不放心的。毕竟周登发这个人物太小，既不是参与长征的红军，也不是共产党的地下专员，更不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充其量是一个受害者，但受害比他更严重的还大有人在。然转念又想，既然是受害者，便是真正经历过那段历史。中国的历史多是写帝王将相，小老百姓像是历史汪洋中的一粒细沙，渺小得无法找寻，殊不知，一粒细沙再小，也是来自于人来人往的沙滩之上。有人处，便有历史。曾外祖父一家，不过是那个时期一类人的小小缩影。这里，仅当我是用一粒沙代表了一片沙滩。

我用第三人称来写，写完自己都觉得像是写了一篇故事。无论这个故事是否能够打动人，那段历史都不再冰冷。那是已成历史的人和

事，他们有语言，有泪水，有无奈，有神态……我想通过活生生的人事，警醒自己，警醒他人。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喊冤平反，更不是为了批判，只是为了去揭示一段真相，还原一段历史。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其影响必然有正面，有负面。不应该简简单单地怪罪个人，那个时代本就无人对错，只是迷茫无知罢了。但如果现在，我们仍在对待某些问题的态度上，轻易地下定义，从而将矛头指错对象，那便是悲哀了。

(注：本文为“为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获奖作品，此处刊用时
有删节)

反思历史始于疑

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我才真正从根本上考虑过往二十多年的经历。可以说，让我真正对历史开始反思的，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在温都尔汗之后。

口述：张思之（律师） 整理：杨东晓（本刊主笔）



张思之在新历史合作社举办的历史嘉年华2013活动现场进行主题演讲



从1950年年底至1952年10月，中共中央先后在全国开展了“三反”和“五反”运动。图为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



三反五反运动时期。广州市百威药房老板虞尧梁贩卖假药，走私漏税，套取黑市外汇，作恶多端。图为新药业店员向他进行斗争的情形。

“九一三”

我知道林彪出事算是很早的，大概是10月10号左右。那时我还在北京郊区的南口农场劳动改造。10月初，和我同在南口农场劳动改造的朱平——他是我在北京市法院时的同事，来告诉我“林彪出事了”。

朱平是我们劳改农场唯一的经常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听的人，他不仅外语很好，还有一项技能：会调短波。所以他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消息。当时我们能够每月进城一次，10月1号他回城里，更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听了。

我从1954年就开始“偷听”敌台了。那年搞内部肃反把我软禁起来，这时我得到320元稿费，我们领导找到我说“你不要拿这笔钱”。我说这不是我愿不愿拿的事，现在的问题是人家给不给。

但是人家出版社根本不理法院，还是把320元稿费给我了。我去买了一台南京电子管厂的熊猫牌五灯收音机，能够听短波的。我就开始听敌台了。

尽管自肃反以来，我此生遭受的一连串的厄运就开始了，但我一直没有想过是哪出了问题，一直把毛泽东当做神一样对待，直到林彪在沙漠中折戟了，一个写入党章的人“温都尔汗”了，肯定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分歧，而且分歧公开化了，这使我产生了思考：他的接班人，一个刘少奇，一个林彪，怎么都公开分歧了？

“镇反”

我对1951年镇反的做法，当时就是不赞成。因为这样做不是依法办事，处决一个人起码得经过法律的审判，得给人有个说法。镇反的时候也不经审判了，一张布告几十个人命就没了；没有布告也可以杀人。尽管我对这种做法不赞成，但镇反是当时的大趋势，毕竟是个运动、是个政治运动，我也就认为应该把政治放在第一位、一切都应该服从政治需求。1979年平反后“归队”时我不愿回法院，也与这个有关。

我亲眼见过的一次在土城执行枪决，枪决了70人。我眼见那被杀的、杀人的，都在发抖。开枪的都是新兵，他们的手都在抖。有的犯

人都不止挨了一枪——士兵也害怕，打不准啊！那个场面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招架不住，心里很久都过不来。

从1951年镇反开始，到1952年“三反五反”，再到后来的历次运动，法院都很难严格地依法办事，都是服从政治。给我印象最深、刺激也最大的，是1957年反右之前，人大代表对法院镇反的做法很怀疑，于是有人大代表到法院来视察工作。法院对在此前没下过判决书的死刑，临时写了判决书，一看就是假的，怎么办？就有人出主意用醋泡。后来，法院的同事陈建国贴出了大字报：“法院醋泡判决，良心哪里去了？”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

“打老虎”

镇反以后，印象较深的就是“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我前几年为了回忆这段历史，查了一些资料，毛泽东每天都有指示，他是亲自指挥。他一定要在全国打出大老虎，包括部队里也要打出大老虎。

北京市的法院开始没有动，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机关没有成立打虎队。后来每个单位必须有老虎，哪个单位没有老虎，单位必有问题。这个时候法院也成立打虎队了。

当时法院领导还很信任我，让我做打虎队队长。可是我什么材料都没有，什么根据都没有，我怎么打呢？

当时的院长王斐然、副院长贺生高他们两位都对我很信任，他们让我做打虎队队长，我也不好拒绝。当时我的工作最忙，敌伪产的案子积压了一万件，工作忙又要打虎，怎么办？那就只能晚上打。

打虎打谁呢？既然反贪污就找财会部门吧。财会部门找谁呢？想来想去，就去找在旧社会法院工作过的财会人员。我们查了他的账，人家确实没问题，我们拿不下来他。于是就想方设法内外夹击，找他

的夫人、深更半夜到他家里去闹。搞了很长时间，这个“虎”还是打不下来，人家确实没有贪污。

我们住的那个院子是法院宿舍，后来有人告诉我，听到他夫人在院子里跟人说：“张思之没有良心，他结婚的被子都是我给他缝的，被子四个角上那花生、栗子都是我从山上给他找来的。他这样欺负我们、欺负老头子，坏了良心了。”

这场运动中，我也想到过，这样做对不住人家。但那是大运动，不是他家就是别人家，反正得找出大老虎来。

揭发

我们的院长王斐然，是1948年和我一道从解放区进北京城的老领导，他人是不错的。1951年镇反之后，北京市委以副书记刘仁为主的一些领导，认为应该充实法院队伍，于是从北京市公安局调来了他们信任的贺生高来做副院长。

贺生高是位老陕北人，是一位非常正派的人，他是刘志丹那时的人，他到最后走的时候，身上还带着几颗子弹。

正副院长后来对立起来了，两派之间弄出很多矛盾。

有一次我听到王斐然在下班后给一个女子打电话，而此前又听说过他进城后与原配离异态度很坚决。我年轻时就是这个观念：共产党员就是圣洁的，一点灰尘都没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能这样？再加上王斐然也包庇过道德和工作作风都不良的同事，这种情况下，我就成了“贺派”了。

到了“反高饶”的时候，空气已经变得很不一般，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一出来，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加强党的团结。我开了几天会都是一语不发，我知道我要是讲话，人家肯定不爱听。到

最后会议要闭幕了，常真发难说：“思之同志不发言不太合适吧。”那就讲吧，我一讲就搂不住火。

我讲王斐然曾经袒护某人不良作风和工作问题，还有对他官僚主义的不满，并且在那种场合批王斐然平时男女私情，气得他当场回了一句：“无非是‘房中术’嘛。”现在想来，我这样的批判属于低级趣味了，确实不应该。那个拉我起来讲话的人很凶恶，他说：“思之同志讲话很重要，应该让市委派人来听。这个人经历过延安整风，他有经验，他知道怎么煽风点火。”

我当时的想法只是，这样神圣的党，怎么能容忍你这样的行为，你既然是领导，你就要用非常圣洁、纯洁的姿态来领导工作。所以我不能容忍他的缺点。

肃反

很快，1954年的内部肃反，降临到我头上。

1955年“肃反”大规模开始后，法院常委在党内号召全部共产党员中县团级以上停止工作，来对付我一个人，也就是说法院骨干分子都站到了我的对立面。

他们在整我时，用的手段比我们打老虎时恶劣得多了，有人给我写了一封“特务来信”，故意造成我与特务有联系的假象。我认为这是法院内部的人写了来陷害我，因此坚持让他们调查是谁写的，这很好查，但他们就是不审查这封信是谁写的。不但不审查，到了1957年我被划成“右派”以后，他们又拿着信来找我，说：“这是不是你写的？是你写的，你承认就没事了。”我怎么可能给自己写特务来信？他们这种手段真是又荒唐又很拙劣。

我也不是那么好整的，虽然几十个人为了王贺之争来斗我，但我从来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过。有一个具体的情节是：王斐然看到怎么整

我也拿不下来，他就来找我了。他说：“问题讲清楚也就告一段落了。老这样子僵着也不是办法呀。”我说：“那我可以如实地讲，我该讲不该讲的都讲了，我已经讲清楚了。”他提示我说：“那你可以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嘛。”这很明显是想让我把贺生高咬出来。我对他说：“那你要早做这么个自我批评，我不早就没意见了吗？”

更早的时候，有人批斗我，是因为我参加过远征军，他们就批我参加过“伪军”。我从来都敢公开讲，我对美国是有感情的，二战期间美国这个国家对中国提供了多大的援助，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美国参战，德意日不是没有得逞可能的。但是抗美援朝时，我真是认为美帝国主义是野心狼。我刚加入远征军时就接触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了，并深受其影响，但在抗美援朝时，我认为是美国政府背叛了罗斯福。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中，有一条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我就一直没有恐惧，因为我一直置个人的生死、荣辱温饱无所谓，我太无所谓了。早一天走晚一天走，都是走；吃好一点吃差一点，只要是温饱问题能够解决，都不是问题，所以他们怎么整我，怎么给我不舒服，我都太无所谓了。知道他们是故意整人，但我并没有怀疑过他们整人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对运动发展事态已经明白了，但是即使是1954年内部肃反肃到了我自己身上，我也没觉得是政策有问题，我以为是下面的人在执行中出了问题。

对斯大林的崇拜也这样。1953年内部肃反还没有开始，我是刑事庭的庭长助理，同时是敌逆产清管理组组长。有一件事我未曾公开讲过：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我觉得我受到了沉重打击。我甚至觉得自己比毛比周都沉痛得多。人类的前途没了，不得了，这怎么办呢？我命令我领导的一个小组停止了工作，开追悼会，40多人一律站着。正在这时，出身北师大、我们一起工作的苟正华闯了进来。

苟正华一进来就说：“老张有个案子要向你汇报。”我“啪”就甩他一个耳光，“你也不看什么场合，汇报什么”。我在那种极度恶劣心情下，竟然抽了他一个耳光。后来我一直向苟正华道歉，他对我很宽大，我

们俩关系一直很好。我在当年对斯大林的热爱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太重大了、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斯大林死了！

斯大林去世时，我有的只是这样一个想法，人类的前途，怎么办呢啊？

“放卫星”

“大跃进”我们参与了，我们还在南口北京市委的农场参加了放卫星宣誓大会。

南口农场放卫星的方法是，把已经快要成熟的30亩稻子拔出来放在一亩地里，当时所谓的密植，绝对是密不透风。庄稼不透风不行啊，后来经高人指点，在这块地的四个角安装了四个鼓风机来吹，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来视察过，因为这是新生事物。

我们也不是无知的人，30亩稻子眼看就要有收成了，你拔出来合成一亩？这不是糊弄人吗？但是当时我心里还有个疑问：《人民日报》上面小孩子坐在稻子上。《人民日报》能造假吗？《人民日报》总不会骗人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想不通，也不信一亩地能产几十万斤。

南口农场当时有四个分场，总场召集四个分场开誓师大会“放卫星”，放卫星的方法很简单，一分场上去发誓，比如他们宣誓要产2000斤，二分场宣誓就要产4000斤，三分场宣誓就要产8000斤，到了四分场就是1.6万斤。当天就能长几十万斤。这很明显是在瞎吹，跟我在一起的周奎正，他说这一亩稻子长这么多，这装在麻袋里掳起来，得掳多高了呀？就为这句质疑的话，当时就按反革命来批斗他。

我们这时候就很明白这放卫星是怎么骗人的了。但我认为路线不会有问题，毛泽东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我们从心里觉得他说得多好啊！那些出问题的，一定是下面执行者不好。

“不驯服”

1979年8月份高考评卷，我们被封闭在北师大看卷子。那时是保密式手工作业，很辛苦，效率也不高。卷子还没看完，学校党委就来人找我，说市委通知你明天早晨9点到市委报到。我问什么事？他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保密的，但是你必须来。

这次会议上，市委书记李立功宣布，市委决定要审判“五大领袖”。市委研究了分工。第一个是老佛爷聂元梓，第二个是蒯大富，好像第三个是韩爱晶，念到韩爱晶时，宣布审判员张思之。念完宣布散会，明天开始工作。

这时我只好找到法院带队的，我说对不起啊，这个任务我接受不了。当时我讲得比较温和，我20多年没办过案件，我怎么会审案子呢？他们就说：“我们是反复研究的，我们研究了材料，因为五个人中，韩爱晶最难对付。我们觉得你能对付。”我说：“对不起，我很难办。”当时我很强硬，我说谁决定的，我也不会去。

1979年“平反”后给我的前景是，你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就是：原来你是哪儿来的，就回到哪儿去。当时我刚恢复党籍，他们就说：“作为党员你得遵守政策吧？”我问：“哪条政策啊？”他们说：“归队呀。法院你实在不愿意回，那你得回律协。”我说我宁肯回律协。我说我是从律协出去的，我就回到律协来。

当时普遍的想法是律师比法官低一等。法官都是政治上过硬的人，有问题的人才去做律师。或者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政治上靠不住的人才做律师。很多人对我的决定很难理解。

我做出回律协的决定，是认真思考过的：经过这么多年反反复复所谓的斗争，人总要有所思考。

从这次开始，我也不那么驯服了。

（本文为张思之先生口述，本刊主笔杨东晓整理）

在历史的苍天下

很多人说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所以行事没有底线。但我知道，中国人最起码曾经是有信仰的。人们心里有一个朴素的“苍天”。王冀豫心里的“苍天”就没有死，所以，他才有面对罪恶的勇气。

文/季业（凤凰卫视《冷暖人生》编导）

2013年，恰好是《冷暖人生》开播十周年。十年，五百多期节目、五百多个人物。作为一个参与该节目近八年的“资深”编导，我见证了其中的大部分。回顾栏目的筚路蓝缕之途，对历史人物的挖掘和记录，起到了劈山开路的作用。从2004年至今，正是对国军抗战老兵、志愿军战俘、文革知青、中越战争老兵等一系列历史人物的呈现，使《冷暖人生》开始触及时代精神的核心。现今的《冷暖人生》，历史人物的比重几乎是五分之二，是实打实的中流砥柱。

而《冷暖人生》的历史讲述风格不同于同时代的大量历史文献类栏目，也不同于“口述历史”类栏目，它的着重点不仅在于历史事件的还原，也不止于人物的历史见证人身份，更重要的是，其中人物的命运必须被历史扭转——这种扭转带来的戏剧性和人性凸显、情感激荡是故事的主核，而由此引发的对历史的反思、对命运的感慨等等五味杂陈的感受，则是主核激起的层层涟漪。

以下，我写几位留给我深刻印象的人物。对他们的有些感受，我已呈现在播出的节目之中，有些感受，况味则更微妙复杂，难以在电视这种大众传媒上完全呈现，今日写下来，也算给它们找个归宿。

王冀豫

王冀豫站在办公室正中，身材挺拔，隔着衣服也能看出肌肉结实，脸上的线条似刀砍斧劈，根本不像60岁的人。只是他看我的时候我觉得他左眼怪怪的，后来才知道，那只眼瞎了。



王冀豫

2010年年末，我在《炎黄春秋》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一个在文革武斗中打死人的红卫兵的自述——这个人物太有分量了。毫不犹豫，我们决定联系采访，出人意料的是，对方一接电话，也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于是，王冀豫就出现在了《冷暖人生》的办公室里。

一切如此顺利，我压抑着内心的波澜。接下来的采访和节目，是我职业生涯面对的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一个文革亲历者（他亲历的程

度如此之深）将可能出现在作为大众媒体的电视上，在彼时的意义可谓石破天惊。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主持人陈晓楠亲自采访，我操控面对王冀豫的摄像机。我差不多记得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以及他说那句话时的语气、神情。王冀豫的坦诚以及反思的深刻程度，远超我们的期许，很多话都有着振聋发聩之感。

1951年，王冀豫出生于北京某部队大院，写出《动物凶猛》（该小说后被姜文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王朔，在王冀豫嘴里都是“小屁孩儿”。这是最为“根正苗红”的一批人，当1966年红色燃烧中国的时候，王冀豫15岁，正是最为“动物凶猛”的青少年。他们一方面颇为自负，认为自己这样的“军干子弟”才是真正的“革命接班人”，而现实处境是：他们的父母又多数都“靠边站”了，那些他们平时看不起的“平民子弟”竟然借着“造反有理”的指示“抢班夺权、翻身做主”了，这绝不能容忍。在文革初期，学校停课，大人们自顾不暇，散布在各大城市无人管教、青春能量急于发泄的青少年成了能被有效利用起来的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他们先是合力“砸烂了旧世界”、推翻了“反动权威”，继而就根据各自的立场分化、互殴了起来，曾经的街坊、同学、工友成为仇寇。且看王冀豫描述他们一伙人在街头偶遇“狗崽子”的一幕：



少年王冀豫

“一帮人打一个人，打倒了以后就拿靴子照脑袋上踹，真是踹，嘭嘭的。当时给我疼的，我就扑上去抱着那人脑袋我说别打了，再打就打死了，太残忍了！后来我就被一个高中的给我提溜起来了，他说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人渣，他是流氓，他是人民的敌人！真是叫我无言以对、无地自容、羞愧极了。脑子里马上过了一个最简单的念头，我应该把自己给否定了，应该像他们一样——我觉得人呐，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干坏事就跟溃了的堤坝一样，我就是那么一个瞬间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混蛋、特别狠，狠到照他脑袋上连着踹！刚开始还有点心里发怵，后来觉得很舒服、很痛快，打人是乐趣。真的，人就可以变成这样，可以变成野兽，瞬间的事。”

文革初期，北京的红卫兵派系林立，王冀豫这样的干部子弟们自称“老红卫兵”，简称“老兵”，他们组成的“联动”派和平民子弟为主体的“四三”派势同水火。1967年8月5日，在一场北京粮校的武斗中，王冀

豫等一伙“老兵”被一群身穿工作服、头戴柳条帽，开着卡车、整齐地喊着“打倒联动”口号的“四三派作战人员”围堵在一条死胡同里。陷于绝境的王冀豫们发疯般地突围，混战中他脑袋上挨了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青年一砖头，他抄起棒子追了上去。



前排正中为王冀豫。

“我就追上去照他脑袋给他一棍子，他就像个布袋子一样，蹦，就特别有弹性，就摔在那个坡上了。滚下来以后他好像才缓过劲来，想爬起来，他的头就在这儿，我就看着他，一棍子打他这个左前额。当时我就特别疯狂地指着他大喊：我说你跑不了了！这个血就一下溅出来了，我那棍子头上都是血。”

混战在几分钟内结束，绝地反击的王冀豫一伙竟以少胜多。但“胜利”的喜悦只维持了一会儿，当听说死了人、尤其是这人还是自己亲手

打死的之后，王冀豫体内那看似凶悍的魔鬼一下子就瘫软了。

“我一听当时我就怂了，一下就如五雷轰顶，嗡一下就懵了。这个理性突然又回来了，杀人害命，这都是缺最大的德了，就浑身都发抖，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后来就跑到医务室，再看到那个人的时候，血就那么噗噗地往外冒，嘴巴里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眼睛半睁着，瞳孔散了。能看得出他很结实，也很英俊，小伙子。那个瞬间躺在床上的这个人他是人了，他不再只是一个敌人了，他是人了，前面没有任何冠词。”

事后，从“四三”发出的讣告中，王冀豫才得知：被他打死的那个青年名叫王雁鸿，19岁，普通工人子弟。从此，这个名字和那张死亡的脸就成了王冀豫的噩梦。当时的乱世，法制几近弛废，警察没有马上找上门来。王冀豫此时恢复了他半大孩子的虚弱本性，他躲在家里，既不敢自首，更不敢告诉父母，想出了一个南下去参加“援越抗美”、到战场上自救的主意。于是他奔武汉、到广州、进海南，一路目睹各地武斗的惨景，停尸房里不仅有“作战人员”，还有很多被流弹击中的无辜路人——卖甘蔗的小女孩，进城的老农民，探亲的公务员……此时他才开始在心中自问：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

1967年12月14日，王冀豫在海南被捕，那一刻他大大地松了口气。他先是被拘押在海口监狱，半个月后被转押回北京半步桥监狱，九个月后，王冀豫被释放转入学习班。出狱后他才从警察和父母那里得知，自己是在王雁鸿的父母的首肯下，才得以被提前释放的。采访到这儿，晓楠问：你后来见了他父母吗？王冀豫摇头，“没有，不让见。”那是采访中他唯一一次流泪。

之后的岁月，这些热血沸腾的红卫兵，被下放农村“改造地球”，在艰难时世中成了一个个泄了气的皮球，也都清醒了过来。接下来的采访中，王冀豫列举了一长串名字——其中有和他一起参加“8·5粮校武斗”的“同案犯”，也包括几个曾在京城风光一时的武斗“狠角色”——这个得了癌症、那人吃了官司、自己则在工厂的一场事故中弄瞎了左眼，说到这儿，他忽然抬起头，看了天花板一眼，说出了最令我震撼的一句话：

“后来我才知道苍天有眼。”

很多人说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所以行事没有底线。但我知道，中国人最起码曾经是有信仰的。人们心里有一个朴素的“苍天”。王冀豫心里的“苍天”就没有死，所以，他才有面对罪恶的勇气。

1967年，王冀豫16岁，王雁鸿19岁。如今，王冀豫62岁，王雁鸿如果活着，65岁。好多年了，每到春节，王冀豫都会给王雁鸿烧纸，烧纸的时候他絮絮叨叨，对着夜空里的王雁鸿说话。王雁鸿早已不再是个噩梦，而像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如此特殊，他从未离开王冀豫半步，跟他一起见证着时代。

节目做完后，我和王冀豫也算成了朋友。他在京郊开了一家马场，总是叫我有空去玩，但我只去过一次，是为了给节目后期拍些外景镜头。王冀豫的马场更像个沙龙，时常高朋满座。同龄人都叫他“黑子”。



王冀豫在马场

有一天王冀豫忽然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因为在微博上“胡言乱语”，账号被注销，要我关注他的新号。我劝他谨言慎行，他嘿嘿笑着，那时我觉得这个比我大二十多岁的男人还是个孩子。

近一年来，“文革忏悔、公开道歉”这些词汇已经渐渐在媒体上更多出现了，前些天，我看到王冀豫又接受了凤凰视频的专访，在专访中他说：“道歉，是一个时代罪恶的一声叹息。”我想起王冀豫说过，他媳妇总骂他：你的那些丑事要说多少遍？全世界都知道了。他则回应：我就是要一遍遍地说，知道我丑事的人越多越好。

我还记得王冀豫的另一句话：

“我没有资格道歉，也没有资格忏悔。我就是认账。”

李文茂、郭庆堂、张洪恩

河北张家口沙岭子医院，现在是一所普通的民办医院。曾经的这里很特殊，只是知道这种特殊性的人很少，并且，越来越少了。

2010年1月，我和一个实习生开车来到这里。走进医院宣传部门，向对方表明身份和目的，对方相当冷淡。我说我想看看曾经住院老兵们的资料，对方说“都没有了”。我又申请想去老院区看看，对方说“早就荒了，院子上锁了，钥匙也不知道在谁手里”。

很显然，我这个记者在对方眼中，对提高医院的知名度和效益都没有任何价值。所幸，我手中还有一个电话号码。

李文茂，时年70岁，已经退休十年的他接到我的电话后略显惊讶。因为我所说的这几个字“志愿军精神病院”，已经二十多年无人向他提及了。

沙岭子医院的前身，叫河北第三康复医院，原属部队编制。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300万志愿军中有20万伤残，而这20万人中有1000人极为特殊——“应激性战争创伤精神后遗症”——这是学术叫法，通俗的理解是：朝鲜战争使这1000名士兵“发疯了”。河北第三康复医院是几家专门收治志愿军精神病人的部队医院之一，先后有380人在这里治疗。1962年，22岁的李文茂来这里当护士。是这所特殊医院的最老的见证人之一。



李文茂在原河北第三康复医院

（李文茂采访记述）“就有一个病号叫江兴汉，他就老爱这枪，捡一个木头把儿，腰里掖着、兜里装着，两个青霉素药瓶他也对到一块儿，弄成一个枪的形状，打枪这个那个的。你收了他可不高兴了，就

是瞄准……有一个叫马光耀，就发怒，咬自己，把自己这两手都咬的都五指不全了，没办法就捆在床上……还有一个叫李海荣，常年不穿衣服。夏天晒就晒着吧，晒得黑不溜秋，老跟那儿站着……赵桐风他要犯了病就可厉害了，打骂可厉害了，弄不住他，解大便解到床上，扔到墙上抹得哪儿也是……”

近五十年过去了，李文茂记得每一个他看护过的病人。他所说的赵桐风，在当时可谓大名鼎鼎——在朝鲜战争中，身为侦察连副连长的赵桐风屡建奇功，荣获“特级战功”。然而在1954年，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病，每天只重复一件事，声称设计威力无比的大炮，间或对着天空大吼，犹如冲锋陷阵。

由于档案和病例未经妥善保存，多数志愿军精神病人的详细资料已无从查证。幸运的是，经李文茂介绍，我们找到了另一位当事人，同是沙岭子医院的退休职工郭茂昌。郭茂昌的父亲郭庆堂，就曾是在沙岭子住过院的380名志愿军精神病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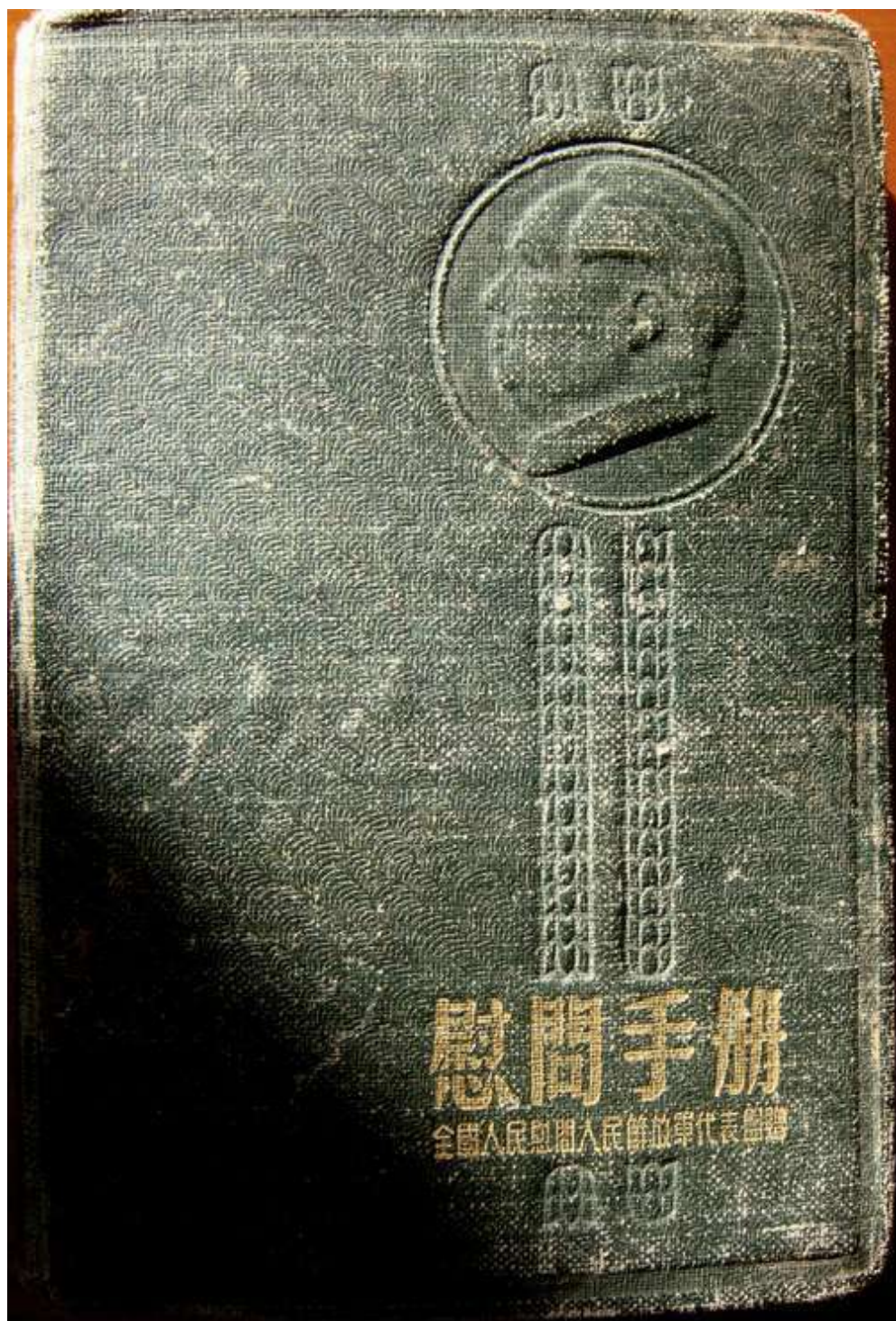


郭庆堂

郭茂昌1947年出生于河南农村，记事起知道父亲是志愿军，但一去不回，家人都以为他牺牲了。直到1957年的一天，郭茂昌发现“守

寡”多年的母亲忽然欢天喜地，原来，父亲竟然来信了。母子俩连忙赶往信中的地址——河北省张家口沙岭子，在第三康复医院，见到了父亲和他的一些战友加病友。郭茂昌清楚地记得父子相见的一幕：父亲的大手抚摸着自已的脑袋，用河南腔惊喜地说：“昌，这是我的儿子，昌！”

虽然知道父亲病着，但英武高大的郭庆堂仍然是少年郭茂昌的偶像和精神支柱。1949年，郭庆堂从河南大学政法系毕业，而后加入志愿军入朝，是部队里罕有的大学生。其因何发病已不可考，据李文茂回忆，郭庆堂的病状相对平静，不像有些病人那样激烈，住院期间还保持读书、看报、写日记的习惯。他和儿子也保持联系，郭茂昌16岁时又一个人去探望了他一次。



郭庆堂遗物（日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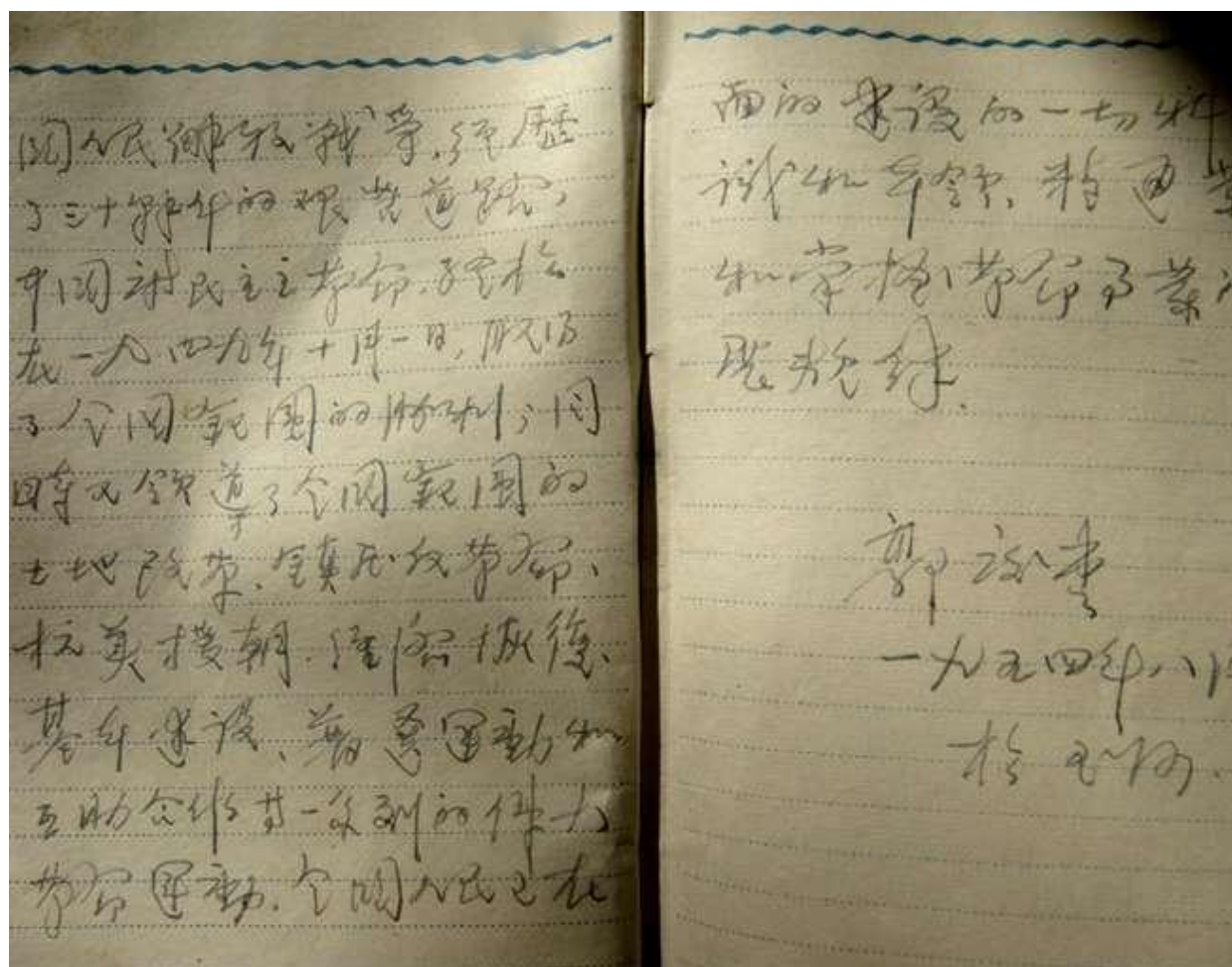
1962年，22岁的李文茂来到医院当护士，后升任护士长。那时380名病号有的已经病逝，有的痊愈后被家人接走，还剩下五十多人。

“他们是毛主席的战士，有功劳的人更得好好护理人家。我们那会儿护理质量好，喂水呀、喂饭呀、处理大小便都挺好，所以病人活的时间都挺长。”李文茂说。

护理之外，护士们还组织病人们种树、饲养小兔子。那是一段平静的日子，但到了1966年，一切都变了，“军管会”进驻沙岭子精神病院。先是每晚6点，病人要集中起来“学毛选”，后来又挨个对病人进行政审。那个总是自残、不得已需要绑起来才行的马光耀，就被查出了问题。

“因为唱歌嘛——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就那个，他们就说你听最后这句，他说是“恩人”——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恩人。”（李文茂采访记述）

唱歌口齿不清的马光耀被抓了“现行儿”。1968年，总写日记的郭庆堂忽然被从医院带走，护士们也不知道原因，不久，郭庆堂被送回来了，但已经是一具尸体。



郭庆堂笔迹

郭庆堂的死因现在已经成谜，采访到了这儿郭茂昌沉默、摇头、红了眼圈。“不能说，没法说。”他哽咽良久。我也沉默，没有追问。伤口过了四十年，一碰仍在流血。

“护士跟大夫医院领导领着去看他，挺瘦，不让我见，怕我害怕。从十岁到我结婚总共才见三次面。母亲更苦，母亲老想着叫父亲回去，能过团圆日子，始终没有盼到。1968年也盼回去了，我捧着骨灰回去的。”（郭茂昌采访记述）

采访后，郭茂昌拿出父亲的遗物：两张照片，两枚入朝作战纪念章，一本日记。郭庆堂笔迹端正遒劲，其中一篇，是他抄写的《共产党党章》。



郭庆堂遗物（入朝作战纪念章）

我提出去看望郭茂昌的母亲，被婉拒。1982年，郭庆堂获得平反后，母子俩被调入第三康复医院，安排就业。随后，我跟着李文茂走进住院部大楼，其中的一间病房，还住着当时还在世的唯一的一名老兵——张洪恩。

在2007年另一家媒体拍摄的视频上，我看到沙岭子医院还剩下三位老兵，三年后我再来，就只有张洪恩了。他时年85岁，牙齿已经掉光，蒙被子躺着，一副木然神情。有些志愿军精神病人没有家人、或和直系近亲失去联系、或者亲属不愿赡养，就只能在医院终老。李文茂问张洪恩：

“张洪恩，认得我不认得？”

“李文茂啊。”

“今年多大了，张洪恩？”

“六十九。”

“六十九？不是吧？”

“是，快七十了。”

“吃什么饭了？”

“馒头。”

“吃几个？”

“俩。”

“怎么样，还可以吧？”

“可以。”

“你的外甥来看你没有？”

“没有。”

说了几句，张洪恩就又躺下，不吭声了。李文茂静静地望了他一会儿。病房里有两张床，张洪恩占一张，李文茂搭边坐的另一张床上，正踞着一个被民政部门从街头捡来、临时放在医院的少年精神病患者。此时他正满脸带笑，咿咿呀呀，自言自语。

沙岭子之行的最后，李文茂带我去荒废的老病区。他穿着臃肿的黑色棉衣，肥胖的身体，影子被冬天的残阳拖得长长的，摇摇晃晃。接近医院的角落，这里人声渐静、荒草渐生，寒鸦在掉光叶子的树上，聚了又散。围墙上还隐约可见旧时代的大标语字迹。铁门上果然

上了锁，已经生锈。我和李文茂隔着栅栏向内张望，院子里的几排平房破败不堪，杂草已高过了窗沿。其中的一间屋子存放着二十几位在这里死去的老志愿军的骨灰，多年尘封，已难以想象里面的样子。

“这院里这边都种着花草树，桃树、果树，工作人员连种带让病人也协助。他们也劳动呀，挖挖土呀、摘个果子、摘个豆角，显得也有点活儿。像刚说的那个李海荣光屁股，也在进那个门就看见、在那儿晒着呢。”

李文茂指着荒院各处，眼神一下子回到了过去。提到总爱光着屁股的李海荣时，他嘴角微微上扬。那是我记忆中最温暖、也是最悲伤的笑容。

最后一个“托派”

这是一个“出土文物”一样的人物，在他一系列令人咋舌的经历背后，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现在我有可能拂去蒙在他身上将近一个世纪的尘埃，把这个面目模糊的老人从少人关注的昏暗角落里请出来。

文/张钧（崔永元口述团队首席记者）

刚听到个消息：陆立之夫妇今年冬天在民政局的帮助下住进了养老院，两人一个104岁，一个93岁，没儿没女，在家就是出了事也没人照应。

去年，我曾和同事一起去看望过他们，那时陆立之的脑子已经有点糊涂了，之前，他托人告诉我们说，还有些话想说。摄像机架起来，他开始说，说来说去，都是三年前我采访他时说过的话。



2012年10月28日，本文作者张钧（右一）和同事到陆立之在滁州市的家中看望陆立之、王师正夫妇。

陆立之是我采访过的第一位百岁老人，他可能也是国内在世的最后一位“托派”。

2009年2月15日傍晚，我突然接到同事孙老师的电话，他让我赶紧和原《炎黄春秋》的副主编刘家驹先生联系，他那儿有个百岁老人的采访线索，据说经历很丰富也很传奇。

陆立之，又名陆梦衣，出生于1909年，1925年加入中共，1927年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秋回国，1930年被开除出中共，旋即加入刘仁静为首的托派组织“十月社”，第二年向南京政府自首，成为军统的一员。现居安徽滁州，他写过一些回忆早期中共活动的文章，曾在《炎黄春秋》上发表。

刘家驹先生的介绍很详细，最后，他补充道：“他还是刘仁静的亲戚，而且很可能是目前在世的最后一个正牌托派。”

当时，我做口述历史采访不到一年，尚没有采访百岁以上老人的经历，陆立之让我既兴奋又惶恐，这是一个“出土文物”一样的人物，在他一系列令人咋舌的经历背后，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现在我有可能会拂去蒙在他身上将近一个世纪的尘埃，把这个面目模糊的老人从少人关注的昏暗角落里请出来，这让我跃跃欲试。但是，他毕竟已经超过百岁，身体、思维、记忆力怎么样？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都还不确定。

不过我的忐忑只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负责联络受访者的张新就给我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由于刘家驹事先给陆立之打过电话，所以老人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要求。“陆老的思路很清楚，而且记忆力也没问题。”听了张新的话，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那天下着雨，冬末春初的北京潮湿阴冷，我走在朝外大街的便道上，一边走一边在电话里对张新说：“马上订机票，咱们后天就去。”

在出发前的一天时间里，我和搭档张新开始疯狂地寻找有关陆立之的信息，收获颇丰。我们不仅从著名托派王凡西的回忆录里找到了有关陆立之的记述，甚至还发现了中共1930年1月将包括刘仁静、陆梦衣等人开除出党的通知，这一切都为我们确定陆正牌托派身份的真实性提供了佐证。

由于陆立之的经历十分复杂和丰富，涉及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众多，这些事件、人物有的我们有所了解，而有的之前简直闻所未闻。每个枝杈伸出去都会耗费掉我们的大量精力和时间。我们自身的知识储备和采访积累可以稍稍减轻一点工作量，但是要做的准备还是做不完，这让我直到踏上飞往南京的飞机时心还没踏实下来。尽管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知识盲点，我的行李中装上了我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参考书：《双山回忆录》、《郑超麟回忆录》、《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史》，等等。

我另外的一点不踏实，是仍然对老人的状态没有把握，尽管张新的反馈是积极的，但在见到老人之前，甚至采访完成以前，一切都还说不准。如果老人身体不好，不能应付长时间的采访，只能持续一两天，那么我们重点问哪些问题？如果采访中发现老人的记忆力或者思维有明显的衰退，我们该怎样启发和引导，帮助他完成回忆？如果采访中老人的身体出了状况，我们又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一遍遍地冒出来，我就像个复习了很久，去参加高考的学生一样，反复熟练地回答着这些问题，从北京飞往南京的飞机上，一直持续到从南京开往滁州的出租车上。

三

2月17日傍晚，在滁州市工人路一栋破旧的楼房里，我见到了陆立之。老人个子不高，身材瘦小，但精神看上去很好，特别是一双眼睛格外有神。我们走进房间时，他主动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向我。他的手有点凉，但和我相握时，我能感到从他手上传递过来的力度。



百岁老人陆立之

房间不大，临窗是一张老式的写字台，上面堆满了书和纸。我们坐定后，老人有点艰难地坐到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从桌上拿起一本黄色封皮的书，递向我，说：“这是我头两年出的一本书，送给你。”

我连忙起身接过书，我知道这就是那本我们只闻其名而未见其实的《谁主沉浮》。这本书是陆晚年所写回忆文章的结集，从上个世纪20年代一直写到1949年以后，内容很庞杂，既包括作者对其本人在五卅运动、上海三次工人起义、“四一二”事变、抗战等大事件中的亲身经历的记述，也涉及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托派组织在中国的兴起发展和覆灭、军统组织在30年代和抗战前后活动等情况的记载，还包括他对周恩来、王明、瞿秋白、米夫等中共和共产国际早期领导人的回忆。在见到陆之前，我们只在网上零散地找到了其中的几篇文章。陆立之把这本书送给我，为我们接下来的采访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在交谈的过程中，陆立之有时会起身取东西，行动有些迟缓。他的夫人告诉我们，之前老人的腿脚还很利落，上下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去年他过一百岁（虚岁），市里领导来看望他，送给他一幅“寿”字。这幅“寿”字被端端正正地挂在房间里最醒目的位置。有天挂在墙上的“寿”字有些歪了，他自己登上沙发想把条幅扶正，就摔骨折了。养了大半年，现在刚刚痊愈，但腿脚已大不如前。

那次见面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我们拜访的目的却全部达到了。通过跟陆立之的交流，我发现尽管老人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偶尔会出现重复和中断，但对一个年过百岁的老人来说，他的思维和记忆力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整个身体状况看上去也很好。这让我对接下来的采访增加了不少信心。

不过，在当时，还是有一个现实问题给我造成了困扰。以往我们对高龄受访者进行采访时，一般都希望能有老人的子女陪同：他们对老人的身体状况最了解，一旦发生意外大家也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反应。陆立之没有子女，身边只有年近九旬的老伴照顾他的起居。他的家房间不大，光线声音状况都不理想，很难达到我们拍摄的基本要求（我们的采访通常会架设红背景，布置简单的灯光，对环境

声有较高的要求），在老人家里完成采访有难度。我们可以在宾馆里布置一个采访间，每天接送老人，但陆立之居住的楼房没有电梯，他住在四层，对骨折刚刚痊愈，年过百岁的老人来说，每天上下这四层楼梯，简直是莫大的折磨。

这时，一同前来的张新提出了一个建议：可以把陆氏夫妻一起接到我们的宾馆去住，这样既可以省去老人每日往返上下之苦，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采访，同时，我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我觉得这办法不错，跟老人一说，他们欣然应允。于是我们约定，第二天一早就把两位老人接到酒店去。

冬末春初的滁州天气还很冷，房间里没有暖气，陆老夫妇在室内都穿着棉袄，我们也没有脱下身上的羽绒服，陆立之的夫人王师正忙前忙后地为我们添茶倒水，拦也拦不住。言谈举止之间，看得出两位老人当年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同样看得出的是他们对我们到来的欣喜。在滁州这座破旧的居民楼的一方斗室里，人多一点总会更暖和些，他们过冷清的日子过得太久了。

四

第二天一早，张新就把二老接到了酒店，稍事安顿，对陆立之的第一天采访开始了。

与老人见面之后，我的心里有了底。对陆立之，是可以按照时间为经，事件人物为纬，突出重点的思路，来进行一次个人传记式的口述历史采集的。头天晚上，我连夜通读了他的《谁主沉浮》，更强化了這個想法，像陆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口述历史采访中也属难得一见，如果不能做一次深入的采访，全面地记录他复杂曲折的一生，那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当时我心里的小九九是，在老人身体允许的前提下，争取花上一周左右的时间来完成这次采访。

我们的谈话是从陆立之的小时候开始的。对于这种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采访，我和我的同事，通常都会用这样的问题作为开端，我借用了挪威作家古尔布兰生一部著作的名字，将这个问题称为“童年与故乡”。一方面这样的问题更容易把老人带入回忆的情景中，逐渐忽略掉我背后一直虎视眈眈的摄像机，话题也不沉重；另一方面，这问题本身也有意义，可以让我们、让未来的研究者去了解镜头前的这个老者是“从何处来的”，会为解释他后来的很多行为提供有效的信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对进入拍摄后受访者的状态进行观察了解的机会，以便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尽快找到与受访者交流的最佳方式。

陆立之在镜头前兴致勃勃地讲了半个小时，这中间我没说几句话，却发现了几个问题：一个是重复，一个是跑题，一个是不按时间顺序讲，一会儿前，一会儿后。应该说，这样的问题在高龄受访者中很普遍。我要做的，就是耐心听，即使重复跑题了也不马上打断对方。过于迅速的反应有可能会破坏掉老人讲话的节奏和其固有的意识流动，让他陷入一种不知所措，大脑突然“死机”的状态。而且在老人跑题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有新的线索和故事浮现出来，这常常是对我们耐心的意外奖赏。只有当我意识到这样的重复和跑题不会再有新鲜的信息浮现时，才会在老人停顿的时候去引导他，使之回到正常的讲述轨道上来。

对陆立之我就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当我开始逐渐介入他的讲述，试图把其从跑到天边的自语中拉回来时，我发现，他可以跟从我的指引，重新回到对眼前事的回忆中。这让我大喜过望。一件事一件事地讲，一点一点地往前推进，采访者适当的介入和引导，当第一天下午，我们完成了对陆立之的头两个小时的采访后，我们之间的最佳交流方式也建立起来了。

五

每天上午一小时，下午一小时，对陆立之的采访按这个节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中间，滁州市政协的领导来过，滁州日报的记者来过，他们和我们寒暄，请老人和我们吃饭，给陆立之拍照，这算是给我们单调重复的采访增加了一些热闹。凑热闹的还有宾馆对面街道上夯实地面的施工机械，它们发出的巨大声响常常让我们不得不停下工作。

来访的人中有人问我：“他说的是真的吗？”

其实这问题从采访第一天起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陆立之的经历中最有历史价值的是他前半生的经历，因为有这样经历的人本就稀缺，活到今天并且还能讲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他对上世纪20-30年代中共早期活动、莫斯科中山大学生活以及对托派组织的回忆和讲述都可称弥足珍贵。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因为年代久远，其他相关的当事人绝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他所呈现的许多故事和细节又多不见诸文字和相关史籍的记载，堪称孤证。如果老人通篇信口开河，那么我们所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的价值甚至这次采访的价值是不是都会大打折扣？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尽可能地给自己寻找着答案。老人的身份是确凿的，这点我坚信不疑。在托派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中，有三处提到他，1929年秋，他们曾经在从莫斯科大学回国时同乘一条轮船。里面还两次提到陆叛变托派组织，到南京自首的事。他与刘仁静的关系也是没问题的，在陆立之保存的照片中，有刘仁静晚年生活的照片，他与刘的合影，他参加刘的葬礼的照片。此外，从40年代的报刊里，也能找到陆曾发表的文章。他的一生脉络清晰可辨。同时，他去世不久的哥哥陆久之的经历也可以与他互为参照。至少，陆立之不是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

而在陆讲到一些重要的史实时，我都会在采访中或者休息时多问几句，比如这是您亲身经历的吗？这是您亲眼看到的吗？或者，这是您从哪儿知道的？搞清楚信息来源，会为以后的研究者解除掉很多不必要的困惑。再有，就是当事件呈现出来而我将信将疑时，我会鼓励

他呈现更多的细节，细节越多，辨别事件真伪的线索越多，对研究者的帮助就越大。

但尽管如此，我仍然很清楚，做得再多，我也无法保证老人所讲的一切都是真实可靠的。我所从事的口述历史的采集工作也不应承担为受访者讲述史实背书的义务。对材料进行辨析、考证，决定是否采纳，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材料做扎实了，给未来的研究者提供尽量多的线索和可能性。想明白这点，我也就不再纠缠老人讲述是真是假的问题了。

六

陆立之的身体之好出乎我的意料，尽管在采访进行到第五天时他出现了轻微的感冒症状，让我很是担心，甚至开始考虑是否先终止这次采访。但第二天，老人家就几乎好了。很快，我们的采访就突破了一周，开始接近尾声。

对采访，总体上我是满意的，老人对刘仁静事迹的讲述，对五卅运动、“四一二”事变、对莫斯科中山大学、对托派组织的成立统一，对抗战时期上海孤岛里军统的活动等的讲述，细致而生动，充满了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细节，一些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出入其间，也是鲜活可亲的。我们希望他能重点讲的，他基本上都讲了，一些我们事先准备没有涉及的内容，他也在不经意间讲了出来，应该说这次采访的收获是沉甸甸的，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同住一家酒店，每天都在一起，除了采访，我们还常会拉拉家常。渐渐的，我们与两位老人之间有了些工作之外的感情。二老年纪大，吃不了硬的东西，一日三餐，基本上就是喝粥，或者是阳春面，小馒头。于是采访多少天，我们就一起吃了多少天的阳春面、小馒头。以至于我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都不碰这几样食品。

陆与现在的夫人王师正是半路夫妻，王出生于上海的书香门第，年轻时应该很美。她后来也投身军统，与陆40年代相识结婚，1949年后一起被抓，一起劳改，一路辗转，晚年一起落户安徽。陆年轻时颇风流，结过不止一次婚，但与他不离不弃，一起吃了几十年苦的，却是这位看上去与他不大般配的大家闺秀。我们每天采访时，陆在摄像机前讲，王就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他。

七

采访越是接近尾声，我内心由一个问题产生的纠结就越严重，这是在我看到《双山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后产生的：

在莫斯科的孙大中，彩莲以“美丽的小麻雀”出名的，因之不断为一些国民党大官们的贵介公子所追求。但她看不起他们，甚至深恶他们，终于和一个并非公子的陆某结了婚。

文中“美丽的小麻雀”叫黎彩莲，被王凡西称为“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1936年因肺结核去世。陈独秀当年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过对黎去世的深切悲伤。而上面提到的“并非公子的陆某”就是现在每天坐在我对面接受采访的陆立之。

我的纠结主要来自下面这段文字：

反对派统一以及大破坏后，她的丈夫陆某变了节，投向南京政府。那时彩莲正在红十字会医院内产子，惊闻此讯，忍痛弃子逃出了医院，与叛变的丈夫决裂。

在危难之时抛下在医院待产的发妻去自首，在什么年代这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在他讲到去南京自首这一节时，陆立之没有跟我讲这个情节，我要不要在采访结束前点明这件事。

这件事的难处在于，陆的夫人有天在走进采访问前对陆立之说：“黎彩莲的事就不要讲了。”而这句话恰巧被我的同事摄像小吴听到了。而每天陆的夫人都会听他的采访，当着两位老人，这个问题变得重如千钧，让我始终无法启齿。

有天，吃晚饭的时候，我貌似无意地提起了王凡西和郑超麟的回忆录，问陆立之是否看过，他迟疑了一下，说，“看过”。我又问：“您觉得里面写得内容真实吗？”他想了想，说：“基本上还是真实的吧。”我没再继续往下问，他也没接着往下说。

整个采访持续了十天，比我们计划的多了三天，陆立之，这个目前中国唯一在世的正牌托派，第一次很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在摄像机前系统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2009年2月27日采访结束时，我特意问了一下摄像，一共录了多少盘磁带，他告诉我，四十二盘。后来我知道，那是1238分钟——20个小时零38分钟。

我最后也没有向陆立之提出关于黎彩莲的问题，我想那段往事一定不止一次地在他的脑海里翻腾。我不愿意面对一个年过百岁的羸弱老人在镜头前的尴尬和辩解，或者可能出现的任何反应，这对我们都是太残忍的事。

这可能有点遗憾，那就遗憾吧。

谁来书写“小草”的历史？

尽管多数人的命运不载于文字，重大事件的叙述也被修官史的人垄断，但民间依然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向后人传达历史真相的一鳞半爪。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完全可以将一棵棵小草的荣枯真实地记录下来。

文/十年砍柴（作家）

没有花香
没有树高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

学生时代，学唱过的歌曲很多，而能在人到中年依然记起的，很少。《小草》算是其中一首，或许是生长在乡野，在我初中时代第一次唱这首歌时，心中有些许悸动。但当时年少的我，也不可能从这首歌生发出更多的什么“微言大义”。

近些年，我数次在清明节回那三千里外的故乡，为祖父祖母扫墓挂青。几乎只有老人和幼儿留守的乡村，草木疯狂地生长无人砍伐。祖母的坟头，只要过一年，野草就齐人高，将墓碑和坟头遮得严严实实，我和我的兄弟用柴刀将草砍伐干净，才能露出墓碑上镌刻的字：“李府张氏老孺人之墓”。



被野草覆盖的祖母坟茔

我的祖母，至死都没有正式的名字。在娘家，她的父母和亲人唤她的乳名；嫁给我爷爷后，载入族谱、刻入墓碑的是“李张氏”。她的两个儿子——我的父亲和叔父、四个孙子——我和三位兄弟，大名倒是清清楚楚地刻在“敬立人”之列。

祖母只活到五十多岁，她在我长兄出生前两个月病逝，四个孙子两个孙女都未曾见面。对我们兄弟而言，“奶奶”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清明前去光顾一次的土堆。我的祖父去世时，我已经12岁，念小学五年级。儿时他偶尔给我讲往事，也只是一些片段——他无非是寂寞中对着不谙世事的孙儿自言自语而已，他的述说中从来不提奶奶——那位替他生过七个孩子只两位成人的妻子。我的父亲有时会给我说两句奶奶的事，也只是“可怜”“善良”“从不和邻里吵架”云云。在爷爷的葬礼上，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了奶奶苦难一生的概述。我的舅奶奶——即奶奶娘家的弟媳妇呀，在哭姐夫的时候，勾起对苦命的姐姐的回忆，她用哭腔诉说我的爷爷命好，长寿，看到了孙子孙女出生，得到了儿子的孝敬，她那位姐姐自嫁到李家以来，她讨过米，经常挨饿。好不容易熬到大儿子工作了，娶了儿媳怀了长孙，可孙子还没出生就走了……

现在我的舅奶奶也离开了这个世界，有时回想起她哭诉我祖母的一生，我不觉凄然。像我祖母这样平凡而穷苦的乡村妇女，连她的儿孙都不能完整地说出其一生经历，遑论他人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这样的普通人，包括我的祖母祖父，就像山间那些小草一样，生长、枯萎、完全消失，无人在意。

国史只为王侯将相大儒名臣等人物作传，自然不会记录这类小人物的命运；那么家族史呢？同样不载。我翻看过本族1983年修订的族谱，多数人如我的祖父祖母，只有一行字记载其生卒之时，他们的人生故事，或精彩或平常，或顺遂或凄苦，全部湮没在两行字中。只有取得过功名和有过官职的家族成员，才会在族谱中附有小传。

我对民间写史感兴趣后，对这类问题进行过一番思考。很能理解在传统中国普通人的故事不载于书是正常的。在多数人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文教不彰，即使是尊师重教的古代中国，能掌握

文字并有意识地记录所见所闻的人，只是少数中的少数。他们中间得意者进入官场，自然不会写小人物的故事；即使失意如蒲松龄、曹雪芹这样的士人，同样只把笔端对准自己的同类。

然而，尽管多数人的命运不载于文字，重大事件的叙述也被修官史的人垄断，但民间依然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向后人传达历史真相的一鳞半爪。

在高中时，因为一位历史教师的缘故，我隐隐觉得中国有两套叙事的模式。这位历史老师是湖南新化县的，新化是陈天华的家乡。他讲课时讲到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解释说这两个小册子是用我们湖南中部叫花子讨米的莲花落写的，所以朗朗上口，易于传播。讲到太平天国时，就放下书本，给我们讲石达开与洪秀全决裂后，分兵向西，曾经包围我故乡宝庆府长达半年之久，最后在正为湖南巡抚做师爷的左宗棠规划下，坚壁清野守住了宝庆城，石达开不得不撤退，继续西行，直到殒命大渡河畔。家乡也便赢得了“铁打的宝庆”之称。

这些发生在故乡惨烈的史实，在历史书中往往是轻轻带过，即使是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学者，也很难关注。比如我所在村庄往南2华里的一个乱坟岗，儿时我和伙伴常常去放牛。老者告诉我那是埋葬“长毛”的地方。这些长毛如何来到这么个偏僻的地方，如何战死，埋骨异乡？没有系统历史知识的老者，当然说不出所以然。多年后我对照石达开围宝庆城的那段历史，才明白宝庆城北路曾发生过一次惨烈的交战，以争夺城北门户，战场就在我村庄旁边。最终太平军战败。

我在想，那段死伤无数的战事发生时，我的祖辈正在做什么？逃难？旁观？一切都没有答案。



多少山民踏过这条石径，他们的名字后人谁能说起呢？

这样的缺憾永远无法弥补，我无法苛求不识字的祖辈将他们看到的人与事记录下来，留给我们。

而今天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九年制义务教育也早在乡间普及，普通人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文字、图像、视频记录周围的一切，也能通过网络等方式进行传播。可以说，民间记录历史，在技术上已无障碍。那么最重要的障碍是什么？

我以为一是意识；二是方法论。

意识上的障碍，是因为受到长期的官方历史观教育影响，把历史记载看得高不可攀。因此首先要给“写历史”祛魅，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每个人书写自己所见所闻，不但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权利。只有更多的人使用更多的方式来记录自己亲历的历史，历史才难以被某些人垄断。

第二个是方法论的问题，好的做法能使所记载的历史更为全面，更接近真实。有志于参与民间写史的人，最好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写日记。我自己记了15年的日记，一直没有断过。一件事发生时，身在其中者不觉得有什么稀奇，因为习焉不察。但如果记录下来，再过五年十年翻日记，它就有历史感，原来当时某个时期，尤其把小历史和大的历史一对照，就很有意思。比如二十年前我刚到北京，三环路刚修好，三元桥边的烂尾楼中旅大厦还在修修停停。现在北京修到六环，再翻看当时的记载，感觉就很不一样，很有历史感。

当一个人记录别人的故事，比如找长辈口述其人生经历，帮着记录下来，重要的是如何引导老人讲出细节，说出更全面的信息。没有引导，长辈们可能不明白，他觉得我要教育这个孩子怎么吃苦，给你来一番忆苦思甜。而且要善于判断平常叙述中可能隐藏的精彩故事。比如某人的奶奶家比他爷爷家富裕，当奶奶的可能讲到这桩婚事，两句话就带过去了。但如果你思考一下，差距甚大的两家怎么会结亲？细挖下去就可能将精彩的细节引出来了，这些细节很可能佐证大时代的变迁。记录长辈的口述之外，尽量多方面采集资料。同样一件事每个人处于自己的立场，其叙述也不一样，几乎所有的大人物、小人物

都是这样。对民国时期发生的大事，蒋介石的日记记录，和李宗仁的口述自传很可能相差甚大。同样一件事情，奶奶说的跟爷爷说的可能不一样，妈妈说的跟爸爸说的也可能不一样。因此要尽量多了解，详细地记录，然后结合其他的史料进行对比、甄别。

很遗憾，等我明白这些道理时，等到记录的技术手段不再是障碍时，我的祖母已经逝去四十九年了，我的祖父也辞世三十一年。他们和无数小人物的故事，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黑幕里。

但愿以后的小草历史不再被忽视、被湮没。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完全可以将一棵棵小草的荣枯真实地记录下来。

我的历史观：五栋楼的故事

一号楼唯物史观是我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历史观。二号楼血酬史观是我2003年初步形成的历史观。三号楼进化史观，是我2008年试图借鉴改造的。四号楼，儒家史观，从2008年到现在2013年，我一直在学习理解改造。五号楼造化史观，只是我想象中的未来建筑。

文/吴思（历史学者）

我们所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从中学到大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报纸广播里整天说改造世界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唯物史观，就是我们这代人无从选择并且不容置疑的历史观。我对历史的宏大叙事特别感兴趣，因此学得特别认真，加班加点地学，装了一脑袋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有简明的结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同三层楼。在这栋楼里，活动着不同的阶级，主要是两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在上层建筑里，住着剥削阶级的代理人，他们的保安和吹鼓手。主要阶级的变化，决定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例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按照斯大林版唯物史观的分类，共有五个历史阶段。

唯物史观有许多高明之处，不过，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理论，在解释中国历史和我们亲历的当代史的时候，难免产生一些困惑。例如，我们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从粉碎“四人帮”开始，到邓小平出山，到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然后调整农村政策，大包干，然后大丰收，其背后的逻辑似乎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两三千年的中国历史经常表现出这种逻辑。

二号楼，我杜撰的历史观，我称之为血酬史观。

为什么要建二号楼呢？因为有了以上困惑，我经常感到一号楼太小，住不下在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角色，一个庞然大物，就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批人。我称之为暴力集团。他们不是生产者，他们掌握的不是生产要素，而是破坏要素。他们凭借破坏要素参与分配。坐了江山之后，凭借权力参与分配，还选拔雇佣了一个庞大的代理人集团——官家集团。

这个集团显然不在生产关系之内。按照列宁的定义，阶级就是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位置的社会集团，如此说来，阶级分析中没有暴力集团的位置。唯物史观把暴力集团归入上层建筑领域，作为国家机

器的一部分，起守夜人的作用，相当于统治阶级的保安。这批人被安排在三层楼上的一个角落里。

我认为，把暴力集团当成保安，太贬低他们了。打了天下，坐了江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生产关系不顺心了，就改革一下，放一放。放多了，不合算了，再收一收。如此收放自如，保安能做这么大的主吗？

于是，我就设计了二号楼，里面有两大集团，一是暴力集团。二是生产集团。描述生产集团行为逻辑的，有经济学的各种定律。描述暴力集团行为逻辑的，有血酬定律。这个定律也是我杜撰的，大意是暴力掠夺行为与暴力掠夺的收益正相关，与卖命的风险及成本负相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风险越大，卖命的越少。

遵循血酬定律的暴力集团的行为，与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呢？我发明了一条对元规则的解释，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这是最基础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在暴力集团的主导下，生成了其他一些次级规则，好比楼房的层级结构。

在生产关系层面，暴力集团会选择最佳自由度，让生产集团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所谓鸟笼经济，充分利用他们，又不至于反客为主，不至于翻天变天。

在财政税收层面，暴力集团会选择最佳抢劫率，也就是最佳税率。

在意识形态层面，暴力集团会制造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价值观，世界观，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历史观。为自身的行为辩护，维护自身统治。

这也是一栋四层楼。

生产集团与暴力集团之间的博弈，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暴力集团内部的博弈，也是一个长长的故事。生产集团内部的博弈，还是一个

长长的故事。生产集团内部博弈的故事，由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讲。与暴力集团有关的博弈，正是二号楼里的故事。

一旦生产集团翻了天，像控制保安那样控制了暴力集团，例如，资产阶级控制了议会，议会控制了政府，政府控制了军队和警察，资本主义时代就开始了。一旦公民控制了政府，政府又控制了军队和警察，公民就成为暴力最强者，民主主义时代就开始了。

与一号楼对照着看，二号楼的特点是：在生产力之外，引进了破坏力，让暴力集团从上层建筑的一个角落里现身，落地，与生产集团共同构成二号楼的支柱，其中破坏力还是核心大柱。什么时候生产集团能把庞大的暴力集团控制住，封在盒子里，压在下面，以生产力为核心支柱建起一座新楼，那时候，生产力才可以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才可以决定上层建筑。

我们现在把权力关进盒子或笼子了吗？如果尚未成功，我们就仍然处在适用血酬史观的历史阶段。

三号楼，进化史观。

引进暴力集团和破坏力要素之后，我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如何把握生产集团和暴力集团的关系？哪种理论适合描述这种关系？我试过唯物辩证法，试过博弈论，试过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还试过阴阳五行学说，这些理论各有千秋，但最好用的好像还是进化论，再加上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行为生态学。

进化论好比一栋楼，由低到高，讲述了生物演化的故事。不同的物种如何形成，如何遗传变异，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相互作用，达成某种生态平衡，层层演化，构成一个又一个时代。在进化论里，故事的主角是物种，常规是遗传，新闻是变异，基本剧情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结局是生态平衡。

行为生态学，不仅讲述进化的故事，还仔细分析各个楼层里不同物种的生存策略，他们的互动，进化，用博弈论计算这些互动的成本和收益，最后演化出稳定的对策均衡体系（ESS）。

我觉得这些叙述框架很精彩，对生物界的解释力很强，便把它搬过来，作为基本框架，整合前两栋楼的建筑材料，在生物进化的基础上讲述人类文明演化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主角不是物种，也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或民族，还不是唯物史观中的阶级，而是某种生存策略。生存策略是行为生态学的重要概念，我用它来定义各大社会集团。采集狩猎是一种生存策略，暴力掠夺也是一种生存策略。打天下坐江山，和务工务农、投资经商一样，都是生存策略。这些生存策略的载体可以叫阶级，但又比阶级大，包括了生产集团之外的暴力集团，我把这两大集团称之为阶群。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就是最大的两个阶群，就好比动物和植物。

这些阶级和阶群彼此互动，继承创新，适者生存，形成某种世态均衡，这就是特定的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

四号楼，儒家历史观。

我们这代人在评法批儒中长大，对儒家缺少尊重。至于儒家史观，在我的印象中，无非是忠臣奸臣，三纲五常，满纸的道德评价，好像水平不高。

大概在200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英语中的“right”如何翻译。我认为最贴切的译法不是“权利”，而是“权分”。分，名分，本分，你的分我的分，在古汉语中是权利和义务的统称。在分前边加一个权字，可以把权利和义务分开，同时将西方的权利概念与中国的传统思路接轨。一旦找到把西方的权利概念引入儒家传统的接口，再进入这

个接口细读，我发现儒家史观很不简单。这里涉及老祖宗的东西了，我们得恭敬点，多介绍几句。

先简单地概括一下：儒家史观，好比一栋建筑，内部有不同层级，还有大大小小的单元房。这栋建筑的名字叫礼，礼的结构大概有两层，一层官，一层民。民又分士农工商等小层级，官也分皇帝贵族和文武九品官员等小层级。每个主体都有不同的名分，不同的名分处于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单元房面积，比如底层小民50平方米，上层二品官500平方米，最高层皇帝10万平方米等等。单元房的大小边界一直在或暗或明地变化，儒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些面积的尺寸如何规定，规定是否得到遵守，是否发生变化。

这种关注本身，已经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分析大楼的内部结构。

儒家史观最概括的表述来自孔子。我们知道，检验一种理论，最无情的办法就是用它预测未来。在《论语·为政》篇里，子张问孔子能否预测未来。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孔子极端自信：“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鉴往知来，通过回顾三代之礼的因革损益推测未来。沿着这条路子，他甚至敢于预测百世之后。可见，孔子历史理论的核心词是“礼的损益”。用我们的比喻说，也就是大楼内外的增增减减。

大楼内外的增减变化，即礼的损益，如何进一步分析呢？儒家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做了一个示范。《资治通鉴》的第一笔记载就是大楼内部层级和单元房的变化，也就是名分的变化。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天子任命三位晋国大夫为诸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天子提拔几个贵族算什么大事？司马光用上千字的篇幅，论述了此事的意义。他首先介绍自己采用的理论框架：“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

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司马光用了三个概念：礼、分、名。不同的名和分，例如君臣，公侯卿大夫，如同大小不同的单元房构成大楼一样，构成了礼。天子的职分是：正名，定分，以礼为纲纪治理天下。这就是司马光心目中的社会结构，也是他把握历史的基本框架。

司马光把礼分解为名和分，然后分析名和分的变迁。他说，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圣人的拳拳之心，始终牵挂着君臣之间的分际边界。

我们知道，名和分一直处于历史变迁之中。以前没有皇帝之名，秦始皇以郡县制统一中国之后，给自己创造了皇帝名号。以前也没有公民之名，现在也从西方引进了。

除了名称之变还有分际之变。前边说过，“right”可以译为“权分”。顺着权分的思路讨论分际变迁，也就是权利义务的边界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公社社员如何有了自留地，如何可以大包干，如何可以进城卖菜，如何可以进城打工，如何可以开办企业，这些都是权利边界的扩张，单元房面积的扩张。权分边际的变迁，民众权分的扩张，导致了社会和时代的变化，构成了改革开放历史的基本轨迹。

有的时候，名号不变，权分却变了，例如，号称是公仆，其实成了老爷，这就是潜规则。有的时候，权分不变，名号却变了，例如还是仆人，却被称为主人，这是更高级别的潜规则。

儒家的礼制和名分分析，不仅关注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纲常伦理，还关注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天有天的分，地有地的分。这就好比在大楼的最高层建了一座大庙，金碧辉煌的天坛。我们知道殷商时期，对天命和鬼神极度崇拜，大规模的活人献祭，到了周朝，往往用陶俑代替活人，天之分减轻，人之分加重。

对天地人的全面关注，就好比在关注大楼及其内部结构之外，还关注大楼的地理和地质条件，关注气候条件，甚至关注信仰等超越性价值问题。

那么，三皇五帝到如今，上述名和分到底是如何变迁的？变迁的力量来自哪里？分际的变迁有什么规律？这些很有深度的问题，都可以从儒家史观中开发出来。儒家经典《周易》所描述的盛衰转化，也可以看作分际变迁的某些常规。对于儒家史观，我研究得不够，但已经意识到水深鱼多，无论是观点还是史料，都是一座宝库，这里先推荐一二。

五号楼，综合前四栋楼的好材料建构一种历史观，我称之为造化史观。

前边有了四栋大楼，到底选择哪栋作为自己的历史观呢？我感到了选择的困难。每一种史观都有优点，也有缺点。

儒家史观包容天地人，关注官家集团内部的名分变迁，这是优点。但对各个生产集团的关注不够，对不同生产要素的拥有者如何获利，如何分配，缺乏深入探讨和计算。

唯物史观对各大生产集团和阶级关系有深入的分析，但缺乏对暴力集团和官家集团的讨论。

血酬史观专门研究暴力集团和官家集团的行为逻辑，对生产集团内部的关系缺乏讨论，也不关注人与天地的关系。

进化史观的“遗传变异、适者生存”原则很好地解释了生物进化史，但主要关注物种的生物学特征。我们可以把物种换成人类的各种“生存策略”，超脱地看待生产集团和暴力集团及其下属各个纲目科属的互动，客观科学地计算社会的均衡状态，就好像计算生物界的进化稳定对策（ESS）一样。

我的愿望是：综合前四栋楼的好材料，取长补短，建造一栋新大楼。例如，在唯物史观中补上暴力要素，在儒家史观中补上生产要素，用进化论和行为生态学的方式讨论甚至计算生产集团和暴力集团

的互动，同时用儒家的名分变迁思想，讨论各个行为主体在互动中的边界损益，而且吸收儒家史观中的天地成分，赞天地之化育，参赞造化。如此建立新的历史观，可以称之为造化史观。

吴 思 著

潜规则

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30年30本书”入选理由

打开了中国传统历史真实游戏规则密码……
给出了一个对社会转型动力模式非常有效的解释范式。
——深圳读书月组委会暨深圳报业集团

吴思《潜规则》



吴思《血酬定律》

结语

一号楼唯物史观是我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历史观。二号楼血酬史观是我2003年初步形成的历史观。三号楼进化史观，是我2008年试图借鉴改造的。四号楼，儒家史观，从2008年到现在2013年，我一直在学习理解改造，虽然很敢下手改造，但至今也没学好，今后还要继续学习研究。五号楼造化史观，只是我想象中的未来建筑。

(吴思：《炎黄春秋》总编辑。本文由吴思先生根据在“历史嘉年华2013”上的演讲整理修改。)

国家记忆2013·致敬历史记录者 致敬名单

2013年11月17日，新历史合作社主办的“国家记忆2013·致敬历史记录者”致敬典礼在苏州举行，向8个在历史记录、发掘、传播和公益领域内的杰出贡献者致敬。



历史嘉年华颁奖典礼

近一百年来，我们在向前奔跑的同时，回首家和国的记忆，有太多的遗忘、遮蔽甚至歪曲。

而幸运的是，在当下中国，有为数众多的人，勇于承担抢救历史记忆的责任。

——他们参与发掘、记录、整理、研究，参与教育、传播、动员，参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他们坚信并践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值得记录，每一份抵抗遗忘的努力都值得尊重，历史记录需要公众参与、公共立场，需要传播和共享。

——他们尽自己的心力，默默耕耘，对历史尽责，为时代留证。

我们有理由向他们致敬。

年度历史影像——《生死连，兄弟情》

那是一场离我们最近，却离我们最远的战争；那是一群仍在我们眼前，却被视而不见的青春身影；那是一个已经逝去，却被呼唤回归的年代；那是一卷在历史中被潜像，而在今天才得以显影的底片。

年度历史图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先生长于乱世，半生漂泊，“先后经历七个国家，看过五种文化、三种制度”，尝遍家国情恨、人世沉浮，于是有了四册回忆录的宏篇巨制。

先生自言“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于是，一己受想行识之中，足见一代众生的存在；一人流亡生老之际遇，可窥历史之壮阔、世纪之流转。

年度历史记录者——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参赛学生

历史的传承，记忆的接续，不仅是通过书本与考试，更需经由口耳相传，血脉相通。父母虽老子弟在，数万名年轻人持续接力，由自己出发，追溯生命的来路与去向，追问家国的过去与未来，可知吾史不断，薪火不灭。

年度历史报道——中国青年报《为心道歉》

为心道歉，留史为证。我们也许能躲避过去，但终究逃不过历史。《中国青年报》不仅记录了一段往事的开头与结尾，也在追问一个时代的来由与方向。

年度历史行动者——“文革”个人道歉者

历史，是所有人的过去。历史的负面，不仅国家当需反思和戒惕，个人亦当有自省与担当。迟到四十年的道歉，虽然来迟，却正当时。

年度历史公益——孙冕和他的朋友们

他在公开信中发誓：“如不让幸存的老兵在他们暮年过上有尊严的日子，切断我的手指，誓为抗战老兵募钱。”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一言之诺，也不仅是他的朋友们的古风高义，他还希望带动这个国家，站出来为父辈尽孝，为历史担责。

年度公民写史——沈博爱

他只是一位普通农人，是中国大多数的一员；他的经历因坎坷而平常，正如中国大多数的故事。唯一不同的是，他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默然终身，由此他成为千千万万梦碎而无声消亡者的代言人。天不丧中华斯文，只因为在中国的底层，一批并非博学鸿儒的小人物，有着赓续文脉的责任感和行动力。

年度特别致敬——张思之

他的法律生涯与红色中国同龄，因此他也与这个国家的法治进程同命。他用行动守护历史的底线，他用辩词刻下历史的年轮，他用自己的一生为时代写下独特的“案例”。或者说，他，以及我们每个人，本身就是历史。



“中国词儿”广告海报



在这里记录中国



关注信睿微信 了解变化的中国

我们的历史

our history

美丽岛 足印

十四位台湾人带你穿越台湾深处

张铁志 杨渡 张钊维 陈忠信 谭端
李乾朗 周渝 朱天衣 李福井 巴代
丁允恭 何明修 海民 叶虹灵

绿岛 古宁头

马场町 安平古堡

西门町 自由广场

紫藤庐 鹿港小镇

新店溪 六张犁

景美 美丽岛

新历史合作社

出品：新历史合作社

出版：中信出版社

总第8期

主编：唐建光

副主编：杜兴

内容总监：谭昊

责任编辑：潘晶

主笔：庄秋水 杨东晓 刘永峰 毛剑杰 何书彬

图片编辑：卫超

封面设计：刘杰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市场总监：夏茉茉

高级产品经理：郭婧

品牌推广经理：石晓倩

产品经理 赵凌子

行政专员：刘美玉

唐建光 (tangjianguang@vip.sina.com)

杜兴 (duxing722@163.com)

谭昊 (edutanhao@163.com)

潘晶 (racine93987@hotmail.com)

庄秋水 (zhangling0301@126.com)

杨东晓 (cnydx@163.com)

刘永峰 (13671399840@163.com)

毛剑杰 (maojianjie999@hotmail.com)

何书彬 (yurangqiao@yahoo.com.cn)

卫超 (dawei781022@126.com)

刘杰 (jieliu1998@sina.com)

夏茉茉 (cskbzhy@126.com)

郭婧 (guojing0416@gmail.com)

石晓倩 (ziyeshiwodi@163.com)

赵凌子 (yikubaobao@163.com)

刘美玉 (422646834@qq.com)

关注我们：

新浪微博:我们的历史-OURHISTORY

腾讯微博:我们的历史

公众微信:我们的历史

编辑部 010-57423216

产品部 010-57423217

市场部 010-57423218

传 真 010-84084564

公共邮箱: ourhistory2013@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8号

关于我们

我们的历史
our history

“我们的历史”是新历史合作社推出的历史产品品牌。由这本数字杂志开始，您将会看到以“我们的历史”为统一品牌的网络产品、图书产品、活动产品、纪录片、电视节目，以及微信、微博等多种媒体形态呈现并传播的历史内容。

从纸张到电子，从文字到影像，从眼睛到心灵，无论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的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新历史合作社

我们关注历史，我们致力传播；我们执着真相，我们求索答案；我们回望过去，我们前瞻未来。

这是一个专注于历史记录与传播的同人平台，欢迎您的关注、参与和加入。

联系我们：

新浪微博：我们的历史-OURHISTORY

腾讯微博：我们的历史

公众微信：我们的历史

编辑部 010-57423216

产品部 010-57423217

市场部 010-57423218

传真 010-84084564

公共邮箱：ourhistory2013@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8号

目录

美丽岛足印——台湾转型地理

第一部分 穿过历史的河流

这座岛屿的暗黑与光亮

在台北寻回“中国”

第二部分 来路寻踪

东台湾行走地图

安平古堡后的历史肌理

台北之心

恋恋西门町

第三部分 转轨地标

二·二八：台北街头的撕裂伤口

紫藤庐的几代客人

我的眷村

金门：因战而兴 因和而变

高雄：“美丽岛”往事

第四部分 图腾与碑石

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野百合

鹿港风潮：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第五部分 寻路未来

回首海天相接处——内在于绿岛的台湾史和历史正义

真相 和解 审判

中国故事

美丽岛足印 ——台湾转型地理

关于台湾，我们知道什么？看到什么？

很久以前，从宣传画里，我们知道阿里山、日月潭、金门岛；后来，从歌曲和电影中，我们又知道了绿岛、澎湖湾、基隆港、鹿港小镇，还有西门町、忠孝路、新店溪……再后来，睽阻半个世纪后，当我们渡过那浅浅的一水海峡，亲身登上这座岛屿时，或许会发现，她是那么熟悉，却又如此陌生。无论是林立的高楼，还是寻常的巷陌，无论是阳光沙滩，还是高山密林，我们曾在此走过，又恍若隔世。

是的，台湾与大陆的阻隔，并不只是那浅浅的一道海峡，也不仅是那短短60年的分离。数千年以前，由这里的原住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始，再到数百年前大陆移民艾杀蓬蒿来此土，再到百余年来的殖民者、光复者、败退者、建设者、牺牲者、奋斗者、乐居者，每一代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那些昔日斑驳的印迹，投影在今日似锦繁花上，才是台湾真实的光影。

如果你要真正看到台湾，看懂台湾，一定要不疾不徐，且停且行，丈量那些脚步，辨识那些年轮，才能听懂她的吟唱，读懂她的沧桑。

来吧，跟着我们的14名“导游”一路走来，他们或他们的前辈，曾在安平古堡眺望，或曾在台北街头喋血；曾在紫藤庐畅谈，或曾在马场町蒙难；曾在眷村安家，或曾在金门驻守；曾在绿岛坐牢，或曾在街头巷尾投票；曾在妈祖庙烧香，或正在西门町流连……跟着他们，从台湾的昨天，一路走到今天。

第一部分 穿过历史的河流

在这条历史之河中，暗黑退潮了，但河中那些不断被历史冲击的小岛仍背负着无数悲伤与苦痛，或者理想与激情。

这座岛屿的暗黑与光亮

文/张铁志

台湾知名作家，现任香港《号外》杂志主编，并在两岸三地重要媒体撰写专栏，关注焦点从政治经济、社会运动到文化与摇滚，并涵括台湾、大陆与国际事务。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在两岸出版著作有《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即将出版《时代正在改变：民主、市场与文化想象》，分析台湾民主之路。



图一 张铁志

此刻，年轻的你试着掀开这个黑幕，看看里面的人是如何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挣脱黑暗，争取自由，并且最终拆下了这片黑色之幕。

这个岛屿在20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页民主的斗争史。



图二 台北自由广场，市民手举蒋介石画像参加庆祝活。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就展开各种政治运动：有要求设置台湾议会的立宪主义，有为工人农民争取权益的左翼运动，还有追求民族解放运动。

但当然并没有成功。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本地民众武装起义，国民党政府武力镇压，屠杀成千上万民众，其后更进一步进行“清乡”，肃清许多政治与知识精英。

1949年国民党政权内战失败，在年底迁移台湾。就在国民党政府来台之前，5月20日台湾开始实施全面戒严，为战后台湾政治拉下了浓厚沉重的巨大黑幕。

在那个黑幕下，是一条坎坷蜿蜒的民主抗争长流，水上漂着的是腐烂的青春之花，沉在河底的是流淌着鲜血的肉体。

数千人因为政治理想，或因为冤假错案，死于独裁体制的暴力之下；另外几千人被囚禁、被虐待，耗尽他们的青春与生命。更多没有被囚禁、被消失的人，是在巨大的伟人铜像前，在无数的标语和比标语更多的特务之前，沉默噤声、心怀恐惧。

此刻，年轻的你试着掀开这个黑幕，看看里面的人是如何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挣脱黑暗，争取自由，并且最终拆下了这片黑色之幕。

在这条历史之河中，暗黑退潮了，但河中那些不断被历史冲击的小岛仍背负着无数悲伤与苦痛，或者理想与激情。你决定一一拜访那些沉默之岛。

从绿岛到台北

首先，你来到台湾东南方外海的绿岛。

这个迷人的小岛现在是台湾的旅游胜地，充满着青春。但曾经，这是一座恐怖的岛屿。因为海岸边是两座白色恐怖时期专门囚禁政治犯的监狱：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训导处（1951~1965年），和“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1972~1987年），通称绿洲山庄。

现在，这些牢笼和外围区域成为绿岛人权纪念园区。在刺人的阳光下，你会先看到海边的“人权纪念碑公园”，这个公园成立于1999年12月10日。在广场中有一块垂泪碑，上面刻着曾被囚禁于此的柏杨先生的句子：“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在公园的坡道，墙上刻着一千多名为追求民主、人权奋斗而遭到政治迫害的人的姓名。你轻轻摸着那些早已被无数人摸到发亮的名字；是的，这些名字正是那历史之河最闪亮的光芒。

你来到台北，走到新店溪畔的“青年公园”。这里是人们从小来散步玩耍的地方，现在依然洋溢着幸福的味道：青年人谈恋爱，爸妈带着小孩散步，老人坐着享受时光。

但这里曾是最最森冷痛苦之地：新店溪畔的草地是1950年代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日据时期这一带叫做“马场町”，现在这里叫做“马场町纪念公园”。

然而，公园中并没有刻上这些受难者的姓名，那段历史也还没有被完整书写。一如另一个台北市的纪念公园。

你从马场町来到台北六张犁的一座小山上，你知道，这也是当年许多在马场町消逝的灵魂飘荡的路线。

1993年5月，政治受难者曾梅兰多年追寻1950年代同案被处以死刑的异姓哥哥徐庆兰尸首，终于在六张犁的乱葬岗发现了他死去兄长的墓碑。这里不只是他哥哥，还有二百多位白色恐怖死难者的坟。

这些墓碑分布于六张犁墓园三个地方，一人一小块立石，上面刻着姓名，死亡年月日，有的刻有死亡地点如“马场町”。当年被处以死刑

的政治犯，若无亲属领回尸体，多埋葬于此。

经由政治受难者团体争取，当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决议在马场町、六张犁设立纪念公园，并进行相关历史研究。后来在马英九市长任期内，先后成立“马场町纪念公园”和六张犁的“戒严时期受难者纪念公园”。只是，虽然公园落成，此地却仍是一片荒烟蔓草。一如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故事是一段被人们遗忘的记忆。

离开这两个城市边缘，你回到台北的中心地带：忠孝东路的喜来登饭店。这里附近有“行政院”和“立法院”，是台北的权力核心区。但1968年，这个饭店和附近区域是“警备总部军法处”和看守所的所在地。1968年之后，这个单位搬移到景美，附近还有负责侦防、逮捕和侦讯的“调查局”，负责军事审判的“军法处”和“军法局”，执行监禁的“军法处”看守所和新店军人监狱，以及枪决死刑犯的安坑刑场。连成一气的死亡地带。

几年前，景美的“军法处”和看守所改制为“景美人权园区”。园区保留了当时的建筑如“法庭”、牢房、接见室、洗衣场等等，并且有几个精采的展示区：一区是政治受难者的文学、艺术与电影的文化展，包括他们出版的书籍与影片；另一区是台湾人权历史与史料文物展。

在园区中的“第一法庭”，曾经进行了台湾民主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审判：1980年3月的美丽岛大审。1980年2月黄信介、施明德、林义雄、姚嘉文、陈菊、吕秀莲、张俊宏、林弘宣等八人被以叛乱罪提起公诉，并自3月进行9天的军事审判。最后，八人全部被判有罪，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

在前美丽岛的历史，除了被处死，被囚禁，还有更多人失去了自由。

你从景美来到温州街，彷彿穿越时光隧道来到一片日式住宅区。这一带大都是当年台大教授宿舍，最特别的，是殷海光故居。殷海光晚年都居住于此。在庭院中，有他自己挖掘的“愚公河”和“孤凤山”（其实只是一座小丘）。1960年雷震被以匪谍罪逮捕后，殷海光很难发表言

论，并被特务严密监控。1966年，台大受到政治压力不再续聘殷海光。1969年，殷海光在此郁郁而终。

从殷海光故居走五分钟，会来到台北市现在重要的文化地标“紫藤庐”，许多人来这里品茶、看饶富味道的建筑，也感受丰富的历史。

这是日据时期的建筑，1950年后成为“关务署”署长周德伟的宿舍。周德伟先生本身是哈耶克的学生，是一名自由主义者，1950年代时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经常在此聚会讨论。1970年代中期后，此屋由其子周渝居住；由于周渝参与党外运动，因此许多党外人士与文化界人士经常于此聚会，举办活动。1981年正式改为公开经营的茶馆，有更多思想与文化座谈，迄今依然如此。

这个场所真正见证了台湾从1950年代至今的民主与思想的火光。

扑不灭的民主之火

你在这个历史之河已经来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爆发的民主运动。你必须再次离开台北，来到高雄，去见证威权体制如何反扑1970年代的改革力量。

1979年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美丽岛杂志在高雄举办一场示威游行，从美丽岛杂志社到新兴分局派出所前的圆环举办演讲，警方强力镇压引发警民严重冲突。事后军警单位展开大规模逮捕。

当年的“新兴分局”如今还在，前面的圆环街道当然已不复见当年的硝烟。高雄捷运站则设立了一个“美丽岛”站，并且有美丽的玻璃艺术“光之穹顶”。而当年的美丽岛事件受刑人陈菊现在是高雄市长。



图三 20世纪30年代,台北荣町(今衡阳路),右侧是著名的新高堂书店,远处是新公园入口。

整个1970年代的政治改革与文化运动风潮，到美丽岛事件划下了一个黑暗的句点，而可能让台湾陷入更肃杀阴冷的气氛。然而，民间社会崛起的力量已非威权体制可以压制住，而将在1980代更沸腾地展开。

你回到台北。就在高雄的美丽岛事件到次年3月景美的军事审判之间，还有一个地方，一个台湾民主运动史的巨大悲剧地点，你必须去。但你必须忍住泪水。

1980年2月28日，当林义雄还在牢里等待审判时，他在家中的母亲和一对7岁的双胞胎女儿，被不明的歹徒闯入，极为残忍地杀害，长女林奂均被刺六刀重伤。林义雄赴殡仪馆时，用头猛撞着无情的冰柜，痛哭哀号：“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们都死了……”

林义雄的住宅后来被基督教长老教会买下，建为“义光教会”，每年2月28日早上都会举行追思礼拜。

1987年7月15日，台湾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但这只是开启政治自由化的大门，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还非常的远：基本的言论与集会自由仍大受限制，民意机构也尚未改选。于是，1990年，爆发了三月学运。

你来到“中正纪念堂”——这里是为了纪念蒋介石这个“现代帝王”的庙，而几步路之外就是“总统府”：独裁者总是不愿意离开权力中心。然而，建造者一定没有想到，这个广场会成为一座人民的广场，抗议的广场。1990年3月，数千名学生来到他们戏称为“中正庙”的广场展开大规模静坐，要求“民意机构”全面改选，并以“野百合”作为三月学运之精神象征。青年的火焰在广场上燃烧着历史的新页。

走出中正纪念堂，你来到旁边这条通往“总统府”前的大道。在野百合学运时，这里还叫做“介寿路”，但1990年代中期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这里曾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禁域，多停留几分钟就会被密布的宪警盯上；1980年开始，许多抗争游行都以此为终点，1994年陈水扁任市长时在这里举办一场舞会，被称为“空间解严”。这个空间的威权性格被逐渐卸下。

你曾经在这里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抗争，气氛紧张或温馨的；例如1997年，你和数万人为了抗议治安败坏而游行到这里，用镭射光在“总统府”建筑上打上两个字：“认错”。这是以高度创意进行意义深厚的反抗。2006年红衫军曾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集会多日，也创下记录。这两年仍不断有许多抗议活动，如农民连续来了两年高喊“土地正义”。

这些活动大部分是温驯而有礼的，不像1980年代的剑拔弩张。以背后的“总统府”为布景，人们在这里演讲、唱歌、喊口号，有时席地而睡一夜，然后平和地结束。

的确，在这个时代，大部分时候抗争戏码都已经是人们熟悉的，而少见激烈冲撞。但能在“总统府”前守夜抗争，能用镭射光羞辱这个最高权力中心，这不正是那些被囚禁的青春，被牺牲的生命，他们用一生所梦想，所争取而来的吗？

在台北寻回“中国”

文/谭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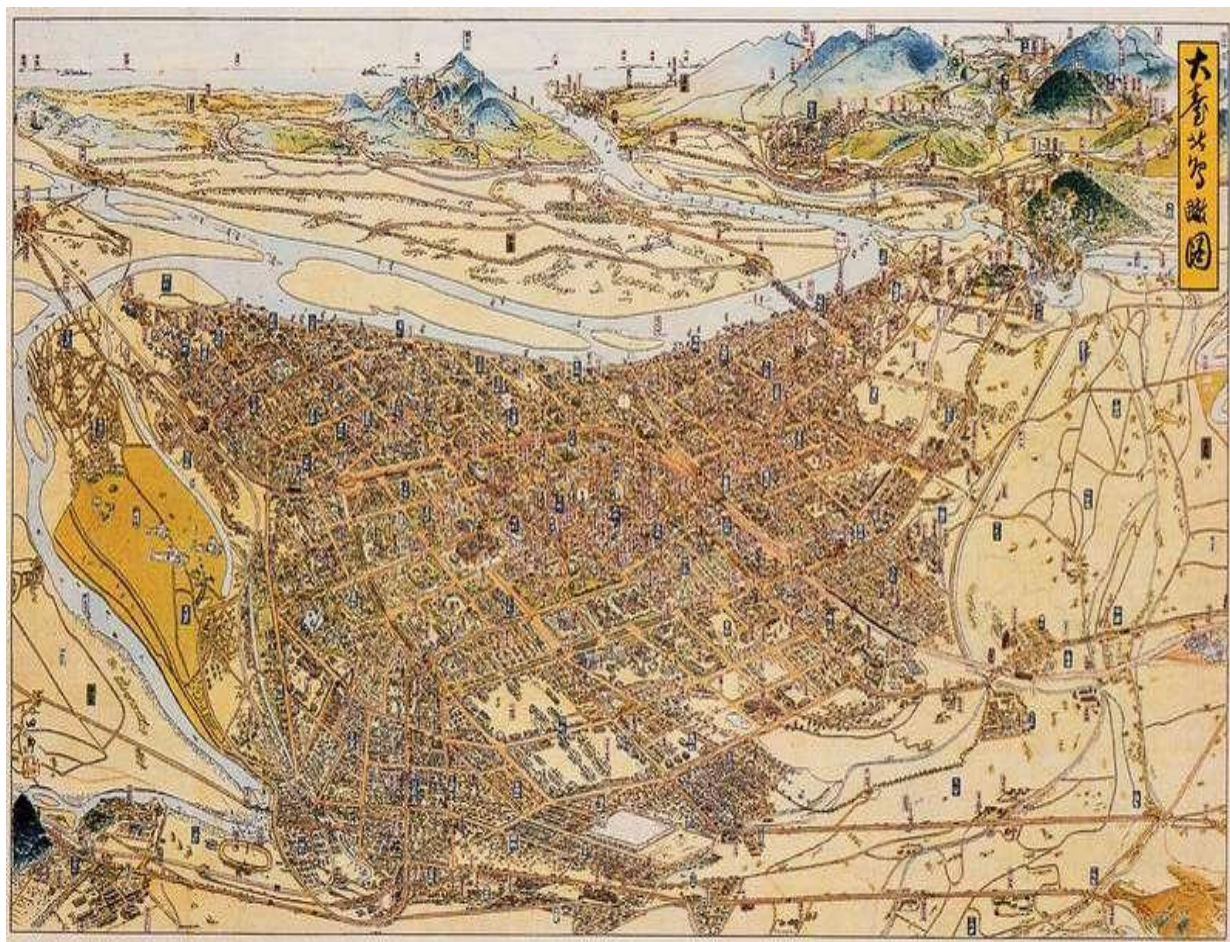
1971年生于台湾，英国University of Sheffield新闻硕士，身兼记者、文史工作者、纪录片工作者数个角色，曾拍过大型国共战争纪录片《最后岛屿》，著有国军底层老兵口述历史书籍《烽火离乱老士官》、翻译作品侦探小说《石猴子》、魔幻小说《王者之眼》。目前以写字编稿为业，常年为台北、北京、上海、欧洲等众多华文报刊供稿。



图四 谭端

今天人们眼中台北的纷乱杂陈，都源自于一个动荡多变、颠沛流离的时代。台北是座充满移民故事的小城，台北不在101大楼，而是在那一条条或安静或热闹的街角巷弄中。深入了解台北一路走来的历程，你将见到台北的绝美风华——中国的，日本的，也是台北的。

许多大陆游客到台湾，第一眼就失望了，他们看到的台北还不如深圳、北京、上海那样，拥有气度恢宏的摩天大楼、笔直宽敞的大街，也没有超大广场。相较于大陆的大城市，台北简直像二线城市，充斥着老旧的楼房，狭窄的巷弄空间。



图五 日据时期绘制的台北地图。

大陆游客到台北，眼神通常都会下意识到处搜索，情不自禁在这个资本主义地区寻找“中国元素”。站在台北街头，他们或许感到既亲切又陌生。亲切的是可以在路上看见各种中国线索：宁波西街、成都路、金华街、西藏路、南海路、南昌路；同时或许又有些陌生感，台湾人的神韵和大陆同胞既相似又不完全一样，他们有着大陆人没有的柔顺口音、总有道不完的谢谢，他们态度热情友善，起码表面是……总之，游客会觉得他们有点“祖国的陌生人”的味道。

虽然处处有中国地名的街道，但是台北却不是纯正的中国味城市。如果要在台湾找中国味，应该到台南。在台北，人们看到的，更多是日本味。台北的“老中国”早已被日本清洗过了，日本人曾经来过，他们拆毁了大部分中国建筑。等到中国人重新回来的时候，民国在这里重新移植了一个中国，那是一个饱受惊吓、刚刚从硝烟中死里逃生，只背着一个行囊，落魄不堪的中国。因为人口拥挤住房缺乏，人们没有立即拆毁日本人盖的建筑，而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切割、拆分、加盖。就像人民群众涌进北京四合院自行加盖形成大杂院、涌进上海租界洋人别墅形成杂居户一样。今天人们眼中台北的纷乱杂陈、缺乏大气，都源自于一个纷扰动荡、颠沛流离的时代。

把中国回植台北

就像在上海街头看见英、法、日、俄各国身影一样，近代台北城有一百三十年的建城史，经过了两个国家、四个不同时代政权的统治，以及至少三种不同的文化特色洗礼和影响。

1946年6月26日，一位叫郑定邦的建筑师奉派到中华民国政府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营建局担任技正，正是这个上海人，让广泛的中国元素流淌在台北城的血脉里。在郑定邦来台的前一年，行政长官公署以行政长官陈仪之名公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当时陈仪尚未有以各省行政区来命名台北街道的想法，只是要把那些日本统治色彩太浓烈的街名改正过来。

本省人和外省人爆发激烈冲突的“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行政长官公署决定彻底清除日本遗留的影响。从上海来的建筑师郑定邦奉命加速执行《街道名称改正办法》。

郑定邦刚到台北时，他见到的台北是一座拥有浓厚日本血统的城市。郑定邦整个人贴在日本人留下的台北地图上，他看见后来的台北车站原来在日本地图上叫“台北駅”，“总统府”原来叫“总督府”，中山堂叫“公会堂”，台大医院当时属于“明石町”，名称是“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附属病医院”。“二·二八”公园原来叫“新公园”，圆山饭店原来叫“台湾神宫”，从总督府去神宫，有一条好直好长的参拜大道叫“御成街道”，后来变成现在的“中山北路”。

日本人走时留下一幅满是日本地名的台北地图，不知道是出于什么鬼使神差的灵感，郑定邦决定把中国地图覆盖在原先这幅台北地图上面。他将中国的中轴线对准当时日本人参拜神社的主要道路，突然间，郑定邦眼前的台北，变成了中国。

按照中国东西南北地理方位，郑定邦开始对台北市街道进行命名。

像当时所有中国人一样，饱受中日战争之苦的郑定邦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影响。他在台北的东区安上临沂街、济南路、徐州路的路名，又偷偷把家乡江浙一带的地名安插在和他一样位阶的中层公务员宿舍附近：金华街、青田街、杭州南路、绍兴北街，再把往南一点的高级公务员住的区块改成南昌路、牯岭街，然后他的想象继续延伸，再往南是泉州路，西南便有西藏路，西北有迪化街，东北有抚远街、长春路、辽宁街，那些曾被日本人横行肆虐的中国地名一一被郑定邦像复仇似的重新定在台北的地图上。

那是一幅民国行政区域图，也是一幅抗战收复失土的地图。当时郑定邦并不知道两年后国民党政府会奄奄一息地迁往台北。

被掩埋的“中国”

1946年10月25日，蒋介石来台参加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会上致词：“与我相别50年的同胞相聚一堂，共同庆祝台湾的光复，使我50年的宿志，得如愿以偿，实在是我平生感到最愉快、最光荣的一天。”清代甲午一战割让台湾，丧权辱国，蒋介石自诩继承清代以降法统，如今台湾在他手上收复，自是无上快慰。

在这次巡视中，蒋介石记载了自己的感想，“巡视台湾之后，较之巡视东北之收获尤大……台湾可视为一片干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

事实上，一年前当精疲力竭的中国人突然迎来胜利，匆匆来到台北接收失土时，他们惊呆了。他们的眼睛像今天的大陆游客一样，不断在寻找他们熟悉的中国元素，但彼时台北几乎已经见不到中国的影子，早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日式城市。

中国哪里去了呢？经过50年的统治，“台北的中国”早已被日本统治者掩埋起来，就像是维苏威火山埋藏了庞贝城一样。中国的基石在台北的脚下，大多成了化石。

1874年，日本明治维新迈入第六年，发生日本出兵攻打台湾原住民部落牡丹社的事件。此时慈禧掌控的大清政府还没有预料至自己二十年后会败给日本这个小岛国。但鉴于牡丹社事件，公忠体国的清官员察觉到日本扩张的野心，于是重新研拟台湾的战略地位。他们明白，台湾将是对抗日本的前哨，便奏请改制台湾战略，最后获得慈禧太后同意将台北升格为首府。

1879年，台北正式取代台南成为台湾首府。当时台北还是瘴气充斥的蛮荒之地。清官吏要建台北府城时，找了半天，想把府城建在台北最早的垦荒聚落“艋舺”，没料到居然却遭到当地士绅的非议。加上清政府国库缺钱，建城的进度相当缓慢。此时，京城颇为活跃的大臣岑春煊为了推动国防建设，到处募集资金，终于顺利推动台北府城的建设。

然而台北城最初建设的规划，被后来上任的台湾兵备道刘璈完全推翻，改以他擅长的风水观建筑这座全新的都城。

清官吏最后在艋舺与大稻埕地区未开垦的一片荒地上，兴建起一座有围墙的府城，将重要的官署衙门包括淡水厅、台北府、布政使司、巡抚衙门，以及文庙、武庙、圣王庙、城隍庙、天后宫等等都兴建其中，将全台湾的宗教与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此地。

台北城在1884年完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座依风水建造的城池。

仅仅十余年后，中国败给日本，台湾成了日本第一个殖民地。日本军队赴台登陆之后，一路势如破竹，剿灭抗日势力，并且由一些见风转舵的台湾人领到台北城下，城里的“劣绅”居然里应外合，从城上丢下梯子放日军进城。

日本帝国占领台湾几年后，在台湾首善之都做的最重要的建设就是实施都市计划——新统治者完全展现了脱亚入欧的方针，他们大肆拆除清帝国为防范日人而设的传统城墙，在原地兴建一座座先进的、能展现日本现代化实力的西洋建筑，许多建筑之华丽即使日本国内的建筑也相形见绌。

在日本人眼里，清廷治下的台湾巡抚刘铭传为台北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不算是甚么真正的现代化。它只有井水，没有自来水，大部分地方没有电灯，它的建筑又是几千年延续下来、注重宗法伦理观而非实用的现代建筑。日本人搞现代化，在城内大兴土木，大肆拆除清廷统治的象征。陆陆续续，代表儒家精神的台北文庙被拆，武庙被拆，布政使司衙门被拆，那些残留的“中国”被摧枯拉朽般的推倒。

开始拆除城墙时，台湾的士绅开始怨声载道了。但日本殖民者早已想定了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根本不理睬住民的声音。直到总督府图书馆长，一位叫“中山樵”的日本人，这位有文化素质的殖民官员跳出来阻止自己头脑发热的同胞，台北这座清代古城才留下最后一丁点骨骸。最终，台北城四周的城墙全数被拆除，护城河被填实，城墙砖被

移作监狱的石材，用来监禁反抗的中国人……日本人只保留了五座城门，其中靠近台北车站的北门是唯一保持原貌的古城门，现在被台湾列为一级古迹。

清代末叶满清政府建立台北城时，像中国许多城池一样，是将台北城沿着中轴线向南北展开建设的。它的北门对准了台北周郊的最高峰七星山，人们从北门进入，一贯直奔往南，将通过最高行政中枢台湾布政使司，再通到南门。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都市计划跟中国不同，为了符合迎接旭日的观点，日本人喜将城池建成“坐西朝东”。所以郑定邦看见的台北，中式的南北中轴线已经篡改成为日式东西中轴线的，原本狭长的布局变得肚子大大，俨如一个清秀少年变成大腹便便面目模糊的中年人。

中国人生命地标的城市

日本人走后，台北在郑定邦的笔下逐渐恢复中国样貌。但她已不可能再是旧时的台北。



图六 20世纪30年代,台北总督府前的荣町(今衡阳路)。

在日据时代，台北有四大聚落，日本高级官员住在小南门、牯岭街一带，也就是现在的中正区，离总督府很近，附近多是有私家园林的日本大房子，现在台湾“总统”的官邸也在附近。

再接下来是“总督府”中级干部和帝国大学教授的宿舍，在丽水街、永康街、温州街、青田街、潮州、金华街及爱国东路一带，也就是现在的中正区以南一直到大安区附近，这里房子稍微小一点，但相对安静。一般日本平民则住在西门町一带，长沙街、峨嵋街、武昌街、昆明街的万华区以东。

日本贸易商人则住在林森南北路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大同区，因为商人的阶级和生活型态，此地风花雪月的场所比较多，曾是台北的不夜城。

1945年抗战胜利收复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人马直接住进小南门至牯岭街一带以前日本高级官员的官舍里。

等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难来台时，许多曾在大陆叱咤风云的文官武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安身之地，只能由势力庞大的台糖公司和台电公司安排他们住进官产宿舍。其他那些沦落来台的文人名士就驻进永康街、青田街、重庆南路尾、厦门街附近，比如大家熟知的文学名家林海音、余光中都曾住在此地。此地区原本是日本中阶官员的宿舍区，新一批住进此地的很多人都是江浙人，因此永康街一带曾是江浙菜较集中的地区，至今在此附近的东门市场与南门市场尚可以买到适合做江浙菜的食材。

待新移民们从惊魂未定中安下身来，转眼已是60年代。

制片厂挑高三层楼高的摄影棚，可以听见演员和导演带着空间感的话音。片场高挑宽敞、安静，摄制组的说话声像空谷足音一般回荡在黑暗中。摄制于1990年代初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片头记录了1960年代的台湾，初中学生小四和同学跑到电影拍摄现场偷看女演员换衣服。他们躲在鹰架上，下面的女演员正在布帘后面宽衣解带。在关键一刻，同学的书不小心从鹰架上砸下来，那声音，惊动了片场。警卫立即冲了出来，小四与他的伙伴们就此展开了一连串迷途人生的追逐。

这是1963年的台北，小四偷看女演员换衣服的地方，叫“国联片场”。小四一代，大约是在1945到1949年之间出生于大陆，父母随着蒋介石迁台，到1963年时，他们已经是一个有曲折移民故事的少年。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剧情是一个台湾社会案件改编的真实故事。小四念的是台北著名的“建国中学”夜间部。电影中出现的片场正是李翰祥的“国联片场”，位置就在“建国中学”旁边。杨德昌念书的时候

正好是“国联片场”最红火的年代。1963年，杨德昌15岁，和片中的主角小四年纪差不多，杨德昌自己念的也是“建国中学”。

当时的台北还没有101大楼，甚至连五层楼以上的建筑都很少。台北很安静，马路上只有少量的公交车、军方的吉普车，最常听见的声音是脚踏车铃铛声和脚踏车架起支脚时的金属敲击声。路上没有那么多私家轿车，也没有那么多废气。

李瀚祥所建的“国联片场”位于牯岭街，这个日本时代台北最高级的住宅区——就在他来台发展的前二十年，牯岭街一带还是日本时代总督府官邸宿舍区，住着不少日本高级文官，此地到处是砖木混合的日式建筑。大一点的官舍围墙内郁郁葱葱，几乎家家户户都被宁静的、精致的日式园林包围着，就像唐诗写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一样，这个区块看上去犹如旧时日本的东京。不过，牯岭街那些有大大庭院的日本官舍，早已分配给政府的高级军政人员。在牯岭街附近的厦门街、金门街、南昌路、浦城街一带，曾住着一些耳熟能详的人物，何应钦、孙立人、胡宗南以及张灵甫的遗孀。

1963年夏天的午后，站在台北的马路上可以听见马路边高大、枝繁叶茂的榕树被风吹拂的声音。在如羊肠的小径巷弄中，不时可以听见叫卖包子馒头或者卖豆花的吆喝声，带着方言的口音，一听便知是来自大陆农村的国民党军退伍军人。小四的父母是来自上海的低阶公务员，白天，他们在外边讲国语，晚上床头，夫妇俩讲的是上海话。

那个时代还是“军事戒严”时期，夜幕降临没多久，“建国中学”一带的公家机构都熄了灯火。台湾其他各地的小老百姓大都回到自己因陋就简的低矮小屋，点燃鹅黄的钨丝灯，全家人就在狭小、拥挤的屋内，安分地度过一整晚。

来自大陆的一般百姓，比如舞女、小贩、商人、教师、退伍军人、公务员、厨师等，则落脚在台北边缘的巷弄中。一些机灵的人就涌到西门町一带，在清代台北府城墙的原址搭起一长排临时木屋，摆起地摊，卖起小吃、杂货糊口。而那些上海来的资本家就挤到重庆南路、博爱路、林森南路一带做起寓公。到了1960年之后，大部分有点

办法的人见反攻无望，陆陆续续移民欧美了。而从1980年开始，当年从大陆来的那一代壮年人，便凋零了。

不到三十年，当年住着逃难来台的大陆人的那些房子大都人去楼空，残破凋败。到杨德昌拍片的时候，牯岭街一带不仅人事已非，景色也已沧海桑田。胡宗南、何应钦、顾祝同等等一批国民党重臣早已故去，张灵甫的遗孀带着儿子移居美国，李翰祥也已回到北京工作生活，台湾电影经过1980年代短暂的荣景之后，正要进入长达20年的衰败期。“国联片场”经过20年的变迁，连建筑都已经不在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开头的片场，是在如今靠近外双溪台北“故宫”的“中央电影制片厂”摄影棚拍的。

杨德昌拍此片时，当时台北经过多年发展，土地已经充分开发，很多历史场景、名人故居已经灰飞烟灭1990年，原先牯岭街那些刨冰店、旧书摊几乎都消失了。电影中，旧时代牯岭街的景，是在距离台北四百公里之遥的屏东县长官邸前的马路上搭的。

1990年代台北街头已经听不见树木被风吹拂发出的沙沙声，取而代之的是马路上汽车的轰鸣声响。台北小巷中带着大陆口音的小贩吆喝声早已随着时代变换悄悄地消失了。1990年初杨德昌在拍此片，要找会讲大陆方言的“外省移民第二代”扮演他们父辈们的角色，都不太容易了。时代转换间，连那些沧桑感和漂泊感充斥的人生故事也都逐渐被一座城市遗忘。

台北之变

从蒋介石率领两百万军民败逃到台湾30年间，台北变成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混乱城市，德国《明镜》周刊形容它近似“猪舍”。

但是在过去30年间，在台湾民主转型和公民社会的建设下，台北逐渐发生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变化，它成了“亚洲最具创意的城市”。

在台北人共同努力下，从都市规划、小区参与、公共艺术、公共空间、街道保存、文化资产保存、商圈建设，台北不再只注重高楼大路那样外表的肤浅，变得友善、变得人性化、变得有层次——从光点戏院到温州、青田、泰顺几条街，从小街小巷里的小公园到淡水河的整治，从新芳春茶行到华山艺文中心，从汉番界碑到中山堂的艺术介入空间，它如今已有了层次丰富的城市风貌。有属于商业的信义计划区，有属于历史的迪化街商业街，有现代化的消费空间101大楼，有记载政府迁台历史的四四南村，台北成为传统与现代和谐搭配的城市。

大陆游客如今站在台北，可以自行设计主题之旅，如“民主转型之旅”“自由主义之旅”“独立书店之旅”“咖啡馆之旅”“日本遗迹之旅”“蒋家蓝色路线之旅”。

台北是座充满移民故事的城市，台北不在101大楼，而是在那一条条或安静或热闹的街角巷弄中，去与不同历史背景的本地人交往，深入了解台北一路走来的历程，你将见到台北的绝美风华——中国的，日本的，也是台北的。

第二部分 来路寻踪

由远古而来的足音曾如此从容自在，只是走近今天才密集而惊惶起来。

东台湾行走地图

文/巴代

1962年生，台湾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人，曾获台湾文学长篇小说金典奖。著有《笛鹳》《斯卡罗人》《马铁路》《走过》《白鹿之爱》《姜路》。



图七 巴代

远古以来，中央山脉坚定不移的屏障与太平洋潮浪海风无时无刻的慰抚，从不因为参与历史的族群如何哀鸣或得意，而稍稍减弱一丝或停止。台东仍将保有全台最丰富多元的族群文化与色彩；仍拥有全台最美丽与多样貌的太平洋海岸风情；仍能清晰感受到最干净，无时无刻不带有一点海洋浪漫与森林青绿交揉的空气。

在台湾，台东县政府近日遭遇了几个麻烦事，首先是为了阿塿壹古道的开筑，与屏东县政府之间相互喊话；第二个是核废料储存地选址作业的争议；再来就是争议了多年的“美丽湾渡假村”的开发案，持续遭到来自全台的环保团体围剿，台东县政府依据环评诉讼的覆议权，企图继续负隅顽抗。另外，知本观光饭店开发案，涉及知本公墓拆迁的事宜，遭知本部落诉诸公议激烈抗争，拖了两年至今仍未解决。另外一件与台东县政府无直接关系的是：2012年12月，卑南族南王部落严正拒绝文化资产局，以“参观卑南族大猎祭”为名的参访活动。这些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事件，恰巧点出台东县的发展意图与原住民族部落土地、文化、尊严有其连动的关系。

回顾历史，1637年荷兰人的探金队伍第一次进入卡地步(今卑南族知本部落)。随后几年与“卑南大社”组成联军，向西向北征伐与找寻黄金，开启了东部族群第一次接触西洋人的经验；部落历史与文化图像也正式清楚地进入西方异族的文字记录中。1721年朱一贵事件及1786年林爽文事件，其余党渗透逃进东部，开启了西部汉族与平埔马卡道族开始零星进入东台湾寻找生机，间接形成屏东枋寮的定点交易，以及汉族通婚融入东部原住民部落的例子。

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清廷开始正视台湾的基础建设与设省议论，首先推行“开山抚番”政策，藉军队武力分别开筑北、中、南三条横贯中央山脉的战备道路以进入东台湾，设“台东直隶州建”，移垦汉民，开发山区，大量的汉民族与市集于焉形成。

日本在1896年依据“马关条约”占领台湾，除了设置台东厅重新规划台东市，也设置“日本移民村”以及招募汉人形成“本岛村”，积极开发整个东部；后续的“理蕃政策”收缴枪枝，更打破了千百年来东部原住民部落间自然形成的疆界。1945年国民党政府迁台，一连串的土地政策与建设方案，以及台湾整体“戒严”“解严”，以及后期的产业发展，更确立了东台湾现况，也埋下更多的不确定。

远古以来，中央山脉坚定不移的屏障与太平洋潮浪海风无时无刻的慰抚，从不因为参与历史的族群如何哀鸣或得意，而稍稍减弱一丝或停止。尽管环境议题与部落永续发展的争议不断被提起，台东县政府

府的积极作为自有其为人民创造财富机会的考量，而辖内各族群也难逃被卷入各方不同立场的拉锯与攻防之中，被迫接受、抗拒或适度调整，其结果如何，还需要时间观察。



图八 台湾卑南族族民正在跳舞。（绘画/孟凡萌）

作为一个关心故乡生存发展的居民，也无须过于悲观。即便未来东台湾有了巨大的改变，那苍郁峻岭与开阔波澜的高山海洋风情，那云瀑、山岚夹道的纵谷幽秘也不会有太多的改变。台东仍将保有全台最丰富多元的族群文化与色彩；仍拥有全台最美丽与多样貌的太平洋海岸风情；仍能清晰感受到最干净，无时无刻不带有一点海洋浪漫与

森林青绿交揉的空气。才陶醉，一个不留神，耳边便响声起可能来自排湾族、鲁凯族、卑南族、阿美族、达悟族、汉族(闽、粤)、新移民(来自越南、印尼、菲律宾新娘、外劳)的美丽歌声与语言。

你，一个带着地图、带着想像闯进台东境内旅客，就请敞开心房装满关于台东的记忆回乡，歌咏或静静咀嚼幸福。

南回线

朝迎旭日自太平洋升起，目送夕阳沉落中央山脉南段的高耸山稜线。整条古道沿着海岸起伏弯，除了绿蠵龟的出没产卵，那深绿平静的太平洋海面，自在的掩隐她恒常的深邃心情，任由阳光从不同角度折射与悦动。

这里所称的南回线，即是编号“9”的台湾省级道路南段，也就是从台湾西岸的屏东县枫港乡穿越中央山脉南段，进入台东县后一路蜿蜒至太麻里的一条公路。这一段省道所穿越的区域，主要是包括清代末期汉人所称“南排湾族上十八蕃社”的狮子乡族群，以及“南排下十八番社”的恒春半岛族群，与串列在台湾东南方延太平洋岸的“东排湾族”各部落所居住的领域。这个区域离开海岸线的山地，直至19世纪末，还是外人难以进入的排湾族领域。

“台9线”由屏东县进入台东县的分水岭上，设有“寿卡检查哨”，是一栋警察执勤住宿的水泥建筑。早期的检查管制哨以管制人民任意进出山地、监控此地排湾族山林活动为主要任务；后期作为南回公路紧急救援站，协助处理山区大小灾变；1980年代台解除“戒严”后，山地管制逐渐松绑，加上警力编制重新调整而终至废哨。

近十年，台湾休闲旅游风气大炽，自行车长途旅行客终年络绎不绝于途，在费力蹬车爬坡二十几公里后，一般人大致会选择“寿卡检查

哨”作为休息与集结处，检查与调整车况，以备接下来二十几公里更陡更弯回的下坡路段。屏东县警局因应这股休闲运动风气，斥资整修这栋建筑物，除了美化外观，也修复相关设备提供骑士们加气、盥洗与打地铺宿营的简单需求。这里的景物、视野透发着一股宁静、安适，咸信是骑士们相机里必存有的风景纪念照。

类似的检查站，在全台山地部落都可以发现。政府沿用日据时期理番政策的“驻在所”概念，长年严格控管山地。某个程度来说，“寿卡检查站”的设立、废哨与转型，正反映了台湾社会渡过威权体制进入成熟的公民社会的过程；也反映了区域族群移动与交流日益频繁以致打破疆界相互影响。而自行车的兴起不衰，也见证台湾人民逐渐步入富而不奢，逐渐重视生活品质的成熟态度。

由寿卡一路东行蜿蜒向下，山路下降到平地临海处的安塑村(排湾族部落)。古称“阿塿壹”，目前是达仁乡公所所在地。在日据以前，一直牢牢地控制由台东向西向南的进出路。可惜腹地太小，加上排湾族如百步蛇般的领地观念，此处始终未能发展形成一个重要的历史市镇，加上受制于可耕地与季风影响，居民经济营生以农耕渔猎为主，离乡工作赚钱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生计。地处交通的要渠长年带来大量流动人潮，脑筋动得快的汉人，设立加油站以及大型便利商店，短暂的停留人潮看似带来商机，却未对安塑部落带来经济上的实质帮助。



图九

这两年往南方的“台26号道”的开筑，所引发的“阿塑壹古道存废”的争议，以及核废料储存地选址的风波，使得安塑部落成为话题部落。部落内部对上述议题各有不同的看法，赞成与反对的阵营形成几个分裂的势力，挑战传统部落的和谐与议事习惯。这个看似一个小部落的问题，目前却也是全台湾拥有观光资源的部落的共同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永续经营之间的冲突，现代议事规则与传统部落协商机制相抵触，在在考验部落如何取舍的勇气与智慧。

所幸，这些恼人的问题，还不需要旁人你我一起焦虑，安塑村目前还拥有台湾环岛公路最后一段尚未连接的断裂点。那一条著名的，

曾经承载着汉民族、马卡道族冒死由西部到东部找寻生活空间梦想的“阿塋壹古道”，正安静地迤邐在安塑村南方，朝迎旭日自太平洋升起，目送夕阳沉落中央山脉南段的高耸山稜线。整条古道沿着海岸起伏弯，除了绿蠵龟的出没产卵，那深绿平静的太平洋海面，自在的掩隐她恒常的深邃心情，任由阳光从不同角度折射与悦动。此处，处处响着动人的音符，除了日夜不停歇的浪涛拍岸与退潮拖刷声，还有一个翻遍所有旅游资料也难以找到的，绝无仅有的声音夹杂在涛声中。那是古道北段凶猛的太平洋浪涛，瞬间卷起推送巨大的卵石，攀上超过45度角的海岸所发出的圆石滚动碰撞声，浪起潮退间规律地发出“喀拉拉”的声响，直教旅人醉迷与喝采，不忍独享。

因为这样，安塑部落的有识之士，正逐渐聚集与推动“阿塋壹古道永续经营”的活动，透过自发性的组织与训练，限定旅客并提供导览解说，解说阿塋壹古道在历史、人文与环境议题上的美丽与哀愁。能不能因此带动部落做某些转型？仍待观察，但也提供出了一个尝试的方向。

台东平原

硬要把长宽也不过12公里的扇形冲积扇说成是“台东平原”，确实有那么点吹牛与心虚，但相对于整个台东境内，从海平面直接攀升到三千公尺高的地形落差，这个冲积扇还真提供了“拥有一片平原”的想像与安慰。

就聚落分布而言，以台东市为中心，周边由南向北环绕着卑南族的知本、建和、利家、泰安、上宾朗、下宾朗以及东鲁凯族的达鲁马克部落、排湾族的东兴部落；除此之外，市中心区还有阿美族的马兰部落与卑南族宝桑部落隐藏在汉族的社区内。

台东市在清末的设省以及日据时期的规划开发，基本上已经是汉人为主的行政区，工商农渔主要的经营者。目前大型工厂只有永丰余纸厂还在运作，兴建于日据时期的台东糖厂已于1996关闭制糖工厂，场内改为其他休闲文创等经营事业。台东县政府在积极开拓财源的焦虑下，企图以发展观光为转型的方向。这个企图，直接影响部落做出反应，传统的大部落——知本、卑南（南王）、马兰（阿美族）暂且不提，就以近年发展“风味餐厅”闻名的利家部落为例：利家部落是卑南族传统八社之一，1888年“大庄事件”，率众焚毁台东直隶州衙门，围困驻军统领张兆连，平息后被分割为遵化、迪化两个部落。日据时期重新规划设村，设立“蕃童教育所”“驻在所”，并大量驱使部落青年为驻在所“警手”从事仆役，却意外地提升部落居民整体的文明素质，促成利家在1950、60年代，成为台东地区从业军公教人员密度最高的部落。除此之外，一般居民从事水稻农耕也极为普遍，在1970年代拥有水稻田与晒穀厂的族人不在少数，部落甚至还有汉人经营的碾米厂。

近几年，台湾整体水稻耕作早已没落，利家部落公部门职业市场的优势也不再，西边山坡地数家颇富盛名的风味餐厅，却成了部落新的景点，吸引台东地区与外地游客的造访。餐厅的工作人员以及歌舞娱乐表演，提供了工作机会。但利家部落显然也有一些文化上的坚持，除了有效区隔出商业活动与部落生活区域的界线之外，还特别着重传统文化的追寻、记录与复振，积极办理社区报纸，每年与知名的艺文单位合作，办理高质量的“梅园音乐会”，已成为台东地方音乐大事。

另外，与利家部落毗邻而居的大巴六九部落(泰安村)，一个拥有知名歌手张惠妹，以及六部长篇小说的小山村。居民从事山林伐木、采集、狩猎、打零工维持营生，青年大多数必须及早放弃学业外出工厂就业；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生活也较为清苦，近几年因为台湾产业转型，技术性低的职业类别逐渐萎缩，导致族人失业聚增，加上1990年代，主要的耕地已多数落入移居而来的汉人手里，生活反而更加艰困于二十年前。目前，部落有三个大型的咖啡园，几户人家沿着利家林道改种植咖啡树，在历次的咖啡评鉴屡屡得奖，附设的咖啡店也成为台东知名的野店咖啡。族人藉着天赋的歌舞才华外出表演，赚取微薄赏金改善生活，也成为另一种转型的型态。

花东纵谷



图十 花东纵谷

在绿树茶香与老巷道中，优游地骑着自行车，不经意抬头，一颗颗彩艳的热气球升空横越头顶，而稍稍边缘的天际，一顶顶的飞行伞带着乘客的惊呼声凌空而过，一群斑鸠聒噪回避，那是怎样的新奇与惬意？

“花东纵谷”指的是中央山脉与海岸山脉之间，南北纵长的狭窄平地。因为两侧山地高耸，纵谷内终年水气丰沛气候温和。上午起自太平洋吹拂而来的水气，常形成云瀑垂挂在海岸山脉西麓；下午中央山脉逐渐形成积云而掩覆整个中央山脉东麓，较低的云层水气便随着风的流动形成山岚，在山麓折区之间飘漫流逝，或在固定的某个高度铺

展，配合着将沉落高耸山脉稜线的偏斜日照，所产生的辉光四射，提供游人攀登健行时一种“腾云驾雾，佛光四射”的想像与实境感受。

纵谷内居民多元，除了布农族、阿美族，早年移居的平埔族马卡道人、客家人、闽南人，1949年军人复原安置的外省荣民也不在少数。各族群不同的生活习性与文化内涵，形成纵谷内缤纷丰灿的风情，主要的作物包括稻米、凤梨、红甘蔗、香蕉、茶等等。

进入纵谷穿越过“初鹿通谷”后便进入以布农族部落为主，以“红叶少棒队”开启台湾棒球运动新纪元而闻名的鹿野乡。其中“布农部落屋”是位在公路与红叶温泉的交会处，是一处由布农文教基金会与当地居民所共同打造，结合红叶温泉、原住民歌舞、雕塑、咖啡与风味餐的休憩区。“布农部落屋”主要的员工与表演人员全都是邻近三个部落的族人，目的是希望多增加族人在地就业的机会。由于设立的位置在三个部落外围，在兼顾生计与维护部落完整性的面相上，是目前全台湾原住民观光产业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布农部落屋北边的“龙田村”，是日据时期所开发的日本移民村，后期因维持困难日本人离去而几近废社。近几年，接邻的“高台”因为发展茶叶、飞行伞与热气球活动兴盛，连带使其老屋旧巷道起死回生，成为另一股观光特色，也使得这一区域成为台东地区最热门的旅游区之一。想像一下：在绿树茶香与老巷道中，优游地骑着自行车，不经意抬头，一颗颗彩艳的热气球升空横越头顶，而稍稍边缘的天际，一顶顶的飞行伞带着乘客的惊呼声凌空而过，一群斑鸠聒噪回避，那是怎样的新奇与惬意？

鹿野以北的台东县境内，有几个重要而且有特色的市镇，包括以汉人、阿美族为主要居民的关山与池上两处以产米闻名的乡镇。每年十一月，稻米休耕所栽植的油麻菜，花开黄油油地铺满整个纵谷，阳光穿刺云层而下，火车穿行其间，旅人骑自行车漫游的幻境般美景，早已是全台闻名的一绝。

东海岸

那伫立在山海之间的聚落特色与民情风俗，那平和恬静的遗世氛围，那淡淡咸味的海风翻阅清叶的细语吟哦，许是一声声地叮咛旅人，旅人啊，就请任意停留一处，悠闲适意地倾听太平洋亘古不歇的拍岸涛声，诉说那山、那云、那浪花之间交撩的心底事吧。

台湾东部的海岸山脉紧邻太平洋，由台东向北延伸至花莲，山地与海岸间狭长的土地，串起了十数个部落以及陆续移入的汉族移民。正因为高山与海洋的紧迫相连，造就了此地阿美族人体型颀长健壮、忍苦耐劳、精于歌舞的民族性，农业与渔猎技术精湛，生活自足，人口众多。这样的民族特性在承平时期，是官方最爱的歌舞表演样板戏码；战时的1940年代，却成为日本与后来国民政府拉夫征兵的最爱。迄今，当年参战的老人多已凋零；在此之前，每个部落几乎都能听得到那些老人，叨叙着关于南洋战争与国共战争的故事，令人不胜唏嘘。

整个东海岸部落的营生几乎都与山海有关，唯一特殊的是日据时期建于都兰的新东糖厂，那是台东汉人集资的民营红糖制造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与台东制糖场一样曾经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糖厂已于1980年代停止生产，目前仍保留了结构完整的木造房舍、办公室、升旗台和工厂，经台东县政府辅导转型为“都兰红糖文化园区”，吸引出身东海岸的许多原住民艺术家、音乐家的陆续进驻，连带吸引其他县市的作家、陶艺家在都兰设籍落户，形成一个很特殊的“艺术村”。

目前东海岸面临台东县政府急于开辟财源，而不断提出的开发计划案，例如荖桐部落领地的杉原海岸，争议中的“美丽湾渡假饭店”开发案，以及“都兰鼻开发案”等的挑战。部落土地在政府法令的蚕食鲸吞中逐渐流失，也激发这些落户聚集的艺术家、工艺家、音乐家、文学家纷纷投入支援部落的抗争，成为近年一个极具特色的现象。

当然，东海岸的美丽景观，绝不仅于日出、海风、浪涛、沙滩、礁岩、芎麻、短草等海边风情。那伫立在山海之间的聚落特色与民情风俗，那平和恬静的遗世氛围，那淡淡咸味的海风翻阅清叶的细语吟哦，许是一声声地叮咛旅人，旅人啊，就请任意停留一处，悠闲适意

地倾听太平洋亘古不歇的拍岸涛声，诉说那山、那云、那浪花之间交缠的心底事吧。

资讯：

台湾原住民

在大陆移民到达台湾之前，已有南岛语系民族来到这里，台湾是南岛语族分布的最北端。今天生活在台湾的南岛语族人，被称为台湾原住民。台湾有已确认的原住民族14个，还有尚未被确认的多个民族。原住民原来广泛地居住在中台湾中部山区，随着冲击平原的形成，自然形成各自的部落。他们后来又逐渐归隐山林，是由于越多越多的汉人的到达及其政权的建立。被赶到山上的原住民，曾经被混为一谈地统称为“高山族”。这的确是一个既不尊重历史又不尊重原住民的叫法。

台湾各原住民族，经历过不同殖民者的统治、军事征伐。先是荷兰人，后是日本人。日本人带来的是伴随着痛苦的近代化文明。每次不同的近现代文明光顾台湾，原住民的语言就会消失一部分，现在，26种已知的原住民语言消失了10种，还有5种濒危。2012年10月的统计显示，台湾原住民人口52万6148人，这个数字只占台湾2300万人口的2.25%。现代社会的阳光终究要洒在原住民的肩上，在本土文化运动下，原住民为本民族正名的呼声一再响起。1991年后山噶玛兰人回宜兰寻根；1996年台北市介寿路更名为凯达格兰大道，这是社会转型时刻一个特殊案例；1997年起，道卡斯族开始为自己记录历史；而巴宰族在1998年已经出版了自己的历史；居住的阿里山的邹族，则每年举行一次“生命的豆祭”，它源于长老时期的婚配文化，为的是本民族人丁兴旺起来。
(整理/杨东晓)

安平古堡后的历史肌理

文/张钊维

60后，台湾台南市人。著有《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1970年代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工作横跨纪录片编导、制片与文化评论。新近完成传记纪录片系列《反对者——陈独秀1879-1942》。



图十一 张钊维

在安平古堡，恢复王城风貌的努力正在进行中，而一个具备多元风貌的安平，而非被抽离了海洋记忆的汉人中心主义所独霸的安平，也在渐渐苏醒。我期待，有朝一日我的小孩在这里，可以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帆船与访客；甚且，他可以驾着其中一艘船，到海上追梦、追风、追寻先祖未竟的脚踪。

现在，闭上眼睛，在一片漆黑之中，我脑海中还能清楚浮现这样的场景：那是清晨六点五十分左右，我背着书包、拎著水壶、拉开铁门、关上铁门，沿着骑楼高低不平的台阶，自己一个人上学去。

这是一段大约二十分钟的路程。首先沿着我家所在的民权路，右转永福路。长大后，我才知道民权路是府城第一街，汉人最早聚居的地方，当年船运码头就在街尾不远处，码头边有供奉包括水仙尊王以及大禹、项羽、寒鼻、屈原、伍子胥等人在内的水仙宫，祝福渡海船民平安。水仙宫建于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也是台湾被收为清朝版图的隔年；到今天，庙前依然是各种南北货跟美味小吃云集的地方。

而在民权路跟永福路交叉口处，路面上一个不起眼的圆形铁盖，盖住了四百年前先民打的井眼，叫做大井头。大井头旁边的转角处就是全美戏院，今天全美门口站着李安导演的人形立牌，因为这个二轮戏院是他电影启蒙的摇篮。

转进永福路，有绣庄、锡铺、清甜的冬瓜茶，然后沿着祀典武庙的红色山墙继续往前走。祀典武庙是台湾第一座官方武庙，建于明郑时期，是东宁王朝的官庙之一；里头，有我曾祖父在日据大正年间捐款六元钱协助修葺而留下姓名的碑牌。武庙旁边的小巷弄，直通明宁靖王朱术桂的王宫；1683年，笃信妈祖的施琅带领清兵打下台湾，王宫改为供奉妈祖的庙宇。为抚恤东南沿海百姓，康熙在灭掉郑氏王朝之后下旨封妈祖为天后，比前朝的天妃还高一级；这座庙宇就叫做大天后宫。

走过武庙的山墙，眼前两栋毗邻着的中式阁楼，就是赤崁楼。最早建于1653年荷兰人占领大员(台南古地名，也是后来“台湾”这个词的来由)的时代，当时叫做普罗民遮城。郑成功在1661年打败荷兰人之后，将它改建，作为全岛最高行政机关。



图十二台南赤崁楼

我所就读的学校，就挨着赤崁楼。它在1912年，日本占领台湾的第16年创校。早期叫做明治公学校，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数度改名，在我两岁、台湾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时，以纪念郑成功为名，定名为“成功国民小学”。

清晨七点一刻左右，我跟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鱼贯走进“成功国小”，在学校旁边巷弄里的玄天上帝庙偶尔会传来打鼓撞钟与道士作法的呜呜牛角号声。

这座玄天上帝庙，开基灵佑宫，又称小上帝庙，有别于位于民权路另一头的大上帝庙——北极殿；此庙建于1671年，也是东宁王朝的官庙。明成祖自认为是玄天上帝的化身，而反清复明的郑成功也笃信

玄天上帝。在北极殿，至今还供奉着当年郑成功中军帐里头的那尊玄天上帝神像以及朱术桂的题匾“威灵赫奕”，这是台湾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块匾额。

至于小上帝庙的兴建略晚于北极殿。其起因是因为，当清朝准备攻打台湾之际，北极殿里经常挤满急着求神问卜的东宁王朝文武官员，一般老百姓不得其门而入，遂干脆自己集资另盖一座专门给民间祭拜的上帝庙。

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展开一天的学习。日复一日地练习在每一篇作文的结尾处都要加上“反攻必胜、建国必成”以及“蒋总统万岁”如此这般的字句。

那是1970年代，当时，蒋介石还在位，但是身体已经不好，不久之后就要病逝。在戒严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底下，我并不完全明白我这条短短的上学路所展示的复杂而丰富的历史肌理。覆盖我成长过程的，是一长段混合着儒家规训、现代化与汉人中心主义的“党国训政”体制；在这体制底下，我的家乡被视为开台首府，郑成功是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曾经在此建立一个短命王朝的闽南海商，其文化被看成是地方风土民情。至于荷兰人，乃至后来被正名为原住民的山胞，多半只出现在课本或者媒体宣传片上，在生活中我几乎意识不到。再说到日据时期，还可以从我父母亲经常以日语沟通、唱日本歌给我听、喜欢寿司味噌汤与主妇之友杂志等等，感受到一些深刻影响，但那恰恰是政府要去压制的殖民遗绪。

一直要到将近二十年之后，我才能够从断断续续的自我摸索与工作经验当中，找出这个台湾最早的汉人海洋城市跟我自己的关系。

这种摸索，就好比沿着赤崁楼与安平古堡之间那条传说中的秘密地下通道，在幽暗中擎着火把慢慢前进，一直走向某个历史的节点、那片曾经是禁忌的大海.....

童年印记

1949年之后，因为担心对岸军队渡海来犯、也担心各种偷渡与走私，政府实施海禁政策，用碉堡、铁丝网、木麻黄、机关枪与岸炮，把台湾岛团团围起来。于是有将近半世纪的时间，在台南这个靠海的城市，海洋成了失去自我记忆的一大片空白领域。

记得我小学时候郊游到海边，仅有一处位在木麻黄树林里的秋茂园可以游玩，其它都是军事禁区。

当海洋的记忆被切除，那个因海洋文明而生的安平古堡与东宁王朝，以及台南的建城，也就被抽空了他们存在的最根本意义。

记忆中最早的一次游玩安平古堡，是跟着哥哥姐姐去的。那是三十多年前，从市区出发，还得转搭竹筏过江，才能抵达古堡脚下；所谓“江”，其实是台江内海，不是真正的江，而古堡就建在内海与外海交界的沙洲上。沿着台江内海有多个这样的沙洲，从外海看过来，形状犹如一只只大鱼的弧形脊背，因此，这些沙洲就被汉人称做“鲲鯓”。在当地西来雅族原住民口中，则称之为“大员”。

我那时所见的安平古堡，跟今天没有什么两样。在红砖铺就的三层平台上，有一栋小洋楼，旁边是一座瞭望塔；几座锈蚀了的铁炮，静静躺在红砖平台、榕树影下。我那时以为，这就是荷兰式堡垒的风格，后来才知道我错了。

四百年前，已经进入大航海与殖民时代的西方各国，急着想要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寻找稳固的贸易据点，以美洲白银来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与茶叶，再销往欧洲。拔得头筹的是葡萄牙人，1577年他们首先从明朝政府手中租借了澳门，接着，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荷兰东印度公司企图打破明朝严苛的对外通商律令，他们试着与沿海商贾、海盗接触，于是在浙江、福建、广东一带，跟中国官方发生多起武装冲突。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司令韦麻郎夺取澳门不果，在华商的建议下，转往扼住台湾海峡咽喉的澎湖，准备长期耕耘。1604年，

明朝将领沈有容率领兵船五十艘、军士两千名前往劝退荷兰人。至今，澎湖马公岛仍留有“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碑。

1622年，荷兰人再次占领澎湖，筑城堡建立基地。1624年，明军前来围剿，激战八个月之后，荷兰人败退。这一战，曾经担任过荷兰人通译的郑芝龙为明军立下战功，从此接受招安，继而成为雄霸东西两洋航路的海上霸主，所有通过这片海域的中外船只都得向郑氏家族缴纳税费。而东印度公司别无选择，只得往东渡过黑水沟，退到明朝势力范围之外的大员。

就在这一年，第一座荷兰城寨在台江内海的一鲲鯓沙洲上建立起来，以荷兰执政家族命名，是为奥兰治城(Orange)。三年之后，改以荷兰行省热兰遮(Zeelandia)重新命名为热兰遮城，这就是后来的安平古堡。

筑城当时，由于材料和工匠缺乏，东北角的城垛用的是澎湖旧城拆下来的石块建筑。其余的建材则主要是以糖水、糯米汁和牡蛎灰等捣成的灰泥黏合红砖筑墙，这些都是当地可以取得的建材。

热兰遮城属于欧洲典型的稜堡式海岸防卫堡垒，由中间的方形城堡以及四角突出的稜形炮台两相结合而成。内城共三层，最下层是仓库、长官公署、瞭望台、教堂、士兵营房等设施。四角的防御性稜堡，上头附建瞭望亭。两角中间有北、东、南三门。长官公署位在内城北侧与北城交接处，是当时政治、经济与军事的中心，他要经常性地向位在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总部报告此地的生产、贸易，以及对原住民部落的征服、结盟、徭役与传教等管理状况。

在这个阶段，荷兰人从南洋引进甘蔗与水牛、从东南沿海引进汉人民工来此开荒，生产大米与砂糖销往东亚各商埠。来台的汉人多半聚居在台江内海东侧的本岛这一边，此地的西来雅族地名叫做赤崁，与位在大员的热兰遮城隔着台江一东一西，两相对望。

荷兰行政长官对汉人的苛政与压榨，引发了1652年的汉人暴动，以起事者为名，是为郭怀一事件。暴动平息后，荷兰当局决定在赤崁

建城以有效管理汉人移民，于是盖起普罗民遮城(Provintia)，也就是后来的赤崁楼，以及开辟普罗民遮街，也就是后来的我的老家民权路。

普罗民遮城

今天站在赤崁楼上，已经看不到四百年前的这些景象了，连台江内海都看不到。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台江内海已经因为陆地上升以及泥沙淤积而萎缩成安平港的普通航道，而原本各自分离的七个鲲鯓，也都已经连接起来。如今真的很难想像当年郑成功的数百艘兵舰，是如何驶进台江内海，发动奇袭的？

1994年，我入伍抽签，中了所谓的“金马奖”，前往金门当兵。当时两岸之间的经常性炮击已经终止多年；我被指派的任务是，在金门最高的太武山顶上瞭望金厦海峡之间，是否有对岸船只越界。如果有，就必须马上回报司令部，准备进行驱离射击。

在碉堡里头挂着的地图上，金门东北方向的对岸有个小镇名叫石井。退伍之后，我才知道石井原来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老家，而我每天在太武山顶上守望着的那片窄窄的海域，恰恰是四百年前郑成功操练水军雄师的地方。而更让我惊讶的是，在后来我们家开始扫母亲这一系祖先的坟墓时，我发现母亲先祖们的骨灰坛上都刻着“石井”二字，无一例外；而我母亲就姓郑。但似乎，母亲与舅舅们对于这个连带关系，并没有多少认识。

2009年夏天，承平多年的台海终于举办了第一次跨海峡的帆船比赛，起点厦门五缘湾、终点台南安平港；这条路线，恰恰就是1661年郑成功率领大军跨海击退荷兰人，拿下台湾统治权的路线。我趁着采访这次比赛的机会，把郑氏政权在台南的重要足迹都再走了一遍，这是我离家多年之后，第一次这么完整地重新回访这些似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也重新认知了，安平古堡的意义。

当年郑成功船队在荷兰通事何斌的带领下，巧妙地通过鹿耳门驶进台江内海，在赤崁北边登陆。他首先拿下普罗民遮城，然后控制了台江内海，对热兰遮城形成大包围网。经过半年多的拉锯战，终于在1662年迫使荷兰总督揆一(Frederick Coyett)献城投降。

2006年，揆一的十四世孙重访这个令他先祖伤心的地方，还到位于忠义路上的郑氏家庙祭拜郑成功。而热兰遮城北边，隔着一条溪的四草大众庙，庙后方的丘塚内葬着许多无名尸骨，就是当年郑荷大战中阵亡的荷兰官兵。经此一战，郑成功以“国姓爷”(Koxinga)之名在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声名大噪，而这也是中原政权真正在政治上统治台湾的开始。郑成功以热兰遮城作为他的居城，并以泉州晋江故乡安平为名，重新命名为“安平镇城”，是后来安平古堡一词的由来。而当地居民则直接称呼它为“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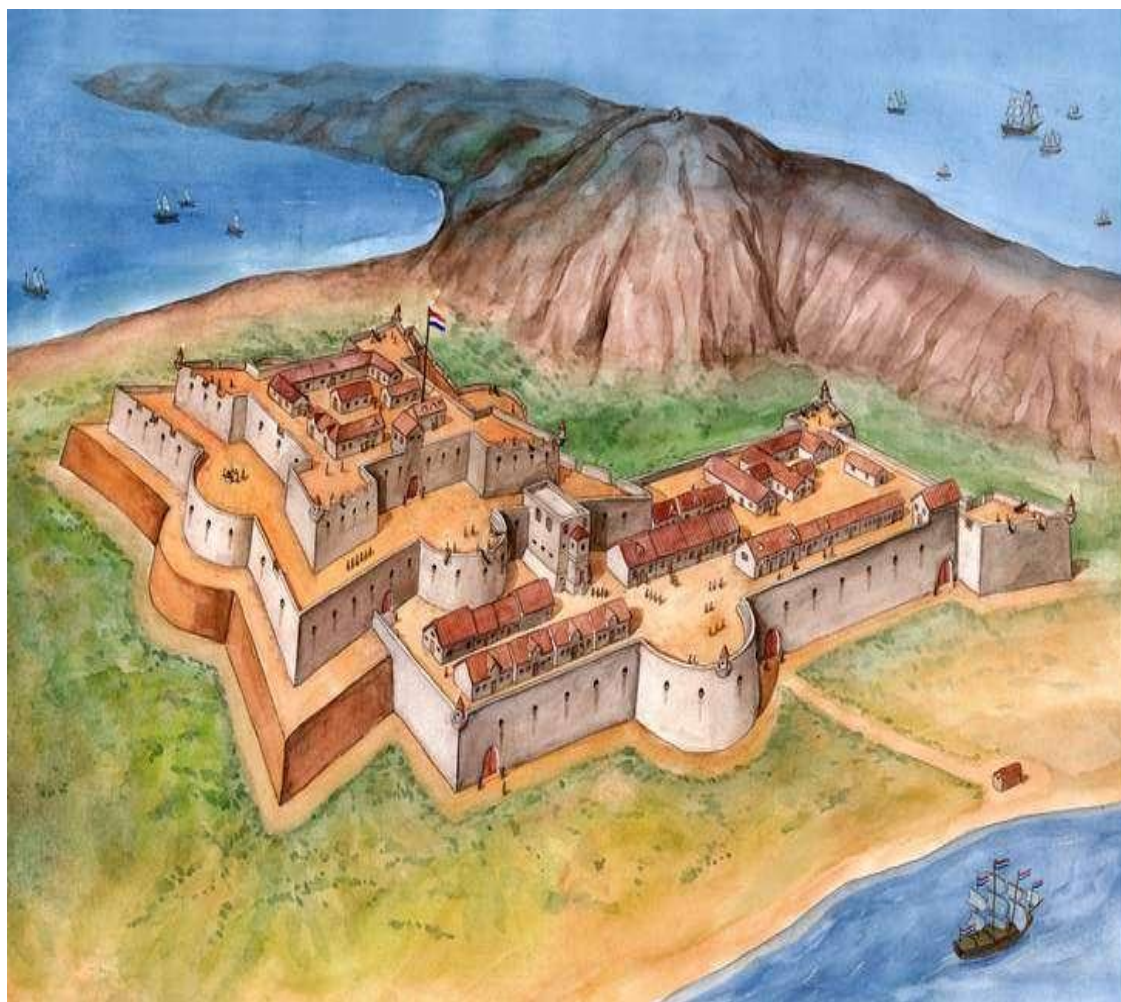
荷兰人与郑氏王朝都将城堡设置在海岸边上，显然跟后来满清统治台湾之后，将行政中心移往赤崁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这是面对海洋的两种态度，也决定了安平古堡后来没落衰败的命运。

满清为了对付郑氏王朝、甚至在占领台湾之后为了永绝海上祸患，多次实施严厉的迁界禁海，除了不许片板下海之外，更严令沿海居民必须往内陆迁移三十里，以福建为甚。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将唐宋以来而至郑氏王朝集其大成的汉人海洋贸易、开拓经验与开放精神完全扼杀，继而错过与欧洲海洋文明进行平等交流与互惠竞争的机会。此一错失，影响长达4个世纪，一直要到20世纪末最后20年大陆的改革开放，才又重新对海洋展开双手。

台湾重新纳入中原天朝版图之后，安平再次进入国际海洋贸易的视野，已经是19世纪了；当时在这片东亚海域竞雄的，不再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与郑氏的庞大舰队，而是后起的英法等国；他们先后以炮舰敲开闭关自守的中原天朝。在英法联军之后的不平等条约中，首次将安平列为通商口岸；于是，德商、英商、美商洋行纷纷在此设立。到今天，我们还看得到德商东兴洋行还屹立在安平古堡的西侧。而此时，安平古堡，这座曾经的王城，仅仅做为清军的军械库，但已年久失修。1867年出版，梅亚斯(Mayers)撰写的《中国及日本的

条约港》一书当中描述的安平王城，已毁去内城四个稜堡及南墙，外城东墙也不见了。

海洋之子



图十三 安平古堡复原图。（绘画/孟凡萌）

雪上加霜的是，1869年，在一次英国与台湾的贸易冲突中，从香港赶来助阵的英舰发炮轰击安平，击中古堡军械库引发大爆炸，使得古堡主体建筑毁坏殆尽。1874年，沈葆楨为了防卫境外势力来犯，在

安平古堡南方的二鯤鯓沙洲上建起一座新的炮台，将古堡外墙的墙砖搬过去使用；沈葆楨为这个新炮台亲题“万流砥柱”与“亿载金城”。

仅仅20年之后，日本人就占领台湾。1897年，日本人将奄奄一息的安平古堡改建成红砖平台，并盖上了海关宿舍，1930年，又改建成文物陈列馆；这就是40年之后，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所见到的样子，也跟今天的样貌相去不远。

安平古堡的衰败，固然有部分是因为台江内海被大量泥沙淤塞，失去了航运功能而退化成为一个小渔港，但是，也跟四个世纪以来，东南沿海汉人在内陆天朝的政策压制之下，对于自身过往海洋记忆的遗弃有关。

这样的遗弃，延续到中原逐鹿的国共战争，以及冷战时期的两岸对峙，以至于我的成长过程中，完全不知晓安平古堡的本来面貌，只留下一个从赤崁楼通往外海的地道传说印象；也不知我的郑氏先祖们在那被铁丝网、碉堡与机关枪隔绝于生活世界之外的汪洋大海上，曾经立下多少丰功伟绩，而只留下一个一心想反攻大陆、收复中原的英雄孤忠形象；更不会知道，我所留恋的台南小吃与民俗当中，有多少海洋文明的痕迹——比方说，以焗烤海鲜跟吐司面包结合而成的棺材板，与葡萄牙食品的关系、状元糕与阿拉伯甜食的关系、斋教菜堂与摩尼教“食菜事魔”的关系，以及“安平追想曲”这首脍炙人口的台湾闽南语民谣当中，一个安平女子跟远颺了的荷兰人的关系：

身穿花红长洋装
风吹金发思情郎
想郎船何往
音讯全无通
伊是行船人遇风浪
放阮情难忘
心情无处讲

相思寄着海边风

海风无情笑阮憨

啊~

不知初恋心茫茫

这首自怜自艾的思恋之歌，似也象征着所谓的“台湾人的悲情”。然而，这悲情，难道不正是来自对于开放、冒险、交流之海洋记忆的压制，继而遗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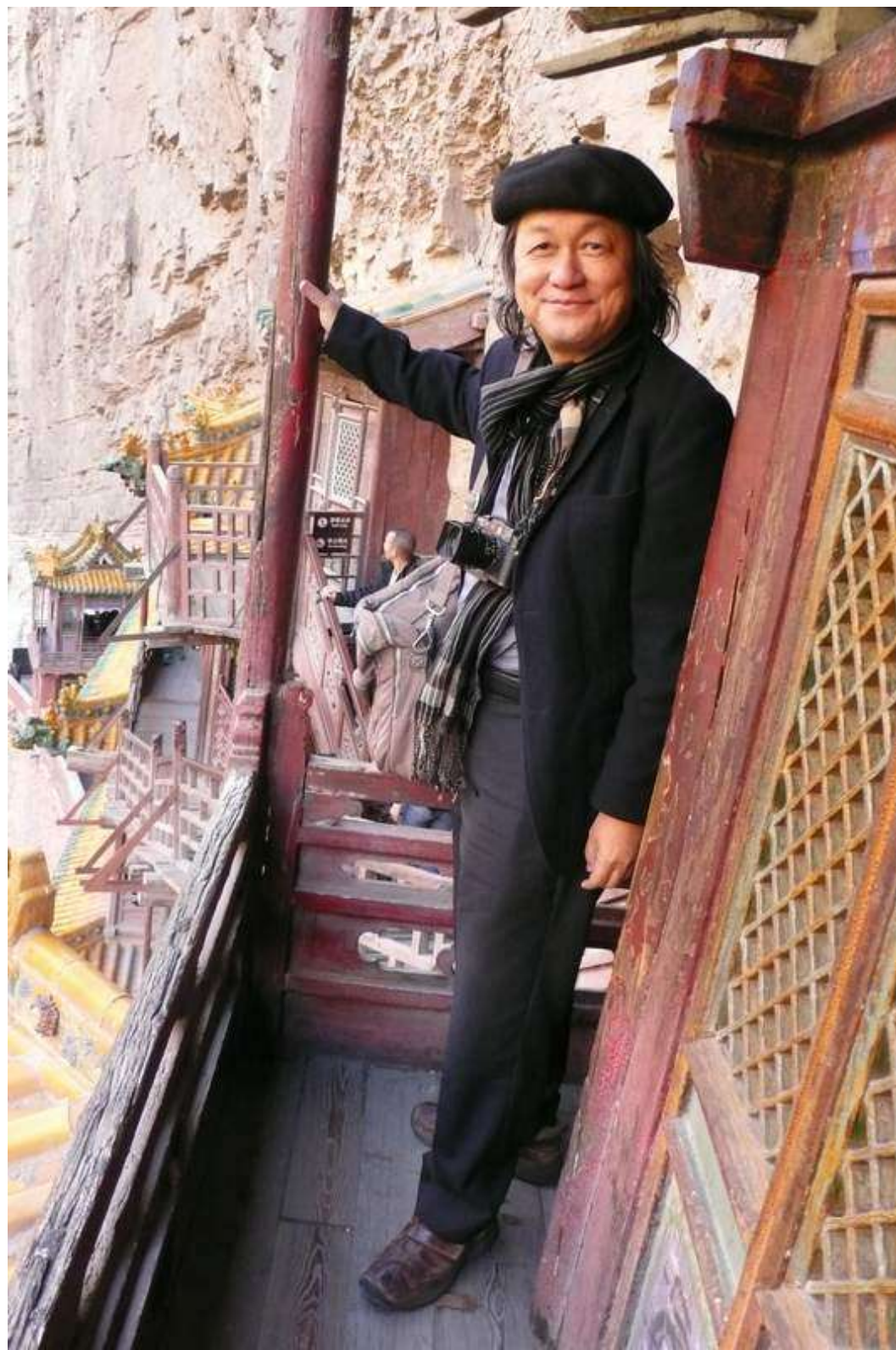
思及此，我不禁要问自己，将来，我要给我的后代什么样的故乡记忆？在我童年上学路上方圆一公里、上下四百年的大井头、武庙、赤崁楼、大天后宫、上帝庙之外，他能否看到更丰富的景象、眺望到更远的地方？所幸，沿海汉人四世纪以来所经受的、中原天朝对海洋记忆的压制与遗弃，终将被全球化的浪潮所冲刷、淘洗。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沿着鲲鯓的海岸线散步、捡拾沙滩上的宝螺与骨螺。在安平古堡，恢复王城风貌的努力正在进行中，而一个具备多元风貌的安平，而非被抽离了海洋记忆的汉人中心主义所独霸的安平，也在渐渐苏醒。我期待，有朝一日我的小孩在这里，可以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帆船与访客；甚且，他可以驾着其中一艘船，到海上追梦、追风、追寻先祖未竟的脚踪。

我希望他记住，他是海洋文明之子。

台北之心

文/李乾朗

1949年出生于淡水，“中国文化大学”建筑及都市设计系毕业。平生致力于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将成果集结，出版了六十余本与建筑相关之个人著作。同时也主持多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计划，出席古迹评鉴会议或文化资产议题会议，尽其所能地为古建筑的保存与未来发声。



图十四 李乾朗

“总统府”



图十五 “总统府”与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

我们今天走在台北城内街头，所见到的许多公共建筑即是日据时期50年之内所建的，位于台北府城正中央的地方，清末原有两座家祠，一为陈氏家庙，另一为林氏家庙，日本人认为这是城内核心位置，强迫两座家庙迁移，在其址上建造“总督府”，这是殖民统治台湾的最高行政机关，它的建筑非常高大而雄伟，明显地表现出统治的权威性，建筑师为来自日本的森山松之助，他当时在台北设计了许多公共

建筑，如台北州厅(今台北“监察院”)、台湾省烟酒公卖局(今台北“专卖局”)、台北总督官邸(今台北宾馆)等。

台湾“总督府”即今天所见的“总统府”，是20世纪初年东亚数一数二的巨大建筑。当时为了建造台湾总督府厅舍，日本政府还特别举办了设计竞图，于1907年公告征选，共有28位建筑家参加，并于1908年评选出七位入围。当时所聘的评审委员包括有野村一郎、辰野金吾以及著名的建筑史家伊东忠太。1909年公布决选，由长野宇平治的作品脱颖而出。长野宇平治于明治26年(1893年)毕业于东京帝大，他当时所设计的台湾“总督府”，中央塔并不高，只有六层楼，且外墙的装饰也很简单。但可能是总督府的主事者对他的设计不太满意，因此又聘请森山松之助将其大幅度修改，成为具有森山松之助风格的“总督府”，也就是现今所见具有一座高60公尺尖塔的“总统府”。

在日本统治的50年中，日本帝国主义向外侵略扩张之大型象征威权的建筑有两座，一是台湾“总督府”，另一座则是朝鲜总督府。后者的建筑采用白色圆顶的文艺复兴式，韩国人受日本压制，也曾发生无数起反抗运动。韩国总督府直到1990年代尚存，但韩人认为总督府建在朝鲜李朝皇宫门口，挡住中轴线之气势，近年以风水的理由将它拆除了。

台湾“总督府”的建造年代较早，从1912年动工，至1919年才大功告成，前后耗时8年，其建筑形式采用英国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总统府”的外观除了中央高塔之外，四角还有许多三角形山头，正面入口两侧又有一对卫塔，上覆小圆顶(现已改为平顶)。尖塔形式与同时期兴建的专卖局相似，不过更为精致华丽。外墙有许多水准横带，红白相间构成了这座建筑物的色彩基调。值得注意的是，森山松之助在此并未采用曼塞尔式屋顶(Mansard roof)，可能是他也须尊重长野宇平治的原始设计图之缘故。

“总统府”的面积广大，其平面呈“日”字形，主要入口设在东面与西面中央，其中东入口是最大且最正式的入口，供所有重要人士出入。西面中央的入口有如后门，它的门厅为椭圆形，立柱为“爱奥尼克式(Ionic)”。另外在四个角落也设四个小门，供一般洽公者或办公人员使

用，平时也有警卫执行安全检查，另外也有供车子出入的车道入口两处，可将车辆开进中庭。

如有机会走进“总统府”，将可发现它有两个中庭，现今庭中种有花草植栽，并且有座椅供人休息，最特别的是建筑物中庭的四角落凸出一座小房屋，据说原始设计时是为了加强结构作用，以增加抗震的能力，平时这四个小房间则作为吸烟室，可见早在1920年代它已是一座禁烟的建筑物了。

中央高塔内有木楼梯可以登临塔顶，平时升旗的卫兵即利用这座高达20层数的楼梯主塔顶升降旗，塔顶的希腊石柱共有32根，外观非常华丽而复杂。在日据时期，这是全台最高的建筑，没有任何一座建筑物高过它，也实现日本殖民统治之威权性质。至于墙体外观，则使用许多横带，这是所谓“辰野式”或“Norman Shaw”风格之特色了。

而且今天站在“总统府”面前，还可以发现到它并非一般公共建筑常用的“坐北朝南”方位，而是“坐西朝东”。仔细分析台湾清代的官署与寺庙，多为坐北朝南，具有南面为王之象征。而日本素被称为日出之国，其国旗也是一个红太阳，因此在台湾有许多日人所建的公共建筑多喜用坐西朝东之方位，“总统府”应是最典型之例。

“总统府”建筑在1919年落成之前，历任的日本总督都利用清代的布政使司衙门作为办公室，至第八任总督田健治郎才搬入新落成的厅舍，一般人远看“总统府”，莫不感到它确实壮丽，但走进大厅，却又觉得它没有很繁琐复杂的装饰，所用的材料也很普通，不过它的构造的确颇为坚固，至第19任总督安藤利吉时，因二战结束，日本战败而离开台湾前，共有12位总督使用过这座建筑。

在日本统治期间，每年总会有日本皇室贵族来台视察，他们也都到总督府访问，其中包括侵台将军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夫人，在1923年，时为皇太子的裕仁来台视察，全台大小日本官员非常慎重地接待他，现在还留有裕仁到总督府参观的一些照片，特别是乘坐马车的照片。“总统府”虽有风光的一面，也曾面临悲戚的场面，1930年台湾总督府当局正准备举办“台湾文化三百年纪念会”时，发生了雾社事件，台

湾原住民长期饱受日人压迫侮辱而起来反抗，台湾中部南投赛德克族的头目莫那鲁道率众起义，引起国际震惊，而当时的日本总督石塚英藏因此辞职下台。

二战末期，美国战机曾数度轰炸台湾，其中在1944年战况最激烈时，有一颗炸弹击中总统府中央高塔南侧的卫塔，整个外墙都倒塌了，且入口门廊及地下室亦遭受到很大的损失，战争期间无法修复，直到战后才予以修复。

1950年“总督府”曾充为“行政长官公署”，至1949年国民党败退至台湾，蒋介石将它改为“总统府”。从1949年以来，这里一直是台湾最高统治者的办公室。为了改善内部的设备，也加装了电梯及空调，但外观的改变不大，只有东面主入口的门廊因曾被炸毁，于战后再予改建，改为有屋顶露台的形式，过去每逢“双十节”时，蒋介石、蒋经国即出现在露台上接受民众的欢呼，且在“总统府”前常有阅兵活动，而“总统府”前的大马路也被称为“介寿路”，直到1996年时才被改称为“凯达格兰大道”，为了纪念台北盆地的原住民平埔族之凯达格兰族。

回顾这座建筑落成90多年来，从总督府变成“总统府”，换了名称，但建筑物仍然没有太多改变，毫无疑问地这是一座伴随着台湾20世纪历史的重要地标。

台北府城东门

正对着“总统府”的景福门，其原为台北府城的东门，乃是清末从城内通往东郊最重要的城门，为了加强防御，城门外另设有外郭，俗称为“瓮城”。可惜在20世纪初年被日本人拆除了，现在所见的东门只有石拱门洞为清代原物，上半段的北京宫殿式歇山顶城楼为1968年所改建，其屋顶铺以绿色琉璃瓦，在山墙上特别浮雕一个国民党徽，这种做法后来被提出质疑，为何将党徽设计在古迹墙上？成为台湾古迹保存史上一个引起议论的话题。

台湾博物馆

台湾博物馆落成于1915年，由野村一郎设计，荒木荣一督工。原为纪念卸任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而向全岛募款建造。当时正值后期文艺复兴式建筑流行的高峰，因此台湾博物馆是属于古典系统中一座最成熟的作品。

平面只有一列，正面向北，入口居中，中央大厅置大楼梯，两翼则作为展览室，两端各置楼梯一处，这种平面可继续向后增建第二列，并以厢房衔接，形成合院式。一楼平面整个抬高，入口处置大阶梯，益使希腊式正面显得高耸而尊贵。柱头使用多立克式(Doric Order)，中央主体六柱，两翼各七柱，角部各四柱，形式3-6-5-6-3的开口节奏，正面比例非常匀称而优美。中央大厅调整成正方形，每边分配四柱，同时又增列一圈外柱支撑二楼回廊，内圈柱被独立出来，自地面直上屋顶横梁，加强了大厅垂直空间之效果。走廊设在南向，因此北面两翼使用附壁柱，南面的柱列反而更明朗，可能决定于风向及日照。战后为增加展览面积，却将南面廊封住，殊为可惜。更遗憾的是1990年代被人拆去木桁架，改为钢构屋顶，以增加展示面积，实在得不偿失。

中央主体的屋顶采用半球形大圆顶，成为馆前路的端景，也是博物馆在人们心目中最强烈的意象。圆顶内装设彩色玻璃，以铅条嵌入不同色泽的玻璃，益显得华丽高贵。

台湾总督府交通局递信部

原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交通局递信部现改为“交通部”，它建于1925年前后，比总督府晚几年落成。当时为台湾通信机关之总部，内设庶务、监督、工务、海事、电气、贮金等单元，掌控全台通信业务，地位甚为重要。

建筑由总督府营缮课设计，采取西洋古典形式，一楼为仿石之墙面，中央辟有大圆拱门入口，二楼外观出现12根高大的希腊复合式(Composite)柱子，造型异常华丽。这座建筑原只有3层楼，战后曾由“邮政总局”“电信总局”等机构使用，现为“交通部”使用之。因近年空间不敷使用，于顶上再增建一楼而成现貌。

台大医学院旧馆



图十六 台大医院旧馆

台大医学院开创得很早，可以追溯到1899年，初期利用台北医院的教室上课，聘请东京帝大出身的医生为教授。学校从讲习所发展为总督府医学，至1919年改称为医事专门学校，至1934年才改称台北帝大医学部，战后称为台湾大学医学院。它的历史实即一部台湾近代医学发展史，所培养的医生为台湾人的健康发挥了无比的贡献，易言之，台大医学院是台湾医学的摇篮。

医学院的建筑始建于1904年，初为木造校舍，至1907年增加几座砖造建筑，其中包括现存临中山南路的一座。至1914年已完成讲堂及生化学药理学校教室等规模，如今仅存的也是被指定的古迹即是这一座紧临仁爱路与中山南路交点的早期建物，它的年代从1907年至1913年，为台大医学院的忠实历史见证物。

其建筑采用19世纪法国盛行的曼萨尔式屋顶，一楼外墙有拱廊，二楼则为希腊柱式回廊，建材朴实而外观典雅，楼板使用了工字钢梁，为台湾所罕见，在建材及结构技术上弥足珍贵。讲堂的跨距甚大，设二楼坐席，惜近年医学院自行拆除了，诚属遗憾之事。

台大医院旧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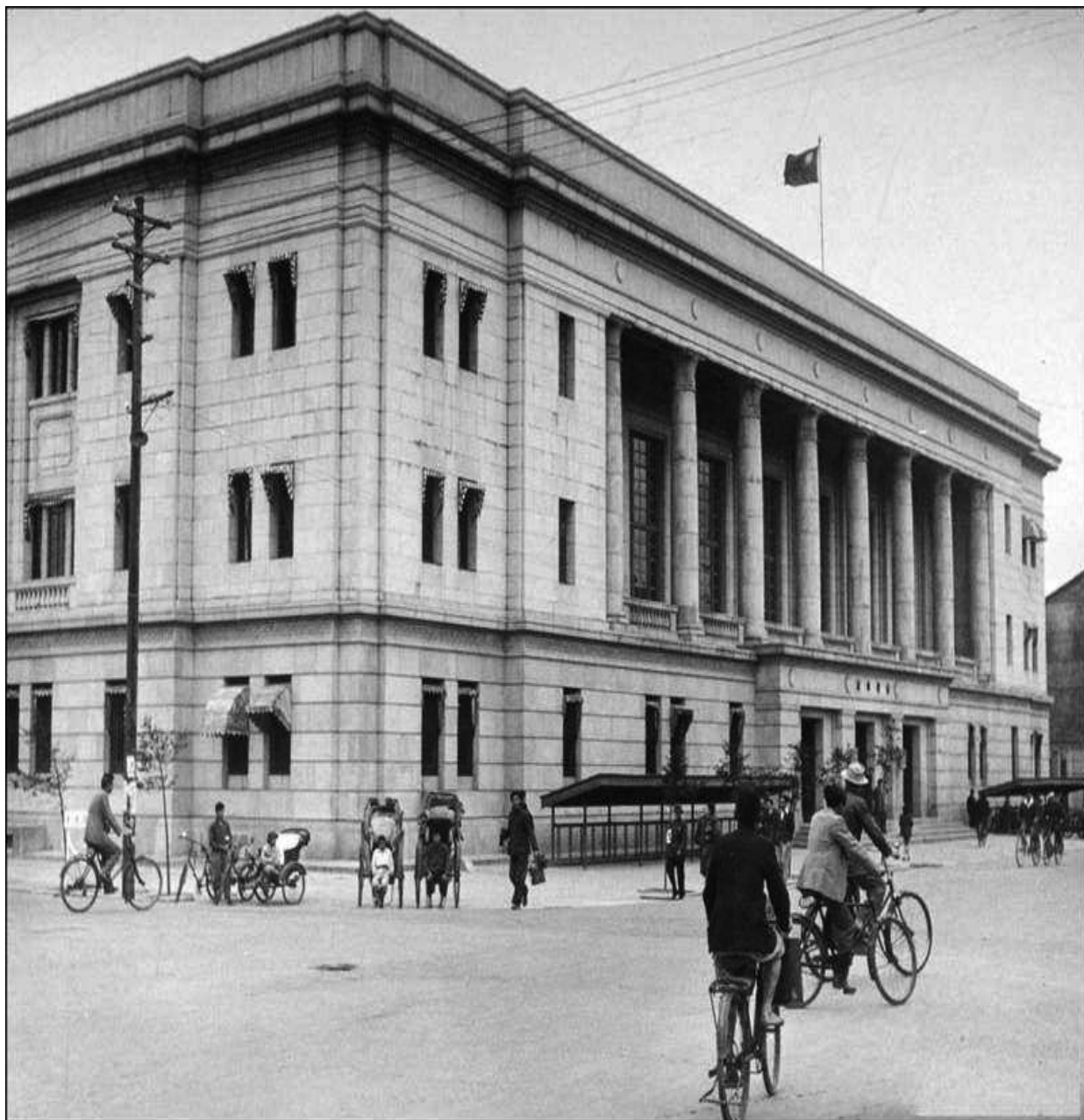
台大医院原称台北病院，最初为木造建筑，1912年在现址开始建造以红砖与钢筋混凝土为主的医院，至1916年大体完工，但有些病房随着医院事务发展陆续于1920年代才落成。台大医院是台湾近代医学史的核心，它的发展也象征着医学的进步。如今虽然在附近另建新馆，但旧馆仍然使用，继续担负其为民众健康谋福的神圣任务。台大医旧馆规模宏大，平面大体采中轴对称，经过中央穿廊可以串连各科门诊及病房，当时为东亚最大的医院之一，设计者为东京帝大出身的近藤十郎。入口大外观华丽，使用希腊柱头，每二根为一组。屋顶用三角形山头及弧形山墙。而大厅内空间高敞，气派非凡，确为台湾近代洋式建筑中之杰作。

劝业银行旧厦

台湾较早的银行为台湾银行，直到1930年代配合当时殖民政策，陆续有其他银行出现。日本劝业银行分别在台北与台南建造行舍，且其建筑风格颇为相近，皆采用厚重的西洋样式，但有趣的是不采希腊与罗马样式，反而从古埃及或中美洲古马雅方面寻求形式的泉源。

台北劝业银行建于1933年，由银行的建筑课设计，战后改为台湾土地银行。它位于襄阳路与文艺复兴式的博物馆遥遥相对。劝业银行位居转角，设有骑楼，巨大的柱子给人以宏伟稳重之感，在结构方面，采用骨构造，其外侧贴入造石片模仿石材质感，极为细腻。值得注意的是柱头上有兽头装饰，显得颇为神秘。

台北台湾银行总行



图十七 1949年2月，台北台湾银行总行。（摄影/杰克·伯恩斯）

台湾银行始创于1897年，当时为日据初期，日本政府为控制台湾金融与经济而设立，亦是后来执行南进政策的金融与投资机构。1903年建银行总部于今址的西侧，原为红砖与斜顶之仿后期文艺复兴式建筑，后来因遭白蚁侵蚀，乃于1938年择今址重建，由日本建筑家西村好时设计，大仓土本施工。

台湾银行在二战时遭受轰炸，屋顶于战后重修，但外观墙体及列柱均为花岗石原物。它采用西洋古典建筑元素，如台座、列柱、石雕花瓶栏杆、柱头与女儿墙连续的饰带，充分表现出稳重而理性的美感。中央主体的屋顶采用半球形大圆顶，成为馆前路的端景，也是博物馆在人们心目中最强烈的意象。圆顶内装设彩色玻璃，以铅条嵌入不同色泽的玻璃，益显得华丽高贵。

恋恋西门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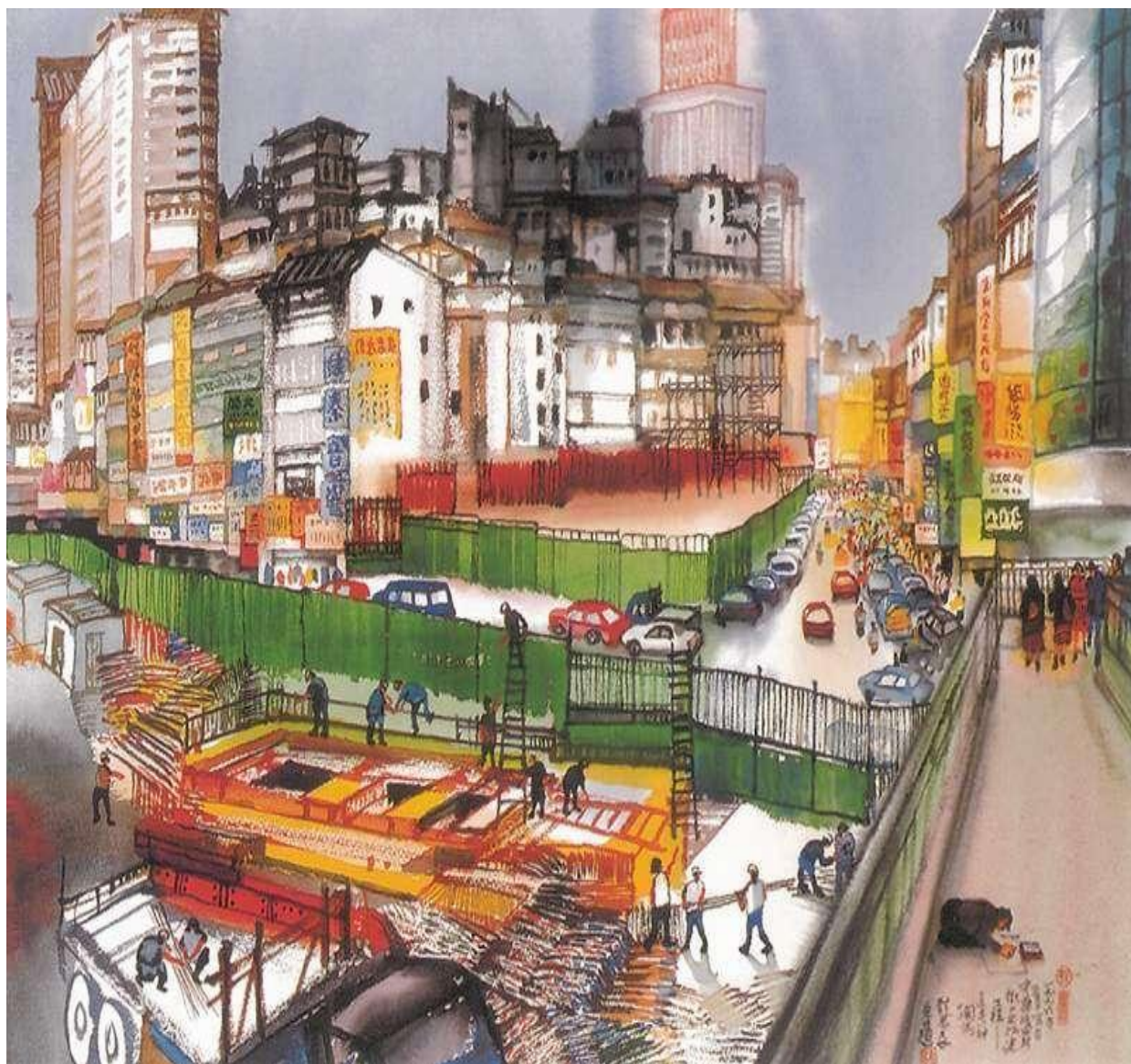
文/谭端



图十八 谭端

西门町像位舞小姐，出身低微，打扮俗丽妖冶。寻欢客离开西门町时一定脱胎换骨地长大了，想起西门町，他们的印象却不是低级的香水味，是自己淡淡哀伤的青春。

1897这一年，年过半百的场喜兵卫带着一家老少乘船到了台湾，在淡水河口下了船。场喜兵卫是皇军眷属，不仅积极响应帝国到海外开垦的号召，也同时是最先分享帝国胜利果实的人。在日本帝国开始推行对外征战时，人们可以选择的路也不多，要么做一个轻生死的皇军战士，要么投入另一个支持帝国的领域。



图十九 水彩《台北西門町的蜕变》，绘/龙思良

刚登陆台北大稻埕码头，双脚实实踏上台北的土地，场喜兵卫一家人便被眼前的景色震慑住了：荒冢累累的坟地，人般高的芒草，在风中婆娑摆动得像大海的波浪一样。走了几步，场喜兵卫便发现处处是泽地，望前看去，一个光着身子的牧童骑在水牛身上，旁边有几只鹭鸶，细细的双脚插在水里一动不动。水池边不远有芭蕉树，叶片又绿又大，低垂着巨大的叶身。清风徐徐吹拂，场喜兵卫闻到空气中竹

林的清新味道，他听到远处密林还有唧唧蝉声。这一切望上去就好像印尼、菲律宾的蛮荒地区一样。

场喜兵卫在日本的身份是“大工”，曾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建筑工人。他响应帝国的号召来到台湾这片新征服的疆域寻找机会。他毕竟是平民百姓，台北城内最好的位置短短两年内已被有权有势的日本人占领。场喜兵卫的年龄较大，做工比不上那些年轻力壮的人，只能将希望寄于下一代。女婿平松德松是很有能力，又肯吃苦耐劳的典型日本青年。平松德松决定站出来，带着家眷在台北最繁华的艋舺(今西门町附近)开设一间餐厅谋生，以家乡为名给这家餐厅取名“纪州庵”。

纪州在日本关西地区，平松德松是关西人，但纪州没有自己的料理代表，而且来台的关东人较多，于是纪州庵卖的是关东料理。平松德松为了缅怀自己的家乡才给自己的店名取名纪州庵。

纪州庵开店的位置，在日本总督府拆除台北府城的西门之外。那座西门原是重脊歇山重檐式的，外层是泥石，里头仍是木结构，完全体现当时中国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哲学。但碍了日本现代交通发展观，说拆就拆了，日本人要展现的是东方新的文艺复兴。纪州庵本店的周边，也就是台北府城西门外的那区块，原本只是一片荒地。荒地上到处是坟墓，白天偶有小童到此牧牛。到了晚上伸手不见五指，乌鸦枝头哑哑叫，好不恐怖。

移民的速度很快，西门外这片荒地上的日本人愈来愈多。台湾总督府立即在这块新开发地上，开马路，架电线杆，挖排水沟，一个现代菜市场也盖了起来。这个“公设西门町食料品小卖市场”分成三个部分，层次非常分明。有八角楼，本楼，还有外铺。十字型的本楼有二层，一楼是砖造建筑，二楼是木构架建筑，顶上是黑瓦。在本楼里有69间铺子，有牛、猪、鸡、海鲜、蔬果等摊位，本楼的底端有一个八角楼，卖些洋杂货、文具、玩具，二楼则是游戏场。楼房里的市场，可以遮风避雨，摊位分门别类，清洗、进货、储存的位置都设计过，消费动线也很清楚。这是一种类似今天ShoppingMall概念的现代市场，但当年在汉人居住地区，市场可不是这样的。他们通常是露天的街

市，摊贩席地或扁担摆货，路上尘土飞扬，菜叶残渣随地丢弃，气味腥膻，毫无卫生可言。

日本总督府在原来台北府城墙位置兴建大马路之后，得到交通之便，场喜兵卫一家人开的日本料理店也跟着红红火火，每天门庭若市，生意兴旺。随着需求大增，纪州庵从日本内地引进陪酒的“酌妇”和“艺妓”，每到夜晚走进这家料理店，看上去俨然一幅日本浮世绘中的热闹景象。

1930年，就在纪州庵门庭若市生意火爆的时候，台北府城已名存实亡，此时清帝国已被推翻多年，中国已是民国的天下，而台北城内的大清帝国官府遗迹已被拆除殆尽，人们对清帝国的记忆也很淡了。

台北府城西门外原本的荒地，在台湾“总督府”行政区域规划下被命名为“西门町”，在不到30年的开发下，成了日本平民住宅的聚落，也因为艋舺、三重、城中三个区块交通节点，商业应运而生，开了好多戏院、歌舞厅、游戏场、购物中心，一时繁华盛极。

对平松德松来说，西门町已从异乡变故乡，然而，没有多久日本军阀发动“大东亚圣战”，像所有的日本人一样，平松德松绝对想不到，在不到15年的时间内，自己会因为日本四处征战战败最终被迫离开这块他们已经当成家的土地。

西门町从荒墓到繁荣，白云苍狗，人间一瞬。日本人用了35年把一个荒凉的乱葬岗变成亚洲娱乐的样板。现在，这个日本血统的新市镇要再次变色。

亲历“二·二八”



图二十 1954年，台湾台北艋舺龙山寺。

1946年夏天，陈伯范带着妻儿来到台湾。天气好的午后，西门町的阳光随着时间在骑楼间移动，南洋溽暑的阳光，人们晒得心烦气燥。陈伯范原来是黄埔军校八期毕业，官拜上校。抗战胜利后，他离开军队回归平民生活。陈伯范和堂兄弟一起来到台湾考察，他们走过西门町，发现经过日本人半世纪的经营，台湾民生与工业的基础设施很先进，都市的水、电、排水系统都很完善，他们一致认为，做生意在台湾是最理想的地方。

回到上海以后，陈伯范决定到台湾从事纺织业。他当时不到十岁的儿子陈肇家至今依然记得，当他和母亲、妹妹们随后从上海坐船到基隆港追随父亲陈伯范赴台创业，下船的时候，他看见基隆港有很多卖水果的舢舨。陈肇家记得自己甫下码头，他和母亲、妹妹们在码头上就被几百个人围着。因为他们从上海来，穿得比较时髦，皮鞋短裤上衣，打扮得干干净净。当地人看他们的穿着打扮，很好奇，几百个人围着他们，当时把他妹妹都吓哭了。

陈肇家算是头一批到台湾来的大陆小孩，那时候台湾本省人把他们当作很稀奇的人。

当时陈家小孩子打扮和台湾本省小孩完全不一样，陈家的孩子都穿皮鞋，陈肇家小小的眼睛却发现本省小朋友几乎都没有穿鞋子，都是打赤脚或穿拖板鞋。陈肇家穿短裤，穿上衣，妹妹都穿花俏的衣服，在当时的台湾，鲜见这样打扮的本省小孩，本省小孩穿得比较朴素。陈肇家留西装头，可以分边的那种，但是那个时候台湾的小孩多是留平头。陈伯范到台湾乡下去开设工厂，为了让儿子有更好的教育，便把陈肇家留在台北送进西门町的“西门国小”念三年级，同时让台北门市部两位杂役看顾他。

陈肇家一进“西门国小”便发现，同学小朋友们都讲台湾话，而且夹杂着大量的日语。同学们经常聚在一起用流利的日语交谈。小小年纪的陈肇家不明白，为什么同学是中国人却要讲“敌人的语言”。

只有八岁的陈肇家当然不懂被统治了半个世纪的台湾同学，本来都有日本名字，在文化上他们已经是中日混血，日本的现代化改造很成功，他的同学在数理科上远远赢过来自大陆的他，更重要的是，陈肇家在班上几乎听不懂老师同学都在说什么。过去八年，他成长于抗战期间的重庆，他自己是一口四川腔的普通话。

陈家门市办公室厕所是日式的，蹲式的，木头地板，旁边有个洗澡间，有水龙头，并没有浴池。洗澡间有水桶，有架子，架上面有水龙头。用水龙头洗澡直接淋浴，或用水缸也可以，当时已用自来水。陈肇家跟随母亲在抗战期间避难在四川白帝城的时候，陈肇家记得家

里用的是水缸。当时住家前面是长江，母亲雇人从长江挑水送来倒入水缸里面，洒点明矾就用了。

来台湾之前，陈肇家一家人曾在上海待了半年，上海的高楼大厦很壮观，来到台北，陈肇家看到台湾的房屋较上海矮小很多，但比白帝城的高。陈肇家回忆起来台北的建筑比较好，在四川乡下都是泥巴盖的房子，墙是泥墙，门是木头门，四川都是老式的房屋，台北比较现代化。

抗战胜利后陈肇家一家人搬到上海住在北四川路。他记得，住在上海时，大小便都先屙到便盆里，每天早上专门有人来收，尿则倒在夜壶里，再倒入粪桶，每天早上有推车来接，倒入一个专门装粪的粪桶。

回忆中，陈肇家发现，卫生方面台北西门町日本人住的专区应该比上海进步，起码有自来水。上海也有自来水，但上海一般人家里没有冲水粪坑而是用便盆，在西门町他第一次见到冲水马桶。

194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发生时，陈肇家根本不知道，第二天还是照常去上课。上课到一半，学校宣布四年级以上的同学在太平町、寿町、西门町集合，要求所有人带棍棒外出。要干什么去陈肇家不知道。陈肇家听不太懂指令只是跟着大家东跑西跑，小朋友说：“你三年级跑来干什么？”，就把陈肇家赶走。陈肇家不晓得自己该何去何从，只好回教室。他看到老师在改作业，就问老师：“老师，他们都不要我，我该去哪？”陈肇家印象非常深，老师低着头，沉思不语大概有两三分钟，然后叹了一口气，用台湾国语告诉陈肇家说：“你赶快回家吧。”

一回到门市部，陈肇家见到那两个学徒大哥急得要命，急着叫道：“大少爷呀，你跑到哪去了！怎么现在才回来？发生重大事件，凡是外省人，不论大人小孩都会被打。”

两位学徒赶紧关上门反锁，带着陈肇家躲在门市楼上，躲了好几天，每天煮点粥吃。大概过了一星期，一天一天地挨着过。最后几

天，米缸里也没有米了，他们三人也不敢出来，只好饿肚子，吃酱菜。到了有一天连酱瓜也没有了。

在办公室不知躲了多久，肚子饿了很难受，某天晚上，突然间听到鞭炮一样的枪声，他们觉得很奇怪，广播里不是讲不准开枪，怎么会有枪声呢？他们在楼上打开窗子往外看，看见天空上面有探照灯，到处照。他们觉得奇怪，那景象像是要打仗的样子，探照灯一照好像要空袭了。搞不清楚实际情形，他们一晚上都紧张兮兮。因为陈肇家还是小孩子，最后累了还是睡了。那两个学徒就紧张得没有睡。一直到了天亮的时候，听到枪声逼近，他们三个人又从窗子向外看，看到土黄色军服的人在路上走。两位从上海来的江西籍杂役说，好像那是国军部队的军服，这么说国军部队已经到了，那枪声可能是部队进城时开的枪。两位学徒很怕死。他们便对陈肇家说，“大少爷，你是小孩子，你出去要吃的，他们不会开枪打你，如果我们出去他们可能会开枪，中了弹就死掉了。”陈肇家那时候是只有十岁，也不懂危险，便说好，接着就出去。走出去大概几公尺，陈肇家就听到很大的枪声，他站着不敢动，情急之下嘴里大声叫道：“我是外省人！”

不到一两分钟，一个年轻的军官出现。青年军官就说，小子，你跑出来干什么？陈肇家说我是外省人，我们三个外省人，住在这里，没有米，肚子饿得很难受。青年军官就说好，叫陈肇家带他去住的位置。那个青年军官的部队是21师，四川部队，原在苏北剿共，突然接到命令便从江苏连云港上船赶到台湾来平乱。因为那青年军官讲四川话，陈肇家在抗战期间成长于四川，也讲得一口四川话，于是颇能跟那部队军官沟通。待在屋里的两个学徒是江西人，说江西国语，沟通反而有困难。

青年军官看了看门牌几号记了下来，然后跟陈肇家道：“小子，现在部队来了，见人就打，至于谁是好人，坏人，我们都不知道，谁是台湾人谁是外省人我们也不知道，见人就打。你不要跑出来，留在家不要出来，米等会我找人送来。”

部队从基隆登陆一直开到台北平乱。骚乱很快被镇压，但埋下的积怨和仇恨直到半个世纪后还没有消除。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陈伯范开设的工厂被抢夺一空，他将门市部收了，立即带着儿子陈肇家离开了台北回到乡下，再也不让独子轻易离开自己。

“新移民”寓所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至1955年“一江山战役”结束的6年之间，蒋介石调派残余的国民党军跨海移往台湾。跟随国民党军来台的，还有一百多万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军眷跟着军队分散在全台湾各地，而那些散兵游勇、落难的下层平民则依附在台湾本地社会周边寻找生存的机会。这些军民同胞们来自大江南北，五湖四海，他们离开中原，来到台湾这个地理边陲和文化边陲的小岛。

他们之中一些机灵的人后来来到台北，来到原本日本平民住的西门町。不像台北其他汉人居住区，日本人撤走之后西门町大部分人都是新移民。大陆来的人晚到，他们找不到适当栖身之处，有些聪明人就在原来被日本人拆除的台北府城西城墙的位置自行架设棚户租给他们，这些棚户紧临台北主要的铁道干线，居住条件很恶劣，火车来来去去轰隆隆，后来涌入此地的人愈来愈多，有些房客就把棚屋切割或加盖再分租出去，毫无限制下形成有如难民营的违建建筑群。

违章建筑群成了西门町一道除了戏院外的特殊的风景。看在台湾本省人的眼里，大陆来的政权和这个难民营的内在关系是分不开的。台湾原本被驯服成工整、自制、内敛、以静制动的日式社会秩序，被眼前躲避战争的难民破坏了。

年轻一代的本省人根本没有学过汉语，他们倒是都有个日本名字，能讲流利的日语。当本省同乡聚在一起用熟悉的日语聊天时，外省人的心里觉得很不舒服。而外省人聚在一起用家乡话说着本省人听不懂的语言，本省人也觉得不是滋味。

然而在这个超大违章建筑下，却有本省人与外省人想不到的发展。这个违章建筑群的文化本身是混杂与融合的，大陆南北方各地的移民最后聚集到这里，在这个破烂的棚屋下苟延，他们从原来广袤的神州大地一下来到台湾，虽然仅能在这个狭窄黑暗的空间里生存，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却出乎意料的顽强。来自大陆各省的人，在这里开设地方口味的饮食店，像徐州砂锅、真北平饭馆、点心世界、清真馆、老陆馅饼、老夏水饺、炸麻花、山西小吃、水煎包，这些都是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鲜有尝过的中华饮馔。西门町在这个时期比任何一个海外唐人街有更丰富的、层次更饱满的中国影子。

大陆的地域文化透过饮食、婚姻、日常生活重新输入跟大陆断绝半世纪的台湾，和台湾本土文化彼此相互碰撞，互相影响，丰富了台湾的多元移民文化，为台湾社会创造了新的经验和新的想像。其中中原文化与边邮文化最集中的交会的地点就是西门町。就像人们到了杭州会去钱塘大潮一样。

娱乐天堂

1949年来台的状况紧急，千金难得一张船票，许多人赴台时已是孤身一人，亲人失散，断了联系。繁华若梦，他们一身清寂，他们窘迫，有些人来台时没有被褥，没有换洗衣物，除了一条裤子，就是一双破旧的皮鞋，和一张照片，有些则连照片都没有，生活也没有着落。当夜幕降临，他们夜夜只能拥枕入眠，做的都是大陆河山和亲人相聚的梦。年复一年，每到佳节，人在异乡的他们有家归不得，他们思念大陆的家人，思念在大陆的年轻岁月，感到特别寂寞。在西门町，这些饱经战火的中国人，看到了一个他们未曾见过的升平世界。对一个过去40年来一直过着战乱岁月的中国人来说，没有战火的地方，就是天堂。

针对这些人的需求，一种模仿上海歌厅形式的红包场歌厅于焉形成。

一开始，这种歌厅就叫歌厅，后来孤身的人们去捧那些他们喜爱的歌手时，形成塞红包的风气，这种莺莺燕燕的歌厅才渐渐地形成“红包场”的称呼。1950至1960年间，西门町的歌厅里传唱不衰的是1920-1950年代的上海老歌，如天涯歌女、舞衣、苏州夜曲、秋水伊人等，一些歌手也取艺名为小周璇、小白光等称号。这些歌厅与延平北路模仿日本乐队唱着日本小曲的酒楼异曲同工，都是缅怀一个逝去的时代。

台湾小说家，桂系将领白崇禧的公子白先勇曾写过一部描绘那个时代的小说《台北人》。在他笔下，《台北人》中的台北人是割断或是留恋大陆的落难公子、将军、教授、商人、官夫人、工人、名媛、低级舞女、女仆，他们行业各异，贫富悬殊，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往事。

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的30年内，也就是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前，西门町成了台北市民的娱乐休闲活动中心，同时也是台北市核心区往周郊地区万华、三重、北投的交通节点，几乎所有大众交通工具的轨迹都会延伸至此。从一开始狭窄巷弄的三轮车，到后来的公共汽车，乃至今天的台北火车与台北地铁捷运站，交通新旧交叠，人潮往来，每天这里都是人山人海。1960年初违章建筑群被改建为稍具现代意义的建筑，中华商场，它与其他新起的百货公司、电影街、歌厅酒厅和各式各样的小吃摊形成一个热闹非凡的娱乐休闲聚落，而这个聚落不再分台湾人、外省人，它们全都混杂在一起。

1949年来台的一代人，到了1980年代，也逐渐凋零了。年轻的一代像他们的父辈们一样在西门町流连忘返，与父辈喜欢上红包场缅怀旧时代的精神追求不一样的是，此时台湾经济已经成长，社会风气渐开，新一代的青年人在这溜冰、看电影、看MTV、谈恋爱、跳Disco，年轻的一代在这里跌入物质追求和成长的迷宫，就像他们的上一代迷失在歌舞厅一样痴迷。大城市在七彩炫目的糖衣下总是隐藏着黑暗与光明、罪恶与救赎的世界。在欢乐的背后，西门町是冷酷的异境，是弱肉强食的竞技场，是抢匪幽暗的巷弄、是雏妓变卖灵肉的温床。嗑药的人、自杀的人、流浪的人，带罪的人、逃难的人窝藏在这个地方。他们在沉迷刺激与快感，他们在这里失去青春与童贞，他们

在这个龙蛇出没的社会陷阱中爬不出来。乞丐、舞女、小混混、地头蛇、怪老头、女学生，他们在此好像找到一个失去地心引力的世界，在这里他们修长的双脚似乎能踢踏起舞，飞跃起来，就像每一个下一代都会逃离上一代给他们设下的桎梏，他们飞到一个新的宇宙，而这个宇宙没有给过去的历史留下丁点空间。

风景不再



图二十一 西门町红楼

1980年“中华商场”拆除前后，商圈渐渐地往东区发展，人潮也随之迁移，这里逐渐没落了。尤其1990年后的十年，台湾电影进入衰败期，西门町的电影街更显得沧桑。

2000年之后，人们再来到台北的西门町，西门町已经被整建过多次，人们看见的那个各种文化参差交错的西门町已经被更新一个世代的“新人种”占领。那些店面变得更小、更碎，名片、传单、简讯到处乱窜，新兴的商业势力霸占了所有光明的地方，黑暗肮脏的一面退缩到更深的巷弄。那个由大东亚娱乐殖民地衍生出的声色浮华世界，死死生生，电影街曾经几度奄奄一息如今又再回春，那个日本时代的“西门町食料品小卖市场”已经变成文创商品展销中心“红楼”，西门町还是夜夜人潮不散，似乎又聚拢了那逝去已久的繁华岁月。

翻过西门町几条主要街道，人们会发现周遭逐渐黯淡下来，扩散出去的商圈，不再有这么多的霓虹，也不再那么吵闹。举头望月，月光皎洁。在暗夜陋巷回头望向声色犬马的西门町，心头总不禁想要长叹一声。历史是一缕炊烟，风一吹就云散风清。一座城市的容颜在岁月中的改变也是必然的，随着时间流逝，没有几个人会记得纪州庵的平松德松，不会记得场喜兵卫，也没有人记得陈肇家，更鲜有人记得那传承中原文化来台的芸芸众生。

白先勇小说《台北人》其中著名篇章《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是这样开头的：“当台北市的闹区西门町一带华灯四起的时分，夜巴黎舞厅的楼梯上便响起了一阵杂沓的高跟鞋声，由金大班领队，身后跟着十来个打扮得衣着入时的舞娘，绰绰约约的登上舞厅二楼来……”

西门町就像位舞小姐，出身低微，打扮俗丽妖冶，三教九流的寻欢客总能在她身上得到身体心灵的慰藉。离开西门町的时候，人们都长大了，想起西门町，他们的印象却不是低级的香水味，而是自己淡淡哀伤的青春。

第三部分 转轨地标

这是一条坎坷蜿蜒的民主抗争长流，水上漂着的是腐烂的青春之花，沉在河底的是流淌着鲜血的肉体。

二·二八：台北街头的撕裂伤口

文/杨渡

曾任《中国时报》副总主笔、《中时晚报》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国民党文传会主委，主持过专题报导电视节目《台湾思想起》《与世界共舞》等，现任“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著有诗集：《南方》《刺客的歌》；散文集：《三两个朋友》《飘流万里》；传记：《简吉：台湾农民运动史诗》《红云——严秀峰传》；报导文学作品：《民间的力量》《强控制解体》《世纪末透视中国》，及戏剧研究《日据时期台湾话剧运动》等十余种。



图二十二 杨渡

“二·二八”之后，台湾人从渴望重建，充满希望的乐观，变成痛苦失望，充满恐惧悲苦。这是一个暗伤，一个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它是台湾人心中永远的痛。只要召唤它，那百年来被压抑在地底的无奈与悲苦便倾泻而出，召唤出集体的伤痛，进而凝聚出力量。

现在回顾“二·二八”的历史，我们有一种深深的悲悯。这是由于“二·二八”曾是台湾最重最深的历史伤痕，也曾是政治仇恨、社会对立、族群冲突、蓝绿对抗、群众动员等的焦点。它曾是历史最敏感的一根脊椎神经，一碰就全身颤抖，伤痛至极。



图二十三 2009年在台北自由广场举办的纪念“二●二八”事件的周年活动。

如今66年过去了，台湾也历经了两次政党轮替，政治的作用已不再，我们反而能从更远的历史的距离，用安静而理解的眼光，重新凝视这一段历史。因为在长远的“时间之镜”下，我们都只是大历史的一个倒影，我们没有仇恨的本钱，只有互相悲悯的观照。

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延续台湾光复后所有社会矛盾的总和，也反映出一个殖民地社会如何回归转型的艰难历程。它既有两种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如何重新融合的课题，更有各种阶级矛盾、族群冲突，以及殖民文化之残留如何转化等的交缠纠葛。

台湾人的希望与失望

1945年8月，日本天皇投降的“玉音”在全台湾放送时，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日本长官公署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勉力维持秩序，以待国民政府来接收。此时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些报复行为开始发生。起初报复当过“日本走狗”的台人，后来也报复日本暴虐的统治者如警察。但大体还维持良好秩序，台湾并未失控。唯有日本统治后期的物资配给控制完全失灵，为取得生活所需，黑市兴盛。小偷去偷农民的稻米牛鸡，不时发生。

有鉴于此，过去的本省地方领袖被推出来作为领导者，以安定社会秩序，等待政府来接收。而这些人过去大都是抗日的英雄，尤其是坐过日本人牢房的知识分子，才能得到社会的敬重，在无形中领导台湾渡过难关。

然而，群龙无首仍难管理，因此他们需要一个有代表性的组织，才能统合混乱的地方团体。台湾义勇队第一批回台的副队长张士德，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区团部副主任的身份，代表中国政府首度来台，就起了绝大的作用。他在台湾各地会见抗日领袖，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义，组成各个地方分团，使各地临时性的地方领导者可整合于组织之下，以维持全台各地的秩序。然而台湾的知识分子并不知道

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问题，更不了解国共内战的历史，此时正怀抱着热情，等待“祖国政府”的到来。

这一段时间不长，约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却让台湾人有一个自治的机会。尤其具有理想的抗日知识分子，更充满热情，怀抱着对建设台湾未来的想象，有如等待故乡的父兄一般，等待祖国的来临。他们未曾料到的是，来接收者竟是如此素质，如此的政权。

“二·二八”的受难者陈明忠形容，光复初期，台湾人成群结队，拉红布条，以迎王师的心情，兴高采烈，在基隆港欢迎国民党军来接收；但看见上岸来的国民党军，却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只见一群拖着破包袱，扛着旧枪，后面带着铁锅碗瓢，脚缠破布绑腿的国民党军，垂头丧气地走上基隆海港。他们简直无法相信就是这个军队打败了日军。当时任何一个日军的配备、武器都比国民党军好太多了。于是充满回归祖国兴奋之情的台湾人，以一种善意来加以解释：“你不要小看国民党军，他们穿布鞋打绑腿，是为了绑上铁块，训练腿力练轻功；他们的锅碗瓢盆，是为了随时可以上场作战，当挡箭牌……”

当年在现场迎接国民党军的许金玉说：“那时，看见部队脏成那样，有人就说，这样怎么能打仗？可是我心里想，八年抗战真艰苦，把他们磨成那个样子，阿兵哥真可怜，又干又瘦又脏，他们为国家受苦了……”

然而，善意的解释很快破灭。现实是一个缺乏纪律与法治观念的行伍、公务员、特务们，以及充满互为矛盾斗争的政治群体，来统治台湾。

国民党军的素质，在大陆已经是恶名昭彰。在台湾也未曾稍有改善。他们强占民宅、调戏妇女、强取民间物资、白吃白喝、贪污公款、横行乡里；加以行政长官公署陈仪手下有所谓的“四凶”，以统制物资之名，行横征暴敛之实，恶行恶状，大至金融汇率、所有贸易、米粮物料，小至民间小小烟酒营生贩卖，都要以统制管理为名，剥几层皮。再加上工业经济崩溃，战后由南洋回台的原台籍士兵失业，流落

街头，只能做做街头小贩，却还得被取缔抽税，查缉没收，简直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台湾早已像一个愤怒的火药库。

台北街头的“导火索”

卖香烟的妇人林江迈只是一点星火，不料她却点燃了整个火药库。

林江迈长得瘦小，丈夫早逝，婆家贫困，从桃园来台北卖香烟，赚取微薄的生活费用。她的孩子都留在乡下读书，唯有女儿林明珠因为重男轻女观念，觉得不必让她读书，于是带来台北做伴。日本统治时代，台湾实施烟酒专卖制度，所有烟酒皆由政府专卖，民间不得私营。1945年光复后，管制一度放松，民间开始私自经营，小做小卖，以渡过失业的难关。不料国民党政府竟维持旧规，不仅实行烟酒专卖，还加强取缔民间小贩，这引起很大民怨。更恶劣的是，政府专卖烟酒品质低劣，高品质烟酒皆被私下转手，私烟私酒当然盛行。林江迈是在重庆北路、圆环一带兜售香烟维生。

当时是记者的周青受访时说过，这地方有不少酒家(当时有女侍陪酒的餐厅)，门外有些年轻力壮的保镖，他们保护酒家，却也看尽许多官商勾结、朱门酒肉臭的场景，看到政府公务员(他们穿的中山服有几个大口袋，人人讥讽说是用来装红包的)在此花天酒地，台湾人却贫困不堪，心中不平。林江迈和许多卖私烟的人来此兜售香烟，是很正常的。当时10岁的林明珠还记得，这些酒家门外的弟兄，看他们孤儿寡母，也很义气照顾他们。

当时私烟是用一个木盒子装着，以一条带子两头拉住，捧在胸前，到处走动兜售。2月27日这一天傍晚，缉私烟警到处查缉，到了万里红酒家附近，烟警五六个人，从一辆卡车上跳下来，开始抓人，机警的烟贩都跑了，只有林江迈手脚较慢，被抓了。抓住她的人叫叶得根，没收了她的香烟盒，准备整个拿走。没收香烟就算了，取走烟盒子等于没收了她的营生，她大哭起来，跪在地上，拉住烟盒子不放

手。这烟警竟用枪柄一把打倒她。林江迈当场喷出鼻血，昏倒在地，她女儿在一旁哭泣，呼叫妈妈。旁边围观的人群，眼看如此欺侮可怜孤儿寡母，莫不激愤，群情激动地围住烟警，想抢回香烟。几个烟警更紧张了，一心只想挣脱包围，就向前冲，往淡水河的方向跑。群众在后面追。其中一烟警叫傅学通怕被追上，回手就开了两枪。不料其中一枪竟打死一个当地二十岁青年陈文溪。群众更加激愤了，一起喊“打死人了”。延平北路一带的人群呼喊起来，整个冲突就爆发了。

烟警逃向延平北路的警察局，人群随后冲入，但他们已把烟警转移到警察总局。群众再追到警察总局，他们又转移至宪兵队。人群愤愤呐喊“严惩凶手”，无效，只能在宪兵队外抗议。

次日，由死者家属和抗议民众所组成的游行队伍，约有两三千人，从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附近出发，沿路大鼓助阵，高喊“严惩凶手”。先至太平町警察派出所抗议，再转至台北烟酒专卖分局，他们冲入其中，殴打数名职员，有二人致死，再拿出烟酒存货，焚烧抗议。高喊“打倒陈仪腐败政权，严惩凶手”。

随后，转往烟酒专卖总局，由于大门紧闭，人群在外墙贴上标语，就转往现在位于忠孝东路通知各县市成立分会，并向工商银行强提2000万元以供该会的经费，同时藉由广播，宣传各地现况，以互通消息。

为了和陈仪政府协调解决方案，3月5日处理委员会决定该会的组织大纲，并通过政治改革案，其要点包括：一、公署秘书长及民政、财政、工矿、农林、教育、警务等处处长及法制委员会过半数之委员应以本省人充任；二、公营事业归本省人负责经营；三、立刻实行县市长民选；四、撤销专卖局；五、撤销贸易局及宣传委员会；六、保障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自由；七、保障人民生命身体财产之安全。

从要求的要点，也可以看出当日台湾人饱受歧视待遇及压迫，渴望民主自治的心愿。但处理委员会乃是各方民意领袖的总合，本身即意见分歧，同时，陈仪政府也派人加以渗透，因此3月6日，处理委员会正式提出改革政治方案的九项要求，内容与前述雷同，但条件提得

更高；并以台湾省参政会的名义致电中央政府。是日，陈仪做了“二·二八”事件后的第三次演讲，宣布尽可能采纳民意要求：一、改组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二、各厅处长尽量任用本省人并希望民意机关推选适当人员；三、各县市长定7月1日民选。此一宣布，等于陈仪完全同意了委员会的要求。如果双方获得结论，事件应可平息。

但陈仪的策略不在于此，而是暂时先答应要求，拖延时间，等待南京政府派出的二十一师军队的到来。同时他策动内应，故意在处委会提出各种新的要求，以至于3月7日后，又重提出四十二条要求，如此一来，等于推翻了前面已获得的协议，一切重来。然而四十二条要求太过繁琐且政治陈义太高，授陈仪以“逾越政治改革，想谋反”的把柄。

3月8日，国民党军二十一师抵达基隆，当晚，陈仪态度丕变，强硬宣布戒严，开始全台的镇压搜捕。由北至南，国民党军一路以机枪扫射镇压，造成民众死伤无数，而宪警则随后进行搜捕。加以有人趁乱夹怨报复，告密陷害，利用战乱无法律审判，造成许多冤错伤亡。

更惨的是“二·二八”之后的肃清，许多参与“二·二八”处理委员会的知识精英、民意代表、抗日领袖、地方士绅，甚至文学作家、医生、艺术家都遭到毒手。嘉义画家陈澄波突然被抓走枪决，就是一例。

当时在邮政总局上班的许金玉记得，被扫射过后，北门附近的牌楼边上，挂了许多血迹，洗也洗不掉。

总之，“二·二八”事件发生不过10日，其后的镇压杀戮，却造成全台混乱，死伤惨重，成为台湾人心中永难磨灭的伤痕。

至今隐痛的暗伤



图二十四 台北市二二八公园内的“二·二八”纪念碑。

“二·二八”之后，台湾人从渴望重建，充满希望的乐观，变成痛苦失望，充满恐惧悲苦。这个悲苦的调子，主导了战后的台湾反抗运动，直到20世纪结束，还未停止。

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也了解镇压过了头，民怨积压太重，为了缓和紧张关系，且为了内战的需要，很快调走二十一师，在大陆招募比较年轻的青年军来台，试图改善。但政府仍在台湾展开“清乡运动”到处搜捕。参与反抗的各地领袖，有不少人被逮捕枪决，其余参与者则遭到通缉。台中的领袖谢雪红及其干部，台北市处理委员会的一些领导者，有多人流亡至香港，再转大陆，投靠旅居大陆的台湾人。他们不

甘心，乃决定组成一个长期性的组织，在海外进行反国民党的运动，于是有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成立。

然而，历经如此重大的镇压屠杀，参与者又是如此之众，就算国民党当局清乡，也不可能逮捕净尽，沸腾的民怨岂能一时平息？更多的幸存者岂能恍若无事？

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反抗暴政，打倒国民党当局。当人们的目光转而凝视中国的现实，一场内战的风暴也正在中国展开。整个台湾反抗运动，于是走向下一个阶段。台湾民众认知到有“两个祖国”，一个是国民党的“白色祖国”，一个是共产党的“红色祖国”。台湾自日据时期即有农民组合、文化协会、台共等左翼社会运动组织，虽然有一些领导者流亡大陆，但台湾的社会基础仍在，在反抗暴政的前提下，台湾的反抗运动与大陆合流，成为国共战争的一环。像农民组合领袖简吉，就担任中共地下党的山地委员会负责人。

“二·二八”的结果，是让反抗运动彻底走入地下，并与国共之争合流。

到了1949年底，国民党当局从大陆溃败迁台，为了保住台湾，蒋介石展开新一轮的清乡，大量逮捕所谓“匪谍”嫌疑者。在“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原则下，所有与地下党有往来的人，不管知情与否，一律牵连逮捕。举凡青年读书会、被密告思想有问题的人、嫌疑人联络过的亲戚朋友等，都被逮捕入狱，株连之广，手段之残忍，让整个社会陷入恐怖。有些青年只是阅读1930年代鲁迅、沈从文小说，被密告，即被判感化3年，期满再加3年，坐了6年的牢，连一个罪名都没有。

当时“白色恐怖”这名词还未出现，人们无以名之，并且这些被逮捕者大多与“二·二八”有牵连，从民间角度看，这整个历史是延续的。民间于是以“二·二八事件”为“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这一段历史命名。这便是为什么“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被形容为数万人的原因。因为和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相加，确实超过数万人。

1950年代后，戒严体制镇压了所有异议的声音，“二·二八”成为一个禁忌的名词，不许民间或任何媒体加以讨论。然而这是一个暗伤，一个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它是台湾人心中永远的痛。只要召唤它，那百年来被压抑在地底的无奈与悲苦便倾泻而出，召唤出集体的伤痛，进而凝聚出力量。乃至1970年代的党外运动，1980年代的民主运动，“二·二八”事件都是反对运动的政治动力。

直到台湾的民主化逐步实现，“二·二八”事件的真相逐步公开，整个社会终于直面了这一段历史。1995年，李登辉政府向所有“二·二八”受难者及家属公开道歉，同时公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以公开立法赔偿受难者和家属。整个“二·二八”事件的伤痛，才慢慢平息。

紫藤庐的几代客人

口述/周渝 采访/杨东晓

1946年生，紫藤庐茶馆主人。自小浸濡于中国传统人文修养，年轻时爱好思想与艺术，首创结合生活、艺术和文化的茶艺馆，更为当时政治异议者、前卫文化及艺术工作者提供一栖身之所；三十年来，出入茶馆的知青文人开枝蔓叶，各自形成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景，紫藤庐也成为台北的传奇。



图二十五 周渝

紫藤庐这段历史，虽然一路行来，但现在回望，距离还太近。

有朋友敦促我记述一些历史事件与重要记忆，但对于讲述紫藤庐的历史，我是否能找到够高度的视界及有意义的观点，这是我一直犹豫的原因。

第一代：暗夜中的一点光亮



图二十六 1950年，郎静山摄周德伟全家福

现在的“紫藤庐”位于台北市大安区新生南路三段，向右走与台湾大学温州街上的教师宿舍只隔一道窄巷，这两条街几乎是相连接的，一侧与台湾大学也很近。我父亲周德伟时任“关务署长”，并兼任台大经济学教授。

1950年起，雷震和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还有张佛泉、夏道平、徐道邻等十余位学者每两周在我家有个定期聚会，当时这个院落还不叫“紫藤庐”，我父亲为他的书斋取名“尊德性斋”，典出中庸“尊德性，道问学”。

这个房子是财政部配给他的住宅。这一带原是日据时期日本人比较高级的住宅区，帝国大学（即后来的台湾大学）教授和一些官员的住宅区，具体是谁住在这套宅子，就不知道了。我查了电力公司的送电记录，最早的送电记录是1920年。

日本人在台湾建了几个大型企业,如工矿公司、台糖公司、烟草公司.....等等，他们退走后，一切收归国民政府所有，然后分给好多部门，像我们那一带有分给台大的，分给台湾银行的，还有一些其他机构的。

我还不到十岁，坐在角落里听不懂他们讲什么，但是从殷海光带来的大学生的神情上看，他们有些人对于我父亲讲的话听不太进去，态度有些傲慢。这个时候，殷海光常是一声不吭，不反对也不赞同。在那段时间，他的几位比较活跃的学生，把所有讲中国哲学的人统统打成“玄学鬼”！

很多年后，我问过父亲当时在谈什么，才知道父亲一方面是在宣讲他的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和观点，另一方面是讲儒家自孔子到司马迁的传统。而殷海光本来继承的五四时期反传统的观点，那时他在哲学上正热衷于“逻辑实证论”，他的学生当然也是站在反传统的立场，自然与我父亲的思考是有抵触的。

这个纯教授们的聚会和讨论，进行了半年多而被迫停止。当时我们家对面的糖果店是特务开的，家里的电话也被监听。记得在蒋经国

正式接位前，有位负责监听但又非常佩服我父亲的特务，有天悄悄地来提醒我父亲，在电话中骂任何人都无所谓，但不要再骂蒋经国了。那时有围绕哈耶克经济学理论进行一些讨论。我在1992年父亲90冥诞时曾经写过一篇《通货膨胀会破坏文明的基础》，刊在《中国时报》副刊(刊发时，被编辑更名为《糖果店对面的春天》)。父亲深刻地看到不良的经济体制与政策，会严酷地影响与扭曲社会中人性与文化的发展。

父亲在召集这个聚会的开始，就提出希望每一个人把他所了解的自由主义的书都提出来。当时我父亲提了四个最重要的学者，父亲在他后来的文章中，有说到他提出的是哈耶克、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还有卡尔·波帕与卢布克，可惜卢布克当时只有德文著作，始终没有被引荐进来。

在我家聚会的人，常常听到我父亲批评蒋介石；德国那个时候已经吃到极权的亏了，而这边蒋介石还要用极权这一套，在台湾变本加厉地继续用独裁来严酷统治。

父亲是英国经济和政治学家哈耶克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入室弟子，1937年他递交了用德文写的《中立货币论》博士论文就回国任教了。他坚决反对当时以苏联为主导的计划经济，认为苏联这样的计划经济必定导致集权，所以他极力倡导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我记得他最得意的一件事情，是跟家人和朋友大谈在国民党中央及“行政院”每次的会议中，他都是单枪匹马与其他主张计划经济的学者与政客激辩。终于把所有计划经济学者们与政客们都驳倒。

由于特务的监视与威胁，尊德性斋原先定期有形的聚会解散了，变成了不定期和个人的探访。

就是在这个1950年代初期的聚会上，父亲把手中那本哈耶克的国内孤本《通往奴役之路》，推荐并借给了殷海光。后来，殷海光把这本书翻译出来，雷震将译文连载在他主编的《自由中国》杂志上。这本书是哈耶克写给大众看的唯一的一本较浅显的书，也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阐述中最著名与流行的一本，1944年在英国出版。殷海光

翻译了这本书，认为它对国民党当局与蒋介石是一个很厉害的抨击武器。他的译文中有强烈的态度，一种情感的态度，这是由于他的五四反传统精神使然。可是哈耶克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写东西完全不温不火的，他认为写文章用的应该是光而不是火。

殷海光晚年，大概就看到我父亲后来翻译的《自由宪章》，当然他也可能看到英文原文，我想这影响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了解了正统的自由主义，对社会与历史的观点，是奠基在社会演化论上；但可惜已经太迟了，他英年早逝，来不及写下这方面的思想了；但他对一代学子的影响，仍是五四反传统式的。当然，殷海光先生树立的是，在威权政治下不屈的独立人格。

聚会被解散之后，夏道平还会经常来与父亲讨论学问，一直到1975年父亲出国以后仍通讯不断。

这段聚会，虽然短暂，却开启了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在台湾的建立。除了殷海光翻译了《通往奴役之路》外，张佛泉开始写作《自由与人权》一书。后来因张佛泉跟东海大学有冲突就转到香港去了，所以这篇书稿就交到香港出版。

几年前，曾经由两岸三地的出版界评选各地最重要十本书。出版于1950年代的《自由与人权》即入选香港几十年来最重要十本书之一。那个时候在华人世界讲自由主义的理论很少，所以那本书的重要性就变的非常突显。

父亲陆续发表了几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并集结成《人文现象的理解》一书，可惜这本书由于文字太深，又是融合了哲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艰深论文，很少人能读得懂，或有耐心去看。

夏道平用自由主义的理论，在《自由中国》上写了一连串评论文章，后来他长期翻译了奥国学派，哈耶克与米塞斯的重要著作。

家中长期来往的人中有白崇禧，他来就是下围棋及吃饭。他总是一言不发。他们北伐时就认识，父亲在北伐前曾任《武汉民报》副刊的主编。所以北伐时为桂系请去负责宣传，帮他们写宣扬文字，他带

一组人，总是走在桂系李品仙部队的前方。李品仙也常来下围棋聊天。

大我十几岁的大哥周弘进了台大经济系后，经常带好朋友回家与父亲聊天，李敖、陈鼓应也经常是我家客厅与餐桌上的座上客。他们这些穷学生都爱吃母亲做的好菜。我记得父亲与他们的谈话，比较少谈哲学和经济学，经常议论古今中外历史。

父亲的一生，以儒家忧国忧民的情怀，做的是政治、经济、社会与哲学的大学问，当然没有像直接搞艺术贴近生活。对我而言，那是一种很艰苦的事情，需要很大的毅力。他希望在传统儒家学说与社会基础上，引进西方的自由主义。晚年即使在身体病痛中，仍用心翻译出哈耶克约六十万字的《自由的宪章》。在这部书的各章批注中经常引用与对照儒家的哲理，如将中庸的思想与中立货币论相对照，强调动态的中立。

第二代：贫穷的波西米亚

父亲1975年退休后，到美国去了。哥哥姐姐都在美国工作上学，只有我留在这个院子里。在父亲离开台湾的前一年，哈耶克和贡纳尔·默达尔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位叫陈忠信的东海大学的年轻人来我家，请父亲到东海大学去演讲，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父亲一生清廉，没存下什么钱，只给孩子每人留下一幅画与几幅字。他到美国之后，我为了搞“耕莘实验剧团”，就把留给我的那幅齐白石虾子水墨画卖了。1976年，这所房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看到一些真诚而有希望的艺术家的作品不被重视。全社会积极搞经济，当时正是台湾经济开始腾飞的时候，到处是加工工业的痕迹，都市缺乏规划，十分脏乱，人们已经被迅猛发达的经济压垮了，活得像蟑螂一样，很压抑，拼命地工作。

我认识天主教耕莘文教院的李安德神父，就在这个机构下创办了耕莘实验剧团。并试着将剧目不送政府单位审查。当时有些学习艺术的学生没地方去，就跑到我剧团混、在我家住。就在这个院子里办展览、排演舞台剧，这也是台湾小剧场运动的开始。一场剧三四十分钟，一次能演出两三个剧目。

从我主持老宅以后，这里的活动发生了转向。当时我觉得整个社会很苦闷，而戏剧是最能探索人在一个时代中的命运。老房子此时发生的故事，是和年轻艺术家们以各种形式走进这座老房子开始，这个房子也走向了普罗大众、走向文化青年了，它所见证的故事，不再仅仅是文化阶层的事情了。

我们演台湾社会很底层的人，清道夫、黑道的混混、快饿死的人。以这个院子为基地，在耕莘文教院搞得热热闹闹的，电影欣赏与小剧场演出。大约搞了两年不到，我就被逼走了。政府无法审核我们的剧本，禁止我们演出，但他们还有一个办法：因为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社团，他们就安排一些可能是有任务的职业学生来加入，加入了就搞颠覆，要把我赶走。后来李神父与我就解散了由我主导的剧团，交给了少数几位真正热爱戏剧的年轻人，以更专业的方式，延续了这个剧团的生命。在此前不久，台湾桃园县刚发生了“中坜事件”，1977年的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在桃园县长选举过程中做票，愤怒的中坜市民包围中坜市警察局还放火烧毁了警察局。

我对那种抗争的手段和行为能够导致这个结果——推翻了弊案、还能当上县长——感到震惊。这一事件的影响力，影响到不少青年学生，我就是受了这个影响，才跟着陈忠信一起参加了党外运动。

第三代：党外活动的据点

离开了剧团后，陈忠信与我参与了当时开始蓬勃的党外运动。我们积极参与了1978年底因台美“断交”而未完成的“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选举，选举停止后，我们又参加了“立法委员”康宁祥创办的《八十

年代》出版社与杂志社。康宁祥找了陈忠信、范巽绿、贺端藩与我去。原来他只是要办杂志，我们建议他先办出版社，先整理《自由中国》十年来的杂志，就其中重要的论述，分类出版选集，提供给以后要搞政治的人作为重要的参考。这段期间，常来聚会的有陈忠信、范巽绿、林浊水、林正杰、苏治芬等，即当时所谓的“新生代”，直到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爆发。

少数没有被抓进去的人，如林浊水、苏治芬等都逃到了我家。当时报纸舆论全面挞伐，都说美丽岛集团是在搞叛乱，就是用舆论来未审先判了。这时需要有人来写一篇法理文章驳斥报纸。我就被叫来写了这篇困难的文章：《政治事件审判的法律神话》，7000多字。在1980年3月康宁祥主导的党外杂志《亚洲人》复刊后的第一期刊出。美丽岛事件是在1979年12月10日发生，党外重要人物几乎一网打尽，与外界隔离毫无音讯，社会充满了恐怖气氛，当时台湾法学界无人敢写此类文章。这期杂志出版后，劫余的党外人士，以康宁祥与张德铭为主组织起来的辩护律师群，才取得了更坚强的立场，为美丽岛事件受难者辩护。

杂志出刊后不久，我要求见父亲的老友当时的“司法院”院长黄少谷先生，之前二天，我就将此杂志送进“司法院”。黄少谷先生约见我，见面时他对我说：你的文章我看了，你的意思我也了解，还有什么意见要陈述的。我说希望美丽岛这个案子要好好处理，这些被抓进去的人是由于政治信仰的不同，是应该要被尊重的，审判时应像魏京生一样，被允许发表他们个别的政治信念；我还严肃地提到这个事件如处理不好，会使以后外省人和本省之间的问题更趋严重。

黄少谷当时是蒋经国最信任与尊重的人。后来我们看到美丽岛大审，是公开的，报纸每天几万字的全程报导，而大审的最后一天，也给了每位当事人自辩的时间，自辩文也是全文公开。所以那个审判一完结后，整个社会人们被压抑的情绪都释放出来了。当时几位辩护律师，如陈水扁、尤清、谢长廷、苏贞昌等，之前都不是党外人士，事后却成了光荣的辩护律师。因了这个特殊机缘，他们都成了民进党成立与今日台湾政治的重要人物。

美丽岛事件坐牢的那些人中，六位最重要的受刑人，有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与林宏宣，是关在同一处监狱。有一次听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夫要到台湾访问，他们决定在牢里发起一个绝食运动，想引起美国的注意。其中几位的太太就来紫藤庐找我们商量，是否我们这些在牢外的人可作些事情，有人提议：牢外的人也来办个绝食运动，绝食者以几位因作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而成为台北市议员的党外人士为主，如陈水扁、谢长廷等，还有江鹏坚、尤清、林正杰、洪奇昌等重要人士，当时新生代分为两派，从美国回来邱义仁那一派人(即后来的新潮流)，认为应该有比较深的筹谋；他们认为：运动不能由牢里来领导牢外，他认为不要再去消耗，去搞这个呼应。但范巽绿与我认为这是个机会，也是道义，当然要绝食呼应。

记得在一决定性的会议中，我说我向来负责的是文字与宣传，只要有人绝食，我相信可以让这个信息传遍全世界，台湾不报导，国外报纸一定会出现。结果我觉得我这句话一出，整个会议气氛改变了，基本上都赞成了。这件事发生在1984年5月，也就是在紫藤庐茶馆正式成立三年后，这也是我为党外参与策划的最后一件政治活动。当然，在解严(1987年)之前，紫藤庐一直是党外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紫藤庐支持的面向，除了原有的文艺活动外，也包括了非以政治性主题的社会运动，同时一份非学院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于1986年开始在紫藤庐酝酿策划，由陈忠信、傅大为、夏铸九、钱永祥、郑村祺等人主导，于1988年创立至今。

保住紫藤庐

1981年，我为这个有三株老紫藤的老宅取名“紫藤庐”，到了1980年代中期，“财政部”迫于“国家安全局”的压力要收回这个宅子，但因为这个宅院在1972年台风袭击时部份屋顶毁损。当时财政部拿不出钱，有三分之一的建筑是我父亲自己掏钱将它改建为二层楼洋房。所以，我拿出各种证明后，宅子算是暂时保住。

1997年，“财政部”再次迫于压力，决定要查封紫藤庐。

当时的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一心想把紫藤庐这片土地跟宅院收回去，于是，一大群朋友开始想办法如何抢救紫藤庐，因为这所房子保存了大家的珍贵历史记忆。“财政部”透过法院，把紫藤庐的院墙与内半部日式房舍部分钉封起来，只剩下三分之一的部分二层洋房，因为这部分是父亲自建的。

几位会出主意的朋友，叫来媒体，他们前一晚先偷偷把钉子启开，然后由胡茵梦、丁乃筑两位名人对着摄像机，一巴掌把木夹板击倒；同时声明“财政部”与法院的做法，违背古迹法，因此紫藤庐恢复了旧观并继续使用。

陈水扁当时是台北市市长，夏铸九教授是台大城乡所主任，他建议我们把紫藤庐提出古迹申请，并知会了台北市政府，于是我们得到通知，可以递呈申请书，请专家做历史的鉴定。夏铸九教授指导两位台大城乡所研究生，于一周内赶出了一个很厚的、图文并茂、扎扎实实的申请书。

这里曾经是民进党搞党外运动时很重要一个活动地点，陈水扁肯定要保护。历史古迹的评审有七位，都是学者。紫藤庐的审查一通过，“市定古迹”的指令就立刻下达。好笑的是，古迹指令公文送达时，法院正在紫藤庐钉隔离木板。

紫藤庐被指定为市级古迹以后，接下来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龙应台出任第一任文化局局长。文化局对古迹有管辖权，她才能够知会当时管理单位，按照文化资产保障法，不但要保存它的古迹原貌，还要懂得它的人文精神，把它经营成活的，并且这个茶馆还要重现原来的文化精髓。这样，这座有着许多的历史意涵和几代人记忆的空间才算保留下来了，并且具有了更多的公共性。

寻找天人哲学的法门



图二十七 紫藤庐内景

台湾进入民主社会后，整个社会似乎又在经历一个新的转向。紫藤庐在成为市定古迹之后，开始转向文艺活动与茶文化的拓展，而茶文化是以汉文化天人哲学为基础的，其中主要是以易经的阴阳思想与老庄的自然哲学为骨干。紫藤庐现在孕育和希望传达的，就是这种东方的哲思与美。

有些不知道紫藤庐历史的人走进来，也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它整体的氛围，包含东方的美感精神与睿思。我常跟工作茶人们讲，要用心灵对待这个环境，环境不是设计出来的，是心灵对话出来的，比如你插花，你就自己去与花、与环境作对话。

紫藤庐的阳光和风透过茂密的植栽，散在院落石板上或屋内地板上，风移影动，当客人进来，颇能抖落尘俗，进入一种交织着自然人文的深邃美境。紫藤庐有许多有意义的文艺展览和演出，比如古琴、南管、昆曲与一些新的创作展演，并始终支持新生的有才气而认真的艺术家。

走过艰难的历史，又进入现代科技与理性的文明，旧的创伤并未疗愈，新的压力纷沓而来，我们面临着精神认同与精神出路的问题，在西方他们依凭着传统宗教与人文的探讨，这是他们精神修复的重要力量。在东方，我相信包含了儒道佛三家长久而深厚的哲理与智慧，也就是实践了几千年的天人哲学，能给我们丰富的资源，相信一条曲折却开阔的大道，会在历史的实践中逐渐浮现。

资讯：

周德伟的一生犹如一个传奇。北大出身，早年从事过国民党党务工作，参加过北伐。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入室弟子。曾任国民党政府“关税署署长”。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坚定倡导者。曾翻译哈耶克著作《自由宪章》，并著有半文言体的回忆录《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他有

一句话“吾不写党史，国民党无真史也！”。作为经济学家，周德伟奉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参预社会政治与经济以避免极权统治，但他又信奉儒学，与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思潮针锋相对。他一生坚定地致力于创造中国文化道统并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相融会的理论体系。中国社科院的学者贺照田评价周德伟时说“殷海光先生只比时代超前一点点，所以大家了解他；周德伟先生比时代超前太多了，所以不易为人所了解。”

我的眷村

文/朱天衣

生长在一个知名的文学家庭，其父朱西宁、其母刘慕沙，均是著名作家。朱天衣在家中排行第三，其姐朱天文、朱天心也是著名作家。年轻时爱好评剧与民谣演出，曾以民谣《深秋浓浓的枫红里》获得金韵奖。著有小说《甜蜜梦幻》《三姊妹》《下午茶话题》《带我去吧！月光》《朱西宁的文学家庭》《朱天衣散文集》《我的山居动物同伴们》等。其他著作有《朱天衣的作文课》《朱天衣说故事》等。



图二十八 朱天衣

从小在眷村长大，使我一直错觉以为这里就是所有，就是全世界。当我长大后，才明白孩提时，自己真的是一只青蛙，而眷村就是供我生长的那口井。

从小到大，我待过三个眷村，分别是桃园大溪的“侨爱新村”、台北板桥的“妇联一村”及台北市的“内湖一村”，也就是说，在12岁前，我整个童年都是在眷村度过的。



图二十九 1956年于雾峰建立的光复新村成为二战后台湾第一个新市镇。

我两岁前是住在“侨爱新村”的，父亲虽已在台北军中电台服役，但却没能分到就近的眷舍，只好每天长途跋涉通勤于台北、桃园之间，有时加班没赶上桃园回大溪的末班公车，便要徒步两个钟头才能到家，即便有三轮车可搭，父亲也会省下车资，为我们姊妹仨买饼干，有时脚气严重，还是宁可歪着脚板走十几公里回家，那时我还是个奶娃，一切都浑然无知，直至后来迁居桃园，常往返这条路，才知道父亲的辛苦。

前一阵子，和两位姊姊回到“妇联一村”去缅怀旧事，以那仅存的几个建筑物为坐标，细细寻觅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上学的路径、打预防针的卫生所、村子周边的小市场……当我们在细数过往时，竟然发现在同一个环境中长大，彼此所记得的却是如此参差，也许是因着年龄的差距、玩伴的不同，所以三个人在成长中汲取的也会不同。

对姊姊们来说，“妇联一村”是她们人生伊始，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我欣羡她们能记得那么多，且都是连贯的，那时才3岁的我，记忆都是片段的，我只记得那时庭院是以竹篱笆圈围，还用公共厕所，烧饭煮水是用煤球炉，马路则以碎煤渣铺就，那煤渣常卡在脚底与木屐间令人生疼，环境里种的多是尤加利(桉树)和羊蹄角，但树都不高，父亲和邻居叔伯也才30来岁，这样的居住环境，对随时还想“反攻大陆”回乡的父执辈们已足够了。

直到1963年葛洛莉台风来袭，适逢大潮海水倒灌，上游石门水库又无预警泄洪，位处中游的我们便被滚滚黄水给淹没了，幸好水漫至屋檐便打住了，大家还有天花板上的阁楼可躲。是后来长大后，才知道原来“妇联一村”所在的浮州里，顾名思义的就是块浮在大汉溪上的沙州，大水来时不闹水患才怪，这也是之后不得不迁村的缘故。

在这之前，父亲因为是一起来台拜把弟兄中最早成家的，除了年节，即便一般休假，这些叔叔伯伯都会把我们这儿当家回，再加上文艺圈的朋友不时也会来家吃饭，所以在经济上总是寅吃卯粮，尔后却因着这场大水，各方来的捐助金，使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得到了舒缓，而且因此得以分配到正兴建中的“内湖一村”，也该算是因祸得福了。

二

“内湖一村”是个中型眷村，因为是新建好的，各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厕所，而且是坐式的冲水马桶，厨房里也开始用桶装瓦斯炉了。配住在此的多是在“国防部”及情报单位工作的眷属，周围还有大型的“影剧五村”“宪光新村”“精忠新村”，我们的村子住了98户人家，其他村子少

说都有两三百户人家，也就是说，在我们眷村外仍是眷村，从我4岁起，就在这范围里活动、在这环境中长大，这让我一直错觉以为这就是所有、这就是全世界。

在学校，也都是眷村孩子的天下，每值开学要填写父母亲工作栏时，我们清一色填写的都是“军”，只有少数“公”或“教”，而本省同学则多是“农”“工”，或是一些我们看不懂的职业。在课业上、在那“国语”教学的年代，本省孩子在起跑点上便吃了些亏，他们回家又总有忙不完的农事家事，而且相较之下，他们的父母也不是那么在意功课，也因此，我一直觉得他们是沉默的、少数的、需要特别关怀的。当我长大后看到人口普查资料——外省人只占台湾总人口18%，算是少数民族时，震惊得不得了，才明白孩提时，自己真的是一只青蛙，而眷村就是供我生长的那口井。

在这几个村子围起来的天地里，间杂着几家杂货店、小面馆、小诊所、理发院……外带一间小戏院、一个小菜市场，生活机能就完备了，无需他求就可自给自足了，即便其中许多店家摊贩不是住在眷村里，也不是外省人，但是当打烊收摊后，他们就自动消失了，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打哪儿来、每晚又退回到什么地方，就像电影里的布景道具、临时演员，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生活所需。

三

而在眷村里，生活中更基本的柴米油盐则是采配给制，由专人拉着车送到村里来，每当听到摇着铃铛的声音，便把眷补证、米袋、油罐准备好，我很记得那眷粮本子的模样，里头用虚线分隔着，写着米面油盐，另有煤代金可领，还分大口小口，一般人家绝对是够吃的，像我们家客人多、狗猫多，每个月就必须向邻居转买些米票，或拿面粉换米，只要别公然交易就好。

有时也会有一些活动摊贩来村里兜售，挑着扁担卖炸臭豆腐的，骑脚踏车卖冰淇淋、麦芽糖的，三轮小货车卖的则是饼干，那饼干装

在长方形的铁桶里，桶子向外的一面是透明的，可以清楚看到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避免铁桶开开关关饼干会受潮，买的时候是论斤秤的，那种拿在手上一根杆子的秤。当时做生意好方便，手握一根秤就可以走天下了。

最受小孩欢迎的就是爆米花了，老板会在村子的广场摆上好大阵仗，我们小孩玩得再热闹，顿时也会作鸟兽散，有的回家淘一奶粉罐的米，有的则围在一旁闻香凑热闹，我们家米都不够吃了，当然只有围观的份，大家等的就是那最后一响，“砰”的好大一声，接着就看到雪白蓬松的米花滚进铁网里，有的人家就这么吃了，讲究点的会拌上浓稠的糖浆，再压在木头模具里切成一块一块就好打包回家了，这算是小时候比较高档的零嘴了。

那时节，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父亲们拿的军饷饿不死人，但也好不到哪去，日子过得如何，端看这家女主人如何持家，经心些的，便会利用面粉做出各式各样的点心来打牙祭，北方家庭的包子馒头就不用说了，包着肉馅的饺子烧卖也都是自己和面擀皮，我的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客家人，兴头来时，也和邻居妈妈学着做面点，芝麻包子、甜咸烧卖都是儿时记忆深刻的面食点心，有时连酒也酿，最常见的是葡萄酒、李子酒，有一次连芭乐(番石榴)都拿来当酿酒食材，记忆中那味道实在不怎么样，难怪会被尘封起来，大概每个人家床底都有几坛这样弃之可惜、食之又不怎么样的酒吧！

后来台湾外销慢慢发展起来，妈妈们便从工厂批一些手工回来贴补家用，最多的是圣诞装饰，那五光十色的灯泡彩球及彩带，把原本平乏无奇的屋子都点缀得亮丽起来了，有一阵子接的手工是在毛衣上绣花，便可看到许多家里都摆着一个绷架，那粗粗的针线在画了图样的薄纸间穿梭，一朵朵花便这么绽放了，我家妈妈忙译稿、忙打网球，有一阵子还迷上钓鱼，钓来的鱼也不吃搁在水缸里养，算是村里的化外之民，为此我很欣羡那些会做手工妈妈的家庭，至少她们的儿女可跟着做、赚点外快。

不过，也不是每个妈妈都如此勤俭建家，像我的母亲终年养着一群不事生产、没人要的猫猫狗狗，大概早被划归异类之属，至于沉迷

于方城之战的妈妈也有，眷村里是不许赌博打麻将的，若有人耐不住一定要打，总会在桌面先罩上军毯，再铺上薄薄一张纸，为的是隐匿麻将牌碰撞的声音，我长大后看香港人乒乒乓乓打麻将，都觉得惊心不已。有一次夜半，父亲还在写稿，听到家里狗吠不已，开门张望，只见一个宪兵低声示意，要父亲管管狗，他们正在执行公务，后来才知道宪兵进村子是来抓赌的，被抓到会如何？好像眷补证会被扣点，这是偷听大人谈话得来的讯息，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不过，此事过后，那超爱打牌的邻居，确实收敛不少。

平时，依各家厨房里端出的菜肴，多半就能看出他们来自哪个省份，只有少数眷村情况特殊，成员才会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比如整个被服厂搬迁来的山东村，从缅甸撤回的云南村，而其他按军种或单位分配眷舍的，那一定是各省人都有，逢年过节可就热闹了。像端午节各家的粽子口味、馅料、形状都不一样，用蒸用煮也各有讲究，我们家除了客家口味的咸粽，还会包父亲最爱的家乡粽，那是什么馅都不添的白粽，吃的时候沾点面糖，单纯享受它的糯米香和竹叶香。端午当天还要上半天课，中午才给回家吃粽子，不过晨起到校时，每个孩子都会带几个粽子，放在教室讲桌上，这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粽子，待老师搬回家享用时，该像抽奖似的，永远不知道会吃到大江南北哪一省的风味粽。

四

过年时，更是每个妈妈大展身手的时刻，家家户户都会拿出压箱底的手艺，做出各式各样的年菜，有的家里挂着一条一条被竹箴撑开的大鱼，像旌旗般在风中招展，一走近他们家便可嗅到腐臭的海腥味，有的则是捆蹄、腊肉、熏鸡，外加一整副的猪肝、猪头皮，那猪的表情就像弥勒佛一般令人发噱，我的妈妈则是以客家菜为底，酸笋、长年菜是必备的，再搭配着从其他妈妈那儿学来的各种风味菜，我们家的年过得是分外热闹。

在诸多年菜中，腊肠是一定要灌的，但每家的都不一样，有的灌的是肝肠，也有灌豆腐馅的，有的偏甜，有的咸到打死卖盐的，还有的则辣到人呲牙咧嘴的，真可说是百花齐放，而且制作过程都得自己来，选肉、切块、拌料、灌肠，乃至之后绑成一节节的晾晒在竹竿上，整个工程繁琐得不得了，每天晨起要把它扛出去，不时还要拿针扎一扎，让里头的气跑出来，太阳下山了又得把它扛回屋里悬在客厅里，一不小心便抹了一头油，如果碰到阴雨绵绵，那可完了，没几天那腊肠便蒙上一层绿，吃是不吃呢？当然是用刷子刷干净了照样吃喽！

过年对我们这些小孩子可是件大事，那是一年当中最巴望的日子，除了吃不尽的糖果零嘴，新衣新鞋也盼了一整年，那年头每个家庭孩子七八个是正常，有的为了生个男孩，已“七仙女”了还不死心，更甚的“十三妹”都出笼了还继续“增产报国”，像我们家只生三个女孩就打住的简直是异数，还好孩子多、有政府养，柴米油盐不愁外，连教育费都由政府买单，这大概也是眷村孩子比较热衷念书的缘故，而且无恒产的我们，读书也是唯一看得到的未来。

家中孩子多，自然是能省就省，衣服总是大的传小的，穿到不能穿了还可以剪了做抹布用，若性别都相同，那还没什么大碍，最怕上头是个姊姊，做弟弟的还得捡那娃娃鞋穿，就算把蝴蝶结给拔掉，但那终究是双女鞋，穿到学校是会被笑话的，所以过年时有新衣新鞋穿，可就是件极其伟大的事。我的妈妈在这方面是很细心的，平时偶制新衣，都会为我们姊妹仨一起准备，且是一式一样的新装，摆明了我无需等候就可穿的和姊姊一般美，这大概也是我们家孩子少才讲究得起，有的家庭窘迫些，过年的新衣干脆就买制服，既有新衣穿，开学个子长大了，也不必再添购制服，虽说是一举两得，但看了总是令人心酸。

压岁钱当然也是孩子巴望过年的主要原因，虽然多半时候只能当个过路财神，马上就被妈妈收了回去，但那份喜气仍是令人雀跃，我们家的压岁钱倒是会分些给孩子用，老大分得三分之二，老二分一半，我虽只得三分之一，但家中客人多，这无数个三分之一加起来还是很可观的。我拿到压岁钱第一件事就是先买两把玩具枪，左一把右

一把好不神气，接下来还会买一大瓶玻璃瓶装的汽水，和玩伴们躲到树林里喝个够，平时就算请客，孩子们顶多能分到半杯饮就不错了，喝的时候要抿着嘴，像喝烈酒似的享用，唯有过年靠着压岁钱才能痛快畅饮，但往往喝不到半瓶，肚子便给撑到快爆炸了，这也才真明白了它为什么会叫“汽”水。

当孩子们口袋或多或少装了些钱之后，便要不安分起来，每年必上演的鞭炮大战于焉展开，我们村子中央是条五米宽的马路，两边房舍呈“非”形排列，因为孩子实在多，平时多是前村、后村各玩各的，井水不犯河水没什么瓜葛，但过年期间，总会有一边先挑衅，随即两方人马便各据马路一头开起战来，一时间冲天炮齐飞，大龙炮、水鸳鸯也当手榴弹丢掷，后来为求准头，把塑胶管都搬出来，一人扛着炮在前头瞄准，另一人在后头点燃冲天炮，就像火箭炮似的颇具杀伤力，但这样你来我往，倒不曾发生过什么意外，最伤的是钱包，最后输赢但看哪方财力雄厚，而我的压岁钱每年几乎都贡献在这场战火中了。

五

平时村里是不给车进入的，老实说那时也没什么车可进来，所以那五米宽的马路完全是我们嬉戏之处，这条路的两端又有两个广场，一个是载爸爸们上班的交通车停放处，另一头则放了篮球架，供青少年发泄精力，不过有时也会在此放映电影，多是一些黄梅调和美国西部片，只要傍晚广播有电影可看，大家吃完晚餐就会搬个小板凳到搭起的布幕前排排坐，这是大人小孩都开心的事，有时电影不那么好看，我们小鬼便会蹓到布幕后倒着看，看得有些头晕了，再乖乖坐回原来幕前的位子。

说到广播也是眷村里的一大特色，平日有什么大事都靠着它告知，除了电影、晚会的预告，要查户口名簿、要发老鼠药，以及年前大扫除的清洁比赛，都得通过它广为宣传，连谁家有电话要接也由它昭告天下。

还好这事很少发生，整个村子就那么一台电话，若哪家真被叫到村办公室接电话，还真有些胆战心惊，毕竟没什么好事是需要即刻以电话告知的，至少我记得住在那儿的六七年间，我们家就没被叫唤去接过电话，好像也没因此错过什么，那真是一个不需要电话的年代呀！

在眷村中最如鱼得水的就是孩子了，一旦进入青春期便躁动得厉害，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完全不明白那些大哥哥、大姊姊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他们变得凶得不得了，偶尔照面总是怒目相向，我们也都知趣地避开他们远远的，尤其是那些大男生常聚集偷抽烟的角落，更是连经过都不敢，尔后便会传来他们打架滋事的消息，轻则学校记过、回家被老爸痛打一顿，严重的则被送去少年监狱管束，当时很多小女生暗恋的一位大哥哥，就听说犯了抢案，当时台湾还处在“戒严”时期，结伙抢劫是可以枪毙的，后来直至我们搬离眷村，都没再看到他，我真的不知道他后来是如何了。

功课好的升上中学，一样是翻脸不理人，在家像刺猬般令人生畏，生活空间的拥挤，更加深了那火药味，我们家人口算少的，挤在十来坪的空间尚且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何况是那些十来口的人家，简直就像是坐卧在火山口般随时等着爆破。经济条件较好的，就开始有购屋搬迁到外头的打算。

我们家算是比较早迁出的，那时大姊已然高中二年级，每天换衣服都要躲躲闪闪的，因为眷村里是没有私生活可言的，彼此串门子连招呼都不必打，直接就登堂入室了，孩子们更是随时破门而入，所以父亲终于狠下心在台北另一隅，找了个适合狗猫居住的新社区，买了间透天厝。所以会说“狠下心”，除了经济上的负担，还有更深层的痛楚，因为一旦置产购屋，那就表示要在这南方岛屿安居落户起来，不打算回乡、回老家了。

也差不多在此同时，许多还打光棍的叔叔，也陆陆续续成了家，是因为返乡无望了吗？而因着他们年纪都不小了，也因着种种原因，在择偶时，他们并不挑剔，许多娶的是梅开二度、甚至已有小孩的女

子，要不就是身心残疾的女孩，相较于本省人重男轻女的观念，这些“外省兵”都很疼老婆，所以他们的婚姻多半都是和谐的。

从小把我们当自己孩子的叔叔伯伯们，每当有了对象时，一定会带回来给我的父母掌掌眼，最记得其中一位蛙人部队的叔叔，最得我们姊妹仨的欢心，只要一听他放假，我们一定是欢声雷动，因为每次他来家都会当马让我们骑，还会带我们进城看电影，许多迪士尼的卡通都是他带去看的。在我五年级时他结了婚，我还代表家里参加了他的喜宴，多年后，这阿姨却因为精神官能症吞药自尽，留下一个女孩，这让我的叔叔伤透了心。

当初从大陆来到台湾时，他不过是个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他很爱看书，写得一手好字，又长得高大英挺，帅得不得了，他直到年过40才成家的，我不知道他一直不婚，是不是家乡有心爱的人，正如我不知道当他娶妻时，是否清楚这女孩其实一直为精神疾病所苦，幸好后来再续弦时，也不是第一次婚姻的新阿姨，为他生了个儿子，一脉单传的他，“终于香火有续，不会愧对祖宗了”，这是晚来得子的他，在给父亲书信中的慨叹。

我们是在1972年搬离眷村的，到处都看得到“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标语。那时我“国小”毕业升“国中”，告别眷村的同时，也正是我童年结束的时刻。

资讯：

眷村的一生

眷村诞生于1947年，她的出生与随国民党军撤台而来的女人和孩子有关。在台湾，这种地方军队家属院不叫“大院”，也不叫“家属院”，叫“眷村”。

台北市的第一个眷村出现于1948年，以“四四南村”命名，这个眷村的住户，全是联勤总部第四十四兵工厂的家眷。

眷村的暴发式出现，发生在1949年。60万撤台人马，急需安身之处。最迅捷的建屋方式就是建“克难小屋”。泥与稻壳混凝打底，竹子当上半截墙，就这样建起会透风漏雨的房子。地面紧张，前排后排侧身而过，家家户户哭笑相闻。由竹篱笆隔开眷村与外面的世界。

这种住房一直住到1956年，这一年，在台湾，工商业界开始响应宋美龄的号召为眷村捐款。

眷村和眷村的孩子一同长大，1970年以后，第一代眷村老迈年高摇摇欲坠。这时台湾的军费已经充实，军方拨款加自筹，拆迁重建时，人们住进了钢混结构的建筑。从此开始，10年时间，竹篱笆完成了使命，成为老照片。四四南村在1999年5月4日突然出现了大动静，所有住户迁出。这里及周边半公顷的区域，被辟为眷村文化保留区，建立“眷村博物馆”。而其他眷村将陆续拆完。

眷村42年的生命中，养育了一大批今天活跃在各个领域的孩子，演艺界的邓丽君、林青霞、潘安邦、张雨生、任贤齐；作家朱天心、朱天文、朱天衣姐妹，朱天心被称为“眷村文学”第一人；剧作家王伟忠把他生活过的嘉义“建国二村”搬上舞台，成为《宝岛一村》；杨德昌的眷村经历搬上银幕后，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曾经历类似于牯岭少年岁月的吕代豪，当过帮主，住过8年牢，他的金不换的故事是，在美国取得教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并回到台湾创建拓荒神学院。

(整理/杨东晓)

金门：因战而兴 因和而变

文/李福井

1950年出生于金门古宁头南山村，从事新闻工作近40年，现返乡研究金门战史及从事口述历史访谈，著有《1949古宁头战纪》等书10余种。



图三十 李福井

战争的终点，就是和平的起点，金门和马祖不再随时准备成为战场，回归了它的地理本色。

1949是历史的关键年，中原大地逐鹿何其之大，但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却是一个蕞尔小岛，位处福建省九龙江口的金门；像1650年代南明的历史一般，金门又适时扮演历史之樵的角色。金门的小历

史，决定中国大历史的格局。故事应从1949年古宁头战役(大陆称为金门战役)谈起。

解放军遭遇了“解放战争”以来第一次大挫败，使得风雨飘摇退守台澎金马的国民党政府惊魂甫定，获得喘息机会。

古宁头战役一刀割开了台湾海峡，从此两岸走向分裂分治的局面，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渠道，它的影响历久不衰，有人认为有如晋朝的“淝水之战”或三国时代的“赤壁之战”。

被战争改变的金马



图三十一 金门莒光楼

1949年之后解放军为了再攻金门，国民党军为了反攻大陆，国共两党惨烈的斗争，在金马地区不停上演。这时的金门驻守10万大军，实施军管；1956年开始实施战地政务，金马成为前哨阵地，人民以军法审判，政治肃杀，全民皆兵。

金马的人民困守在战地的牢笼里面，一切只能俯首贴耳，仰承上意。战地政务锢蔽了思想，锢蔽了土地，锢蔽了政治。但是它有一个

好处，10几万大军供给了金马人民经济的奶水。而与此同时，高压统治与白色恐怖如影随形。万一讲错一句话，就会请去唱“绿岛小夜曲”。

这时金马虽然也实施所谓民主投票，但都是同额选举，只能选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有关当局为了提高投票率，渔民甚至要投票才准许出海。如果有人敢于出马挑战党的候选人，人若在金门，军方就千方百计约谈，威胁利诱退选；人如在台湾，就公然以行政手段干预，阻挠候选人回乡参选、发表政见。

金马人民被关进政治牢笼里，而沿海土地如出一辙，早都布满层层叠叠的地雷，围上铁丝网，成为军事管制区，任何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土地与人民的发展，都受到严格的钳制，只能无语问苍天。

只有十万大军的经济奶水，造福了一方百姓，成为战地政务时期的利赖。金门驻守大军的地方，都发展成新兴的城镇或村市，主导地方的兴隆，那时在乡村有柑橘店、洗衣店、冰果店与餐饮店，老百姓随便做一点小生意，都可以维持一家子的生活。

金门的东半岛有太武山雄峙，因此成为军事重镇，山外与下庄、沙美与阳翟就是这种城、乡型发展的典型。而山外的新市位于太武山南，紧邻军事指挥中心，1958年“八二三”炮战之后，成为新兴城镇的翘楚。

山外此时每逢假日军人阗塞，电影院、小吃店、冰果室与理发厅，时常挤满了军人，而精神食粮的书店更是门槛为穿，山外之热闹盖过了金门的行政中心后浦(亦称金城)，一间店铺高达2000万新台币(下同)，大家还惜售。

山外做什么生意都赚钱，老板常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吃午饭。金门东区的崛起，写下战地政务的传奇，不晓得造就了多少千万富翁。源成书店的老板李文块，古宁头南山村人，1957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手经营一家书店，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也见证了山外的兴衰起伏。

李文块开门市兼营书籍批发生意，金门当时有18家书店，他从早上8时到下午3时一直埋头写批发单；这时的源成是金门第一大书店，名声响亮，假日阿兵哥的人潮常将书店挤得水泄不通。

李文块向台湾出版社划拨买书，每常要汇款结账，那时金马实施金融管制，钞票印有金门或马祖专用，即使要汇出去一块钱都很麻烦。他说一张身份证一月只能汇1000元，然而他的营业额大，每次汇款把整条街的身份证都借光。

每次为了汇款问题非常伤脑筋，然而他跟阿兵哥的交情好，有一次某一连部的补给士用手帕包了50张补给证给他(补给证约等于军人身份证)。他拿到山外军邮局，向柜台服务人员说今天要汇5万元；邮局质疑老百姓怎么会有军人补给证，此事爆开闹到军政当局那里，终于每月准他汇5万元，他如获大赦，满心欢喜。

后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不要说2万元，每月甚至于汇到二三十万，邮局都给他通融。他的书店不知赚了多少钱。源成书店只是战地政务时期的一个缩影，庶几可以举一反三。

和平，金马回归本色



图三十二 古宁头牌楼

金马受到战地政务的桎梏，1987年当台湾解除“戒严”，金马民众也上街头与夜宿“立法院”抗争，终于在1992年11月7日解除“戒严”与战地政务，实施民主政治，还政于民。金门与马祖脱离了战地的角色，不再是蒋经国所说的反攻大陆的两个拳头，回归到它的地理本色。

2001年2月1日金马实施“小三通”，成为两岸和平的试点与交流的平台，和平带来了新的愿景与希望——开放观光。

政治与思想“解严”之后，海岸也跟着“解严”，金门要在2014年扫除所有海岸的地雷，让土地从此获得充分的自由。两岸的和解，土地的自由，带来了发展的希望与商机，社会的变化于焉开始。

金门发展观光的四大特色：战役史迹、闽南文化、侨乡文化与自然生态。

金城是文化镇，后浦2012年入选台闽地区十大观光小镇之一，市区有模范街，1924年兴建，融合中西建筑风格，古朴而典雅；清遗总兵署，有200多年历史，古榕蔽空；清嘉庆朝邱良功母亲节孝坊，是金门唯一一级古迹。

郊区的古岗有翟山坑道，宏深而壮观；金门城有文台古塔、碣石与金门老酒厂；水头的得月楼，是金门的地标与侨乡文化的代表。

金湖是商业镇，从繁荣到没落，左近的太湖区有榕园高荫，慰庐曾是两蒋的最爱，旁边有“八二三”战史馆与俞大维先生纪念馆。

金宁是战役史迹乡，古宁头战史馆、林厝和平纪念公园，与北山古洋楼——当年解放军作战的前线指挥部；濒海有北山播音站，为冷战时的代表。

沙美是农业镇，金门的吉祥物风狮爷数目最多。山后的民俗文化村，整体宏观的闽南式建筑风格，在金门无出其右；邻近的狮山炮阵地有八英寸的巨炮，定时表演炮操；东北角的马山最接近大陆，有坑道与播音站遗址，当年林毅夫在此地当连长，乘夜泅渡到大陆。

烈屿是自然生态乡，风景秀丽，风鸡、北风爷是其图腾，镇风辟邪与风狮爷异曲同工。烈屿文物馆收藏甚富，可见战地政务时期之一斑；湖井头的战史馆纪录冷战史；黄厝的勇士堡与铁汉堡，有地雷展示馆。

金门现今设籍人口将近12万人，常住人口约在5万左右，然而行库的存款有800亿，在大陆买房超过1万套。金门人经济向左，政治向右，金门当前的发展，端赖结合两岸——台湾的政治松绑与陆客自由行。

战争的终点，就是和平的起点，两岸如能在古宁头战场建碑、迁葬、公祭、安魂、立庙，哀悯国共两军战死的军魂，记取历史的教训，建立和平广场，“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金马就可以彻底非军事化，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经济特区。

高雄：“美丽岛”往事

文/杭之

本名陈忠信。1970年代参与台湾民主运动，任《美丽岛》主编。因“美丽岛事件”系狱四年。出狱后从事写作。



图三十三 杭之

美丽岛事件的发生，是台湾社会的不幸，但台湾民主化的历史进程确实就如古诗所吟：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高雄是台湾南部的最大都会，也是台湾最大的港都。17世纪荷兰人入据南台湾时，高雄(当时称为“打狗”，系汉人依原住民族方言takau之音译)已逐渐形成渔港。《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后，日本人于20世纪初，开始有计划地将高雄港整建成现代化港口，为殖民势力向南扩张作准备。二战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旋即在国共内战中失败退守台湾，高雄是重要的工业重镇，高雄港为东南亚、印度洋与东北亚间重要的海上航运转运中心。

位处热带的高雄，有着浓浓的南国风情，相较于温带北台湾的另一都会台北，在风土人情上，自是另一番风味。从清治后期，经日据时期到国民党统治以迄于今，经过不到200年的发展经营，高雄的都市风貌已颇有可观，除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外，也保存不少中式传统建筑、近代西式建筑。市中心区域的道路网呈棋盘式，其路幅之广阔，在全台各城市中数一数二，其中有10条东西向的主要道路，以“从一数到十”命名，由南到北依序以“一心、二圣、三多、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十全”为名。

在五福与六合之间，横贯着两条大道，其中一条叫中正路(一如台湾其他城市，到处是以蒋介石的名字命名的马路)，与通过火车站、南北纵贯通抵高雄机场的中山路(这是以孙中山之名命名的)，在市中心地带交会，这个地方叫“大港埔圆环”。这里的地下，是高雄捷运红、橘两线的交会站。这个车站就是有名的“美丽岛站”，由日本建筑师高松伸设计站体。车站主体建筑为圆形，直径达140米，为全世界最大的地下圆形车站。圆环四边捷运出入口以“祈祷”为主题意象，彷如双手合掌的“祈祷”，象征着抚平历史的伤痛，引领人们走向和平、祥和的境界。

这座曾被美国旅游网站BootsnAll在2012年评选为全世界最美丽的15座地铁站第2名的美丽岛站，除车站内部的设计外，更可看的是穿堂

层的穹顶大厅。这是由意大利艺术大师Narcissus Quagliata创作的“光之穹顶”(The Dome of Light)，为全球最大一体成型的单件玻璃公共艺术作品，其直径达30米，穹顶面积660平方米，共享了4500片玻璃窗面。支撑穹顶的两根大圆柱，一根是红色，代表“阳”，一根是蓝色，代表“阴”，象征着阴阳相融、交会以成万物，而穹顶的创作主题分四大区块，依顺时钟方向依序为：水——生命的孕育；土——繁荣与成长；光——创造精神；火——毁灭与重生四大主题，讲述宇宙与人的故事。

在美丽岛站的建筑意象与站内公共艺术的精神呈现上，环绕着生长、繁荣、毁灭、重生、祈祷……这一切的创作精神元素，都跟美丽岛站所在的“大港埔圆环”30年前发生的“美丽岛事件”(或称“高雄事件”)有关。美丽岛事件是台湾20世纪后半叶重大的历史事件，直接影响了台湾政治民主化发展进程的推进。

1979年12月10日，全台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以庆祝国际人权日为由，在高雄大港埔圆环附近美丽岛杂志社高雄分社前集结群众，并试图游行前往演讲会场。出发不久，游行队伍即被“镇暴部队”阻挡于大港埔圆环，军民对峙一阵子后，军警发射催泪瓦斯试图驱散群众，引发民众与军警激烈之流血冲突，党外人士于是退回杂志社前演讲，而军警也数度采取施放催泪瓦斯等行动，试图驱散群众，以致爆发几波军警民冲突，至隔日凌晨群众始逐渐散去。



图三十四 美丽岛事件游行

12月13日清晨，国民党政府展开行动，以“涉嫌叛乱”罪名将张俊宏等14人逮捕(施明德在“警备总部”人员围捕下脱逃，黄信介则因具有“立法委员”身份，需待“立法院”决议同意始可逮捕)。接着，陆续逮捕黄信介、施明德，全台被捕者近百人，美丽岛杂志社及全台各地服务处均被查封，《美丽岛》杂志以外的“党外杂志”，如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倾向工农路线的《春风》等，均被停刊。经过两个多月的秘密侦讯，军事法庭起诉黄信介等8人“涉嫌叛乱”，高俊明牧师等10人“涉嫌藏匿施明德”；另外，魏廷朝等33人则由台北地方检察署以刑法“暴行胁迫”起诉。

大逮捕前后，威权政治体制下的台湾社会，上上下下弥漫着“猎杀女巫”的气氛，美丽岛政团人士迅即被“破坏安定的非理性行为”“暴力集团”“叛国集团”等挞伐之声浪淹没。然而，由于大逮捕所牵连人数近百，社会上口诛笔伐所营造出来的气氛太过肃杀恐怖，为“二·二八”事件以来所仅见，一些稍微冷静的思维在这片肃杀氛围的夹缝中慢慢伸展出来，呼吁政府当局“哀矜勿喜”，审慎处理本案，海外人权团体、留美学界也陆续出现类似的声音。一些留美学界人士更推请作家陈若曦携带致蒋经国的联名函回台见蒋。

由于台湾内外的呼吁与世界舆论的压力，蒋经国决定公开审判这一群异议人士，全程开放中外媒体采访。这在国民党统治台湾的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

经过大约半年左右的秘密侦讯、公开审判，施明德被处无期徒刑、黄信介14年有期徒刑、林义雄等6人12年有期徒刑。另魏廷朝等33人被分别处3至6年不等的徒刑。至此，这一事件暂告一个段落。总结此案，堪称台湾继“二·二八”事件“中坜事件”之后最激烈的军警民冲突事件、政治事件。当天的冲突事件，通称“高雄事件”，连同其后的“美丽岛大审”，史称“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事件”后来对台湾历史进程的发展，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都起了关键性的影响。这一事件使蒋经国去世前放弃国民党一党专政路线，并实质开放了党禁、报禁、老兵返乡探亲等，这些措施及其后续一连串作为，使台湾社会逐渐从政治管制下的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的民主社会。

旧政治与新势力

“美丽岛事件”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偶发事件。它是当时台湾内外情势下，虽非必然，但在统治者与反对人士互相猜忌的角力下，很自然就会产生的政治、社会冲突事件。

蒋家在国共战争中败退来台，前有“二·二八”事件的镇压，后有1950年代的白色肃清，并在国际冷战对峙格局下，对台湾实施硬性威权统治。这一切到了1970年代前后有了变化。

当时，蒋经国准备全面接班，他巧妙运用这内外情势，一方面允许并鼓励一批呼吁改革的青年菁英(以知识界、企业界为主)，以《大学》杂志为阵地，推动青年政治改革运动；另一方面，在1972年正式接任“行政院长”后，推动“十大建设计划”、启用高玉树、谢东闵、林洋港等台籍菁英，并办理“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的定期“增补选”。“增补选”是指1947年选出者继续任职，代表大陆各省“民意”，但在台湾直接由人民定期“增补选”比例很低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监察委员”，以加强民意代表性，也补强日渐凋逝的所谓“法统”。一系列的革新措施，进一步巩固了蒋经国的权力基础，也营造了“新政”的气象。

然而，当时台湾所面对的内外困境并没有因而解决，也不能满足新兴社会力量的革新要求。这是一种补强式的有限度革新。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仍然牢牢罩着台湾社会，只是从“硬性的威权统治”转型为“软性的威权统治”。

大约在1973年，蒋经国全面接班已顺利完成。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新兴力量集结起来挑战国民党威权统治。其后历经1977年的“中坜事件”，到1978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一个新兴的民主运动已基本形成。

“中坜事件”是当年县市长改选，桃园县长候选人许信良的支持者发现，在中坜一投开票所进行开票作业时有“作票”舞弊行为，要求检察官处理，群众认为检察官的作为偏袒舞弊者，导致激愤的群众包围中坜警察分局，最后并演变成火烧警察局的冲突事件。这一事件对接下来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影响。

受这次事件及该次选举众多党外人士当选，党外人士大受鼓舞，于是在即将到来(1978年底)的“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增补选中，准备大展身手，在全台各地展开组织化的串联、整合。一时之间，各种讲述政治改革理念的所谓的“党外书刊”如雨后春笋，最后并由黄信介领军

组成“党外人士助选团”，提出“共同政见”，主张推动“十二大政治建设”，包括解除1949年以来就存在的“戒严”“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市长”直接民选等。这种组织化的竞选组织及政纲式的共同政见，是1949年后所未曾有的(日据时期反对殖民统治时有过)，因此，朝野之紧张、冲突不断，但因年底的选举将届，国民党也不敢大规模镇压，一直保持斗而不破的姿态。这使得这一次选举的热度与紧张程度前所未有。

正当“选举”进入最紧张激烈的时刻，12月16日凌晨，突然传来华盛顿将与台北“断交”，并与北京建交的消息。蒋经国决定中止还有一星期就要投票的选举。一时之间，“朝野”各自都有着深深的危机感。在国民党方面，右派保守强硬声浪高涨，攻击随后来台商讨后续双边关系的美国特使，跟踪党外人士，以大量文宣丑化党外人士。其中最荒谬的是一封《南海血书》，声称是渔民在南海荒岛海边捡到血书，写者以海螺尖刺在身上，用血写成，最后失血而死。“血书”控诉“民主斗士”使越南赤化，以影射党外人士。在党外人士这边，担心国民党将会采取高压手段来对付党外。这时，台湾内外情势诡谲，不可逆料。

血色美丽岛

果然，1979年是风雨的一年。党外人士经过商讨，计划于1月29日由台北南下到高雄进行拜年活动，沿途散发“党外国是声明”，并于2月1日在高雄举行千人餐会。不料，1月21日清晨，党外元老余登发(曾任1947年在南京的首届“国大代表”，后任高雄县长)被捕，罪名是“涉嫌叛乱”，因为有一名几个月前被捕的“匪谍”曾将一“革命动员第一号令”经余登发的儿子交给余，并派余为“高雄台南地区最高指挥司令”。

这一荒唐的所谓“叛乱”及逮捕行动，使党外人士相信原先的判断是对的，国民党将开始出击，采取高压手段。于是，一致决定“游行抗议”，地点是余登发的老家高雄县桥头乡。此为台湾“戒严令”下第一次示威游行，很多参与者事先都曾慎重交代后事，因为这在当时是可判死刑的“叛乱罪”。

游行过后，双方持续处在一种“敌对僵持”的状态。党外人士要求放人，国民党则态度强硬，迅速将余登发等判刑，并封闭党外杂志，将参与游行的桃园县长许信良以“擅离职守”送“监察院”，还发动桃园各界围剿，在其宿舍围墙喷漆“许信良是共产党”“打死共产党”，最后民选的许信良被“惩戒休职二年”（即剥夺剩余任期）。

党外人士这边则再次以“拜年”的名义在桃园游行，并在5月26日以许信良庆生为由，在中坜举办户外餐会及演讲会，吸引超过二万群众参与，是党外在选举期间之外第一次大型群众集会。算是再一次突破戒严令的钳制。但僵局并未打破，冲突、对立、压制行动仍然持续。

为了自保，党外人士加紧集结，企图以常设组织的方式将全台各地的反对力量组织起来。几经商讨，决定由黄信介等人筹设兼具宣传、运动、组织的杂志社，此即“美丽岛杂志社”。杂志社的社务委员广纳全台党外人士，包括已独自创设《八十年代》杂志的康宁祥等人，乃至主张工农路线的《夏潮》杂志社相关人士，并在各县市陆续成立服务处。一时之间，全台左中右各派都集中在《美丽岛》旗帜下，所以后来有人以“美丽岛政团”称之。

杂志创刊号在8月中旬出刊，旋即轰动，一再加印，最后销售数达7万本，而且一期比一期高，最后的第4期更创下14万本的纪录，可能是台湾政论杂志的最高纪录。短促的4期杂志中，除了具体从政治、经济、社会、工农渔，乃至文化、法治等各方面抨击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施政，更探讨韩国、尼加拉瓜等独裁统治，批判的尖锐，大概20年前《自由中国》杂志被封闭以后所未有。杂志在“发刊词”等处一再强调要“让民主永远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并且一再呼吁国民党，面对当时台湾的内外危机，“要有智慧有勇气抗拒军事统治的诱惑，用更完全的民主来满足社会的意愿”。

杂志社除出刊物外，更在各地办座谈会、演讲会等活动，以及成立各地服务处。施明德说得更清楚，这是在“党禁”不准组党下，一个“没有党名的党”。

事情发展到美丽岛杂志社以运动的方式朝向实质组党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对这样的挑战愈来愈不能忍受，其内部右派激进力量高涨。9月初，美丽岛杂志社在台北中泰宾馆举行创刊酒会，就出现一群所谓的“反共义士”在会场外闹场，辱骂党外人士是“卖国贼”，并攻击出席酒会人士，扬言将以暴力对付党外人士。

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下，美丽岛杂志社计划于12月10日在高雄市扶轮公园举办“世界人权纪念日”演讲大会。但国民党政府一直不批准。由于过去类似活动常到最后一刻才被批准，且几个月来紧张气氛持续升高，同时为了凸显人权日的意义，以及国民党对人权的践踏，美丽岛杂志社决定如期举行。而国民党方面则一再恐吓警告。双方剑拔弩张，山雨欲来。

12月9日晚，杂志社高雄服务处的宣传车在市区广播第二天的活动，于鼓山分局附近遭警察拦阻，两名义工被拖进分局殴打，然后押送南区警备司令部。消息传回服务处，群众集结鼓山分局要人，僵持到半夜，才由两名党外人士前往南区司令部带回浑身是伤的两名义工。该晚这一被称为“鼓山事件”的发生，使全台各地党外人士群情激愤，原先并未计划前往者也纷纷前来，主战派声音取得主导权，游行势在必行。

面对这一形势，国民党政府调动宪兵、保安警察、镇暴部队和镇暴车在市区部署待命，并由南区警备司令及宪兵司令指挥。在一阵折冲之后，南区警备司令透过中间沟通的一位黄姓教授亮出最后底线：室内演讲，不准游行。黄教授被党外主战派轰出去。结果，经一番折腾，最后，冲突发生，镇暴部队喷瓦斯欲驱散，群众冲破封锁，镇暴部队再伺机喷瓦斯驱散。

就这样，历史的悲剧再一次发生。历史的下一步如何发展，也在等待发牌。关键的发牌人是蒋经国。

蒋经国选择公开审判。虽然在审判前的2月28日发生林义雄家祖孙4人惨遭杀害(只有长女救活)的命案(这个命案迄今未破案，一般认为跟美丽岛案有关，但没有证据说这是蒋的下令，也没有证据说蒋完全置

身事外，至今是悬案)，但美丽岛案本身没有像过去白色恐怖以来的案子常有见血，是一个事实，这使后来的民主转型更少仇恨，纠葛少了一些。

在林家血案的悲戚气氛中，军法大审展开。被告及辩护律师除对事件当天的相关情节展开辩护外，更将答辩层次提升到戒严体制的“合宪性”、台湾的前途等政治层次，俨然一场政治见解的攻防战。

经过媒体成篇累牍的报导，诸多在国民党戒严统治体制下的现象的合理性，开始在社会中被关注、被质疑、被讨论。许许多多过去因戒严体制而从不关心、不敢关心政治的人开始关心政治了，这无形中为不久之后出现的政治自由化、民主化铺平了道路。

堂堂溪水出前村



图三十五 美丽岛审判现场

当50余位反对运动人士被判刑底定之后，国民党决定恢复1978年底中止的选举。这时，党外阵营因美丽岛案，元气大伤，形同瓦解。但仍有19位候选人打着“党外”的旗帜参选，更有周清玉等3位家属“代夫(兄)出征”参选。国民党虽强硬放话，竞选中不准谈“美丽岛案”，但家属将“美丽岛案”当作诉诸台湾人民判决的机会，直接而大声地控诉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高压。

结果，3位家属都高票当选，周清玉还在台北掀起旋风，以超高票当选。其他以党外名义参选的康宁祥等人也多顺利当选。国民党想一

举扑灭党外势力的愿望落空。“党外”的香火延续下去了，台湾的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在20世纪的最后两个世代跌跌撞撞地上路了！

胡适晚年曾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送给被蒋介石关起来的雷震。诗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当年党外人士因受雷震的影响也常以此诗自励。

美丽岛事件的发生，是台湾社会的不幸，但台湾民主化的历史进程确实就像这首诗所吟的：堂堂溪水出前村。历史翻过一页，大港埔圆环仍然默默地伫立那里，圆环四周像是多了四双合掌祈祷的双手，祈求这片土地的和平、祥和！

第四部分

图腾与碑石

那些曾被高高供奉的图腾，终究在诸神退位后成为碑石。

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野百合

文/丁允恭

丁允恭，1976年生，曾任民进党主席特别助理，及台湾劳工阵线等社运团体理事。写作兼事文学创作与公共评论，曾获中国时报、联合报文学奖。



图三十六 丁允恭

无论大庙的碑牌，被统治者如何更改，这座庙前之埕，却早已属于群众，在这诸神退位的岛屿，事物真实的名字唯有系于人心。

1996年3月21日，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亲手揭下“凯达格兰大道”的路牌布幕。这条原本叫作“介寿路”的10线大马路，如今有了新的名字。

当时市府所进行的“空间解严”，不只是名称的更换，原本限行汽车的介寿路，如今也成了开放机车行驶的凯道。当然，远远在此之前，它就已经是群众运动汇集的场所。

“眼前开阔的凯达格兰大道，数年前仍然戒备森严。”在2000年政党轮替的就职演说中，踌躇满志的陈水扁，不忘提起这个正名工程的起始。

而在过去的介寿路底，还有一栋介寿馆，也就是台湾人民所熟知的“总统府”。

在通常的印象中，“总统府”应该是蒋介石来了以后，才取名叫作介寿馆；然而介寿馆这名字却是先于“总统府”而存在的。

1948年，原本的日本台湾总督府，此际的行政长官公署，在整修以后，适逢蒋介石60岁寿诞，遂命名为介寿馆，然而这时蒋介石却并没有在此过寿；而到了隔年，国民党政府迁台，才选定以此为“总统府”办公厅舍所在，蒋介石此际才成了介寿馆的正主。

一直到了2006年，陈水扁第二任任期里面，高高悬挂着的介寿馆牌匾，才真正地从“总统府”的大门口卸下，安静地躺在“国史馆”的仓库之中。经过了10个年头，名字的工程，才从外面的凯达格兰大道，走进了路底的“总统府”。

然而，沿着凯达格兰大道走回头，来到中山南路右转，下一个在概念里要被拆除的名字，在那边等着。

这是2007年，鸽群纷飞的广场，蓝瓦白墙的牌楼，上面还写着“大中至正”。“教育部”的主任秘书庄国荣，向媒体宣示，中正纪念堂所属的编制中正文化中心，将改隶“台湾民主纪念馆”，整体园区则是“台湾民主纪念公园”。

随后，中正纪念堂的正堂大厅铜门就以整修的名义轰然紧闭，也让铜雕座椅上的蒋介石巨像不见天日了整整5个月。12月6日，正在争议喧腾里面，吊车将八角屋顶下的中正纪念堂牌匾卸下，换上了“台湾民主纪念馆”的牌子，而隔天宛如大庙正门牌楼上的“大中至正”，则变成了王羲之字体的“自由广场”。大厅的蒋介石铜像则被其政权所屠戮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姓名包围，颇有面壁思过的意味。



图三十七 中正纪念堂内景

随着陈水扁政府逐渐陷入种种弊案的疑云，正名的工程，也成为蓝绿两党间，另一条战线。名字的工程，后来却变成了寸土必争的巷战。当“民主纪念馆”的名字，无论是行政上或是物理上都在原来的“中正纪念堂”挂牌了，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郝龙斌，则坚持着外面的捷运站仍然挂着“中正纪念堂”，非常形而下地实践“一个场所，各自表述”。

然而在各各自表述以外，却又难得让双方产生与常识背离的共识。为了阻止政敌的正名工程，去动任何一片砖砖瓦瓦，郝市府的文化局，指定“中正纪念堂”为“暂定古迹”；民进党政府的“文建会”，则为了管辖的权属，以及变更指定的范围，也跟进将“台湾民主纪念馆园区”，

指定为“国家古迹”。因为正名的争端，而让仅有27年历史的建物，荒谬地成为了古迹。

圣殿与庙埕



图三十八 台湾台北中正纪念堂

当然，说它是古迹，让我们都会深感忍俊不禁，但如果它不是古迹，在两厅院出现以前，它也不是如它的行政隶属一样是个“文化中

心”，那它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所？在许多人心中，它庶几就是一个庙宇寺院，里面拜着他们不愿去信的神。

中正纪念堂，是圆山饭店与慈湖灵寝的设计者杨卓成的又一重要作品，而从作者我们可以看出中正纪念堂在建筑学上的系谱。

从1966年，在大陆吹起“文化大革命”的号角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反制，也推动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鼓吹传统中华文化的保存。而在建筑方面，通过大型公共建物的兴筑，强力推展“正统”中国元素，同时又试图结合当代建筑，成为台湾当时建筑的显学。

后向地来看，这一波建筑浪潮，是中国北方建筑语汇的大量移植。然而对于当时的当政者与建筑师们而言，中国风并不是一个外来的Chinoiserie(具中国风味复杂华丽图案的艺术风格，尤指欧洲18世纪所摹仿的家具、纺织品、陶瓷等的花样设计或装饰)，而是对抗西式、日式，或日式的西式等建筑典范、一种本土的尝试，但这时候的“本土”，却是中国的想象。

而中正纪念堂，可以说是这波“现代化中国建筑”最后一次高潮。对比于其他公共建筑，中正纪念堂的纯粹政治性更为强烈。

在蒋介石去世后的两个月不到，“行政院”就“接受各界与治丧大员建议”，决议除了慈湖陵寝以外，还要在台北市由杭州南路、中山南路、爱国东路与信义路包围的心脏地带，建立一座“永怀领袖”的殿堂。

除了中国建筑语汇的再次昂扬以外，更为核心的，这是一栋彻头彻尾的政治图腾，除了供奉蒋介石铜像以外，几乎找不到什么积极用途。无论是前置的设计理念，还是后向的诠释，官方单位发挥了无比的创造性，告诉人们：八角形的屋顶，象征“海内外同胞从四面八方来归，接受蒋公伟大精神之感召”，纪念堂本体下的三层台基，则是“象征三民主义，表示蒋公毕生努力其言行，均以三民主义为基础”，根本是充满了“党国论述”的经纬之学。

后来，中正纪念堂又进行两厅院(“国家戏剧院”“国家音乐厅”)的扩充工程，虽然同样由杨卓成所设计，两厅院红柱黄瓦的造型，又引起

了再一次的建筑美学争议。

如此的建筑风格，再加上政治造神的场所精神，又如何让人不觉得它仿佛真的是一座庙呢？就连流行的歌曲也开始这样唱：

“忠孝东路西对介寿大路遐，介寿大路公在中正大庙埕；介寿大路口号按作无开声，中正大庙埕内大家免著惊。”

这是当时依然愤怒的罗大佑，在1991年把原本的《皇后大道东》改配了台语词、重新发表的《大家免著惊》。“埕”在台湾话中，是广场、庭院的意思，尤其是较大的庙寺外面，往往都会有“庙埕”。

在民进党政府以官方的力量推动“正名运动”以前，对体制怀有怨愤的年轻人们，早就在自己的次文化里面，把中正纪念堂称为“中正庙”。

罗大佑这阙歌词，除了把“中正庙”这个民间流传已久的诨称写进歌里，也直接写到了“庙埕愈来愈赤炎，休闲抗议艺术相招来占领”，虽然直白的歌词远不如粤语原作的夹枪带棍高竿，然而也算是具体写到了中正纪念堂广场之上，逐渐多元纷呈的时代面貌，同时也揭示社会气氛已然改换的骚动序幕。

这是1991年，在三月学运发生的后一年。而正因为这一场学生运动，中正大庙庙埕的场所意象，固化成为群众运动的圣地，庙埕上的人跟庙里面的“神”强烈对立起来。

把火苗吹入校园的风

而庙有属于帝王宗室公侯将相那样望之俨然的系谱，埕上的水浒群英，也有自己的背景故事。在学生们来到中正庙的庙埕以前，植满杜鹃花与椰子树的台大校园，是“三月学运”前夕、1980年代学生运动，最主要的前置场景。

1979年“美丽岛事件”，以全岛大逮捕与党外人士的入狱告一段落。然而，原本与牢狱差别不大的台湾社会，却逐渐(被)打开了牢门。各种政治与社会运动在1980年代星火燎原，同样的火苗也被时代的风，吹入大学校园里面。

1981年，李文忠、赖劲麟等人，在台大校园，开始以“五人小组”进行活动；1982年，大学新闻、大学论坛、医讯以及法言等社团，组成联盟，推动代联会主席，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普选，这当然是台湾社会渴望直选的延伸，学生自治成为对政府体制的映射，也当然成为当权者亟欲敕平的对象，这是一脉相承的正当性战争。

1984年，台大学生甚至在代联会中，以94比0的票数，通过主席普选的提案，然而却遭到校方的悍拒。1985年，主催普选运动的政治系学生李文忠，更被校方以“英文三修不过”的理由处以退学，李文忠于是在校园里的地标、纪念台大首任校长、也是当初五四悍将的傅斯年的“傅钟”之下，身披抗议布条绝食抗议。李文忠事件后，声援的学生多遭到记过、留校察看等打压。

隔年1986年10月24日的傍晚，遭到停社的大新社，以“自由之爱”为名在台大门口的广场，举行社团的惜别会，学生们不畏教官、校方人员甚至外头情治单位的盯场，一个接着一个走上前发表激昂的演说。

从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到言论及出版自由的保障，校园里面具体而微演示着台湾社会对自由民主的渴望。

七百个“皇帝”与一个“总统”

然而，撇开种种早已铺好的时代脉络，野百合最直接的导因，是一场被700个“皇帝”逼压出来的起义。

依据1948年开始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本文规定，“国民大会”代表每6年改选一次。而从1948年到1990年，照说“国民大会”也该改选了7次了，然而这却关乎了统治者微妙的心理学问题。

对偏安海角的国民党政权而言，既然坚持蒋介石是整个中国的领导人，这政府是整个中国的政府，那么“35省”的“总统”，怎能不是“35省”的代表选出？蒋介石为了维系作为“中国统治者”的正统性，从此就冻结了“国会”的选举。同时，也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订定，架空了“宪法”。当然，比这样形式上理由更重要的，是维持在这蕞尔小岛上有效的专政统治。

虽然其后，有经过小幅度的“增额”民意代表的改选，但绝大部分的席次，还在代表着他们业已失根远离的遥远省份。经过了40年，两蒋都已经先后辞世，第一届的“国代”仍在任上。新任的台籍“总统”李登辉，却也是这些万年“国代”所投票选出。

学运爆发的3月之前，李登辉才却经历了“二月政争”，这是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夺权风暴。从1988年蒋经国猝逝，李登辉接任“总统”及国民党代理主席时，以蒋宋美龄为首的势力，就逐渐集结，形成与李登辉“主流派”对抗之“非主流派”，企图夺回权力。

1990年2月，非主流派终于与李登辉正面对决，在国民党临中全会中，拟推出林洋港、蒋纬国为正副“总统”候选人未果后，3月又将战场转进这绝大部分席次未曾改选的“国民大会”之中，串联“国代”打算以连署方式，推举林蒋两人参选，但二人随后又被李采取手段、各个击破，在有惊无险中，李登辉与李元簇，成为唯一一组候选人。

对看不清楚宫廷政治迷雾的大多数老百姓而言，“国民大会”开会所在地、阳明山上的中山堂，是另一座大庙，是匪夷所思的“山中传奇”。人民在风波中从媒体上所看到的，是老“国代”们即使拄着拐杖、提着尿袋也要去投票的画面。这样的画面不是让大家感佩他们戮力从公，而是惊叹这些人死也要抱住“党国”赋予的不正当权力不放。

尤有甚者，就是少数改选的增额“国代”也与老人们同流合污，在3月13日，“国民大会”里的老代表与新代表，一同通过了临时条款的修正案，把当届增额“国代”的任期，一举延长为9年，自己替自己延任，这样的荒唐，逾越了人民的忍受极限。

本来台大学生会、社运团体以及自由派学者，因应保守派夺权的危机，拟在3月18日举办群众大会，后来因为林蒋二人退选，集会之议也随之取消。然而，危机虽然解除，但在民间看来，民主没有倒退，却也不算前进。

3月16日的傍晚，周克任、杨弘任、何宗宪等9名台大等校学生，据说是在酒醉之余情绪激愤，遂临时起意，也不管有无动员，就几个人自己在中正纪念堂的广场，一屁股坐下，拉起长横幅的白色布条，写着：“我们怎能再忍受七百个皇帝的压榨”。

这就是“三月学运”的序幕，在暗夜里长出的百合花蕊。

“二月政争”是大庙里面的宫廷斗争；然而外面的“三月学运”则管不了那么多，学生们在意的不是“总统”能与“皇帝”是要合谋还是要拉锯，而是要以人民的力量请“皇帝们”退位。

野百合的六个春日

这暗夜里的花蕊，不管是统治者集团眼中的鲜花还是毒草，却在一夕间迅速蔓延，在整座庙埕上长得满满的。

3月17日的一大早，才不过是第二天上午，上千学生开始聚集，包括民学联在内的各校学运社团，纷纷声明加入静坐，广场上也设置了指挥中心，当晚学生们更依照区域与学校推举代表，进一步组成了校际会议。台大等校的自由派学者，也在法律学者贺德芬的呼吁之下，宣布要把课堂搬到广场上，展开“民主教育周”。

也在这一天，学生在校际会议中，提出了学运的四大诉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提出政经改革时间表。

18日学生们持续汇集，远在台南的成大，上百名学生集体北上参与广场静坐；不只来自中南部的大学生，连台北邻近学校、建中及北一女的高中生们，都背着书包穿着制服，来加入静坐的行列。

也在3月19日，广场上的气氛燃烧到高点，有两个重要的事件发生。其一是由东海大学学生方孝鼎率先宣布开始绝食，随后9名学生跟进。

其二，在晚上11点多，“野百合”的符码，才正式由校际会议通过，成为“三月学运”的精神象征。于是，这场学运，以及这些广场上的学生，甚至是一整个世代，有了独特的名字。

广场上出现由文宣组所印发的“野百合的春天”传单，对采用这个意象做出说明，反照了学生们的自我想象：本土、草根、纯洁。

值得一提的是，从传单的标题来看，野百合意象的出现，显然与罗大佑1982年发表的《野百合也有春天》，也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他的音乐是这个时代的插曲，甚至成为背景声。

3月21日这天，也是“国民大会”票选“总统”的日子，在只有一组候选人的情况下，李登辉当然毫无悬念地当选了。当天下午，他会见53名学生代表，表达了支持的态度。学生们回到广场上，经过讨论，决议隔天上午解散。

一个世代的烙印



图三十九 野百合学运现场

在“学运”过后3个月，1990年6月21日，大法官会议做成“释字第261号解释案”，推翻了当初在帝王意志下曲意做成的“释字第31号解释案”，明白表示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应在1991年底前全部退职；1991年4月22日，也在李登辉意志的贯彻下，“国民大会”通过废除临时条款。再之后，如我们所有人所熟知的，台湾经过了“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以及在2000年发生了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短短6天的“野百合学运”，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有甚于民进党的冲撞、李登辉的操作，或是政坛上其他运作者的力量吗？或者，野百合只是广大民间力量的具体演示？这或许都没有办法做个明确的回答，但野百合为广场创造新的印记，也成为一整个世代烙印，这都是无法抹灭的遗产。当然，争议也跟随而来。

在“三月学运”短短6天的过程中，几乎是在一开始，在广场上，就有许多民进党党公职，以及素朴的支持群众，热切地前往声援，甚至捐输物资现金。其中更有许多，自发地原地坐下，与学生一同静坐。

3月18日，民进党甚至把宣传车聚集、在大中至正门下举办造势大会，学生们决定以绳索拉起纠察线，把学生与其他群众，尤其是民进党党公职，严密区隔开来。

这样的动作原因很好理解：野百合象征的纯洁，如何能够与政党的杂草相互混合呢？然而它们却是从同一片愤怒的土壤长出。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来自群众或学生自己，认为这样的作为太过自命清高、远离群众。

这样纠察线的争议，在学运告终、当初诉求皆已实现的多年之后，仍然未曾休止，也形成另外一组“庙与埕”的对立辩证。

在1990年代之中，民进党从地方县市选举，到各级“中央民代”选举屡战皆捷，1994年首次“直辖市长”选举，民进党推出的陈水扁赢得台北市长选战；1997年县市长选举，在23个改选县市中，民进党更一举拿下12个席次。而这样急速的政治版图膨胀，产生了大量党公职干部、各级政府幕僚的需求，也拉开了庞大的政治人才缺口，野百合一代的年轻人，于是自然成为这个人力缺口最重要的甄补来源。民进党各个派系与山头，莫不张开双手，招来这个世代加入麾下。

相对的，对广场上的学生而言，当他们走出校园，打算进一步投入实际政治改革时，难道有比这个更为直接的道路吗？不论是本就指向“国家机器”的台大系统、或是诉求“人民民主”的民学联系统，都有众多的学运参与者，之后投入了民进党，担任幕僚，或竞选公职。这样的双向力量，几乎让野百合世代，成为民进党一个世代工作者的代称，也几乎让民进党阵营，据有了野百合的名字。

像是曾经担任台大学生会长，后来又成为“内阁阁员”“立法委员”的罗文嘉，是许多人提到“野百合世代”时，常会想起的代表性人物，但“三月学运”时他正在当兵，并不在广场上面。

然而，学生们从埕上走到庙里，甚至在2000年政党轮替后，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即使是野百合们本身，也大有不甚同意的声音。

2004年，曾经参与“野百合学运”的部分社运人士，召开记者会指责进入民进党政府的昔日战友，已经沦为权贵而“腐烂臭不可闻”。2008年，又有参与过野百合学运的学者，在中正纪念堂召开“野百合同学会”，抨击民进党把野百合学运收割为自己的“不当党产”。当然，这些动作，也同样受到怀有其他政治动机的批判。

野百合的成员们，是否到了庙堂之上，就遗忘了在庙埕上的悲愿？不管在庙里或是埕上，是否又真的为台湾带来许诺的改革与进步？或许现在也还无法盖棺论定，他们如今还并不算老，许多人还在重要的岗位上，甚至益加重要，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回应这个历史的提问。

无论如何，我们能确定的是，经过“三月学运”，中正纪念堂外的广场，空间的意义自此改换。自此群众示威、学生运动在此发生不辍。

在台湾民主纪念馆正名风波的同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奚落说：为什么要把供着独裁者铜像的大殿，当作民主的纪念馆呢？然而，经过这一次次群众运动的洗礼，八角大堂外面的广场，不管是叫“民主公园”，还是“自由广场”，却似乎都很得宜。

在2008年，政党再次轮替后，“班师回朝”的国民党政府把“台湾民主纪念馆”的牌子拆掉，换回原本的“中正纪念堂”，可是外面牌楼上面的“自由广场”四字却被保留了，没有变回原本的“大中至正”。这其中的妥协为何，十分耐人寻味。

然而无论大庙的碑牌，被统治者如何更改，这座庙前之埕，却早已属于群众，在这诸神退位的岛屿，事物真实的名字唯有系于人心。

鹿港风潮：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文/何明修

1973年出生于台北市西门町，目前是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运动、劳动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



图四十 何明修

罗大佑在1982年所发表的《鹿港小镇》一曲，虽与4年后的“反杜邦运动”没有关系，但是歌词提到“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很贴切地唱出了现代化的两面性与暧昧性。鹿港居民们要求保存一个自己所熟悉的鹿港，一个香火鼎盛、生意活络的滨海小镇，而不是烟囱阴影下的工业城。

1986年的春天，位于中台湾的鹿港小镇笼罩在一团未知的恐惧之中。美国杜邦公司决定在中台湾设置二氧化钛工厂。对于政府官员而言，这项投资案一方面可以解决因选址失当而闲置已久的彰滨工业区，另一方面也可以提振当时的低迷景气。他们有理由相信，鹿港居民也会乐见跨国工业的进驻，以及就业机会与土地价值的提升。

然而乐观的官员万万没有想到，鹿港居民在新任镇长的带领下，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绵密的反对运动，他们要求保存一个自己所熟悉的鹿港，一个香火鼎盛、生意活络的滨海小镇，而不是烟囱阴影下的工业城。

在清代，台湾有“一(台南)府、二鹿(港)、三艋舺(台北)”的说法，鹿港是与大陆往来的重要港口。但是在1860年《天津条约》开放的商港中，鹿港被遗漏了。在日据期间，1908年完成的南北纵贯铁路也没有经过这里。曾经风华一时的鹿港就此黯淡地退出历史舞台，只维持它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商业与信仰中心的机能。就在这种历史的机缘下，鹿港完整地封存老台湾的温情与人情味，而那则是其现代化工程所摧毁的美好价值。



图四十一 日治时期的鹿港

因此，当“反杜邦运动”兴起，当地居民不只是捍卫自己的环境权，他们也是保护家园的集体记忆。罗大佑在1982年所发表的《鹿港小镇》一曲，虽与4年后的“反杜邦运动”没有关系，但是歌词提到“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很贴切地唱出了现代化的两面性与暧昧性。一方面，渴望经济富裕几乎是落后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另一方面，无情的现代化是代价昂贵的，淳朴家乡的好山好水被破坏了，敦厚的人际往来也被冷冰冰的金钱关系所取代。

鹿港人坚决反对自己的家乡被巨大的工厂所吞噬。为了反对杜邦设厂，他们串联其他公害受害地区、组织反公害协会、发行宣传刊

物、动员学童绘制反公害壁报等。在1986年6月24日，鹿港居民聚集中山路上的妈祖庙前面，面对他们的是一排又一排的警察与宪兵。指挥一声令下，群众冲破了官方封锁线，台湾环境运动史上第一场示威游行出现了。虽然游行路线不超过一公里，也没有重大的警民冲突，但是鹿港居民沿途高喊的“我爱鹿港、不要杜邦”的口号，通过电视媒体报道，引发全岛关注。

12月13日，鹿港人以参观台北市中正纪念堂的名义，利用情治单位防备不及，举标语牌在“总统府”前进行抗议。这场抗议活动不但是“前无古人”，因为当时台湾仍是处于“戒严”时期，没有人敢在“总统府”的敏感地区进行反对活动；更是“后无来者”，因为不久之后，政府设立所谓的“博爱特区”，以安全为由禁止周遭一切游行集会活动。

在接连的抗争活动下，1987年3月，杜邦公司决定放弃鹿港设厂计划。这项未曾意料到的胜利宣告台湾环境运动的诞生。4个月之后，长达39年的戒严令终于解除，也将新生的环境运动带向一个更激进化与政治化的路线。

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



图四十二 自明代起,鹿港与大陆沿海城镇之间的贸易往来已经相当频繁,当地民众为求商船往返海上平安,集资建造了鹿港天妃庙。图为今日鹿港天后宫。

“全球思考、在地行动”是全世界环境运动者所奉行的原则，台湾也不例外。在杜邦事件中，反对者最常举的例子是1984年的印度博帕尔(Bhopal)毒气外泄惨剧，来说跨国企业对于第三世界的公害输出及其危害。但是更值得注意的，台湾环境运动具有浓厚的本土性格，“在地思考”的成分远比“全球思考”更重要。事实上，也是这种“保卫家园、抵抗外来公害威胁”的号召下，环境运动可以说是台湾分布最广泛的社会运动。在杜邦事件中，在“我们只有一个鹿港”“我爱鹿港、不要杜邦”的口号下，当地渔会、农会、青商会、学校、庙宇、文化社团纷纷加入运动的行列。

鹿港位于中部的彰化平原，自古以来物产富饶。彰化县与浊水溪以南云林县供应全台三分之一以上的优质稻米、四成以上的新鲜蔬菜、猪肉与鸡蛋、八成以上的文蛤。大陆移民渡海来台之前，原住民最早在此游耕狩猎，但是一波波的移民压力下，他们被迫迁徙或是被汉化。在这片台湾的米仓上，不同祖籍的汉人也进行争夺土地的生存竞争。包括鹿港在内的沿海一带主要是由泉州人所占据，越往内陆则越是漳州人的天下，势单形薄的客家人则是住居在两大族群之间。

到了19世纪后半叶，汉人移民出现了“土著化”的发展，祖籍的分化越来越不重要，日据时期的殖民歧视加速了漳泉之间的融合。尽管如此，鹿港仍保存许多道地的泉州文化特色，最明显的即是“鹿港腔”的台语，台湾中部一带年长者可以清楚辨识这个特有的腔调，而鹿港人也以此为傲。

鹿港的中山路是该镇最重要的老街，当地信仰中心妈祖庙位于西北侧，庙口就有当地著名的各种鲜蚵料理。从那里散步往东南方向，一路上也会看到许多专门制造与贩卖神桌的商店，这里有许多罗大佑歌中的“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鹿港向来是台湾传统木匠师傅的集中地。在中山路与民族路的路口，玉珍斋是著名的百年老铺，各种糕点是观光客向来不会错过的传统美食。再往前到了复兴路口，则是可以看到民俗文物馆的入口。那幢华丽的洋楼是当地发迹者辜显荣所兴建的，辜家在日据时期、国民党时期、甚至是民进党执政时，都是显赫的“红顶”商人，可以说是台湾第一家族。由于鹿港的特殊人文条件，乡土认同得以在这场运动中彰显。在这种强大的信念下，反对者主张杜邦的设厂要经由“公投”过程来决定。因当时“戒严令”仍存在，这项要求有其进步性与前瞻性。事实上，他们的灵感来自于1983年党外运动所提出来的“住民自决”。换言之，反杜邦运动者等于将民主价值落实到地方层级，让看似遥远的公共事务成为人民日常生活可触及的议题。

当时，本土认同可以支撑进步性社会运动，原因在于国民党的“大中国主义”试图消灭台湾本土文化。无论是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他们的母语被当成是低俗的“方言”，在学校与其他公共场所是被禁止的。官方教科书所教的内容是长江、黄河，但是台湾浊水溪与玉山却完全没有提到。因此，越会念书的学童，就越不了解自己的家乡，甚

至是越看不起自己所承继的本土文化。在杜邦事件中，鹿港人高举自己的地方认同，而他们的成功更是带来激励作用。在“解严”后的各种环境运动中，可以看到“我爱后劲、不要五轻”“我爱宜兰、不要六轻”“我爱美浓、不要水库”等口号，这等于鹿港模式的扩散与延伸。

杜邦事件发生时，“邻避”一词还没有在台湾广泛使用。当时官员希望鹿港人能“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言下之意即是，他们是基于地方自利，而忽略了台湾建设之需要。但是从事后发展来看，杜邦事件作为台湾环境运动的先行者，其实并不算是邻避事件。因为跨国公司的投资并不是满足大多数人所需要的公用设施，毕竟是无法与垃圾场、发电厂、手机基地台相提并论。而且，鹿港运动者在当时积极串联各地的公害受害者，在成功之后，也参与许多地方的环境运动。因此，如果将杜邦事件定位为邻避运动，则是太限缩了其丰富的历史意涵。

草根抗争与外援行动

在杜邦事件，鹿港运动的灵魂人物是曾在当地小学任教的粘锡麟。开始，他只是为了帮他的同学竞选鹿港镇长，意外地踏入这场创造历史的事件，展开了往后20年运动生涯。他后来也在高雄、花莲等地环境运动中，长期“蹲点”扮演军师的角色。粘锡麟身份证上的职业栏是登记的“环保弘师”，他的确是全职地投入运动参与，尽管时常面临物质生活的困顿，但是丝毫不改其志。

反杜邦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1986年夏天，一群台大学生组团南下，他们在鹿港进行调查，后来更出版了一本调查报告。在当时，学生运动才起步，异议学生面临了校园内的教官、行政人员、国民党职业学生的威胁，因此，一开始学运的诉求总是围绕着学生自治、言论自由等议题。正是由于鹿港人成功的“六二四大游行”，学生开始将注意力移转到校园外。在“解严”后的各地环境运动中，学生自发地组织工作队，进驻面临开发威胁的穷乡僻壤，协助居民共同保护家园。

1980年代中期，大学生还十分生嫩，他们能帮反杜邦运动的忙是有限的。那时，最重要的外界协助是前来报导的记者，其中包括目前担任“文化总会”秘书长的杨渡。这些记者们可以说是“左手写新闻，右手写传单”，一方面将当地的讯息传播到全台各地，另一方面则是帮忙拟定运动的策略。在报禁与新闻检查仍没有被废除的年代，记者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功地让在地的声音不被官方的片面宣传所掩盖。因此，杜邦事件开创了后续台湾环境运动的一股重要的潮流——将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草根群众串联起来。此前，关心核能安全、生态保育的专家学者，通常认为他们只要通过大众媒体、办杂志就可以来倡导环境保护的理念。对于他们而言，自己的任务是说服政府内部的开明派官员，而不是直接面对基层人民。但是反杜邦运动的成功，扭转了这种裹足不前的心态。在杜邦事件落幕之后半年，一群大学教授组成了台湾环境保护联盟，他们将组织定位为“草根的、知识的、行动的”，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草根行动结合起来。

经济发展的反思

杜邦事件并不是台湾第一件环境运动，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陆续出现了各种反公害的“自力救济”风潮。弱势的农渔民是常见的受害者，当时，台湾战后迅速的工业化之负面环境后果已经浮现，许多肥沃的农地被征收，开发成为工业用地。大型水库出现严重淤积，破坏了下游河川的生态。在教科书中，“十大建设”被吹捧为国民党政府德政，几乎每个小学生都知道蒋经国所说的“今日不做、明日会后悔”；但是在现实上，大炼钢厂、大造船厂、石化工业、核能发电这四个建设却是带来了周遭居民的环境梦魇，也是“解严”后环境运动主要抗争的对象。

杜邦事件之前，国民党政府并不是没有想以行政的手段强化环境治理。1970年代末，政府开始规划“国家公园”，1982年在“卫生署”下成立了“环境保护局”。官方的改革脚步始终赶不上台湾环境恶化的趋势，也无法真正解决民众所面临的公害威胁。环境问题为何无法解决？追根究底，是因为阶级的不平等与政治的不自由。“戒严”时期，集

会游行的公民自由都是被禁止的。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情治人员就会用“泡茶聊天”的方式来表达“关心”；如果柔性劝说没有用，接下来出现就是镇暴警察与宪兵。因此，公害不只是生态环境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议题。在台湾1980年代的反核运动中，有个著名的口号“反核就是反独裁”。这句话也可以用在综括杜邦事件前后的各种环境运动上，人民要抗议的对象就是只一味追求经济成长，而忽略生存权的发展主义与政治专制。罗大佑在《鹿港小镇》中，嘶声呐喊着“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就是在抗议现代化所带来扭曲的人性与过度商业化。

在杜邦事件争议期间，“行政院长”俞国华表示，如果这个案件没有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环评)，就不会获得通过。环评的立意，是希望能重大开发行为之前对于各方面影响，以减缓负面的冲击。但因杜邦事件与解严几乎同步，此时，台湾环境抗争风潮遍地开花，政府反而开始担心环评是否会“激化”环境运动，“立法”的进程就因此搁置了。一直到“国会”全面改选，环境运动者联合“在野党”的力量，使得“环评法”在1994年获得通过，那已经是杜邦事件落幕的8年之后。在杜邦事件落幕后半年，最高环境主管机构终于升格，从“卫生署”的附属单位提升为“行政院环保署”。从后续的台湾环境运动发展来看，这种科学主义的治理显然没有办法化解因为公害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冲突。民进党“执政”的8年期间，环境运动者曾被任命为“环保署”长，各种环境决策管道也比以往更开放，但是民间团体与“环保署”的冲突仍是时有所闻。事实上，科学专业的判断并无法挑战政治的决定。在台湾，蓝绿两大政党都是奉行经济成长优先的发展主义，在这个稳固的政治共识下，环境的诉求总会是打压的。

鹿港改变台湾容颜

1986年初，“反杜邦运动”登场，年底，民进党成立，并且正式以反对党的名义投入选举。年份上的巧合似乎注定了环境运动与民进党一段20几年来难分难解的爱恨纠葛。当时，许荣淑担任包括鹿港在内

选区的“立法委员”，她是“美丽岛事件”政治犯张俊宏的妻子，在“代夫出征”的名义下踏入了政坛。许荣淑要竞选连任，由于杜邦事件已经成为了全台关注的议题，她曾在鹿港举行一场反杜邦说明会，吸引了近3000人的听众。然而，许荣淑的举动却引发包括粘锡麟在内的在地人士之不满，因为她在事前完全不关心反杜邦运动，却等到反对声势高涨之后，立即来收割运动的政治果实。在那年，许荣淑拿了近21万张选票，创下全台最高票的纪录，顺利连任。

在台湾，很多人以为民进党的党旗以绿色为主，就是与环境保护有关。事实上，这是错误的认知。组党之前，在1981年的台北市议员选举中，以陈水扁为主的党外候选人联合采用绿色的旗帜，一开始是为了宣示“净化政治、净化选举”的主张。民进党的“绿”从“干净”到“环境保护”之转变，是受到1980年代中期的反公害抗争风潮影响，其中杜邦事件的成功，带给这些反对派菁英很大的启示。因此，在民进党的创党党纲中，明确宣示要“匡正过去破坏生态环境之经济挂帅政策”，更高举反对核能发电的立场。

民进党与环境运动的同时兴起，再加上他们都是对抗国民党政府，这使得两者之间具有合作的可能性。直到1990年代中期，民进党与环境运动可以说是处于一种联盟的关系。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协助运动者在议会上提出法案、揭露公害弊端，在民进党执政的县市，环保法规被更严格执行，环境团体的建议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策。然而，到了后来，民进党的政治实力开始稳固，有机会在全台湾选举中击败国民党，他们对于环境运动的态度也开始改变。为了避免被贴上“反商”的标签，民进党对于以往的环境承诺开始不是那么热衷，对新浮现的开发争议，不敢明确表态。在1996年，某些环境运动者组成了台湾绿党，并且投入选举，这显示环境运动与民进党紧密联盟关系已经不复存在。

民进党“执政”的8年(2000~2008年)中，陈水扁宣示的“拼经济”“排除投资的绊石”“新十大建设”等政策目标，都是十分接近旧国民党的发展主义。尽管政党轮替让环境运动者获得了更广泛的参与管道，但是在“核四”“国光石化”“中部科学园区”等争议案上，民进党的立场是与环境团体相左，也引发了激烈的冲突。至少对于某彻底失望的环境运动

者而言，他们已经死心了，认为国民党与民进党没有什么两样。2008年，马英九带领国民党重新取得政权，让环境运动团体面临了更严苛的挑战。如果说民进党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那么国民党则是毫不掩饰的真小人，在推动各种具有争议的开发案上，是完全不会手软。另一方面，下台后的民进党在环境议题上修正了立场。在蔡英文的领导下，民进党提出2025年废核，对于国光石化采取反对态度，这稍微拉近了他们与原先疏离的环境团体之关系。

无论接下来环境运动的轨迹会是如何，可以确定的是，那股起自于鹿港小镇的风潮，已经彻底改变了台湾社会的容貌。

第五部分 寻路未来

历史已经走过，但我们如何寻找未来？

回首海天相接处 ——内在于绿岛的台湾史和历史正义

文/海民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志愿者。

纵然绿岛绵延着数十年的思想斗争，但在今天的绿岛人权园区，这一切带着价值抉择的故事，都被剥离在选择性保留的“事实”之外，从而也就被遮蔽了。以绿岛园区为代表的官方设置史，正是一场历史诠释争夺史。

2012年10月11日，台湾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1926-2012，“中国统一联盟”前主席、劳动党荣誉主席、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前会长)，在北京治疗两年后，不幸病逝。对于多数两岸民众来说，生长于日本殖民台湾下的嘉南平原乡野，却为了民族统一和国际主义而奋斗至人生最后一刻的林书扬，当然是陌生的名字。但恰恰是这个因为国民党白色恐怖而在台湾社会消失长达34年又7个月(1950-1984)的名字，集中体现了20世纪后半叶两岸民族分裂与国际冷战的时代轨迹。在林书扬先生的告别式与纪念会上，主办单位播放了林书扬接受知名报告摄影家关晓荣先生访问时的一段纪录片，他在片中说：

靠什么坚持过来，现在叫我要怎样跟你们说呢？在那种境遇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总是要过日子啊。像我这种判无期徒刑的人，这点若没看开，几乎就没办法生活下去。……大概十年刑期将至的人要出去的时候，他们还未出去，我就有心理准备了。大概再两三个月，就有一大批人要出去了，做伙在那个风暴里头一起共甘苦生活过来，有一大批人已要脱离监狱的生活，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对留在那里的人来讲，如果没有心理准备，当然会形成相当大相当大的冲击……你必须

要有一个人生观。一个人生命的过程和终点，或者说得抽象一点，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一个人的生命在什么状况下结束，才没辜负生命的价值？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无意借用宗教的力量，所以就是一个人生观、生命观。也许说得大一点，口气说得大一点，说不定认为：这也是我们正在承担，为了替这个社会的进步承担某一种代价，不得已的代价由我们来承担。

林书扬接受访问时，背景正是曾经关押着他与多名政治受难人的集中营旧址；而这个飘摇在海天无垠相接之处的远方，就是因为集中营才广为人知的太平洋小岛——绿岛。

绿岛这样走来

绿岛地处台湾东南海面，与目前存放大量核废料的兰屿遥遥相望。天晴时，可从绿岛西北看到台东，或向南方看到兰屿。这两个蕞尔小岛，成为台湾本岛与菲律宾之间的中介地带。相对于海峡两岸整个范围，可谓边陲了。绿岛因其地理特性而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后成为流放地之一。1930年，一篇递交给共产国际的台湾形势报告曾提到两个强制劳动地，一个叫“Hung Tai Yui”，另一个则叫“Ho Aou Yui”，前者可能是原名“红头屿”的兰屿，后者则可能正是曾被称为“火烧岛”的绿岛。对于20世纪的台湾来说，绿岛作为“流放地”的历史姿态，就是从日据时代展开的。

“日本的战败及中国的胜利，给我们在主观和客观上，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今天仍在继续地进行中。”——这是台籍中共地下党员叶盛吉(1923-1950，知名台大医师)被捕之后，以日文撰写的自叙传的最后一段话，也是他的政治遗言。这段隐晦却又难掩其政治视野的判断，说明了1945年的台湾光复如何改变台湾人民的命运。

由于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官僚腐败无能，复以持续高涨的全国革命形势，1947年爆发了“二·二八”事件，促使大批台湾的省内青年出现认同左转——包括叶盛吉——从而为当时试图在岛内站稳脚跟的中共地下

党(以“台湾省工委”为主)创造出发展条件。然而1949年之际，岛内白色恐怖开始抬头。以年初的“四六”事件为始，岛内情治机关公开打击以台大师大为首的学生运动；同年底，地下党刊物《光明报》遭破获，连带致使党组织从基隆、台北等地开始瓦解。地下党不断被破坏的过程宛如涟漪，许多牵连深浅不一的省内省外群众大量遭到逮捕。受难人陈英泰先生回忆：“到处都是抓人与办人的地方：保密局、调查局、保安处、内政部、刑警总队、宪兵队、陆军总部、海军总部、空军总部、联勤总部，而各机关都备有看守所。”“很多抓人机关、一个地方不够关，还设有看守所分所。”“这些调查机关都把入犯集中到我们所说的军法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做最后的……定夺。”

朝鲜战争爆发后，解放军渡海可能性大减，国民党当局遂在血腥中展开了今日所习称的“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台北市新店溪畔的“马场町”，是当时最知名的刑场，许多烈士在这里遭到枪决、曝尸示众，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叶盛吉。无人认领的尸体(许多是外省籍)在殡仪馆收尸之后草草集中埋葬。直到1993年，这个湮没已久的乱葬岗，才被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在台北六张犁山区发现，共有200多墓石遗存。

1951年，未判死刑的政治犯开始往绿岛的“新生训导处”转移。虽然新生训导处只是台湾许多白色恐怖遗迹的一部分，绿岛的命运却从此改变。如林书扬先生所云：“50年前的政治犯的服刑机关有两种。虽然服刑者的法律身份都是所谓的‘叛乱犯’，但不同的机关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生活规定，其间的差异很大。一种是集中营，另一种是监狱。前者如著名的‘绿岛新生训导处’(起自1951年)；后者如早期的台北军人监狱，中期的台东泰源感训监狱(1963年起)，后期的“国防部”绿岛监狱(1971年起)等。集中营因为有强迫劳动和强迫学习，各项规定比监狱更严苛、更繁杂。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营里的生活虽然活动空间比较大，但导致强制和反强制、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的经常性紧张总是带着思想斗争的成分。从而整个生活气氛是沉郁的，还带有一点诡谲。”

国民党在岛内发动白色恐怖以来，新生训导处是第一个为了关押政治犯而专门建设的设施。直到以台北新店安坑的军人监狱为代表的狱所陆续盖好，才开始有政治犯先后从绿岛被回送岛内。虽然也曾出

现大批政治犯再次送返绿岛的状况，新生训导处还是在1960年代逐渐荒废。直到1970年代初期泰源监狱发生政治犯暴动，当局才又使绿岛成为政治犯的集中关押处。然而此时迎接政治犯的已非集中营式的新生训导处，而是新盖的监狱，也就是今日已然改建为绿岛“人权园区”主要景点之一的“绿洲山庄”。

岛上的白色恐怖遗迹



图四十三 1954年，绿岛上的囚犯在海滩上做下午时间的健美操。

现在去绿岛参观，非常方便。从台北搭上火车，沿着岛屿边缘向东向南而行，穿越高山与碧海之间的兰阳平原与花东纵谷，就可以从台东的富冈渔港乘船前往绿岛。到了绿岛，租上一台摩托车，更能在半小时内环岛一周。这是多么小的岛屿！然而1951年第一批押往绿岛的政治犯，却是从基隆港集体搭乘美制LST登陆艇前去，并且直接集中到绿岛北岸的新生训导处。时至今日，还可以看到1950年代新生训导处的许多遗迹，甚至还可以看到依据受难人陈孟和先生回忆而于近年重建的受难人营舍(仅复原第三大队营舍)。这些新旧建筑，结合起1970年代兴建的绿洲山庄，共同在绿岛北岸形成现在所称的绿岛人权文化园区。

强制劳动是1950年代绿岛最突出的政策之一，其中包括让政治犯砌围墙把自己围起来。他们被迫在海边敲打礁石，搬回营区，最后竟形成长达1000多米的围墙。因此也有人戏称为“万里长城”。时至今日，遗下的残迹仍能体现白色恐怖年代的氛围。就像目前仍遗留在台北市华光社区后的台北监狱围墙遗址一样，那面据说用清代台北城墙之墙石重砌而成的石壁，就是日本殖民者迫害许多爱国爱乡志士的血泪证明。不过，作为集中营，新生训导处时期的关押状况毕竟不同一般监狱。由于绿岛最大的围墙就是四周的海洋，因此当时的政治受难人仍有可能因为强制劳动或生活所需而被允许在岛上其他地方活动。极个别者，甚曾远达绿岛东南潮间带上的温泉村——也就是现在最出名的朝日海底温泉——活动。

比起强制劳动，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直接决定生死的思想斗争。在洗脑与反洗脑之间，狱方使出了许多畸形而恐怖的镇压手段。新生训导处四周，设有许多碉堡。这些现在犹然可见的碉堡并非防卫之用，而是用来教训政治犯的禁闭室。许多受难人回忆，关进去后，满地湿臭，人体必要的排泄恶化碉堡空气，人多时更加难受。于是被关者只能努力站着将头伸往唯一可以吸到新鲜空气的枪眼上。任何人都承受不了这种非人折磨——然而，这还只是关禁闭而已。当许多受难人因为层出不穷的镇压而牺牲，就会被送往绿岛东北角埋葬。久而久之，这片公共墓地就成为受难人十二个中队建制之外的第“十三中队”。

从新生训导处向东通往“十三中队”的途中，会经过美丽的沙滩；在陡峭的山壁上有时还能看到野生梅花鹿。但这沿途美景，正是受难人当年打石劳动之所在。从“十三中队”再向东走，就能看到一个巨大无比，宛若室外音乐厅的海蚀洞穴，这就是有着许多传说的燕子洞。据说该地曾在1950年代初期被狱方当局视为集体屠杀的实行场所；也有人说，这是受难人的暂时停尸之处。

1970年“泰源暴动”后，许多受难人被转往新建的绿岛监狱关押，即绿洲山庄。受难人史庭辉先生回忆，对他们1970年代才入狱的政治犯来说，其实不如1950年代入狱的难友熟悉绿岛周边环境，因为绿洲山庄完全是高墙铁柱交织而成的现代监狱，而非半开放的集中营。于是眼前所见，只能是高墙之上剩余的风景——如最初由美国人兴建于绿岛北岸的灯塔。虽然这个灯塔已是今日著名景点，但在当时，灯塔之类的建筑却被受难人视为自己正在坐美国牢的象征。

遭遮蔽的历史线索

狱中的思想检查和非人道镇压，在1970年代仍然存在。于是，洗脑与反洗脑的斗争，依旧在或者公开、或者隐蔽、或者集体、或者个人的状况中发生。在人世的生死来去和建筑物的兴起颓圮间，唯一贯穿绿岛白色恐怖历史的隐蔽线索，即在于此。1960年代入狱的作家陈映真，曾这样回忆绿岛政治犯的思想斗争：

“自省自勉录”，是狱中交给每个犯人的小本子，要人天天检查自己的思想吧。大多数的人自然懂得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交差，唯独书扬却每天认真地记下所感所思，丝毫不因狱中现实环境的荒谬性，而稍微屈笔。

“这样，只会惹来无谓的麻烦吧。”有一次，在他告诉我一则他写的“自省自勉”内容后，我担心地问。

他沉默了一会，独语似的说：“如果对自己最起码的真实勇气都丧失了，我要到哪里去得到力量，支持我度过这漫长的25年，支持我度过前头漫无终点的囚人的岁月？”

他的声音是平静的。几十个在那个秘密的监狱中的放风场上或慢跑、或疾走着兜着圈子的犯人，都脱光上身，贪婪地亲炙着五月的离岛上并不猛烈的阳光。天空是一片纯净的碧蓝，而我的心中却哽满了书扬的话所激起的动荡、翻腾的情绪。

1970年代因“成功大学共产党案”而入狱的吴俊宏先生则回忆：

(1975)年底，我们这批狂热的年轻左翼政治犯，革命热情再度燃起，倡议在监狱里建立新的革命组织，并将此提议告知老政治犯，邀请他们共襄盛举。年轻一辈当时所提出的新的革命组织名称为何，至今我已不记得，只记得当时在第一区的林书扬，透过外役难友，辗转传来他的看法，提议组织名称为“政治犯反暴政自卫组织”，英文为 Political Prisoner Anti-tyranny Self-guard Organization(简称PASO)，这个名称因局限在监狱一隅，不被狂热的一辈所接受，最后由于年轻一辈意见也产生分歧，此新的革命组织遂告无疾而终。我也就在此时第一次听到林书扬这一号人物。对他的日式教育背景，而且常年关在牢里，居然能运用出这样的英文辞句，也感到好奇。我很想见见他，然而他在一区，我在四区，不得相见。

.....林书扬也不畏艰险，系统地传来他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记得当时，在传递他所写的纸条时，我们常将它藏在衣缝里，以免被监方查获。.....如今回想起这些过往小事，还真为当时我们所处的险境捏把冷汗，也对林书扬的勇气油然而起敬。

林书扬感性地说：“绿岛方圆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们的梦想凌云。无奈那沙砾数亩的营地，却紧紧地索住了我们的忧愤乡愁万斛！我们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拼斗。在愤怒中我们彼此警惕于爆发的临界点。恐惧时，互相印证眉宇间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损思想的锋锐。纵然长夜逡巡，

也要留住晨曦的光与热！日日、月月、年年，让躯体老去，却要挽住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

“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这正是支持着许许多多政治受难人抵抗狱中压迫与狱外社会歧视的精神动力，然而这种思想上的坚持无论如何不可能仅从这样那样的物质遗存而得反映。纵然绿岛绵延着数十年的思想斗争，但在今天的绿岛人权园区，这一切带着价值抉择的故事，都被剥离在选择性保留的“事实”之外，从而也就被遮蔽了。

“人权园区”与“转型正义”



图四十四 监狱使绿岛出名。2002年,店主陈盈明在绿岛开设了这个名为“大哥的故事”的纪念品店。这是绿岛最有名的特色纪念品专卖店,当时店门口挂的不是“欢迎光临”,而是“感谢探监”。(摄影/范菁晶)

198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的空间相对扩大,几十年间的白色恐怖历史开始出现“平反”“翻案”的可能。1980年代中,政治受难人组成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以克服两岸民族分裂为主轴,展开了受难人自己的平反历程。但平反之路并不平坦,因为受难人内部无法形成完全一致的声音。据受难人陈明忠先生的回忆,1970年代“泰源暴动”就曾经出现台独暴动者欲杀外省人与“红帽子”受难人意图借此取信美国的险境。“解严”后,由于冤假错案确实存在,加上“统独”问题在台湾社会日渐渲染,受难者内部的历史解释和价值判断出现了更复杂的分化。比方部分冤假错案者确实希望得到官方“平反”,但对真案或因狱中斗争而实现思想觉悟的受难者而言,这种“平反”却没有直接意义。

总体而言,台湾许多与白色恐怖有关的遗迹或纪念碑,都有官方或深或浅的介入;台北景美与台东绿岛的两个官设的“人权文化园区”则是典型作品。绿岛人权文化园区是在作家柏杨先生的催生下实现的。遭构陷入狱关在绿岛的柏杨,先于1996年在当地筹建人权纪念公园,后于1999年设立“绿岛垂泪碑”。随后在官方的推动下,正式实现人权园区的设置,并在2008年以后复建新生训导处部分建筑。

以绿岛园区为代表的官方设置史,正是一场历史诠释争夺史,更是这类争夺史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受难人的抗议,园区也许不会包括新生训导处旧址。而垂泪碑旁的石墙虽然镌刻了许多受难人的姓名,却也有许多受难人为了避免被官方利用而婉拒列名(于是上面的姓名便不全是当地服刑的受难人。比方吕秀莲)。

马场町与六张犁等遗址的整修状况也一样。发轫于陈水扁台北市长任内的计划虽在马英九担任市长的时候完成,代价却是原方案的缩水。此外,民进党“执政”7年之后,才在“领导人选举”前夕忽然为六张犁死难者举办“普渡祭”,此亦充分体现为政者企图借此骗取选票的功利心态。选后,马政府底下的“文建会”一度要将“景美人权文化园区”中的“人权”删掉,文过饰非,后因招致严重抗议才罢手。最近,官员龙应台

因为阅读了“泰源暴动”牺牲者遗书而在相机前落泪。但谁还记得，正是龙应台曾在1994年声言“盖棺论定的忠奸”不能翻案，从而严厉指责为六张犁死难者平反的陈映真？又有谁能够直面，官方迄今仍只愿意“平反”那些不会撼动当局合法性——无论是死是活——的受难人？而此不正是所谓“转型正义”的真实底线？

为了让下一代知道真实的历史，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决定自己来说自己的故事。于是，他们在2012年4月组团重返绿岛，随景口述。行后，互助会秘书孟祥不无感慨地说：虽然园区复建的新生训导处第三大队营舍摆设许多栩栩如生的蜡像以模拟受难人当时的生活状态——拉着自制小提琴自娱、看书、睡觉，甚至上厕所——但当时的狱中斗争和思想状况，却因为这种叙事而被全面掏空，整个展示成为反共陈窠深重的台湾社会所易于接受的空心商品。在观看的消费中，民众得以换取疑似的良心。正如林书扬所言：“像五十年前政治受难人的狱中经验谈，在刊物上有没有市场，令人不无怀疑。不过在日趋虚矫的社会风气下，只要经营得当，似乎很多东西都可以商品化，包括陈年的政治事件。”至于解说员讲述着与当事人认知全然相反，却又能迎合大众心理的价值判断，就更不足奇了。

遗迹与遗迹之间，也存在多种历史诠释的竞逐。由于六张犁与马场町历来是受难者最常集会悼念的遗址，受难人对于这两个地方的诠释权几乎不可动摇，因此，诸如人权园区之类的设置，不过是在抵消多数受难者希望通过六张犁与马场町而传达给民众知道的历史信息。在六张犁的荒烟蔓草中，受难人所树起的大理石纪念碑镌以“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两句铭言，尽显受难人心愿。2012年的马场町“秋祭”，受难人更在重重压力中以临时搭建的钢架竖成宏伟的黑色“人民英雄纪念碑”，向死难于台湾的两岸先烈致敬。如果有所谓的“转型正义”，对于这些受难人而言，那绝非一岛所能设想乃至完成的事情；这必须是以克服两岸民族分裂为前提，才能在两岸社会的携手进步中展开的工作。

民族分裂所造成的伤口，是在分裂的克服中才能得到抚平。正如大众文教基金会——这是知名台籍地下党员简吉先生哲嗣所创立的文化团体——近期的展览文宣所言：“两岸政治与民族的和解，使得过去的

台籍中共党员陆续得以返乡，台湾的左翼历史也获得重新的认识，中华民族的永久和平的前景也充满了希望。”——谨以这段话，代为本文的结语。

资讯：

造梦：柏杨重返绿岛



图四十五

1996年，台湾公共卫视要拍《柏杨传》，这是柏杨在1994年之后第二次返回绿岛。他回到自己当年待过的297号牢房，换上从家里带来的坐牢时的衣裤——满是洞洞的汉衫和屁股上打着大块补丁的宽条裤子，站到从前向外张望的地方——小便池旁边的窗下，趴在高高的窗口边，光着脚，往外看(下图)。在押的9年零26天中，外面的世界就是柏杨的梦想。在他走出绿岛之后，他的梦想，又回到了绿岛，他一直想在这个留下时代罪恶的地方，树立一个碑，让后世记住：“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1999年2月10日，绿岛人权纪念碑落成。时任“总统”的李登辉在揭幕典礼上致词，代表台湾政府向所有曾为追求民主而努力的人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向所有为争取人权而蒙受苦难的人表达最深的歉意。

柏杨的梦想不仅是树起这座碑，他希望这纪念碑能这样植入人心：“人权，不单纯是政治上的争取，法律上的诉讼，而是一种思想的独立，和人格的尊重。”他说这应该成为生活中的基本素质，在人必需的尊严之外，还要学习如何公平地尊重别人的尊严……一切“强凌弱、众暴寡”的强权野蛮行为，都应当用理性、公道、沟通和协调来解决。但台湾并不会因为绿岛立起了人权纪念碑，就能真正实现“转型正义”，也不会因为景美建了人权园区，就能抚平“白色恐怖”的巨创。因此，柏杨在揭幕典礼上告诫：人权纪念碑不仅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更大目标的起步。

真相 和解 审判

文/叶虹灵

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执行长，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现正就读台湾大学社会所博士班。



图四十六 叶虹灵

台湾一路发展转型至今，并非一蹴可就；而民主转型之后对这段黑暗历史的消极处理，相对于和平转型的成就，就显得不那么令人骄傲。台湾族群间迟未愈合的裂痕，受难者与家属久候不到的正义，社会对民主、人权等价值至今缺乏稳固共识，都是我们轻忽转型正义正持续付出的代价。

故事可以从一封E-mail的片段说起：当我问李老先生是否愿意跟学生谈谈他在白色恐怖时期坐牢的经验时，他先说没时间，又表示自己不是名人，没有什么好说的。我继续表达，访谈的时间、地点我们一律配合他的需求；而且无分案情轻重，总之希望能尽量记录下所有政治受难前辈的故事，好让年轻人了解历史。他在电话中喃喃地哽咽：“这是我出狱后，第一次说出这段故事，连我太太都不知道。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以前发生什么事，从来没有人关心过这些事。”

——这是2008年，我在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以下简称真促会)协助执行“威权时期政治受难者访谈计划”过程中，与会内成员们分享的信件。

当时尽管台湾已经“解严”逾20年，但大部分台湾人对于“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仍然所知无多。1990年代由民间陆续进行的访谈计划，要么以1950年代初期涉案人数众多的大型案件为主，如台北的“鹿窟案”、涉及中共地下组织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系列案件；要么则跳跃至1980年代有吕秀莲、陈菊、施明德等涉入的美丽岛案。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的政治暴力系谱，除了“二·二八”事件深植人心外，“戒严”38年(金门、马祖超过40年)酿成的超过1.6万名政治犯，大多面目模糊，几乎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中。



图四十七 1980年3月18日，施明德出庭

为了赶在老人日渐凋零前，留下他们的口述记录，以作为日后与官方档案对照研究的凭据，我们组织培训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团队，在几位大学教师的带领下开始这项工作。这在许多曾经历独裁或威权统治的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原本该由政府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等类似机制，投入资源而进行的历史调查与访谈工作，在台湾，却因为政府的缺席，只好由民间承担。我们刻意挑选的对象是，此前从未以任何方式留下记录的受难者：不是后来跨足政坛的名人；不是重复接受访谈民主英雄或明星级受难者；没有足够的能力撰写出版回忆录等。我们希望尽可能地在史册上刻下这些原本的无名氏，让这些长年来的禁忌、连妻小都未必知晓的压抑经验，得以留存下来。

将近四年下来，我们完成了超过200份的受难者与家属访谈记录。类似我们这样，与时间赛跑抢救历史的，还有些学者与文史工作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大学几个专门访谈五零年代中共地下党案件的研究生，他们以一己之力上山下海，近年来也完成了超过两百份访谈，累积了超过数百万字的逐字稿。

这些以民间涓滴力量进行的工作，正是希望描绘台湾政治受难者的光谱，从中共地下党员到台湾本土人士；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菁英、叱咤风云的抗日名将到乡间不识字的农民、工人、主妇乃至女中学生等；他们或因意识形态的差异；或因为挺身反抗压迫性的国民党政权而集结组织；或以思想、言论不见容于当权者，而成为执政者的敌人，被欲除之而后快。

我们从这些“受害者”的访谈中，还想要勾勒出威权统治的轮廓：包括在戒严体制下，“宪法”保障人民的各种基本权利与自由如何遭到限缩；“国家机器”在逮捕、侦讯、审判乃至执行判决等不同阶段的作为；以及为了稳固统治，政府采行的各式联保切结措施，将监视与控制向下延伸至村里基层网络等。有政治犯背景的已故作家叶石涛的形容相当贴切：“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整个台湾看作是一个大监狱。当然这个大监狱里有无数的小监狱囚禁着台湾人的菁英份子。不管是小监狱或监狱，台湾人没有自由，活在噩梦之中却是一样的。”

这座被政治犯柯旗化喻为“监狱岛”的台湾，至今仍处处留下时代的印迹。例如如今以沙滩、海上活动闻名的度假岛屿澎湖，却早在1949年间，即成为“白色恐怖第一大案”——山东流亡学生澎湖案的所在地。当年8000名因国共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中学生一度暂住澎湖，但却与澎湖驻军发生学生究竟要入伍或留校受教的冲突。1949年7月13日，澎湖防卫司令部在操场召集流亡学生，令其按高矮排列，无分年龄，凡身高达军方标准者，一律强制编入部队。学生不满哭喊、鼓噪着“我们是来读书的”，军方先是开枪示警，后以刺刀刺伤部分上前抗议的学生。带领学生呼口号、大骂军阀的唐克忠老先生至今在访谈中仍记得臀部、大腿遭刺后，血流如注的锥心之痛。

在这之后军方为平息纷扰，以有人检举“共谋潜伏，于军中制造骚动为由”，将积极奔走希望让学生复学的烟台联中校长、分校长张敏之、邹鉴等50多名师生，逮捕送往台北审讯，最后以张、邹等7名师生为潜台共谋为由，在1949年末将7人绑赴马场町枪决。在威权统治期间，即便多位山东籍政界、学界菁英屡有政府应平反冤案的呼声，却无下文，要到“解严”后的政治案件翻案风潮中才得到平反。2008年底，受害者倡议多年的“七一三纪念公园”终于落成，清脆悦耳的风铃声回荡在澎湖特有的玄武岩打造的碑林间，象征后人终能以宽恕与和谐的心境，挣脱凝重的时代负担。

未获补偿的受害者



图五十 陈春长，台湾彰化鹿港人，解放前当兵来大陆。在海峡两岸隔绝的数十年间，他的父母先后在台去世。“一水之隔，遥如登天”，每年清明节，陈春长只能来到海边，面对台湾，遥祭父母亡灵。（摄于20世纪80年代）

离岛尚且如此，台湾本岛更是几乎全面笼罩在两蒋的威权统治阴影下，例如位于台北石碇山区的鹿窟，是台湾的重要煤矿产区。因中共地下组织在此发展基地，而后牵连出的本案，造成200多人被捕，一人当场被击毙，审判后35人遭枪决，其余98人被判刑期合计865年。偏远山区多内婚的结果，是大部分村人都有亲戚关系，一人被捕则牵连数户，有论者甚至以“清乡灭村”称之。还有些未经一般审讯、判决流程被捕的未成年少女，被当时的保密局特务头子谷正文强留差遣私用，被用作家务帮佣、跟监、进行农务长达数年之久。如今地方政府已在当年逮捕刑讯的指挥部“鹿窟菜庙”（现改名光明寺）附近设置纪念碑与鹿窟事件纪念公园。

类似这样的纪念碑、纪念公园，连同白色恐怖时期重要的监狱与拘禁场所，如较为知名的绿岛与景美人权园区；或如已经改为马场町纪念公园的枪决刑场、以乱葬岗形式，埋有大批遭枪决政治犯遗骨的台北市六张犁公墓等，在台湾并不罕见，而且多由台湾当局或地方政府发起并维持。

但除了这类比较软性、纪念性的伤痕遗址维持外，台湾官方在处理这段黑暗历史时并不特别积极。我们既不像南非曾经成立“真相与和

解委员会”，由具道德声望的宗教领袖图图大主教领导，巡回各地举办听证会，让公众理解种族隔离受害者曾有的苦痛，加害者必须以公开坦承交代为恶的真相才能换取特赦；也不像众多拉丁美洲政府如智利与阿根廷，在军政府倒台后，近年来开始积极处理转型正义，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侵犯人权的军警特务乃至独裁者，一一送上法庭审判；更别提铁幕颓倒后，东欧各国曾实施的人事清查制度，前政府高官、秘密警察及其线民等，或是与各类公职绝缘，或是必须接受社会的谴责，原因无他，这些人被认为并不具有足够的民主素养而可承担民主时代的公务。

这些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最常见的机制，在台湾却付之阙如。官方最主要的成就，是以金钱来补偿受难者逝去的生命或消磨在劳狱生活中的青春。截至2012年底为止，台湾政府捐资成立的“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案件审判补偿基金会”成立14年，已经补偿7000多位受难者或家属，共发出196亿的补偿金。然而，不只生命与自由难以用钱弥补，对正义的渴求、民主与人权价值的扎根、族群裂痕的弭平等，更不是单赖金钱补偿可以完成的工作。

台湾一反世界各国处理这类黑暗历史的潮流，在民主化以后，透过关闭政治受难者在“解严”后的上诉之门。原本依照“戒严法”规定，“解严”后依照第八、第九条判决者，得“依法上诉”。但为了担心长期“戒严”造成的大量政治案件，若均予以上诉机会，恐怕会瘫痪法院，“必然严重影响整个体制与社会”，故在“解严”前两周的七月一日，蒋经国政府公布“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其中第九条第二款明文规定“刑事判决已确定者，不得向该管法院上诉或抗告”。此后再经“大法官会议”释字272号解释，“为谋裁判之安定，维持社会秩序所必要”，“国安法”限制人民上诉权利并不“违宪”，这最终封闭了受害者的“司法救济”管道。

人民对于“戒严”时期非常法制的非法或不当军事审判，居然无法在民主化以后依法院上诉管道救济。严谨调查还原史实并非补偿基金会的任务。因此，尽管透过申请，如今受难者或家属可以领有“总统”具名颁发的“名誉恢复证书”，但这仅是象征性作为，政治犯们在“司法”记录

中的“有罪之身”状态并未改变；要将加害者送入“法院”更是不可能的任务。

难怪父亲在六零年代遭到枪决的郭女士，对于即便领取补偿金，但对加害者未能负起责任或受到惩罚，至今仍有正义未能伸张的怨怼：“审讯我父亲的几个人，陈××等人他们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让我非常地愤怒……现在没有私刑，我们也只有无力感，即便国家给我们补偿金，也没有多大意义。”

远未完成的转型

也因未经彻底的真相调查乃至“司法审判”，使得台湾社会对白色恐怖加害者的思考失之扁平，一种看法是将蒋介石视为为所有罪行之“元凶”，这可以民进党“立委”段宜康2012年在“立院”，希望从时任“文建会主委”的龙应台（现为“文化部长”）口中逼问出蒋介石该为白色恐怖负起最高责任，但龙应台始终以结构、集体回覆的几番针锋相对为例：

“段：龙主委，那我这样请教你，相对于在场的你我，相对于在历史上这么多已经逝去的人，我要向你请教，在台湾历史上，对那段历史必须负责的，最大的责任是不是蒋介石、蒋中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前总统——蒋公？是或不是？”

龙：是。第一，您问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我不认为个人是免于这个责任之外。第三，真正判断哪一个人的责任到什么程度，这是整个社会要去探讨的问题。

段：我这样问你好不好，他需不需要负责？或者说他的责任比起你我来说是不是比较大？

龙主任委员应台：我认为我们整个社会要有……

段：你连让掌握最大权力的人为这段历史负责的话都讲不出来，莫怪……

龙：不是，我不轻率的作答。”

蒋介石在“戒严”时期作为在台最高领导人，该为白色恐怖负起的责任是连马英九自上任国民党主席以来，都承认且多次为之道歉的。然而，思考若只停留在蒋氏一人身上，将会忽略加害体制与其他高阶领导人或官员的责任，例如蒋经国自50年代起统领情治机构的特殊身份，至今仍因其统治期间开明、慈爱的形象，以及发展经济的成就，并不常为大众所注意。

或历任“总统府”秘参军长、“国防部长”、参谋总长的桂永清、周至柔、刘士毅等人，其实一如蒋介石般，都曾经在“军法审判”层级核覆的案卷中，加重原本被下级“军法官”轻判的刑罚，甚至改判死刑。而龙“主委”的结构说在这个地方也站不住脚，除了这些握有改判生死大权的高层军政人士历历可数之外，近年来也开始有人研究当年判决政治犯死刑的“军法官”，其实并非如同有些捍卫者言，他们只是“依法行事”，若不重判被告，可能也会为自己惹祸上身。最新的研究结果发现，“法官们”针对类似罪行仍有相当的裁量空间，判决的罪名与刑罚轻重都不一致，当有人轻判被告时，也有人遽下重手处以极刑，这些人要负起的历史责任显有差异。还有一种“乱世用重典”的说法是，在国共战争脉络下，这是捍卫政权的必要之恶。但这个观点无法说明，为何在1954年底台海局势大致稳固后，政府仍续行数十年的“戒严”统治，以行政、“司法”箝制社会，剥夺人民基本自由至八零年代末期。

如果不抛开这些极端且单一的加害者或体制想像，我们难以思考，各种不同类型的体制参与者、协力者的角色与定位。没有司法审判、没有真相调查、加害者从不需要对自己在“戒严”时期的角色进行严肃反省的结果是，社会关于正义、责任价值的混淆。出身反对阵营的陈水扁前“总统”，曾任命“戒严”时期主动起诉党外人士的检察官为检察长；当年起诉美丽岛案的检察官也持续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安坐司法官训练所所长位置。几乎所有加害体系的成员都能在国民党与民进党政府执政期间平步青云，享受优渥的退休生活，徒留广大的政治受害者与家属呼求正义无门。

此外，台湾社会未能彻底反省加害体系的弊病之一，则是社会对于民主、人权等深层价值的认知薄弱，例如位于台北市中心的中正纪念堂，持续以政府资源来纪念威权政府领袖，蒋介石铜像迄今仍遍及全台各级学校、公共场所的独特现象，在民主国家几乎找不到类似案例。对于独裁者蒋经国的美化与怀旧现象也一样荒谬，时至今日，小蒋仍是台湾民众票选领导人物名列前茅的典范之一；他早期冷峻的情报头子身份被中晚期的亲切形象淡化。他镇压美丽岛民主运动时的重手常被选择性忽略，反而因为解除“戒严令”而被不可思议地美化为台湾民主的推手。然而，在他统治后期发生的众多政治刑案，如震惊美国的江南案（情治单位派遣黑道杀手赴美枪杀异议作家）；反对派领导人林义雄老母与双胞胎幼女身中多刀横死，大女儿被杀成重伤的林宅血案；在美国资助过党外杂志的陈文成博士，返国探亲时被警备总部带走问话后，翌日被发现陈尸台大校园的命案等，都被高度怀疑是情治机关所为，蒋经国却鲜少遭逢如其父般被指责为“元凶”的待遇。陈林两案迄今未破，林宅血案发生地如今已经改为长老教会义光教会对外开放；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也展有各式纪念文物与案情简介。这两个同样位于台北市的纪念场址，为想要了解两蒋父子统治台湾面貌的游人提供另一个选择。

最后，没有对这段“戒严”历史进行严谨而翔实的调查，造成的流弊之一是，台湾社会仍相当程度地纠结于各式族群迷思中。“档案局”中虽有超过200万页解密的政治案件档案，但如此庞大的份量，若无政府积极投入整理，单凭民间组织或个别学者之力，实在难以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也因此各式粗糙的历史论断，例如将“本省/外省族群”与“政治压迫的受害者/加害者”等同起来，至今是常见的政治操作方式。

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去年夸夸其言“白色恐怖受害者都是外省人，没有什么本省人”这种完全经不起证据检验的说法，却因为台湾缺乏具有公信力的调查报告，而让政客有众声喧哗、各取所需的操弄空间。尽管学者吴乃德曾经指出，在申请补偿获准的案例中，外省籍受难者的比例约占四成，高于外省人在台湾的人口结构比例（约15%），外省民众的高受难比例，其实已经破除了这种粗糙二分法的迷思。或如另一种常见的政治标签，是把左翼份子或社会主义信徒与外省族群、乃至亲共画上等号，但根据学者林正慧研究50年代的省工委系统案

件，在涉案的两千多人中，本省籍人士占了96%的压倒性多数。这些数据说明了省籍与意识型态选择、乃至在压迫政权中的加害/被害者关系很难建立直接且必然的关联。转型正义工作对台湾的重要价值之一，也在于厘清历史事实，以期能弭平族群裂痕，建立迈向社会共同未来的基础。

台湾从“戒严时代”的“监狱岛”一路发展转型至今，并非一蹴可就；而民主转型之后对这段黑暗历史的消极处理，相对于和平转型的成就，就显得不那么令人骄傲。从离岛到本岛，由北到南，许多已然风化或仍然耸立的各种刑场、监狱遗迹，带给人们的启示或许是，转型正义工作涉及的深层价值，或许乍看之下不是最迫切需要处理的议题。但若以为消极视之，就能让时间自然疗愈伤痕，显然是个误解。台湾族群间迟未愈合的裂痕，受难者与家属久候不到的正义，社会对民主、人权等价值至今缺乏稳固共识，都是我们轻忽转型正义正持续付出的代价。



在这里记录中国



关注信睿微信 了解变化的中国

我们的历史

our history

撷英版

家·国·天下

新历史合作社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新历史合作社 出品

《我们的历史》总第8期

主编：唐建光

购书平台：多看阅读、亚马逊、掌阅、拇指阅读、字节社、豆瓣阅读

互动平台：

公众微信：我们的历史

新浪微博：我们的历史-OURHISTORY

腾讯微博：我们的历史

联系我们：

编辑部：010-57423216

传真：010-84084564

邮箱：xinlishipr@163.com

mailto:ourhistory2013@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8号（附图）



杂志 北京公共文化客厅

● 杂志客厅 ● 入口 (P) 停车场 @杂志客厅

☎ 15001023414 ✉ zazhisalon@163.com

关于我们

我们的历史
our history

“我们的历史”是新历史合作社推出的历史产品品牌。由这本数字杂志开始，您将会看到以“我们的历史”为统一品牌的网络产品、图书产品、活动产品、纪录片、电视节目，以及微信、微博等多种媒体形态呈现并传播的历史内容。

从纸张到电子，从文字到影像，从眼睛到心灵，无论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的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新历史合作社

我们关注历史，我们致力传播；我们执着真相，我们求索答案；我们回望过去，我们前瞻未来。

这是一个专注于历史记录与传播的同人平台，欢迎您的关注、参与和加入。

联系我们：

新浪微博：我们的历史-OURHISTORY

腾讯微博：我们的历史

公众微信：我们的历史

编辑部 010-57423216

产品部 010-57423217

市场部 010-57423218

传真 010-84084564

公共邮箱：ourhistory2013@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8号

目录

写下我们的历史

家史

[父亲的“交代”](#)

[我的眷村](#)

[余美颜：第一欲女的性与情](#)

国史

[这座岛屿的暗黑与光亮](#)

[商务印书馆：出版帝国的易帜](#)

[上海大亨的血色黎明](#)

天下史

[电影：帝国的浮尸](#)

[红色十月的主角与配角](#)

[家国梦](#)

[睡眠：逝去的长梦](#)

中国故事

家•国•天下

**我们的历史撷英版
发刊词**

写下我们的历史

在写下这一行字时，历史正从我们身边溜走。

从宇宙诞生始，从生命诞生始，或是从国家诞生始，更重要的是从每一个人诞生始，历史就存在了，与生俱来，如影随形。历史是过去的一切，是一切的过去。我们存在，历史就会存在；我们怎样，历史就会怎样。

由是而言，历史从来不是我们的身外之事，不是他们的笔下之花。它既不是帝王之谱牒，也不是党国之讖纬，不是课本之条目，也不是考卷之答案。

历史是我们的影子，也是我们的镜子，是前人留给我们的遗产，是我们写给未来的证词。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当事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

历史开始了，让我们记录它，记住它，为今日留证，为明天留言。

新历史合作社

2013年5月

智慧人生

品味舍得



凝聚东方智慧，传承千载诗酒文化，
引导中国生态酿酒潮流，更以百斤好酒仅得两斤舍得精华的卓越品质，
完美诠释智者的取舍之道，堪为高尚智慧人士的最佳犒赏。

 沱牌舍得酒业 <http://www.tuopaishede.cn>

家史

家

父亲的“交代”

要是没有后来一次次的交代材料，父亲便永远地消失在天翻地覆后的历史烟尘中了。

文/胡发云（作家）

1991年深秋的一天，父亲过完他的虚岁八十大寿两个多月之后，兀然离开了我们。

当时父亲身体尚好，没有任何要烦劳我们的地方，在我们忙碌的时候，还可以帮我们做一些家务照看一下孩子。他突发脑溢血的当天上午，还去邮局买了报刊，然后登上我们家附近一座刚刚建好但还未通车的立交桥，从高处看望这个日益变换着面目的古城。回家路上，父亲顺便买了我最喜欢吃的鲜河虾——那天下午，我结束了一个多星期的笔会回家时，父亲正坐在厨房门口的一只小椅子上，将河虾的长须一一剪去，准备晚上做一道他拿手的油焖虾。就在那天下午，他斜依在自己的床上进入了昏睡并在第二天中午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去世，让我顿时有了一种空洞的感觉。第三天，办完父亲的后事，送别了一拨又一拨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邻里故旧，听了许许多多他们对于父亲的回忆与赞颂，我走进他的房间，关上门，一下就闻到了他的气息。屋子里一切都是原样。只在那个梳妆台上方，在母亲的遗像旁，又添了一帧他的遗像。这只梳妆台和另一个大衣柜，是抗战前，他新婚家具中的两件，欧式风格，硬木的，很重。武汉沦陷后的一段混乱时期，家里被乱民进入过，拿走了很多物件。这两样大家具，大概因为太重而被留下，只把大衣柜上的水晶玻璃镜卸走了，大衣柜下面的一个抽屉也被卸走了——进入者大概要用它来装一些小零

碎吧。直到我懂事，大衣柜的柜门上，还贴着一张花鸟画遮丑。那个被拿走的抽屉，也一直留着一个方方的空洞。

站在父亲那通达宁静的遗像前，我放声痛哭了一场，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嚎啕大哭。

我一辈子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四十二年。我曾在一篇关于亲情的文章里这样写过：从我记事起，到我自己也成了父亲，于我来说，父亲已和家里那些老式家具一样，成为一种极熟悉也极惯常的存在。如同我不曾想过我从何处来一样，也不曾想过他将到何处去。我以为我们会这样一直过下去。面对父亲死亡给我的打击与震撼，我才感觉到，他对我是如何重要。而那数十年温厚祥和的日子是如何珍贵。这是任何一个伟人英雄的死都无法比拟的。对于一个给了自己生命的人，对于一个从襁褓中开始守护你，直到你成家立业依然牵挂着你的人，怎样的感谢与敬重都是不为过的。

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想写写他，要动笔时，才发现他一生中，那一段于他，也于我们这个家族有着至关重要关系的历史，我几乎是一无所知——那就是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他在这一段风云际会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的生活经历。他从来没有说过其间的任何一件往事，也没有让我们看到一点和这段往事有关的物件、照片或文字。仿佛那是一段从来不曾存在的岁月。

父亲其实是一个热爱生活并兴致勃勃地记录生活、保存生活的人。一张电影票，一份演剧说明书，连外出旅行的公交车票、公园门票，都会收藏起来。看一次排球联赛，他会将各队出场队员姓名，各场比赛的比分都一一记下，甚至家庭购物，他都会认真记下流水账——这些文字，常常成为我日后写作的资料。他也给我们讲过许多他年轻时候的游历或奇遇，北京的风情，西安的吃食，在庐山爬好汉坡，在大西北熬鹰，坐羊皮筏子渡滚滚黄河，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看那种豪华赌场的赌徒们打“苏哈”一夜输掉万贯家产，在大沙漠骑马掉队遇见狼群，被它们团团围困在一个小沙丘上，天色渐黑，直到烧完了随身带的所有可以燃烧的东西，才被赶来的同伴们救下，有时也会讲到几

件他一生中很得意的奇特医案，但那都是发生在平民身上的故事……他坚决地回避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一段岁月。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搬迁新居。清理父母的各类遗物时，发现了和父亲那一段岁月有关的东西——在一只破损不堪的牛皮纸袋里，装着厚厚一摞纸质不同、墨迹各异的材料，那是1949年后，父亲在历次运动中的自传、履历、交代材料或认罪书。好几次，我读着读着，不忍再读下去。这个一生都那么自尊自持、淡定从容的人，会写下这么多自污自辱的文字。如果说50年代的自传尚还客观、冷静、抱持着分寸，到了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认罪书，就不忍卒读了。那是他自1949年来的二十年中，第一次被隔离审查，那时候，我们兄妹三个已经插队去了，家里只有多病的母亲和刚上初中的小弟。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最高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我的历史罪恶活动全面交待

我是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干了一段长时间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替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蒋帮卖命效劳,残酷地镇压人民,镇压革命,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罪人,解放以后,党和革命人民对我宽大处理,没有将我治罪,还给我工作,这是我最难忘的大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阶级地位,生活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近十多年来由于我没有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极其严重,剥削阶级思想意识依然存在,並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这次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革委会和革命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我的罪恶历史进行审查和揭发批判,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对我极大的帮助,极大的教育,极大的挽救,使我思想上逐步有所提高,认识到我过去反党反人民的罪恶确实是严重的,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只有老老实实地把以往的见不得人的罪恶历史彻底地进行交待,低头认罪,争取党和革命群众对我从宽处理,才是我唯一的出路。现将我在国民党反动派

训练第九期受短期军医训练三个月,课程为内外科,七七事变后,我们学习期满,仍回伪军单位。

1937年下半年伪政府为应付抗日在武汉成立防空司令部,兼作防毒演习,我也参加过演习,防毒演习是公开地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的,由傅英先经手主办(傅英先曾在南京伪防毒训练班学习过,他回汉后担任伪武汉市防空司令部防毒组组长)那时我也参加过帮助他作一些防毒器材的准备工作,防毒演习的内容是以动物(狗兔)作试验,将动物有的戴上防毒面罩,有的不戴,放置在有玻璃的纸箱中,通过毒气后,观察防毒面罩的效果。

1937年12月伪武汉警备旅改编为伪陆军第185师,我被调至该师1092团医务所当一付佐(上尉)军医,1938年夏旅部办着训练班我讲3几课,1938年下半年日寇逼近武汉,我于9月间随伪部队开赴咸宁,金牛镇前方,伪部队与日寇接触后被打垮,我同伪1092团医务所军医主任杜家瑞、徐军医(名字记不清)等随着溃退的伪部队步行到长沙。

我在伪武汉警备旅第二团医务所工作时,上面曾发给每个连队一把长指挥刀,平时都不佩带,只有在旅部召集全旅检阅时才佩带,平时是放在家中,我随伪部队离开武汉时,没有将刀带走,武汉被日寇沦陷后,我父亲将刀埋在家中地板下,1955年我父亲将房子卖掉,在出卖房屋办理各项手续时我均未过问,以后我父亲曾对我说过,新房主在修理房屋时将那把指挥刀挖出来上交,当时未引起我的重视,以为上交了也就罢了,所以一直未向组织上交。

我到长沙后住的三天内我到了我妹夫胡叔居,我爱人杨曼云(在日寇将要逼近武汉之前我二弟胡家铺在伪军医第33卫生

父亲之所以数十年来一直保留着这些取辱底稿，我想大约是为了安全，他必须在不同运动不同背景下，保持自己叙述或交代的前后统一，唯一不同的是，他对自己“罪恶历史”交代得更彻底，更细致，以至许多微不足道或纯属私人生活的细碎往事，都不断地被挖掘出来。他对自己的批判也在一次次升级，一次次加入新的政治语词，以符合运动的需要。至于为什么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已宣布放弃阶级斗争，他自己也进入耄耋之年，还依然保存着这些屈辱的文字，是他有意想留给我们，还是他没有完全相信，这些东西是永远也用不着了，就已不得而知了。

为了认识父亲，我不得不一次次背负沉重，强忍痛楚，将父亲在一次次愈来愈强大的压迫与恐惧中，为了自身和家庭的安全写下的那些文字读下去，这件事断断续续用了我好几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又沿着父亲文字的线索，四处搜寻它背后的历史真相。最后，我终于从这些文字中读到一个壮丽温婉令人激动怅然的家族故事，一个时代大变迁，大震荡中的汉口人家的命运。

我见到父亲最早的一份履历，是1955年写的，查阅了一下，当时正值审干运动。可以看出，当年的父亲，已经学会了一套“新中国”的语言，并按照新时代的价值观来进行陈述。他在自己1949年前所服务过的许多机构前，都加上一个“伪”字——“伪一四五后方医院”、“伪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伪测量学校”（但略去了“军政部”、“中央陆地”等字眼），包括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惨烈屠戮破坏，并导致胡家背井离乡从江西迁徙到武汉的张献忠，也用了这样标准的革命语言“……胡家瑞，男，1913年9月3日出生。湖北省武汉市人。祖籍江西，在张献忠领导农民起义时迁来武汉居住。我祖父胡远盛年青时自行耕种小块土地，到老年时因所种田地靠近铁路线被当时铁路局购买去了，因此改业经商，在汉口开设振丰织布厂，数年后由于生意不好而停业，购置平房数间靠收租金过活。1915年患脑充血逝世。”

这一些文字中，父亲大约考虑到祖辈的土地、财富、社会政治态度等敏感问题，在叙述中都做了趋利避害的陈述，也让我知道了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在新政建立之后，毁掉了那么多旧时代的照片——因为照片上可以透露太多的信息。后来，我向亲戚们征集了许多胡家老

照片，询问了许多胡家往事，并实地走访了祖父辈的故居，看到了许多父亲未曾充分表述的情况。父亲说的曾祖父的“小块土地”，据我的大表姐说，在今天汉口闹市区的京汉大道上，紧邻当年最繁华的中山大道。20世纪初，张之洞修筑京汉铁路，征购了我曾祖父那块土地。曾祖父用那笔钱款，在汉口的发祥地——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居仁门长堤街购买了四处房产，自住一处，分给我祖父兄弟三人各分得一处，余下的现金，也做了这样的平分。这样，才有了后来我祖父兄弟三人投资碾米厂、织布厂等商业活动。2008年，我找到长堤街安定巷口的祖父故居，一个多世纪后，虽然进行过多次修葺改建，但原来的木质框架结构大多还在。临长堤街的两层楼房有两个门面宽，向安宁巷内延伸约二十多米，占地约二百多平方米。现在这块宅基地上已经住着十多户人家。我又找到附近祖父哥哥的故居，现在是我的远房堂兄胡发青的遗孀及儿子一家居住。他们说，1949年后，当年老屋的院子被房管所盖了公房，近些年，他们在老屋的宅基地上翻盖了这栋三层楼新房，占地面积也有近百平方米。



作者的曾祖父在二十世纪初

祖父一代，是胡家最后一代诗书耕读的传统生活者。他们自治自得的日子，突然间就被一次世道变迁兀然打断了，而他们的儿女们，

却是如鱼得水地进入到一种新的生活中。祖父那一辈，应该是怅然又平和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但是纲常尊严，生活习性都不允许他们也像子女那样改变自己。记忆中，祖父春夏秋冬所有的服饰，没有一样是洋装，甚至连中山装都没有。一直到他老人家上世纪60年代82岁去世，永远是传统的长衫长裤布袜布鞋，即便在武汉的酷夏中，也绝不穿短衫短裤。我父亲那一代，则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很快西化了，与祖父相反，他们留下的民国照片中，看不到一件中式服装。



1951年作者三叔一家和祖父胡传茂的合影。这样的旧时打扮，胡传茂坚守了一生。

祖父那一辈在这样一次大的社会转型中，是无奈的失败者和出局者。几次不成功的投资之后，他们都退回到个人的传统生活中。记得我母亲多次开玩笑说，你爷爷兄弟三个，一个玩鸟玩了一辈子，一个钓鱼钓了一辈子，一个玩蛐蛐玩了一辈子。母亲说的钓鱼的那一个，就是我祖父，七八十岁的时候，还会坐了火车到临近乡下去钓鱼。

但是，他们都将自己的子弟，培养成了最早的一批现代武汉人。满清到民国，两代人完成了一次天翻地覆又温文尔雅的历史转型。

“我父亲胡传茂出生于1881年9月7日。幼时在私塾读过4年书。成年后随祖父种地和经商。自从我祖父去世以后，曾做过猪鬃生意，一度和朋友合伙在硚口汉正街杨家河开设碾米厂，因为各股东意见不合而退股，并曾在旅舍和板厂当过店员。近多年来因年老体弱没有工作。我父亲一生胆小谨慎，闲暇的时候喜欢钓鱼，从来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



年轻时的胡传茂

“我兄弟姐妹共5人。姐妹各一，均已婚。弟二人都是医务工作者，二弟胡家镛现在汉口江汉区工会工厂联合保健站当医师，三弟胡家庆现在汉口市二医院当医师。我们兄弟姐妹因居住分散，平时很少

会面。我爱人王剑华浙江嘉兴人，初中文化，曾当过小学教员和店员，现在家中料理家务。目前我有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很年幼。

我是1919年2月间进汉口桥口惠民亭私立辅德小学读书，于1925年毕业，继续到汉口汉正街至公巷天主堂内进然中学读书，至1929年8月毕业后，由我堂兄胡家骥介绍到汉口鄱阳街天主堂医院学习班学习，当时因该医院学生名额已满，调至该院医师郑香亭诊所学习。1930年夏季，郑医师到上海开业并兼办牛奶厂，我也随同继续学习。”



抗日战争开始以前的胡家瑞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是武汉最好的一段时光，是史说“黄金十年”的顶峰。我父亲兄弟姐妹五人陆续立业成家。父亲和二叔都当了医生，三叔正在学业攻读之中。祖父在丧偶数年之后，放下了独自养育一群儿女的重担，除自己有房产及租金，还可以安享儿女之福了。但是，遥远的北方，一直暗涌着不祥风云，“九一八”之后，中国大地一直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父亲在自传中写到：“1935年11月，我考入武昌武汉警备旅第二团当司药，后来调为军医。1937年6月，我被保送到南京伪军医署军医学校军医训练班第九期受医务训练。七七事变，训练班于8月间结束，我仍回汉到原伪部队工作。1937年12月份，武汉警备旅改编为伪陆军第一八五师，我被调至该师一〇九二团当一等佐军医。1938年10月中旬，随伪部队开到咸宁县金牛镇前方与日寇作战，被打垮后，伪部队向湖南溃退，我到长沙后没有赶上伪部队，即随伪军署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我二弟胡家镛及女友，妹胡淑君，妹夫洪锦麟，爱人杨曼云都在该卫生船舶工作，他们是在我离开武汉的前一天送一批伤员到长沙的，我到长沙后找着了他们）。才知道二弟胡家镛又返回武汉去接另一批伤员了。”



这是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武昌解放路，该照片从蛇山天桥上拍摄。从1952年至1983年，作者胡发云在这一条路上住了31年，度过了整个幼年、童年和青少年。于作者而言，许多店铺都记忆犹新。这条最繁华的路段上，连同几百米远的民主路，起码有五、六家书店。

一部艰苦卓绝碧血汗青的武汉保卫战，在父亲的自传中变成了这样简单平淡的数百个字。在十多年后清队中的几次交代材料中，父亲对这一段历史有过更加详尽的描述，虽然里面充满文革的意识形态语言，但是从中我依然读到了那个民族危亡故园飘摇的气息。

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中国的危局日渐凸显。淞沪血战三个月，11月12日上海失守。一个月后，南京沦陷，日寇屠城。民国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是许多军用物资、工业设备、大学的图书仪器和各类人才都还滞留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重要机关以及主要的党政军要员们也已移驻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

军事、外交、经济与文化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也转移到了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日军攻克南京之后，紧接着就制订了进攻武汉的军事计划。1938年7月初，华中派遣军的兵力由徐州会战后的3个师团增加到14个师团，占当时侵华日军总兵力的百分之三十多，配备各型飞机300架，各型舰艇120艘。意图毕其功于一役，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完成对全中国的占领。

一场惨烈的血战即将开打。父亲在南京军医学校受训返汉，立即投入到防空防化演习培训中，父亲在1969年3月清队运动的隔离审查中写到：“1937年下半年，反动政府为了假抗日，在武汉成立防空司令部，并作防空防毒演习，我也参加过演习。防空演习是公开地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的……旅部办看护训练班，我讲了几次课。”

作为武汉保卫战的亲历者，父亲一定知道，那段日子，武汉上空发生过什么事情。但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那八个月中，血洒长天的武汉大空战。但正是父亲的这些交代，引领我去撕开了重重历史帷幕。作为一个在武汉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人，我居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家乡曾发生过中国二十世纪最大规模也最壮烈的空战。没有提到那些年轻的空军飞行员在敌我军力悬殊的搏杀中，一批批献出自己美好的青春，也没有提到无数的父老乡亲在大轰炸中血肉横飞家产毁尽……艰苦卓绝的武汉保卫战就是从一场空战开始的：“1938年2月18日中午，武汉城区响起了尖锐的空袭警报声，日军驱逐机26架掩护轰炸机12架正向武汉飞来。驻防汉口王家墩机场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代大队长李桂丹率29架苏制E-15、E-16战机升空迎击，在武汉上空与敌机英勇激战，击落敌机14架。其余日机狼狈逃窜，未能进入武汉市投弹。中国空军损失飞机4架。大队长李桂丹、分队长吕基淳、飞行员李鹏翔、巴清正、王怡5位勇士血洒长空。”（《武汉保卫战之二——武汉上空的鹰》）

父亲在交代中写到的“金牛之役”，也是一场可歌可泣的悲壮战歌。金牛镇，古称黄石、大冶，江夏，咸宁、鄂州五县通衢之地，是扼控

武汉南大门的要冲。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进攻安庆起，至10月25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止，历时约4个半月。日军前后投入武汉作战的兵力达35万余众（是时，日本全国陆军的总兵力约90万人），中国参战的部队则更达130个师，约100万人。会战时间之长、参战兵力之多、规模之大，是八年抗战期间任何一次战役所不能比的。父亲当时所在的185师，正是武汉保卫战结束之前，殿后作战的一支部队。军史上有着这最后一役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记载：“罗卓英指挥武昌以南金牛方面的作战，掩护各军撤退，整个武汉城区只留卫戍部队一个旅（第185师第545旅）的正规军作象征性的抵抗。至10月24日，以中山舰对日空战直至沉没，宣告了武汉失守。这天，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汉口市市长吴国桢宣布：‘保卫大武汉之战，我们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之能事，我们的最高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我们于人口的疏散，产业的转移，已经走得相当彻底，而且我们还掩护了后方建设……’同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关报《扫荡报》分别发表了告别武汉的社论。”

26日，日军第9师团攻占了贺胜桥，切断了粤汉铁路，但是，此时中国守军已经撤到了湘北及鄂西地区，日军企图在武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未能得逞。

武汉保卫战开始前数月，父亲让自己的妻子杨曼云，妹妹胡淑君，二叔胡家镛的女友（我至今没能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后来的家庭变故，家族对她颇有怨艾）及妹夫洪锦麟进行了三个月的战地看护培训，进入战时的一个特殊机构——军政部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这是战时通过水路救治运送伤病员的舰船医院。武汉保卫战中大量的伤病员，都要通过长江水运到湖南。在日军掌握制空权的形势下，这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我记起小时候，他们几位长辈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数次谈到在长江行船时，遭遇日寇飞机大轰炸，有一次他们前后的轮船都被炸沉，只有他们那一艘得以幸免。只是我并不知道那是一艘国军的医疗卫生船舶。父亲在金牛之役结束之后，步行到长沙，多方打听，找到已经护送伤病员抵达长沙的妻子，妹妹，二弟女友。但得知二弟胡家镛在这危难之时，再次返回武汉去接尚还留在那里的最后一批伤兵，那时，武汉地区大部分已被日军占领。第二天，适逢长沙大火，全城火光熊熊浓烟蔽空，整个长沙变为废墟。

短短数月间，父亲兄妹数人，宁静温馨的都市生活，兀然陷于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战火中。那时，年岁最长的父亲25岁，二弟的女友尚未满二十。我的表姐曾听长辈说，考虑到这一路颠沛流离风餐露宿会有许多的不便，父亲和大家商量了一下，给二弟胡家镛和女友匆匆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婚礼是在一个庙里办的。在父亲文革中另一份交代中，写到是在当时作为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临时驻地的长沙金刚禅院找到这几位女眷的，那么表姐说的庙，大约就是这金刚禅院了。一个战火狼烟颠沛流离中的战地婚礼，没有酒宴，没有洞房，只有漫漫长路，等待这几个年轻人继续跋涉。



胡家瑞兄妹三人广西汇合

父亲的履历中继续写道：“在1939年2月间派我到广西兴安大溶江镇伪军政部第一四五后方医院当一等佐军医，担任重病室与伤员室内

科主治工作。同年8月被迫参加该院全体员兵集体入国民党，几个月后每人发给一个党证（解放时我将它烧掉了）。当时我对政治是模糊的，只知道搞医务工作。”



胡家瑞战争年代使用过的部分医疗器材，包括输液瓶、听诊器探头等等。椭圆形铜质注射器消毒盒上还可以看见“德国制造”的字样。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的堂姐，也就是二叔胡家镛的女儿从广州来汉省亲，我问起父辈的往事，她告诉我，她那儿有一张照片，是我

父亲、二叔、小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杨曼云，还有已经挺着个大肚子的她妈妈的合影。我问，肚子里是不是你？堂姐说，是她的哥哥，比她大三岁，在她出生前就死掉了。因为这个哥哥的早夭，她父母亲感情有了裂痕。母亲怨恨父亲，一个当医生的，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她母亲一度情绪异常，常常和二叔争吵。生下堂姐不久，她独自一人去了重庆，在舞场里和一个英国人好上了，不久和那个英国人一起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英国。这样的一次私奔，对于胡氏家族来说，是一个逆天的恶行，也是一次奇耻大辱。后来，以至数十年后，堂姐的生母多次要求回来探望女儿，都被我祖父等坚决地拒绝了。她们最后见面与和解，是在上世纪末。

战时药品紧张，即便是自己的亲人，也不能随便动用军用药品的。但是二叔的妻子一直不能原谅这一点。

这个悲剧也发生在我父亲身上。1940年冬天，他年轻柔弱的妻子杨曼云，在两年多的跋涉辗转辛劳困顿后，因病不治去世。这是父亲一生中，对他打击最大的一件事。其后数十年中，父亲从没有再提起过这件断肠往事。在他的交代材料中，有这么几句淡淡的文字，但我读得出他从未遗忘的伤痛：“1940年冬我爱人杨曼云因病去世，由于夫妻感情的关系，当时对工作不起劲，想离开大溶江镇，于1941年3月间请准长假离开医院，于1941年夏季到达重庆后，找到了我爱人的哥哥杨圣诚处闲居。”

堂姐回到广州，给我寄来了那张极其珍贵的照片。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让他们在这样一个阴郁的秋天相聚了。照片上，我父亲他们五个都穿着便装（或许正是这一点，让这张照片得以保存到现在）。面容消瘦，神色阴郁，衣衫也远不如往日讲究。一点也看不出劫后重逢的欣喜。杨曼云静静站在父亲身边，这大约是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我曾在我三叔家看过她一张战前的照片，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斜躺在草地上，纯净又快乐的样子。

杨曼云去世的时候，应该很年轻。她还没来得及生孩子。

九年之后，我母亲要生我的前些天，做了一个梦。梦里杨曼云来到她床前，神色悲戚，对我母亲说，看你多好啊，有了家，又要有孩子了。然后久久无语。我母亲将这个梦对我父亲说了。父亲沉吟半天说，这个孩子生了，不管是男是女，就叫云吧。于是，我的名字，就和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性有了关联。这个女人跟随我父亲，在战火中流离半个南中国，最后把年轻的骨骸，埋在了西南边陲一个叫大溶江镇的陌生地方。也埋葬了父亲战乱之中最珍贵的一段恩爱。

“抗日战争胜利，医院随兵役部办理结束。我于1946年元月被调至白市驿伪第四军官总队第一大队为队员兼医务所主任，1946年3月由过去的同事唐健民介绍我进重庆北碚伪中央测量学校校医院当二等正军医（中校）。该校在1947年秋迁到苏州。”

父亲调往苏州，这个美丽的江南文化名城，从此与我有了生命联系。

父亲一生喜爱艺术，1940年，刚到广西大溶江145后方医院的时候，父亲曾和小姑父一起，组织了一个京剧社，为那些伤病员和医务人员演出。**父亲去黑头，姑父去小生**。我们小的时候，偶尔会听到他们一起唱唱老戏。

父亲在另外一篇交代材料中写了，到了苏州之后，很快爱上了苏州评弹。闲暇时光，常去各个书场听书。当时我母亲在评弹艺人张月泉工作室（原文如此）工作。母亲的任务是到各个书场听书，将其他评弹艺人的好段子，好书目默记下来，回来后整理成文，供张月泉参考或使用。（母亲的这段经历，她生前也从未对我们说起过。）就这样，在书场里，他们相识相爱了。1948年春上，他们结婚了。我算了算，我应该是在苏州孕育的。

顺便说一声，查阅父亲在苏州中央陆军大地测量学校资料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之父吴忠性，和父亲曾是同事。一个是校医，一个是教官。只是前者在1949年后进入共产党军队，而我父亲当年婉谢了让他留在共产党军队医院的请求，乘舟东下，回到故乡。

父亲最后写到：“1948年9月调至汉口洞庭街兰陵路口伪军医署第二休养总队当二等正医务主任。1949年2月该伪总队奉伪军医所的命令向重庆迁移，先搬到湖南衡阳，到衡阳后总队以下的几个组改为大队，1949年5月伪总队分数批迁重庆，有的走水路，有的走陆路，我同总队部的一部分职员和眷属是第一批乘火车到柳州转搭汽车于7月抵达重庆。11月重庆解放前夕，该队总队长金克明逃跑了，总部队大部分同事不愿意走等待解放。重庆解放后，我们随着伪军医署所在解放军二野军事代表赵文怀领导下办理清点移交物资，并在二野卫生部学习队学习三个月，于1950年3月呈请批准返籍。蒙二野派船并发给生活等费回汉。”

这二百多字，其间又有多少风雨飘摇荡气回肠的经历？1948年9月，整整十年之后，父亲回到了三百年来先人居住的故乡武汉。带回了他的新妻，和新妻腹中的孩子。那是他动荡半生之后的第一个孩子。我曾见过一张胡氏家族在那年冬季的全家福照片，年近七旬的祖父端坐中间，父辈兄弟姐妹五个及其配偶子女依次前后左右排列。长辈们指着照片上我母亲隆起的肚子对我说，那就是你。那是自1938年那个离乱之秋十年后，全家人的第一次团聚。

那一年父亲已经35岁。父亲依然在为那些伤病员工作，但这一次的伤病员，是在中国人的自相厮杀中流血受伤的。

1949年1月8日，我在离祖父家不远的普爱医院出生。那是一家建于1864年的教会医院，也是湖北省最早的西医院。据说那一天，蒋介石在武汉黄浦路官邸召见孙科、张群、张治中，商讨最后的和谈事宜，并令外交部长吴铁城知会美、英、苏、法四国驻华大使，请其协助完成和谈，未果。13天之后，老蒋黯然下野。于是，便有了父亲履历中交代的“伪总队奉伪军医所的命令向重庆迁移”——几乎重复了十年前那一条护送伤病员艰难西撤的路线。那是1949年2月，我刚刚满月。这次西撤历经五个月，7月到达重庆，11月底二野大军进入重庆。父亲是有机会去台的，他当时已是休养大队负责人。但是他放弃了，守护着全队设备药品还有那些伤病员等待一次历史的大更迭。父亲也是可以进入共产党的军队医院的，但是他也放弃了。正如他说的，他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认为治病救人，悬壶济世，是医生的天职。他后来

才知道，有一些人，哪怕是保家卫国浴血杀敌的手足同胞，也是不可以被救治的。救治他们，就等于是他们的帮凶，是人民的敌人。这些在文革中成为组织和群众对他说得最多的批判用语，后来也成为父亲对自己罪行的批判用语。

一段漫长的军旅医生生涯终于结束了，十多年战争的腥风血雨也停息了。父亲卸甲还乡。他当年拿着二野军代处发给的批文与路费乘舟东下时，大概没有预料到，其后十多年中，还有着那么漫长的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在等待着他。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照片，是父母和幼年的我。这张照片一直都在家里的：母亲穿着旗袍高跟鞋，抱着我。父亲长裤衬衣，侧后站立。父母脸上都是安宁幸福的微笑，一点也没有另一种危险与苦难逼近的感觉。倒是不到一岁的我，眼里充满疑惑和思虑，和那种年龄很不相符。



十个月的胡发云和父母摄于1949年最后的重庆。这是胡家瑞最后一张身着军便装的照片。

一直到我弄清了父亲那长长一段历史之后，我才发现这张照片是在重庆拍的，仔细看，父亲穿的是夏季的军便装，肩头还隐约看得见肩章扣带。这是父亲唯一一张和他军旅生活有关联的照片。他所有其他物件都毁掉了，照片，手枪，中正剑，各种可能会带来麻烦的衣物和用品，还有他及他的亲人们所经历的一切。我想，要是没有后来一次次的交代材料，父亲便永远地消失在天翻地覆后的历史烟尘中了。

父亲的叙述中，多次提及“请假”、“请调”、“请辞”，说明了当年国民革命军机构中的技术人员，是拥有很大的职业选择权的。当年，不论在日占区还是在大后方，作为一名年富力强的医生完全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样式，甚至留在沦陷的武汉，也依然可以过好自己的日子。我的三叔胡家庆在日寇逼近的时候，因为尚未成年，和祖父一起留在了武汉，数年后也成为一名医生，从日据时期，一直到1949年后，他是我父亲兄弟三人中生活得最富裕也最安稳的。这只能说，十四年的军旅生涯，是父亲自己的选择。这也是我们从未听到父亲对他当年的选择悔痛不已怨天尤人的原因。

父亲从中学起，读的就是教会学校，工作初期，也是教会医院。一直给他各种专业教育和提携的天主堂医院医师兼太和医院院长郑香亭先生，也是一位天主教徒。我不知道父亲是否也曾是一名教徒，或有宗教信仰。但是从他一世的作为，对待人生命运的态度，我看到他内心的光。

本文摘自：《由我而史》（链接）

我的眷村

文/朱天衣

生长在一个知名的文学家庭，其父朱西宁、其母刘慕沙，均是著名作家。朱天衣在家中排行第三，其姐朱天文、朱天心也是著名作家。年轻时爱好评剧与民谣演出，曾以民谣《深秋浓浓的枫红里》获得金韵奖。著有小说《甜蜜梦幻》《三姊妹》《下午茶话题》《带我去吧！月光》《朱西宁的文学家庭》《朱天衣散文集》《我的山居动物同伴们》等。其他著作有《朱天衣的作文课》《朱天衣说故事》等。



从小在眷村长大，使我一直错觉以为这里就是所有，就是全世界。当我长大后，才明白孩提时，自己真的是一只青蛙，而眷村就是供我生长的那口井。

从小到大，我待过三个眷村，分别是桃园大溪的“侨爱新村”、台北板桥的“妇联一村”及台北市的“内湖一村”，也就是说，在12岁前，我整个童年都是在眷村度过的。



我两岁前是住在“侨爱新村”的，父亲虽已在台北军中电台服役，但却没能分到就近的眷舍，只好每天长途跋涉通勤于台北、桃园之间，有时加班没赶上桃园回大溪的末班公车，便要徒步两个钟头才能到家，即便有三轮车可搭，父亲也会省下车资，为我们姊妹仨买饼干，有时脚气严重，还是宁可歪着脚板走十几公里回家，那时我还是个奶娃，一切都浑然无知，直至后来迁居桃园，常往返这条路，才知道父亲的辛苦。

前一阵子，和两位姊姊回到“妇联一村”去缅怀旧事，以那仅存的几个建筑物为坐标，细细寻觅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上学的路径、打预防

针的卫生所、村子周边的小市场……当我们在细数过往时，竟然发现在同一个环境中长大，彼此所记得的却是如此参差，也许是因着年龄的差距、玩伴的不同，所以三个人在成长中汲取的也会不同。

对姊妹们来说，“妇联一村”是她们人生伊始，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我欣羡她们能记得那么多，且都是连贯的，那时才3岁的我，记忆都是片段的，我只记得那时庭院是以竹篱笆圈围，还用公共厕所，烧饭煮水是用煤球炉，马路则以碎煤渣铺就，那煤渣常卡在脚底与木屐间令人生疼，环境里种的多是尤加利(桉树)和羊蹄角，但树都不高，父亲和邻居叔伯也才30来岁，这样的居住环境，对随时还想“反攻大陆”回乡的父执辈们已足够了。

直到1963年葛洛莉台风来袭，适逢大潮海水倒灌，上游石门水库又无预警泄洪，位处中游的我们便被滚滚黄水给淹没了，幸好水漫至屋檐便打住了，大家还有天花板上的阁楼可躲。是后来长大后，才知道原来“妇联一村”所在的浮州里，顾名思义的就是块浮在大汉溪上的沙州，大水来时不闹水患才怪，这也是之后不得不迁村的缘故。

在这之前，父亲因为是一起来台拜把弟兄中最早成家的，除了年节，即便一般休假，这些叔叔伯伯都会把我们这儿当家回，再加上文艺圈的朋友不时也会来家吃饭，所以在经济上总是寅吃卯粮，尔后却因着这场大水，各方来的捐助金，使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得到了舒缓，而且因此得以分配到正兴建中的“内湖一村”，也该算是因祸得福了。



“内湖一村”是个中型眷村，因为是新建好的，各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厕所，而且是坐式的冲水马桶，厨房里也开始用桶装瓦斯炉了。配住在此的多是在“国防部”及情报单位工作的眷属，周围还有大型的“影剧五村”“宪光新村”“精忠新村”，我们的村子住了98户人家，其他村子少说都有两三百户人家，也就是说，在我们眷村外仍是眷村，从我4岁

起，就在这范围里活动、在这环境中长大，这让我一直错觉以为这就是所有、这就是全世界。

在学校，也都是眷村孩子的天下，每值开学要填写父母亲工作栏时，我们清一色填写的都是“军”，只有少数“公”或“教”，而本省同学则多是“农”“工”，或是一些我们看不懂的职业。在课业上、在那“国语”教学的年代，本省孩子在起跑点上便吃了些亏，他们回家又总有忙不完的农事家事，而且相较之下，他们的父母也不是那么在意功课，也因此，我一直觉得他们是沉默的、少数的、需要特别关怀的。当我长大后看到人口普查资料——外省人只占台湾总人口18%，算是少数民族时，震惊得不得了，才明白孩提时，自己真的是一只青蛙，而眷村就是供我生长的那口井。

在这几个村子围起来的天地里，间杂着几家杂货店、小面馆、小诊所、理发院……外带一间小戏院、一个小菜市场，生活机能就完备了，无需他求就可自给自足了，即便其中许多店家摊贩不是住在眷村里，也不是外省人，但是当打烊收摊后，他们就自动消失了，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打哪儿来、每晚又退回到什么地方，就像电影里的布景道具、临时演员，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生活所需。

三

而在眷村里，生活中更基本的柴米油盐则是采配给制，由专人拉着车送到村里来，每当听到摇着铃铛的声音，便把眷补证、米袋、油罐准备好，我很记得那眷粮本子的模样，里头用虚线分隔着，写着米面油盐，另有煤代金可领，还分大口小口，一般人家绝对是够吃的，像我们家客人多、狗猫多，每个月就必须向邻居转买些米票，或拿面粉换米，只要别公然交易就好。

有时也会有一些活动摊贩来村里兜售，挑着扁担卖炸臭豆腐的，骑脚踏车卖冰淇淋、麦芽糖的，三轮小货车卖的则是饼干，那饼干装在长方形的铁桶里，桶子向外的一面是透明的，可以清楚看到里面装

的是什么东西，避免铁桶开开关关饼干会受潮，买的时候是论斤秤的，那种拿在手上一根杆子的秤。当时做生意好方便，手握一根秤就可以走天下了。

最受小孩欢迎的就是爆米花了，老板会在村子的广场摆上好大阵仗，我们小孩玩得再热闹，顿时也会作鸟兽散，有的回家淘一奶粉罐的米，有的则围在一旁闻香凑热闹，我们家米都不够吃了，当然只有围观的份，大家等的就是那最后一响，“砰”的好大一声，接着就看到雪白蓬松的米花滚进铁网里，有的人家就这么吃了，讲究点的会拌上浓稠的糖浆，再压在木头模具里切成一块一块就好打包回家了，这算是小时候比较高档的零嘴了。

那时节，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父亲们拿的军饷饿不死人，但也好不到哪去，日子过得如何，端看这家女主人如何持家，经心些的，便会利用面粉做出各式各样的点心来打牙祭，北方家庭的包子馒头就不用说了，包着肉馅的饺子烧卖也都是自己和面擀皮，我的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客家人，兴头来时，也和邻居妈妈学着做面点，芝麻包子、甜咸烧卖都是儿时记忆深刻的面食点心，有时连酒也酿，最常见的是葡萄酒、李子酒，有一次连芭乐(番石榴)都拿来当酿酒食材，记忆中那味道实在不怎么样，难怪会被尘封起来，大概每个人家床底都有几坛这样弃之可惜、食之又不怎么样的酒吧！

后来台湾外销慢慢发展起来，妈妈们便从工厂批一些手工回来贴补家用，最多的是圣诞装饰，那五光十色的灯泡彩球及彩带，把原本平乏无奇的屋子都点缀得亮丽起来了，有一阵子接的手工是在毛衣上绣花，便可看到许多家里都摆着一个绷架，那粗粗的针线在画了图样的薄纸间穿梭，一朵朵花便这么绽放了，我家妈妈忙译稿、忙打网球，有一阵子还迷上钓鱼，钓来的鱼也不吃搁在水缸里养，算是村里的化外之民，为此我很欣羡那些会做手工妈妈的家庭，至少她们的儿女可跟着做、赚点外快。

不过，也不是每个妈妈都如此勤俭建家，像我的母亲终年养着一群不事生产、没人要的猫猫狗狗，大概早被划归异类之属，至于沉迷于方城之战的妈妈也有，眷村里是不许赌博打麻将的，若有人耐不住

一定要打，总会在桌面先罩上军毯，再铺上薄薄一张纸，为的是隐匿麻将牌碰撞的声音，我长大后看香港人乒乒乓乓打麻将，都觉得惊心不已。有一次夜半，父亲还在写稿，听到家里狗吠不已，开门张望，只见一个宪兵低声示意，要父亲管管狗，他们正在执行公务，后来才知道宪兵进村子是来抓赌的，被抓到会如何？好像眷补证会被扣点，这是偷听大人谈话得来的讯息，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不过，此事过后，那超爱打牌的邻居，确实收敛不少。

平时，依各家厨房里端出的菜肴，多半就能看出他们来自哪个省份，只有少数眷村情况特殊，成员才会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比如整个被服厂搬迁来的山东村，从缅甸撤回的云南村，而其他按军种或单位分配眷舍的，那一定是各省人都有，逢年过节可就热闹了。像端午节各家的粽子口味、馅料、形状都不一样，用蒸用煮也各有讲究，我们家除了客家口味的咸粽，还会包父亲最爱的家乡粽，那是什么馅都不添的白粽，吃的时候沾点面糖，单纯享受它的糯米香和竹叶香。端午当天还要上半天课，中午才给回家吃粽子，不过晨起到校时，每个孩子都会带几个粽子，放在教室讲桌上，这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粽子，待老师搬回家享用时，该像抽奖似的，永远不知道会吃到大江南北哪一省的风味粽。

四

过年时，更是每个妈妈大展身手的时刻，家家户户都会拿出压箱底的手艺，做出各式各样的年菜，有的家里挂着一条一条被竹箴撑开的大鱼，像旌旗般在风中招展，一走近他们家便可嗅到腐臭的海腥味，有的则是捆蹄、腊肉、熏鸡，外加一整副的猪肝、猪头皮，那猪的表情就像弥勒佛一般令人发噱，我的妈妈则是以客家菜为底，酸笋、长年菜是必备的，再搭配着从其他妈妈那儿学来的各种风味菜，我们家的年过得是分外热闹。

在诸多年菜中，腊肠是一定要灌的，但每家的都不一样，有的灌的是肝肠，也有灌豆腐馅的，有的偏甜，有的咸到打死卖盐的，还有

的则辣到人呲牙咧嘴的，真可说是百花齐放，而且制作过程都得自己来，选肉、切块、拌料、灌肠，乃至之后绑成一节节的晾晒在竹竿上，整个工程繁琐得不得了，每天晨起要把它扛出去，不时还要拿针扎一扎，让里头的气跑出来，太阳下山了又得把它扛回屋里悬在客厅里，一不小心便抹了一头油，如果碰到阴雨绵绵，那可完了，没几天那腊肠便蒙上一层绿，吃是不吃呢？当然是用刷子刷干净了照样吃喽！

过年对我们这些小孩子可是件大事，那是一年当中最巴望的日子，除了吃不尽的糖果零嘴，新衣新鞋也盼了一整年，那年头每个家庭孩子七八个是正常，有的为了生个男孩，已“七仙女”了还不死心，更甚的“十三妹”都出笼了还继续“增产报国”，像我们家只生三个女孩就打住的简直是异数，还好孩子多、有政府养，柴米油盐不愁外，连教育费都由政府买单，这大概也是眷村孩子比较热衷念书的缘故，而且无恒产的我们，读书也是唯一看得到的未来。

家中孩子多，自然是能省就省，衣服总是大的传小的，穿到不能穿了还可以剪了做抹布用，若性别都相同，那还没什么大碍，最怕上头是个姊姊，做弟弟的还得捡那娃娃鞋穿，就算把蝴蝶结给拔掉，但那终究是双女鞋，穿到学校是会被笑话的，所以过年时有新衣新鞋穿，可就是件极其伟大的事。我的妈妈在这方面是很细心的，平时偶制新衣，都会为我们姊妹仨一起准备，且是一式一样的新装，摆明了我无需等候就可穿的和姊姊一般美，这大概也是我们家孩子少才讲究得起，有的家庭窘迫些，过年的新衣干脆就买制服，既有新衣穿，开学个子长大了，也不必再添购制服，虽说是一举两得，但看了总是令人心酸。

压岁钱当然也是孩子巴望过年的主要原因，虽然多半时候只能当个过路财神，马上就被妈妈收了回去，但那份喜气仍是令人雀跃，我们家的压岁钱倒是会分些给孩子用，老大分得三分之二，老二分一半，我虽只得三分之一，但家中客人多，这无数个三分之一加起来还是很可观的。我拿到压岁钱第一件事就是先买两把玩具枪，左一把右一把好不神气，接下来还会买一大瓶玻璃瓶装的汽水，和玩伴们躲到树林里喝个够，平时就算请客，孩子们顶多能分到半杯饮就不错了，

喝的时候要抿着嘴，像喝烈酒似的享用，唯有过年靠着压岁钱才能痛快畅饮，但往往喝不到半瓶，肚子便给撑到快爆炸了，这也才真明白了它为什么会叫“汽”水。

当孩子们口袋或多或少装了些钱之后，便要不安分起来，每年必上演的鞭炮大战于焉展开，我们村子中央是条五米宽的马路，两边房舍呈“非”形排列，因为孩子实在多，平时多是前村、后村各玩各的，井水不犯河水没什么瓜葛，但过年期间，总会有一边先挑衅，随即两方人马便各据马路一头开起战来，一时间冲天炮齐飞，大龙炮、水鸳鸯也当手榴弹丢掷，后来为求准头，把塑胶管都搬出来，一人扛着炮在前头瞄准，另一人在后头点燃冲天炮，就像火箭炮似的颇具杀伤力，但这样你来我往，倒不曾发生过什么意外，最伤的是钱包，最后输赢但看哪方财力雄厚，而我的压岁钱每年几乎都贡献在这场战火中了。

五

平时村里是不给车进入的，老实说那时也没什么车可进来，所以那五米宽的马路完全是我们嬉戏之处，这条路的两端又有两个广场，一个是载爸爸们上班的交通车停放处，另一头则放了篮球架，供青少年发泄精力，不过有时也会在此放映电影，多是一些黄梅调和美国西部片，只要傍晚广播有电影可看，大家吃完晚餐就会搬个小板凳到搭起的布幕前排排坐，这是大人小孩都开心的事，有时电影不那么好看，我们小鬼便会踅到布幕后倒着看，看得有些头晕了，再乖乖坐回原来幕前的位子。

说到广播也是眷村里的一大特色，平日有什么大事都靠着它告知，除了电影、晚会的预告，要查户口名簿、要发老鼠药以及年前大扫除的清洁比赛，都得通过它广为宣传，连谁家有电话要接也由它昭告天下。

还好这事很少发生，整个村子就那么一台电话，若哪家真被叫到村办公室接电话，还真有些胆战心惊，毕竟没什么好事是需要即刻以

电话告知的，至少我记得住在那儿的六七年间，我们家就没被叫唤去接过电话，好像也没因此错过什么，那真是一个不需要电话的年代呀！

在眷村中最如鱼得水的就是孩子了，一旦进入青春期便躁动得厉害，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完全不明白那些大哥哥、大姊姊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他们变得凶得不得了，偶尔照面总是怒目相向，我们也都知趣地避开他们远远的，尤其是那些大男生常聚集偷抽烟的角落，更是连经过都不敢，尔后便会传来他们打架滋事的消息，轻则学校记过、回家被老爸痛打一顿，严重的则被送去少年监狱管束，当时很多小女生暗恋的一位大哥哥，就听说犯了抢案，当时台湾还处在“戒严”时期，结伙抢劫是可以枪毙的，后来直至我们搬离眷村，都没再看到他，我真的不知道他后来是如何了。

功课好的升上中学，一样是翻脸不理人，在家像刺猬般令人生畏，生活空间的拥挤，更加深了那火药味，我们家人口算少的，挤在十来坪的空间尚且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何况是那些十来口的人家，简直就像是卧坐在火山口般随时等着爆破。经济条件较好的，就开始有购屋搬迁到外头的打算。

我们家算是比较早迁出的，那时大姊已然高中二年级，每天换衣服都要躲躲闪闪的，因为眷村里是没有私生活可言的，彼此串门子连招呼都不必打，直接就登堂入室了，孩子们更是随时破门而入，所以父亲终于狠下心在台北另一隅，找了个适合狗猫居住的新社区，买了间透天厝。所以会说“狠下心”，除了经济上的负担，还有更深层的痛楚，因为一旦置产购屋，那就表示要在这南方岛屿安居落户起来，不打算回乡、回老家了。

也差不多在此同时，许多还打光棍的叔叔，也陆陆续续成了家，是因为返乡无望了吗？而因着他们年纪都不小了，也因着种种原因，在择偶时，他们并不挑剔，许多娶的是梅开二度、甚至已有小孩的女子，要不就是身心残疾的女孩，相较于本省人重男轻女的观念，这些“外省兵”都很疼老婆，所以他们的婚姻多半都是和谐的。

从小把我们当自己孩子的叔叔伯伯们，每当有了对象时，一定会带回来给我的父母掌掌眼，最记得其中一位蛙人部队的叔叔，最得我们姊妹仨的欢心，只要一听他放假，我们一定是欢声雷动，因为每次他来家都会当马让我们骑，还会带我们进城看电影，许多迪士尼的卡通都是他带去看的。在我五年级时他结了婚，我还代表家里参加了他的喜宴，多年后，这阿姨却因为精神官能症吞药自尽，留下一个女孩，这让我的叔叔伤透了心。

当初从大陆来到台湾时，他不过是个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他很爱看书，写得一手好字，又长得高大英挺，帅得不得了，他直到年过40才成家的，我不知道他一直不婚，是不是家乡有心爱的人，正如我不知道当他娶妻时，是否清楚这女孩其实一直为精神疾病所苦，幸好后来再续弦时，也不是第一次婚姻的新阿姨，为他生了个儿子，一脉单传的他，“终于香火有续，不会愧对祖宗了”，这是晚来得子的他，在给父亲书信中的慨叹。

我们是在1972年搬离眷村的，到处都看得到“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标语。那时我“国小”毕业升“国中”，告别眷村的同时，也正好是我童年结束的时刻。

资讯：

眷村的一生

眷村诞生于1947年，她的出生与随国民党军撤台而来的女人和孩子有关。在台湾，这种地方军队家属院不叫“大院”，也不叫“家属院”，叫“眷村”。

台北市的第一个眷村出现于1948年，以“四四南村”命名，这个眷村的住户，全是联勤总部第四十四兵工厂的家眷。

眷村的暴发式出现，发生在1949年。60万撤台人马，急需安身之处。最迅捷的建屋方式就是建“克难小屋”。泥与稻壳混凝打底，竹子当上半截墙，就这样建起会透风漏雨的房子。地面紧张，前排后排侧身而过，家家户户哭笑相闻。由竹篱笆隔开眷村与外面的世界。

这种住房一直住到1956年，这一年，在台湾，工商业界开始响应宋美龄的号召为眷村捐款。

眷村和眷村的孩子一同长大，1970年以后，第一代眷村老迈年高摇摇欲坠。这时台湾的军费已经充实，军方拨款加自筹，拆迁重建时，人们住进了钢混结构的建筑。从此开始，10年时间，竹篱笆完成了使命，成为老照片。四四南村在1999年5月4日突然出现了大动静，所有住户迁出。这里及周边半公顷的区域，被辟为眷村文化保留区，建立“眷村博物馆”。而其他眷村将陆续拆完。

眷村42年的生命中，养育了一大批今天活跃在各个领域的孩子，演艺界的邓丽君、林青霞、潘安邦、张雨生、任贤齐；作家朱天心、朱天文、朱天衣姐妹，朱天心被称为“眷村文学”第一人；剧作家王伟忠把他生活过的嘉义“建国二村”搬上舞台，成为《宝岛一村》；杨德昌的眷村经历搬上银幕后，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曾经历类似于牯岭少年岁月的吕代豪，当过帮主，住过8年牢，他的金不换的故事是，在美国取得教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并回到台湾创建拓荒神学院。

(整理/杨东晓)

本文摘自：《美丽岛足印—台湾转型地理》（链接）

余美颜：第一欲女的性与情

她这样一个孤单女子，对性、爱情、家庭之自由的追求处处碰壁。为了破茧而出，她自己的性和情与整个时代的巨轮死磕，频频以失败告终，这让余美颜心灰意冷。她和因“人言可畏”自杀的阮玲玉不同，她不惮人言，她只恨自己当初“误解自由”，最终决然地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文/任珏

欲女蹈海

1928年4月19日夜晚，一艘名为“加拿大皇后”号的邮轮（另有一说法为“加拿大”号邮轮），正从香港开往上海。一位华服女子面色憔悴，在船舷边踱来踱去。偶有旅客经过，她欲言又止，好不容易说出“大地坼裂，吾将投海以洁吾身”这样没来由的话，便不愿多讲。同行的女友怕她出事，她又忙不迭让人不用担心：“哪有人跳海前先告诉别人的，我是说着好玩来着，别担心。”女友稍微交代了下便回船舱休息了，她双臂环抱胸前，将自己静静地藏在黑暗处，倚在船栏上，冰冷的海风吹乱了她额前的刘海。但是她丝毫没有察觉到寒意，木然望着黝黑的夜海，心事重重。

这女子把随行的佣人叫到身边，嘱咐说：“等船到了上海，你要是寻不见我，就自己回香港吧。”说完拿出100元钱，吩咐佣人将其中的50块打赏给帮过自己的买办，剩下的回香港后分发给家中其他侍役。佣人见她如此神情，虽颇为担心，但见她安排妥当，亦不敢多问，只

有允诺会办好差事。（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午夜2时30分，当邮轮经过温州出海口时（另有一说，其自杀跳海处为上海吴淞口），这女子纵身跃入大海。待船上众人发现动静，她已经被波涛吞没。其后，人们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两封绝命书，均委托船长寄回香港，一封是她写给全国女同胞的，一封则留给她的情人——渤海九少。（杨村，《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另有一说，余美颜只留下一封告全国女同胞的绝命书。）

这名女子，不是别人，正是风靡沪粤港的奇女子——余美颜。她不是电影明星，但是电影明星杨耐梅排除万难、不惜牺牲色相筹措资金、自主公司也要将她的故事搬上银幕；她不是皇亲贵族，但裙下之臣数以千计，10年欲海浮沉，令她阅尽天下男人无数，不论是军阀、富商、阔少还是沪上文青小记者，都对她趋之若鹜，将之奉为女神。

奇女子
余美顏
浪漫情書



一代欲女就这样顷刻间香消玉殒，举国哗然。死前唯寄信一位情郎，更是令这位睡过数千男人的奇女子更加神秘莫测。《申报》、《大公报》等大小报章均在同年五四前后连篇累牍，加之《奇女子投海后余闻》、《社会逸闻：荡女之身世》等猎艳标题报导此事。荡女赴死的新闻，一时间竟成报界奇景，蔚为壮观。

1931年北京华明书局更是出版了一本名为《对待男子锦囊》的小册子，列明作者为余美颜，由南海吴亚农作序，指称此书乃为余美颜蹈海前之遗作，“纯出庄言，有裨女界”。（余美颜，1931，《对待男子锦囊》，北平：华明书局。）书中分门别类地指导女子，作为妻子、媳妇，在婚姻的不同阶段，该如何侍奉不同类型的丈夫和长辈，颇有一种欲女版《女诫》的味道，极尽贤妻良母之典范。因尚未发现其他史料旁证此书，颇令人质疑此书有可能为他人趁势冒名代笔之作，以图欲女赴死商机之利。



余美顏
對待男子錦囊

余美顏著

直到余美颜死后的第六年，以“提倡社会高尚‘娱乐’”为己任的《玲珑》杂志仍刊出一则《奇女子余美颜在粤拍戏》的消息，声称余美颜蹈海未死，已投身影业，与人合伙开拍电影公司，并将以女主角身份在广东拍摄《红粉骷髅》一片。（《奇女子余美颜在粤拍戏》，载《玲珑》杂志1934年10月31日，2221页。）这样死而复生的香艳传闻，令人喋喋称奇之余，不仅慨叹一代奇女子的肉欲情念，不仅在生前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即便身故之后数年亦是可供市井把玩的艳情奇谈。余美颜作为民国第一欲女，生前种种离经叛道之言行已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时代话题。身故之后，欲女痴情的粉色故事，自然也比其他普通女子更能刺激娱乐市场的消费动力。

女子自杀在民国时期算不上新鲜事，上海市的自杀现象尤为严重。侯艳兴的研究发现，上海市仅在1934年一年中，自杀人数便高达2325人，也就是说，在1934年，每一天平均每3小时，上海便有一人自杀。而且自杀人数中，女性多过男性。从1929年开始，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女性自杀人数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到30年代中期达到顶点。

这一时期的女子自杀的原因大抵可分为：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四大类，女子自杀多因家庭纠纷，男子自杀则多因为生计艰难。（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余美颜早已离家在外10来年，不可能是因为家庭纠纷自杀。凭她的美艳和欲女之名，吃穿用度自是不必担心，更不可能因为生计问题自杀。那么，到底是怎样的齷齪大地，令一代欲女决绝赴死呢？

情窦初开

余美颜，别号梦天，生于1900年，广东台山县荻海人。关于她的家庭背景，存在不同版本的说法。广为流传的版本是，余美颜的父亲余大经是当地的一名典当商人，母亲饱读诗书，颇具文学修养。亦有一说，称其父亲是广州某当铺的伙计，每月收入仅四十元，仅够一家

生活所需。不论家境如何，余美颜年幼时，口齿伶俐，“姿美神秀，质意心灵”，每次放学回来，因其姿色过人，总有不少男士尾随其后。（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余大经见不得这般情形，勒令美颜辍学回家。余美颜高小毕业便不再继续读书，回到家中补习国文、英文。因天资聪慧，十五岁上下便已可以与人高谈阔论，大谈自由解放的道理。

渤海九少是众多倾慕余美颜的年轻男子中的一位，因常常飞鸿传情，深得美颜好感，情愫渐生。少女的芳心一旦豁开了一道口子，内心的欢喜便如同冲出闸门似的万马奔腾了。为了和九少相会，美颜常常要等到严厉的父亲出门之后，才能溜出家门和九少相见，她对这来之不易的自由恋爱甚为珍惜。

或许是因为从小读了那些自由的文章，或许是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先进思想，余美颜不仅向往爱情的自由，也渴望身体的自由。在那个年代，会游泳的人不多，女子游泳更是稀罕。余美颜穿泳衣下水游泳的事情成为当地的一段佳话，令她声名鹊起。十七岁那年，美颜代表母校参加台山县的联合运动会，被首富之子谭祖香一眼看中，谭家很快便上门提亲。余大经一口应承了这门婚事，虽然母亲知道女儿的心另有所属，但始终拗不过一家之主余大经的主张。第二年，18岁的余美颜成为谭家媳妇。（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新婚燕尔的余美颜并没有太多时间与丈夫共沐鱼水之欢。婚后两个月，因家族生意失利，谭祖香奉父命前往纽约处理商务。丈夫离家之后，余美颜的日子并不好过。刚刚被点燃的青春之火无处排遣，每每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的都是那些自由的欲念不断与妇道规训强烈碰撞的煎熬。丈夫常年未归，家中礼数严格，余美颜最后终于“复因种种关系，感觉婚姻不自由之痛苦”离家出走，浪迹广州、上海、香港等地，开始了她长达10年的情欲之旅。

浪荡十载

从1898年光绪帝下令解除女子缠足恶习的“天足运动”到1927年广州国民政府通过的《禁革妇女束胸》的“天乳运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民国时期的女性身体自主权大大增强。1927-1937年的10年间，国民政府大力提倡国民体育运动，女子体育得到快速发展。（王浩，2012，《民国时期的女子体育研究（1927-1937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在“救国强种”思想的指导下，女子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逐渐被国民政府收编、征用，成为肩负国族兴亡之重担的法器。1934年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蒋介石的大力推动下，更是将整个国民生活进行军事化改造。（蒋介石，1940，《新生活运动要义》，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大概只有前30年左右的时间，是女性身体最为自主、最为奔放的年代，这正是令余美颜成为民国第一欲女的时代。



余美顏搭

呢隻船由滬

來港嘅

食說呢首奇

女子唔輕易

被人拍照嘅

我認識佢廬山

呀我佢拉架

點肯放過佢

奇怪！將近

上晒客重

見佢嘅影跡

莫不是呢

首神秘奇

子化裝兆

記者耳目

1918年2月27日，余美颜离家出走来到广州没多久，偶遇一桩刺杀案，她被巡捕误当成凶手抓了，投送到了监狱。因为此次拘留，谭家与余家解除了婚姻，父亲余大经认为此乃奇耻大辱，追至广州，将她告进了当时广州的新式监狱“习艺所”改造一年。“习艺所”是当时广州政府开办的收容所，在收监犯人的同时，培养他们走上社会、自力更生的能力。

余美颜是如何挨过这一年的监狱生活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团，无人知晓。牢狱之灾并未令余美颜顺从于传统道德。或许是在牢房里看到诸多人间百态，让她认清社会制度乃是男人设立的本质，更让她学会了娴熟运用身体工具追求理想、反抗社会的本领。在她出狱之后，更加坚定了走追求自由的道路——身体的自由、感情的自由、金钱的自由、性的自由和家庭的自由。

获释后，余美颜身着奇装异服，行为怪异，她在沪港穗三地漂泊，穿梭于军界、商界各路达官显贵之间，她承认自己玩于股掌之间的男人，达到了3000人之多（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2页。）她不顾政府禁令，冒着巨额罚金的风险，在广州城扬鞭策马，与另外三位行为出格的世家女子被世人称为广州“四大天王”，风头盛极一时。

更有传言说她娇奢淫纵，喜欢在旅馆裸睡，一时间引来很多人的注意。被解除婚约、被脱离父女关系，没有了这些传统道德约束下家庭和婚姻的包袱，本就崇尚自由的余美颜，为自己找到了释放身体情欲的社会空间。她将酒店的公共地方视作展示身体的舞台，沐浴之后，赤身裸体睡在卧室门口，令来往旅客瞠目结舌。她旁若无人、谈笑自如。对于那些见她裸体便惊愕不已的人，余美颜是颇为不屑的。在她眼中，自然裸露的身体，是一般人无法欣赏的一种美丽。

社会大众对她多以“奇女子”视之，各类大小报章都拿她当娱乐明星对待，或抨击，或猎奇，她追求自由的代价便是让自己不断成为娱乐头条。当然，报界也不乏评论者认为她是敢做敢为的女界先锋，开创了女子之新纪元。

虽倾慕之人颇多，亦能将男人把玩于股掌之间，但余美颜的心里始终是追求爱情自由的。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传统家庭依然无法容忍这样一个追求爱情自由、身体自由、情欲自由的绝世女子。余美颜不断遭受感情上的挫败，无法再结秦晋之好、重归家庭，只能在情涛欲海中辗转漂泊。

对于别人对她放浪形骸的指责，她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她说过：“无论古今中外，只有男子可以玩弄女子，女子不能玩弄男子，所以我和数千男子性交，这是我玩弄男子的一种把戏，虽然不能说是开世界的新纪录，但也是爽快十余年，男子原来是很笨的，玩弄不是一件怎样的难事，这就是制度所造成的啊。”（张振编著：5女子自杀的解剖6，南京中山书店，1928年版，第17页，引自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2页）

交往、把玩的男人越多，越让余美颜了解这个男人主宰的世界，她也越发知道，把玩的男人虽多，但只能令自己爽快一时，并不能彻底改变这种大多数女性不自由的社会现实。自由理想无法全面达成，感情挫败日益痛心，阅历的男人越多，她越觉得自由之理想行将幻灭。

一掷千金

作为一代传奇女子的余美颜，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闹市掷钱事件”了。有一年冬天，有一个富商想与余美颜同居，余见这人并不算讨厌，便同意了，叫他带3000元钱来过日子。但第二天富商只带了1500元前来，余美颜见状大怒大骂他为富不仁、吝啬不堪。

余美颜虽说是一代欲女，但却是性情中人，感情的纯洁在她看来，绝不是金钱可以交换的肉体交易。她不能接受富商将两人的感情关系视为市井买卖一般的讨价还价。区区1500元，余美颜并不看在眼里。她一把抓过钱来，推开亚洲酒店七楼的窗户，将这些钱悉数抛下，就当是替这富商为寒冬腊月里的穷苦百姓做点好事。纸币如雪片

般在广州闹市街头（另有一说是在上海）从天飘落，余美颜追求自由的心也在这些世俗男人一次又一次的羞辱面前，摇摇欲坠。

广州、上海两地的报纸纷纷报道此事，也让余美颜的惊世骇俗之举进入了沪上四大花旦之一的电影明星杨耐梅的眼帘。

搬上银幕

经历逐出家门、婚姻失败，情伤遍体的余美颜不是没有想过委身为妾，但心中对自由的念想，又让她无法逆来顺受。虽心系渤海九少，但渤海九少的父母，因听闻她的风流韵事，认为两人若是只做对露水夫妻，家里不会阻拦，但若是成为永久伴侣，家里断然不会同意的。历尽沧桑的余美颜知道，在那个年代，得不到家长支持的婚姻只是春梦一场。

回不去家庭，亦无法收获爱情的余美颜，试图遁入佛门，以寻得灵魂上的自由。她曾在香港九龙青山佛寺落发为尼。但谁知道消息泄露出去，众多相好跑去青山寺看她。佛门乃清修之地，哪里容得这些狼虎之徒恣意徜徉？住持觉得这样成日迎来送往会有碍清规戒律，担心闯出不雅之祸来，遂要求她离开。至此，余美颜已经清楚地知道，侍佛之路是走不通了。

阅人无数，却无法在性的关系上获得应有的尊重；付出感情，却被拒于传统礼教家庭之外；一心理佛，追求最后剩下的灵魂自由，亦不容于尘世。这时候，除了死，她再无第二条路可走。

走上银幕，是余美颜自杀前最后的心愿。1927年她前往上海，想联络朋友看能不能碰碰运气，投身大银幕，她说：“吾放荡十年，负辱深重，此行来沪求以投身银幕，留一纪念，使社会一般青年得识余之真面目，或不至于蹈余覆辙，目的达后，余将投身大海，洗去此生污秽，来世或可做一纯洁女子，得到真正自由。”（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3页。）

其实，将余美颜“一掷千金”的故事搬上大银幕的想法早就在杨耐梅的心里酝酿。杨耐梅1927年便在报章上读到有关余美颜“闹市掷钱事件”的报道，她对余美颜不堪男人屈辱一掷千金的壮举颇为欣赏。同是不羁女子的杨耐梅叹服美颜这种不为男人金钱驱使的傲世奇女子的作风，发誓要将余美颜的故事拍成电影。



楊耐梅

她拿着报纸去找大导演张石川，想让张导演开一出戏，让自己来演，但是张石川对这种“淫娃荡妇”的故事毫无兴趣。这时候杨耐梅已经有自立门户办电影公司的想法，唯独缺拍摄经费。杨耐梅已经接到盘踞山东的“花国将军”张宗昌的邀请，上济南一聚。坊间更是传闻，此行或将是一场肉欲交易。

杨耐梅正在犹豫是否接受邀请，张石川的拒绝，让杨耐梅颇为不满，冯俐在她的剧本《影后胡蝶》中，借女制片人“黄耐梅”之口，道出了杨耐梅下定主意拍摄余美颜故事的心声：

中国女子从来只晓得三从四德，却不晓得自己除了为那些个男人生生死死之外，还可以有点别的作为！今天我也算是来跟张先生打个招呼，等我从济南回来，一定要开办一个自己的电影公司，专拍让天下人称奇的女人……”（冯俐，1996，《影后胡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半个月之后，杨耐梅携带巨资平安返沪，开办“耐梅影片公司”，购买昂贵摄影器材，聘请史东山做编导，拍摄了由自己出演女主角的《奇女子》一片。杨耐梅的行事风格与余美颜颇有些相似之处，影片中两位奇女子的鲜活故事，令影片不仅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也获得包括蔡楚生在内的影业同仁的赞赏。世人记住了杨耐梅，更记住了余美颜。但这时候，余美颜已经等不及看到大银幕上的自己了。



楊耐梅與「奇女子」余美顏

一九二八到一九二九年間上海有一位最受人注意的女演員楊耐梅，她底一生可紀的事實在太多。

楊的戲路與白光很近似，起初她是明星公司演員，在張石川導演「玉梨魂」中飾筠青，繼入大中華百合公司主演「探花女」。她擅演所謂「香豔浪漫」的悲劇角色。她的性格很特別，作風很新奇，那時演員多是隸屬於某一家公司的，獨楊耐梅不甘寂寞，喜歡時時變動。不久，她脫離大中華百合公司，於一九二八年九月間自組耐梅影片公司，第一部新片決定採用轟動一時的「奇女子」余美顏為劇本故事，由楊耐梅自飾余美顏，配以朱飛（飾渤海九少），高倩韻，高占非，易小鏡等，一

误解自由

早在1927年夏天，余美颜去上海的时候，就有了自杀的打算。她就自杀方法的问题咨询过一个叫做马浪荡的记者。马浪荡将自己对自杀方法的研究心得分享给余美颜，他告诉美颜：“你如果真是要死，我

可以告诉你两个艺术的死法，这是很容易的：其一是投美妙的西湖，其二是投身茫茫无涯的碧海。前者，以你这样的人，能够埋香葬玉于西湖畔，可供骚人墨客的题咏，留心社会问题的研究；再就是伟大的毁灭，艺术的自杀，永远不留一点痕迹在此污浊的人间。”（张振编著，1928，《女子自杀的解剖》，南京：中山书店，18页，引自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3页。）马浪荡的此番分析令余美颜颇为认同，最终她还是选择了投海这样艺术的自杀方式，来追求她人生最后的自由。

余美颜死后，广州报章上有人评价余美颜是“放辟邪侈”之人，但却欣赏她能“以一女子而能趋役须眉之人”，更推崇奇女子的行事风格，认为“女同胞如能自拔于玩之地位，虽如奇女子何害”。（《婆无渡河》1928年5月7日《广州民国日报》，载南方都市报·发现广州·第58期，广州旧闻篇：戏里戏外奇女子生前身后不堪情，2006年8月21日。）余美颜也曾坦承自己是一个社会的反抗者，她的这些浪漫行动，招致社会的不满，她亦不满社会的道德桎梏，遂将身体及情欲都换做反抗社会、报复社会的道具。

余美颜只是遵从本心、偏爱自由。为了心中这点自由的梦，燃尽了自己肉体 and 情欲。幼年时就在她心中萌芽的自由之种子，带她走向欲女之路，也带她走向人生的终点。



她这样一个孤单女子，对性、爱情、家庭之自由的追求处处碰壁。为了破茧而出，她自己的性和情与整个时代的巨轮死磕，频频以失败告终，这让余美颜心灰意冷。她和因“人言可畏”自杀的阮玲玉不同，她不怕人言，她只恨自己当初“误解自由”，最终决然地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在她写给全国女同胞的绝命书中，她写道：

颜不幸生于此青黄交接时代，自小凭媒妁之言，听父母之命，嫁夫远适外国，数年未谋一面，少识之无，误解自由，竟任性妄为。在此污浊万恶之社会，浮沉十载有奇，虽阅人甚多，终未能结朱陈之好，前虽钟情渤海九少，奈为家长所阻，终失所望。终失人生乐趣，留此残生亦无所用，决然立意毕命，离此污浊世界，还我清静本来。（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幼年时的思想启蒙，让她成为追求自由的一代奇女子。时代的进步只是将余美颜这样的女人抛向红尘，成为被男人和媒体消费的浪荡欲女。虽然余美颜也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把玩男人以作报复，但历史的车轮总跑不过时代洪流中个体的理想追求。当看清这污浊世界的龌龊本质之后，唯有投海赴死，才能涤濯清白。

余美颜是奇女子，是一代欲女，更是个择善固执的女人。

自由，便是她心中的执念。

本文摘自：《叛道者·风气初开时的民国另类》（链接）

国史

国

这座岛屿的暗黑与光亮

文/张铁志

台湾知名作家，现任香港《号外》杂志主编，并在两岸三地重要媒体撰写专栏，关注焦点从政治经济、社会运动到文化与摇滚，并涵括台湾、大陆与国际事务。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在两岸出版著作有《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即将出版《时代正在改变：民主、市场与文化想象》，分析台湾民主之路。



张铁志

此刻，年轻的你试着掀开这个黑幕，看看里面的人是如何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挣脱黑暗，争取自由，并且最终拆下了这片黑色之幕。

这个岛屿在20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页民主的斗争史。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就展开各种政治运动：有要求设置台湾议会的立宪主义，有为工人农民争取权益的左翼运动，还有追求民族解放运动。

但当然并没有成功。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本地民众武装起义，国民党政府武力镇压，屠杀成千上万民众，其后更进一步进行“清乡”，肃清许多政治与知识精英。

1949年国民党政权内战失败，在年底迁移台湾。就在国民党政府来台之前，5月20日台湾开始实施全面戒严，为战后台湾政治拉下了浓厚沉重的巨大黑幕。

在那个黑幕下，是一条坎坷蜿蜒的民主抗争长流，水上漂着的是腐烂的青春之花，沉在河底的是流淌着鲜血的肉体。

数千人因为政治理想，或因为冤假错案，死于独裁体制的暴力之下；另外几千人被囚禁、被虐待，耗尽他们的青春与生命。更多没有被囚禁、被消失的人，是在巨大的伟人铜像前，在无数的标语和比标语更多的特务之前，沉默噤声、心怀恐惧。

此刻，年轻的你试着掀开这个黑幕，看看里面的人是如何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挣脱黑暗，争取自由，并且最终拆下了这片黑色之幕。

在这条历史之河中，暗黑退潮了，但河中那些不断被历史冲击的小岛仍背负着无数悲伤与苦痛，或者理想与激情。你决定一一拜访那些沉默之岛。

从绿岛到台北

首先，你来到台湾东南方外海的绿岛。

这个迷人的小岛现在是台湾的旅游胜地，充满着青春。但曾经，这是一座恐怖的岛屿。因为海岸边是两座白色恐怖时期专门囚禁政治犯的监狱：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训导处（1951~1965年），和“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1972~1987年），通称绿洲山庄。

现在，这些牢笼和外围区域成为绿岛人权纪念园区。在刺人的阳光下，你会先看到海边的“人权纪念碑公园”，这个公园成立于1999年12月10日。在广场中有一块垂泪碑，上面刻着曾被囚禁于此的柏杨先生的句子：“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在公园的坡道，墙上刻着一千多名为追求民主、人权奋斗而遭到政治迫害的人的姓名。你轻轻摸着那些早已被无数人摸到发亮的名字；是的，这些名字正是那历史之河最闪亮的光芒。

你来到台北，走到新店溪畔的“青年公园”。这里是人们从小来散步玩耍的地方，现在依然洋溢着幸福的味道：青年人谈恋爱，爸妈带着小孩散步，老人坐着享受时光。

但这里曾是最最森冷痛苦之地：新店溪畔的草地是1950年代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日据时期这一带叫做“马场町”，现在这里叫做“马场町纪念公园”。

然而，公园中并没有刻上这些受难者的姓名，那段历史也还没有被完整书写。一如另一个台北市的纪念公园。

你从马场町来到台北六张犁的一座小山上，你知道，这也是当年许多在马场町消逝的灵魂飘荡的路线。

1993年5月，政治受难者曾梅兰多年追寻1950年代同案被处以死刑的异姓哥哥徐庆兰尸首，终于在六张犁的乱葬岗发现了他死去兄长的墓碑。这里不只是他哥哥，还有二百多位白色恐怖死难者的坟。

这些墓碑分布于六张犁墓园三个地方，一人一小块立石，上面刻着姓名，死亡年月日，有的刻有死亡地点如“马场町”。当年被处以死刑

的政治犯，若无亲属领回尸体，多埋葬于此。

经由政治受难者团体争取，当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决议在马场町、六张犁设立纪念公园，并进行相关历史研究。后来在马英九市长任期内，先后成立“马场町纪念公园”和六张犁的“戒严时期受难者纪念公园”。只是，虽然公园落成，此地却仍是一片荒烟蔓草。一如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故事是一段被人们遗忘的记忆。

离开这两个城市边缘，你回到台北的中心地带：忠孝东路的喜来登饭店。这里附近有“行政院”和“立法院”，是台北的权力核心区。但1968年，这个饭店和附近区域是“警备总部军法处”和看守所的所在地。1968年之后，这个单位搬移到景美，附近还有负责侦防、逮捕和侦讯的“调查局”，负责军事审判的“军法处”和“军法局”，执行监禁的“军法处”看守所和新店军人监狱，以及枪决死刑犯的安坑刑场。连成一气的死亡地带。

几年前，景美的“军法处”和看守所改制为“景美人权园区”。园区保留了当时的建筑如“法庭”、牢房、接见室、洗衣场等等，并且有几个精采的展示区：一区是政治受难者的文学、艺术与电影的文化展，包括他们出版的书籍与影片；另一区是台湾人权历史与史料文物展。

在园区中的“第一法庭”，曾经进行了台湾民主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审判：1980年3月的美丽岛大审。1980年2月黄信介、施明德、林义雄、姚嘉文、陈菊、吕秀莲、张俊宏、林弘宣等八人被以叛乱罪提起公诉，并自3月进行9天的军事审判。最后，八人全部被判有罪，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

在前美丽岛的历史，除了被处死，被囚禁，还有更多人失去了自由。

你从景美来到温州街，彷彿穿越时光隧道来到一片日式住宅区。这一带大都是当年台大教授宿舍，最特别的，是殷海光故居。殷海光晚年都居住于此。在庭院中，有他自己挖掘的“愚公河”和“孤凤山”（其实只是一座小丘）。1960年雷震被以匪谍罪逮捕后，殷海光很难发表言

论，并被特务严密监控。1966年，台大受到政治压力不再续聘殷海光。1969年，殷海光在此郁郁而终。

从殷海光故居走五分钟，会来到台北市现在重要的文化地标“紫藤庐”，许多人来这里品茶、看饶富味道的建筑，也感受丰富的历史。

这是日据时期的建筑，1950年后成为“关务署”署长周德伟的宿舍。周德伟先生本身是哈耶克的学生，是一名自由主义者，1950年代时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经常在此聚会讨论。1970年代中期后，此屋由其子周渝居住；由于周渝参与党外运动，因此许多党外人士与文化界人士经常于此聚会，举办活动。1981年正式改为公开经营的茶馆，有更多思想与文化座谈，迄今依然如此。

这个场所真正见证了台湾从1950年代至今的民主与思想的火光。

扑不灭的民主之火

你在这个历史之河已经来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爆发的民主运动。你必须再次离开台北，来到高雄，去见证威权体制如何反扑1970年代的改革力量。

1979年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美丽岛杂志在高雄举办一场示威游行，从美丽岛杂志社到新兴分局派出所前的圆环举办演讲，警方强力镇压引发警民严重冲突。事后军警单位展开大规模逮捕。

当年的“新兴分局”如今还在，前面的圆环街道当然已不复见当年的硝烟。高雄捷运站则设立了一个“美丽岛”站，并且有美丽的玻璃艺术“光之穹顶”。而当年的美丽岛事件受刑人陈菊现在是高雄市长。



整个1970年代的政治改革与文化运动风潮，到美丽岛事件划下了一个黑暗的句点，而可能让台湾陷入更肃杀阴冷的气氛。然而，民间社会崛起的力量已非威权体制可以压制住，而将在1980代更沸腾地展开。

你回到台北。就在高雄的美丽岛事件到次年3月景美的军事审判之间，还有一个地方，一个台湾民主运动史的巨大悲剧地点，你必须去。但你必须忍住泪水。

1980年2月28日，当林义雄还在牢里等待审判时，他在家中的母亲和一对7岁的双胞胎女儿，被不明的歹徒闯入，极为残忍地杀害，长女

林奂均被刺六刀重伤。林义雄赴殡仪馆时，用头猛撞着无情的冰柜，痛哭哀号：“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们都死了……”

林义雄的住宅后来被基督教长老教会买下，建为“义光教会”，每年2月28日早上都会举行追思礼拜。

1987年7月15日，台湾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但这只是开启政治自由化的大门，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还非常的远：基本的言论与集会自由仍大受限制，民意机构也尚未改选。于是，1990年，爆发了三月学运。

你来到“中正纪念堂”——这里是为了纪念蒋介石这个“现代帝王”的庙，而几步路之外就是“总统府”：独裁者总是不愿意离开权力中心。然而，建造者一定没有想到，这个广场会成为一座人民的广场，抗议的广场。1990年3月，数千名学生来到他们戏称为“中正庙”的广场展开大规模静坐，要求“民意机构”全面改选，并以“野百合”作为三月学运之精神象征。青年的火焰在广场上燃烧着历史的新页。

走出中正纪念堂，你来到旁边这条通往“总统府”前的大道。在野百合学运时，这里还叫做“介寿路”，但1990年代中期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这里曾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禁域，多停留几分钟就会被密布的宪警盯上；1980年开始，许多抗争游行都以此为终点，1994年陈水扁任市长时在这里举办一场舞会，被称为“空间解严”。这个空间的威权性格被逐渐卸下。

你曾经在这里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抗争，气氛紧张或温馨的；例如1997年，你和数万人为了抗议治安败坏而游行到这里，用镭射光在“总统府”建筑上打上两个字：“认错”。这是以高度创意进行意义深厚的反抗。2006年红衫军曾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集会多日，也创下记录。这两年仍不断有许多抗议活动，如农民连续来了两年高喊“土地正义”。

这些活动大部分是温驯而有礼的，不像1980年代的剑拔弩张。以背后的“总统府”为布景，人们在这里演讲、唱歌、喊口号，有时席地而睡一夜，然后平和地结束。

的确，在这个时代，大部分时候抗争戏码都已经是人们熟悉的，而少见激烈冲撞。但能在“总统府”前守夜抗争，能用镭射光羞辱这个最高权力中心，这不正是那些被囚禁的青春，被牺牲的生命，他们用一生所梦想，所争取而来的吗？

本文摘自：《美丽岛足印—台湾转型地理》（[链接](#)）

商务印书馆：出版帝国的易帜

江山易帜，故人凋零，仅是那艰难的生存就已让张元济殚精竭虑了，向着既往磅礴瑰丽的梦想而复兴的路则更加黯淡无望，其实自新政权建立之后，在“人民出版事业”的旗帜下，等待这个昔日出版帝国的，就是一个已经注定的前景。

文\刘永峰

1949年5月，上海，那是张元济一生中最后一次经历兵荒马乱，中共的军队一路攻打过来，已经兵临城外，此时，这座繁华的城里到处都是忧心慌乱的人群。在霞飞路沙发花园的一栋住宅内，已见惯了兴亡易代、动乱沉浮的他，则平静地观望着外面正在骤然变化的局势。



绘制复原的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公司全景

经年国难，战乱将息，这位坚韧的老人，对于来日已不似青年的兴奋，在颇为有限的余日里，他更倾心于一段和平闲淡的生活。当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惟仍甚望将现有职务早日摆脱，重反故巢。”考虑到他当时的年纪，想必也没人会怀疑这份心愿的真诚。

三年前，自从曾带领商务印书馆创造辉煌的王云五辞去总经理一职投身政界以后，这个位置上便再没能找到合适的继任者。张元济不忍看到数十年事业的倾覆，“遂不得不插身干预”，公司的权力实际上就已转入张元济等五位董事的手中，偌大的一个出版帝国一摊子的事务

便压在了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上。那时，在私下的通信里，他曾向胡适倾诉道：“此中苦况殆不堪为知我者道也。”就中难处大约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况且，无论如何，身体的日趋衰退都是不争的事实，在历经世事沧桑之后，这位老人已太过疲惫，然而也就在此时，其灌注几十年心血所苦心经营的商务印书馆却正面临着一个从未有过的十字路口。



张元济像 作者 王平

出版帝国

那时，张元济比任何人都清楚商务所遭受的危机有多么深重，当然，他也比任何人更加了解一个出版帝国曾经的辉煌，知道它之于时代的分量，它之于自己的意义。虽然一个老人已经极少地直露自己的心怀，但在一个王国败落的暮景里，还有什么比过往的美好更刺痛人心呢。

自从1902年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以来，张元济便一直是商务的灵魂人物，1926年，60岁的张元济宣布退休，不再直接管理业务，但很快又被推选为商务的董事会主席，“仍旧把商务认为他的终身事业”（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而也正是因为这位“学识广博”、“眼光远大”的清末维新派人物，让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小小的印刷作坊，发展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现代出版企业。

20世纪20年代以后，商务开始了它的极盛时代。在当时的出版行业里，它拥有着第一流的编译群体，第一流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且它在海内外一度设有36个分支馆，1000余处办事机构，这个庞大的发行网络遍及全国主要的城市、商埠及海外，“凡华侨群集之处，均有代理书店”。30年代初，商务年出版图书近千种，占全国年图书品种总量的40%以上，而据美国学者白鲁恂所言，抗战爆发前夕，商务一年的图书发行量相当于整个美国出版业的发行总量。



早期商务印书馆印刷车间

然而，商务雄厚的能量并非仅仅施展在了出版领域，其凭借着在其他方面也极具魄力的开拓能力，在当日的中国，更是硬生生地打造出了一个巨无霸的文化综合机构。这个综合体包括一个出版社、一个图书馆、十多个杂志社；包括有最新装备的现代化印刷厂和供应全国的印刷机械器材厂；包括了一个以拍摄科教片、风景片和艺术片的电影厂；还包括大规模的新式益智玩具厂，文具教具科学仪器厂。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先后开设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商业学校，以及面对更广大求知群众的各科函授学校。这便是商务呈现于时代的一个非常奇特而又极为壮观的图景。



商务印书馆早期会员合影

如果说，商业上的表现是评价一位工商业者最立竿见影的尺度，那么，以此标准来衡量张元济之于商务的影响，则未必合适，因为作为这个出版帝国的缔造者，张元济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为商务带来的是超出商业之上的气质与情怀。

1902年，张元济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后，一批学有所长的读书人开始陆续落户商务，在其辉煌时代，商务的编译所一度拥有编辑300多

人,其中有的人宁可不就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大学教授而愿在“商务”当编辑。胡适曾说,商务印书馆的实力当时国内没有一所大学能及。这批读书人往往都有着自己的文化志向及抱负,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组织 and 编制不再仅仅满足于编辑、印刷、出版文化读物的层次上。他们编写教材、更新教育,延聘通儒、整理国故,而在传播西学上的贡献更是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们将编书、写书、出书作为自己影响世道人心的手段,无一日不在为苦难的中国提供最重要的食量——书本。

一位曾供职于商务的出版人陈原,在评价张元济这位前辈时说:“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商务印书馆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媒介,他实际上把它当做他的理想试验场。他的改造社会的试验场。……只有把全民族的素质提高,民智打开,才能从根本上拯救垂危的祖国,所以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的蓝图,……是为变革社会需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那样的蓝图。张设想的实验场是围绕着广义的文化教育而启动的。简而言之,张元济办出版社,确实不是单纯为了出书,他是在办一个旨在名副其实的‘大学校’。”

大厦将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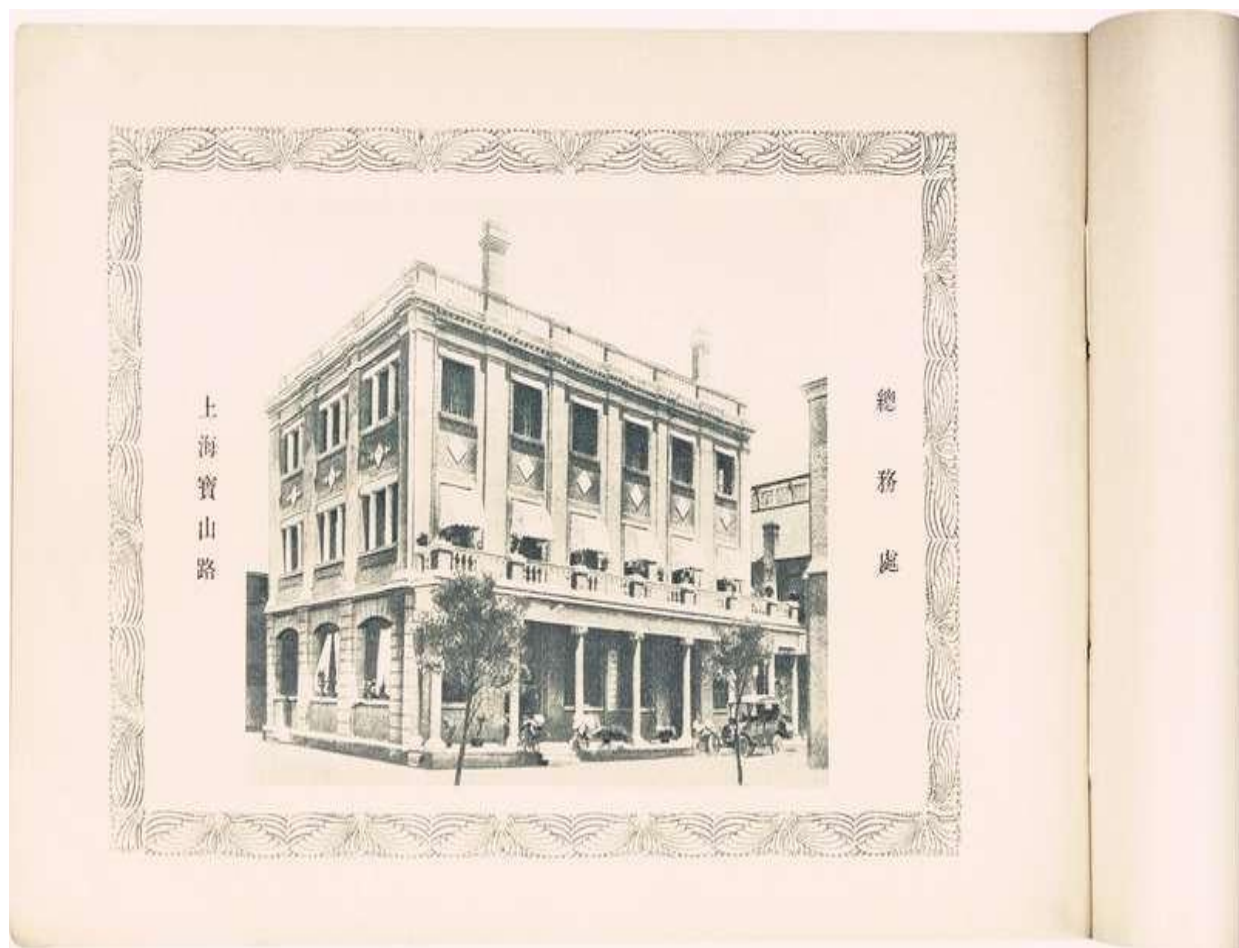
到了1949年,那个曾承载着张元济毕生理想的商务帝国,早已被残酷的现实撞击得破败不堪。

那一年的4月22日,张元济约来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们,在自己的家中召开了第487次的董事会议,商讨去年股息发放的事情,然而由于“公司经济不裕”,最终决定改付书券,这是商务经营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其实经济上的“不裕”,已经不是近来才有的问题。两年之前,张元济就曾给胡适写过一封信,提到商务在北平图书馆寄存着九十包的藏文经集,属于极不易得的珍本,那时迫不得已准备将其出售,“以疗商务目前之贫”,所以,请胡适为这套书估算价值。到了1948年,据商务经理李拔可所言,“公司年终负债已达300亿”,“再不努力,前途殊为可

虑。”而当时在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营业部工作的戴孝侯，提起当年的困境则说：“解放前夕，国统区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商务机构庞大，人事臃肿，历经‘一·二八’总厂被毁及在抗战八年和太平洋战争中各地分馆遭受房产、设备、存货的损失，元气大伤，加上存书20000多种中70%以上已不合时需，无法销售，更处在入不敷出、朝不保夕之境。同人工资及日常开销需靠多方贷款及变卖产业、原料、物资、勉励支付。”

随着内战的不断持续，商务的境况也更加恶化。1949年，张元济写给友人严景耀的一封信中说：“战事延长，遍地烽火，人方救死不暇，诗书自非所亟。一二月来，全馆几无营业可言，累卵之危，不堪设想，正不知何以度过此难关耳。”



1926年印制的《创立三十年商务印书馆志略》

在战乱期间因时局的牵累，商务的凄惨处境并不算意外，可是到内战结束以后，这种糟糕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甚至更加令人绝望了。一直以来，教科书都是商务最大的业务，商务的董事陈叔通甚至直言：“商务发财主要靠教科书”。1949年以后，中共宣布废止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并实行“教科书国营”政策。这对商务印书馆可谓致命的打击，原有小学课本存货全部作废、就地切毁、卖作废纸。当然，更为严重的是教科书编辑出版权的丧失。“教科书国营”制度刚开始，即便因国营力量一时薄弱难以完全承担起编辑全套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商务向政府推荐的大量教材被采用的也已极少。而1950年底，自从专门负责中小学教材出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以后，商务便彻底退出了这个市场。

然而，还不仅仅只是教材，中共建国以后，商务其他种类的书也因“太缺乏时代性”而失去了不少读者。自建馆以来，商务一直奉行“在商言商”的经营原则，而这在49年以后重视政治的文化环境里，便显得不合时宜了。1950年，商务的董事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本馆创办以来，已有五十余年，因为历史的因袭，以致规模较大，分支机构众多，且前此业务向来避免和政治接触，以致在时代转变以后，公司业务远跟不上政治。”

而由于经营困难，入不敷出，此前，商务强大的营业力量的标志——遍布各地的庞大网络，如今，反而成了不堪负担的累赘。1949年3月，总管理处以“密启函”通知各地分支馆采取“应变”措施，指示分支馆开支超过营业收入30%者，应立即“裁员减薪”。而在总馆的五百余名职工，其工资已按7折减发。

这种减薪的措施，遭到了工会的反对，而一时间紧张尖锐的劳资纠纷又益发让张元济焦头烂额了。商务的工会组织曾是上海的四大工会之一，而中共又时时在背后支持发动，所以向来有运动的传统，后来位居中共高层的陈云，其革命生涯就是从商务的工运开始的。张元济对工运、劳资纠纷向来的态度是“和平改革，勿伤元气”，然而，到了1949年，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处于地下的共产党如今已取得政权，工会代表在和资方交涉中态度也强硬起来。

1949年6、7月间，张元济与工会多次交涉，一再提及的减薪事宜及业务改进方案，工会方面一直未予接受，职工们并在公司大楼贴出红色大字通告，发泄不满。9月，即便在政协开会期间，上海的来信依然会不断地送到张元济下榻的六国饭店，报告事态的进展，那时，商务的劳资纠纷已让张元济绞尽脑汁。9月13日，他又收到商务总经理陈夙之的来信，“知职工会指责改组案，异常蛮横……然同人无能相助者”。看后，他一夜都未安宁。

求援碰壁

那时，张元济的心力全被这些苦恼的事务所牵缠，而年过八旬的身骨，依然忙碌不已。据他的家人回忆，张元济每日天不亮就起身，盥洗完毕后就坐到他卧室兼工作室的一张方桌前开始工作，批阅公文、写信、查资料，总之写个不停。天亮时则打开百叶窗，熄了灯，伏在书桌上继续写。八点一过，商务印书馆的通信员便会骑自行车送来一大叠书信文件请他阅看。如果其中有急件，他就让师傅等着，立即书写回复意见后带回馆中，其余的就留下一一阅看、写复信。下午四时，通信员再来一次，把书写得密密麻麻的信件、批复意见取回。直到1949年底他中风卧床以前，张元济几乎天天如此。

1949年7月19日，张元济又将商务的董事们召集到自己的家中，上海解放近两月以来，这是商务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一些改革措施，并且鉴于目前的困境，拟定了以下计划：邀请沈雁冰出任出版委员会会长；就公司财政困难情形上呈陈毅市长，请政府监察并予以指导；关于职工待遇事宜，与工会协商，如不能获得决定，再请上级机关调处。

7月27日，张元济与公司总经理陈懋解联署上陈市长呈文，报告了商务历年经营出版事业的经过及现在业务、财政困难情形。文中说：“敝公司创业以来，亦思于文化教育之事，有所效力。今处此危殆之境，除至不得已时召集股东讨论最后解决办法，并公告社会予以支持

外，不敢不先沥陈于钧座之前”。最后恳请政府“垂念此五十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

那时，当年曾在商务服务过的一批旧人以及曾经与张元济私交甚密的友人，如陈云、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等，都已在新政权身居要职，张元济也曾一再致书请求他们帮助商务度过难关。9月，张元济北上参加政协会议期间，趁机向沈雁冰提出邀请担任商务的出版委员会会长以董理全局。沈回复说“甚愿南下，重回本馆，但此间有关涉文艺职，甚难脱身”。他推荐了郑振铎。张元济“再三致意，渠终辞”，也不敢过于勉强。在离京南下的前一天，张元济偕商务的另一位董事陈叔通专门拜访了沈雁冰，“复申前请，沈坚辞”。在张元济返沪后，沈雁冰数次致信，又坚辞商务出版委员之一席。而此后不久，这位曾在商务由练习生而至《小说月报》主编的沈雁冰，出任了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商务印书馆工会的《复工条件》

商务出身的人中身份最特殊、职位最高的是陈云。9月25日，张元济到朝阳大街117号财政管理处去访陈云不遇，留下了一封信就出来了。

11月10日，张元济在给另一位商务旧人新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的信中写到：“鄙公司两遭兵燹，旧有工人大多失业，嗷嗷待哺，殊堪怜悯。若辈均有多年之经验，任其废弃，亦属可惜。贵署如有添募工人之举，可否酌量收用，俾得一吃饭之所。”

11月21日，张元济又写信向郭沫若求助说：“商务印书馆荆棘丛生，几濒绝境，……贵会如有文学艺术大宗著作，可否畀予发行，稍获馈贫之粮，庶免覆巢之惨。”

不久，他得知中央政府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又于12月8日写信给陈云说：“敝公司从事有价证券之承印已历多年，虽总厂迭遭摧毁，而胶版方面尚具相当设备承印印花邮票税票等项，其成绩深为各方所赞称。”并表示：“极愿承揽此项证券工作”。

以张元济的地位和名望，一再出面请求昔日下属向商务伸出援手，没有什么比这更反应出商务的困境了。很长时间里，商务都是靠变卖纸张、机器、地产在勉强维持，到了1949年年底，尚留的各项物资皆是生产所必需，已无可变卖，在各地分馆厂，虽还有不动产多处，但一时也无人问津，且远不济急。于是，11月30日，张元济签署了商务董事会《上陈市长节略》，请求人民银行贷款二十亿，藉资周转。

12月初，张元济来到汉口路建设大厦的上海市政府拜访陈毅，将《上陈市长节略》亲自呈上。陈毅看后，说：“如果说人民银行没有二十亿，那是骗你的。我不能骗你老前辈。只要打个电话给人民银行就可以送给你，你老这么大年纪，为了文化事业亲自跑到这里来，理应借给你。”然而，他接着又说：“我想还是不借给你为好，二十个亿搞到商务一下就花掉了。还是从改善经营想办法，不要只搞教科书，可以搞些大众化的年画，搞些适合工农需要的东西，学中华（书局）的样子，否则不要说二十亿，二百亿也没用！要你老先生这么大年纪，到处轧头寸，我很感动，不过，我不能借这个钱，借了是害了你们。”

人民出版事业

仅是那艰难的生存就已让张元济殚精竭虑了，向着既往磅礴瑰丽的梦想而复兴的路则更加黯淡无望，其实自新政权建立之后，等待着商务的就是一个已经注定的前景。

1949年10月9日，政协会议期间，两位商务的旧人郑振铎、胡愈之曾来拜访张元济，在谈到未来的出版趋向时，胡愈之说：“将来大约注重分工合作，出版、印刷、发行固须分工，即出版亦须分别部门各专一类。”而不久之后，胡愈之便就任新设立的出版总署署长，因而他的这些话自然代表了新政权下出版事业未来的方向。

出版与宣传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把书籍期刊的出版发行视作“国家建设事业及人民文化生活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工作”，革命年代如此，取得政权后就更给予特别的关注，希望“把全国出版事业在统一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需要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则在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开始陆续出台。大会上，胡愈之发表了题为《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的主旨报告，正式明确了中国出版新的方向，即“人民出版事业”的道路。

而在“人民出版事业”这一概念的统摄之下，于是，我们看到，这次大会以及在此之后陆续颁布的一些政策条例，则包含了这样一些色彩鲜明的内容：比如，统一全国新华书店，加强专业化和企业化经营，实行出版、印刷、发行分工和出版专业化，对私营出版业的整顿和改造；加强对稿源控制，取消私营出版业时事政治类读物的出版权、教科书编审权和出版权；出版业均必须定期编制选题计划、编辑计划及出版计划，呈报当地出版行政机构，对出版物内容的审定，在不违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害于人民的原则下均准予印行；统一调配纸张，实施加工订货等等。

出版、印刷、发行分工及出版专业化的政策，对于编、印、发三位一体的商务印书馆可谓是迎头痛击，然而，为了获得政府帮扶，摆脱经营困难，又必须走上“人民出版事业”的道路。在此环境下，商务的调整改造首先从发行部门入手，1950年底，出版总署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联书店、联营书店等五家单位的发行机构，以公私合营方式合并成立了当时仅次于新华书店的全国第二大发行系

统一——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从此，商务不再管发行，亦不参与发行机构。

而按照出版总署出版专业化的要求，此前出版门类极为完备商务印书馆此后的出版方向也被调整为：以出版实用科学书籍为主，兼及儿童书和辞书。文史方面，基本上不再出版新书，文史旧存稿分别转移给有关出版社，重印书只限于四角号码新词典等语文工具书。当时，高教部教材编审处在编写和翻译高等学校的教学用书，考虑到教材的特点：如公式多、插图多、表格多、外文多、符号多等等，没有排印科技书籍经验的一般印刷企业不容易很好地完成出版任务，于是，出版总署决定在过去有很好的教材出版经验的商务印书馆与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建立约稿和订货关系，承担高等院校工科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教材的大部、理科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四种专业教材的全部以及部分文史教材的出版印制。

就这样，经过政府主导下的初步调整和改组，商务印书馆实现了自身的变革：在稿源、纸张等均有政府控制分配的体制下，通过接受加工订货，商务逐步被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而在国家“出版专业化”政策的主导下，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几乎完全停顿，西学译著锐减，过去一直走多元化出版战略的商务印书馆，开始服从于“分别部门，各专一类”的出版方针。

而那时，几位商务元老的人生也谢幕在这样的时刻，商务的命运就显得更加悲凉了。1950年5月，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的高凤池病逝。次年偏瘫了一年多的张元济，似乎预感到生命之火将息，便自撰讣告，也预备着与世长辞。而转眼1952年元月商务董事会自选的公司经理谢仁冰，在奔波劳累中，突然脑溢血而弃世。数日之后，全国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五反运动”，在物色谢仁冰的继任时，公司中竟无人愿意代表资方出面。一切都与原来不同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合影

公私合营

在“人民出版事业”的旗帜下，像商务一样的私营出版企业，其生存空间已是越来越逼仄，已走到绝境。1952年2月12日，徐善祥写信给陈叔通，谈起商务的困境：“目下燃眉之急为经济问题。中图公司已积欠商务贷款二十四亿之巨。电函交驰，昨始得到复信，谓中国经济之窘，与商务相同，不特贷款无法照付，且因流动资金缺乏，非增资不可。故此惟一之来源，希望已绝。人民银行，照原约本可借款八十亿元，现虽亲借五十亿元，但沪行已得总行命令，不准放款，历与磋商，迄无所得。”难题何止这些，转瞬又是发薪日期，在三反期内不能拖欠分文，而且人民银行的五亿短期借款也即将到期，商务“真所谓罗掘已空，山穷水尽”。徐善祥最后说，在此“贷款无着”、“借款不到”、“旧货卖不出”、“薪工不能欠”的四重难关之中，“惟有不悼冒昧”，“肯祈婉商胡愈之署长转商人民银行总行通融借款”。

务公私合营，弟亦极愿于吾身亲见之。来信三月云云，转瞬即到，然消查公股，公家尚无丝毫象征，京沪各方至今无公文一纸，未知何故？”

就在那时“五反运动”开始了，陈毅曾向有关方面打过招呼，不让商务印书馆派人来张元济这里影响他养病。虽然张元济并没有受到这次运动的搅扰，但商务公私合营的事情却被迫延迟了。直到1953年10月，张元济读到《人民日报》鼓励私人资本与国家经济合作的社论，又“怦怦欲动”。于是，张元济分别致信陈叔通和史久芸，认为“本馆改为公司合营之时机，业已来临。”并请史久芸先向出版管理局提出口头要求，予以尽先公私合营。

11月3日，商务印书馆正式向出版总署提出公私合营申请书。由于当时高等学校教学用书迫切需要成立专业的出版机构，出版总署便有意将商务印书馆改组为高等学校教学用书的专业出版机构。于是，出版总署会同高教部于1954年1月16日、1月28日两次邀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代表举行会谈，商讨出版社的名称、今后的专业方向、业务范围、组织机构和领导关系、资产负债和股权清理、人事安排、筹备工作等协商公私合营的具体事宜。

那时，张元济卧病在床，便委托陈叔通为资方的全权代表，并一再让资方代表抱定“领导被领导”的五字原则，不要提过分要求。于是，会谈很快便有了结果：商务印书馆全面公私合营，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鉴于商务在海外的影响，同时仍保留商务印书馆的名称。商务印书馆原有北京及上海两个印刷厂、以及海外机构由新机构统一管理，仍沿用原有名称，不加改变。高等教育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高等学校及中等技术学校教学用书，而商务印书馆现有的出版物，如一般科技读物、工具书、古典书籍及其他不属于高等教育方面的书籍，继续以商务的名义出版。考虑到商务的传统，新机构成立后，仍暂兼营印刷和海外发行业务。关于组织机构及领导，则在高等教育部和出版总署的领导下，由公私双方各推荐董事若干人，组织新董事会。



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

会谈结束的当天，陈叔通便写信给张元济：“五十七年事业可有交代，实即有了结束。以后公以文史馆馆长之例，为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之例，切勿过问。”

1月29日，出版总署正式批复接受商务印书馆全面公私合营的申请，并由出版总署和商务印书馆共同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筹备处，成立北京、上海工作组，以上海工作组为重点，核实资产，定于1954年4

月1日前完成商务印书馆全面公私合营的手续。从此，一个新的商务开始了。

本文摘自：《1953，中国商人的生与死》（[链接](#)）

上海大亨的血色黎明

在五反运动的巨大冲击之下，对未来感到绝望的资本家们纷纷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了却人生，而那些依然活着的人们，在新的经济制度下，他们已不知该如何来扮演资本家的角色，于是，一个阶级最后的垮掉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文\刘永峰

1949年的5月24日，上海的夜里渐渐听到了“噼啪噼啪”的响声，与此同时，在远方天空中开始出现了红色的火星，飞来飞去。

伴随着枪声密集地响过，解放军进城的消息同时也在人群中散播开来。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虽然我们已经不能历数，有多少不能安眠的人们和他们各自或喜或悲的心事，但对于许多此时还身在上海的资本家而言，这该是一个忐忑不安的夜晚。



1949年5月，逃难者挤在一艘将驶向宁波的美国海军货船。

惶恐

此时，上海的荣家，只有荣毅仁和父亲荣德生还留在上海，坚守着一份支离破碎的家业。1948年底，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因受国民政府的敲诈气愤不过，便将他的家人及产业全部转移到了香港，后又远走巴西。此后，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已经74岁的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

那时，荣家的遭遇也只是上海滩众多故事背景中的一个插曲而已。淮海战役前后，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就已忧虑重重，他们预感到时局的紧张，许多资本家已经远赴香港、海外，寻找新的出路，上海的许多企业出现了资金外逃的情况。当时摆在面前的道路无非三条：继续追随国民党，举家搬迁过海，落户台湾；暂时避走香港，静观事态的变化和发展；怀着复杂的心情，留在上海。

在北伐时期曾经帮助过蒋介石的陈光甫，虽然此时又会不时地收到蒋托人转达的“慰问”，重述着那些旧日的“情谊”，但这位金融巨子却对此早已寒心：“政府向来予人以‘空心丸’，不知已有若干次，受者深知其味，未免难受。”于是，在上海易帜的一个月前，他便默默地离开上海来到香港。

直到上海解放的几天之前，向来以果断敢行著名于世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还是在是留是走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他在一封家书中写下了当时上海混乱的景象：“战火迫近沪郊，市区有时已可闻得炮声。当局正在疏散人口，但以交通梗阻，且有力者早已他往，无力者只得坐守。”



1949年5月，国民党士兵禁止农民进城卖菜。

正当刘鸿生疑虑重重、难下决断之时，以汤恩伯为首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命令上海市政府组织“保卫上海委员会”，拉拢各界人士参加，刘鸿生也被委任为保卫委员。国民党特务对尚未离沪去台的重要人物严加监视，上海市社会局局长陈保泰几乎每隔一小时通一次电话，随时掌握刘鸿生的动态。随着形势的紧张，刘家决定让刘鸿生暂时隐匿起来。5月22日夜10点多钟，距上海易手只有三天的时候，汤恩伯派军车强行将他带走，随机被送上军用飞机直接飞往广州。到广州后，刘鸿生怕再被带到台湾，便找了个机会避开特务的监视，偷偷溜到了香港。

对于资本家们的纷纷逃离，与其说是躲避战乱，毋宁说是对即将到来的中共充满了忧虑。在陈光甫看来，“今日之争非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实在可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他又想起宁汉分裂之时，汉口共党政府主动组织各业工会，清算斗争的事情，“颇有令人难以终日之苦”。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共党号称人民解放军，先从工人主政入手，即如银行方面，首先驱逐经理，由工役组织委员会开始清算。其时，我是在上海好，还是不在上海好？”那时，刘鸿生也说：“我那时不但相信共产党，而且怕它。怕共产党来了要清算我。”

可以说，这样的想法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时代情绪，即便是那些留在上海的人们，也同样被这种情绪所感染。因不愿跑到国外做“白华”，而“在犹豫中决定留了下来”的荣毅仁，对于共产党也是疑惧的，他说：“当时听到不少谣言，说共产党实行共产、共妻，资本家要被清算、杀头，不杀也要去做苦工。甚至还听说：济南成通纱厂资本家苗海南在济南扫街。那时，上海工商界当中有些人到香港去了。我家也有人主张走，他们以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一定要吃苦头，不如带些钱到香港，可以自由些。”（《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同样，因为不忍舍弃家族产业而留在上海的郭琳爽，听到“共产”两个字时，也不免有些畏惧，“以为共产党来了，产业就要共光，资本家是没有前途的”。

就这样，在上海，这座以工商业繁华而著称，催生并聚集着中国最主要的一群资本家的城市，因为一个立场上与资本家水火不容的政党的到来，远处渐渐响起的枪声里，便有了一种特殊的况味。

黄金岁月

5月25日清晨，申新厂的一位厂长坐了汽车来到荣家，说上海解放了。荣毅仁见到后觉得奇怪，“为什么解放了还能坐汽车？”由于好奇，荣毅仁便同那位厂长一起坐了汽车出去看一看情况。一路上，他看到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排排的解放军“席地而卧”，“毫不扰民”。回到家中，他将沿途所见，告诉家人，他们对生命安全是放下了心，但荣毅仁心里，“对今后到底如何，企业怎么办下去，仍旧茫茫然，很是不安”。

但就像那一天清晨的景象在荣毅仁的心中带来惊喜一样，一些慢慢的好感开始在上海的资本家中间蔓延。

其实，也就在不久之前，一直以来将资产阶级当做革命对象的中共，在已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后，也开始意识到对于资产阶级的需要。杨奎松在《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一文中写道：“由于受到战争尚未最后结束的影响，市场疲软，销售萎缩，再加上中共进城后政策普遍向工人贫民倾斜，使工商业者人人自危，从而造成生产锐减，大批工厂商店歇业和倒闭。随之而来的，则是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客观的形势也逼迫着中共对资本家们收敛起了敌意。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肯定了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现代工业中目前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主张团结尽可能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共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进入了一个怀柔时期。



1949年5月，商家加固橱窗以防暴乱和抢劫。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汇集着12000多家工厂，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一半，贸易额也将近占全国的一半，在其500多万人口中，有70万产业工人，20万店员，因而对工商业的政策成败也就成了能否顺利接收这座城市的关键。

1949年6月2日，上海解放后的第七天，上海党政负责人在中国银行大楼的四楼大厅里，召开了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会。90多位上海最知名的产业界人士，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这里。身穿褪色布军装，脚蹬布鞋线袜的陈毅开口说道：工商界的朋友们，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十六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

而紧接着，为了稳定资本家的情绪，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工商界人士盛丕华为上海副市长，华东局又聘请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张元济、章士钊等14位与上海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著名人士为上海市政府顾问，并动员他们去做流往海外的资本家的工作。

与此同时，一些扶助工商业的措施则令资本家们喜出望外，比如：发放工商贷款，扩大加工订货，中共对于新社会的劳资矛盾，也不再提倡采用罢工、包围等过激的手段。那时，荣毅仁也向政府提出了不少请求解决困难的办法，只要对生产有利，“政府总是迅速的同意照办，从没有受到过留难”。“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使我感到很快慰。”荣毅仁说：“这使我不得不开始信服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了。”

而上海种种欣欣向荣的新鲜气象，也很快通过各种途径，被传到了香港，甚至更遥远的美国，传到了那些犹豫观望中的人们耳中，于是我们看到，刘鸿生、吴蕴初、周作民等等一些解放前远走他乡的资本家们，开始陆续返回上海，试图重振起他们心仪的事业。

对于资本家而言，中共的新生政权下，似乎是一个依然美好的时代。郭氏家族的四小姐郭婉莹（原名戴西）曾这样回忆说：1951年以

后的三年左右，是留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的黄金岁月，经过国内内战时的混乱，经过1949年前夕去与留的彷徨，他们开始在和平的年代里，感到尘埃终于落定，自己如果好好努力的话，在没有战争、没有溃兵、没有黑社会敲诈的社会里，会大有前途。

震慑

1950年下半年，在经济形势好转的同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中共在全国范围展开了抗美援朝的社会动员，伴随急剧增加的战时物资需求，国内的生产活动深受刺激，上海的工商业又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那时，由于大宗订单基本上只能来自于党政军等政府部门，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钱交易的现象，贪污腐化也一时突显了出来。为了遏止这一现象的发展，中共极为机敏地作出反应：1951年冬天，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而随着各地报告越来越多地提到，贪污浪费现象的背后是官商勾结、行贿受贿之后，中共马上认定：这是资产阶级有预谋有计划的行为，是“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他们认为，造成贪污、浪费的最大的祸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及其腐化影响的侵蚀。

于是，本来是一场旨在反对党内自身问题的“三反”运动，转瞬间便被扩大到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上去了。而斗争的矛头实际上也指向了整个资产阶级，以“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反扑”。

虽然对于“五反”内容的正当性，多数资本家都难以否认，但中共的“突然”变化的脸色，让心情刚有所安定的他们又瞬间疑惑起来。荣毅仁说：五反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也认为这些不法行为确实不好，应该反掉。但后来斗到自己头上来了，心里很不痛快，以为自己这几年一直靠拢党，做事也规规矩矩，没有犯什么错误，为什么也要反，又怀疑

政策是不是变了。斗争究竟是苦痛的，我一面又要检查自己，一面又要安定各个企业负责人的情绪，精神上又紧张又苦闷。



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南阳烟草兄弟公司股票认购证

正是因为思想上的混乱和苦闷，资本家之间的各种聚会也就变得十分频繁。由于商场上的需要，上海的资本家早已形成了一种按行业或身份地位组织定期聚会的风气。那时，恒源祥老板沈莱舟的寓所是朋友经常聚会的地点之一，聚会之后他们常去附近的一家“马和记”牛肉面馆聚餐，但在1952年2月，他们惊讶地发现，这家面馆四周的墙壁上，已贴满了醒目的大字标语：“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马和记是黑联络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2月底，上海资本家的这些“聚餐”之类的活动也被打上了阶级对抗的烙印，迅速成为政府的清理对象。

在“五反”运动中，上海普遍采用了资本家自己“互助互评”的形式：将同行业的资本家编成小组，在小组中各自交代自己的“五毒”行为，并且进行互相帮助与互相评定违法等级。同行资本家都是内行，这样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无法蒙混过关，相互攻击也容易打中要害；另外，同行间往往具有很大矛盾，这更有助于挑起资本家内部斗争。

与此同时，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工人店员对资本家的检举揭发此起彼伏；资本家们则纷纷“坦白交代”，许多人主动低头认错，争取过关。而许多“坦白”或“交待”与有关单位掌握情况不相符，或达不到需要水平的，“逼供信”的粗暴方式也十分常见。为了落实对自己单位人员贪污受贿的指控和落实对资方偷漏税的指控，往往动辄到工厂、商店抓人、打人。杨奎松在《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一文中写道：

据上海“五反”委员会辅导组报称：“顺华机器厂负责人瞿明德、乐嗣黻二人被天原电化厂于三月八日传去，迄今厂中无人负责。更有人民银行派丁永以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名义，将中国柴油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陶咸于上月廿二日传去，迄今已两旬，尚未放回。”“合众冷气工程公司经理马德祥被浙江蚕业改进所人员传讯数日夜。派克公司资方钮永集被黄浦区税局三次传讯，罚站二十余小时。”“其中最普遍的是罚跪、‘立壁角’，比较突出的如上海第二印染厂传讯某五金号推销员包鑫泰，令其下跪，并脱大衣抓头发，迫令承认行贿及书写凭证及随传随到的保证书。江宁区税局将商人白建华打耳光后当场晕倒，醒来后说他装死，又拿棍子乱打。商人何润泉被三个工作人员轮流打了一个半钟头。高桥区税局将商人李俊荣关在大房间里被十几个人拳脚交加的痛打，并用针刺其指头。金昌钢铁行副理周菊牲被黄浦区税局责令举椅子跪在地上，也有被罚跪在桌子上的板凳上等。



1956年，上海永安公司公私合营成立大会上，郭琳爽（左）代表私方签字。郭琳爽时任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解放前曾是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解放后，积极带头公私合营和参加各项政治活动。

一种普遍性的恐慌很快就已在资本家群体中蔓延。五反运动发起后，从2月12日至15日不过4天时间，就自杀22人。这时还是一些小企业的业主，从2月下旬开始，一些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家也开始走上了自杀之路。

以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为例，“五反”前该厂即已开始积欠工资，从1952年2月下半月起，因“三反”“五反”造成市场萎缩，业务更加清淡，原料和销路都发生问题，所得收入只够维持日常开销，更加发不出工

资来。但是“五反”到来，造成职工与资方尖锐对立，硬是将冼关在厂里楼上两天两夜，连斗带逼。在被逼无奈之时，又被税务局逼上门来，这位67岁的老人走投无路，最后跳楼自杀。

而杨奎松则在《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一文中说：“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数字已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更足以见这场运动之激烈和对资本家精神冲击之巨大。”

垮掉

在五反运动的巨大冲击之下，对未来感到绝望的资本家们纷纷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了却人生，而那些依然活着的人们，在新的经济制度下，他们已不知该如何来扮演资本家的角色，于是，一个阶级最后的垮掉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桂勇在《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一书中写道：“1949年后原有的资本主义经营规范逐渐被打破，资本家发现自己开始变成一个对生产经营茫然无知的‘门外汉’，因为他们过去所熟悉的一套经济活动准则被彻底否定了。‘五反’运动对资本家的清算，加工订货中各种限制与指责，使资本家搞不清何为‘合法经营’，何为‘不合法经营’。”

正如一位资本家在回顾那段历史时所说：“虽然说剥削是不对的，是有罪的，但是这个理论是解放以后才提出来的，过去是没有的。将本求利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天经地义的事情突然变成有罪了，这个差距太大了。作为一个中国的老百姓，怎么能一下子经得起这样的打击呢？”

而当时的企业大王刘鸿生，虽说在中共的影响下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但依然也很难理解“劳动创造世界”这一“真理”。他说：“我始终

搞不通，为什么共产党硬要我们承认是工人养活我们，不是我们养活工人呢？没有我们的许多工矿企业，工人哪里会有饭吃呢？”

与此同时，资本家对于他们的存在感也产生了迷惑。在不断的政治宣传乃至暴力威慑下，带有贬义色彩的“私方”面目取代了“财产所有者”的身份，成为资本家角色意识的主要部分。在新的话语里，他们不再是成就显赫的社会精英，而是以剥削他人为生的寄生虫。资本家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对工人的权威。当过往笼罩着的光环消失以后，一般的工人也逐步走上与资本家对立的道路，有时还表现出对资本家人格的蔑视和侮辱。

一位资本家回忆说：“当时，整个形势给我们心理带来很大打击：工人不听话了，社会议论也不好，家庭内部也起了变化了。这些是真正的致命伤，因为我们从此没有积极性了，什么事情都干不好。”另一人则说：“作为一个厂的领导来讲，资本家自身难保，没有什么权力，还不如当一个工人。这样，资本家就产生了许多消极的思想，放弃经营了。他没办法再做下去，再干得多也没有用。‘五反’运动说资本家一生都靠剥削他人，企业迟早要被弄垮。事实上，资本家的心理状态已经这样垮掉了。”（桂勇：《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

此前，在资本本能的驱动下，资本家们所富有的勤奋进取的精神，已不复存在，转而整个阶级都患上了消沉绝望的情绪。而与精神的垮掉同时降临的，则是一个个刚有些转机的企业又重新走向了瘫痪。正如一位资本家所说：“就上海的一般情况来说，‘三反’‘五反’下来几乎所有的厂在经济上都垮台了。我们的厂子比较小，工人也不多（大约十来个人），平时经营上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三反’‘五反’运动一来，厂里财务就开始紧张了。尽管我们厂最后被评为基本守法户，但给补税、退赔什么的一弄，资金都没有了。”



1949年5月，上海街头生意清淡的三轮车和塌车。

那时，即便备受政府方面重视和保护的荣毅仁，都已经承受不住了。他表示，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已准备押款10亿，以还付欠中粮公司的款项，其他退款，只能将申新等厂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实行公私合营。如果这样还不行，“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

而当时生病在家的刘鸿生，听说其全部企业都受到了检查时，令他很不痛快。他告诉儿子们：“如今国家有了前途，共产党在经济问题上也很有办法，不要我们资产阶级这个朋友了。你们各自想办法吧！”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政府把厂子收掉，或公私合营。说：“反正是完了，早点送掉岂不更好？”



1956年，公私合营时期，一家绸布商店庆祝开业

结局

当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后，已陷入穷途末路的资本家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是唯一的选择，上海的资本家开始纷纷要求公私合营，或抵厂还款。

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官方的记载中曾这样描写着那天的情景：“各界人士的报喜活动有早到晚川流不息，敲锣打鼓，爆竹震天。很多资本家也跟着工人群众一起敲锣打鼓，参加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活动。”而在这样的喜庆里、在资本家将自己的财产拱手送人的背后，又隐含着一段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本文摘自：《1953，中国商人的生与死》（[链接](#)）

天下史

天下

电影：帝国的浮尸

在第三帝国最高导演戈培尔的主导下，整个纳粹德国时期共生产1363部影片，绝大部分是军政宣传片和娱乐片，前者发挥向民众灌输纳粹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后者则是为了让民众逃避现实，以便更容易服从管理。

文/邱实

1933年3月，德国大导演弗里茨·朗被刚上台半个月的戈培尔叫到办公室谈话。他的新作《马布斯博士的遗嘱》刚刚杀青，讲述神经错乱的马布斯博士用催眠术控制他的病友实施有组织犯罪，却当即因“危害公共秩序”遭纳粹禁映。



1943年，希特勒为施佩尔颁奖。

戈培尔对弗里茨·朗只字未提禁映的事，却说希特勒和他多年以前看过朗先生的影片《大都会》，非常喜欢，希望他能领导环球电影有限公司（UFA），为纳粹拍片。

会谈当晚，弗里茨·朗就带着电影拷贝逃离了柏林。他是犹太人，此外，他不得不与迷信纳粹党的夫人离婚。与朗同期逃离德国的还有导演派伯斯特（Georg Wilhelm Pabst）、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杜多夫（Slatan Dudow）、西奥德马克（Robert Siodmak）、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等等，整整一个世代的文艺精英。那个风云际会的魏玛文化落幕了。



劫后余生的勃兰登堡门及菩提树下大街

总导演戈培尔

如果1927年的弗里茨·朗没有拍成《大都会》（Metropolis），后来的纳粹电影史也许会完全改写。《大都会》是当年科幻大片的顶峰，也是魏玛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和无声电影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片中呈现了未来世界的摩天楼都市、轨道列车、空中机场以及女机器人和机械假手，成为后世无数科幻电影的鼻祖。史诗的气魄打动过希特勒，但因为空前的510万马克投资，以及同年有声电影的冲击，欧洲最大的电影公司UFA血本无归。



导演弗里茨·朗

环球电影股份公司（Universum Film A. G）即UFA，成立于一战末期，是整合了德国多家电影公司的大集团，后来发展为魏玛德国乃至全欧洲电影创作的发动机，可与同时期的经典好莱坞相媲美。直到1927年，因《大都会》破产的UFA被右派分子胡根贝格（Hugenberg）收购，转拍音乐剧和英雄史诗电影。

要掌控德国电影，必须要掌控UFA。1933年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成立“国民启蒙与宣传部”，下设“帝国文化厅”和“帝国电影厅”。胡根贝格在出任纳粹经济部长后，UFA电影的内容已完全在戈培尔控制下。1937年宣传部所属公司开始收购UFA，至1942年将其完全国有化，接

管包括制片、发行乃至胶片印制等所有部门。除了里芬斯塔尔等人的三个亲纳粹公司，德国电影公司全部被统合进UFA集团。

戈培尔曾宣称：“只有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土壤里，艺术才是可能的……我们无意容忍那些即使是最轻微的、在德国要被连根拔除的想法，无论以何种形式，或隐蔽或公开地被重现在电影中。”1934年2月纳粹通过电影法，规定官方须审查从电影剧本到演员挑选、影片拍摄的全过程，以“防止与当时国家精神相背离的情节主题会出现”。1936年戈培尔禁止了电影批评，理由是它“展现犹太人性特征”。电影评论重新定义为“影片观察”，成为宣传部指令的附庸。

戈培尔成了第三帝国最高的制片人和导演。整个纳粹德国时期共生产1363部影片，绝大部分是军政宣传片和娱乐片，且无一不经过宣传部的审查，前者发挥向民众灌输纳粹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后者则是为了让民众逃避现实，以便更容易服从管理。

戈培尔如是宣告：“（政治）就是现存的最高级的和最综合的艺术，我们在制定现代德国政策时，感到我们自己就是艺术家……艺术和艺术家的任务在于成形，定形，消除有害的东西，为健康的人创造自由。”

所有商业体制下的旧明星必须听命帝国文化部的领导。正如纳粹刊物常说的，“只有那些真实的、诚实的艺术家，那些将自己融入集体并成为全体演出者中的一个有用的人时，才能够享受这样的殊荣。……将明星病从电影中根除掉：明星必须死，这样电影才能够活。”

一批新的听命于党的电影人被网罗在宣传部周围，包括导演卡尔·里特尔、维特·哈尔兰，瑞典女影星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莎拉·莱安德。戈培尔那位深色皮肤的演员情妇丽达·巴洛娃也使他增色不少。整个纳粹德国的文艺界只有一个人不受戈培尔掌控，那就是莱妮·里芬斯塔尔。



《马布斯博士的遗嘱》海报 (1933)

雪峰の诱惑

1927年UFA破产前后，莱妮出演“高山电影”教父范克执导的《圣山》并一举成名。她扮演一名强健、纯洁的少女在海边翩翩起舞，笑问登山者“你来找什么”，后来她获得登山者求爱，投身于攀登阿尔卑斯山的运动中。此后，她相继出演同类题材的《大跳跃》、《匹茨帕吕的白色地狱》、《勃朗峰上的风暴》、《冰峰呼救》，并自导自演了影片《蓝光》。片中莱妮的形象一次比一次高大，从远离尘嚣的牧羊女、无性别的探险者（对自然的敬畏）演化为征服自然的女英雄，雪峰和白云开始由攀登的目标变为衬托主角的背景。



戈培尔慷慨激昂的演讲

在《蓝光》（1932）中，一道神秘的蓝光从山巅放射出来，只有莱妮饰演衣衫褴褛的流浪少女旺塔能够在夜幕下安全攀上山巅寻到蓝光所在，而她却只是沉醉于光的美丽。当她透露出发蓝光的其实是颗宝石后，贪婪的村民上山夺走宝石。满月之夜再次登山的旺塔由于失去蓝光而坠崖身亡。借用苏珊·桑塔格的分析，片中的少女是象征自然性的生灵，同时是理想化色欲的化身，村民则是庸众的代表。当少女与高山交叠，形成了一种诱惑，色欲的目标从女性转向那个崇高神秘的峰巅，达成了精神的“升华”。

正如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在高山电影萌芽期就指出的，整个爬山场面寓意着为美好而可怖的高远目标奋斗的渴望，“闪烁的冰镐和夸张的情绪”，让人感觉到“一种类似于纳粹精神”的“英雄理想主义”开始挣扎着争夺权力。“不成熟与对山脉的迷恋是一样的，都是反理性主义的征兆，也是纳粹主义得以发迹的资本。”这种迷恋后来转化为对元首的崇拜。

里芬斯塔尔影片借助身体呈现“超人”意识、人对天空的征服、对极限的挑战，是从早期她参演一系列“高山电影”起一脉相承的叙事模式。当莱妮自称还“分不清左派右派”时，就已经与希特勒信奉的尼采哲学不谋而合了。

1933年莱妮成为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并在1934年纳粹纽伦堡大会上拍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开场中雪峰、云朵以及元首救世主般降临的场景，希特勒的形象、帝国铁鹰与纽伦堡的古雅建筑反复出现在蓝天白云的前端。这都明显是来自高山电影的技法。城市里飘动的卐字旗海洋、游行中照亮夜晚的火把、难以计数的人群在欢庆广场上组成“活人造型”，则是纳粹凭借其权力为电影注入的魔力。



莱妮•里芬斯塔尔

曾经也是滑雪和登山运动员的施佩尔担当纽伦堡会场的总设计师，为列队欢迎的人群和行进的队列做足了准备。这让这场阅兵式与纪录片拍摄，更像是一次屡经彩排的盛大演出。那一场被排练数十次的劳工组织检阅场面，在影片中格外动人：

劳工组织官员高喊：“你们来自哪里？”

队员：“我来自费里斯兰！”

“你呢？”

队员：“来自巴伐利亚！”

“你呢？”

“来自凯撒施图尔！”“康尼斯堡！”“西里西亚！”“波罗的海！”“黑森林！”“德累斯顿！”一个个队员被投以大特写镜头，骄傲地喊出一个个德国地名。最后官员喊道：“一个民族，一个元首，一个帝国！”鲜活的人拼成帝国的版图，而都效忠于一个领袖，纳粹所标榜的“血与祖国”的主旨喷薄而出。

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纪录片《奥林匹亚》中，莱尼再次展现“雪峰的诱惑”。影片第二部最后15分钟里，她用特制的防水摄影机记录下跳水健儿从蓝天背景中翻滚落入水下的画面。天空中泳装健儿的线条，正如她当初登上雪峰的剧照一样，展示着对“力与美”的膜拜。这正是纳粹需要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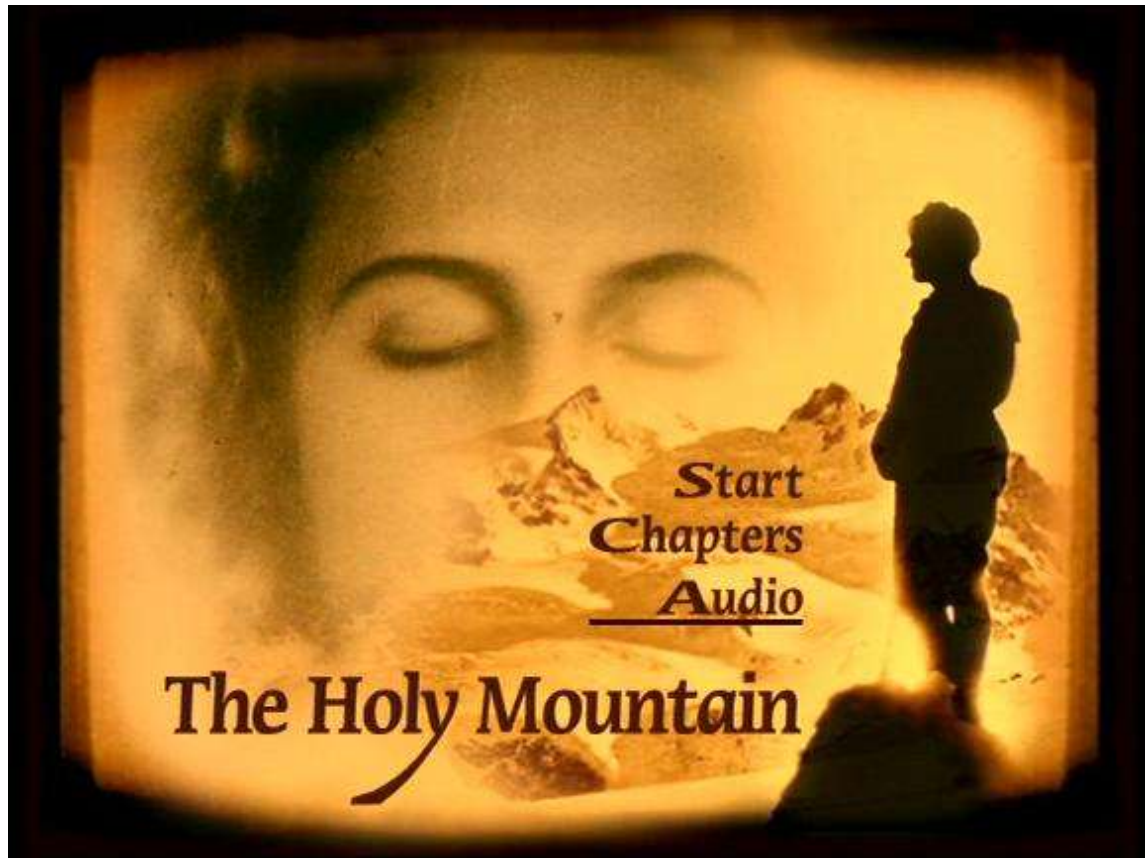
牺牲多壮志

1933年，刚刚得宠的莱尼曾拒绝希特勒的一个拍片邀请。希特勒要她把威塞尔（纳粹冲锋队小队长，皮条客和打手）的故事拍成影片。后来这部影片由别人拍完，名为《豪斯特·威斯特玛》，片中流氓威塞尔一变而为被共产主义者杀害的传奇英雄。一首相传为其生前所作的《豪斯特·威塞尔之歌》还成了纳粹党歌。

这是纳粹上台伊始的献礼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分别是歌颂纳粹冲锋队的《冲锋队：男人的热情》和《希特勒青年奎克斯》，讲述被共产主义者杀害的青年团团员的故事。

《希特勒青年奎克斯》的制片人是卡尔·里特尔（Karl Ritter），一名狂热的战争片导演，也是UFA的制片主管和电影厅委员，他拍摄了《爱国者》（Patrioten，1937）、《蓝十字勋章》（Pour le Merite,1938）、《休假宣言》（Urlaub auf Ehrenwort,1938）等大批

军政战争电影，且屡获殊荣。通过《叛国者》（Verräter, 1938）和反苏联电影《赤色恐怖》（G.P.U, 1942），他还在德国引入了谍战电影。



《圣山》海报



1933年，莱妮成为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

里特尔明确宣告电影应为纳粹意识形态服务：“德国电影的道路将没有任何妥协，其结论就是每一步电影必须致力于服务我们的社群、民族和我们的未来。”

他的电影“如坦克一般处在宣传战线最前沿”，经常展现“战斗机飞行员英勇死亡”，但也偶尔“用力过猛”，比如在一部影片中，他让一个步兵纵队为了引诱敌人进入己方火炮射程而壮烈阵亡，军方人士质疑这种战略是丑化德军。

战争开始后，戈培尔没有缩减电影投资，因为宣传战的意义不亚于正面战场，此时更需要宣传来鼓舞士气。播报吞并波兰、进军法国的新闻短片不断从前线传来，被强制贴在每部电影之前放映。当宣传部发现观众频繁延迟入场来逃避影片之前的新闻短片时，戈培尔下令新闻开播后观众不得再入场。

纳粹的战地新闻片素材全由前线记者拍摄于真实的战场上，由飞机载着底片飞离前线第一时间送到后方，成片的胶片装上货车派往全国，有时降价安排放映。由于画面暗示的时机必须恰到好处，戈培尔要求战地新闻片必须在同一天在全国发行。尽管大西洋阻隔重重，UFA驻纽约办事处仍然平均每两周能引进一部德国影片到美国。希特勒驻各国的外交官们也把大使馆的宴会当作战争片观摩场所。

《西线的胜利》（Sieg im Westen, 1941）是纳粹战争片中的典型。片中的图像、炮火和解说声交叉轰炸，在平面版图上以若干箭头指向行进方向，配以德军阅兵行军时的整齐步伐和野战炮的整齐开火。血肉横飞的画面不见了，中弹倒下的画面不见了。当解说宣布胜利时，画面已切换成了在巴黎的阅兵式，依旧是整齐的步伐。观众不会看到阵亡，只有歼灭敌军的数字。因为“省略”才象征着闪电战。



卡尔·里特尔

影片还省略了侵略者造成的毁坏，而却表现德国人修复被炸毁的桥梁和教堂的情景。当然影片不忘把马其诺防线中的法军刻画成嗜酒堕落的邪神。

影片中的领袖不再有《意志的胜利》那般活灵活现，他很少出现，隐身成为了“战神”或战争艺术本身。唯有解说热情重复着元首的“天才计划”。间或有一幕希特勒看望伤员的情景，他的手就仿佛拥有神力，摸摸伤员就能让他们复原。

犹太人居斯

正如那些反英、反法、反苏电影，戈培尔也命令导演维特·哈尔兰 (Veit Harlan) 拍一部给大众看的反犹电影。



1938年拍摄的《蓝十字勋章》海报

1935年，纳粹颁布“纽伦堡法案”，强调“雅利安人”的纯正血统，剥夺犹太人公民权。1938年“水晶之夜”起，纳粹团体开始大规模袭击犹太人。戈培尔也早有蓄谋，保存了一份1933年焚书时的禁毁书目——历史小说《犹太人居斯》（Jud Süß, 1925）。

小说中故事发生在1733年，居斯精明能干，能识时务，担任德意志符腾堡公爵的财政顾问，帮助公爵聚敛钱财，扩充军备以准备推翻议会独揽大权。而公爵贪财好色，想要霸占居斯的女儿，导致她反抗而死。决心复仇的居斯同公爵鱼死网破，向议会泄漏了政变计划。公爵中风身亡，居斯投案入狱。在被告知改信基督教就可以活命时，他反躬自省，仍然坚守犹太教的价值，被处死刑。这本是一个资产阶级悲剧故事。

居斯显得更有男人味。因为“坏小子”这种荧幕形象，早就在清除好莱坞影响的运动中消失了。

帝国的浮尸

一方面，戈培尔用战争宣传片密集轰炸观众，令其难以恢复理智思考，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明智的鼓动家，戈培尔经常说过分的政教宣传反而会减弱纳粹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力。他提倡UFA多拍些娱乐片和历史题材电影（神话传说或战争胜利），让人逃避现实，同时，有意通过娱乐片将某些意识形态“内化”。

泽德尔鲍姆被戈培尔所看好，被塑造成一位纳粹理想中的女性。她生于瑞典，属于纳粹神话中的北方日耳曼人，是纯血的雅利安人。她一头金发，身材健美，举止简约，身体裸露时也不会引发性欲。在一幅纳粹媒体为她推出的海报中，她穿戴大衣围巾，在山中拉着雪橇娱乐，脸上绽放两朵红晕。这是纳粹为了向英法资产阶级“大小姐”纤弱习气宣战，着力塑造出的雅利安健壮而美丽的女性形象。

1942年9月，UFA公司也是纳粹德国最赚钱的电影《黄金城》（Die goldene Stadt）在威尼斯首映。泽德尔鲍姆出演一个向往城市的乡村女孩，身着纯洁而鲜艳的彩色衣服，戴一顶黄色大草帽，与周围的山水融为一体。她在遇见城里来的工程师时坠入爱河。但恋人被父亲赶走，她独自来到向往的大城市布拉格，与表哥相恋，换上了时髦的都市服饰。而当她怀孕后，却因为父亲再娶而丧失继承权，被表哥赶出家门，终于投湖自杀。尸体浮出水面，洗尽铅华，又如天使般洁净。溺死之地，金黄的麦浪在风中摆动。

Veit Harlan

Goebbels' Starregisseur

Ingrid Buchloh



导演维特·哈尔兰

尽管是一部乡村/都市题材的情节剧，寓意却十分明显。纯净的祖国乡村与暗藏危险的异国都市，女主人公从叛逆父权，最终回归故土，相较之下自然前者才是正路。如纳粹所宣传的，乡村里孕育着“德意志精神”，而都市是充满犹太人和资产阶级的堕落之地。另外，布拉格也代表了非日耳曼种族。戈培尔甚至坚持改动剧本结局，把原著中父亲之死改为女主人公必须死，因为她怀上了“异国杂种”。

泽德尔鲍姆的角色尸体再次洁净地浮出水面，与《犹太人居斯》中的多萝西一模一样。民间也送给她“帝国的浮尸”的戏称。

与这种取向相反，女星莎拉·莱安德（Zarah Leander）被要求屡次扮演由堕落到赎罪的角色。比如《到新岸去》（To New Shores, 1937）中，她的角色是英国淫乱的舞女，而必须在“新岸”澳大利亚里靠诚实劳动谋求新生。显然，这里的新澳大利亚，正与《黄金城》中德国乡村是同一物。



2010版德国电影《犹太人徐斯》剧照

然而生活中，哈尔兰夫妇不像宣传中那般“纯净”。哈尔兰结了三次婚，第一次还是跟犹太女人，而与第二任妻子尚未离婚时，泽德尔鲍姆就已经怀孕了。UFA极力将哈尔兰夫妇描绘成勤劳的艺术家庭。而婚外情频繁出现在哈尔兰的剧本中，迫使戈培尔不得不频繁干预。试想在一个百万战士搏命前线而让妻子守空房的国家，婚外情是多么大的灾难。如果有，出轨的妻子应当愧死。

史诗的终章

随着战争的僵持，纳粹电影开始回避现实，转而拍摄腓特烈大帝、俾斯麦时期的战争往事，哈尔兰执导的《伟大的国王》和里本埃勒执导的《俾斯麦》等电影便是这一“精神胜利法”的产物。



《黄金城》电影海报

继续倡导“勤劳主妇”式的家庭妇女形象让纳粹陷入窘境，因为成百万的后方妇女必须被动员起来支援前线军需。泽德尔鲍姆在《伟大的国王》（Der große König, 1941）中、莱安德在《伟大的爱情》（Die große Liebe, 1942）中都被要求出演随军妻子的形象。

1943年，战局开始不利于德国。为了重振士气，戈培尔命令导演拍摄他所喜爱的《泰坦尼克》。这是史上第一部“泰坦尼克号电影”，片中虚构和历史杂糅，着重表现英美资产阶级的堕落导致“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突出船上德国人的英勇无畏和舍己救人的美德。影片于1943年11月在德占区上映。令戈培尔不安的是，沉船影片不但没有振作士气，反而让观众情绪更低落。他连忙禁掉了电影。



莎拉·莱安德

戈培尔仍谋划拍些振奋人心的东西，他授命哈尔兰拍摄一部反映“普鲁士战胜拿破仑”胜利的影片《科尔贝格》（Kolberg）。故事核心是1806-1807年在普鲁士小城科尔贝格，军民一心抗击拿破仑大军的故事，然而关键的史实中的失败变成了胜利，另糅合以其他错乱的史实。戈培尔坦言，片中的故事是一场“头脑中的战争”，但必须展现悲剧性的牺牲和抵抗的决心。彻底遁入虚幻，说明纳粹的文化权力已近崩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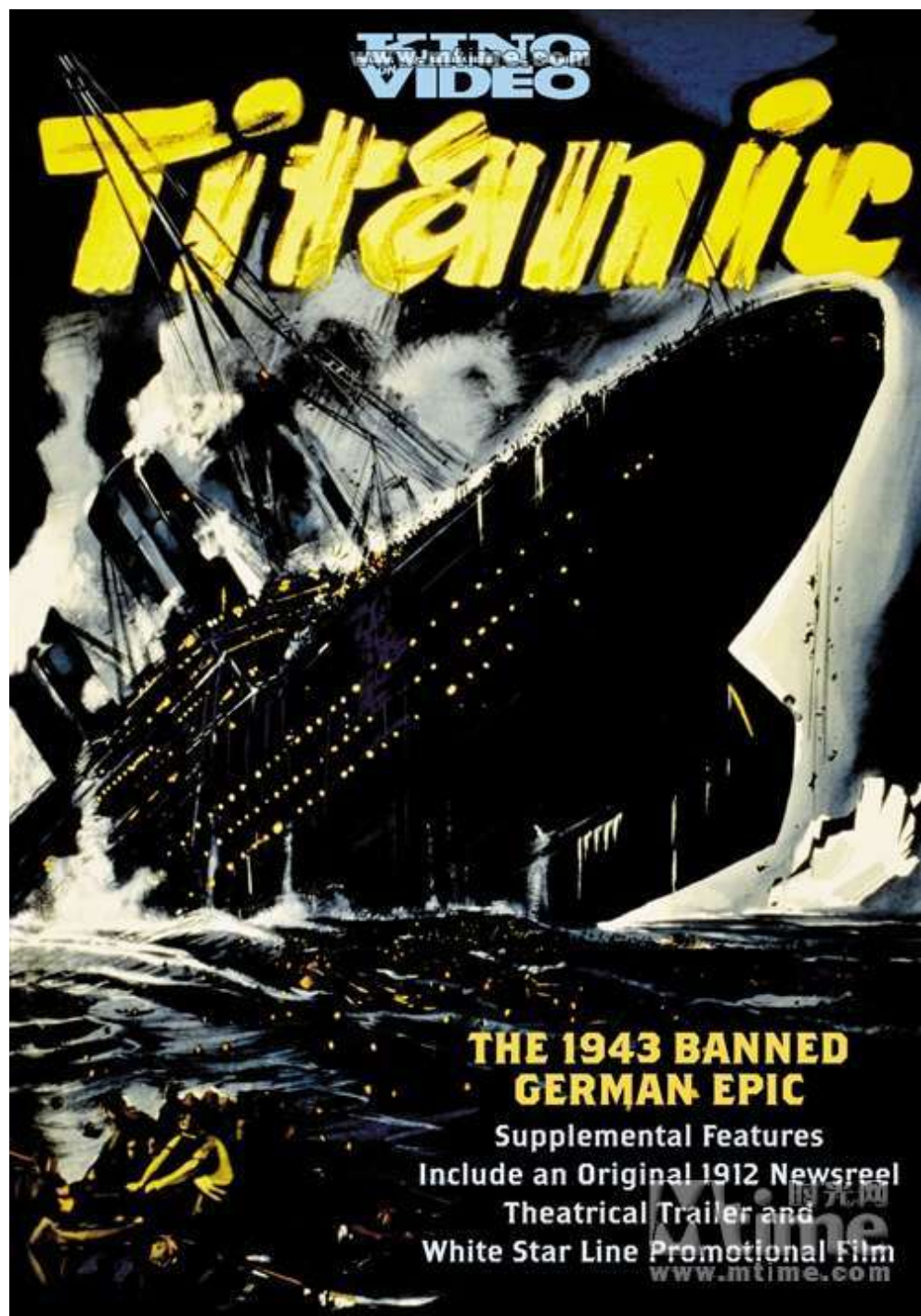


《伟大的国王》电影海报

这部戈培尔最后的作品花费近900万马克，哈尔兰夫妇全情投入，历时近3年，动用18.5万名临时演员和6000匹战马。出演影片最后一幕战争场面的几处部队是刚从被包围的前线撤退后，换上古代衣装直接进入电影拍摄的，而苏联大军已经集结于不远处。这种庞大的开销只

能导致《大都会》一样的破产。当1945年1月公映时，德国大部分的电影院已经化作瓦砾了。

战后，里芬斯塔尔和哈尔兰相继被盟军抓捕和审判。他们的上司戈培尔，已经在1945年5月1日杀死六个孩子和妻子后饮弹自尽。



1943版《泰坦尼克》电影海报

哈尔兰因为拍摄反人类的《犹太人居斯》受审，他称自己是“迷失自我的艺术家”，他也是纳粹暴行的受害者，如果他不按戈培尔的意思拍一样会被枪毙。“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曾为魔鬼做事。”他用人人都有

份的理论推脱责任。经历了一场险些丧命的心肌梗塞，哈尔兰最终被无罪释放。而《犹太人居斯》成为战后唯一被判有“反人类罪”的电影。

尽管哈尔兰获准继续执导，他的妻子泽德尔鲍姆却被禁演。人们对女人的“过错”总是更为严苛，更何况她的“雅利安少女”形象那么深入人心。

里芬斯塔尔被盟军反复抓捕和释放，还曾被关进疯人院，1952年终因为并非纳粹党员而无罪释放。1953年，她拍摄于战争时的影片《低地》终得上映，影响平平。1955年，她的《奥林匹亚》终于登陆纽约并广受好评。纽伦堡三部曲仅存的《意志的胜利》至今仍是影视学院的教学材料，但教师不敢给学生们播放完整的影片，因为它的威力太强大了。

欧洲最大的电影公司UFA被民主德国接收，改造为“德意志电影公司”（DEFA）。1991年两德合并后，UFA重建，成为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现在是贝塔斯曼跨国集团的一部分。

参考书目：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从加里加利到希特勒》，2008

斯蒂文·巴赫：《极权制造——莱尼·里芬斯塔尔的一生》，2010

安特耶·阿舍得：《希特勒的女明星》，2009

泰勒·唐宁：《奥林匹亚》，2012

Eric Rentschler, The Ministry of Illusion: Nazi Cinema and Its Afterlif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Ingrid Buchloh, Veit Harlan: Goebbels' Starregisseur, Schoeningh Press, 2010

本文摘自：《最恶的美：纳粹极权的精神大法》（[链接](#)）

红色十月的主角与配角

在《列宁在十月》这部电影中，在每一个关键点上，列宁都要卫士瓦西里去找斯大林。在苏维埃大会等重要的历史场合，斯大林都站在列宁的身边。在十月革命进程中，斯大林也一直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革命而筹划着。其实，在历史上，的确有这么一个人在列宁身边运筹帷幄指挥十月革命，但他不是斯大林。

文/姚望

一列火车喘着粗气即将进站，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搜捕着谁。两个黑影趁人不注意，下了列车，消失在夜色之中。这两人就是列宁和他的卫士。

这是电影《列宁在十月》开始的一幕，也是历史上曾经的片段。1917年7月，布尔什维克差点起义，史称“7月事件”，列宁等人被临时政府通缉，逃亡芬兰。10月，列宁在卫士的陪伴下，经过维堡，返回当时的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准备发动十月革命——在现场一直观察的美国记者里德称之为“震撼世界的十天”。

当电影《列宁在十月》大功告成之日，时光距当年列宁发动的革命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表现“7月事件”的油画作品

片中的主角列宁已于1924年病逝。那位主要配角、忠心耿耿的卫士瓦西里的原型艾诺·拉西也在1936年过世。

这名芬兰铁路钳工出身的警卫后来参与创建了芬兰共产党，是芬兰驻共产国际代表。去世原因是肺结核以及酗酒。

其他一些人，那些领导十月革命的主角，随着世易时移，有的人被处决，有的人被流放，有的人成为阶下囚。

然而，有一个人，站到了苏联舞台的中央。

他就是斯大林。他要力转乾坤，他要通过电影《列宁在十月》重塑十月革命的历史。

斯大林，主角还是配角？

“明天我一定要见到斯大林同志。你去找斯大林同志。”

在电影中，在每一个关键点上，列宁都要卫士瓦西里去找斯大林。在苏维埃大会等重要的历史场合，斯大林都站在列宁的身边。在十月革命进程中，斯大林也一直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革命而筹划着。

其实，在历史上，的确有这么一个人在列宁身边运筹帷幄指挥十月革命。

他不是斯大林，他是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

是他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是他领导了为起义设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他在斯莫尔尼宫孜孜不倦，具体领导了十月革命。

不过，在列宁逝世后，在苏共党内的斗争中，这位托洛茨基败给了斯大林。到1929年，他被逼离开了苏联，流亡他国。

所以到了1937年，斯大林领导下拍摄的这部电影中，虽然反映的是十月革命，但是完全没有托洛茨基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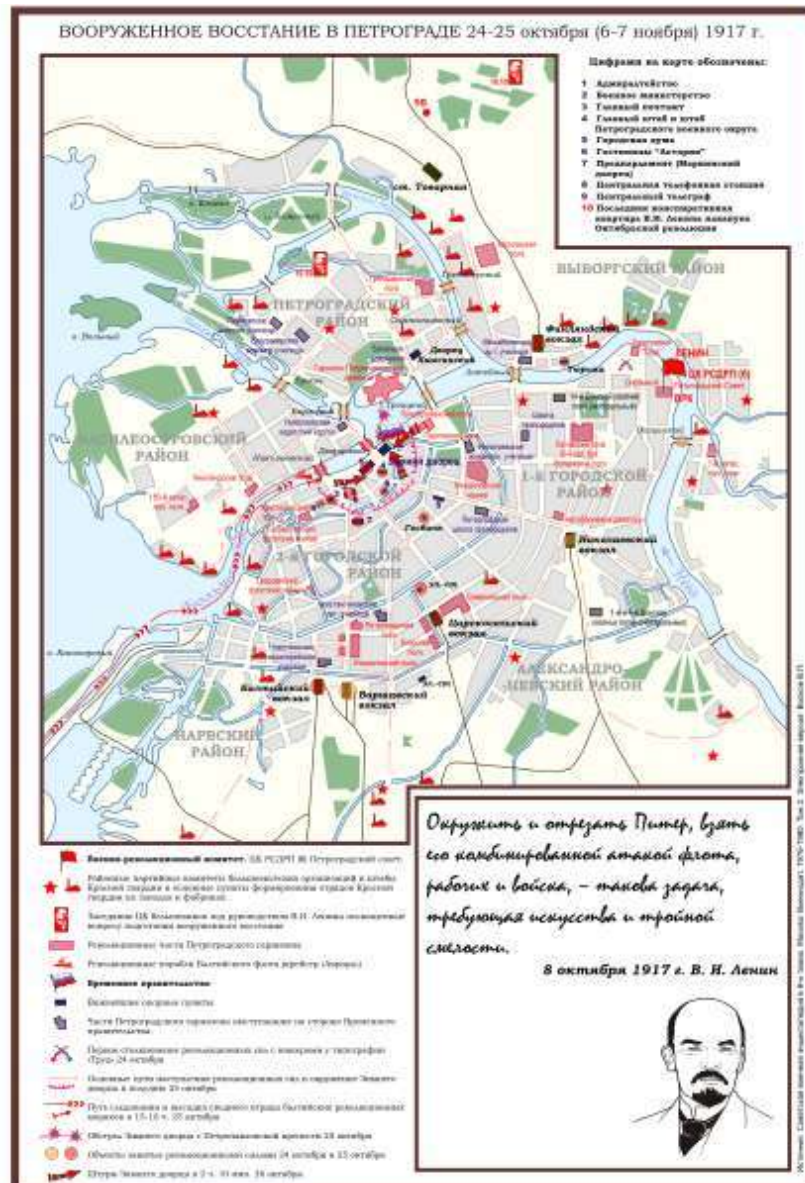
十月革命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在干什么？

在其他革命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没有提到斯大林直接参与过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过与起义相关的事宜。

只有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书中说，斯大林负责和列宁的联系工作，这个似乎和电影可以吻合一点。不过事实上，列宁在革命期间和其他人联系得更多一些。没有什么材料说明斯大林到底做了哪些联系工作。

现有的材料倒是可以发现斯大林从事了不少宣传工作。在报纸上和党内同志以及临时政府论战。

不过，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编纂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斯大林领导十月革命找到了证据：1917年“10月16日，党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选出了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这个党总部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属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核心，它实际上领导了整个起义”。但这个表述并没有其他文件和回忆录的旁证。



1917年11月，十月革命在彼得格勒起义冲突示意图

“这些伪君子，这些政治娼妓出卖了我们，背叛了党中央的决定。”在电影中，列宁狠狠地骂了两个人。他们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人都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

在十月革命即将发生的时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仅有的两位反对发动武装起义的中央委员，并且在非布尔什维克刊物，高尔基主编的《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反对武装起义的决定。



加米涅夫



季诺维也夫

列宁是否在气头上真讲过这话，已经难以考证。不过作为旁证的是，1917年10月列宁曾与他们两位有过严重的政治分歧。此外，列宁也曾使用过妓女的字眼。列宁在1905年9月7日写给党中央的信中就已经形容，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人劳工联盟为政治妓女。所以列宁在气头上说政治论战对手为政治妓女，是有过先例的。

但不同的是，十月革命之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列宁的同志。在美国记者里德的作品里还是提到了他们参加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没提到斯大林。

革命成功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成了苏联的主要领导人。但是到了斯大林时代，这两位则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并在1936年的大审判之后被枪决。电影中列宁骂人的话，也成了斯大林行动的注释。

斯大林如此关注一部电影，主要是为了通过塑造自己在十月革命中的形象来奠定自己革命元勋无可替代的地位，通过塑造自己在列宁身边，奠定自己是列宁接班人的形象。到了1937年，他已经通过十几年的斗争在党内获得胜利，这是他重建话语权的时候了。

冬宫之夜的搏斗

在苏联的历史叙述中，十月革命中两个阶级的斗争，是最主要的叙述线索。一边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一边是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双方阵营间紧张的抓捕，大炮的怒吼，革命队伍对冬宫的冲锋，以及枪战，无一不刻画出双方的冲突你死我活，十月革命的发生，使1917年10月25日（俄历）的夜晚，骤然紧张起来。长期的宣传，给人们形成了对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固定印象。

1917年俄历二月发生了二月革命，沙皇政权被推翻。随后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及六月成立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就是成分复杂，长期以来把持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手里。布尔什维克党长期以来只是苏维埃里的配角。直到十月革命不久前，俄历9月25日布尔什维克才掌握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权，托洛茨基成为主席。

而那个时候正在筹备11月7日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反对起义的。

布尔什维克选择11月7日是深思熟虑的。据美国记者里德记录的列宁的说法：“11月6日发动嫌太早了。我们必须使起义具有全俄罗斯的基础；而在6日那一天，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还没有到齐。……但另一方面，11月8日发动又嫌太迟了。到那时候，大会将组织就绪，而要求一个人数很多的团体来采取迅速的、决定性的行动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在11月7日举行起义，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那一天开幕，那么我们就可以向大会宣布：‘政权就在这里！你们将怎样来行使这个政权？’”

苏维埃的对立面临时政府也不是完整的一块。自从沙皇退位以来不到半年，已经过了五次替换，并先后有了三届政府。如果说一开始临时政府还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党为主的话，那么到了十月革命前，则是自称社会主义政党占了多数。在内阁中，4个立宪民主党，2个社会革命党，3个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一个劳动党团，一位独立人士，以及两名军人。此时领导临时政府的是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

中国学者金雁考证，就在十月革命前一天：俄历十月二十四日，在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临时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苏维埃政府次日提出的“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几乎如出一辙。该议案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由于列宁的坚持，布尔什维克党还是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

而在现实中的攻打冬宫，双方的冲突远没有电影中展现的那么激烈。一边是工农赤卫队和海军的起义部队；另一边是守卫冬宫的不多的士官生，以及被临时安排过来的妇女敢死营。



描绘攻打东宫情景的油画

真正打仗开始没多久，士官生就放弃了抵抗。在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就通知赤卫队来接防，并亲自打开宫门，把围攻冬宫的起义部队带到了临时部长们正在开会的地方。

整个起义的结果，仅仅死了六、七个人，伤了50个人。列宁对起义的总结是“罕见的顺利和不流血”。

顺带一提的是“阿芙乐尔”号的神话。在影片中，“阿芙乐尔”号发出的炮弹在冬宫中爆炸，通常都会把“阿芙乐尔”号的那一声炮响看做是起义的信号。

实际上当时“阿芙乐尔”号正在大修。当晚所做的事情是，通过军舰的电台发布了列宁的《告俄国人民书》，发了几个空弹，据说是为了提醒涅瓦河上的其他舰船警戒，而不是进攻冬宫的信号。

不过，即使前苏联解体了，“阿芙乐尔”号还是躺在涅瓦河畔的港汊里述说着历史。船上的铭牌还在告诉你哪门炮奏响了革命的凯歌。

导演与演员

《列宁在十月》就这样在斯大林政治意图的背景下出台了，并且整整影响了几代人的十月革命观。

就在这部片子杀青十年前，为了献礼十月革命十周年，苏联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拍摄了《十月》，他要尽可能地在银幕上再现十月革命的“原貌”。蓝本正是美国记者里德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这部片子的英文名正是这个，并请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担当顾问，负责攻打冬宫时的“作战指挥部”的负责人波德沃伊斯基在片中饰演自己。



《震撼世界的十天》封面

相对于十年后的后来者《列宁在十月》，《十月》这部片子在传播影响力上远远不足。首先是技术上，这是一部默片，背景请肖斯塔科维奇配乐，整部片子角度独到，节奏感强，但更像是一部MTV，而不像《列宁在十月》这样的有声电影，具备更好的叙事能力。

更主要的原因是，这部片子忠于历史，描写了斯大林的政敌托洛茨基等人，而没强化斯大林的角色。拍摄《十月》的时候是1927年，托洛茨基刚刚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处于低潮。所以片子就没得到大力推广。

到了十月革命胜利二十年的时候，政治气候已经定型。

《列宁在十月》是苏联年轻导演罗姆1937年的作品。剧本由青年剧作家卡普勒尔所写。1937年11月6日，在斯大林的私人电影院观看，并得到充分肯定。11月7日是革命纪念日，在莫斯科大剧院正式首演，获得巨大的成功。1938年，此片在法国和美国首映。据《纽约时报》的评论：罗姆在革命的背景中，率先展现了列宁的个性。演员楚金向观众展现了列宁有趣、活泼的一面。



1918年11月7日，莫斯科，列宁在红场上发表演讲，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

不过另据中国学者闻一调查：十月革命节前夜，斯大林看了《列宁在十月》，当时还对罗姆说不错。可就在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红场上的检阅之后，电影局局长舒米亚茨基传话说要补拍，“不逮捕临时政府成员和攻打冬宫，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垮台终究是不清楚的。必须补拍攻打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的戏”。这时，罗姆光火了，就说：“怎么补拍？什么时候补拍？影片都在上映了！”舒米亚茨基告诉他说：“不，它已经停映了！一个小时前已经电话通知让所有的电影院将这部片子撤下来。”至于补拍的时间，舒米亚茨基告诉罗姆，斯大林说，时间现在不起作用了，因为纪念日已经过去了。结果是，卡普勒尔改写了这两段戏的本子，罗姆又重回列宁格勒去拍这两场戏。

1938年，又是卡普勒尔编剧、罗姆导演，拍摄完成了“列宁系列影片”的第二部《列宁在1918》。



《列宁在1918》海报

卡普勒尔获得了1941年的斯大林奖金，风头正劲的时候，和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传出了恋情。

可能是斯大林不满卡普勒尔和斯维特兰娜的恋情，卡普勒尔于上个世纪40年代初被捕，在靠近北极圈的劳改营中度过10年。斯大林逝世后，于1954年被释放并被平反。

罗姆凭借《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于1941年获得斯大林奖金，一举成为大导演。扮演列宁的演员史楚金，据说在《列宁在十

月》中的表演被列宁夫人批评为动作太多，在后一部电影中改进，成为最早一代扮演领袖人物的特型演员。在拍完《列宁在1918》没多久就过世了。史楚金在逝世后被追授了斯大林文艺奖。扮演斯大林的演员格利德史塔布虽然没参拍《列宁在1918》，却也成了斯大林的特型演员。



1919年5月25日，列宁与同志们检阅在红场列队的各级指战员。

1956年，随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电影导演罗姆重新编辑了电影。新版本中斯大林只是主要演员之一。一个例子就是列宁和斯大林四小时的会面场景被裁剪，只是在字幕上加以说明。

到了1963年，这部电影被进一步剪辑：通过各种技术技巧，斯大林完全从电影中删除，有些提到斯大林的那些场面，通过配音改变。所以最后这个电影有了三个版本，分别是1937年版，1956年版以及1964年版。

本文摘自：《苏联往事》（[链接](#)）

家国梦

同一个家国，不同的主义，在这场错误的战争中，谁在保家，谁在卫国？

文 宿亮

内战，扭转人心，割裂南北。

这里是北纬三十八度线上最知名的一段。60多年前，这里一度充斥着炮火、叫喊、缠斗和死亡；如今，平静的“三八线”仍旧显得危机四伏，双方间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互相威胁、恐吓。对于朝鲜半岛民众而言，民族在这里撕裂。

1950年6月27日，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今称首尔）。在平壤，朝鲜领导层正焦急地等待数十万南方朝鲜劳动党党员“揭竿而起”，加入人民军，一举击破韩国李承晚政权，统一南北。因为一个名叫朴宪永的前南方政治领袖曾经承诺，会有至少20万南方同胞正等待着人民军的到来。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

同一时期，曾经在朝鲜平安南道人民政治委员会工作的“脱北者”白善烨晋升少将，并执掌韩军第一师。正如朝鲜人民军对朴宪永的期盼一样，在无法确知外部力量是否会介入半岛战事的前提下，韩军也把击败北方军队的重任寄托在这名生长在北方的职业军人身上。

朴宪永：南北双方共同的敌人

1950年11月，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指挥部。朝鲜人民军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和他的副首相、外相，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朴宪永对桌而饮。由于战局不利，屋子里的气氛有些紧张。几个月之前，人民军一举南下，占领了朝鲜半岛90%的国土，但随着美军在仁川登陆，北方告急，连平壤都已经落入韩美军人手中。

一个月之前，朴宪永在北方几乎走投无路之际，刚刚作为金日成的特使前往中国，恳请毛泽东主席派遣军队援助朝鲜。



北朝鲜的会议照片，右起为外交人民委员朴宪永和金日成

酒过三巡，金日成显得微醺，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扶着桌子。突然指着对面的朴宪永骂道：“你的游击队都去哪里了？你不是说老百

姓会起义吗？结果都去哪里了？”

金日成所说的，正是家乡在汉城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元老朴宪永先前承诺，只要占领汉城，就会有南方劳动党成员起兵支持人民军，推翻李承晚政权。

对于金日成的责骂，朴宪永显得有些委屈。作为总政治局主任，朴宪永从来没有机会执掌战争指挥权，为给人民军争取援助，他东奔西走，已经筋疲力尽。朴宪永认为，作为人民军最高指挥官，金日成应承担战局失利的责任，而不是埋怨别人。他指出，在多次战役中，金正日的命令可能并不是最佳选择。

金日成大怒。他说：“你这个臭小子，你这是什么话？如果战争出现失误，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你也有。有你这样判断形势的吗？”

说罢，金日成抄起桌上的大理石墨水瓶砸向朴宪永。

这则故事记录在朝鲜战争中南方大将白善烨的回忆录——《白善烨将军朝鲜战争回忆录》中。至于朴宪永有没有被这个墨水瓶砸中，大概已经无据可考。不过，韩国首尔延世大学教授朴林明认定，朝鲜劳动党两位高级领导人金日成和朴宪永之间的关系在朝鲜战争中已经破裂，这也给朴宪永战后的命运写下伏笔。

朴宪永，生于“三八线”以南，忠清南道礼山郡人。他19岁开始流亡海外，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参与1925年朝鲜共产党成立，是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元老人物。1945年，后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袖金日成从苏联返回朝鲜前，朴宪永在汉城领导共产党党中央，在国内积累了一定的声望。

就朴宪永和金日成的关系，不少历史学家都试图在有限的资料中理出头绪。有人说，朴宪永是朝鲜战争爆发的真正“推手”；有人说，朴宪永为朝鲜人民军最终未能一统南北“背黑锅”。朴宪永的是是非非与这场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但大国之间就朝鲜半岛的未来“暗流涌动”。在苏联军舰的帮助下，金日成返回朝鲜，径直在苏联占领的北方咸镜道成立朝鲜共产党北方局。尽管金日成公开表示服从汉城共产党党中央和朴宪永的领导，但北方局由于在苏控区，得到苏联支持，行动较为独立。

另一方面，朴宪永在南方的日子并不好过。朝鲜共产党在汉城的活动受到美国占领方和南朝鲜政权的打压，主要领导人遭到通缉。朴宪永、李承烨等共产党领导人于1946年被迫撤往北方。随后，南北双方各自建国，半岛即将进入战火纷飞的时代。

一些历史资料记载，撤到北方的朴宪永并不甘心把党内权力让给金日成，两人一度形成对峙关系。



北朝鲜军队抵抗美军。

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位于平壤的劳动党党校正在举行一场学习班毕业典礼。此前两年，朝鲜半岛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朝鲜光复后，一度形成了朴宪永领导的南方共产党和金日成领导、由朝鲜共产党北方局改组而成的北方共产党，随后两党相继改名劳动党，进而合并。

不少原南方劳动党党员跟随朴宪永一同北上。他们在这次学习班毕业典礼上和北方党员一起庆祝。突然，有一名喝多了酒的南方劳动

党党员起身高呼：“朴宪永万岁！”这虽然只是一句酒话，却让朴宪永陷入了被动。不少党内领导人指责朴宪永搞宗派主义，南北劳动党员之间的关系一度剑拔弩张。

在苏联方面的调解下，朴宪永接受了寄人篱下的现实，出任朝鲜南北劳动党联合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并担任朝鲜副首相兼外相，成为朝鲜战争前北方政权的“二把手”。

在第一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中，除朴宪永外，朴文圭、李承烨、许成泽、李炳南、金元凤、白南云6名部长级官员同样来自南方劳动党，形成南北各分天下的局面。

就之后的朝鲜战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权力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与战争爆发紧密相关。

由于认定美国不会直接干涉朝鲜战争以及南方李承晚政权不断扬言北进，朝鲜方面普遍持有武力统一半岛的主张。在朴宪永看来，南方是自己已经苦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存在一定的群众基础，多名南方劳动党领导人也正在汉城等地从事地下工作，一旦战端开启，能够赢得不少南方民众的支持，从而迫使李承晚政权屈服，完成南北统一。

有些史学家坚持，朴宪永之所以屡屡强调南方劳动党员的群众基础，是为了“争功”。按照金日成等人先前的方案，北方将通过人民军为主要力量武装统一半岛，巩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这一方案受到朴宪永的反对，因为朴宪永希望把统一半岛的功劳记在南方劳动党头上。

不过，就在人民军发兵之前数月，南方劳动党留在汉城从事地下工作以及反政府游击队的领导人被李承晚政权逮捕，这使得朴宪永倍受打击，在党内的地位有所动摇。

无论朴宪永当时内心做何种想法，他确实夸下“海口”，称北方军队进入汉城之日，就是20万南方劳动党党员起兵响应之时。

时间回到1950年，根据先前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人民军6月25日凌晨向南方发起突然袭击。韩军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迅速溃败，仅仅过了不到3天时间就丢掉了首都汉城。随后，朝鲜军队势如破竹，一度占领了半岛90%的土地。

不过，朴宪永承诺的20万南方劳动党党员没有“如约而至”，等来的却是3个月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在仁川登陆。随后，战争的发展卷入了更多国家，北方一度溃败，金日成和朴宪永两人就承担战争失利责任陷入争执，这才有了金日成用墨水瓶怒砸朴宪永的一幕。



1950年7月，美国步兵第24师一部到达朝鲜大田车站。

停战后，南方劳动党在朝鲜政府内威信受到重挫。不少政府内部人士认为，来自南方劳动党的领导人没有尽力发动群众、配合人民军进攻，应该为战争失利负全责。从1953年开始，包括朝鲜劳动党秘书、朴宪永在南方劳动党的副手李承烨在内多人被处决或判刑。南方劳动党彻底失势。

1955年，朴宪永同先前被处决的李承烨一样，被控为“美国间谍”，罪名是促使朝鲜人民军贸然进攻，获死刑判决。在不少传说中，朴宪永被极其残忍的行刑手段杀死，不过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

朴宪永的真实想法可能永远无法确切还原。不过，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虽然可能存在争夺权力的想法，但多次被敌人逮捕、一直希望南北统一的朴宪永无论如何不会是间谍。

一些俄罗斯史学家曾经撰文思考朝鲜战争的原因。他们认定，朴宪永可能比金日成更热衷于这场战争。朴宪永是汉城人，一直在南方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其号召力和人脉资源都留在南方。一旦南北统一，支持朴宪永的党内成员和党外群众都会增加，与一直在海外抗日的金日成相比，朴宪永更有优势争夺党内领导权。

不过，朴宪永的这种想法没有实现，相反，因为政治斗争的缘故，他最终成为南北双方共同的敌人，遭到南北方民众的指责。

朴宪永为了推动半岛共产主义运动和南北统一成为李承晚政权的敌人，战后又为战争失利承担责任，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人。他是否希冀回到南方，亦或掌握更大权力，无人可知。但朴宪永没能再次回到他一直奋斗的汉城，他的“家国梦”最终上演一出悲剧，留给后代人的只有唏嘘。

白善烨：流泪做先锋

还是1950年，9月15日，美军完成了仁川登陆，在短时间内扭转战争形势。28日，美军攻占汉城。一辆吉普车开进忠南道办公大楼院内，韩国国防军第一师师团长白善烨从车上走下来，前往二楼的办公室领取作战计划。

取到作战计划后，白善烨急切地翻着，希望看到第一师团的行军路线。作战计划清晰地标明，美军两个师团从汉城进军平壤，而韩军则要沿着海岸线进军海州方向。

白善烨着急了。多年之后，他在《白善烨将军朝鲜战争回忆录》一书中写到：“我不能理解。在占领敌军首都的过程中，这片土地的主人——（韩）国却被排除在外，怎么也不能只是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的发生。”



1950年，在前线的白善烨

白善烨找到了美国第一军军团长弗兰克·米尔本，要求改变作战计划，让韩军第一师负责进攻平壤。白善烨知道，说服美军改变作战计划意味着改变后勤、通信、运输等一系列作战细节，似乎是不太可能

的事情，但他依旧迎难而上。他给米尔本讲韩军的作战能力，讲部队的士气，甚至讲50多年前日军攻占平壤的作战方略。

不知不觉间，白善烨的眼泪开始顺着脸颊流下来。他说：“我的童年是在平壤度过的。大同江哪些地方深、哪些地方浅，我都非常清楚。因为大同江是我和我弟弟一起打滚玩耍长大的地方，我比任何人都清楚那里的情况……”随后，白善烨哽咽了，一句话也说不出。

如他所言，白善烨出生在平安南道江西郡，童年在平壤度过。他1939年从平壤师范学校毕业，随后前往伪满洲国奉天军官学校学习。日本投降后，白善烨回到平壤，就职于平安南道人民政治委员会，曾经担任有“朝鲜甘地”称号的朝鲜民主党创始人曹晚植的秘书。

1945年12月，白善烨“脱北”，加入韩国国防警备队，1950年成为韩军第一师师长。

美军仁川登陆后，已经成为韩军第一师团最高指挥官的白善烨已经磨拳霍霍，准备带领第一师团杀回故乡平壤。

在1950年9月的那天，美军米尔本军团长陷入沉思，他面前的白善烨脸上还挂着泪珠。最终，米尔本拿起了电话，要求参谋修改作战计划。而白善烨则飞奔到参谋办公室，亲自等了三个小时拿到修改后的新方案。

拿到作战方案后，白善烨率领第一师团进驻刚刚收复的汉城。在继续北进的同时，他有些担心自己三个月前被迫仓皇南撤时留在汉城的家人。他坐着吉普车去找弟弟白仁烨，后者是韩军第17独立团团团长。一见到哥哥，白仁烨就说：“家人们都没事。母亲和大嫂都很安全。”



1951年7月10日，白善烨作为韩国军队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当天的仪式，南方军队只有他一人出席，是荣誉也是他最大的可悲。

听罢，白善烨低头思考了一下。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回到师团指挥部，部署北进行动。在白善烨看来，只要家人没事，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打回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家乡平壤。

为了先于美军进入平壤，白善烨动员一切力量。他顶着压力收编那些在南撤时留在汉城的第一师团士兵，补充兵员。就下属对这些士

兵忠诚的质疑，白善烨说：“韩国成立不到两年，我们现在正经历巨大国难……现在并不是相互埋怨的时候。过去的一切就让它随着临津江的江水过去吧，让我们重新团结起来，为了此刻进攻敌军的首都团结一致。我一概不会追究过去的事情。”

行军途中，白善烨要求士兵日夜兼程，不少人脚上起泡，只能一瘸一拐地前进。为了振奋军队士气，白善烨在行军途中经常向着士兵们大声喊“平壤”，士兵们也大喊“平壤”。随后，这成了韩军第一师团的口号。

在平壤的边缘地带，第一师团的通讯参谋找到了人民军的通讯线路，接通了平壤总司令部的交换台，但由于没有平壤口音，担心在通话中露出破绽。于是，参谋找到了在平壤长大的指挥官白善烨。

白善烨接过电话，问道：“同志，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人民军总司令部的接线员非常焦急，甚至没有询问对方的身份，只是在慌张中说：“得赶紧撤退，我们也得活下去啊！”由此，白善烨判断，平壤已经“慌了神”，命令部队加紧进攻，喊出了“回家”的口号。

进军途中，白善烨看到了大同江，这是他和弟弟幼年时经常玩耍、知根知底的江水。白善烨脑海中浮现了自己7岁时的场景。那时，他刚刚失去父亲，母亲从平壤附近的江西郡搬到这座城市。当时，走投无路的母亲把三个孩子带到大同江大桥上，似乎要准备投江自尽。

白善烨回忆，那时13岁的姐姐对妈妈说：“树也得三年后才能生根，我们刚来平壤，不能就这样死去……让我们抱着死的决心再活一次。”于是，平壤成了他们的故乡，白善烨在这里生根，如今则希望带着军队打回故乡。面对熟悉的城市，白善烨“眼角开始发烫，心也跟着跳起来”。

终于，曾经流着泪要做先锋的白善烨终于第一个带兵进入了平壤，在回忆录里，他把这里称作“我1945年12月离开的故乡”。和他一同进入这座城市的还有美国第一军团联络官本·维泽。

按照白善烨的回忆，维泽的父亲是美国传教士，而维泽本人就生在平壤。“他用平壤话对我（白善烨）说：‘我得快点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真的想快点回去。’”

在平壤，白善烨首先来到的地方是位于万寿台的金日成办公室。他坐在金日成的椅子上，思考着整场战争的来龙去脉，思考为什么半岛陷入了那场“充满血腥味的同族相残”。

因为首先进入平壤，白善烨被李承晚亲自任命为少将，称他“挽回了（韩国）国军的名誉”。

不过，过了没多久，在中国抗美援朝部队的攻势压力下，白善烨所带领的部队以及支援他们的美军惨败。仁川登陆后，一直处于进攻态势的美韩军队随着战局的扭转开始步步后退。

可以想象，当被迫撤出平壤、再次离开大同江时，白善烨的心情是怎样的惆怅。

1951年7月，交战双方正式开始第一次和谈。北方的和谈代表中，有以南日大将为首的三名朝鲜将军，另外包括抗美援朝部队的邓华将军和解方将军；南方的和谈代表则是由四名美国将军加上白善烨共同组成。一场朝鲜半岛的战争，和谈时，南方军队竟然只有一人出席，这是白善烨的荣誉，也是他最大的可悲。



参加朝鲜停战谈判的“联合国军”和南方首席代表美国海军中将特纳•乔埃(中)、白善烨（右二）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白善烨流着眼泪向美军争取获得进军故乡平壤权力的地方——忠南道，正是朴宪永的故乡。两个希望半岛统一的人，一个离开南方家乡去北方参政，而另一个离开北方的家乡率领南方军北进。然而，两人都没有如愿，“三八线”依旧横亘在南北之间。

几十年后，已经垂垂老矣的白善烨早已不在军中服役，谈起朝鲜战争的语气也多了一些平静的色彩。但每次说起战争中带着部队离开平壤时的感受，白善烨就无法再坦然面对。“有多少眼泪来自心底？对于没能实现统一大业、从战线上撤退的军人来说，内心的伤痛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即便是现在，每当想起当时的各种情况，心里都会感觉麻麻的。”

那些未终结战争的一代

对于朝鲜半岛而言，“三八线”是停战协定规定的停火线，但却不是战争终结的信号。事实上，从严格意义上讲，1951年停战后朝鲜半岛仍处于敌对状态，南北双方的战争没有结束，统一梦想没有实现。这或许就是国际政治与民族情感之间的差别吧。

1950年战争爆发时，朴宪永50岁，白善烨30岁。5年后，朴宪永被处决，白善烨离开军队选择从政。战争改变了半岛的发展历史，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当他们怀揣统一目标投身战争时，或许从未想过无法终结自己发起的战争。

对于朴宪永来说，他背负着“间谍”的罪名死去。作为朝鲜半岛南北政府的敌人，没有人为他说话。

2004年，朴宪永的女儿、莫斯科舞蹈学校教授朴维维安娜告诉韩国《东亚日报》：“将一生献给共产主义运动的父母在朝鲜和苏联被肃清的事实不仅是我们的家族的悲哀，也是历史的一大讽刺……希望父亲也能得到正确历史评价的日期早日到来。”几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尝试分析朴宪永在朝鲜半岛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的作用，试图为战争的爆发和结局提出新解释。

对白善烨来说，他已经是一位90多岁的耄耋老人了。这名与美国名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中国人民解放军名将彭德怀、邓华共同号称

“韩战四杰”的功勋将军朝鲜战争后做过韩国驻多国的大使及内阁交通部长官等职务，后来从商。



2002年5月，81岁高龄的白善烨与美国战友世纪相聚

2002年卢武铉政府时期，韩国民间机构民族问题研究所出版《亲日人名辞典》，指责白善烨在伪满洲国军校上学时在日伪军队服役，是亲日的“韩奸”。这让告别民众关注视线的白善烨又激起不少争议。

然而，2009年，李明博政府执政期间，将白善晔推举成为韩国“名誉元帅”，称老人是韩国军队第一大将，他成为“名誉元帅”能够提高朝鲜战争参加者的自豪感和国民安全意识。2010年，韩国陆军第一师把一块纪念石碑命名为白善晔将军石碑，是韩国第一个以战争指挥官个人名字命名的纪念碑。

这种迥然不同的待遇引发不少人的思考。一些史学家认为，政府更迭，不同领导人的南北政治纲领不同，直接影响了朝鲜战争一代的评价。卢武铉政府提出对北方缓和的政策，与美国关系不睦，社会力量强调韩国民族主义有利于政府执政。而政策倾向美国的李明博政府对北方态度强硬，于是授予朝鲜战争中韩军中有号召力的将军以特殊荣誉也是有特定意图的。

战争的确从来都没有结束。哪怕战争中的那一代人已经死去或是老态龙钟，他们依旧在朝鲜半岛南北对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或许有一天，当朴宪永、白善晔或是朝鲜战争中其他半岛人心中的南北统一目标真正得以实现，关于他们的是是非非才能有一个平静的解答。

本文摘自：《朝鲜泪与梦》（链接）

睡眠：逝去的长梦

不管是长睡还是小眠，在日复一日的常态生活中，睡眠都提供给我们一段暂离工作的烦忧、日常生活的琐碎甚至无需任何记忆的时光——这便是睡眠的美妙之处。但从1500年到现在，人类的睡眠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栗月静 邸笑飞

1710年，英国作家理查德·斯梯尔在伦敦的《闲话报》上写到：他最近去拜访一位来自乡下的老朋友，他在晚上8点到的时候，这位朋友已经上床就寝。当他第二天11点到的时候，被告知他的老朋友正在吃饭。就此，斯梯尔评论说，总之，我的这个老派的朋友忠诚遵守先辈的传统，作息时间和他的祖先一样。



英国作家理查德•斯梯尔

而斯梯尔这一代，所有的欧洲精英都已经改变了，1500年到1700年之间的文化革命，不但让人们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还催生了8小时睡眠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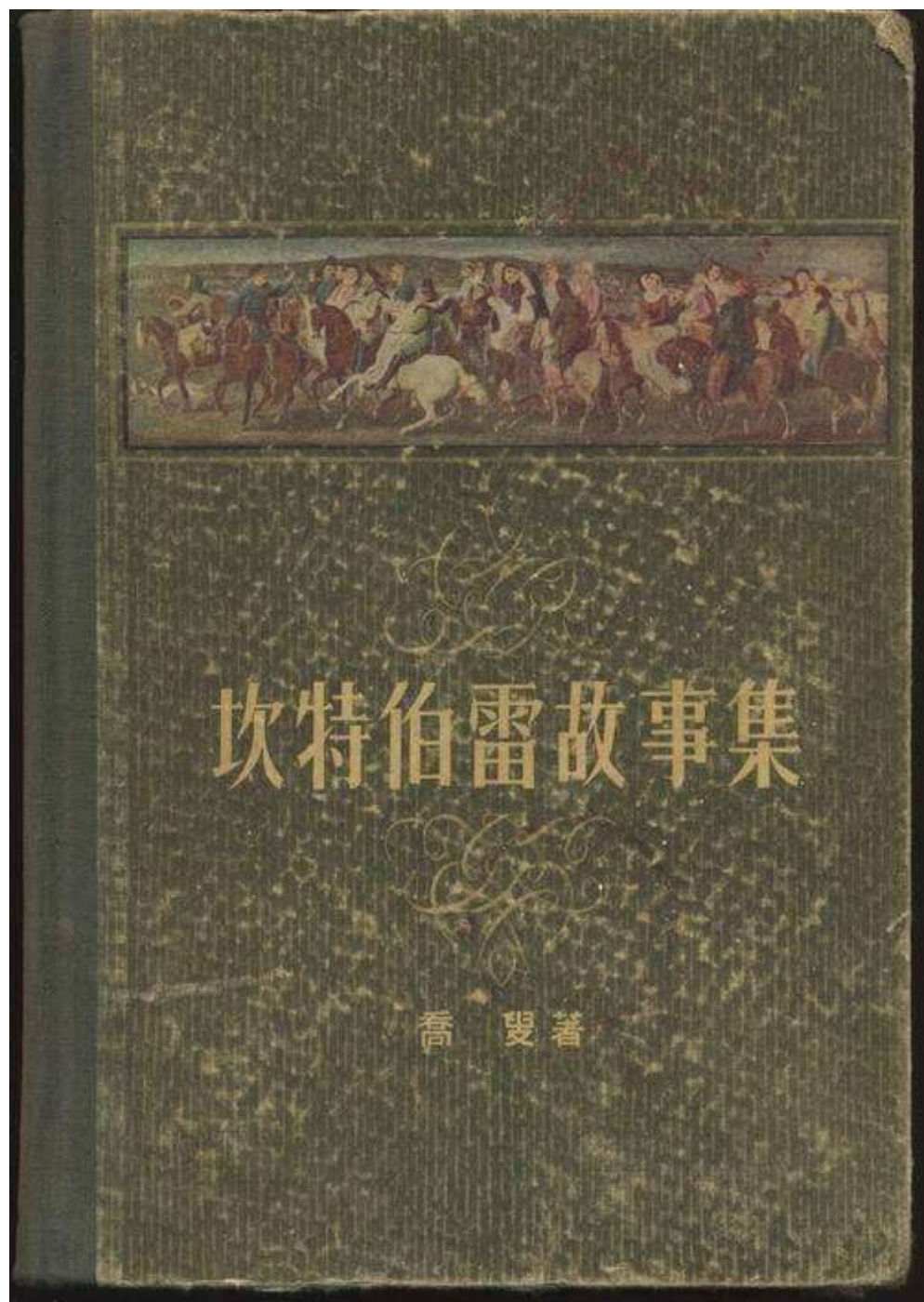
分成两段的睡眠

自有记载以来，人类就在日落后睡眠。对于工业化之前的平民生活而言，也确实没有比黑暗降临更重要的事了。黄昏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将门窗锁紧、将看家狗放出去的时候。在中世纪的许多行业中，上夜班是非法的，政府规定严禁夜晚继续工作。1375年，德国汉堡市政当局要求，在秋天“太阳变成金色”时以及冬季“夜晚到来”时，蹄铁工人必须停止工作。法国13世纪出版的一本《行业手册》严禁金匠和银匠在夜间干活，因为“夜晚的亮光无法让他们真正把活干好”。

即使对广大的穷人来说，大多数夜晚也宣告着白天的辛劳终于结束。16世纪一首民谣唱道，劳工们的回报就是“干完一天的活后，在欢乐和消遣中度过夜晚”。对有些中产阶级家庭来说，午夜前的时光用来娱乐和消遣，尤其是男人们，流行纸牌、骰子和其他赌博游戏。而更多的劳工回到家后就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几乎连吃晚饭的力气都没有，尤其是在夏季农活最繁重的乡村。漫漫黑夜留给了人们充足的睡眠时间。因此，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尔》一书中写道：“我们的生命有一半在黑暗中。”

但是从荷马时代开始，由于黑夜漫漫，睡眠时间太长，人们午夜就会习惯性醒来。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1500年之前的人们睡到半夜会爬起来一个小时候左右，然后接着睡，因此一夜被分为“第一觉”和“第二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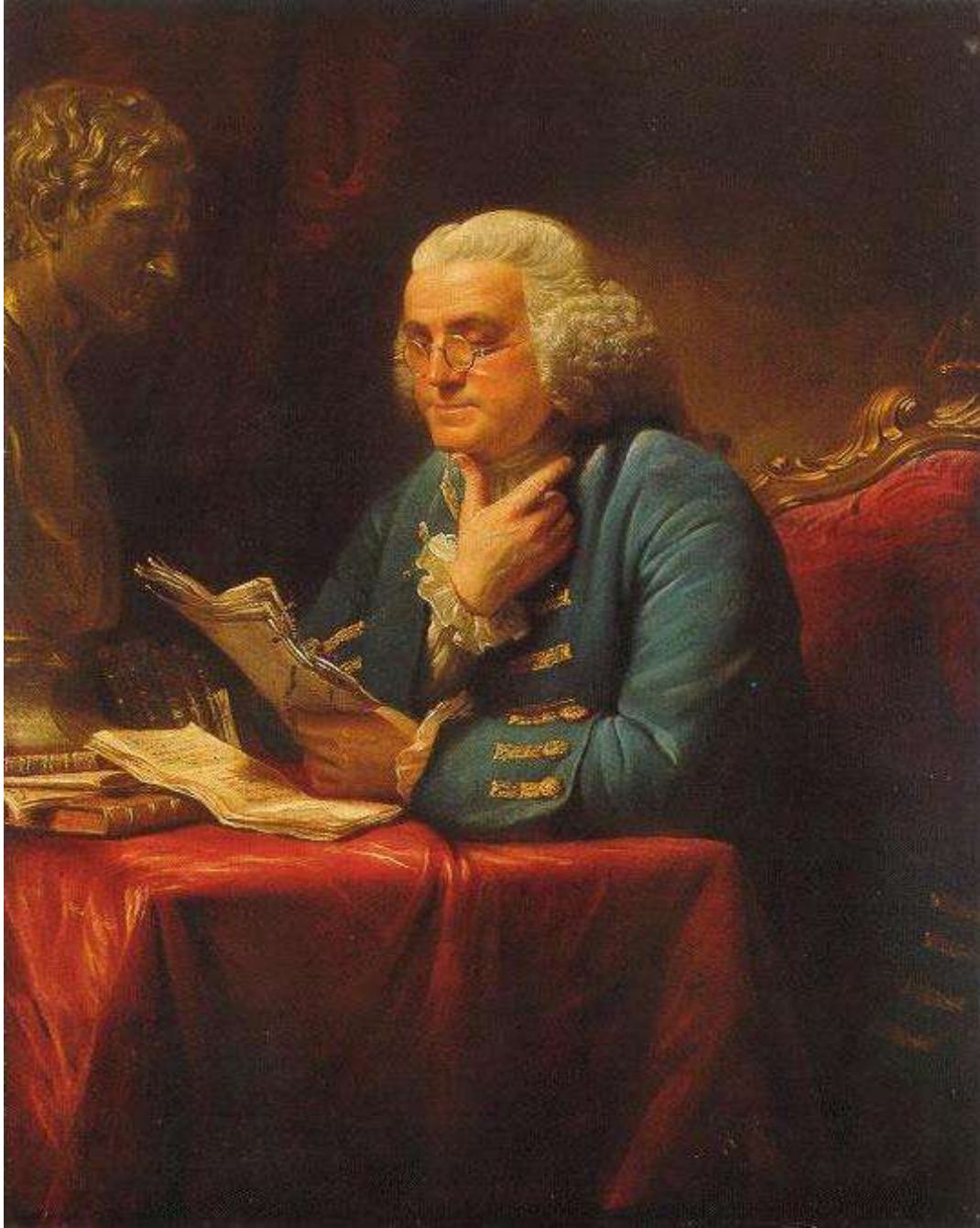
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罗杰·埃克奇注意到《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一个人物决定在“第一段睡眠”后继续睡觉。英格兰的一位医生则写到，在“第一段睡眠”和“第二段睡眠”之间的时间是学习和沉思的最好时间。



旧版《坎特伯雷故事集》

你可能会疑惑，“第一觉”和“第二觉”之间，干什么呢？在两段睡眠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人们可做的事情太多了，可以起床照顾家畜或做家务，躺在床上思考、抽烟，与同床的人闲谈或者做爱——据说这段时间

受孕的概率最大。一位16世纪的法国内科医生总结到，工人能够生出更多的孩子是因为他们等到“第一段睡眠”后才做爱。而18世纪美国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喜欢光着身子，坐在椅子上阅读，享受冷空气浴。对于很多人来说，从第一觉中醒来后最重要的是仔细思考变化多端、模糊不清的梦境。即使到了近代，梦在人们的生活中依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大众普遍认为，梦的点点滴滴都预示着未来，同时也回顾着过去。



本杰明·富兰克林

这种两段法的睡眠方式，或许是人类在没有外界刺激所拥有的本能睡眠方式。一位名叫托马斯·威尔的精神病学专家在马里兰州的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工作，他做了个实验，让被试者处在没有人工照明，没有电视或者电脑的干扰的环境中。他注意到被试者在午夜后不久醒

来，数个小时后再度入睡。这与埃克奇教授在历史文献和早期文学作品中发现的阶段性睡眠模式相同。

事实上当代许多非工业化文明地区仍保持着以前的睡眠方式。在非洲大陆的扎伊尔和博茨瓦纳的某些地方，那些半夜醒来就睡不着的人开始唱歌，或出去拉手风琴，其他人醒来后就加入其中。传统的音乐和舞蹈可能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夜生活的初露头角

在1500年，巴黎的夜晚实行宵禁，悄无声息。到了1690年，很多巴黎的咖啡馆到凌晨还没关门。在1700年，受过教育的富裕阶层，上床睡觉的时间是在凌晨三四点钟。在1500年到170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人类的睡眠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历史学者克雷格（Craig Koslofsky）在《夜晚帝国》中解释了这一变化，他认为，在1500年到1700年之间，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精英阶层把醒着的时间延长了7个小时。夜晚不再是睡眠的时间而是各种娱乐和社交表演的时刻。克雷格把这种转变称之为“对夜晚的社交和象征性使用进行了扩展”，与之相伴随的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人的夜间活动和对夜晚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并就此引发了一场文化革命，来自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大量档案和印刷品都证明了这一转变，这场变革打乱了日常生活的节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睡眠模式。



绘制于17世纪，表现伦敦咖啡馆场景的版画。



克雷格手举他的著作《夜晚帝国》。

西方仪式史上最突然的转变——从街头转向殿堂，从白天转向夜晚——出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生活方式的改变。1417年，为了让伦敦冬日漆黑的夜晚明亮起来，伦敦市长亨利·巴顿发布命令，要求在室外悬挂灯具照明。后来，他的倡议又得到了法国人的支持。16世纪初，巴黎居民住宅临街的窗户外必须安装照明灯具。路易十四时，巴黎的街道上出现了许多路灯。1667年，“太阳王”路易十四正式颁布了城市道路照明法令。室外都点起了灯，室内就更明亮了。生活空间变得更明亮，黑夜因此可以被人们利用。

随着室内照明，街道照明的改善，另一项减少人们睡眠的则是新的刺激性饮料的引入。1652年伦敦的第一家咖啡馆“罗西咖啡馆”开张，此店以“咖啡的好处”为题，印刷宣传单，是世界上第一份咖啡广告单。而茶叶最早见于英国文献是在1615年，在17世纪晚期，中国茶已经进入英国，饮茶风俗逐渐开始在英国各个阶层盛行。而原产于美洲的巧克力则也在17世纪中期流行起来——1657年，第一批著名的英国巧克力屋出现了。咖啡、茶和巧克力都是具有神经兴奋作用的食物，它们的广泛使用，让人们有更充分的精力利用被灯光照亮的夜晚。



伦敦的第一家咖啡馆“罗西咖啡馆”内饰。

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生活的增加，也使得欧洲贵族、皇室和城镇富人在夜晚发展起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在16世纪，王

室出席的主要娱乐活动是骑士比武大赛，当然是在白天举行的。到了路易十六时代，主要的娱乐活动，芭蕾、歌剧、跳舞会、化装舞会和放烟花都是在晚上举行的。1736年，一位英国作家感慨到，“照明的艺术结束了之前的黑暗时代”。



DISCUSSING THE WAR IN A PARIS CAFE.
SEE PAGE 304.

1870年9月17日，伦敦新闻画报登载的版画《谈起战争的巴黎咖啡馆》。

延迟上床入睡还改变了欧洲人的心态。夜晚仿佛一股殖民势力，大大影响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创造物——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在此，男人可以脱掉自己作为神职人员或者政府行政人员的外衣，自由交换对各种问题的看法。用18世纪一位作家的话说，凌晨两点钟的社交和智识生活就是在咖啡馆里谈论生活、行动、精神和活力。很多研究已经证明，咖啡和咖啡馆激励了反对现有陈规的精神，导致了异教徒的出现。从伦敦到巴黎，当时的各国政府也意识到了危险，试图对这一新的公共领域进行监视。

夜晚的社交和争辩促进了启蒙思想，但是却不利于另外一种思想——冥想。耶路撒冷的圣西利尔曾经问过：“有什么比夜晚更能启迪智慧呢？”夜间搅扰人心的事较少，而寂静则为自己反省创造了理想环境。“夜晚是最适合反思的时候”，法国一位作家在16世纪说道。宗教改革时期，虔诚的男女至少会花上一个小时来独自冥想，加强自我意识。因为黑夜的消退和漫长睡眠的减少，人们独处和冥想的机会大大降低了。



绘制于1567年的油画《勃鲁盖尔的长老》中可以看到睡眠中的人。

正如一位1661年的观察者所看到的，那些光彩夺目，足智多谋的自由思想家或者害怕孤独，或者是因为太爱有人陪伴，所以从来没有给自己留出独处的时间。在夜晚，人们再也不独处了，知识分子绕开了深思内省。夜晚那孤独深思驱逐白天虚华的力量永久消失了，而这正是夜晚的灵魂。

当我们从白天走进黑夜时，仍能彻夜阅读、工作或者娱乐，同时我们也习惯了更少的睡眠。根据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的资料，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人们的睡眠时间减少了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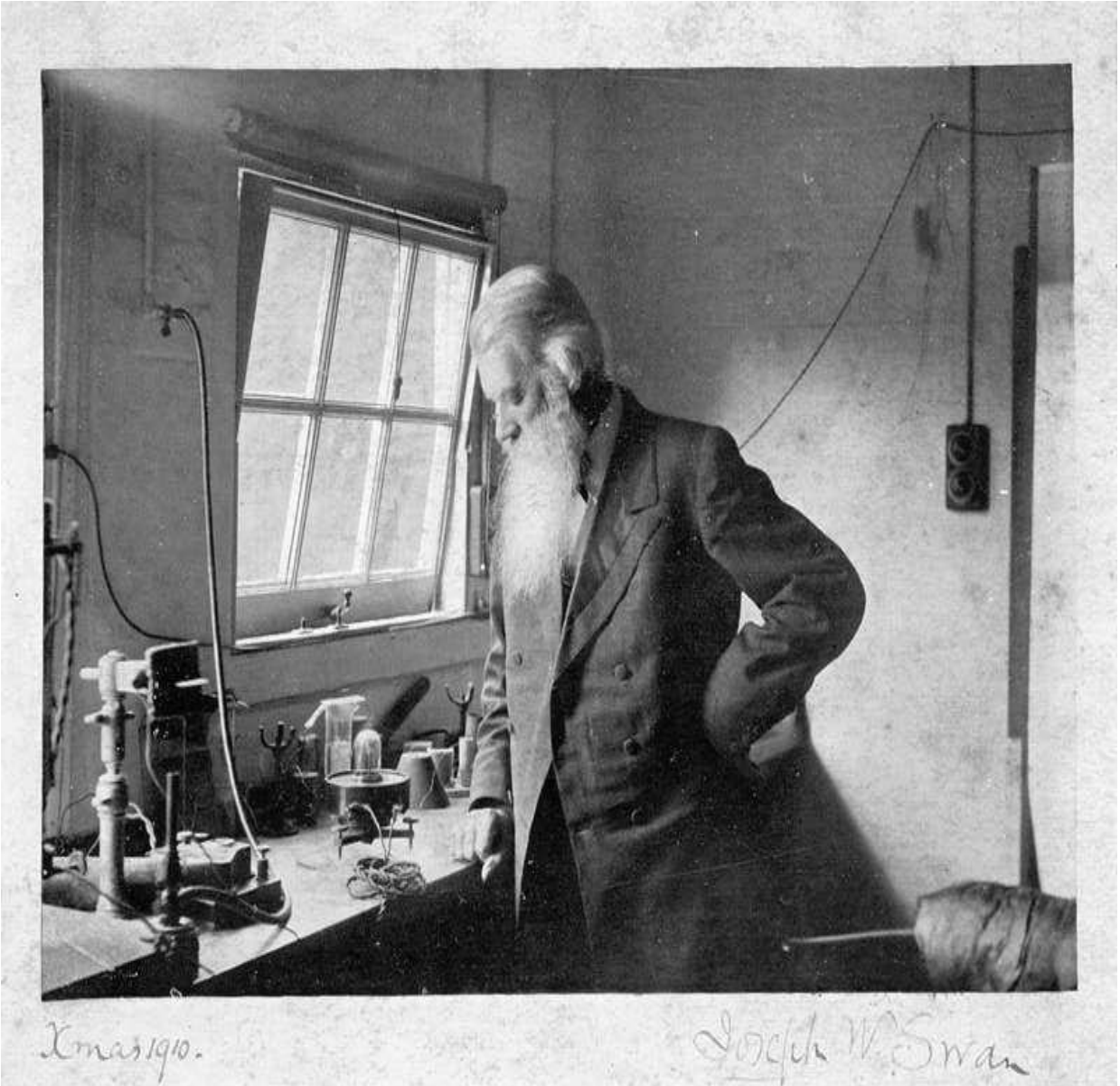
19世纪，伊斯坦布尔的咖啡厅。

8小时睡眠的诞生

1500年到1700年之间的文化革命，不但让人夜生活崭露头角，还催生了8小时睡眠观。现在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睡眠是不被打断、连为一体的，简直难以想象以前人们的睡眠方式如此不同。“其实这种传统睡眠方式是一种自我放松的简单、正常的方式。”弗吉尼亚科技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根·埃克里克说，“我们渴望的连为一体的连续睡眠是现代世

界的创造。”18世纪中叶以后，黑夜在大小城市中都经历了一场去神秘化过程。

1850年，英国人约瑟夫·威尔森·斯旺（Joseph Wilson Swan）开始研究电灯。1878年，他以真空下用碳丝通电的灯泡得到英国的专利，并开始在英国建立公司，在各家庭安装电灯。1880年，爱迪生在试验了1600种材料后，终于用碳丝做成的灯丝成功制成了世界上第一盏白炽灯，成功在实验室维持1200小时。从此人类进入用电照明时代。1909年美国科学家柯里奇发明了钨丝做灯丝，提高了白炽灯的亮度和寿命。电灯照亮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角落。太多的事情要做，太多的机会在诱惑，如同打翻的潘多拉盒子。夜猫子，黑白颠倒，失眠等等问题随着黑夜的消逝降临人间。



正在研究电灯的约瑟夫·威尔森·斯旺。

此后，给个人带来深远影响的现代“24小时”、“7天制”社会和8小时睡眠观也显露雏形。8小时工作制最早由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于1817年8月提出。1833年，在欧文的支持下，具有同情心的工厂主约翰·多赫尔蒂等人发动了一场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运动。1866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提出了“8小时工作，8小时自己支配，8小时休息”的口号，要求各国制定法律予以确认。1877年，美国工人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罢工，工人向政府提出改善劳动与生活条件，要求缩

短工时，实行8小时工作制。在强大压力下，美国国会被迫制定了8小时工作制的法律，后被其他国家纷纷效仿。



罗伯特·欧文



1900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八小时工作日”劳工运动。

明亮的夜晚，不用工作的时间，使得人们不再满足于将漫漫长夜付诸睡眠，午夜前成了消遣的时间——读书、谈天、下棋、去酒吧娱乐或者看电影，可干的事情多得是。20世纪30年代，夜场电影大大繁荣起来，因为夜场观众的增加，美国电影市场上出现了所谓的“双片制”，即在夜场电影中一次安排两部影片放映，而票价基本保持不变。这两部影片中，往往其中一部是投资巨大、制作精良的“A片”，另外一部影片则是成本低廉、水准相对粗糙的“B片”。久而久之，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A级片”和“B级片”。

电视也不甘示弱，开始抢占午夜的注意力。1954年，NBC由史蒂夫·阿伦主持的《今夜节目》开播。它开了电视节目从凌晨一直持续到

午夜的先河。ABC、CBS也不甘落后，纷纷推出精心制作的午夜栏目，比如ABC的新闻分析性节目《夜线》，CBS的新闻评论性节目《莱特曼今夜秀》。这些节目让观众在上床睡觉前最后兴奋一把。约翰尼·卡森是深夜时段著名脱口秀节目《今夜秀》（Tonight Show）的前任节目主持人。每周日的夜晚，大约有1000万至1500万的美国观众没有收看《今夜秀》节目就无法入睡。因此，评论家比尔·迈克称他为“国家情绪的调解器”，说“他每晚都重新调解我们的情绪，这样我们才能很好地入睡”。



1954年，史蒂夫·阿伦主持的《今夜节目》开播。

自2002年起，每年3月21日被确定为“世界睡眠日”，这标志着现代睡眠观念已正式树立起来。现在我们希望白天能全身心投入工作，因此要有一整块时间来睡觉，且不被打断。在我们的观念中，优质睡眠是在完全安静的黑屋子里躺下入睡，8小时后起床。《失眠：文化史的视角》一书称，从18世纪开始，我们就更看重醒着的时间，而将睡眠时间当作为清醒提供支持。我们希望睡眠能够经济有效，“我们一躺下就需要立刻入睡，以便按时起床，并立刻开始新一天的工作”。所以不论因何原因长时间睡不着时，我们都会紧张地去看闹钟，并绝望地计算：如果现在入睡，还能睡几个小时。于是失眠问题出现了。因此而催生了庞大的睡眠产业。

寻找消失的甜梦

虽然当代的人们大都可以睡在温暖舒适的床上，但是失眠症却开始困扰越来越多的人。很大程度上因为现代人的睡前习惯很多对入睡有反作用——现代人大多喜欢在睡觉之前看电视，玩电脑到深夜或者在入睡关灯前查看一下电子邮件和短信息。而据美国睡眠基金会调查显示，将近95%的人在睡觉之前有使用电子设备的习惯，三分之二的人有睡眠不足的现象。而据哈佛医学院和波士顿布莱根女子医院的查尔斯·蔡斯勒(Charles Czeisler)表示，在入睡之前接触人造光源，会导致人体产生警觉反应以及抑制褪黑素释放，而褪黑素则是一种能够促进睡眠的激素。因此，即使是静静地看一本书，都会对甜甜入睡有所影响。



查尔斯·蔡斯勒

据调查，在过去的50年里，英国人每晚的平均睡眠时间已由此前的9小时降为7小时。研究机构Vitality Show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只有19%的成年人每晚能睡上8小时，而有16%的成年人每晚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睡眠专家推荐青少年每晚睡眠时间为9小时15分钟，然而据调查，美国青少年实际上在周一到周五睡眠时间平均只有7小时26分钟。对此科学家十分担忧，他说：“比起一个世纪以前，现代孩子们的睡眠时间少了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早期的青铜雕像“爱神睡觉”。

缺少睡眠会对人们的工作、心情、家庭、驾驶习惯、性生活以及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令人感觉疲倦，记忆力下降。目前，超过

半数的英国人在工作的时候会感到非常疲倦。在30岁左右的英国女性群体当中，有59%的人“一直觉得非常疲惫”。如果睡眠不足将会损害人体正常生理机能，甚至还会导致人发胖。内分泌学专家撒拉德·塔赫利教授就称：“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每晚睡眠时间远低于7小时的人，患上肥胖症的概率非常高。”

如今打着改善睡眠旗帜的床垫、睡眠纺织品、功能家纺、枕具、健康睡眠系统等竞相上市，截至2012年9月份，我国睡眠产业的市场规模已达1200亿元。据估计，目前美国睡眠经济年产值已达200亿美元，做出贡献的包括1000多家经过认证的睡眠诊所，无数促进睡眠的处方药物、书籍和小器具等。位于明尼苏达伊甸大草原的齐亚睡眠商店是首家奢侈睡眠用品店，提供光疗法设施、禅宗闹钟、蒙巴萨皇家蚊帐以及600美元一副的防噪音干扰耳塞、16种不同充气床垫和30种各式枕头，但是似乎没有一种方法能够长久地有效，这也是睡眠产业长盛不衰的缘由。



现代人的睡眠治疗

很多科学家也想方设法为人们找回香甜的睡眠，最近很多专家提出，连续睡一整觉并不是高水平工作绩效的必要条件，比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戴维·丁格斯带领的团队研究发现，让被试者小睡仅仅24分钟就会改进他们的认知表现。而林肯大学教授西蒙·杜兰特负责的另一项研究表明，一个被试者小睡时的深睡眠时间可以预测其在工作中的表现。纽约城市大学的研究者则发现小睡的被试者比那些没有小睡的，能够更好地建立文字关系。

人们逐渐接受了连续睡眠并不是最好的睡眠方法，时不时小睡甚有益处这个观念，企业开始允许在工作场所午睡或者其他类似的小睡

时间安排。例如，谷歌就允许员工在工作时午睡，认为这将会提高工作效率。美国职业棒球联盟的几个球队也通过在赛场搭建一个让队员赛前睡觉的安静区域，来帮助队员适应长赛季的需要。

但在现代社会，夜晚越来越五光十色，充满优惠，人们也越来越无法屏蔽在夜晚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等设备，无论有再多柔软的枕头、如丝般光滑的床单、促进睡眠的咒语和安眠药品，那如中世纪之前人们的一夜长眠，恐怕是可望而不可及了。

本文摘自：《人之退化》（[链接](#)）



在这里记录中国



关注信睿微信 了解变化的中国

我们的历史 our history

叛道者

风气初开时的民国另类



新历史合作社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出品：新历史合作社
总第6期

主编：唐建光
副主编：杜兴
责任编辑：潘晶
主笔：庄秋水 杨东晓 刘永峰 毛剑杰 何书彬
图片编辑：卫超
封面设计：刘杰

市场总监：夏茉茉
品牌推广经理：石晓倩
产品经理：赵凌子
行政专员：刘美玉

唐建光 (tangjianguang@vip.sina.com)
杜兴 (duxing722@163.com)
潘晶 (racine93987@hotmail.com)
庄秋水 (zhangling0301@126.com)
杨东晓 (cnydx@163.com)
刘永峰 (13671399840@163.com)
毛剑杰 (maojianjie999@hotmail.com)
何书彬 (yurangqiao@yahoo.com.cn)
卫超 (dawei781022@126.com)
刘杰 (jieliu1998@sina.com)
夏茉茉 (cskbzhy@126.com)
石晓倩 (ziyeshiwodi@163.com)
赵凌子 (yikubaobao@163.com)
刘美玉 (422646834@qq.com)

关于我们

我们的历史 our history

“我们的历史”是新历史合作社推出的历史产品品牌。由这本数字杂志开始，您将会看到以“我们的历史”为统一品牌的网络产品、图书产品、活动产品、纪录片、电视节目，以及微信、微博等多种媒体形态呈现并传播的历史内容。

从纸张到电子，从文字到影像，从眼睛到心灵，无论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的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新历史合作社

我们关注历史，我们致力传播；我们执着真相，我们求索答案；我们回望过去，我们前瞻未来。

这是一个专注于历史记录与传播的同人平台，欢迎您的关注、参与和加入。

联系我们：

新浪微博：我们的历史-OURHISTORY

腾讯微博：我们的历史

公众微信：我们的历史

编辑部 010-57423216

产品部 010-57423217

市场部 010-57423218

传真 010-84084564

公共邮箱：ourhistory2013@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8号

目录

叛道者 风气初开时的民国另类

吴虞：时代的逆子

张竞生：一纸初开性教育

生育：种族使命与个人自由

乳房问题：束放谁做主？

余美颜：第一欲女的性与情

男女争权：盛七小姐的财产官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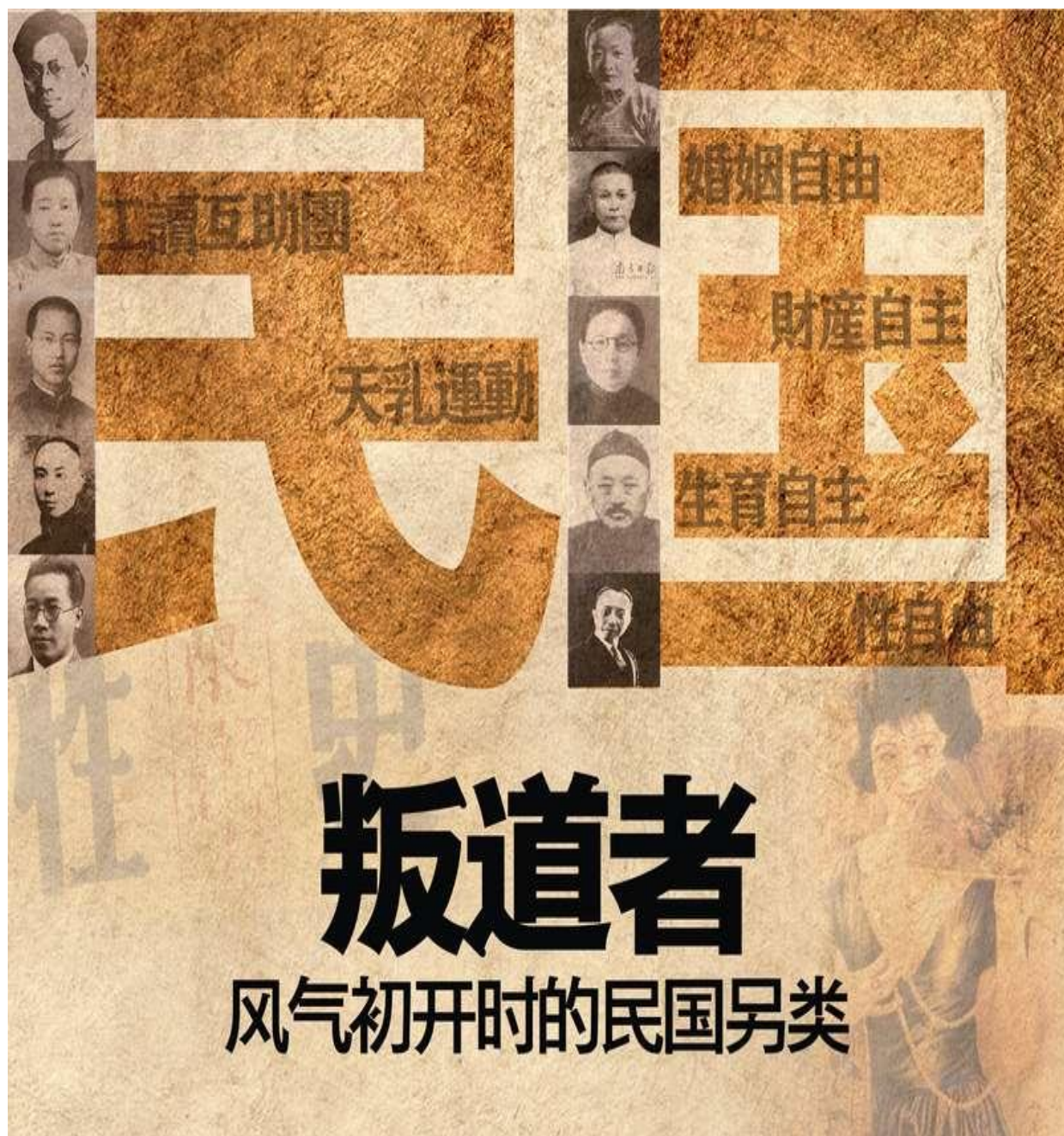
工读互助团：叛道之梦与寻路之困

叛道者 风气初开时的民国另类

1911年，在四川成都，头顶着“士林败类”、“名教罪人”的恶名，而已被教育界驱逐的吴虞，又因为发表反对儒教及家族制度的文章，再被政府通令缉拿。

那时，他慌忙逃窜，方才躲过一劫，但此后，即便是改朝换代的变革，都依然没能改变人们对于这位世俗传统的反叛者刻意的疏远与躲避，没有报纸敢刊登他的文章，更在长达八年之久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敢聘请他担任教职。

然而，与其他时代里那些孤独而寂然终老的叛逆者相比，吴虞又是幸运的，一个与他同声相和的时代，还是在他的有生之年里如潮奔涌般地到来了。



清末以来整个社会越来越多的对旧传统的反对之声，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终于汇成滚滚大潮。而被时代洪流所唤醒的万千青年，天然地便携带着激烈、叛逆的因子，毫无顾忌地去与传统决裂；同时，自由精神、个性解放的追求又在无时无刻地塑造着他们年轻的身心。于是，一个个离经叛道者便接踵而来，历史以难能一见的浩荡力量冲击着家庭、社会，冲击着陈规旧习，及一切旧传统的根基。

在绵延千年的传统里，女性一直作为附属者的角色，而承受着诸多的不公，于是，在对旧文化的造反中，女权成为最受人瞩目的内容之一。她们反叛婚姻，表达情爱，如余美颜；她们主张平等，争取遗产权利，如盛爱颐；她们又从那道德的禁锢里解放了身体，如天乳运动。在那个叛逆的时代里，一些禁忌的主题同样被揭露开来，比如研究“性学”的张竞生，又比如被视作“反动医学”的节制生育。而从旧的家庭、旧的社会里，走出来的一个个自由青年，当他们开始尝试着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时，于是又有了如“工读互助团”一般安娜琪的昙花一现。

所有这些大胆而超前的行为，虽依然不免因“伤风败俗”而受到争议，但正是这些不顾一切的冒险，方才打开了一个不拘规矩、个性放肆的时代，同时，也在一个个离经叛道者蜂拥而至的冲击下，观念的更新、时代的嬗变才得以实现。

吴虞：时代的逆子

家庭所酿就的痛苦，曾一次次绞割着吴虞的内心，他早已看到过在孝悌、礼仪这些温情脉脉的教化里对于人性的压迫，他更亲身体会过那套儒教的外衣下，制度的残忍、道德的虚伪以及生硬的伦理中所造成的罪恶。这种自身的不幸，让吴虞成了这场革命中最激进而坚定的一人，因而，他也受到了旧势力最强力的反扑。但在这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万千青年，便统统成了旧文化的离经叛道者。

文/刘永峰

1910年，成都，一场家庭官司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时赋闲在家的前富顺县教谕吴兴杰，因家产纷争迟迟未决、赡养一事亦存不满，便一纸状书将儿子吴虞起诉到官府。除状告儿子不孝之外，他还到处传说吴虞忤逆犯上殴打父亲。



吴虞晚年肖像，1905年秋，东渡日本

而紧接着，作为儿子的吴虞，则写了《家庭苦趣》一篇长文为自己辩白，并油印出来四处散发，更有好事的记者还将此文刊登到了《蜀报纪事》上，于是，吴家的一干“家丑”便尽数曝之于众。此事一出，顿时成了当时震惊成都上层社会的一场“家庭革命”，社会舆论为之哗然。

就在众口汹汹的声讨中，那个“非礼非法”的“忤逆子”吴虞，及那积累多年的父子矛盾，也完全暴露在公众的面前。

冲突

吴兴杰、吴虞父子的糟糕关系由来已久。吴虞很小的时候，他父母的关系就一直不好。吴兴杰“行有惭德”，“私交李氏孀”，并不惜破产以供其奢用，以致夫妻反目，吴虞母亲也因此忧郁而死。吴兴杰随即迎娶李寡妇入门，李氏好吃懒做，又抽大烟，“荒纵无所忌”，吴虞很看不惯，父子之间的矛盾遂日益尖锐起来。不久，吴虞被父亲驱赶回新繁老家依靠几亩薄田为生，父子从此分家，这一年吴虞才20岁。



吴虞东渡日本留影

1905年，吴虞东渡日本，留学两年，归国后发现祖辈留下来的数百亩田地已被父亲罄售无余，他不忍坐视祖业毁尽，于是由亲族主持，吴虞将大部分祖产继承过来负责管理支度，同时也把父亲迎回家赡养。然而吴兴杰依然不改旧行，“待先生夫妇极无礼，又责供糜费，稍违其意，怫然不悦”。一日，吴虞偶然失言称继母为“李寡妇”，吴兴杰又大怒，辱骂终日，此后，又连夜起草讼牒，欲以不孝的罪名起诉吴虞。家人哭劝、说情皆无济于事，吴虞便亲自去夺状子，推搡之中并将状纸撕碎。最终，吴兴杰还是将儿子告到了官府。

这个特殊的事件，正如一个时代的样本，将当时家庭制度所有的弊病都暴露无遗：婚姻不幸、父子反目，当原本的亲善与温情，无声地耗尽在束缚与冲突之中，怨恨和敌意却在最亲近的血缘里疯狂生长。

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以家族为单位的组织，稳定而坚固的家庭制度曾是传统社会里一切制度的根基和保障。但相应的，到了传统社会末期，它所有的沉疴痼疾，也都感染着其最核心的组织器官——家庭。

于是，在清末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受到现代思潮影响的人们也开始向着古老的家庭制度发起挑战。他们认为，中国由于家族思想的发达，导致了国家思想的缺乏，而秩序森严的家族制度更造成了国人的愚钝麻木、畏服顺从和无自由，于是，在更新政治、改造国家的大背景中，家庭革命就成为又一项必然的诉求。

正如1904年《江苏》第七期上一篇《家庭革命说》的文章所言：“家庭革命者何也？脱家族之羁扼而为政治上之活动是也，割家族之恋爱而求政治上快乐是也，扶家族之封蔀而开政治上之智识是也，破家族之圈限而为政治上之牺牲是也，去家族之奴隶而立政治上之法人是也，铲家族之恶果而收政治上之荣誉是也。”也就是说，要通过家庭革命而摆脱家庭的束缚、禁锢、限制和奴役，从而实现革新政治之目的，获得作为人的自由、幸福、才智和权利。

这种观念也深深影响到吴虞，维新运动后，吴虞成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并在1905年秋东渡日本，就学于早稻田大学法政专业。此后，他常将儒家的礼法制度与老庄、孟德斯鸠、甄克思、穆勒、斯宾塞、远藤隆吉诸家著作，及欧美各国律法，比较对勘，以发掘中国家庭制度的病症。

他说，在传统家庭制度所规定的秩序里，“但求君亲长上免奔亡弑夺之祸，而绝不问君亲长上所以致奔亡弑夺之故，及保卫尊重臣子卑幼人格之权”，因而是专制主义的，那么，以专制主义的家族为国家的基础，则“人民无独立之自由”。若此种家庭制度不革命，则“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所以，吴虞主张那些尊卑贵贱不平等的制度应统统废弃，父子“有互相扶助的责任”，却“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同为人类，同做人事，要承认子女自由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

围剿

家庭所酿就的痛苦，曾一次次绞割着吴虞的内心，他早已看到过在孝悌、礼仪这些温情脉脉的教化里对于人性的压迫，他更亲身体验过那套儒教的外衣下，制度的残忍、道德的虚伪以及生硬的伦理中所造成的罪恶。这种自身的不幸，让吴虞成了这场革命中最激进而坚定的一人，因而，他也受到了旧势力最有力的反扑。

吴虞的自辩，更是因为碰触了儒教社会里那自扬家丑的禁忌，而犯了众怒。那时，因屡屡发表一些非儒反孔言论而早已对吴虞不满的卫道士们，对这样离经叛道的名教罪人显然更不会放过。

那时，一位吴虞留日时候的同学，拿着他的《家庭苦趣》，找到四川教育总会会长、也是“五老七贤”之一的徐炯，“以为扬亲之过，名教罪人，不可恕”（《吴虞集》）。徐炯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会，声讨吴虞，并将其逐出教育界。随后，这位同学又约集了100多人签名，以“绝孝养”、“大逆挞父”的罪名将吴虞“诉之于官”。而吴虞撰写的《宋元学案粹语例言》一书，因为例言中引用了明代异端李贽的话，这时也被四川学政赵启霖下令查禁，不准发卖。

受到家事牵累的吴虞，似乎是出于故意的报复，在1911年又著文反对儒教及家族制度，于是，被四川咨议局纠举，呈请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予以逮捕。通缉令一下，吴虞不及携带行李，闻风而逃，跑到乡下身为哥老会首領的舅舅家前去避难。官兵于成都抓人未果，王人文于是移文各省逮捕，文中并有“就地正法”之语。

辛亥之后，满清覆灭，旧政府对吴虞的通缉也随之取消，他方又回到成都。然而，此时“诉讼成瘾”的吴兴杰又将状纸递到了新成立的军政府。军政府认为吴父多不是，裁决吴虞胜出。然而，尽管新的法律判决吴虞赢得了官司，但他却依然输给了那个时代，而且输得一干二净。

在一百多年前的成都，即便法律上的胜出，也依然不能影响那时根深蒂固的父子观念和伦理秩序。从事教育本是他体面而稳定的收入

来源，但即使到了民国时代，却依然遭受教育界的排挤打压，在长达八年里，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敢请他教书。那时，吴虞只做些写稿、判词的工作，但很快这条路也被封上了。1914年1月11日，四川《醒群报》因为吴虞之前曾在该报上“主张宗教革命、家庭革命”而被官方查禁，此后，四川的其他报纸也都不敢再刊登吴虞的文章。

甚至在不相干的民众那里，也是到处弥漫着“正义的火气”，他们写信骂吴虞及他的家人，在成都的西门旁写文章控诉他，即便后来他到了北大教书后，还依然会收到匿名骂他的信件。吴虞深切地感到社会的疏远，他在他的家乡是那么“不得人心”。

迟来的时代

在备受煎熬的岁月里，吴虞的朋友不多，即使有同情他的也少有往来，很多人都疏远着他。

而间接的，他却得以读到许多新书、写出了他一生中大部分的重要文章。一系列的不幸遭遇之后，性格偏执的吴虞，只会更加坚定了“家庭革命”的主张。他说，那些想法“虽蒙‘离经叛道’之讥，所不恤矣。”

尽管在当时吴虞大胆的思想，被当局认为“荒谬之极”而屡遭围剿，但几年以后，当他在成都华阳书报流通处偶然看到了一本叫做《新青年》的杂志后，一切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自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界里反传统的倾向，到了这时终成气候。民国建立后，乱象丛生的局面，让那些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的知识分子在失望之余，有了新的觉悟。他们意识到，以往的学习，或器物，或制度，还仅是西方形式的模仿，并未触及西方立国的根本精神。政治变革，须建立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而社会变革，又必须以心理变革为先导。因此，只有先涤荡尽旧有观念、信仰、人生观，即旧文化，才能为新文化的养育创造条件。于是，因应着时代的要求，一场

几乎是以全盘反传统为基调的新文化运动爆发了。而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正是这场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

《新青年》中那些激烈的文章令吴虞的内心如触电了一般，他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继而产生了投稿的冲动。1916年12月3日，吴虞写信给陈独秀，说自己有诸多“非儒”之作，然成都“同调至少”，报纸亦不敢刊登，希望能在《新青年》上刊发。陈独秀见信后，则如获知音，并回复说希望吴虞能将文章“全数寄赐”。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一次发表了吴虞的文章——《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而一个多月之后，远在成都的吴虞才从报纸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他激动不已，“余之非儒及攻家族制两种学说，今得播于天下，私愿甚慰矣。而随后，《新青年》又连续发表了吴虞的多篇文章，一时成为《新青年》对读者重点推荐的作者。

身七十。(魏之所謂人)方鶴(桐城人)鄧雨人(王丰塘村夫度西人)。
 華溪(貴州)者年六十餘。觀方司(看蝶影飛紅)亦樂與
 之共著。魚鼓。可知者時情景。豈尚有內怨。可言哉。至北吳其
 之詩。自有其苦。負責。不必諱。杜美序。猶之西證之文。自有西證。負
 責。不必諱。杜陳源也。若定指責者。即吳虞。我也不能辯。
 (七)我的詩集。刻在未到北平之前。倚檻之。不加刪。本無意。請何
 所用。其苦。何計。何不用。甚。假。面。具。我非。請。理。學。的。素。無。兩。廣。肉
 之。此。名。由。廣。速。則。中國人。矯。頑。戲。曲。疾。速。者。莫。汗。牛。之。文。樹。足。能。一
 一。舉。西。三。乎。若。曰。疾。速。則。果。之。王。凌。波。蔡。松。坡。之。小。居。仙。同。新。彩
 在人。耳。目。陳。獨。秀。黃。季。請。先生。之。遺。之。足。下。能。一。舉
 而。西。之。子。表。公。開。家。曰。士。名。有。志。母。官。相。強。而。必。用。者。都。是。各。不。其
 非。可。耶。
 (八)我想。打。老。子。又。想。制。奪。兒。子。的。自由。想。是。有。意。思。而。無。所
 為。的。足。下。何。以。知。我。想。從。前。集。不。疑。無。婦。翁。人。乃。言。其。撫。婦。翁。
 今。我。與。婦。翁。人。又。言。我。制。奪。兒。子。的。自由。豈。非。怪。事。此。等。事。似。未。可
 信。筆。書。寫。至。陰。謀。孔。道。果。何。所。振。而。言。
 其他。所。說。不。知。多。辯。前。乞
 記者。先生。斟酌。以。為。表。即。煩。表。表。此。後。不。再。贅。後。去。
 吳虞。毛。筆。信。札
 此。信。係。示。周。作。人。馬。叙。信。諸。先生。思。想。清。楚。者。

吳虞毛筆信札

而这时的吴虞，已不再是一个孤独的反者，在苦苦等待许多年后，他的呐喊，终于可以与时代的浪潮相互应和。当时，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针对家庭问题，或与家庭问题有直接相关的妇女、婚姻、性道德、生育限制等问题也都纷纷

发表文章，表达了“家庭革命”的思想。整个社会都对家庭问题的讨论表现出浓厚兴趣，而更有激进者提出废除婚姻、毁灭家庭的主张，对旧的家庭制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反击。

其实，遭到反对的，又何止是家庭？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一切旧的思想、制度、文化都出现了叛逆者的身影。自新文化运动一开始，新文化的倡导者们便以《新青年》为阵地，使个人主义、自由精神、个性解放成为千百万中国“新青年”信奉的人生价值。并且，他们将传统文化视为过去时代的产物，根本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因此，也更加坚定了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姿态。于是，在这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万千青年，便统统成了旧文化的离经叛道者，同时，一个不拘规矩、个性放肆的时代也来临了。

张竞生：一纸初开性教育

一本薄薄的名为《性史》的小册子被反复盗版，直至全国各大城市的大中学生人手一本，其后又被盗印、伪名仿造数十年。中国的现代性教育普及以这么一种粗暴简单的形式铺开，实在是令人猝不及防。而《性史》的编者张竞生被冠以“性欲博士”的骂名，为全中国“正人君子”所唾骂。

文/李梓

人生开局

张竞生出生于1888年2月20日，其家族是广东饶平的大家族，其父虽然不是很富，但家里三代华侨，颇有积蓄。家中人为了使他才，一路供读，1907年，他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前途一片光明。

不要小看这所“小学”，实际上是两广总督岑春煊督办的军校高等课程，学制三年，与张竞生同班的陈铭枢、陈济棠，后来都是赫赫有名的广东王。

军校学生吃饭是以班级为单位，八个人一桌定量。为了遏制抢食风，张竞生和另一位王鸾同学出面，把最能抢的八个人编在一桌。这八个人闹起来，惊动了校方，为了这个小事情，就把张竞生和王鸾开除了。

一晃眼到了1910年，张竞生进了京师大学堂。这年4月，汪精卫刺杀满清摄政王震惊全国。汪精卫入狱后，陈璧君听说他有革命信念，找人联络他，商议如何营救汪精卫。张竞生虽然有革命信念，但却没

有谋士的头脑，这个忙没有帮上，还是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挽救了汪精卫。



张竞生

此间张竞生参加了同盟会，并参与了若干暴动、示威活动。虽然之前营救汪精卫并无建树，但张竞生与汪精卫的交情还是建立了起来，汪精卫推荐张竞生为南方议和团秘书，协助南方军政府与袁世凯议和代表唐绍仪进行谈判，谈判结果就是著名的清帝退位、全面停战、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后张竞生据此写下一篇重要的历史回忆录《南北议和见闻录》。

留法博士

南北和谈结束后，孙中山接见张竞生，问他是打算进入政府做官还是从军。张竞生的回答是，希望能出洋留学。

孙中山满足了他的愿望，1912年10月，张竞生以中华民国第一批官费生资格，与宋子文、谭熙鸿、杨杏佛一起，前往法国留学。

从1912年至1919年，张竞生先后在法国、英国留学，直至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外，他在欧洲的这若干年，先后邂逅几场爱情，虽然没有修成正果，却给他留下了绮丽的回忆，欧洲对性的开放与自由，影响了他的一生。至1950年代，张竞生执笔《十年情场》，回忆了在欧洲的情与性的经历，读起来唯美而又至情至性。

正是这段难忘的经历，使张竞生注重于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育及相关社会学说的研究，对卢梭的学说和孔德的情感社会学更有兴趣，并将之笼统地称为“美的学说”。1919年4月8日，张竞生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的研究》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法国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在北大的黄金时代

1920年，张竞生学成归国，在广东呆了几个月的时间，其间干了两件“蠢事”，一件是向陈炯明提交了他归国途中写的报告，核心内容是主张避孕节育，提倡每对夫妻只生两个孩子，妻妾众多的陈炯明说他是“精神病”。第二是在当地报纸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又在学校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开设游泳课，被守旧势力取了一个绰号“卖春博士”，连在潮州的中学校长也当不下去了。

同年10月，他接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书，邀请他为哲学系教授。这对他而言无异于找到了一块圣地，“开始奏响他学术生命中短促但最华彩的乐章。”(其子张超语)



1921年，桑格夫人（中）北大演讲时，与张竞生（右一）、胡适（左一）留影

当时的北大，经蔡元培接手三年，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以及“教授治校”的制度，正是民主之风盛吹的黄金时代。张竞生从1921年至1926年，先后在北大主讲行为论、逻辑学、风俗学、孔德学说、社会主义、行为论史、逻辑学史等课程。此外，还在中法大学、北京孔德学校教授实验哲学课程。在群星闪耀的北大教授中，他与胡适是最年轻的两个教授，一度春风得意。

张竞生关于节制生育、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的主张，于整个社会来说是惊世骇俗、有伤风化伦常的言论，但在西风东渐大高等知识分

子内，却被理解为社会进步、妇女解放、生育健康的必然之路，蔡元培、胡适等人都曾为之鼓吹。

此外，他与李大钊交好，两人曾一起发动“非宗教运动大同盟”，张竞生被推举为主席，李大钊为执行委员。

爱情大辩论

张竞生在北大有个同事叫做谭熙鸿，是北大的首任生物系主任。他的妻子陈维君是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妹妹，1922年突然病逝，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陈维君的妹妹陈淑君此时准备报考北大，看到姐夫的窘况，同情怜爱之心大生，两个月后，与谭熙鸿结了婚。谁料婚后，陈淑君先前的恋人沈厚培闹上门来，被谭教授轰出去后，暗生一计，投书《晨报》，称与陈淑君早有婚约，指责谭熙鸿夺人所爱，有伤风化。

民国的特色就是吵架动辄见报，无论家事国事。陈淑君一看，也在《晨报》上发表声明，说她和这个姓沈的根本就没有婚约，称她与谭的婚姻是个人自由、双方自愿。

本来，这个事与张竞生毫无关系，但张教授此时却展现了他“学术呆”的天赋，也在《晨报》上撰文一篇，题为《爱情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从学术角度上剖析这件事情与爱情定则的验证，核心就七个字：爱情是有条件的。

张竞生列举出依附于爱情的条件共有六项内容：感情、人格、相貌、才能、名誉、财产。条件愈完全，爱情愈浓厚。并说，真正讲爱情的人，无论初交还是久婚，必须时时刻刻改善提高彼此相爱的条件，一来可以得到爱情时时进化的快感，二来可以拒绝敌手的竞争，同时，夫妻在生活上、道德上也有巨大的影响。

他同时解析欧美夫妻关系，维持在一种彼此相互勉励向上的相敬如宾，因为他们知道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是朋友关系的一种，是可以离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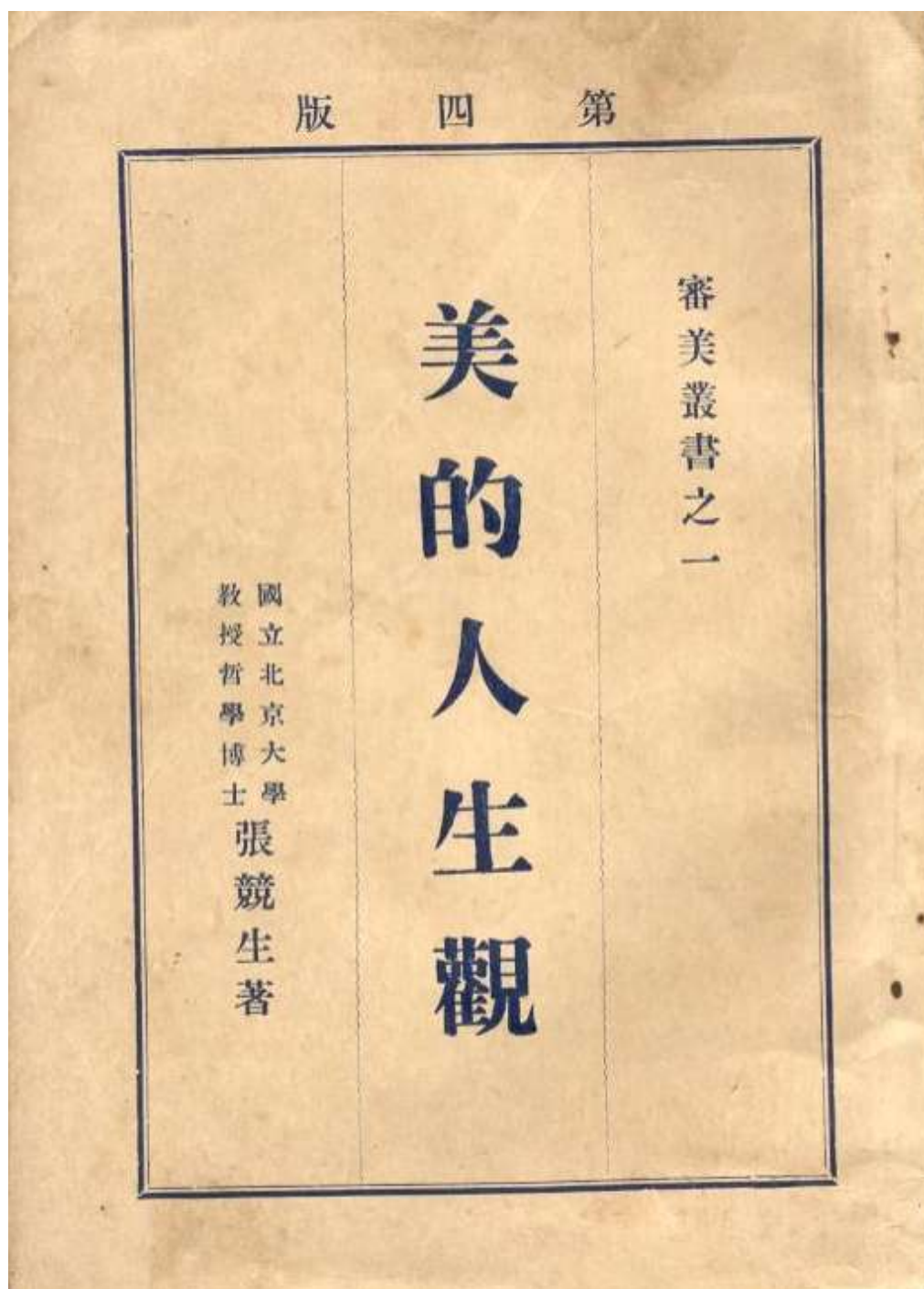
张竞生的这套理论，在女人还普遍是男人的附属物的中国社会，引发了无数人的怒火和批驳，让本来已经快平息下来的事件又进入新的风暴核心，让他的朋友谭熙鸿夫妇更加难堪，这正是他不知人情世故之处。

在报纸的刻意炒作后，此事件一直沸沸扬扬持续了三四个月，在大辩论的最后混乱阶段，连鲁迅都出来呼吁停止这场争辩，而张竞生却认认真真地准备了一篇长达四万字的公开答辩，将其若干年来对爱情的研究集大成，作为此事件的结束。

中国第一次性调查

关于爱情有条件的大辩论，只是张竞生学术主张中的一项，亦只是他的学术主张引起风波中的一小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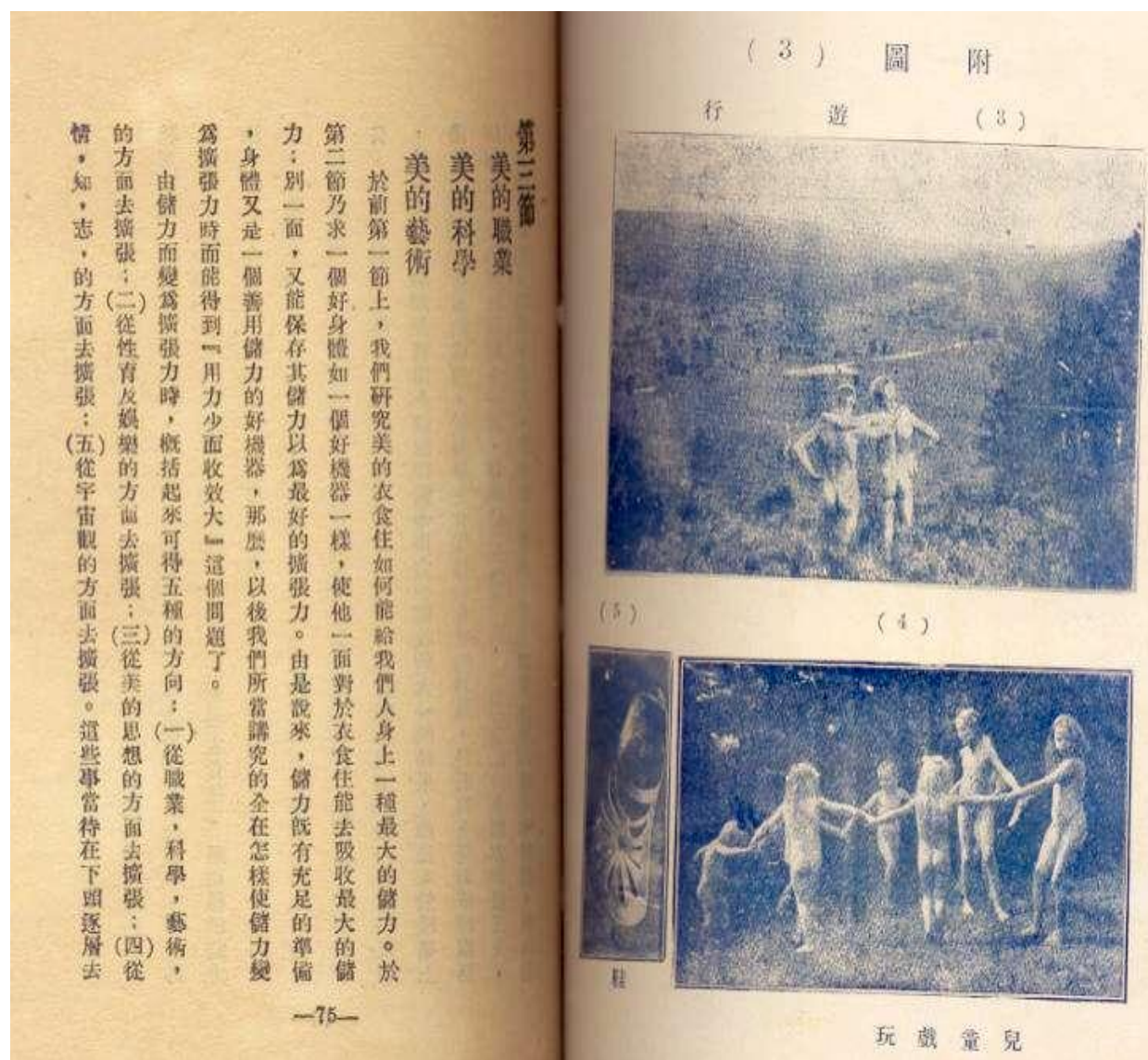
1925年张竞生出版了《美的人生观》，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主张学习美国的经济组织法和日本的军国民组织法，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臻于富裕之境”，“进为强盛之邦”。《美的人生观》先是作为北大教材印行，1925年发行全国，多次再版，成为畅销书。张竞生受此鼓舞，又出版《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并于1925年冬天进行了中国第一次性史调查。



民国十五年（1916年）版《美的人生观》封面

张竞生时任“北大风俗调查会”的主任委员，在拟定要调查的30多项社会现象中，其中就有性史一项。此时，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士出版了六大本性心理丛书，让张竞生心生羡慕。在法国留学的岁月里，

张竞生习惯了性的解放与自由，反观中国在礼教下的束缚，张竞生有意去触碰这个禁区，以启迪民智，提高中国的婚姻质量。



《美的人生观》内页

在此背景下，由他设计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性史调查开始了。张竞生在问卷中提到的问题，涉及私人性生活的种种：你从几岁知晓两性的分别？几岁春情发生？初次的情况如何？之后又怎样？对于异性的心理，兴趣厚薄，等等。最后是“事情当求真实，不可杜撰，因为这是性学研究”。

征文发出后，得到全国各地回稿300余篇。张竞生从稿件中挑选出七篇，作者均为当时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认为其内容坦诚可信，又在每篇后辅助点评，介绍眼前心得，解答作者的疑惑，一并收录在册。不久，这本小册子取名《性史》，以《性教育丛书第一集》的形式出版。印数只有1000册。

按照张竞生的计划，以后还要继续调查研究以及编印续集。

疯卖全国

而此书引起的轰动，着实出乎意料。据林语堂杂文载：“出版之初，光华局的两个伙计，专事顾客购买《性史》，收钱、找钱、包书，忙个不停。第一二日，日销千本。书局铺面不大，挤满了人，马路上看热闹的人尤多。租界巡捕用皮管灌水冲散人群，以维持交通。”



《性史》书封

《性史》一出，全国各地盗版成风。据1926年8月3日《民国日报》载，光在广州已经售出五千余本，书店更向上海订购了五千本。报道中说：“书尚未到，已为各校学生定尽。以城北及城东两女小学生

为最多。自从看了性欲博士的《性史》后，一班青年男女，弄得好像饮了狂药一般。”

张竞生从此这“性欲博士”的帽子，就摘不下来了。

《性史》的泛滥，给书商看到了一条赚钱的康庄大道，除盗版本体外，邀人捉刀写续集，或者出版类似题材书籍，充盈于市。单几大城市统计，《性史》就卖了数十万本，而真正由张竞生出版的，只有那区区一千本，且稿费只有200元，已经分给了七个作者。冒名盗版给张竞生带来了数不尽的名誉灾难，让他在全国名声扫地。以1926年为界限，之前的张竞生一直是意气风发的年代，此后就是落入万丈深渊，深受无处不在的讨伐。

如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性史》的流行实可称为中国现代性教育普及的开端，对于受到现代科学启蒙的新一代，以一种新的科普形式取代《西厢》、《红楼》等文学作品，成为枕边书，是一种必然要发生的流行。而这一幕竟然以这么一种粗暴简单的形式铺开，实在是令人猝不及防，其引发的社会反应，此时全堆积到一个人身上，《性史》的编者张竞生被冠以“性欲博士”的骂名，为全中国“正人君子”所唾骂。

张伯苓告查《性史》

在《性史》泛滥之时，天津大、中学校的学生，几乎到了人手一册的场面。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发现其对学生影响极大，遂召开全校大会，亲向学生训话，宣布凡发现读《性史》的，要给予记大过或斥退的处分。此后又一纸公文告到京津警察厅，要求查禁《性史》、《情书一束》等五种“淫书”。此后，学校又组织突击搜查，凡学生藏书中有“爱”字样的可疑书籍，一律收走。

张伯苓是天津南开的奠基人，著名的教育家，以他发出如此过激的行为，可知《性史》一书，确实对青年学生教育形成了冲击。此后

的泛滥虽非张竞生所为，但这股风潮的源头却在他这里，张竞生实则难以言清。

为平息是非，张竞生通知书店，除最初的1000册外，不可再印，又废除了出版第二集的计划。然后，此后的数十年，中国乃至海外的地摊上，仍然处处可见《性史》第n集。张竞生的儿子张超说：“1980年，我在海外的一家书店里竟然看到了《性史》第十八集，有朋友告诉我，他在海外的书店里，还看到了《性史》第二十三集。”

在《性史》风波后，张竞生反省其原因有二：

其一，《性史》虽然是效仿蔼理士的专著，但蔼理士的书是将严肃的讨论作为正文，而将个人性史作为附属参考资料。而 he 自己在编辑《性史》一书时，有失重心，对科学方法的结论不足。

其二，《性史》的作者皆为实录，普遍有“小说式”的毛病，尤其是第一篇小江平的《初次的性变》，有违道德伦理，描述极为露骨，“不免涉入淫书的一类了”。

张竞生沮丧地写道：“性学博士”的花名与“大淫虫”的咒骂，是无法避免的了。但他毕竟是学哲学的，善于自我排解：“哲学家应有他的态度，就是对不应得的名誉与毁谤，都不必去关心，但自痛改过与竭力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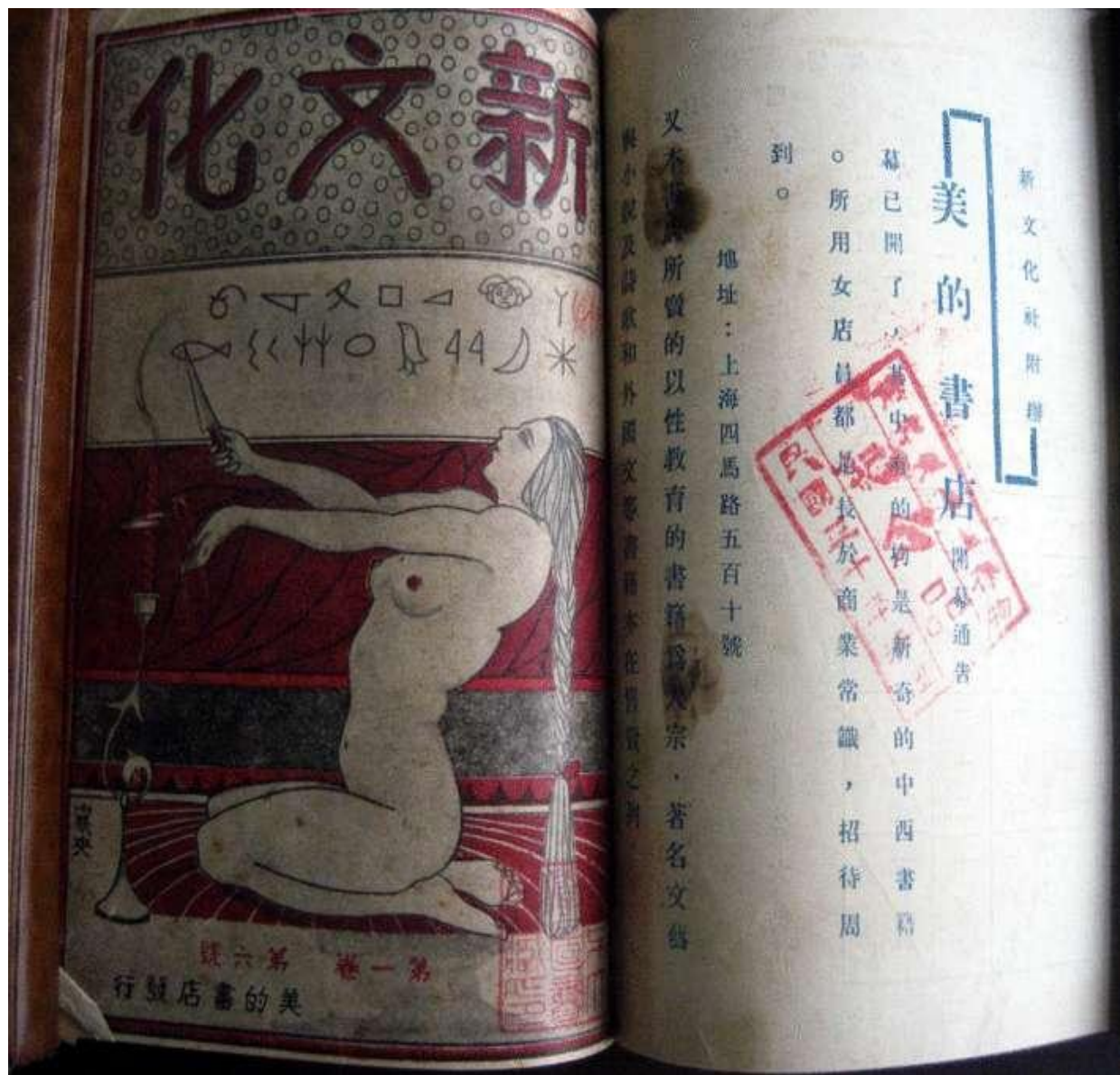
张竞生是大有学问的智者，凡智者内心坚持，不容易为外物左右。这也就是人们说的“天真”、“不懂人情世故”，或称为“骑士风范”。

日本于20世纪30年代将之翻译出版，冠之以“中国第一本真正的性史”的赞誉。

南下上海

1926年，受《性史》事件的影响，张竞生在北京的日子极难熬。加之张作霖攻入北京，蔡元培去职，北大也不再是桃源。当时张继在上海筹备上海艺术大学，邀请他南下。到上海后不久，上海艺术大学却因经费不济停办。

此后，张竞生于1927年创办《新文化》月刊和美的书店，继续创造平台，宣扬其“美的主张”。



1926年，张竞生创办的《新文化》月刊

《新文化》创刊号即抛出对“妇女继承权”的讨论并发动赞成者签名。内页中有一篇张竞生自己写的小文，是反对处女膜崇拜的，此文直接导致该书被洋人巡警冠以“淫书”查处罚款。此后办了七期，《新文化》月刊便被停刊。

同时，张竞生还由同乡投资，创办了美的书店，他结合欧美书店特色，整个书店布置优雅脱俗，在书店二楼设计了一间咖啡屋，并提供各种报纸供读者阅览。此外，他还雇佣了一批年轻女店员，这对清一色的男性店员的时代来说，冲击力实在太大了。

据说，书店开张那一日，人山人海，店内书籍被购一空，来这的人小半是冲着女店员来的，多半则是专程来一睹“性学博士”的庐山真面目。

当时在暨南大学念书的温梓川说起对张竞生的印象：“我们在那里等了不久工夫，张竞生果然从外面进来了，他的个子并不昂长，只是很壮硕，跑路也是雄赳赳的，有点像欧洲人那种高视阔步的神气。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红光满面，神采斐然。……我们告诉他，我们很喜欢读他主编的《新文化》月刊，他点点头。我还问他，他编的《性史二集》、《性艺》等书，为什么不在美的书店出版。他告诉我们，那些多是一些下流胚子冒用他的名字乱搞的东西，并不是他编的。说着还慨叹他的著述想不到会得到这样相反的影响。”

禁止与流行

美的书店生意红火，让张竞生心情愉快，并于1928年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翻译外国图书计划，计划每5年翻译一批图书，逐步销售，取得利润并再翻译下一批图书。为此，他号召国内文化界普遍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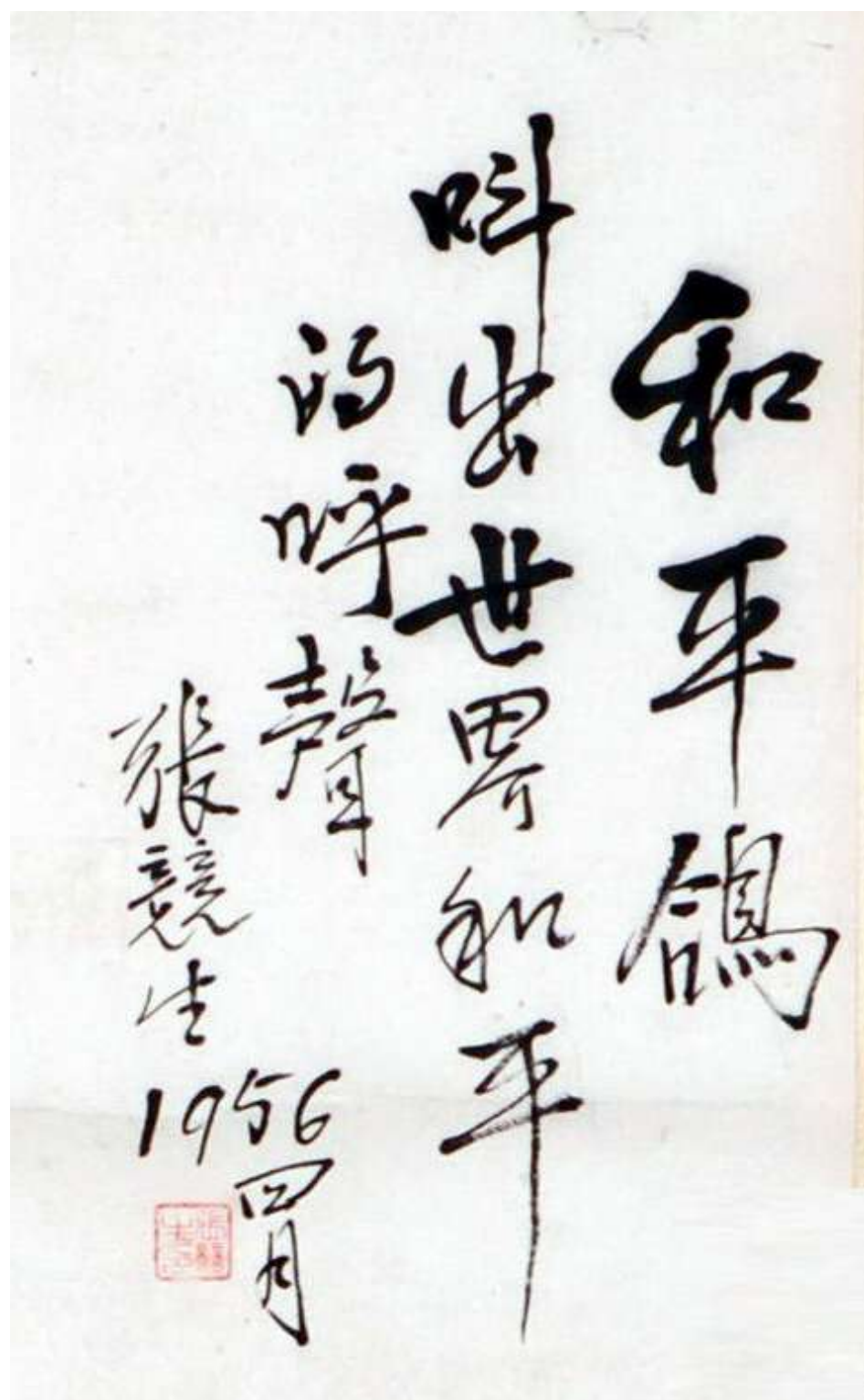
计划未曾施展，他与美的书店就被人告上法庭，理由是销售淫书，而被指为淫书的，是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士一套被翻译为中文的

学术丛书。美的书店，前后遭遇起诉五六次，每次都由租界的外国检察官审理罚款。

温梓川说：“张竞生开办的美的书店，生意虽旺，但是官司却打了十多次。每次开庭，报纸上总是连篇累牍地大事渲染，张竞生的名气能够那么响亮，那么家喻户晓，这未尝不是一个原因。”

从1926年至1928年，张竞生以一种非正面的形象，反复被媒体恶炒，而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则一直被反复盗版，发行远至海外。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张博士名声扫地，但同时也以一种令人惊讶的速度，为国人打开了性教育这扇门。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和影响，加于一人之身，而张竞生却硬扛了过去，实是硬汉骑士。

此后同业搅乱，上海邮局又停办书店邮寄业务，几经折腾，书店只好关门。但他雇佣女店员的创举却为上海商界所效仿，渐成风气。



张竞生题字

笔战攻伐

《性史》风波后，在上海，张竞生与周氏兄弟交恶，双方相互攻伐。鲁迅（周树人）专门攻击过美的书店雇佣年轻女店员的事，“店内尽是脸白貌美的店员”。另外一篇则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要到二十五世纪。”

鲁迅先生没有见到台湾槟榔女郎的盛况，不然也不会这么尖刻。而且，上海的商店从此也逐步地开始雇佣女店员。而那个二十五世纪的预言，则是大大失策，如今才21世纪，可谁还看《性史》这么老旧保守的书，性学教授都直接上电视大谈其谈，其尺度和底线早掉到海沟里了。

知识界对张竞生的态度，以周建人为典型，《性史》出版前，周建人屡次挺身为张竞生维护，而《性史》风波逐步席卷全国，成为全国“正人君子”一统的唾骂对象后，周建人也逐步地认为张竞生过火，在主办刊物上对张竞生的人品、私事等进行贬低，着意进行打压。

民国时候，知识界相互打嘴仗，直至掀别人的家底，无限夸大别人的短处，相互如泼妇骂街般无理智地谩骂，实是风气。周建人掀张竞生的家底，实是掀到了他的痛处，因此时他正在面临家庭破散的风暴。张竞生破天荒也着文痛骂周建人媚日，在家穿日服讲日文娶日本老婆等等。骂完之后，张竞生回顾之时颇为后悔，觉得自己当时心智迷失。

1928年，发生了另一件事，是张竞生在书店关张后，一家三口去杭州散心，让前北大同事、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蒋梦麟知道了，大发官威，着令警察把他逮起来要审判。原因是蒋梦麟认为张竞生给北大抹黑：“我们以前在北大请他当教授，是请他教哲学的，他竟这样捣乱，所以非惩治他不可。”后经张继保释，才将其放出。

读者或不明白，同为北大教授，为何蒋梦麟如此不待见张竞生，作为留美博士，蒋梦麟在蔡元培时代，就实际参与校务管理，有隐形校长之称。此事发生一年后，他又将北上担任北大校长，收拾蔡元培

离任后的乱象。他任校长，又没有蔡元培的威望，故改变了教授治校的方针，改为校长治校。蒋梦麟重实务而不重自由，实是有官威。而此事，也可见张竞生处境之恶劣。

归隐故乡 鞠耕田园

受此牢狱之惊后，张竞生决心回广东。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是他在黄埔小学时候的同班同学。陈铭枢知道老同学的困境，资助他去欧洲散了几年的心。张竞生在此间，翻译了卢梭的《忏悔录》、《歌德自传》等书。



张竞生故居内的雕塑

1933年，他再次回国，此时主持广东政府的是他在黄埔小学的另一位老同学陈济棠。陈济棠邀请他到省府任职，张竞生不想当官，只想选择基层农村做经济实验，陈济棠遂给他挂了一个空职：广东省政府实业督办。

此时张竞生婚姻破裂，身败名裂，形单影只，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给他介绍黄冠南为妻子。人到中年的他突然找到了家庭的安宁，他的这段婚姻甚为和谐，一连生了五个孩子。有朋友讽刺他在中国首倡节

育，自己却未能身体力行，他也不以为意。他的儿子张超回忆其父说：“天真率性，整日为饶平地方经济发展跑来跑去”，又说“私生活严谨认真，完全不像某些人想象那样”。

从1933年起，张竞生专注于乡村经济试验，人称北梁南张。他在家乡饶平修公路整农务，让家乡人着实感谢和尊敬。作为饶平数十年唯一的一个博士，当地人不称他的姓，而只称博士。当时也有人邀请他主持教育事业，但每次都因为他主张男女同校等西式教育而夭折。直至1970年去世，他再也没离开过广东。

回顾其一生，张竞生说：“凡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

立志要一辈子叛逆的李敖，在大学时代读了张竞生的《十年情场》，遂立大志要做张竞生第二，还要写一部《中国性史》。

生育：种族使命与个人自由

“制育方法,多普及一人,即灭此一人之种,多普及一家,即灭此一家之种,若真普及于全国,恐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自由生育与节制生育的主张者,都把生育问题上升到种族存亡高度,而个人是否应当有生育的自主呢?

文/黄加佳

1936年4月,北平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杨崇瑞得知美国节育活动家桑格夫人与英国节育活动家马丁夫人将来华讲学,非常兴奋。桑格夫人是世界节育运动的先驱。1922年,她就曾来华访问。那一次,桑格夫人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的关于节制生育的演讲,引起了中国知识界极大反响。此后,节育运动开始在中国萌芽。杨崇瑞希望桑格夫人的来访,能再次掀起一个宣传节育的高潮。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桑格夫人因病未能来到北平。4月21日,只有马丁夫人一人乘火车来到北平。



杨崇瑞

然而,北平舆论界对马丁夫人的来访,表现得并不友好。次日,北平《世界日报》刊文写道:“有外国反动医学人士来华,拟宣传所谓的节制生育。国人则有一奇装异服的中年妇女前往迎接。居心叵测,须加注意……”那个所谓的“奇装异服的中年妇女”指的就是杨崇瑞。其

实，当天杨崇瑞身着寻常旗袍，发髻盘于头上，并无丝毫“奇装异服”可言。可见，大众对节制生育抱有多么深刻的成见。虽然，节育运动已经在中国进行了二十多年，但仍被大多数中国人视为一件离经叛道的事。

第一个捅破窗户纸的人

1922年7月11日至14日，第五次国际生育节制大会将在英国伦敦召开。当年2月，桑格夫人便从美国出发，她想在会前前往日本和中国这两个东方国家，宣传一下节制生育的理念。



1916年，桑格夫人留影

不过，桑格夫人在日本遭到很大抵制，日本政府甚至一度禁止让她上岸。与日本的抵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知识界对桑格夫人和她宣传的理论，抱以极高的热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不但邀请桑格夫人到北大做报告，还委托大名鼎鼎的胡适为她做翻译。蔡元培在演讲启事中写道：“无限制的生育，使人口之增加超过教养能力，小之可致一身一家之贫窶，大之实为世界文化与和平之一大危机。”可见，当时知识界已经把“节制生育”提高到关乎民族兴亡、世界和平的高度来讨论。

4月19日演讲当天，北大三院“听讲的人满坑满谷，四壁有站着的，窗口上有爬着的，甚至把北大三院的窗户桌几都要给挤坏了”。当天，桑格夫人演讲的题目是《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她不但历数了人口增长过快对人类社会的威胁，还大篇幅介绍了具体的节育方法。

在公开场合大谈“性”事，在中国是闻所未闻之事。因此，这次演讲所造成的轰动效应也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当时正在北大读书的陈东原，后来在他撰写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中写道：“当时听讲的十分拥挤，讲稿传出后，更是轰动一时，认为是甘霖玉露的也有，认为是奇谈趣语的也有。但是中国社会弥漫的‘性’的玄秘空气，总算她第一个出来打破的。中国从前何尝有人把‘性交’的事拿在大庭广众中演讲的哩？她这一次的演讲，除了生育节制的种子外，还创始了一种好的态度，给中国人知道‘性’的事情原来还是值得用科学方法去探讨的啊！”

桑格夫人的演讲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1922年6月，《妇女杂志》展开了关于节制生育的大讨论，《家庭研究》杂志还特地开辟了《产儿限制号》。“节育”一时成为北京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此前因提倡生育限制法，而大受社会咒骂的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不无感慨地说：“我的学理比桑格夫人的高深得多。但我被侮辱，伊享盛名，所以不同的缘故，因为伊是美国的女子，我是中国的男人！”

虽然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在“多子多福”观念流传了千年的中国，桑格夫人的节育理论还是引起了不少攻击。当时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把节制生育与猥亵联系在一起，认为性和生育问题是不宜在公开场合

谈论的。因此《申报》在介绍桑格夫人演讲的内容后,不得不郑重声明:“夫人演辞,读者幸勿以猥褻视之,请转其眼光于社会的价值可矣。”



桑格夫人曾多次被捕，但仍然对节育运动热情不减

有的人认为生育是自然法则，“用人为的方法节制生育，便是背叛自然的罪人”。他们认为男女结合的唯一目的就是生育子女，除此之外纵欲过度就是禽兽之行。有人担心，“如果避孕方法可以使人知道，不是男女苟合的事情要增多么？”要是人人都懂得避孕，那么处女、寡妇都可以任意妄为，无所忌惮了。还有人把节制生育上升到民族存亡的高度，认为“桑格夫人之制育方法，多普及一人，即灭此一人之种，多普及一家，即灭此一家之种，若真普及于全国，恐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这些言论今天看来都不值一驳，但在当时却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想法。

中国传统的生育观是建立在传统家族制基础上的。人们认为人丁兴旺既能延续香火，又能扩充家族的势力。极度依赖劳动力的农业社会，家中男性劳动力的多寡关系到家庭的经济状况。正所谓“门前车马非为贵，家有儿孙不算穷”。然而，不得不正视的是中国民间自古便有“避孕”、“堕胎”、“溺婴”等现象。道光年间的《蒲圻县志》曾引用苏东坡的记载：“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鰥夫。”极度贫困的中国老百姓，不得不用如此残酷的方式来减轻家庭负担。

从培训接生婆开始

桑格夫人第一次访华时，杨崇瑞正在协和医学院进修。

杨崇瑞出身书香门第。虽然是个女孩子，但13岁父亲就把她送入北京有名的贝满女中读书。贝满女中毕业后，杨崇瑞考入协和女子医科大学。1917年，她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22年，在山东和天津工作几年后，她又回到协和医学院进修。此时，她才开始把自己的专业确定为妇产科。为什么会走到助产事业上来？杨崇瑞在自传中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我是一个女人。”在工作中，她见证了太多女人因生产而丧命。



1921年底，杨崇瑞与妇婴学院学生合影

100年前，中国产妇面临何等野蛮的接生方式是今人难以想象的。20世纪初，一度在福建福清县工作的英国医生波尔特，在他撰写的医学报告里，这样描述中国产妇在家分娩的恐怖景象：产妇坐在床边，丈夫坐在身后支持产妇身体，接生婆在产妇前面忙碌；为了给婴儿“开路”。这些缺乏医学知识的接生婆会用长指甲抓破孕妇的会阴、阴道甚至宫颈。无情的抓挠，常常给产妇留下无法治愈的伤害，甚至带来名为产褥热的夺命产后症。在高烧、寒战和下腹部疼痛中，产妇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最后丢下宝宝，撒手人间。

杨崇瑞曾接到遵化县一位农民来信，说他们乡下很多刚生下来的小孩都因“四六风”而死。他的两个孩子都是这样死的。这次，他妻子在月子里也得月子病死了。他求医院大夫能去救救大人和孩子！收到信后，杨崇瑞赶紧组织人手，携带器械赶往遵化县。那一次，她深入遵化、三河、玉田等县的乡村进行调查。

经过生化实验，杨崇瑞发现，新生儿“四六风”死亡是由于破伤风杆菌传染而引起的；产妇的月子病则是在接生时，接生婆毫无卫生意

识，致使感染病毒所致。据杨崇瑞统计，当时北平郊区和河北省农村的新生儿破伤风的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二百；产妇的产褥热死亡率高达千分之四十左右。再加上儿童因麻疹感染肺炎死亡的，就更多了。以至于，当时农村有句俗话：“只见娘肚大，不见儿走路。”

20世纪20-30年代的北平，还很少有产妇到医院去分娩。当时，无论贫富，产妇生产几乎全部依靠接生婆。封建时代，属“三姑六婆”之一的接生婆，被社会大众视为“贱业”。充当接生婆的，往往是一些没文化的中老年妇女。别说医学常识，就连起码的卫生都难以保证。

杨崇瑞认为，尽快改变中国产妇的境遇要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是组织人力将北平市挂牌开业的360多名旧式接生婆，分期分批加以轮训；其二是兴办助产学校。

1929年11月，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在灯市口的临时校址成立。当时学校定名为“教育部、卫生部合组助产教育委员会附设第一助产学校”，后又改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由教育部、卫生部联合聘任妇产科专家杨崇瑞博士为校长，主持校务。



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学生自治会合影

建校之初，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英国人马士敦主张，招收一些小学文化程度的女子，训练两到六个月，让她们尽快去城乡各处代替接生婆。但杨崇瑞认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接生婆是下九流的营生，如果招收一批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给她们短期培训，她们很容易就会放

弃这个职业。从职业发展的角度着眼，杨崇瑞觉得应该招收一批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并给予她们比较系统的培训。这样她们能在社会上立稳脚跟，打稳职业方面的基础。因此，第一助产学校学制三年，学生除学习妇科、产科、儿科、公共卫生等相关专业外，还开设了社会学、心理学和医院管理等课程。

为了扩大学校规模，杨崇瑞购买了交道口南大街84号的“蓉玲公主府”和麒麟碑胡同六号的民房，并在麒麟碑胡同兴建一栋三层楼房。据说，这里曾是明嘉靖年间大将仇鸾的府第。因为府门前立着一块雕着汉白玉麒麟的影壁，所以得名麒麟碑胡同。老北京有“麒麟送子”的传说，因此自明代起，这里就是北京产婆的聚集地，就连给皇家接生的产婆也住在附近。杨崇瑞选择在麒麟碑胡同旁边开办妇产医院，可谓用心良苦。1931年8月竣工后，这里成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和附属产院的新址，即现在的北京东四妇产医院。



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门

在开设新式助产学校的同时，杨崇瑞开始着手对北平挂牌营业的360名接生婆，分期分批进行培训。据说，杨崇瑞的接生婆学生们，平均年龄高达54岁，其中还有给末代皇帝溥仪接生的产婆。

杨崇瑞对接生婆们的培训，包括接生时要用肥皂洗手、剪指甲，接生的每个环节怎样消毒，如何处理分娩时的危机情况，如何结扎脐

带防止新生儿破伤风等。今天看来，这些培训内容非常基础，不过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当年接生婆们的水平之低。

节制生育咨询部

在杨崇瑞的努力下，一批批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助产士走出校门。“去医院生孩子”的观念也渐渐深入人心。但令杨崇瑞倍感无力的是，虽然卫生和现代医学观念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接受，但临床中孕产妇的各种病症不但没有减少，还有加重的趋势。杨崇瑞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多产”。

杨崇瑞曾经做过一项专门统计，育龄妇女中已生育四至五胎的占绝大多数，有人甚至生过15胎。产妇中年龄最大的达54岁，最小的只有15岁。反复怀孕、生产造成许多女性患有子宫脱垂等病症。出生的孩子中至少有一半是不受欢迎的，许多孩子死于照顾不当、虐待，甚至溺婴。据杨崇瑞统计，中国每年有1100万至150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310万至472万个婴儿，这个比例大大超过西方国家。

1930年2月，在杨崇瑞、燕京大学司徒（Maxwen Stewart）教授、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等人的倡导下，北平妇婴保健会成立。该会成立初期规模很小，不太被社会关注，甚至一度因各种原因而停办数月。直到1932年清华大学陈达、燕京大学雷洁琼等人加入后，才日渐红火起来。此时，北平妇婴保健会在钱粮胡同甲二号保婴事务所内设立了节制生育咨询部。每星期三上午9时至12时，杨崇瑞亲自到这里面授节育方法。

从桑格夫人的介绍中可知，上世纪20-30年代的节育方法主要有断欲节欲法、断种法和机械法。

断欲法，是指男女之间保持精神上的爱情，不涉情欲。不过，这种古典的、柏拉图式的爱固然高尚，但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不具备推广价值。节欲法，指的是今天人们仍经常采用的“女性安全期避孕法”。

桑格夫人认为这种方法很不可靠。据统计，曾有5万名德国退伍军人采用安全期避孕法，结果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有效。不过，看了桑格夫人对“安全期”的定义，就知道为什么她认为“此说不甚可靠”了。当时，医学界认为女性“安全期”是“月经止后两周到月经前三天”。这显然与今天的解释大相径庭。



1928年，杨崇瑞在北平举办接生婆讲习所留影

断种法，分为“X光放射法”和“外科手术法”。通过外科手术节育的方法今天仍在使使用，但桑格夫人大力推崇的“X光放射法”，今天看来就显得很可疑了。据桑格夫人介绍，德国医学家霍克研究认为，用X光放射男女生殖器可以使种子变弱。据说，放射X光时还可以控制分量，“要断种一年便一年，要断两年便两年”。“这种注射X光线的方法，全无痛苦，并且不是使男女日后无色欲能力，不过把男的精虫、女的卵子消化，没有孕育的能力罢了。”然而，今天我们知道，长期暴露在X光射线之下，对人体的副作用极大，决不会有人用这种方法避孕了。

机械方法是今天仍被广为使用的男用避孕套和女用子宫帽, 以及避孕药。

从杨崇瑞写的临床记录分析看, 当时他们主要向前来咨询者推荐女用避孕器具。当时常用的女用避孕器具主要分为宫颈帽——带有1%乳酸胶冻的橡胶子宫托和放在食醋内的一种简单的阴道塞。由于阴道塞比较便宜, 医生们大多向患者推荐阴道塞。不过, 医生们对北平当时能找到各种醋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 不同的醋质中酸的含量大不相同。后来, 使用阴道塞的患者大多改用了宫颈帽。

然而, 避孕的效果并不太令人满意。杨崇瑞统计, 1930年3月至12月的10个月中, 只有22名患者使用了避孕用品。虽然, 寻求避孕帮助的患者中很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上层阶级, 但避孕失败的比例还是相当高。其原因, 有的是因为对诊所缺乏信心、就诊匆忙; 有的是因为子宫托断裂; 有的是因为丈夫不喜欢或迷信。

《北平晨报·人口副刊》刊登的《妇婴保健会工作报告》中显示, 接受节育咨询的前100个案例中, 有55名丈夫曾受过大学教育, 只有3人不识字。可见, 当时寻求节育服务的, 大多是社会的中上流的社会分子, 普罗大众对节制生育还怀有较深的成见。

1937年,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 中国社会转为战时模式, 杨崇瑞也奔赴大后方。节制生育的工作就此搁置。1957年, 当人口学家马寅初重提节制生育问题时, 杨崇瑞给予大力支持, 结果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这时她才知道, “节制生育”已经不是一个医学问题, 而变成了“政治问题”。

乳房问题：束放谁做主？

乳房的束与放，不仅事关母子康健，更关乎种族强盛，于是，一场关于乳房的社会冲突，不仅牵动了男与女，还惊动了官与民。

文/毛剑杰

董竹君：“清倌人”的1910年代时尚

在1915年逃出当“清倌人”卖唱的“长三堂子”之前，董竹君的日常装束大约是“一件灰色无花的绸面灰鼠皮袄，一条黑缎裤，一双黑鞋和白洋布紧袜套”，内衣则是紧胸的布背心，这是当时女性的时尚着装。



董竹君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自晚清到民国的嬗变，除了不再有“龙椅上的皇帝”之外，其他一切照旧，社会风气亦然。女性着装整体风格也同样依然传统、保守：即便是睡觉，她们也要穿着长过膝盖的长背心，减少身体的裸露，出门时在旗袍、大褂里面，必须穿上马甲、胸褙。

但一个古老沉闷的中国，以及与它伴生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种种，毕竟渐行渐远；而欧风美雨带来的清新气息，则正渐渐浓郁，将要酝酿成一场大时代的观念解放风潮。

而女性传统内衣样式也已经渐渐开始变化：一种由“捆身子”内衣演变而来的、俗称“小马甲”的新型内衣样式正流行着，其形制与穿在外面的坎肩不同，一般都比较短小，并且，在小马甲的前片，还缀有一批密钮，使用时将胸部紧紧扣住。



民国早期奶品广告中的女模特，是时以束缚成扁平胸为美

此时，女性胸部依然被严重束缚着。董竹君后来回忆说，1913年，已满13周岁的她，就像当时所有女孩子一样，都要束着一件紧胸白布背心，把胸部捆得紧紧的。

1915年，上海《妇女》杂志创刊号发文，将束胸与缠图十四

足进行比较，认为前者对女性的健康伤害“更大而深”，因为“束胸致胸疾，将来生育子女，虽有乳汁必不畅旺，胎儿身体必不健全”。



民国初年流行的“小马甲”

该文还指出，束胸可能导致传染肺病、流毒骨髓，造成弱国灭种的祸患，因此呼吁女同胞“保护自然之发育，须以强国强种为人身之要图”。将“放乳”上升到了民族国家强盛的高度。

这大约是最早的女性“放乳”呼吁。

当时曾担任女校教务15年的吕澂纯女士则指出，小马甲妨害女子胸部发育，易致肺病，成年女生患咳嗽病者十之八九，都由此引起。而且生育子女“先天势必不足，致有积弱之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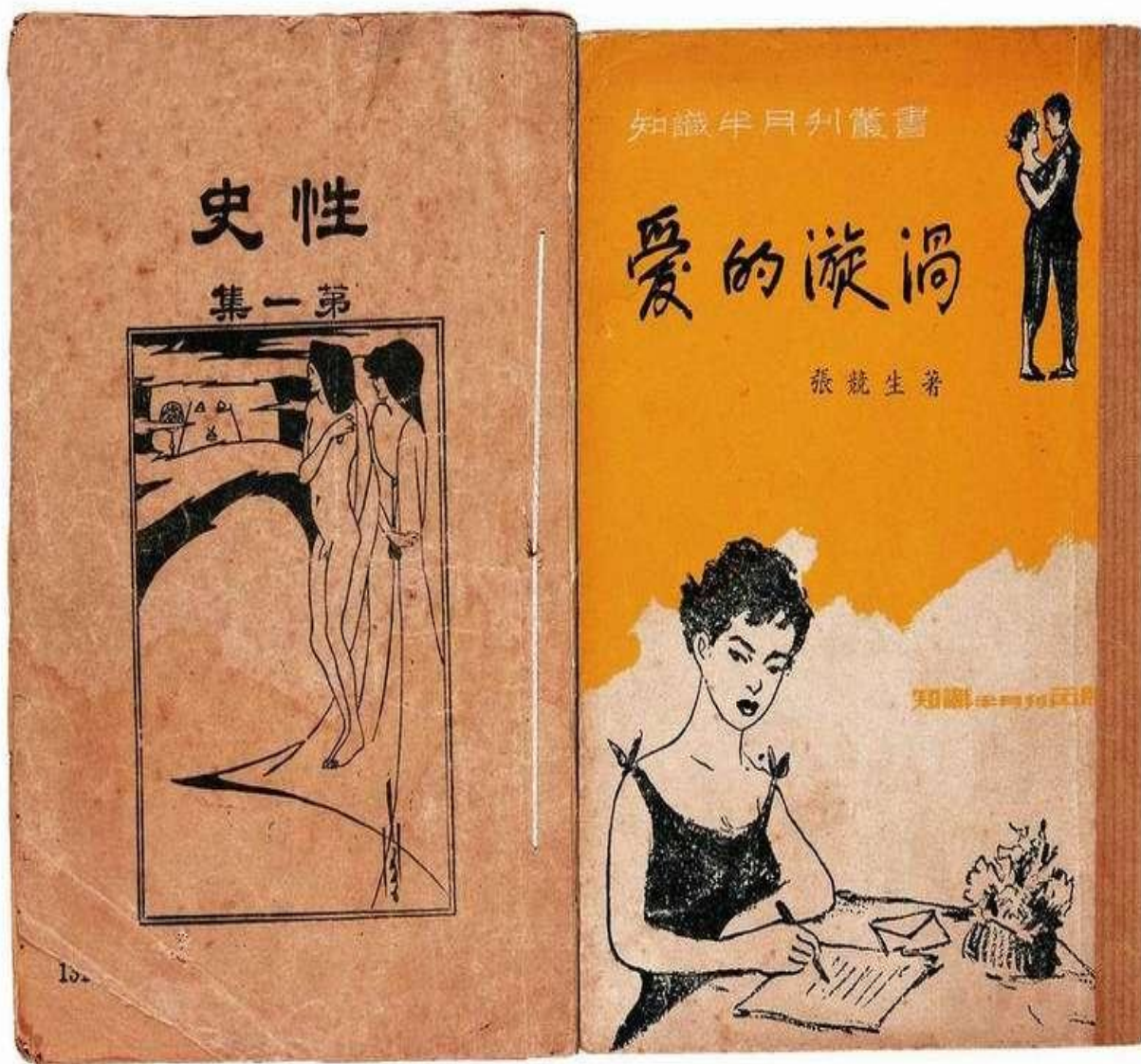
比较接近现代的女性着装样式，可能最早是在妓女身上出现，而后渐渐流行于一般时尚女性中：女衫手臂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吊高至一尺有余，夏天“内则穿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以有眼纱之纱衫”。

在当下观念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着装，但在一个世纪前，它依然是人们眼中的“暴露服饰”。守旧派人士如上海市议员江确生，甚至在1918年致函民国江苏省公署，愤指最近社会上妇女流行一种“淫妖之衣服”，“肌肉尽露、不成体统，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要求江苏省、上海县及租界当局出面禁止这种“淫服”。

为此，上海地方政府于1920年发布布告，禁止“一切所穿衣服或故为短小袒臂露胫或模仿异式不伦不类，并称其“招摇过市恬不为怪，时髦争夸，成何体统”。“故意奇装异服以致袒臂、露胫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惩办”。这也就是说，女子只要穿着低胸露乳、裸露胳膊、小腿的服装，就将面临牢狱之灾。

男性主导的“天乳运动”

在顽固的保守力量面前，留学归来的张竞生大胆地为女性社会注入了新思想。时任北大哲学教授的广东学者张竞生在1923年4月29日于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连梁启超、鲁迅等知名人士也参与其中。为时两个多月的讨论，他受到了多数人的批评，但也从此声名远播。



张竞生所著《性史》与《爱的漩涡》书封

张竞生自己也以为是“反对束胸最力者”。1924年，他的《美的人生观》讲义在北大印刷，这是一部充满“离经叛道”意味的讲义。在“美的性育”一节中，他倡导裸体：裸体行走、裸体游泳、裸体睡觉……认为“性育本是娱乐的一种”，并像今天的“夫妻夜话”节目那样十分详尽地介绍了“交媾的意义”和“神交”的作用”。

他更提出，“束胸使女子美德性征不能表现出来，胸平扁如男子，不但自己不美，而且使社会失了多少兴趣”。这让新旧思潮激战的中国

为之一颤，一时间，大家闺秀们纷纷开始悄悄放胸，被当时的媒体称为“天乳运动”。1926年，张竞生更公开出版《性史》一书，大谈“性的美好”。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更为猛烈的欧风美雨后，“德先生”、“赛先生”以及伴随而来的思想解放、女性解放潮流，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冲击着古老的“三从四德”禁锢。

在上海地方政府发布“禁止女性袒臂、露胫”令的同一年，《上海民国日报》发文，先是从生理学剖析束胸的害处，然后大声疾呼“妇女若世代束胸，我们的种族即衰弱了！其时，我们的民族，不待帝国主义来侵略和压迫，我们也自己归于灭亡了！”这与1915年《妇女》杂志创刊号的观点完全一致。

与此同时，一些留洋归来的社会名流如胡适等，也在各种场合发表言论反对女性束胸。

“假使个个女子都束胸，以后都不可以做人的母亲了！”

“中国现在的女学生，将来都不配做母亲，是种族上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张竞生出版《性史》的同时，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怂恿”第17届西画系采用裸体模特，并在画展公开这些“裸体淫画”，成为当年与《性史》齐名的“桃色新闻”。

当时，有一位女校校长看后谩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蠹贼！”一时舆论界纷纷扬扬，群起而攻，有人说：“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三是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甚至当时上海总商会的会长朱葆三，也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开信，骂刘海粟“禽兽不如”。

正如鲁迅所说的“在中国改革是极难的，哪怕是要挪动一个火炉子的位置，也往往要流血”，更何况，张竞生所提倡的放乳，触及千年传统社会的性禁忌——在传统观念里，性学跟淫秽几乎是同一个概念。

对于《性史》与刘海粟裸模事件，社会哗然、学界纷纷声讨的结果是，《性史》被禁，刘海粟也差点被当时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逮捕。

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以超越时代的激进方式，强烈冲击了女性观念。据林语堂描述，《性史》开卖时盛况空前，“买书的卖书的忙成一团，警察要用水管子冲散人群”。

即便是《性史》被官方查禁后，坊间盗版翻印依然不计其数——人们一面义正词严地指责张竞生离经叛道，另一方面却忍不住好奇和天性，或公开或秘密地接受了《性史》的刺激。就在《性史》被禁后不久，《国民日报》的副刊也开始公开介绍起女性“曲线美”了。

1927：武汉名妓裸奔

《性史》出版的同一年，发端于广州的国民大革命，自南向北席卷中国。

到1927年初，北伐军已经攻克武汉，国民政府随之迁来，武汉一时成了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而一场得到新政权支持、甚至以官方力量强制的女性身心解放风潮，随之到来。

3月8日，国民政府组织20多万军民在汉口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随后，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突然，名妓金雅玉等人赤身裸体，挥舞着彩旗，高呼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等口号，冲进了游行队伍。她们都认为“最革命”的妇女解放，就是裸体游行。



由奥地利画家希夫作创作于上世纪20年代，表现上海橱窗里西方文明的漫画

20天后，3月28日，蛇山南麓的阅马场热闹非凡，妇女协会宣传组走上街头演讲。她们现身说法，卷起裤腿，光着脚丫控诉缠足之苦。宣传组成员顾灵芝高声演讲：“要坚决放脚，要坚决剪发，还要坚决反对束胸！束胸是最不人道主义的！束胸是一条毒蛇！它缠着我们妇女的肉体和灵魂……”

说到激动处，她脱掉上衣，双手托着丰满的乳房说：“你们看，这就是真正的解放。”并热泪盈眶地振臂高呼：“全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在妇女协会的号召下，妇女摆脱买卖婚姻，放脚剪发，反对束胸，提倡自由恋爱。

这场“裸奔”运动，对于国民政府的女性解放政策不无触动。

在1927年5月朱家骅代理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后，7月7日，他在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递交了《禁止妇女束胸的提案》，要求以省政府布告的形式，限三个月内，“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

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这一提案获得了通过。而后，广州政府甚至还特意为此成立了“天乳运动执行委员会”。

广东强制推行天乳运动在全国引起反响，上海《申报》于1927年7月9日即刊登朱家骅的天乳运动禁文，《上海民国日报》则刊文倡议打破女子“以束胸为美”的观念，应该稍有些强制意味。

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进而发出公函，在全国范围内通令禁止女性束胸：“妇女束胸实属一种恶习，不但有害个人卫生，且与种族优盛有损。”随后，广西、湖南两省地方，也相应出台了禁止束胸令。至此，由官方的介入，天乳运动渐渐波及全国。

卫清芬：胸部束放之间的苦恼

然而，就像当初官方禁令不能阻止新思潮蔓延那样，它同样不能一蹴而就改变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固有观念。在文化传统深厚的中国，命令往往敌不过风俗：“千百年来这种束胸的陋习，一代一代传下来，上行下效，相习成风，如今大有牢不可破之势。”



民国月份牌上可以看到内衣外穿的女性肖像

尤其在既开放又保守的广东，就像陈序经教授在《广东与中国》中所言，既是新文化的策源地，也是旧文化的保留所，天乳运动启动容易，推行却难。

1927年8月26日的《广州民国日报》，登载了这样一条社会新闻：广州大沙头一位男士带着不束胸的妻子上街，被三位穿着时尚的先生轻薄地称为“村下婆”，也就是“粗俗村妇”。

而后，那位女士无法接受这样的嘲讽，便借了一件小衫，“居然束起胸来了”，《广州民国日报》这则新闻最后这样结尾道。其语气意外之余，不无对女性屈从社会压力不敢展示自我的惋惜，更何况，这时距离大清皇帝退位、民国始建已经15年，其间关于女性应当“放乳”的呼声从未断绝。

另一位女性卫清芬，后来回忆说，她自己由于身体发育得比较早，15岁的就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开始束胸。到了1927年，“禁止女子束胸案”颁布后，她大着胆子扔了束胸布。那时没胸罩，光着身子穿外衣，非常抢眼。被保守的公公看到，立马将她丈夫叫到正房里暴训一顿。于是，卫清芬才放了几天的天乳，又束了起来，上街时被女警察罚了50块大洋。

公公起初嘴还硬：“罚就罚，我还出不起这钱？”又有一天，一个妇女组织再一次上门来检查，发现她还束胸，又罚了50块大洋。这下，公公心疼起钱来，再也不过问儿媳束胸不束胸了。

其实，卫清芬一家的苦恼是当时千百家的缩影，束放之争也是千百年风气和一朝新政之间的博弈。

实际上，天乳运动能否得以实现，关键还是看女性们的态度。此间，尽管女性赞成天乳的当属多数，如广州女性就掀起了穿“腊肠衫”热——那是广州话里的旗袍，以衬托女性的曲线美，女性衣服裁剪也多了胸高一项。

但另一方面，还有相当比例的女性反对天乳运动。1931年6月13日，上海《申报》发文称，“女子束胸之风……虽历经内政部遵令查禁，无如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而尤以各学校女生为最”。

该文举例称，浙江萧山县立女子中学女生一直束胸，被政府强令“解放”，并定期检查，但女生们对此普遍“羞形于色”。然后感叹道，“许多自号革命的新妇女，天天开口妇女运动，合口妇女解放，但是她本身仍受着狭小背心压迫，就不想法去谋解放！”

此时，解放妇女束胸仍遇到较大阻力。

阮玲玉：“义乳”先行者

坚决反对和坚定支持两端之外，更多的女人是徘徊于束胸和放胸之间，这不仅是社会思潮新旧交替间的特征，还有现实的阻碍因素：如何使女性在解除束胸后而又使两乳不下垂，这是天乳运动具备可行性的关键。于是，在“种族强盛等”崇高命题之外，问题再次回到了女性内衣样式的革新上。



阮玲玉穿着新式内衣，将旗袍之美和女性身体曲线近乎完美地结合，从而将一个时代的美凝聚在荧屏。

当时《北洋画报》第114期有一篇文章《小衫应如何改良》，这种小衫指的就是之前在妇女当中盛行的捆身马甲。作者绉香阁主则有针对性多了：“小衫本身并无废除的理由，因为它不过是一件衣服罢了，我们所要打倒的不是它，是‘压乳’的行为。”这种意见，比之简单激进的“天乳运动”要合理不少。

据当时的媒体调查，当时乡间妇女束胸或穿小背心的只占少数；而城市妇女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妇女束胸穿背心的约居99%。因此改革女性内衣势在必行。

1927年8月到10月间，《北洋画报》连续刊登了西洋女性抹胸图片四幅，对西洋胸衣构造进行详解，显示西洋抹胸既可保护身体发育又有美观效果。也是在这个时候，乳罩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时人称之为“义乳”。

以出演《神女》、《新女性》等影片蜚声影坛的阮玲玉，是民国时期最耀眼的明星，她精湛的演技，迷茫的美丽让影迷为之疯狂。她身着旗袍，风姿绰约，风情万种，给后人留下了惊艳的一个瞬间。她是最早戴“义乳”的中国妇女之一。阮玲玉正是利用这种新式内衣，将旗袍之美和女性身体曲线近乎完美地结合，从而将一个时代的美凝聚在荧屏。

而西式胸罩随之风行中国，并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改良中式内衣，为20世纪30年代女性乳罩的引进推广奠定了基础，经过改造的女性内衣能兜合乳部，不束亦不松。这对“天乳运动”在1930年代的顺利推行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后，放乳逐渐由最初的自我解放，变成了一种时尚。女性曲线美的风韵之美，受到新潮人物追捧，新式女装对性感风情的追求，改变了传统女装胸、腰、肩、臀完全呈平直的造型风格，开始热衷表现身体立体感的设计风格，在交际场所出现了以“露、透、瘦”为特征的新颖女装。

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袒胸露臂成为女性服饰的一种时尚潮流。“春江女子感文明，装束无端又变更，高底皮鞋长筒袜，袒胸露臂若为情。”恰当地记录了这样的服饰风尚潮流。

1937年电影《到自然去》中，白璐等的泳装照，又引领了一波内衣风尚：影星胡蝶、白杨，一个个穿上泳装，走进泳池，在阳光下展

示她们健康、健美的身躯。白杨还穿过比连体泳装更为开放的两截式泳装亮相。



1937年电影《到自然去》中白璐等演员的泳装照

时尚女性不再羞答答掩饰对内衣的渴求，舶来品的吊袜带、西式睡衣、浴衣也被她们尽收帐中。

在旗袍里面穿戴精美的蕾丝衬裙或西式内衣，胸乳部戴着乳罩，呵护乳房；腿部有长长的丝袜，系着吊袜带。在室内，也流行穿睡衣。一些镂空和透明的化纤或丝织品开始运用到内衣上，并且采用了轻纱之类的薄、透、露的面料，以增加性感的魅力。女子胸衣在收口上缀有丝带等装饰物。

此时，袒露装早已不再有20世纪20年代政府禁止的遭遇，女人要想出众，穿着奇装异服、袒露装，在大街上回头率最高。20世纪40年代，随着电影的传播，美国好莱坞魅力，也开始在中国大城市显示出它的影响，追求时尚的年轻女孩以好莱坞影星为榜样，刻意模仿，甚至会穿上袒胸露背装，将肌肤与内衣展示在世人面前。

余美颜：第一欲女的性与情

她这样一个孤单女子，对性、爱情、家庭之自由的追求处处碰壁。为了破茧而出，她自己的性和情与整个时代的巨轮死磕，频频以失败告终，这让余美颜心灰意冷。她和因“人言可畏”自杀的阮玲玉不同，她不惮人言，她只恨自己当初“误解自由”，最终决然地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文/任珏

欲女蹈海

1928年4月19日夜晚，一艘名为“加拿大皇后”号的邮轮（另有一说法为“加拿大”号邮轮），正从香港开往上海。一位华服女子面色憔悴，在船舷边踱来踱去。偶有旅客经过，她欲言又止，好不容易说出“大地坼裂，吾将投海以洁吾身”这样没来由的话，便不愿多讲。同行的女友怕她出事，她又忙不迭让人不用担心：“哪有人跳海前先告诉别人的，我是说着好玩来着，别担心。”女友稍微交代了下便回船舱休息了，她双臂环抱胸前，将自己静静地藏在黑暗处，倚在船栏上，冰冷的海风吹乱了她额前的刘海。但是她丝毫没有察觉到寒意，木然望着黝黑的夜海，心事重重。

这女子把随行的佣人叫到身边，嘱咐说：“等船到了上海，你要是寻不见我，就自己回香港吧。”说完拿出100元钱，吩咐佣人将其中的50块打赏给帮过自己的买办，剩下的回香港后分发给家中其他侍役。佣人见她如此神情，虽颇为担心，但见她安排妥当，亦不敢多问，只有允诺会办好差事。（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午夜2时30分，当邮轮经过温州出海口时（另有一说，其自杀跳海处为上海吴淞口），这女子纵身跃入大海。待船上众人发现动静，她已经被波涛吞没。其后，人们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两封绝命书，均委托船长寄回香港，一封是她写给全国女同胞的，一封则留给她的恋人——渤海九少。（杨村，《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另有一说，余美颜只留下一封告全国女同胞的绝命书。）

这名女子，不是别人，正是风靡沪粤港的奇女子——余美颜。她不是电影明星，但是电影明星杨耐梅排除万难、不惜牺牲色相筹措资金、自主公司也要将她的故事搬上银幕；她不是皇亲贵族，但裙下之臣数以千计，10年欲海浮沉，令她阅尽天下男人无数，不论是军阀、富商、阔少还是沪上文青小记者，都对她趋之若鹜，将之奉为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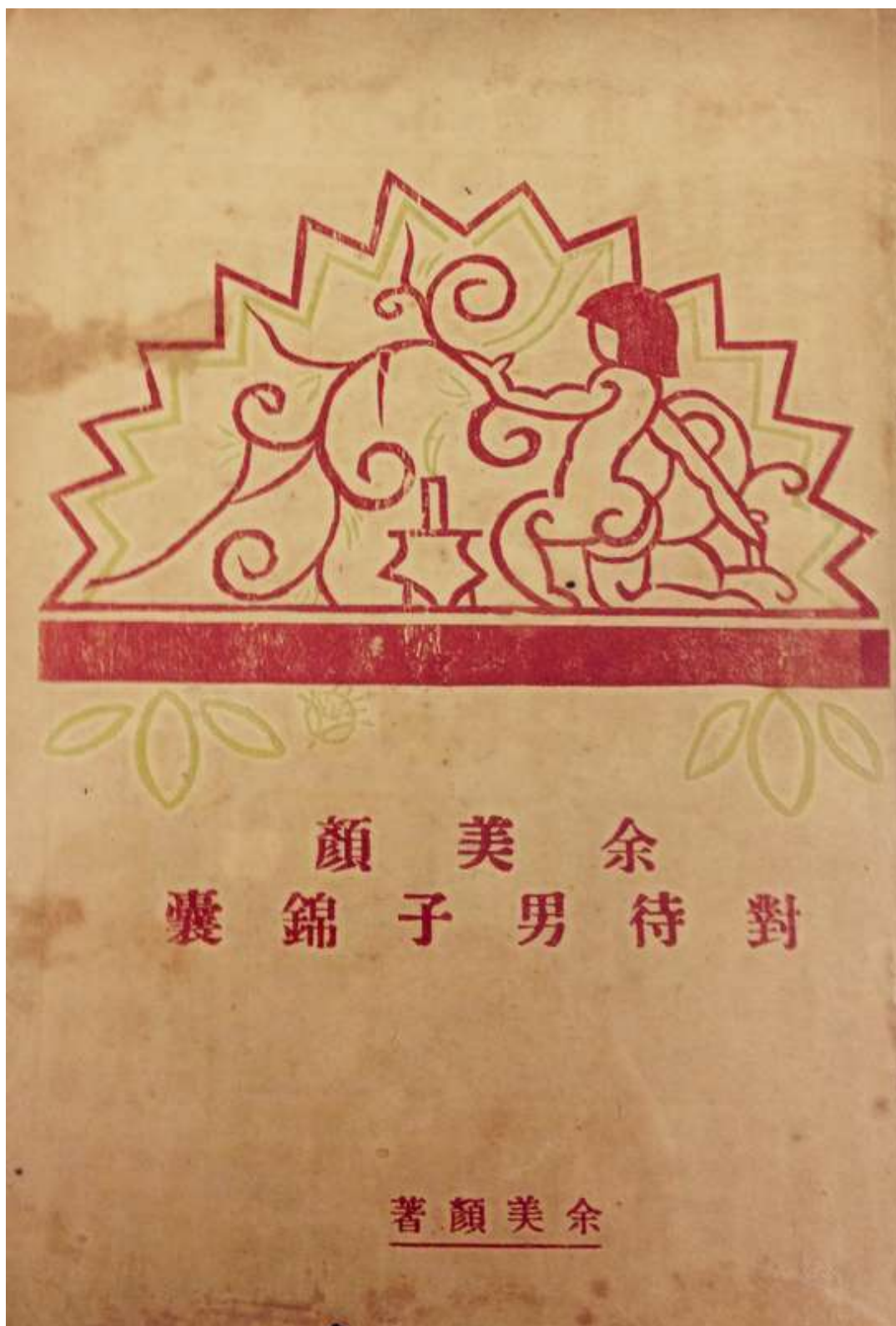


香港流传的《余美颜浪漫情书》封面

一代欲女就这样顷刻间香消玉殒，举国哗然。死前唯寄信一位情郎，更是令这位睡过数千男人的奇女子更加神秘莫测。《申报》、《大公报》等大小报章均在同年五四前后连篇累牍，加之《奇女子投海后余闻》、《社会逸闻：荡女之身世》等猎艳标题报导此事。荡女赴死的新闻，一时间竟成报界奇景，蔚为壮观。

1931年北京华明书局更是出版了一本名为《对待男子锦囊》的小册子，列明作者为余美颜，由南海吴亚农作序，指称此书乃为余美颜蹈海前之遗作，“纯出庄言，有裨女界”。（余美颜，1931，《对待男

子锦囊》，北平：华明书局。）书中分门别类地指导女子，作为妻子、媳妇，在婚姻的不同阶段，该如何侍奉不同类型的丈夫和长辈，颇有一种欲女版《女诫》的味道，极尽贤妻良母之典范。因尚未发现其他史料旁证此书，颇令人质疑此书有可能为他人趁势冒名代笔之作，以图欲女赴死商机之利。



被称为余美颜蹈海前之遗作的《对待男人锦囊》封面

直到余美颜死后的第六年，以“提倡社会高尚‘娱乐’”为己任的《玲珑》杂志仍刊出一则《奇女子余美颜在粤拍戏》的消息，声称余美颜蹈海未死，已投身影业，与人合伙开拍电影公司，并将以女主角身份在广东拍摄《红粉骷髅》一片。（《奇女子余美颜在粤拍戏》，载《玲珑》杂志1934年10月31日，2221页。）这样死而复生的香艳传闻，令人喋喋称奇之余，不仅慨叹一代奇女子的肉欲情念，不仅在生前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即便身故之后数年亦是可供市井把玩的艳情奇谈。余美颜作为民国第一欲女，生前种种离经叛道之言行已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时代话题。身故之后，欲女痴情的粉色故事，自然也比其他普通女子更能刺激娱乐市场的消费动力。

女子自杀在民国时期算不上新鲜事，上海市的自杀现象尤为严重。侯艳兴的研究发现，上海市仅在1934年一年中，自杀人数便高达2325人，也就是说，在1934年，每一天平均每3小时，上海便有一人自杀。而且自杀人数中，女性多过男性。从1929年开始，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女性自杀人数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到30年代中期达到顶点。

这一时期的女子自杀的原因大抵可分为：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四大类，女子自杀多因家庭纠纷，男子自杀则多因为生计艰难。（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余美颜早已离家在外10来年，不可能是因为家庭纠纷自杀。凭她的美艳和欲女之名，吃穿用度自是不必担心，更不可能因为生计问题自杀。那么，到底是怎样的齷齪大地，令一代欲女决绝赴死呢？

情窦初开

余美颜，别号梦天，生于1900年，广东台山县荻海人。关于她的家庭背景，存在不同版本的说法。广为流传的版本是，余美颜的父亲余大经是当地的一名典当商人，母亲饱读诗书，颇具文学修养。亦有一说，称其父亲是广州某当铺的伙计，每月收入仅四十元，仅够一家

生活所需。不论家境如何，余美颜年幼时，口齿伶俐，“姿美神秀，质意心灵”，每次放学回来，因其姿色过人，总有不少男士尾随其后。（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余大经见不得这般情形，勒令美颜辍学回家。余美颜高小毕业便不再继续读书，回到家中补习国文、英文。因天资聪慧，十五岁上下便已可以与人高谈阔论，大谈自由解放的道理。

渤海九少是众多倾慕余美颜的年轻男子中的一位，因常常飞鸿传情，深得美颜好感，情愫渐生。少女的芳心一旦豁开了一道口子，内心的欢喜便如同冲出闸门似的万马奔腾了。为了和九少相会，美颜常常要等到严厉的父亲出门之后，才能溜出家门和九少相见，她对这来之不易的自由恋爱甚为珍惜。

或许是因为从小读了那些自由的文章，或许是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先进思想，余美颜不仅向往爱情的自由，也渴望身体的自由。在那个年代，会游泳的人不多，女子游泳更是稀罕。余美颜穿泳衣下水游泳的事情成为当地的一段佳话，令她声名鹊起。十七岁那年，美颜代表母校参加台山县的联合运动会，被首富之子谭祖香一眼看中，谭家很快便上门提亲。余大经一口应承了这门婚事，虽然母亲知道女儿的心另有所属，但始终拗不过一家之主余大经的主张。第二年，18岁的余美颜成为谭家媳妇。（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新婚燕尔的余美颜并没有太多时间与丈夫共沐鱼水之欢。婚后两个月，因家族生意失利，谭祖香奉父命前往纽约处理商务。丈夫离家之后，余美颜的日子并不好过。刚刚被点燃的青春之火无处排遣，每每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的都是那些自由的欲念不断与妇道规训强烈碰撞的煎熬。丈夫常年未归，家中礼数严格，余美颜最后终于“复因种种关系，感觉婚姻不自由之痛苦”离家出走，浪迹广州、上海、香港等地，开始了她长达10年的情欲之旅。

浪荡十载

从1898年光绪帝下令解除女子缠足恶习的“天足运动”到1927年广州国民政府通过的《禁革妇女束胸》的“天乳运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民国时期的女性身体自主权大大增强。1927-1937年的10年间，国民政府大力提倡国民体育运动，女子体育得到快速发展。（王浩，2012，《民国时期的女子体育研究（1927-1937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在“救国强种”思想的指导下，女子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逐渐被国民政府收编、征用，成为肩负国族兴亡之重担的法器。1934年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蒋介石的大力推动下，更是将整个国民生活进行军事化改造。（蒋介石，1940，《新生活运动要义》，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大概只有前30年左右的时间，是女性身体最为自主、最为奔放的年代，这正是令余美颜成为民国第一欲女的时代。



余美顏搭

呢隻船由滬

來港嘅

食說呢首奇

女子唔輕易

被人拍照嘅

我認識佢廬山

呀我佢拉架

點肯放過佢

奇怪！將近

上晒客重

見佢嘅影跡

莫不是呢

首神秘奇

子化裝兆

記者耳目

香港20世纪50年代流传的《奇女子》的漫画书，取材余美颜的风流故事，故事内容或许为臆造。但是仅就图片呈现而言，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历史旁证。

1918年2月27日，余美颜离家出走来到广州没多久，偶遇一桩刺杀案，她被巡捕误当成凶手抓了，投送到了监狱。因为此次拘留，谭家与余家解除了婚姻，父亲余大经认为此乃奇耻大辱，追至广州，将她告进了当时广州的新式监狱“习艺所”改造一年。“习艺所”是当时广州政府开办的收容所，在收监犯人的同时，培养他们走上社会、自力更生的能力。

余美颜是如何挨过这一年的监狱生活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团，无人知晓。牢狱之灾并未令余美颜顺从于传统道德。或许是在牢房里看到诸多人间百态，让她认清社会制度乃是男人设立的本质，更让她学会了娴熟运用身体工具追求理想、反抗社会的本领。在她出狱之后，更加坚定了走追求自由的道路——身体的自由、感情的自由、金钱的自由、性的自由和家庭的自由。

获释后，余美颜身着奇装异服，行为怪异，她在沪港穗三地漂泊，穿梭于军界、商界各路达官显贵之间，她承认自己玩于股掌之间的男人，达到了3000人之多（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2页。）她不顾政府禁令，冒着巨额罚金的风险，在广州城扬鞭策马，与另外三位行为出格的世家女子被世人称为广州“四大天王”，风头盛极一时。

更有传言说她娇奢淫纵，喜欢在旅馆裸睡，一时间引来很多人的注意。被解除婚约、被脱离父女关系，没有了这些传统道德约束下家庭和婚姻的包袱，本就崇尚自由的余美颜，为自己找到了释放身体情欲的社会空间。她将酒店的公共地方视作展示身体的舞台，沐浴之后，赤身裸体睡在卧室门口，令来往旅客瞠目结舌。她旁若无人、谈笑自如。对于那些见她裸体便惊愕不已的人，余美颜是颇为不屑的。在她眼中，自然裸露的身体，是一般人无法欣赏的一种美丽。

社会大众对她多以“奇女子”视之，各类大小报章都拿她当娱乐明星对待，或抨击，或猎奇，她追求自由的代价便是让自己不断成为娱乐

头条。当然，报界也不乏评论者认为她是敢做敢为的女界先锋，开创了女子之新纪元。

虽倾慕之人颇多，亦能将男人把玩于股掌之间，但余美颜的心里始终是追求爱情自由的。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传统家庭依然无法容忍这样一个追求爱情自由、身体自由、情欲自由的绝世女子。余美颜不断遭受感情上的挫败，无法再结秦晋之好、重归家庭，只能在情涛欲海中辗转漂泊。

对于别人对她放浪形骸的指责，她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她说过：“无论古今中外，只有男子可以玩弄女子，女子不能玩弄男子，所以我和数千男子性交，这是我玩弄男子的一种把戏，虽然不能说是开世界的新纪录，但也是爽快十余年，男子原来是很笨的，玩弄不是一件怎样的难事，这就是制度所造成的啊。”（张振编著：5女子自杀的解剖6，南京中山书店，1928年版，第17页，引自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2页）

交往、把玩的男人越多，越让余美颜了解这个男人主宰的世界，她也越发知道，把玩的男人虽多，但只能令自己爽快一时，并不能彻底改变这种大多数女性不自由的社会现实。自由理想无法全面达成，感情挫败日益痛心，阅历的男人越多，她越觉得自由之理想行将幻灭。

一掷千金

作为一代传奇女子的余美颜，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闹市掷钱事件”了。有一年冬天，有一个富商想与余美颜同居，余见这人并不算讨厌，便同意了，叫他带3000元钱来过日子。但第二天富商只带了1500元前来，余美颜见状大怒大骂他为富不仁、吝啬不堪。

余美颜虽说是一代欲女，但却是性情中人，感情的纯洁在她看来，绝不是金钱可以交换的肉体交易。她不能接受富商将两人的感情

关系视为市井买卖一般的讨价还价。区区1500元，余美颜并不看在眼里。她一把抓过钱来，推开亚洲酒店七楼的窗户，将这些钱悉数抛下，就当是替这富商为寒冬腊月里的穷苦百姓做点好事。纸币如雪片般在广州闹市街头（另有一说是在上海）从天飘落，余美颜追求自由的心也在这些世俗男人一次又一次的羞辱面前，摇摇欲坠。

广州、上海两地的报纸纷纷报道此事，也让余美颜的惊世骇俗之举进入了沪上四大花旦之一的电影明星杨耐梅的眼帘。

搬上银幕

经历逐出家门、婚姻失败，情伤遍体的余美颜不是没有想过委身为妾，但心中对自由的念想，又让她无法逆来顺受。虽心系渤海九少，但渤海九少的父母，因听闻她的风流韵事，认为两人若是只做对露水夫妻，家里不会阻拦，但若是成为永久伴侣，家里断然不会同意的。历尽沧桑的余美颜知道，在那个年代，得不到家长支持的婚姻只是春梦一场。

回不去家庭，亦无法收获爱情的余美颜，试图遁入佛门，以寻得灵魂上的自由。她曾在香港九龙青山佛寺落发为尼。但谁知道消息泄露出去，众多相好跑去青山寺看她。佛门乃清修之地，哪里容得这些狼虎之徒恣意徜徉？住持觉得这样成日迎来送往会有碍清规戒律，担心闯出不雅之祸来，遂要求她离开。至此，余美颜已经清楚地知道，侍佛之路是走不通了。

阅人无数，却无法在性的关系上获得应有的尊重；付出感情，却被拒于传统礼教家庭之外；一心理佛，追求最后剩下的灵魂自由，亦不容于尘世。这时候，除了死，她再无第二条路可走。

走上银幕，是余美颜自杀前最后的心愿。1927年她前往上海，想联络朋友看能不能碰碰运气，投身大银幕，她说：“吾放荡十年，负辱深重，此行来沪求以投身银幕，留一纪念，使社会一般青年得识余之

真面目，或不至于蹈余覆辙，目的达后，余将投身大海，洗去此生污秽，来世或可做一纯洁女子，得到真正自由。”（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3页。）

其实，将余美颜“一掷千金”的故事搬上大银幕的想法早就在杨耐梅的心里酝酿。杨耐梅1927年便在报章上读到有关余美颜“闹市掷钱事件”的报道，她对余美颜不堪男人屈辱一掷千金的壮举颇为欣赏。同是不羁女子的杨耐梅叹服美颜这种不为男人金钱驱使的傲世奇女子的作风，发誓要将余美颜的故事拍成电影。



楊耐梅

杨耐梅饰演《奇女子》的剧照

她拿着报纸去找大导演张石川，想让张导演开一出戏，让自己来演，但是张石川对这种“淫娃荡妇”的故事毫无兴趣。这时候杨耐梅已经有自立门户办电影公司的想法，唯独缺拍摄经费。杨耐梅已经接到盘

踞山东的“花国将军”张宗昌的邀请，上济南一聚。坊间更是传闻，此行或将是一场肉欲交易。

杨耐梅正在犹豫是否接受邀请，张石川的拒绝，让杨耐梅颇为不满，冯俐在她的剧本《影后胡蝶》中，借女制片人“黄耐梅”之口，道出了杨耐梅下定主意拍摄余美颜故事的心声：

中国女子从来只晓得三从四德，却不晓得自己除了为那些个男人生生死死之外，还可以有点别的作为！今天我也算是来跟张先生打个招呼，等我从济南回来，一定要开办一个自己的电影公司，专拍让天下人称奇的女人……”（冯俐，1996，《影后胡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半个月之后，杨耐梅携带巨资平安返沪，开办“耐梅影片公司”，购买昂贵摄影器材，聘请史东山做编导，拍摄了由自己出演女主角的《奇女子》一片。杨耐梅的行事风格与余美颜颇有些相似之处，影片中两位奇女子的鲜活故事，令影片不仅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也获得包括蔡楚生在内的影业同仁的赞赏。世人记住了杨耐梅，更记住了余美颜。但这时候，余美颜已经等不及看到大银幕上的自己了。



楊耐梅與「奇女子」余美顏

一九二八到一九二九年間上海有一位最受人注意的女演員楊耐梅，她底一生可紀的事實在太多。

楊的戲路與白光很近似，起初她是明星公司演員，在張石川導演「玉梨魂」中飾筠青，繼入大中華百合公司主演「探花女」。她擅演所謂「香豔浪漫」的悲劇角色。她的性格很特別，作風很新奇，那時演員多是隸屬於某一家公司的，獨楊耐梅不甘寂寞，喜歡時時變動。不久，她脫離大中華百合公司，於一九二八年九月間自組耐梅影片公司，第一部新片決定採用轟動一時的「奇女子」余美顏為劇本故事，由楊耐梅自飾余美顏，配以朱飛（飾渤海九少），高倩韻，高占非，易小鏡等，一

《奇女子》中，饰演女主人公余美颜的杨耐梅与饰演男主人公渤海九少的朱飞的剧照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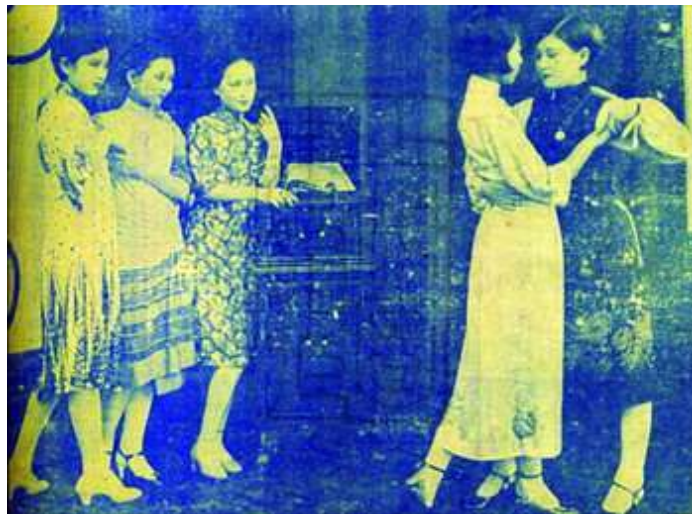
误解自由

早在1927年夏天，余美颜去上海的时候，就有了自杀的打算。她就自杀方法的问题咨询过一个叫做马浪荡的记者。马浪荡将自己对自

杀方法的研究心得分享给余美颜，他告诉美颜：“你如果真是要死，我可以告诉你两个艺术的死法，这是很容易的：其一是投美妙的西湖，其二是投身茫茫无涯的碧海。前者，以你这样的人，能够埋香葬玉于西湖畔，可供骚人墨客的题咏，留心社会问题的研究；再就是伟大的毁灭，艺术的自杀，永远不留一点痕迹在此污浊的人间。”（张振编著，1928，《女子自杀的解剖》，南京：中山书店，18页，引自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3页。）马浪荡的此番分析令余美颜颇为认同，最终她还是选择了投海这样艺术的自杀方式，来追求她人生最后的自由。

余美颜死后，广州报章上有人评价余美颜是“放辟邪侈”之人，但却欣赏她能“以一女子而能趋役须眉之人”，更推崇奇女子的行事风格，认为“女同胞如能自拔于玩之地位，虽如奇女子何害”。（《婆无渡河》1928年5月7日《广州民国日报》，载南方都市报•发现广州•第58期，广州旧闻篇：戏里戏外奇女子 生前身后不堪情，2006年8月21日。）余美颜也曾坦承自己是一个社会的反抗者，她的这些浪漫行动，招致社会的不满，她亦不满社会的道德桎梏，遂将身体及情欲都换做反抗社会、报复社会的道具。

余美颜只是遵从本心、偏爱自由。为了心中这点自由的梦，燃尽了自己肉体 and 情欲。幼年时就在她心中萌芽的自由之种子，带她走向欲女之路，也带她走向人生的终点。



《奇女子》剧照，左三为杨耐梅饰演的余美颜

她这样一个孤单女子，对性、爱情、家庭之自由的追求处处碰壁。为了破茧而出，她自己的性和情与整个时代的巨轮死磕，频频以失败告终，这让余美颜心灰意冷。她和因“人言可畏”自杀的阮玲玉不同，她不惮人言，她只恨自己当初“误解自由”，最终决然地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在她写给全国女同胞的绝命书中，她写道：

颜不幸生于此青黄交接时代，自小凭媒妁之言，听父母之命，嫁夫远适外国，数年未谋一面，少识之无，误解自由，竟任性妄为。在此污浊万恶之社会，浮沉十载有奇，虽阅人甚多，终未能结朱陈之好，前虽钟情渤海九少，奈为家长所阻，终失所望。终失人生乐趣，留此残生亦无所用，决然立意毕命，离此污浊世界，还我清静本来。（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幼年时的思想启蒙，让她成为追求自由的一代奇女子。时代的进步只是将余美颜这样的女人抛向红尘，成为被男人和媒体消费的浪荡欲女。虽然余美颜也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把玩男人以作报复，但历史的车轮总跑不过时代洪流中个体的理想追求。当看清这污浊世界的龌龊本质之后，唯有投海赴死，才能涤濯清白。

余美颜是奇女子，是一代欲女，更是个择善固执的女人。

自由，便是她心中的执念。

男女争权：盛七小姐的财产官司

一部名为《小姐争产》的时装戏在1929年初红遍上海，这部号称“上海最新时事特别警世新戏”来源于此前一年，民初首富盛宣怀七女儿盛爱颐争夺遗产的官司。这桩官司吸引了上流阶层及整个社会的注意，当时《申报》的评论就认为“按女子要求男女平等之财产继承权，此尚为第一起，影响全国女同胞之幸福，关系甚巨”。

文/凡歌

这毫无疑问是一桩离经叛道的官司。

1928年8月29日，上海当时销量已达14万份的《申报》，在其社会新闻版头条，刊登了《女子承继遗产问题》一文。文中透露，清末洋务运动主将、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七女儿盛爱颐，以兄弟辈分析遗产不遵守现行法律，未按男女平等办理，已延请律师，正式向法庭起诉，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



盛爱颐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数千年的传统习俗中，女儿都被父系社会视为外人，从未被赋予财产继承权。民国肇始，缔造者们将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概念都搬了进来，在法律上亦有明文规定。但在现实中，真正实施起来仍困难重重。

豪门恩怨历来是人们最爱看的八卦，何况女儿争夺遗产，更是千百年来第一遭。

盛爱颐此举在北京、广州等地激起了不同的反响，这桩官司吸引了上流阶层及整个社会的注意，当时《申报》的评论就认为“按女子要求男女平等之财产继承权，此尚为第一起，影响全国女同胞之幸福，关系甚巨”。

遗产

盛爱颐时年28岁，尚待字闺中。这位盛家七小姐，之前曾传出与宋子文的绯闻，但因受到其母亲的阻挠，最终不了了之。

这位未出阁的小姐之争产，乃因盛家有着庞大的家业。其父盛宣怀被公认为是清末继胡雪岩之后的第一官商。他以帮助李鸿章办理“文案”起家，办洋务40年，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第一个煤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



盛宣怀53岁肖像

盛宣怀既被称为实业家，又在官场倚仗李鸿章，数十年间遂成江浙巨富之家。到1911年辛亥清朝覆亡时，盛宣怀已官居邮传部尚书。

民国五年（1916年），盛宣怀去世，身后留下巨额家产。盛家特成立了由盛氏好友、亲信、亲属等人员组成的遗产清理小组，由李鸿

章长子李经方主持，对盛氏遗产作了全面的梳理并进行了财产分割。复旦大学档案馆保存的盛氏遗产分割会议文件抄本显示，遗产盘点分割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先后开过八次遗产清理小组会议，最终清点出盛氏遗产按动产、不动产、各种股票及有偿证券等件，按照清理处清册，除现款及拨出各产业外实共计价值银一千两百九十五万六千零九十八两三钱八分八厘。

盛宣怀生前曾留下遗嘱，要求在安排抚养寡妻和女儿嫁奁的财产后，将遗产分为两份，一半用于建立愚斋义庄，以所生孳息十分之四充作慈善事业，十分之六作盛氏本支子孙男女读书、婚嫁、经商及祭祀、扫墓、修理宗祠、置买田产、资助盛氏合族义庄之用；另一半作为可继承的遗产。其时盛氏共有五房儿子为法定继承人（第二、六、八子早夭不在内；长子盛昌颐当时已死，以其子盛毓常为代表；三子盛同颐当时也已死，以其继子盛毓卹为代表；四子盛恩颐，五子盛重颐，七子盛昇颐）。长房传人盛毓常初期曾托律师提出过反对意见，但经家族调解最后亦认可了遗产分配方案。

当时盛氏五房儿子均分遗产共580万两，每房各得116万两，另外五成580万两捐入愚斋义庄。按盛家遗产分割会议记录，在继承遗产之前，七小姐盛爱颐、八小姐盛方颐各保留了嫁奁费6万两。

此番分家最后以拈阄仪式结束，五房各拈得“仁义礼智信”一字，沪上名流作了见证，并请当时上海律师公会会长丁榕作了公证。盛宣怀一生好作慈善之举，其遗嘱所留义庄，颇类似今天富豪们所成立的慈善基金，以盛宣怀之远见，此义庄若长兴盛，一方面有益于社会公益，另一方面亦可保盛氏子孙未来生活、教育无忧。

但孰料，这一现代化方式的义庄，恰埋下了日后盛氏家族分崩离析的隐患。



盛家在静安寺路上的老公馆

1927年3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欲继续北伐，其巨额军费的着落就瞄上了上海的巨富与银行。盛家作为首富，自然逃不出牢笼。1911年苏州和平光复时，革命军就曾查抄过盛家的财产。后来盛宣怀主动表示为革命捐款，新政权就又发还了他的家产。这一次，不过是旧事重演。

义庄既然是公益事业，当然要为革命作贡献。江苏省政府其时通告盛家，命令把愚斋义庄财产的四成上缴国库，充作军需。革命有需要，个人也有需要，老四盛恩颐早就惦记上了义庄之公产，此时借机提出将已归入愚斋义庄、用于慈善基金的部分，由盛氏五房分掉。1928年2月，盛恩颐（老四）、盛重颐（老五）、盛昇颐（老七）以及两个侄子盛毓常（长房长孙）、盛毓邨（盛老四之子，过继给三房），准备将义庄财产之六成，计银350万两共同瓜分。

此事在家族内部引发颇多争议，七小姐盛爱颐带头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此举有悖祖训。但手头吃紧的兄弟们却一意孤行。盛爱颐又提出，既然要分这笔公产，那么她也有份，要付给她10万银两做出洋

留学的费用。盛恩颐对此并不反对，但老五盛重颐、老七盛昇颐却不愿意割肉。几兄弟以家里早已为爱颐、方颐预备了各6万银两的奁资为由，拒绝她们参与遗产分析的请求。

谈判不成，那就法庭见。一怒之下，盛七小姐一纸诉状把哥哥盛恩颐、盛重颐和弟弟盛昇颐及侄儿盛毓常、盛毓卹送上了上海租界临时法庭，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将此项六成庄产与原告重行均分，以符合法例而重女权”。

新潮

盛七小姐打官司鲜非心血来潮。



盛家三小姐合影。盛关颐（中）、盛爱颐（右）、盛方颐（左）

开埠八十五年后，上海滩西风东渐，居埠的人无不以新潮自居。

但更重要的是，此时国民革命军北伐直逼沪上，其民主、自由、平等之政治主张，正欲通过法律施行于现实中。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业已大幅提升。彼时不仅女校大开，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女大学生约占大学生总数的15%，女留学生亦达万人以上。而且有女性参选议员成功，社会上亦有自由职业女性之出现，仅上海其时就有女律师

三四十人,女模特上百人。男女平等虽未成为现实,但已渐成社会风气。

关键的一点是,见过世面的盛爱颐在和律师商议中得知,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有法律支持女子财产继承权。

此前,在历时十多年女权运动的推动下,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确认男女平等的宗旨:“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此后的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内中更进一步指出,“应督促国民政府从速依据党纲对内政策第十二条‘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之规定”,在法律方面要实施“制定男女平等法律”和“规定妇女有财产承继权”。并在“妇女运动适用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男女职业平等”、“男女在法律上绝对平等”、“男女工资平等”、“妇女应有财产权与承继权”等。



盛家四小姐盛樨蕙与其母刁夫人

同年，国民党中执委第61次会议决定，司法机关以后凡是审理有关妇女的诉讼，都要根据这个决议案进行。7月，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发布了《审判妇女诉讼案件应根据妇女运动决议案之原则

令》，训令各级司法机关在未制定新法规以前，凡属于妇女诉讼的案件，都应依照该决议案在法律方面的原则进行裁判。

这让盛爱颐看到了赢得官司的可能性。

时光倒退十年，盛七小姐的官司绝无打赢的可能。

只消把视线移向1919年的北京，就会发现民国已立，但陈规依旧。该年9月份，声名鹊起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写了一篇7000字左右的《李超传》，刊登在当时北京最新锐的杂志《新潮》上。让好好先生胡适都为之愤怒呐喊的李超，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班的一名女学生。父母双亡后，他的堂兄以嗣子身份继承全部家产，后又强迫她嫁人，并断绝其经济来源。李超积愤成疾，不幸早逝，而其遗留书信字字血泪。同学苏甲荣将之整理，转交师长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引发教育界一波新的摧毁旧制度的呐喊。

陈独秀发表《男系制与继承制》，痛斥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指出要改变财产继承中男女不平等的旧制度。胡适则写下了脍炙一时的《李超传》，在这篇传记的末尾，胡适提出了五个尖锐的问题，其中之一正是女子继承财产问题。胡适引用李超书信中语质问——“此乃先人遗产，兄弟辈既可随意支用，妹读书求学乃理正言顺之事，反谓多余。念之情理，岂得谓平耶？”诸位读这几句话，又发生什么感想？

北京教育界为李超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会。一时间，掀起了一波争取妇女财产继承权，追求男女平等的新舆论高潮。李超同学程俊英说，“李超的死和追悼会，给我班的刺激很大，激起了反封建婚姻的怒潮。冯沅君同学带头和儿时在河南订婚的未婚夫退婚，其他同学纷纷响应”。



青年时代的盛老四与孙用慧

李超案后十年，女权运动高涨。独立、自由、平等之思潮首先在大城市中蔚然成风。妇女解放运动所带来的改变从文学、报纸、戏剧中均有体现，至20世纪30年代初，大城市中的有识阶层已普遍接受这些观念。

在这个新旧社会转化的年代，正需要有一些领头者来打破陈规，确立新风。

盛七小姐在南京国民政府初立时的这一官司，不能不说是时势使然。其时的国民党，正在争取社会各界支持，社会舆论亦站在了盛爱颐一边，上海《申报》的报道即指出“盛女士为国民党老党员，对于革命工作，曾迭次参与机要，先总理在日，甚为重视，又与宋氏姐妹相知甚深，故此次提起诉讼，各方均表同情”。

官司

这一案件经由《申报》报道，当即在上海引起轰动。

此后《申报》在其社会版上连续追踪报道，使盛氏官司家喻户晓。“未嫁女子而欲承受父母财产，实以此案为嚆矢。故此案不特为法律界所注意，抑且为全社会所重视”。（《盛女士请重分遗产》）

1928年9月5日，上海临时法院在其第八法庭公开审理此案，办案法官为李晋孚推事。此案既经报章报道，更是民国政府第一件女权官司，遂吸引了上海著名律师江一平、詹纪凤等各界名流前往旁听。

但此案原被告均未出庭应诉，只派代理律师在庭上唇枪舌剑展开交锋。

李晋孚法官首先问明双方姓名、年龄和籍贯，然后由原告申辩。

原告代理律师陆鸿仪、庄曾笏出庭应辩。陆鸿仪宣读诉状时，直接以国民党二大妇女运动议案为诉求，称：“不思在此党治之下，法律上以男女平等为原则，国民党对内政策第十二条业已确认，而最高法院迭次解释，亦根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未出嫁之女子，有与同胞兄弟同等继承财产之权……法律所赋予之权利断难丝毫放弃。”

在祭出国民政府党政决议案之“大旗”后，陆鸿仪称“本案争点纯为法律问题，应请将愚斋义庄之六成遗产准以七份分配，原告应得一份，计50万两”。

被告方则声称，原告已取得6万两奩资。

法官追问：“原告是否已经分得6万两？”

律师陆鸿仪辩称：“那6万两属奩资，并非从已分派及义庄保管两部分款内提取的。”

盛恩颐的代理律师接着提出了诉讼时效的问题，称“原告律师认为此案为法律问题，属于事实。但重分财产须具备两个要件，本案原已订有分析文书，岂能擅自推翻。而且盛老太爷歿于民国五年（1916年），那时五房已开始享有继承权，并签订文书分配遗产，然而当时并没有女子有继承权的法律条文，法律不追既往，所以原告不应具有分析遗产的权利，请法庭驳回诉请”。



盛老四盛恩頤（右）与父亲及老五在日本合影

紧接着，盛重頤、盛昇頤、盛毓常的律师也都提出了一系列反对意见，其核心意思都是反对盛爱頤参与分析遗产。各方律师显然都早有准备，各引条文，各呈己见，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辩论，此事亦引得上海各大小报章详加报道。

上海临时法院并未当庭宣判，但当时的舆论显然对盛七小姐相当有利。

1928年9月13日，盛七小姐官司正在进行之中时，《大公报》刊发了陈学启关于《中国妇女最近的状况》的文章，分析其时女权状况，不无忧虑地称“用了不少的精神与心力去努力，然而，结果一无所获，或者，所获得的，不是妇女所希望的。这些教训，使妇女们知道这些都是枝节小事，不能解决大问题的，就是说，获得女权亦是无用的，要进而求得人权”。

时隔两天，《大公报》的另一则新闻，则刊登了河北省吴桥县公民为请求女子继承权问题给河北省政府的上书，其中谈到：“所谓男女平权者，仍系表面客气之言”，希望“会议照准，使继承之权，男女共同享受。”

这一案件审理长达一月之久。最终临时法院李晋孚推事认为，根据现行的法律，盛爱颐同他的兄弟和侄子拥有同样的继承权利。对于被告提出盛爱颐因为得到妆奁费而丧失继承权的问题，李晋孚认为，原告分受妆奁费与几位被告分受遗产的道理是相同的。被告等既然可以在分受遗产之后，又主张继承义庄财产的六成，那么原告依照未出嫁子女有与胞兄弟同等继承财产权的现行法例，自然不因曾经受分妆奁费而丧失继承本案讼争财产的权利。

据此，法官最终判决原告胜诉，被告盛恩颐等不甘服输，又提起上诉。但上海公共租界上诉法院最终认定系争的愚斋义庄60%的财产是被继承人盛宣怀指定为本支及族中公益用途、组织董事会保管的财团法人的资产，上诉人既然已经在民国九年分析遗产时遵照盛宣怀遗意，将该部分遗产捐助愚斋义庄，那么捐助财产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不能再收回。所以，上诉人认为系争财产是已经被五房继承且公共保存的财产，因而拒绝被上诉人参与分析的理由不能成立，最终上诉被驳回。

1928年9月21日，上海《申报》以“盛爱颐诉请承继遗产案判决”为题详细报道了这次判决过程及结果，称“今后凡有男女间争执财产继

承权的，都可以把他来做重要的参考”。

盛七小姐打赢官司的直接影响是，其八妹盛方颐依样画葫芦，当即在临时法院对其兄弟和侄儿提起了同样诉求的诉讼，也同样赢得了七分之一的财产。

但这一案件所带来的蝴蝶效应却刚刚开始。

起伏

盛七小姐可以自由恋爱，盛七小姐也可以继承遗产，个性独立的名门闺秀可以反叛旧时代，也可以引领新风气。

但是，盛七小姐的成功是否可以复制？这却是一个颇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

研究者刘一注意到，上海市的张金宝和张根媛两姊妹也曾在临时法院提起过民事诉讼，控诉她们的继母张顾氏（生有两个儿子），要求根据女子继承遗产条例，将故父张裕生的遗产（包括地产及现金计七万八千）做四份分析并各得四分之一。该案和盛氏姐妹的案件案情相差不多，结果却截然相反，张氏姐妹败诉。原因只在于她们的父亲张裕生逝世于1925年10月19日，离赋予女子财产继承权的《妇女运动决议案》通行之日相差半年多。况且张裕生去世前未对财产做特别安排，他的遗产自其去世时起自然就已经由两个儿子继承且不可追溯了。

男女平权所带来的家庭纠葛，其要改变的是一代人的家族观念，远非法院一纸判决所能解决。在纠结前行的过程中，女儿的继承权，逐渐由未婚者扩大到已婚者，并最终促成了妇女权力的全面平等化。

现实中，各地法院遭遇了一系列关于继承权的考验，他们不得不把这烫手的山芋扔给民国最高法院。

先来看看，1928年各地法院向最高法院的请教题吧。

浙江金华地方法院就向最高法院询问：“未出嫁之女，是否必须于其父母乏嗣时，方可主张承继财产。抑不问有无胞兄弟，均有承继权之存在？”

福建省高等法院则请最高法院解释：关于财产承继问题，是否不问嫡庶长幼男女，皆得为承继人同等承继，抑其应继部分有无差异？

浙江永嘉地方法院致电最高法院询问：“设有女子父母俱亡承继遗产，一旦出嫁，即第三四号解释无异男子出继，能否将父遗全部财产契往夫家，抑须交还入继之子，并酌留祀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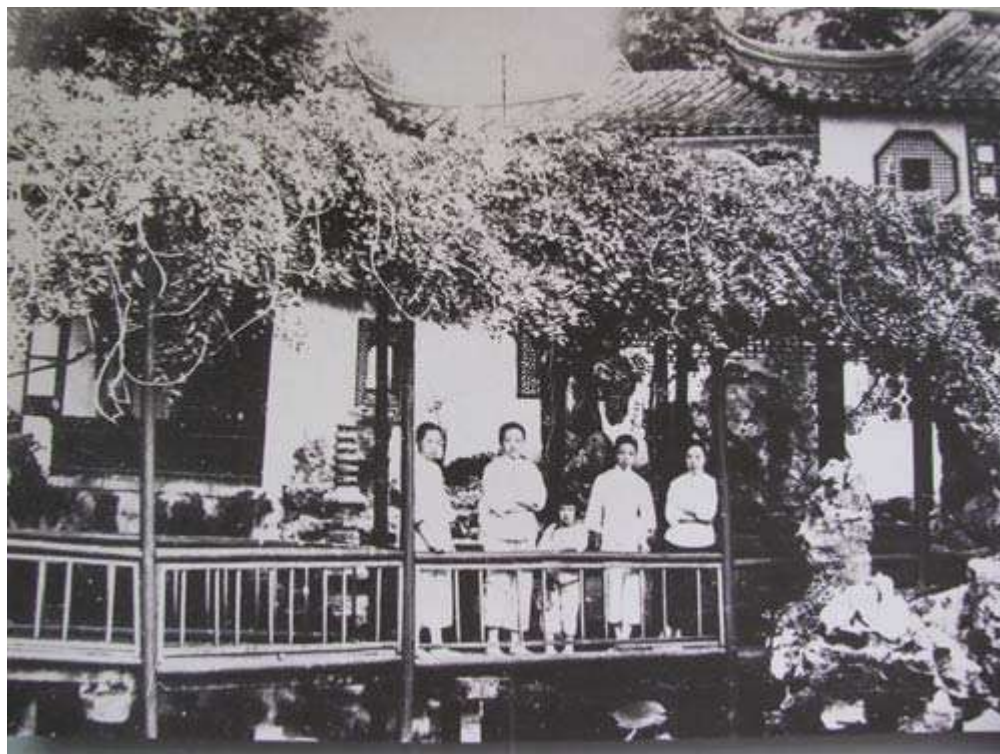
.....

类似的疑问还有很多，除了法院有疑问，律师也有难题。上海律师戴景槐和李时蕊先后数度追问“既然未嫁和已嫁女子都享有继承权，那么已嫁女子在继承开始前死亡，其亲属是否有继承权？女子现在有了继承权，那么她们是否也承担‘父债子还’的义务？”

最高法院应急不暇，盖因这类疑问均来自现实中大大小小的官司。针对各地法院和舆论界关于已嫁女子有无财产继承权的疑问，1927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在致湖北省司法厅的解释中肯定了已嫁女子有财产继承权。但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在解释上仅以未婚女子为限，最高法院1928年第47号令解释云：女子继承财产，系指未出嫁女子而言，不问有无胞兄弟，应认为有同等继承权，出嫁女子则不得主张。在政权并未统一之际，互相打架的司法解释令下级法院一筹莫展，只能是葫芦官判葫芦案。

直到1929年4月，司法院召开解释法令会议，认为最高法院关于女子继承财产之解释应重新编定。这一年7月3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最终通过了《已嫁女子追溯继承财产施行细则》，明确已婚女儿和未婚女儿享有同等的财产继承权。并可追溯至国民党二大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1926年10月）通令各省到达之日。

这一细则，使之前有疑问的妇女们，看到了新的曙光。



1917年，盛家女眷在留园合影

盛爱颐的两个已嫁姐姐盛关颐 and 盛静颐，在1928年眼睁睁看着两个妹妹拿走50万银两，但彼时已婚女子无权继承的解释，让她们有苦无处诉。待到新令一出，此时不告，更待何时。于是，1930年盛关颐 and 盛静颐再度将盛氏兄弟告上法庭称：当时出嫁时，仅得少许妆奁，未分丝毫遗产。因此要求重行分析财产，将愚斋义庄60%分成九份，两姐妹各得其一。

这一年，上海富商步吉臣的三个已嫁女儿也相继提起诉讼请重分父亲遗产。一时间，上海豪门的女儿们竞相开始“继承财产”的男女平等的比赛。

这其中，又以盛氏家族最为令人刮目相看。

效仿

盛氏家族庞大，兄弟姊妹嫁娶皆是豪门，在沪上形成了庞大的家族势力。

盛七小姐赢得官司之后，打破了之前兄弟姐妹们和平共处的假象，并由此蔓延开去，搅动了不同利益者的入局。从1928年夏到1933年夏，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上海人都可以在《申报》上看到关于“盛家官司”的报道：

《昨时法院谕准盛氏公产过户》 1928年6月22日

《盛女士请重分遗产》 1928年9月6日

《盛爱颐诉请承继遗产案判决》 1928年9月21日

《盛氏已嫁两女亦诉诸分产》 1930年3月7日

《盛宣怀已嫁孙女又提析产之诉》 1930年6月5日

《盛宣怀外孙希图分析遗产》 1931年12月3日

《盛氏外甥争产案》 1932年1月29日

《纠纷不已之盛氏争产案》 1933年5月28日

就连追踪报道此案的《申报》都感叹道：“一案未结，一案又兴，可推为全沪健讼之魁”。但从另一个侧面观察，会发现盛氏之连环诉讼案，却使其时还很艰难的女子继承权从此广为人知。

1930年，继盛氏姐妹先后发难外，盛氏的第三代也加入了诉讼之战。

第一起案件是盛宣怀的已嫁孙女盛蓉又对其叔盛恩颐及其儿子盛毓卹提起析产之诉。

在外人看来，这是一起相当纠结的家庭官司。1915年，因盛家老二艾臣没有生育子女，由庄太夫人做主，将盛家老大葵臣的女儿盛蓉过继给盛艾臣做女儿。嗣后因盛艾臣去世，庄太夫人为其续后着想，又将老四盛恩颐的儿子盛毓卹立为盛艾臣的嗣子。但其时盛毓卹尚年幼，就一直跟随其生母居住在上海，并未与其庶母（盛艾臣之妻）同住。

1919年盛艾臣去世，1930年盛艾臣之妻去世，其间盛蓉充任孝女，按风俗照办礼仪至六七出殡、送灵柩等。但丧礼之后，盛蓉却发现报上载有盛毓卹诉毛曾年（庶母的姨侄）窃盗一案，才知道盛恩颐、盛毓卹及其生母趁丧事忙乱之际，竟将庶母所遗留的贵重首饰（存储四明银行保管库内）私行提取，此外还封存了所遗留的衣物、金银器皿，意图侵占。盛蓉认为他们损害了她的继承权利，起诉盛恩颐与盛毓卹共同继承盛艾臣的遗产。

这一继承案件尚未停息。1931年，盛家小女盛孝颐之子林凤文、林凤钧，也于第一特区法院控诉盛泽臣、泮臣、频臣、毓常、毓卹、关颐、爱颐、静颐、方颐等九人侵占外祖母庄太夫人的遗产，要求代位继承其已故母亲应得的遗产。

第三代人的追诉显然因为前述《已嫁女子追溯继承财产施行细则》的出台，令他们看到了希望。于是接踵而至的，便是盛家四妹的女儿云芝及其五个兄弟共同提起侵占之诉。原告认为被告所提供的外祖母的遗嘱是假的，因为遗嘱中仅分给他们的母亲一万，这完全不符合庄太夫人向来钟爱子女，毫无等差的做法，所以他们坚持应将外祖母的遗产三百作十份分析，每个子女各得三十万，他们母亲的那份由他们代位继承。

只怕盛宣怀万万想不到，自己一世英明，打造出一个庞大家族，身后却是一地鸡毛。

争财也罢，夺利也好，盛氏遗产继承案就像连环接力赛，一棒比一棒精彩。仿佛就是为了以案例来阐释民国继承法的各个环节。

这一连串案件中，有未嫁女儿要求继承权的，有已嫁女儿追溯继承权的，还有侄女起诉叔叔要求和父亲嗣子获得同等继承权，连外孙女、外孙起诉要求代位继承外祖母的遗产也不漏过。民国女子继承权研究者刘一认为，盛氏女子系列争产案及时而生动地展示了一幅国民政府对于女子财产继承的态度和法律变化的动态图。

不仅盛家，当时盛七小姐的胜诉，带动了上海豪门一连串的诉讼案件，如李经方（李鸿章之子）、薛宝润（印染巨子）等诸多富绅名流的遗产继承纠纷案，这些豪门世家的女子走上法庭，都要争取属于她们的财产权利。经由沪上报纸广泛报道，普通人家的子女也开始勇敢地合法权益而斗争。妇女聘请律师维权的事例逐渐增多，仅在1929年11月至12月两个月的时间里，《申报》上类似的记载就不下20起。

对一般小市民来说，没有巨额家产可以继承。那么，这样的官司值不值得打呢？

把视线移向当时的另一座大城市广州，其时的《广州民国日报》开设有“法律问答”专栏，由五位律师来回应民众提出的一些法律问题。民国史研究者许峰翻阅此间报纸回答的法律问题，发现问询最多的是婚姻问题，其次则是财产继承问题。关于继承问题，此前大都是询问男子继承权的，自国民党1929年6月通过已嫁妇女继承权法案后，所有关于继承问题的都是对女子财产继承权的咨询，大部分又都是关于对追溯既往的疑问。

举1929年9月21日刊登的一则问答为例，足见民众对于这一问题的关切程度。

问：“女子对于父母遗产有无继承权？缘妹等有兄弟三人，先祖遗下屋业一间。民国十年两兄将此屋业按与别人，而弟实不知也，其时若乔尚未出阁，如编现未嫁人，妹等闻说新颁法例，女子对于父母遗产无论已嫁未嫁，均享有继承权，未悉确否？果尔，则妹等对于祖父遗留下屋业，有无享受继承权？此屋已由两兄按与别人，若债权人请求官厅封抵债务，妹等应以何法保护？乞示知（陈若乔、陈如编）。”

当时黎浩潮律师回复称：根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议决案，以民国十八年五月十五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八一次会议关于女子继承财产立法权新解释，无论已嫁未嫁之妇女，均有继承财产权，并能追溯及既往，虽已分析者，得请求重新分析，但以本法细则施行后六个月内为止方有效，至两兄抵押产财，弟既未知，可以“共有财产不得由共有中之一人或数人私擅处分”为理由，请求确认其抵押无效。

类似问题的激增，在许峰看来，正是时代脉络在民间社会的延伸。

但民国时期女儿的财产继承权利是非常脆弱的，美国学者白凯在其所著《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 ~ 1949》尖锐地指出，个人产权原则及随之而来的自由处分原则要摧毁它实在是太容易了。因为新法律只对死后继承这一财产分配方式进行了约束，却没有否定传统的生前以赠与为手段的分家惯行，也就是说，如果父亲想把财产全部交给儿子，只需在生前自主将家产分掉，女儿没有任何权利进行阻止。“他是否故意剥夺他的女儿继承权并不重要，他对自己的财产有权任意处置。”

另外，新法律和男女平等意识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知识的缺乏、交通的不便及财产诉讼费用的昂贵，使得“继承问题成为大多数小城镇和乡村妇女经验之外的事物”。

但经由日渐兴盛的报纸的传播，男女平等逐渐成为一条基本的法律原则，更借由财产继承这一敏感问题而深入人心，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

资讯：

上海滩“豪门官司”

1928年，盛爱颐起诉其兄侄，要求同等的财产继承权。律师根据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妇女运动决议案》，运用法律武器最终胜诉，由此开启了中国女子争取财产继承权的历程。

1929年，妇人郁蒋氏要求与兄弟平分继母的遗产并起诉到法院，成为上海市第一起已嫁女子向娘家追溯财产的案件。

1930年富商步吉臣的三个已嫁女儿诉请重分父亲遗产，并依据新颁布的《已嫁女子追溯继承财产施行细则》赢得诉讼。

1932年颜料巨商薛宝润的外孙女提起了上海市第一例依据新民法中代位继承权的规定要求分得外祖父遗产的案件。

参考书目：

《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

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

谭志云：《民国时期妇女财产继承权问题》

刘一：《民国时期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肇端》

赵宏：《民国时期女子财产继承权的变动》

许峰：《民国广东地区的民间法律生态》

工读互助团：叛道之梦与寻路之困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主义，但却一直没有实践的机会。”在理想主义照亮中国的时代，一场乌托邦的实验，混杂着知识分子对于理想社会的空想与青年一代的叛逆开场了。

文/李梓

1920年1月10日，四个杭州青年来到北京，他们的年龄，只在20岁左右，他们的到来，只因为响应由王光祈、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起的北京工读互助团。这其中，领头的正是杭州五四学潮的带头人俞秀松，他们中间，还有刚刚因为《非孝》一文暴得大名的施存统。获得加入工读互助团的资格，让他们欢喜不已。

主义的流行与社会的空想

在辛亥革命后，知识界发现，旧的统治被推翻，而旧的社会依然存在，社会改良变革成为知识界探索的一个方向，互助主义在此时被引入中国，并开始了其实验之旅。

此时为知识界所醉心的理论派系，包括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互助论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新村主义，其混杂的社会改良实验在20世纪初滥觞，成为工读互助团萌芽的土壤。知识界介绍各国社会试验的文章长篇累牍，几年的氛围营造下来，直恨不得自己卷起袖子试验一场。

1919年7月，在《时事新报》上，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左舜生发表了《小组织的提倡》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左舜生哀叹“极不自然”的现代

生活：人格堕落、缺乏友爱、家庭苦恼、“生活方法不良”、“人沦为机械、欲望和社会的奴隶”……因此提出了“小组的营造”。



左舜生

他说，应该建立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抛开旧家庭的束缚，原有的关系责任一概解除，加入的团员收入为团体的共同财产，除了维持成员极淡泊的生活外，多的收入捐为公益事业，此外集体还应负责成员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费用，以便让下一代人得到改良。

左舜生的这篇文章，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与回应，各种各样的社会构想由此而生。

王光祈的田园梦

这其中，以王光祈的回信最长，信的开头便是“舜生！我昨天读了你的文章，《小组织的提倡》，知道你要创造一个崭新的生活出来，我欢喜得连吃饭都忘了！”

在信中，王光祈将“小组织”进行了细化和勾勒：“我对于新生活的组织已经有了办法……我们先在乡下租个菜园，这个菜园距离城市不要太远，亦不要太近，大约四五里路为最宜；这个菜园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只要够我们十余人种植罢了……”

“菜园中间建筑十余间房子，用中国式的建筑法，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卧室、饭厅，等等。……园子周围挖下一条小溪，溪边遍植柳树；柳树旁边就是竹篱，竹篱里头就是我们的菜园了……”



王光祈

“我们园中要附设一个平民学校，附近农家子弟均可以到学校读书，不纳学费。我们还要常常到那些农家和他们诚诚恳恳的周旋，每逢星期，还要聚集他们开一个演说大会。散会之后，我们还要开演幻灯，或购置留音机器一架，使他们大家快活呀！”

沉浸在美妙幻想中的他写道：“天真浪漫的农夫是与我们极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

在此时的知识界，与土地的亲近和耕作，实在是一个时髦的题材，托尔斯泰构建1889年的长篇小说《复活》，就以亲近土地的耕作与劳动，作为主人公的救赎与新生的契机。此时的中国知识界，将体

力劳动作为达到“知行合一境界”的手段。王光祈的田园幻想曲，打动了大批人。

大气磅礴的诗人“根据地”

在此后的讨论中，诗人宗白华在读罢王光祈的构想后，毫不客气地指出：“两君所说的……略带了高蹈隐居的意味”，“还是消极方面的意思多，积极方面的意思少”。

宗白华提出了一个大气磅礴的社会改造模式，同时还提出一个新名词“根据地”。他提出，集结一大群有志改造社会的青年，在中国寻找一片未曾开垦的土地，“在那山林高旷的地方，用最新式的农学方法和最新式的机器合力共作，不仰求于旧社会”。



宗白华

“根据地已得后，将建立各种学校，造成一班身体、知识、感情、意志皆完全发展的人格”，在此研究发展出一种最良好的社会组织，以及发展工艺、交通、厂矿、企业等，实验成功后，再将此次成功进行宣传。“发行到旧社会中，使旧社会彻底觉悟自己的缺憾，欣羨我们的完备。”

最后，以新社会为指引，指导旧社会进行改良，“使全国人民皆入于安乐愉快的生活”，这么一来，“我们创造少年中国的大目的可以渐渐达到了”。

宗白华最后说：“但是我们还要前进，用我们的余力帮助全世界的人都臻此境，以至于无疆之休。那时我们人生的责任，才可以勉强算是尽了。”

宗白华这竟然要以个体发起建造一个社会的构思，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而他在文中说“这旧的社会，我们情愿让与他们了”，可见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他对于现实社会的痛恨已经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工读互助团的落地

在由这一篇小文引起的讨论中，关注与参与讨论的知识分子上百，最终参与发起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名人教授有17人，上海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有24人，其中包括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标志性名人，可谓“席卷知识界”。

正如王光祈所说的那样，“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主义，但却一直没有实践的机会。”

许多署名人，实际上只是关注了此事，但未必认为有可实行的条件，比如蔡元培、胡适。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如果不去试验，如何知道不能成功。这个群体包括左舜生、宗白华、王光祈，他们以浪漫的

设想为起端，王光祈首先设计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模式，左、宗二人则参与到上海工读互助团中。

北京工读互助团章程的起草者王光祈，为创办工读互助团可谓殚精竭虑。最初，他为工读互助团设计了两种经济来源：种菜、翻译书籍。然而，他那美妙的对郊区菜园生活的构想一旦发表，立刻就有一位上海人夏汝诚写信来提出质疑：以种菜维持生计，“生活能否支持”？种菜之外，“每日读书三钟（三个小时）”，又有多少闲余与农夫接近、改造中国呢？

夏汝诚只是一位普通的上海市民，生平不见于史，但他提出的问题却切中要害。

为寻求答案，王光祈于1919年8月走访北京郊区的菜农，他发现，郊区的农民，一年忙碌种菜，又养牲畜，也仅勉强够生活所需。从经济上来讲，构建在菜园之上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而翻译书籍，仔细一想，又有多少参与工读互助团的青年能够胜任呢。

随后，王光祈将工读互助团定位于依靠他所熟悉的城市中各大学周边创办，以美国式工读生活为样板，并加入了财产公有，按需分配等原则。他认为，这种组织比半工半读学校好，因为半工半读学校仅限于技能培训，“不能将各科置办齐全”；比“成美会”好，因为成美会依靠捐款，是一种施舍行为，而且受助的人总是有限；比“新村”容易，因为不需要土地，容易实施。

而在解决经济来源上，王光祈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办法：设立食堂（饭馆）、贩卖杂货、印制信笺、生产墨水、洗衣……细概之，可谓围绕着大学校园形成的一系列配套产业链。而且，王光祈将每项业务开办需要的启动资金及环节都进行了估算：工读互助团先设立三组，第一组27人，经营食堂、招揽石印与装订生意，兼营洗衣，“开办费四百元”；第二组19人，经营业务大致相同，不过地点和第一组错开，“开办费三百元”；第三组若干人，全部由女子组成，编织衣物、制作小工艺品，“开办费三百元”。为此，共需募款一千元。



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劳动情景

如果放到商业发达的今天，由一位课余打工经验丰富的大学生来做这个方案，可能比王光祈的方案更经济适用。但在当时，社会经济不发达，这份方案已经可谓详尽难得。更兼之，知识分子坚信，要改造世界，就必须亲自动手，所以这个方略中，有许多自己创办的项目。

这是一个试验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简章》，最后由王光祈正式拟定，其中重要条约包括：第一，团员每日每人必须工作四小时；第二，团员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之教育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系归团体公有；第三，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

工读互助团既强调每个个体的自由，可随时加入和退出这个团队，同时又规定在进入这个团体后，成员就宣告脱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和原有学校关系，在团体内“绝对实行共产”。

在当时，此条约可谓惊天动地，在今天读来，也是不可思议，而且必见其在实际执行中的困难险阻。

然而，设计者的初衷，就不是不与现实妥协，而试验的初衷，就是“脱离现实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这一个看起来天真，做起来艰难的方略，得到了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崧年、罗家伦等发起人的肯定，成为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模式。

为尽快将工读互助团开办起来，17名发起人分担了一千元开办费的募集，发起人陈独秀捐洋三十元、发起人胡适捐洋二十元，即使家境贫寒、子女众多的李大钊，也捐洋十元……仅一周时间，“共收入现洋1041元，票洋254元”。王光祈后来回顾，“其中最出力的，当首推陈独秀先生”。

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北京《晨报》发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详细介绍了工读互助团的宗旨、章程，并在文中说：“我们天天在文字上鼓吹改革社会，从未有改革社会的实践运动……（它）便是我们实际运动的起点。”

此文一出，即宣告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正式成立。不到一个月，从全国各地报名参加甚至不远千里跋涉而来的学生就达到了数百名。王光祈对此欢欣鼓舞，他说，“不到一个月……工读互助团居然产生于‘首恶之区’的北京城里”，“若是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将渐渐实现”。

五花八门的试验参与者

1920年1月，北京工读互助团的三个男子组人数相继齐备，其来源大致可分为：北京高校在校学生、外地来京借读生、为参加此次活动特地来京人士等，年龄都很年轻。除了社会实验，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有借此机会完成人生的学习之意。

其中，第四组为集体参加，是一批本来准备留法工读的学生，因留法手续难取得，听说此计划后，愿意加入，将在外国工读改为在国内工读。

这其中，又以一组的参与者最为铁血，纠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办人物：

何孟雄——五四运动北京学生代表人物之一，参与创办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职务，1931年牺牲。



何孟雄

俞秀松——五四运动浙江学生代表人物，参与创办中国共产党和起草党纲，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任书记。



1920年1月，俞秀松在北京工读互助团时留影

施存统——俞秀松好友，一同参加学生运动，一同参与创办中国共产党事务，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施存统当选为团书记。



施存统

傅彬然——俞、施同学，与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在浙江共同创办《浙江新潮》，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以后逐步转入教育出版事业。

陈公培——中国早期共产党员，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入黄埔军校二期，参与东征、北伐，1927年参与南昌起义。

参与工读的青年，细分下来无非两类：要么为读书而来，要么为理想而来。



陈公培

不出意料的女子组难产

与男子组相比，女子组即第三组的筹建从1月拖到3月，迟迟招募不到足够的人。

王光祈在构建工读互助团时，特别设计了女子组的存在，他说，新社会渐渐萌芽之际，倘若拒绝妇女的参与，“我恐怕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女同胞都要同声一哭”

正因此，他物色了张人瑞、田维等女子高师学生，作为第三组联络人，并于1920年1月17日，在《晨报》以《女子工读互助团快成立》的标题，刊载广告。这则广告宣称，“成立伊始，团员大概只十人至十五人，有志入团者不可不先行向该校发起人接洽，以免额满是遗”。然而，招募广告发出去后，北京本地的女学生询问者甚众而响应者寥寥，最后确定参与的只有五六人。组织者冰如在《第三组的经过》一文中，写道：一个月来，到女子高师来报名的也有二十多人，“但对于‘工’、‘读’两个字，有点把握的不过两三人”；而其余成员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贫苦人家的女孩子。“穷贫的人以为这是个慈善事业，像女子职业学堂。女儿在家里横竖吃白饭，不如送到团里去吃几年饭.....”

而贫苦女孩子之外，来的还有几个时髦的太太，大多受过新式教育。听说工读互助团是“女子解放的先声”、“谋自由独立的好机会”，她们纷纷前来报名。但，“听说要在团里住，洗衣煮饭都要自己做，读书做工都有一定的时间，他就不愿意来了”。

最后，还有一些考不进女子高师的学生。“（她们）听说团员可到女高师入学，就要来入团，做个晋身的阶梯，想得到个‘女学生’的美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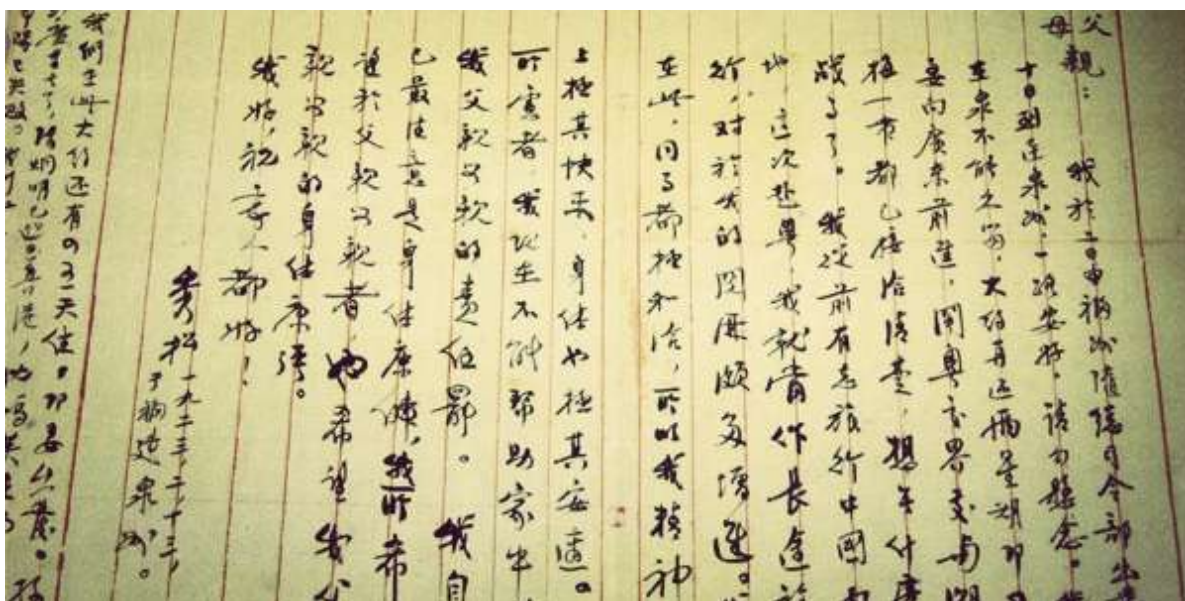
除此以外，也有一些写信来，立志要千山万水跋涉而来的女子，以为这是人生挣扎自立的机会，但冰如又担心这些女子出门的安全问题。经过两个月筹备，只招收到五六个团员。

参与工读互助团的女子中，以两位最为有名，其一为抗争包办婚姻而从家中出走的国会议员之女易群先，其二为有中国最早女共产党员之称的缪伯英。

三脱离引发的风波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成员，于1920年1月上旬到齐，然后开会研讨落实此条款。激进的会员们甚至提出要相互监督做到三脱离，以此为革命的验证。

组员俞秀松一到北京，就写信给家里，宣布脱离家庭关系。俞秀松出身书香门第，其父俞韵琴是浙江诸暨有名的教育家，是清朝末代秀才，曾担任过清末知事府老师，1917年起担任诸暨师范讲习所的所长。论起来，他们家算是开明家庭，然而，为了自己的信仰，俞秀松毫不犹豫。他的同乡好友施存统，因为《非孝》一文，与家庭的关系算是早已破裂，因此也不存在障碍。



1923年2月13日，俞秀松于泉州写给父母亲的信

在这样一个强势主导的群体里，这些条款被一丝不苟地拿出来讨论执行，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舍得公开与家庭割裂。施存统记录，组员第一次开会，因为商议是否实行团体内共产，就退了五个，其后集体讨论是否要与家庭脱离关系，又走了三人。有走的，也有来的，其后又有六人加入进来，形成了思想统一的团队，无论共有财产、脱离家庭、脱离婚姻、脱离原有学校，均步调一致。

施存统由此写道，“这几个问题解决后，精神上很有几天愉快。我们那时以为，我们的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

一本糊涂的经济账

第一组在实现了三统一之后的一段时间，白天努力工作，晚上讨论“主义”，日子可谓充实而有趣味。此时他们的情谊甚好，甚至衣服都集中放到了一起，洗干净的衣服，谁喜欢便穿了去。领到开办资金

后，购买物资、粉刷食堂墙壁这些活，大家都抢着干，这是1920年的1月。

到了1920年2月，第一组便因为经济问题陷入困境。第一组的营业，分为电影、洗衣、印刷、食堂、英算专修馆五种。但一个月经营后，团员们发现，除食堂与英算专修馆，其余三种均为亏损。其中，电影放映业务主要在各高校进行，初期各校学生捧场，生意不错，一个月后即告亏损。而印刷业务生意冷清，洗衣业务完全竞争不过街上的洗衣店。

而对于第一组有重要意义的食堂，地址在北大沙滩校区附近，以北大师生为主要顾客。一开始，这个名为“俭洁”的食堂生意兴隆；它只有三间房子、五张餐桌，于是，两个多月后食堂扩大规模，“另租两间房子，增添五张桌子”。就是这次扩张带来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团员们很快发现，“生意既不发达，开销又比前大”；而十几天以后，“每天要亏本一元五角”。餐馆的亏本，很快将第一组带至泥沼，因为参加餐馆经营的学生是最多的，多达8人。

唯一赚钱的就是英算专修馆业务了，投入仅两元，却赚了75元。由此证明，补习到现在也是大学生最稳妥的勤工俭学方式，实在是经久不衰。

不仅是第一组，其他组的经营也出现了类似问题。王光祈为之设计的独立创业模式，遭受了市场的冷雨袭击。

关于经济模式的不成功，熟读马克思理论的戴季陶在当年5月1日的《星期评论》中专门撰文，认为“工读互助团遇到的问题，就是当下手工业者遇到的问题”，在市场上还有大量失业人员的情况下，劳动者只有不断延长工作时间，才能继续保持他们的饭碗，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是互助团成员的学习时间不足，他们只有不断地延长工作时间。

批评与效仿

在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胡适在一次演讲中，直言批评工读互助团脱离了初衷，称其“只有做工的苦趣，没有工读的乐趣”，“对于家庭、婚姻、男女、财产等等绝大问题，都早已有了武断的解决，都早已定为成文的戒约了”。

胡适认为，“工读主义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

北京工读互助团虽然有17位名人教授作为发起人支撑，但除了初期的募捐外，真正参与到其中的寥寥无几。每个人对于工读互助团的构建都不一样，胡适先生的构建计划，完全是一个美国式的青年工读计划，与社会改良无关。而王光祈等人的构建，则完全建立在构造一个新社会的基础上。这必然导致两者的意见分歧。

如此华丽的知识分子后援团阵容，竟然没有给工读互助团提供一个完善的教育计划，实是这一工读试验中的败笔，必然让那些为读书而来的青年失望。而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必然是缓慢的，因而又让那些为理想而来的青年失望。

或因如此，1920年2月，因驱张（“五四”运动时期，湖南学生发动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第二次到北京的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女子工读互助团，后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成绩如何，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

但毛泽东和许多署名人一样，一边虽已不看好，一边又兴致勃勃地进行新的构思，“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



1935年，“北京工读互助团”早期成员张申府全家在照澜院9号合影

这一年春天，前来考察北京工读互助团的还有恽代英，他回到武汉后，将“互助”、“日新”、“健学”诸社的骨干联合，成立利群书社，并写下《未来之梦》一文，在文中他大力鼓吹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书社以外，我们要在乡村中两三年内另立一个根据地……索性丢了书社，干干净净为他谋个结束，大家用全力到乡村的事业上去，将来再图个卷土重来之计。”

在1920年短暂的春天，许多人沉浸在工读互助团所构想的这个美丽新世界中，哪怕明知道是一个梦境，也愿意花费他们人生中不多的时间，参与构筑这个梦。

风波与时局

从家中逃婚而出的易群先小姐，既美丽又活泼，用施存统的话说就是“所有的男生都爱她”，初时，是工读互助团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至2月底，易群先小姐坦率地告诉了施存统，她与何孟雄相爱了。这一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第一组的分裂。第一组中有人认为何孟雄是欺骗女子感情的败类，要将他从团队中驱逐出去，因为施存统和陈公培为何孟雄说好话，又要把他两人也驱逐出去。此事的结局是易群先小姐对工读互助团大失所望，去了天津。第一组从此兄弟反目，以前的和谐气氛荡然无存。

顺便提一句，何孟雄此后与工读团中另一女子缪伯英修成正果，1920年3月3日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遂介绍缪伯英加入。1920年10月，他俩共同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缪伯英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秋两人结婚，并将位于景山南路的住处充当中共北京党组织的联络点。



何孟雄与妻子缪伯英合影

1920年2月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李大钊送陈独秀逃离京城。

2月底，陈独秀到上海后，正遇上尝试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的王光祈，当时毛泽东在外地，但听说此事后，愿为发起人。1920年3月5日，上海《申报》刊登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公布《上海工读互助团简章》，共有24人署名，包括陈独秀、王光祈、汪孟邹、张国焘、宗白华、左舜生、毛泽东等人，宣告上海工读互助团成立。

除上海外，广州于3月22日成立了女子工读互助团，武汉、南昌、天津、扬州也先后出现工读互助团或类似组织，而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办的工读互助团，毫无例外朝着两个方面滑落：要么成为空谈主义的社团，要么成为普通的勤工俭学团，前者在数月内解散，而对于后者，知识界也痛心疾首：“这样无益的团体，何不速解散。”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破灭

1920年3月，俞秀松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离开工读互助团，他在3月写给骆致襄的信中说：“我和存统两人做事，想急进一点，认这个‘工

读互助团’不是久长之处，所以我们决计就要离开此地，到别的地方去了。”又说：“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俞秀松为何急着离开工读互助团，固然易群先事件破坏了第一组的团结是原因之一，第一组经济率先崩溃是原因之二，而认识到工读互助团并非实现其理想的平台才是关键原因。



俞秀松被捕后，他的爱人前去探视。他勉励爱人说：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要革命就不要怕杀头。革命者是杀不完的，为革命献身是光荣的。

壮哉俞秀松 辛卯年春月 張廣敏敬录



俞秀松纸本素描肖像（作者：骆根兴）

加入工读互助团之初，俞秀松在给父母的决裂信中写道：“我来的目的是，实验我底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而经过动手实践后，他已意识到工读互助团的实践绝不可能实现他的宏大理想，从而产生了“速去”的念头。

第一组于3月23日开会，讨论了第一组的出路，并决议各人自找出路。第一组就这样解散了。对工读互助团执念最深的施存统，因患上肺病，无力再将第一组支撑下去，遂与俞秀松同时前往上海。5月，两人共同参加了陈独秀主持的上海共产主义研讨会，并研讨建党纲领等。1920年6月，施存统在戴季陶的援助下前往日本养病和留学，随身携带的，还有暂命名为“社会共产党”的纲领。

在此风云变幻的时局中，北京工读互助团各组陆续偃旗息鼓，第二组、第四组陆续解散，而第三组女子工读互助团虽然成员艰难，但胜在坚韧，为四个小组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组。一直坚持到1920年10月底。

工读互助团解散后，施存统写有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记叙和检讨工读互助团的得失，他不同意发起人王光祈所说的，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是因为人急功近利的原因。作为主要的实践和总结者，施存统总结说：“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根本上谋全体改造，枝枝节节改造一部分是不中用的。社会没改造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与北京工读互助团各组的陆续解散同步的，是北京时局的变迁。1920年中国时局，包括孙中山讨桂、安福系倒阁、湖南驱张、滇桂派冲突、曹吴讨段，以及护法运动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动乱，国际上，则有苏俄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加强对华合作，以及美国镇压美国共产党等新闻。

毫无疑问，时局中每个有志于为中华而奋斗的小个体，正在因为这一系列事件而不断作出和修改他们的奋斗轨迹，由此产生向左，向

中，向右的激烈分化，许多青年由此选择更为激进的社会改良模式，由无政府主义转化而来的工读互助团的寂落散场在所难免。

工读互助团的少年们走得毫无留恋，只留下发起人王光祈黯然神伤：“忽忽半年，毫无建树，清夜思之，汗如雨下。加之一年来无暇读书，思想破产，直欲赴郊外放声痛哭一场。”



在这里记录中国



关注信睿微信 了解变化的中国

我们的历史 our history



雾霾百年 谁在谋杀我们的空气

新历史合作社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

新历史合作社出品

《我们的历史》总第8期

主编：唐建光

购书平台：多看阅读、亚马逊、掌阅、拇指阅读、字节社
豆瓣阅读

互动平台：

新浪微博：我们的历史-OURHISTORY

腾讯微博：我们的历史

公众微信：我们的历史

联系我们：

编辑部：010-57423216

传真：010-84084564

邮箱：ourhistory2013@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8号（附图）



杂志 北京公共文化客厅

● 杂志客厅 ● 入口 ● 停车场 ● @杂志客厅

①15001023414 ②zazhisalon@163.com

关于我们

我们的历史
our history

“我们的历史”是新历史合作社推出的历史产品品牌。由这本数字杂志开始，您将会看到以“我们的历史”为统一品牌的网络产品、图书产品、活动产品、纪录片、电视节目，以及微信、微博等多种媒体形态呈现并传播的历史内容。

从纸张到电子，从文字到影像，从眼睛到心灵，无论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的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新历史合作社

我们关注历史，我们致力传播；我们执着真相，我们求索答案；我们回望过去，我们前瞻未来。

这是一个专注于历史记录与传播的同人平台，欢迎您的关注、参与和加入。

联系我们：

新浪微博：我们的历史-OURHISTORY

腾讯微博：我们的历史

公众微信：我们的历史

编辑部 010-57423216

产品部 010-57423217

市场部 010-57423218

传真 010-84084564

公共邮箱：ourhistory2013@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8号

目录

雾霾百年：重新呼吸的城市

马斯河谷：追寻空气杀手

多诺拉：被烟雾淹没的小镇

洛杉矶：雾锁六十年

伦敦：“雾都”摘帽记

四日市：让公害成为公敌

PM2.5与中国空气保卫战

中国故事

雾霾百年： 重新呼吸的城市



《智子入浴》，1972年，尤金·史密斯摄。这张照片拍摄的是患有“水俣病”的智子，该病是最早出现的由于工业废气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深刻反映了化学工业污染对人类的危害。

雾蔽天空，霾锁人间。

雾霾，在历史上曾经是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大文豪狄更斯，以伦敦大雾为背景写下传世之作《雾都孤儿》，主人翁奥利弗的命运正如伦敦上空的雾霾一般，悲欢聚散，历经苦难。

后来的故事，却一如雾霾那样阴沉。1952年岁杪，震惊全球的伦敦烟雾事件，仅4天就致使4000多人丧生，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又有超过8000人因呼吸系统疾病或其他诱发疾病失去生命。伦敦人为了日夜依赖却大意忽略的空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自地球之始，空气就与生命相依相伴。然而直到两三百年前，人类才发现空气的秘密；直到百许年来，才发现这无色无味中也潜藏着危险；而直到近几年，PM2.5这个隐形杀手，才出现在中国人的词典里，一瞬间家喻户晓，闻之色变。

林立的工厂，奔驰的汽车，沸腾的工地，给人类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危险。从英国伦敦到比利时的马斯河谷，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到东部小镇多诺拉，一直到日本海滨的四日市，雾霾如影随形般地跟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步伐，似乎挥之不去。

1968年，日本，60岁的四日市居民大谷彦一郎在自家加工厂上吊身亡。当家人翻看他的日记时发现这样的语句：“很遗憾啊，虽然我很想呆在家里，但那里环境实在呆不下去。”而直到此时，四日市的居民们发出了“还我碧海蓝天”的呼喊，并在漫长的抗争后，让碧海蓝天重新归来。

同样的故事，在一个个国家，一个个城市，往复上演。

今天，我们在雾霾中驻足回顾，回顾这些曾经同样湮没在浓雾中，而今重新迎来碧空蓝天的一个个城市，希望能够穿透重重迷雾，通过他们的苦痛与努力，挣扎与博弈，让艰于呼吸的我们，看到重见天日的光亮。

马斯河谷： 追寻空气杀手

文/徐畅

1930年的冬天，比利时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造成了几十人死亡。这一事件也成为欧美工业化以来，空气污染可以成为死亡和疾病的潜在诱因的最早证据。

生命的悲剧

1930年12月1日，星期一，比利时大部分地区以及荷兰都被一场浓雾所笼罩，其中，马斯河谷的雾尤其浓厚。马斯河发源于法国香槟——阿登大区，从比利时东南部的列日市穿过，然后向北折流。



1930年，马斯河谷区域内的大量工厂排放工业烟雾。

由于当地正值隆冬，气压较高，白天的气温可以勉强维持在零摄氏度以上，到了夜里气温则更低。同时，当地基本上处于明显无风的情况。这场大雾迟迟未能散去，在马斯河谷中持续到星期四下午，然后消失，星期五又出现，最终在星期六消失。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这场雾在靠近列日城南的山谷中特别浓厚，而在那里，河谷烟雾的高度始终没有超过两岸高地的边缘。

对于列日的民众来说，星期一和星期二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到了星期三，奇怪的事情发生了。12月3日，大约正午时分，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陆陆续续出现异常，医院诊所的医生们开始忙碌起来，从中午忙到晚上，一直忙到第二天白天。许多病人因鼻、口、咽喉、气管和支气管受到刺激而感到不舒服或者是疼痛。医生们发现，所有的病人都发生了呼吸道黏膜红肿的症状，而且红肿现象还在不断向身体的更深处扩散。此后，有专家学者对患者进行检查，发现该现象扩散到了支气管的大支而没有扩散至小支。在这些患者中，大部分存在剧烈咳嗽的现象，带有像哮喘一样阵发的、重呼气的特点，有部分病人的呼吸频率超过了每分钟40次。部分重症患者呼吸急促且

困难，与之伴随的是脉搏过快、脸色苍白、四肢发冷、出汗较多，甚至出现浓咳痰症状。病人恶心和呕吐的现象很普遍，但没有系统的中毒迹象。

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63位病人相继死去。到12月6日，星期六，烟雾散去，没有出现新的死亡病例，也没有出现任何新的患者。与此同时，那些依旧活着的患者迅速康复，几天后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病征。在接受治疗的重症患者中，没有人存在肺炎的症状，通过临时性的注射肾上腺素使病情得到缓解。同时，医生还为他们注射了强心剂，但是当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在家接受护理时，这一举措收效甚微。

在大雾弥散的那五天，究竟有多少病人发病无法确定，但曾有记载，一位医生在星期四共探访了69位病患者。在那些重症病例，尤其是至死的病例中，尽管许多都是老人、哮喘病人、支气管炎患者和心脏病患者，但依旧可以确定，之前从未得过病的年轻人也会在这场大雾中变得病重，而且其他正常的健康人也因脖子和喉咙受刺激而呈现病征。当时的报纸列出了48名死亡的患者名单。其中，死者年龄从20岁到89岁不等，但平均年龄为62岁。27名男性遇难者比21名女性遇难者年轻，前者的平均年龄为56岁，而后者的平均年龄是70岁。短短几天内，63人丧命，这样的死亡率是正常时间的10.5倍。

值得注意的是，大雾笼罩着列日城、马斯河谷以及周边地区，但是这场灾难所造成的病情只发生在长25公里、宽1到2公里的列日南部地区。在该区域内，人口密集的列日城本身并没有受到烟雾影响，位于河谷西南部的休伊地区只有少数病患，且无死亡案例，而相较之下，列日以南20公里处，人口仅为3500人的昂日地区的病患最多。从死亡区域的东西分布来看，有45例发生在马斯河谷的东北端，其他18例位于中部的昂日；从南北分布来看，45人死于河谷北岸，18人死于河谷南岸。

与人类的悲惨遭遇一样，无数家禽和牲畜也无法躲避这场劫难。平时在牛棚里安静吃草的牛感觉非常不舒服，它们也不幸患上肺气肿

和口腔黏膜疾病，病情严重的甚至直接死亡。同时，当地人还发现，那几天，鸟和田鼠也有死亡。

马斯河谷的列日

一场持续几天的大雾，竟然让60多人死亡。这不仅让比利时人震惊，也让整个欧美社会大惊失色。为什么这样耸人听闻的事件会发生在一个小国。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惨剧发生地列日以及比利时的历史发展情况。



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当地居民行走在浓烟弥漫的马路。

列日作为中世纪以来形成的以教会为中心的城市，所在的这一区域起初并不吸引人。但是，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其北部边界地区丰饶的矿藏、森林以及水力资源所具备的重要开发价值逐渐被人们发现。

从历史上看，包括采煤业在内的矿业是列日较早的产业。有学者指出，当地采煤业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12世纪。其煤矿如果算不上欧洲大陆第一个的话，可能也属于最早的一批。因为马斯河及其支流的向下深切作用，当地的石炭纪岩层得以显露，这极大地推动了矿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作为当地最著名、最核心的产业，冶金业在列日具有独特的地位。早在19世纪，列日及其周边就以高水平的金属锻造

工匠而闻名。这些工匠利用当地丰富的煤和木炭，为欧洲市场生产提供多种多样的商品，包括铸铁件、钉子、锁、钥匙、刀具等，此外，各式各样的武器也让这座城市熠熠生辉。20世纪以来，随着周边地区煤铁资源的输入，列日的冶炼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列日大约每年生产120万吨铁、130万吨钢，这些产品约占比利时钢铁产出的27%。

在列日，人类的活动主要集中于河谷地区，尤其是马斯河谷。该河谷是马斯河蜿蜒于列日与西部小城休伊之间24千米长的一段河谷，总体上呈西南至东北走向。马斯河谷中部低洼，与两岸高山的相对高度达一百多米。这样的高山峡谷让人们生出一种狭窄感。然而，正是在这种狭长的空间内，由于两岸高山与河漫滩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点非常少，诸多工业化以来城市的元素，尤其是重工业，像填鸭一样被塞了进来。炼油厂、焦化厂、炼锌厂、冶金厂、玻璃厂、化肥厂、硫酸厂、发电站、煤矿以及众多遭到破坏的滩涂、尾矿库等，都挤在这窄窄的马斯河谷。此外，这里还有通向布鲁塞尔的铁路、公路以及附近工厂工人居住的房屋。

从列日的工业发展轨迹中，可以窥探出比利时整个国家工业化水平。实际上，作为欧美世界仅次于英国而较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比利时拥有较为完善的工业基础和雄厚的工业实力。截止到1870年，比利时就已经建成了3000公里的铁路，成为当时世界上铁路网最稠密的国家。因此，到19世纪90年代，当我国的晚清政府访问欧洲的薛福成外交使团在比利时参观了工厂、企业，考察了当地工艺制造后，也纷纷将其实业之发达记录下来。鉴于比利时当时工业先进水平，清政府于20世纪初选派了大量学生赴比利时留学，其中，列日因其工业活动长久以来闻名于世而成为留学生主要的目的地之一。

1930年5月至11月，为了庆祝国家独立一百周年，也为了进一步开展国际贸易，比利时承办了世界博览会。在这世界工业发展的盛会上，为了更好地展示本国工业发展水平，比利时将展示实业内容的会场定在列日。会场中，在煤、铅、锌等传统工矿业产品之外，比利时将其橡皮、化学、玻璃等新兴工业产品搬上展台，以见证当地，尤其是交通便利之列日的发达工业。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世博会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马斯河谷的这场生命悲剧便悄然上演。比利时开始承受工业化带来的伤害。

大雾如何杀人？

大雾如何杀人？这场致命的大雾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很多高级官员，包括比利时女王伊丽莎白都走访了受灾害影响的地区。这一事件被很多国家的医药学和科学期刊报道。

为了弄清楚该事件的原委，当地政府很快就行动起来，比利时政府先后拨款25万法郎用于相关调查。12月6日，也就是大雾消散的那天，列日的皇家检察官迅速启动了一项司法调查，成立了一个包括列日大学的病理解剖学和法医学费克特教授在内的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还有毒理学、病理学、气象学以及工业化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马斯河谷工业区远景，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居民区紧邻工厂的布局。

经过若干时间的调查研究与分析，该委员会最终完成了一份报告。由于列日地区通用法文，所以该报告以法文呈现。该报告在1931年5月19日被提交至比利时皇家医学院，后来又作为一本关于空气污染著作的一部分于1933年出版。其英文版也在1936年3月发表，但与原始版本相比略有删节。

该委员会成员在地方检察官的帮助下对部分死者尸体展开了解剖检查。大约有15具尸体被加以显微镜和光谱的血液分析，他们的所有器官也得到了毒理学分析。结果表明，所有解剖的人体中都存在气管粘膜和大支气管堵塞的现象（有时还伴有黏液和纤维素的分泌液），上皮缺失，真皮的毛细血管扩张，还有些微的白细胞分泌物。死者肺部的显微切片显示，直径为0.5至1.35微米的纯碳颗粒被发现游离在肺泡中，或者被淹没在多核的白血球中。除了呼吸道内壁受到刺激性化学物质损害外，死者其他器官和组织并没有毒物效应。

从气象学的角度，委员会的气象学专家做出了自己的分析。12月1日到5日，当地受到高压控制，一直都是反气旋的天气。尽管有东风，但风力十分微弱，空气流通的速度最大值为每小时1至3千米。这股若有若无的风从列日吹向狭窄的马斯河谷，将来自列日城和河谷下游地区大型工厂的废气缓缓散入狭窄的河谷。河谷的两端是90~120米的山岗。这些条件使大雾持续的时间更久。大雾中的气温是1至2摄氏度。但距离地面70至80米高的气温却更高，由此产生的逆温现象阻止了烟雾的上升与扩散，而这个高度恰恰比马斯河谷中最高的烟囱还要高。于是，在如此气象条件下，这一大气“屋顶”便强迫河谷排放出的废气和杂质在列日和休伊之间的河谷走廊中聚集。根据撰写报告的作者计算，在被水汽浸泡且全然不动的大气中，直径为1至4微米的烟尘颗粒会花费1.5至6天的时间从60米高空沉降下来。小且慢的固体和液体沉积物很容易被吸入，不仅是在雾中，在室内也是如此。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生病和死去的人都是没有离开房屋，甚至不下床的人。有资料显示，当地大雾持续三天以上的现象在此以前的40年中只出现过5次（1901年、1911年、1917年、1919年和1930年）。其中1911年1月的大雾中，一个与马斯河谷垂直的小河谷中有牲畜死亡的情况发生。

确定了灾难爆发的天气和地形原因，人们便开始考虑究竟是哪些物质给身处当地的人们带来伤害。来自荷兰莱顿大学的斯多姆·范·莱文教授曾亲赴灾难现场，向当地民众了解情况，同时对事件爆发原因提出自己的看法。针对灾难爆发时当地人传说的缺少氧气、战争毒气、天上降下撒哈拉沙漠的沙土等解释，莱文教授一一予以否定，并且指出，大雾本身致病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因为他自己生活的荷兰海边，

有时会持续出现好几天的浓雾，但是这些浓雾并不带来疾病。他对当地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发现河谷地区遍布锌、过磷酸盐以及其他的重工业，这就说明了在没有其他刺激性物质的情况下，即使是处于平常环境中的空气为什么依然含有二氧化硫和氢氟酸。他发现，由于土壤中的酸性物质过多，邻近地区已经不能耕种和放牧，不少牧民因为这个原因从工厂主那里获得了赔偿。同时，在马斯河谷中的一部分地区，电灯失去透明度的速度似乎比其他地方更快，并且居住在河谷，尤其是昂日附近的部分居民已经意识到了空气中的刺激性物质。他说，有些病人“闻不出空气中特殊的味道，毫无疑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已经对附近的气味习以为常。当我之后走过邻近地区时，我可以非常清楚地闻到异味，比如，二氧化硫。”

莱文教授的调查研究为事件真相的挖掘提供了线索。作为政府资助的委员会，专家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当地工厂排放了异常的有毒化学物质。因此，研究人员唯一的选择就是去测量烟、气体以及这一地区工厂中排放的灰尘。他们锁定了27家工厂排放的大约30种物质。根据排放数量的最坏状况和受影响人群的症狀的计算结果，大多数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氢气、硫化氢、砷化氢、二氧化氮、硝酸、氨气、氯化氢、乙炔，以及其他碳水化合物、硫化物、氯化物、氟化物、硝酸锌和硝酸铁，都被排除了。然而，“发生在上至呼吸道下到细支气管和肺实质的粘膜表层阻塞的现象，却可以归结为细微刺激性颗粒的影响”。肺泡中游离的和被吞噬的微粒显示，它们是在死者遇难前不久被吸入的。然而，碳微粒应该是无毒的，除非他们吸入了刺激性的酸。撰写报告的专家因此猜测，“刺激性气体被吸附在细微的烟尘微粒上，而这些微粒在大雾制毒功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研究人员尝试着去寻找最不利于健康并引发死亡的刺激性物质。他们最先调查了氟化氢，因为这种物质从昂日的一个化肥厂排放出来，此前曾影响过植物和食草牲畜，毁坏过灯泡和窗框。然而，学者们估计的氟化氢的最高浓度（整个河谷中的浓度是0.4毫克/立方米）和昂日地区上下风向首发症状的同时发生，则意味着当地不可能只存在一个污染源。尽管如此，氟化氢仍旧可能是工厂周围事故的诱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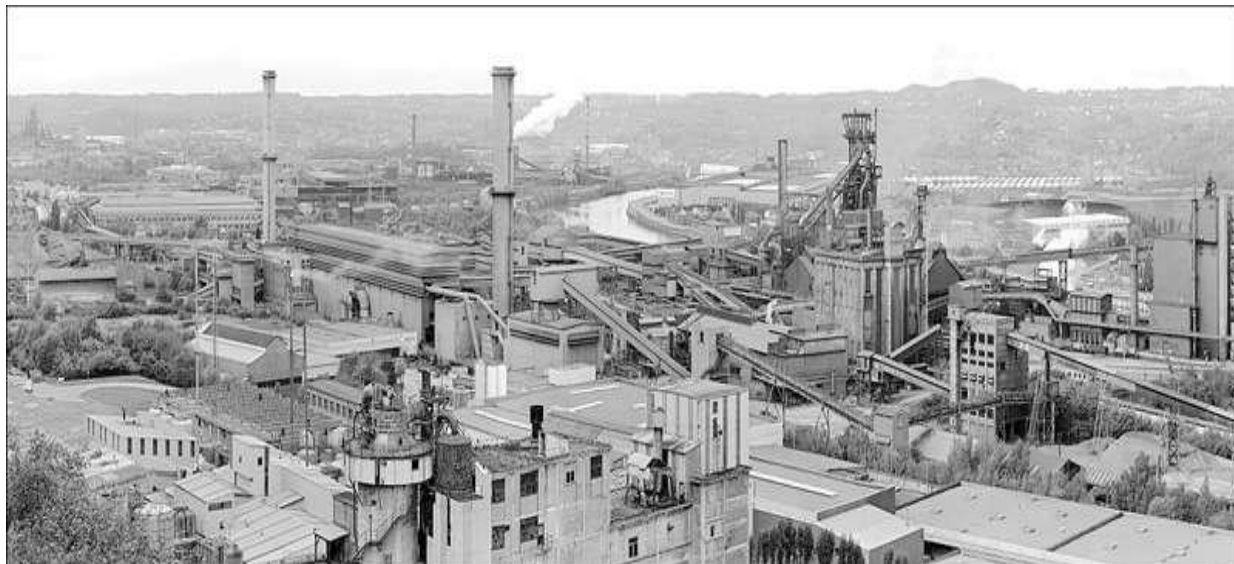
最后，研究人员证实，硫化物在河谷中被排放的量最大。研究人员假设每家每日消耗15千克煤，而煤炭中硫的含量是1%，在此基础上，估算工业和居民用火燃烧煤炭的数量。结果显示，每天会有超过60 000千克二氧化硫产生，四天大雾后，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浓度就会上升到每立方米100毫克。该二氧化硫浓度已经超过了它的毒性阈，即长期暴露在浓度为每立方米20至30毫克二氧化硫的大气中，这样的浓度已经能够诱发受害者的症状。更何况，还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二氧化硫被氧化，因此毒硫酸的浓度（假设为每立方米4毫克）也会超过其毒性阈。撰写报告的专家指出，人口增长过快和工业的发展已经使硫化物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其中1899到1931年间新鲜降雪中的二氧化硫含量增加了十倍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从死亡和重度受伤人员的地理分布的角度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在马斯河谷的尽头靠近列日的地方，二氧化硫的浓度比靠近休伊的另一端要高，而恰好前者的工厂和私人住宅的数量都比后者多。

经过一个连续的排除过程，委员会确认“煤炭燃烧产生的硫是有毒的，不管是以二氧化硫还是以酸的形式，或者是以硫酸的形式；这些物质的产生只有在特殊的天气状况下才有可能”。

马斯大雾灾难为人们提供了毫无争议的证据，证明了空气污染可以杀人，从而引起了科研机构相当大的关注。由于条件的限制，当时成立的专家委员会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较多失误，这使得其研究的可信度遭到了其他专家学者的怀疑。很多人认为将这一灾难的发生归结于某一种物质是不对的。包括莱文教授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倾向于气态氟是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当然，他们提供的证据也不够充分。而历史的真相还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探索。

在马斯河谷灾难发生后，政府还任命了另外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一位子爵领导，主要工作是评估与空气污染有关的立法情况并提出改善建议。该委员会认为，应该由一个全盘负责的办公机构而不是当地政府来为工业开采颁发许可，并以此方法来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在一本关于马斯灾难的书中，作者建议采用英国的空气检测方法。然而，当空气污染被认为是经济和工业繁荣的必然后果时，人们几乎不会采取怎样的改善措施，因而只去享受工业发展带来的权益而

忽视本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虽然报告中已经明确表示马斯河谷的空气污染会持续很久，但空气污染导致慢性病的可能性却迟迟没有被加以考虑。空气污染引发的疾病在很多年后才被纳入研究范围。



现代马斯河谷工业区旧址，可以看到保存至今的钢厂建筑。

在马斯河谷事件过去四十年后，1972年9月，一场大雾天气的污染事件导致昂日和其周边的几个村庄的人们呼吸系统出现问题，而且据传有家养牲畜死亡的现象出现，此外，还有200多则民众的抱怨被记录下来。

1930年，欧美世界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此时的人们正忙着加快工业品生产，以摆脱危机的束缚。他们并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关注自己对于身边环境的破坏。然而，被大雾和各种污染物悄然掩盖的马斯河谷给无知的人类教授了第一堂关于环境保护的课程。自此之后，这样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费克特教授领衔的委员会专家在提交的报告中提醒道，如果伦敦也发生与马斯河谷类似的灾难，那么该地的死亡率将会在现有数据基础上上升10.5倍，伦敦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197人。很显然，那些专家们的预测并不准确，因为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从而成为空气污染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事件。

参考文献：

Anonymous. Fog on the Meuse[J]. The Lancet, 1931, 217: 302-303.

Benolt Nemery. The Meuse Valley Fog of 1930: an Air Pollution Disaster[J]. The Lancet, 2001, 357: 704-708.

Elkins T H. Liège and the Problems of Southern Belgium[J]. Geography, 1956, 41(2): 83-98.

Firket J. Fog along the Meuse Valley[J]. Transactions of the Faraday Society, 1936, 32: 1192-1196.

梅雪芹. 和平之景——人类社会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郑焱 王水卿. 中国与1930年比利时世界博览会[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95-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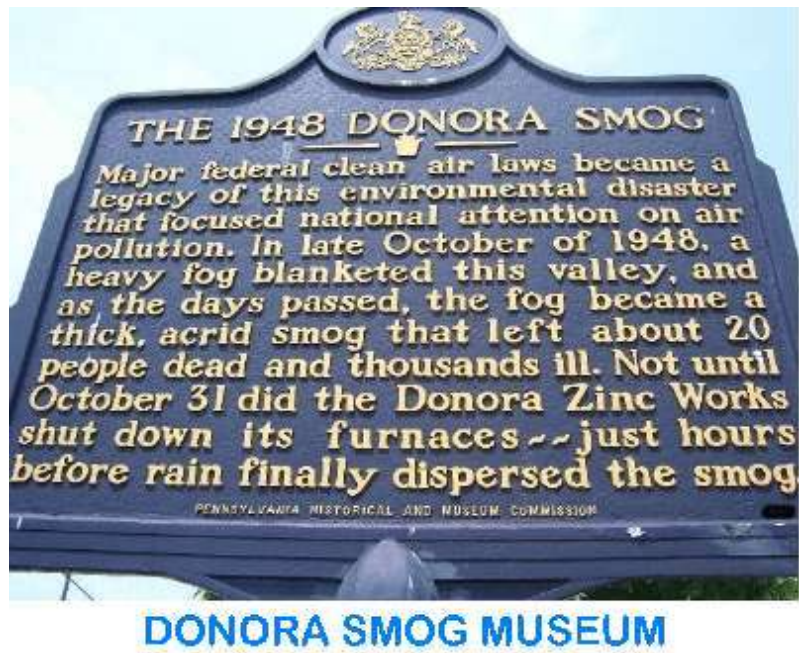
潘越. 中国近代留学比利时研究（1903-1949）[D]. 广州：暨南大学，2012.

多诺拉： 被烟雾淹没的小镇

多诺拉人不得不做一个选择：“这不是煤灰，叫金粉。‘只要工厂开工，小镇就一片兴旺，这是你爷爷和你父亲的收入来源。没有人会去问是否正是它使许多人病倒，人们先得吃饭啊……今天他们可以把它称为污染，但在当时，这只是谋生的一种方式。”于是，大多数多诺拉人面对污染都选择了默默承受，即便1948年的烟雾在6天里就杀死了20人并让小镇1.4万人中的6000多人生病。

文/刘宏焘

多诺拉（Donora）原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小镇，1948年10月以后却因一起空气污染事件而闻名于世，“多诺拉烟雾事件”亦成为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而载入史册。1998年，多诺拉烟雾事件50周年纪念日前后，一位名叫贾斯汀·肖利（Justin Shawley）的高中生促成了一块纪念碑的竖立。宾夕法尼亚州历史和博物馆委员会在原炼钢厂的中心竖起一块边长1.5米的方形青铜匾，以纪念死去的人们。为此，小镇的居民、当地官员和州政府官员在侍奉圣母玛丽亚的天主教堂举行了一个仪式。那块匾上刻着如下的文字：



“多诺拉烟雾事件”纪念牌。

“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这场环境灾难将美国人的注意力吸引到空气污染上来，它的一个遗产是促成了联邦空气洁净法令诞生。1948年10月下旬，一场大雾笼罩了这个山谷，并持续数日，大雾变成了浓密而有刺激性的烟雾，致使20人死亡，数千人患病。直到10月31日，多诺拉锌厂才关闭它的炉子——几个小时之后，一场大雨彻底驱散了烟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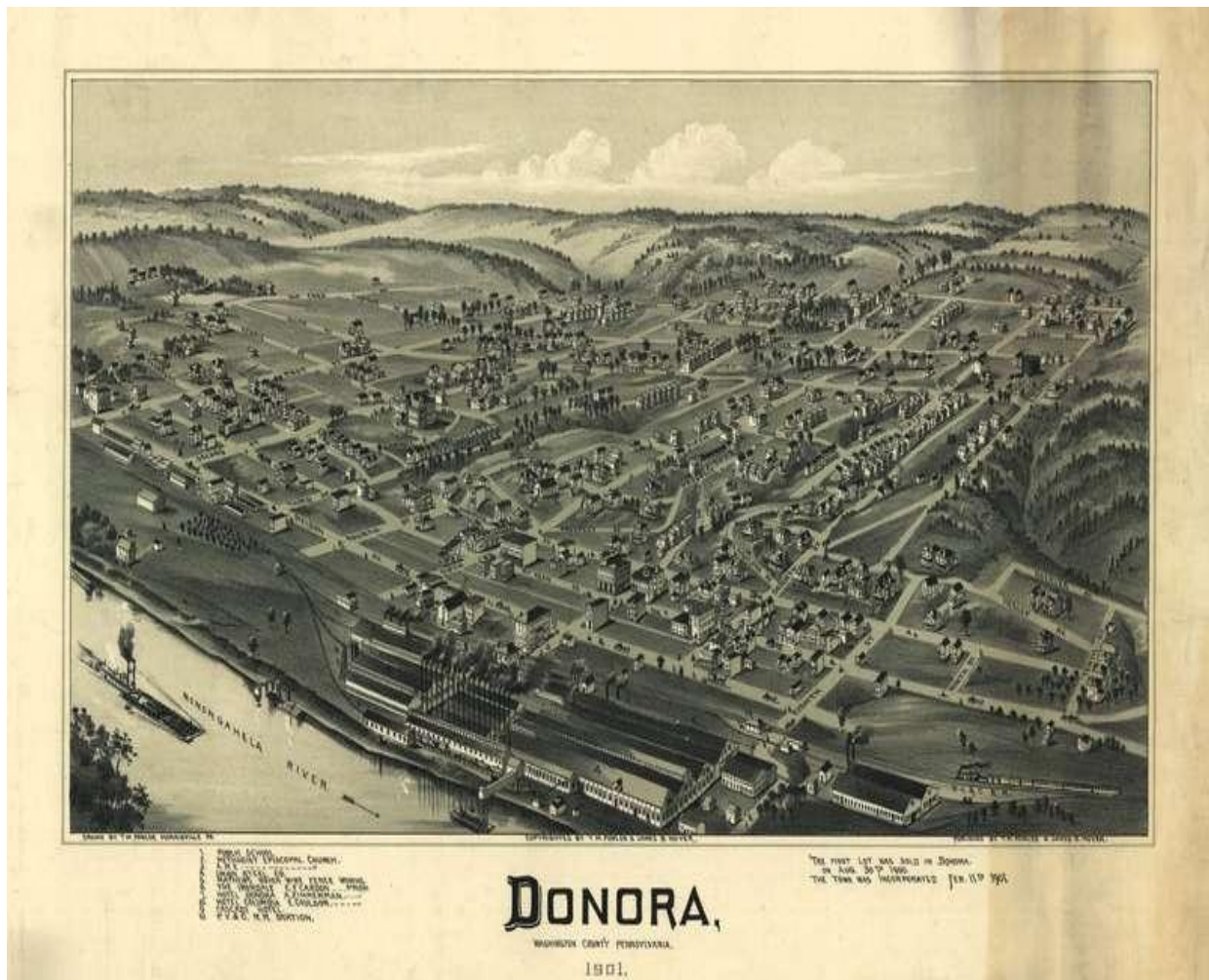
多诺拉的灾难在半个世纪后以这种方式为人们所纪念，然而这种有点轻描淡写的表述对于世人了解这段历史是远远不够的。

田园里兴起的钢铁小镇

多诺拉镇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南方25英里（约40千米）处，在莫农格希拉河（Monongahela River）河谷地带，被这条河的一个马蹄形河湾所围绕，四周环山。它起源于1863年，最初不过是莫农格希拉河边的一个小码头和小村庄，叫作西哥伦比亚。当工业革

命已将莫农格希拉河谷的其他地方变成世界最大的钢铁中心之一的时候，这里仍然是一派田园风光。

1898年，钢铁企业家威廉·唐纳（William H. Donner）看中了这块宝地，计划在这里发展钢铁工业。唐纳很快便展示出了他在工业方面的才能，获得了著名金融家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等人的关注和投资，组建了联合进步公司（Union Improvement Company），计划在这里建设一个新的工业城镇。到1901年时，一座新的工业小镇便在这里诞生了，它取名为多诺拉。“多诺拉”的命名颇为独特，是由威廉·唐纳的姓和安德鲁·梅隆的妻子诺拉·麦克马伦·梅隆（Nora McMullen Mellon）的名组合而成，即Donora。



1901年，宾夕法尼亚画报地图登载的多诺拉小镇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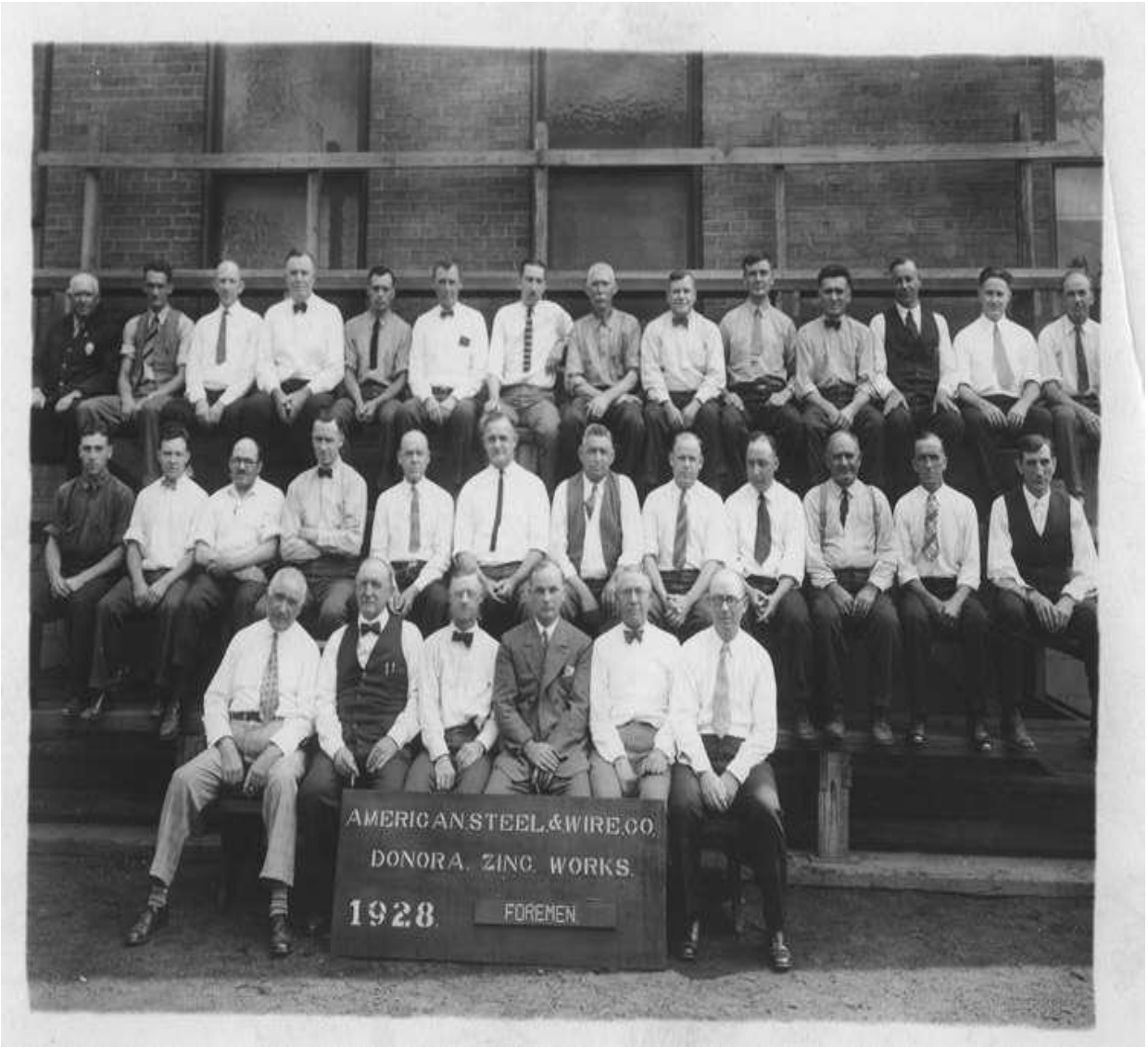
威廉·唐纳之所以会看中多诺拉这块地方，是因为从经济区位角度来看，它确实是发展钢铁工业的理想之地。首先，这里的水陆交通非常便捷，除了水路交通，还有从这里通过的宾夕法尼亚铁路、苏必利尔铁矿和阿巴拉契亚煤田的矿产资源可以很方便地运到这里；其次，这里水资源非常丰富，这对于钢铁工业的生产是不可或缺的；最后，它与钢铁之城匹兹堡市的距离比较适中，可以发展成为匹兹堡的卫星城，并有效地利用其资金、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当然这里也有局限，即地势狭窄、不够开阔，但是这块狭长的谷地也足以建设一座钢铁厂和若干相关联的工厂。



多诺拉鸟瞰图，可以看到工业区交通便利，电线厂沿着河道呈马蹄弯分布。

1901年，多诺拉镇作为一个自治的政治实体而在华盛顿县建立起来。是年，它的人口达到了4000人；而就在前一年，这里的人口仅400人，正式居民只有12人。人口的急剧增长，得益于联合进步公司建立的钢铁厂吸引了大批就业移民。除了工人，还有一些人来到这里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为工人提供饮食、衣物、燃料和保健服务等。工人们在工厂干完活后，还会继续他们的另一份工作，就是建造家园，为他们的家庭建一幢房子；工厂一流的机械工、制模工或焊工甚至有能力强建造3层的楼房，这足以装下他们的孩子、父母、祖父母，甚至一些刚来自中欧的堂兄妹们。镇上还建起了教堂和学校，很显然他们是要在这里定居了；不论是工人，还是商人，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着自己的“美国梦”。

就这样，多诺拉镇在工业的带动下逐渐兴旺起来。工厂特别是炼钢厂也支配着人们的生活，有些人在为工厂而忙碌，有些人则为工人而忙碌。在多诺拉，钟表似乎是多余的，炼钢厂发出的尖锐的汽笛声宣布着用餐、下课和召开家长老师联合会的时间。一有火灾发生，炼钢厂的长笛会通知人们小镇的哪片街区发生了火灾，并指出具体的街道号。



1928年，多诺拉锌厂工人合影。

1902年，多诺拉的钢铁厂建成了，到1908年时又增添了许多高炉。多诺拉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制钉厂”，在全球范围的家庭和建筑里都可能寻找到它们的踪影；多诺拉生产的电线也被用于世界各地供电系统的建设。

多诺拉镇作为钢铁生产地可谓兴盛一时，不仅生产了大量的钢铁产品，也理所当然地消耗了大量的原料。炼钢需要铁矿石、煤和石灰石，据当时多诺拉炼钢与钢丝厂的一本宣传册介绍，维持一天正常的

开工需要450吨铁矿石、400吨焦炭、60吨石灰石和60吨辅料，工厂每天烧掉的煤相当于匹兹堡所有家庭的烧煤总量。装载原料的大驳船顺莫农格希拉河而上，经由复杂的水闸的层层提升而抵达多诺拉，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所必需的原料。还有一些原料是通过宾夕法尼亚铁路的货运列车运来，其中阿巴拉契亚煤离此地并不远。

有了这些原料就可以生产了，在高炉炼铁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焦炭。在20世纪上半叶，多诺拉的焦炉相当简单，用耐火砖建成宛如巨型蜂巢的构造，把煤铲入焦炉，加热到高温，然后生成焦炭。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气和烟尘，人们以为它们都留在了焦炉里，而实际上它们都逃逸出去，弥漫于四周的空气中。炼焦过程每天还需要成千上万吨的河水来淬火，有人想出了用炼钢的废水来淬火的办法，节约了水，但与此同时也使得废水的毒性更强了。据当地的一位名为莱门多纳的太太说，在焦炉废水渗流区完全种不出西红柿来。

钢铁冶炼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和废渣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在这里生活下来的人们也几乎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些工业发展的副产品，或者说认为它们理所当然。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场景甚至会引来人们津津有味地驻足观看，据曾在多诺拉生活过的戴芙拉·戴维斯（Devra Davis）博士回忆说：“在夏日的夜晚，我们一家人会坐在后院草坪的椅子上，观看被称为‘渣壳’的东西喷出炽热的火光。将铁水从炉子运走的铁水包喷出明亮的燃烧着的碳料，宛如一颗绚丽的大宝石。炉子上方5个立式发动机一年到头不停地开着，从车间1200立方米的热气中抽气，并产生大量瓦斯气。当这些瓦斯气在炉子上方的烟囱燃烧时，加上微红的铁矿石和其他粉尘，在夜晚像火箭的尾迹一样光芒四射。景象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壮丽的火花雨、蔓延的火焰、炽热的粉尘等点燃了数千米的天空，形成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也时常让那些前往匹兹堡的人停下来观看。



多诺拉钢铁厂内，工人正在熔炉前操作。

众所周知，钢铁暴露于潮湿的空气中易于氧化而生成铁锈，通常要镀锌对其进行保护。1915年，多诺拉新建一座锌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锌厂之一。然而，它的生产设备已经过时，所使用的是体积庞大的烧煤卧式炉，而当时较为先进的电炉所排放的烟尘较少，而且不会产生大量的含锌有毒废气，但多诺拉的锌厂并没有采用这种先进

的设备。这个工厂的烟囱也很矮，只有45米，无法将废气排到工厂周围近200米高的小山的上空。

锌厂产生的废气大大加重了多诺拉的空气污染问题。1933年，据一位历史学家报告说，锌厂下风向山坡上的印第安人墓中的尸骨受到了废气的腐蚀，周围的青草也都枯萎了。锌厂雇用了大约1500名工人，这些人虽然平均每天只工作3小时，但是他们的健康却遭到了严重的侵害；他们在这里工作的时间都不长，没有人能干到30岁。

钢铁工业的发展给多诺拉镇带来了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鼓风炉、焦炉、煤炉和锌炉等排出的废气和烟尘经常被困在多诺拉周围山峦围成的这个山谷里，久久不能散去。它们带来了令人惊叹的美丽的日出、日落，也带来了大片的不毛之地。



20世纪40年代，多诺拉锌厂正在排放大量有毒废气。

烟锁多诺拉

1948年10月26日，多诺拉的空气与往常有些不同，一场烟雾在这里持续笼罩了数日。后来，据作家伯顿·罗彻（Berton Roueche）描述说：“10月26日这个周二的早晨，烟雾封锁了多诺拉。天气阴冷多云，一片死寂，烟雾不断堆积，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整天，第二天继续。一直到周四，烟雾变得黏稠起来，成了静滞的黏结体。那天午后，只能

看清街对面。除了高耸的烟囱，连工厂也消失在雾中。空气中开始有一种令人作呕的味道。”多诺拉的一位经历过“二战”的退伍军人阿诺德·赫希（Arnold Hirsh）描述说：“空气看起来呈黄色，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景象……黑烟挂在大气中，无处可去，一动不动。”

然而，多诺拉人对空气污染已经习惯了，污染稍重一些或稍轻一些都难以引起他们的特别关注；即便是污染的严重程度超过了以往的大多数情况，他们也会暗示自己没什么大的问题，或者期待它很快就会散去。此时，大多数多诺拉人仍然像往常一样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0世纪40年代，多诺拉居民区笼罩在浓烟中。

时值万圣节。29日下午，小镇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游行在幽灵般的薄雾中照常举行，孩子们仍然在没有散去的烟雾里游荡穿梭。尽管后来人们知道这样是多么的危险，但不得不说它确实符合当时的氛围。多诺拉的高中橄榄球队龙之队仍然在艰苦地训练，准备第二天与莫农格希拉镇野猫队的比赛。30日上午，球赛如期举行，多诺拉镇的人们仍然兴致很高地前来观看，只是因为赛场上有烟雾，常常看不到球在哪里。

在比赛过程中，广播突然要求多诺拉龙之队的球星队员斯坦利·萨瓦（Stanley Sawa）“回家，赶紧回家！”听到这种催促，看台上一些观众还以为这是个恶作剧。斯坦利直接穿着比赛服一路跑回了家里，刚回来的他十分生气地质问为什么要他中断比赛回来。邻居告诉他，他的父亲出事了，正和医生在一起。老萨瓦是铁矿石搬运工，这一日他呼吸急促、头晕目眩，被人从工厂送回了家。当斯坦利回到家时，他的父亲已经死了。遭遇不幸的并不只是老萨瓦，后来人们了解到，30日上午10点之前，多诺拉镇已有9人去世，24小时内死亡人数上升到18人。

与此同时，几乎整个镇子的人都感受到了烟雾的威胁。阿诺德·赫希和他的兄弟刚从部队退役，身体状况良好，他们这一天本来也打算去看球赛，但是他们在路上却因感到不适而返回家中。他们回来后发现母亲身体同样不适，并且更为严重。他们急忙给镇里的医生打电话，但是被告知镇里的8位医生都在忙着，无法出诊；医生还说“整个小镇都生病了……快把你们的母亲送出小镇吧！”他们照做了，他们的母亲也暂时躲过了一劫，然而两年后她还是去世了，去世时不到50岁。

灾难似乎突然降临，多诺拉镇许多人都生病了，人们陷入恐慌之中。镇里仅有的几名医生在救治病人的同时，劝说人们如果能够离开就尽快离开这个小镇。镇里的消防员则挨家挨户地给人们送氧气罐，因为数量不够，他们还从邻近的一些小镇借来了氧气罐。仅有少数人看到外面糟糕的天气状况而关上门窗，在屋里闷了5天，并逃过了这场灾难。烟雾打破了小镇的宁静，却没有打乱工厂的节奏，工人们仍需坚持照常上班，工厂日夜运行的轮班制也没有停止。



20世纪40年代，“多诺拉烟雾事件”中正在转送医院抢救的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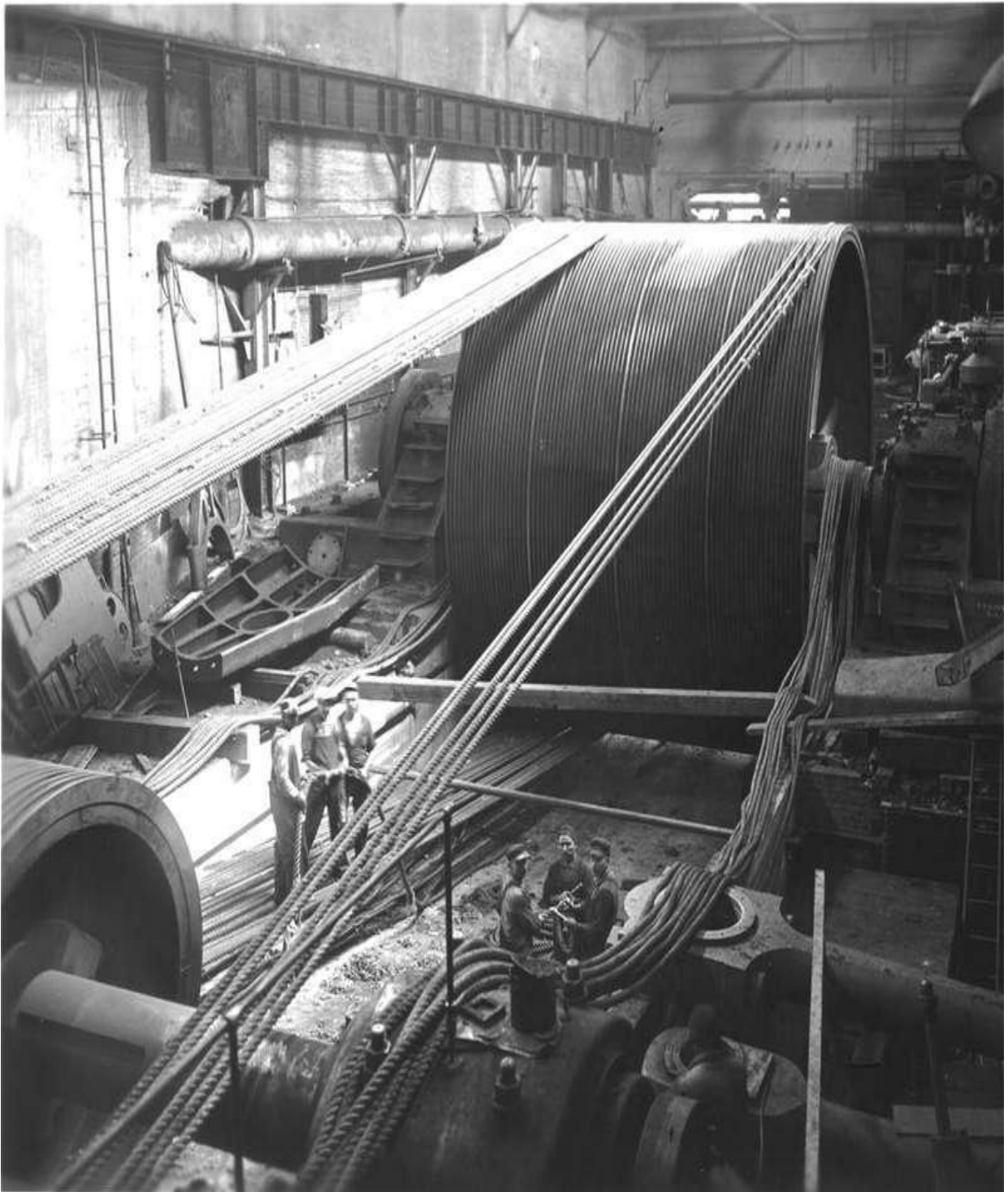
到10月31日，烟雾才逐渐消散。次日凌晨，一场大雨降临，终于将笼罩了多诺拉6天的烟雾一扫而光。烟雾中遇难者的葬礼大多在11月2日举行。这是雨过天晴的一天，出现了灿烂的阳光、湛蓝的天空和漂亮的白云，仿佛春天一样。此时，街道上到处是年轻人，他们又活跃

起来，橄榄球队继续练习，拉拉队员为他们呐喊加油，多诺拉镇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和宁静。

多诺拉人在1948年10月的烟雾事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迟钝，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为此，戴芙拉·戴维斯曾询问过她的妈妈，她妈妈说：“当时没人知道污染……我们没有想得太多。”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污染这样一个问题。戴维斯的妈妈回忆说：“还记得我们车身上的灰尘吗？记得我们下午开车就不得不打开前灯吗？记得有时白天见不到太阳吗？记得女人们每周都要挂出窗帘晾干吗？我们中许多人放弃了使用窗帘而改用软百叶帘，因为百叶帘可以直接擦洗。我母亲的房子有36扇窗户，我们总是在擦洗它们。当我们洗到最后一扇时，第一扇窗户又脏了。”

其实，多诺拉人当时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做一个选择：“这不是煤灰，叫金粉。‘只要工厂开工，小镇就一片兴旺，这是你爷爷和你父亲的收入来源。没有人会去问是否正是它使许多人病倒，人们先得吃饭啊……今天他们可以把它称为污染，但在当时，这只是谋生的一种方式。”于是，大多数多诺拉人面对污染都选择了默默承受，即便1948年的烟雾在6天里就杀死了20人并让小镇1.4万人中的6000多人生病，他们大多仍然没有起来反抗。

多诺拉的这场灾难引起外人的关注，首先得益于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的呼声，10月30日，他在全美无线电广播节目中说：“宾夕法尼亚州勤勉工作的钢铁小镇多诺拉今晚处于悲痛之中，因为它刚从一场大灾难中恢复过来。一场浓重的杀人雾使小镇上许多人得病和倒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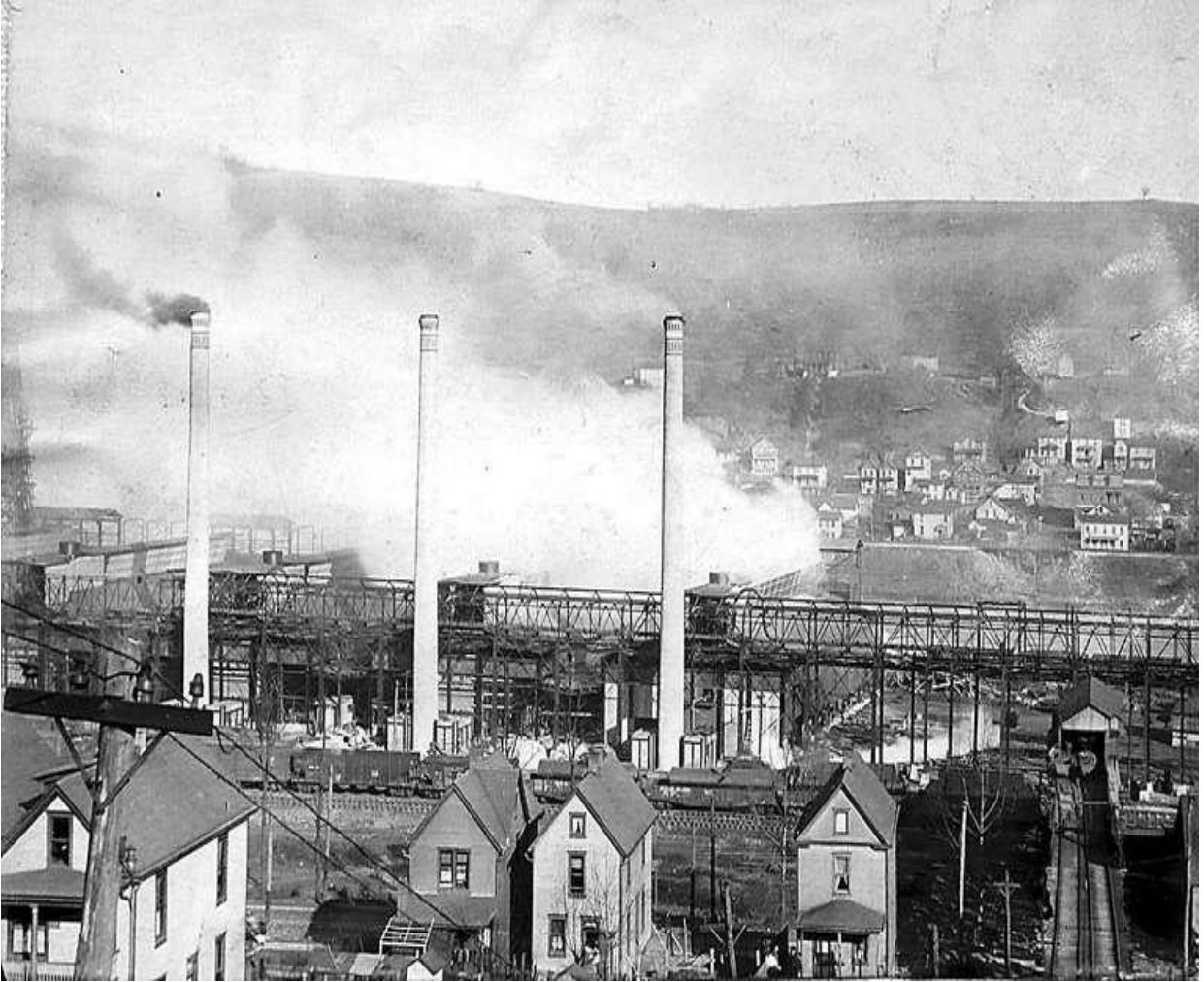


拍摄于1925年8月29日，多诺拉电线厂内，工人在巨大的电缆卷轴旁工作。

美国炼钢与钢丝厂的法律总顾问罗杰·布劳（Roger Blough）大概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和严重性，31日凌晨3点他打电话给锌厂厂长迈克尔

·尼尔（Michael Neale），要他暂时不要往炉子里装锌矿石。但是尼尔并没有照做，他认为锌厂没有问题；直到公司雇用的专家小组前来调查时，他才行动起来，并将此描述为对社区的关心，而不是表示对烟雾事件负有责任。事后，华盛顿县的卫生官员向州卫生局申请锌厂重新开工，并表示这次事件只是一次偶然的大气事件，所以也不会展开调查。

烟雾事件之后，反倒是多诺拉镇之外的人发起了一场短暂的反对锌厂的运动。亚伯·塞拉皮诺（Abe Celapino）是河对岸韦伯斯特镇（Webster）的一个富裕农场主和餐馆主，他喂养的母牛和鸡纷纷死于这场灾难，他联合当地报纸《莫内森独立日报》要求锌厂搬迁到一块荒地上。日报的总编说，这样做可能很快就不必要了，因为锌厂正在它坐落的地方制造不毛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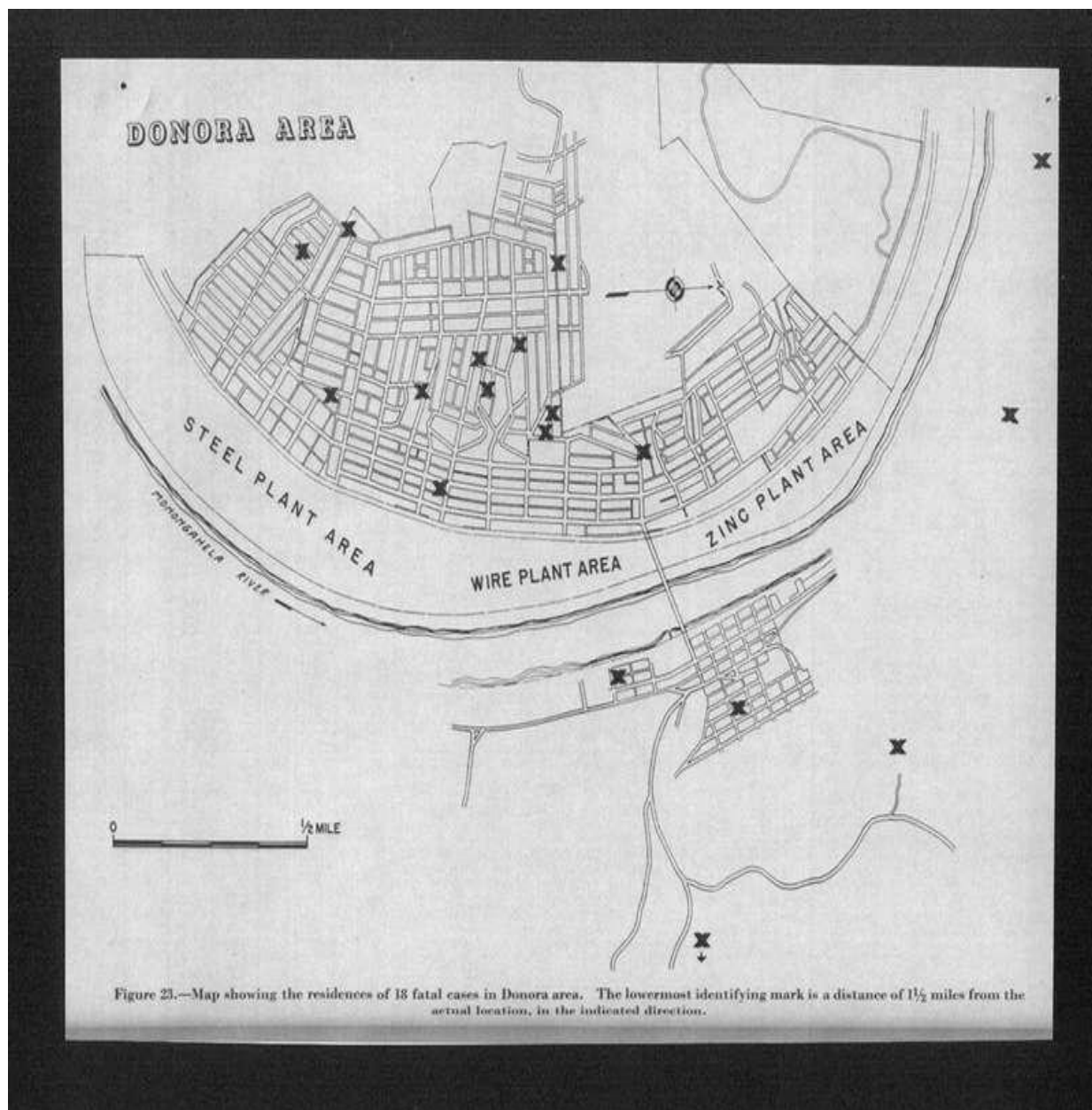


20世纪40年代，多诺拉居民区在内烟雾弥漫中紧邻工厂

比尔·罗根斯（Bill Rongaus）医生是当时多诺拉自治镇议会中唯一的非工厂雇员，他指出锌厂应对此次烟雾事件负责。但是其他人表示反对，其中一位工人议员表示他并不关心它杀死了谁，他只想继续做他的工作。后来宾夕法尼亚州主管林业的副局长答复说，多诺拉可以要求锌厂在烟囱上安装烟尘过滤器。但是工厂主们对烟尘过滤器并不感兴趣，当地人特别是工人们竟大多站在了他们一边。

谁为此负责？

多诺拉烟雾事件发生了，人们免不了要追问它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谁应当为此负责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产生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以锌厂为首的多诺拉的诸多工厂排放的废气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些工厂当为此次事件负责，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科研工作者、多诺拉的居民以及周边小镇中同样受到影响的居民；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次事件主要是由异常的天气引起的，锌厂等无需对此事件负责，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工厂主和该地的一些官员。很显然，这两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立场的影响。



1948年的烟雾事件中，多诺拉当地卫生局绘制的死亡报告位置标注图。

回到事件本身，可以看到：多诺拉烟雾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异常的天气，也就是逆温现象的出现。逆温即是对流层中出现的气温随高度增加而升高的现象。出现逆温层后，原本可以对流运动的大气层的层次结构便稳定了，逆温层像一层厚厚的被子罩在上空。逆温现象如果出现在城市和工业区等大气污染较重的地方，将会导致污染物无法扩散和不断聚积，从而可能出现空气污染中毒事件。1930年马斯河谷事

件、1948年多诺拉烟雾事件和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的发生都与逆温现象的出现有关；前两者更为相似，都是河谷地区的地形逆温引起的。

如果从避免环境灾难的角度来看，之前选择多诺拉作为钢铁生产地是很不明智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芝加哥、匹兹堡等工业城市试图治理城市的污染时，通常是将一些重污染的工厂转移到卫星城。这种“工业郊区”的出现无疑减轻了大城市的污染问题，但是却让这些地区的居民和环境承担了风险。最初在多诺拉选址建厂，企业家仅从经济角度出发，对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缺乏应有的预见，这无疑是其灾难发生的重要原因。



20世纪40年代，多诺拉小路尽头浓烟滚滚的钢铁厂。

更为严重的是，在多诺拉工业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忽视。最初在这里建锌厂时，转移过来的不过是一些落后的生产设施和技术。很快便有人对多诺拉污染表达了不满，1919年，河对岸韦伯斯特镇的布奇哈特（Burkehardt）夫妇对锌厂发起了民事诉讼，索赔1万美元，赔偿对其家周围树丛、篱笆、房屋油漆以及布奇哈特夫人身体健康所造成的损失。锌厂认为没有科学的证据和检验方法表明这些损失是由锌厂造成的，所以它不应当负责。最终，法院裁定锌厂给布奇哈特500美元的赔偿。1935年以后，先后有两次联合的受害居民针对锌厂的集体诉讼，索赔分别达150万美元和450万美元，但均没有胜诉。锌厂忙于应付诉讼和自证清白，却无意于采取措施减轻污染。而多诺拉的官员更是没有对多诺拉的污染进行限制和治理，居民大多也没有站起来反抗，选择承受的理由乃是为自己留下“谋生”的道路。

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引发了更多的人关注空气污染，多诺拉事件亦成为一些美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然而，这些事件的真正教训并不只是说明了工业源或燃烧煤炭导致的短暂而激烈的空气污染事件会很快让体弱者倒下，它们还说明日常暴露于低浓度的看不见、闻不到的污染物亦能够摧毁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在烟雾事件之前，多诺拉人已在受到严重污染的空气中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其不利影响虽然无法量化确定，却是无法否认的。科学研究亦表明，“多年的非致命暴露”会持续损害呼吸系统。在多诺拉烟雾事件中去世的20人的痛苦是一时的，但是另外数千人在其余生仍要忍受空气污染所造成的病痛折磨。烟雾事件之后的一个月里，多诺拉镇又有至少50人非正常死亡。甚至10年之后，这里的死亡率仍明显高于周围城镇的死亡率。

The VALLEY INDEPENDENT

The Voice of the Mid-Monongahela Valley

SATURDAY EVENING, OCT. 29, 1988

30¢ PER COPY

Deadly smog isn't forgotten



Fumes from Donora Zinc Plant were blamed for deadly smog that struck Donora in 1948.

Donora felt hard punch 40 years ago

By BOB GARDNER

DONORA — It started 40 years ago today.

Eyes were smarting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breathe because a heavy vaporous cloud had settled over Donora. Before it would lift, 19 persons would die and the cause of their deaths would become the target of an investigation world-wide.

That "cloud" became the infamous "Donora smog," which first settled on the community on Tuesday, Oct. 26, 1948. Reaching its death-dealing height on Saturday, Oct. 30, it was dissipated by a continuous rainfall on Sunday, Oct. 31, but its effects would still be felt a decade later.

The number of deaths, in newspaper accounts of the disaster years later, would range from 22 to 25, but no less than 5,910 of Donora's 12,000 residents — most of them elderly with a history of chronic respiratory problems — would fall ill from contact with the smog.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ause of the Donora smog launched by stat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uthorities would lead to the first anti-pollution laws.

The smog, it was learned, was caused by a severe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inversion in which cold

20世纪80年代，有关多诺拉事件的媒体报道。

1949年，美国公共卫生署（U.S. Public Health Service）对多诺拉烟雾事件的调查表示，它是由逆温现象引起的，同时要求多诺拉要减少污染气体的排放和建立天气监测系统，以预防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1951年，受害的居民对锌厂的母公司美国炼钢和钢丝公司发起了诉讼，索赔464.3万美元，但最后只得到了23.5万美元的赔偿。1955年，在多诺拉烟雾事件的推动下，美国通过了《大气污染控制法》（Air Pollution Control Act）。这部法律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很小，因为此时美国国会并不想在环境问题上对州权进行太多的干涉，所以这

法律中没有具体的强制性措施。但是，作为美国国会针对大气污染问题通过的第一部法律，它仍然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美国普通公民和政策制定者意识到环境污染正在侵害公共健康和福利，这是一个应当予以重视的问题；它还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做了铺垫，起到了推动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 安禾生编：《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见证·思考》2005年4月号。
2. Davis, Devra：《浓烟似水：环境骗局与环保斗争的故事》，吴晓东、翁端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3. 姜立杰：《“多诺拉事件”与美国历史上的卫星城环境问题》，《前沿》2006年第6期。
4. Luna, Marcos,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Environment since 1945,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12.
5. Snyder, Lynne Page, “‘The Death-Dealing Smog over Donora, Pennsylvania’: Industrial Air Pollution, Public Health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1948-1949,”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 18, No. 1, Special Issue on Technology, Pollu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Spring, 1994), pp. 117-139.
6. Stacey, Charles E., Charlton, Brian, Lonich, David, Donora, Charleston: Arcadia Publishing, 2010.

洛杉矶： 雾锁六十年

在20世纪40年代，许多电影公司在排完电影后都会把胶片冲洗出来，然而它们却发现影片的每一个镜头上都笼罩着一层浅蓝色的薄雾，如同幽灵一般。可是胶片洗印厂的工人和电影的摄影师一直按照正确的流程工作，并未犯错。直到后来，人们才明白，这个“幽灵”原来就是洛杉矶鼎鼎有名的烟雾。

文/徐畅

1948年的某一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炼油厂附近的农民非常郁闷，他们耕种的菠菜的叶子不再呈现出绿色，而是变成了银色或古铜色。这预示着一段时间以来的劳动成果付之东流。同时，加州其他地区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得知这一情况，加州理工大学的荷兰裔教授J. 哈根·斯密特特意走访事发现场。通过与当地农民的深入交流，他了解到，这片地区经常会出现烟雾天，而恰恰在这些烟雾天里，居民们普遍能闻到一股漂白剂的味道。就在斯密特开始对此现象进行思考时，一位同事向斯密特回忆起了自己前不久的遭遇：“有一天，烟雾笼罩在帕萨迪纳高速公路上，我正在开车。可是开不了一小会儿，我就不得不停在路边，因为眼睛流泪不止，而且伴有撕裂般的疼痛。我无法再坚持睁眼开车了。”

菠菜叶子为什么变色了？烟雾天的空气中为什么会有漂白剂的味道？同事为什么会泪流不止？这些事件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一系列的疑问让斯密特陷入了沉思。

其实，要解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从二战期间，加州洛杉矶市遭受到的一场严重袭击说起。与1941年的珍珠港偷袭不一样，这一次的

“侵略者”不是日本人，而是弥散在空中的烟雾。据《洛杉矶时报》报道，1943年7月26日，巨大的烟幕降临市区，导致城市中心的能见度急剧下降，让楼房、街道变得朦朦胧胧。在这阳光被遮蔽的白天，洛杉矶的数千居民感到眼睛刺痛，喉咙如同被刮擦一般，伴有咳嗽、流泪、打喷嚏等症状，严重者呼吸不适、头晕恶心，难受至极。他们意识到，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镜头上的“幽灵”

洛杉矶位于美国西海岸，背靠海岸山脉，面朝太平洋，阳光明媚，气候温暖，风景优美。由于早期金矿、运河等开发，且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洛杉矶经济发展非常迅速。1936年石油的开发，尤其是二战爆发以后，在飞机制造和军事工业的带动下，这座城市逐渐成为美国西部地区的重要海港和美国第三大城市，人口和机动车规模迅猛增长。不过，城市的繁荣也带来了空气污染问题。



烟雾天际线中的洛杉矶。

早在1903年，由于排放废烟的厂房大量聚集，洛杉矶首次出现了烟雾弥漫的现象，当地居民甚至误以为发生了日蚀。1939年至1943年，据气象记录，洛杉矶的能见度迅速下降，在上文提到的那个白天，人们最多只能看见三个街区。有传闻甚至指出，洛杉矶的蒙罗维尔机场一度考虑搬家，以远离这持续不断的烟雾天气。

洛杉矶的居民越来越担忧那密布于眼前、充斥于肺部的烟雾，但是人们并不清楚20世纪40年代以来造成洛杉矶烟雾的真正原因。人们根据伦敦的经验，认为排放二氧化硫的工厂是罪魁祸首。作为二战期间工业化的结果，工厂排放二氧化硫量在当地急剧增长。于是，当地政府开始采取行动。1943年7月洛杉矶光化学烟雾首次出现后，洛杉矶市政府便开始采取措施。当年8月，时任洛杉矶市长的弗莱彻·鲍伦（Fletcher E. Bowron）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该市将在4年的时

间里消灭烟雾。10月，洛杉矶县议会任命了一个烟雾废气委员会，专门研究该问题。经过调查，该委员会在1945年2月颁布了禁止浓烟排放和空气污染控制的规定。接着，洛杉矶开始管治工业和生活废气的排放，要求市区工厂依照严格的标准处理排放的废气，生活产生的有害气体排放也被一一进行处理。同时，当地尽量使用含硫量少的燃料，以此控制二氧化硫的排放。到1947年初，洛杉矶地区工厂的二氧化硫的排放逐渐减少，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然而，洛杉矶的烟雾依然没有散去，反而出现得愈来愈频繁。

洛杉矶烟雾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上文提到的1943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导致400多人死亡，这一数字仅仅是1952年12月同样事件中洛杉矶市65岁以上老人的死亡数。而在1955年9月，光化学烟雾又造成400多名老人在短短两天内死亡，更多人因受到烟雾刺激而出现眼睛刺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同时，仅1950-1951年，美国因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就多达15亿美元。

烟雾也造成家畜患病，妨碍农作物及植物的生长，尤其对多叶蔬菜有严重影响。有科学家通过调查，发现多叶蔬菜由于长期受烟雾的影响，叶子变成银色或古铜色。其中莴苣、菠菜、生菜、甜菜、燕麦等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后来，当地人把这些植物当作衡量空气污染程度的标尺。

与此同时，洛杉矶的烟雾还让橡胶制品老化，使露天材料与建筑物受腐蚀而损坏。它还会降低大气可见度，影响汽车、飞机安全运行。此外，烟雾对当时好莱坞电影的拍摄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许多电影公司在排完电影后都会把胶片冲洗出来，然而它们却发现影片的每一个镜头上都笼罩着一层浅蓝色的薄雾，如同幽灵一般。可是胶片洗印厂的工人和电影的摄影师一直按照正确的流程工作，并未犯错。直到后来，人们才弄明白，这个“幽灵”原来就是洛杉矶鼎鼎有名的烟雾。

造成如此严重恶果的洛杉矶烟雾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烟雾之城”

随着调查的开展，人们对洛杉矶烟雾成因的认识也在逐渐发生变化。1945年8月，洛杉矶县主管卫生事务的官员斯沃托特在《帕萨迪纳星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烟雾来源于多处，包括工厂的废气排放、蒸汽火车及柴油卡车的排烟、垃圾场的露天堆放、焚化炉的废气排放和废弃场废弃物的烧毁处理等等。大气污染专家雷蒙德·塔克也持相同观点。他在1946年的《洛杉矶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将问题完全归罪于工业或工厂时应该慎重，因为每个人都会做出导致污染的事情。”塔克提出了23条详细的意见，包括禁止在家庭后院的焚化炉和垃圾场焚烧垃圾、禁止使用冒烟的卡车等。此外，鉴于洛杉矶市采取的治烟措施与洛杉矶县以及其他45个城市的行为脱节，他还建议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全县范围的且拥有广泛权力的大气污染管理机构，实施大气污染控制规则，及时采取控污措施。



20世纪40年代，雾气笼罩的洛杉矶街头。

塔克的建议在1947年得以实现，当年4月15日，县议会批准了建立全县统一的大气污染控制区的法例草案。对此，加州城市联盟表示支持，认为县域范围的大气污染控制比单个城市更为有效。该法案在州众议院里以73票赞成、1票反对的票数通过，并在参议院以20票全票通过，由州长厄尔·沃伦于6月10日签字生效。四个月后的洛杉矶县空气污染控制区以全美第一个相关机构的身份成立。12月30日，控制区强制实施了空气质量计划，要求所有主要公司必须拥有大气污染许可证。此后，周边地区也分别成立了各自的大气污染控制区。

尽管建立了县域统一的大气污染控制区，但是人们依然不清楚烟雾的具体成分与成因，也不知道该如何控制它。

在本文开篇提到的几件事情发生后，斯密特凭借自己的经验，开始关注洛杉矶空气中高度氧化的元素。他对光在有机化合物中，尤其是来自植物的有机化合物的影响非常感兴趣。1950年，斯密特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会引起眼睛刺痛并损害呼吸道的臭氧。在此之前，他将植物放入一个密闭的空间，其中充满了臭氧，结果他发现，这些植物出现了与受到烟雾损害相似的症状。而在那段时间，洛杉矶县空气污染控制区的研究人员也在一座玻璃房里做起了实验。他们通过阳光照射汽车尾气制造烟雾。大气污染控制区的志愿者进入玻璃房让眼睛暴露于烟雾，研究人员则在外面用秒表计时，看这些志愿者会在多久后流出眼泪。正是在这次试验期间，一位后来成为该控制区官员的志愿者因为吸入浓度极高的臭氧而患上了支气管炎。这一实验也佐证了斯密特的观点。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臭氧如何产生？为了弄清问题，斯密特亲自前往炼油厂收集了一些空气样本。在分析这些样本并借助其制造出“哈根烟雾”后，他在1952年宣布了自己所做的最终结论：洛杉矶烟雾的主要成分并非直接来自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而是形成于空气中。斯密特的公告震惊了整个社会，他的一位同事指出：“这一消息引发了骚动。”实际上，洛杉矶烟雾与美国东海岸城市中出现的二氧化硫烟雾污染不一样，因为东部的污染物主要由燃烧煤炭和重油产生的二氧化硫所构成，而洛杉矶烟雾与阳光的催化作用有关。当时洛杉矶大约有250万辆不同型号的汽车，每天消耗1600万升汽油，由于汽车汽化器的

汽化率低，导致每天有1000多吨碳氢化合物进入大气。同时，汽车尾气中的烯烃类碳氢化合物和二氧化氮等物质也大量地排放到空气中。在加州南部强烈的紫外线的照射下，由于吸收了太阳光所具有的能量，这些物质的分子变得极为不稳定，原有的化学链也遭到破坏，进而形成新的物质，即包括臭氧、氧化氮、乙醛等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光化学烟雾。这种化学反应也被称为光化学反应。所以，尽管洛杉矶烟雾也冠以“烟雾”二字，但它并不同于伦敦烟雾（smog）。伦敦烟雾的称呼来自烟（smoke）与雾（fog）两者的结合，而严格的词源学是不允许用这个词去描述洛杉矶空气的。在美国，“烟雾”这个词，更确切地说，洛杉矶型烟雾应该是“光化学烟雾”（photochemical smog）。而光化学烟雾或洛杉矶型烟雾，是当今城市地区最常见的空气污染问题之一。



A Los Angeles freeway at 4:30 P.M. The most pressing problem for urban workers who flee to the suburbs: getting to and from their jobs in the city.

1955年，洛杉矶下班时间的车流。

当然，洛杉矶烟雾的形成与当地特殊的地形和气候条件是密切相关的。从地形上来说，洛杉矶西面临海，三面环山，地处一个类似于口袋的盆地中。在几乎是东西走向的海岸线上，常年吹的是微弱的西风或西南风。这些风将城市上空的空气吹向城市背后的山地。在天气方面，当地受持续性的反气旋控制，多下沉气流，不利于城市污染物的扩散。同时，沿着加利福尼亚州海岸，有一股向南方和东方流动的加利福尼亚洋流，使得海水较冷。来自太平洋上空的温暖空气在越过海岸向洛杉矶移动时，受此洋流影响，接近地面的空气变冷，而高空的空气却变暖，由此形成了洛杉矶上空强大的逆温层。它就像帽子一样盖住了地面的空气，使城市的污染物无法上升到越过山顶的高度。在这样的气象条件下，污染物一连几天聚集不散，静止不动，进而污染了当地的空气环境。也正是在这样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下，繁荣起来的洛杉矶逐渐失去美丽怡人的环境，成为“美国的烟雾城”。

追查“元凶”

明晰了光化学烟雾的成因之后，洛杉矶政府也随即采取了行动，它将视线集中于排放碳氢化合物的油田、炼油厂等遍及当地的石油工业。由于采取的措施极为严格，碳氢化合物从1947年每天排放2100吨降为1957年每天250吨。可以说，这样的成绩相当喜人。与此同时，当地政府还妥善处理了垃圾场的露天焚烧问题，减少了工厂烟气的排放，对冒黑烟的家庭后院的焚化炉予以禁止，并调整了南加州果园的加热问题。

然而，即便如此，光化学烟雾依然大量存在，甚至呈愈演愈烈之势。有学者统计了洛杉矶县报道居民患眼睛过敏症的天数，其中1959年是187天，1960年是198天，1961年是186天，1962年是212天。这样的数据显示出洛杉矶县的空气污染非但没有好转，反而继续恶化。

真正发生改变的时间是1953年。前一年的冬天，伦敦的“杀人烟雾”夺走了4000人的性命。由于害怕同样的灾难降临洛杉矶，加州州长古德温·奈特任命化学家阿诺德·贝克曼组建一个委员会，调查并提出空

气污染治理的建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贝克曼领导的委员会提出了几条影响深远的建议，计划由政府空气管理机构在未来几年实施。具体建议如下：

1. 削减炼油厂，减少加油行为过程中的蒸发泄漏，进一步降低碳氢化合物排放。
2. 建立汽车尾气排放标准。
3. 柴油卡车和公共汽车采用丙烷作为燃料，取代以前的柴油。
4. 重污染行业考虑放慢发展速度。
5. 禁止室外垃圾燃烧。
6. 发展快速运输系统。

在这几条建议中，委员会注意到了汽车尾气的排放问题。实际上，在石油工业每天排放500吨碳氢化合物的同时，由小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每天所排放出来的碳氢化合物则有1300吨；到1957年，机动车辆所排放出来的碳氢化合物约占这个城市每天总排放量80%。可以说，汽车尾气正是导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产生的最大的“元凶”。因此，如何控制汽车尾气、减少碳氢化合物，就成了治理洛杉矶空气污染的重中之重。不过，正如美国学者巴里·康芒纳所言，控制汽车尾气对于“像洛杉矶这样的奢华城市来说是有挑战性的”。在美国这样一个车轮上的国度，汽车不仅拉动了制造业的发展，而且创造了丰富的经济、文化效益。美国的汽车工业每年大约销售产品达15亿美元。它与石油工业有密切联系，石油工业每年生产大约10亿美元的产品。汽车工业是这个国家军事和财政综合体的一个主要部分。而在洛杉矶都市化的过程中，汽车更是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20世纪40年代初，洛杉矶就拥有汽车250万辆，每天消耗石油1100吨，排出碳氢化合物1000多吨、氮氧化物300多吨、一氧化碳700多吨。如此之多的废气，一经当地灿烂温暖的阳光的照射，形成刺激性的光化学烟雾浓度可想而知。



1947年，洛杉矶烟雾巡逻车正在查证。

当然，洛杉矶人没有退缩。随着烟雾污染不断持续，公众舆论压力越来越大，认识到一个县无法有效控制机动车的污染后，加州议会就创立了加州机动车污染控制局，赋予其“测试汽车尾气排放并核准排放控制装置”的权力。自20世纪50年代起，洛杉矶开始大规模地控制汽车排放，要求老旧车辆强制改装或更换。此规定出台后，绝大多数机动车做出了减少排放的处理。由于意识到整个加州的空气污染防治工作缺乏足够的主动性，加州政府便参与进来，并且不顾当时汽车工业界的强烈反对，开始对在加州出售的新汽车设立空气污染排放限制。

在此期间，部分官员为了自己和民众的健康而据理力争，在洛杉矶烟雾治理进程中坚守了公民的职责。比如，洛杉矶县检察官肯尼思·哈恩通过自己的努力，迫使底特律的汽车大亨生产和安装了尾气污染控制装置，这也成为一段历史佳话。1953年2月，哈恩致信福特公司总经理，询问其公司是否在进行消除或减少尾气排放的研究，得到的答案却是所有的汽车厂商都没有这样的研究计划。哈恩坚持不懈，不断催促汽车厂商研制尾气控制装置。到1953年底，汽车厂商表示已经开始启动该装置研究，并在哈恩的一再追问下，于1955年回应称，将会研发出这样一项减少尾气中碳氢化合物排放的装置。18个月后，哈恩又一次追问该装置是否安装于1957年生产的汽车上，回答是次年有可能。通信继续，到1960年11月18日，通用汽车公司告知哈恩，一种曲轴箱净化器将安装在1961年为加州生产的汽车上，但效果不佳。直到1966年，改进后的尾气控制装置才正式安装于加州的新汽车上。而加州也首次设立汽车尾气排放标准。



1954年，洛杉矶汽车制造商协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汽车催化转换器，用以调节汽车尾气从而减少排放。

同时，为了从国家层面表达治理空气污染的决心，控制汽车尾气排放，美国国会出台了几项重要的治理空气污染的立法，iii其中最重要的便是1963年出台的《清洁空气法》。该法强调了机动车对空气污染问题的重大影响，明文“鼓励”联邦政府对机动车和固定污染源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机动车作为一种移动污染源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得到正式承认。该法在20世纪70年代两次修订，联邦政府治理空气污染的权限也得以加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各级地方、州和联邦政府联合开

展了空气污染管制，使洛杉矶的空气污染控制得到了更大的支持，获得了更多的资金，也更深入到企业、社区和居民生活之中。

自1965年到1968年，由于安装了尾气控制装置，洛杉矶机动车每天排放的碳氢化合物下降了200吨，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亦下降了不少。但这些有害物质减少的同时，另一种有毒物质过氧化氮却呈增加趋势。同时，有研究显示，含铅汽油燃烧产生的有毒污染物达到一定浓度后会导致行动及学习能力障碍，甚至对儿童大脑造成损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加州在洛杉矶率先开始了汽油清洁化处理行动，并于1975年首次作了要求安装催化转换器的强制规定，以此减少碳氢化合物、碳化物以及产生过氧化氮的氧化氮排放。正如有人所言：“洛杉矶的空气质量因为政府的这种强制措施而得到了改善。”而为了更好地治理整个加州的空气污染问题，1967年，时任州长的罗纳德·里根组建了加州空气资源管理委员会，以取代洛杉矶机动车污染控制委员会和空气卫生系统实验局。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国内环保运动的深化以及要求改善空气质量的压力不断增大，加州政府开始鼓励使用甲醇和天然气来代替汽油，以更好地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1955年，洛杉矶，高地公园乐观主义者俱乐部宴会上穿着烟雾防毒面具的宾客。

1977年，为了全面解决洛杉矶和周边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加州成立了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区。其管理范围包括洛杉矶县、凡杜拉县、河滨县和圣伯纳迪诺县1.2万平方英里的空气域。该机构也接替了1947年建立的洛杉矶大气污染控制区的职能。其主要任务，是在联邦、州和地区空气污染法律和标准的指导下，保护公众健康不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区人员技术力量强，具有很大的自治权，每年拥有上亿美元的运作预算。通过管控生产活动、推广先进技术以及开展教育活动，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区极大地影响了洛杉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居民区设置模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这些措施都积极地推动了洛杉矶烟雾的治理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洛杉矶政府在1943年以后就不断想办法控制空气污染，但仅仅起到烟雾减轻的效果，并没能完全摘掉美国“烟雾城”帽子，因为包括洛杉矶在内的整个美国的汽车消费俨然已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直到2007年，经过许多年的努力，“烟雾城”这顶扣在洛杉矶头上六十年的耻辱的帽子才真正被摘了下来。此时的洛杉矶，终于达到了清洁空气的标准。

伦敦： “雾都”摘帽记

1952年，在12月5日之后的一周时间内，伦敦死了4703人，而在大雾之后的两个多月时间内，又有约8000人相继死亡。此外，成千上万的幸存者患上了比较严重的后遗症，如支气管炎、心脏病、肺癌……可以说，整个伦敦都沉浸在迷雾带来的悲痛与咳嗽声中。“英国人在饱尝了因烟雾毒魔对生命的大量吞噬而带来的恐惧之后，不得不痛定思痛，汲取无数生命换来的教训”。

文/徐畅

一直以来，伦敦以其“雾”而闻名于世，被称作“雾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其小说《荒凉山庄》中就特意描述了伦敦的雾：“雾笼罩着河的上游，在绿色的小岛和草地之间飘荡；雾笼罩着河的下游，在鳞次栉比的船只之间、在这个大（而脏的）都市河边的污秽之间滚动……偶然从桥上走过的人们，从栏杆山窥视下面的雾天，四周一片迷雾，恍如乘着气球，飘浮在白茫茫的云端。”在狄更斯的文字中，雾的意境竟如此美妙。可是，在现实生活中，雾却给人们带来了诸多不便，甚至危害。

迷雾漫漫

1952年12月3日早晨，伦敦气象台发出预告，当晚将有一个冷锋南下通过，午间最高气温达到6摄氏度，相对湿度70%。当日白天，明媚阳光普照大地，为冬日伦敦带来温暖。同时，从北海吹来的风，向南拂过，带走了英伦三岛上工厂和居民烟囱内冒出的浓烟，使空气变得

格外清新。对当地人来说，这正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好日子。傍晚，一股高压气旋覆盖了伦敦，当地刮起了凛冽的北风。第二天，风云突变，高压气旋沿着自身路线向东南移动，逐渐向伦敦靠近。从这天上午起，风速减慢，云层慢慢增厚，伦敦城又逐渐恢复了往日“雾都”的风采。



1952年12月5日，伦敦特拉法加广场，浓雾中的行人和鸽子。

到12月5日，伦敦气象台的风速表测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数据——风速几乎为零。此时，英伦首都无风，整座城市都充斥着灰白色的浓雾。从高处看，伦敦城恍若仙境，置于云端。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

由于伦敦的街头巷尾工厂林立，成千上万个高大烟囱按部就班地排放着燃煤废气；同时，城区几百万居民也延续着几个世纪以来冬日必需的项目：烧煤炉取暖。如此一来，几百万根烟囱就像排水一样将烟排出。在近乎停滞的空气中，由于逆温层的阻隔，排出的热废气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因为遇冷而下沉返回地面，进而形成厚达100至200米的浓雾。在这浓雾构造的牢笼中，飞机航班取消，火车移动缓慢，公路上的汽车如同蜗牛一般蠕动，泰晤士河中的轮船因失去了航行的视野干脆停靠岸边。有人做了统计，在伦敦的市中心，能见度保持在500米以下的时间持续了114个小时，50米以下的时间持续了48小时。而在希思罗机场，自12月6日早上起，能见度低于10米的时间几乎有48小时。



1952年12月，泰晤士河中的拖船因失去了航行的视野停靠岸边。

当时，乔治·莱斯利还是伦敦南部克拉芬地区一所学校的学生，而他的家则在距此不远的布里斯顿，他记得一位年纪稍长的朋友买了一辆很旧、很破的汽车，必须从克拉芬开回布里斯顿。由于浓雾漫漫，他那坐在驾驶室里的朋友根本无法看见路边的台阶。莱斯利灵机一动，从车上下来，径直走到车前，一屁股坐上了发动机盖，就此指挥朋友开车。当他们穿过克拉芬时，一辆摩托车出现在了莱斯利的左手

旁，车主问他：“克拉芬公园地铁站怎么走？”莱斯利幽默地答道：“你现在已经把摩托车开到了人行道上，如果继续前进20码，你和你的摩托车就将翻到台阶下。”



由于街头能见度太低，市民用手帕和手电筒相互配合引导汽车前行。

其实，“雾都”民众已经习惯了每年冬季都会出现的大雾。在他们的记忆中，白天会从一场薄雾开始，太阳逐渐黯淡，到了午后，宛如“豌豆汤”的浓雾便会占据所有的街道。然而，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1952年12月5日开始的大雾竟然如此浓密，以至于人们的双眼成为多余。有

人讲述了一位朋友父亲的故事：由于室外的能见度非常低，这位父亲不停地寻找自己的位置，可就是找不到路边的街牌，他只好绝望地坐在人行道台阶上。猛然间，一阵急促的声音传入耳朵，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盲人用盲杖敲打地面，沿着道路寻找回家的路。最后，借助盲人的盲杖，这位父亲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1952年，伦敦浓雾第二天，走在上班路上的市民。

被大雾所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人们的出行。迷雾恰逢周末，还导致许多业余活动无法展开。来自布里斯托尔大学的退休教授罗伊·帕克回忆，1952年的他还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名三年级的学生。大雾降临的那些天，正好赶上周末的橄榄球比赛，由于能见度低，比赛组织者被迫取消该项赛事，这让他这位橄榄球狂热分子非常郁闷。室外看不见，伦敦人的室内生活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大雾弥漫的某天夜晚，伦敦的萨德勒威尔斯剧院正在上演根据小仲马小说改编的戏剧《茶花女》。起初，演员们很投入，表演非常顺利，可是在第一幕结束后，观众却坐不住了。原来，随着戏剧表演的不断进行，越来越多的雾气渗进了剧院，让观众的视线逐渐模糊起来。最终，这出戏剧因为观众看不清演员而被迫中止。除此之外，电影院因为观众看不清银幕而停止营业，学校里的孩子也会因相似的理由而被学校管理者放回家。



© Associated Newspapers / Rex Fea

伦敦街头商店，家长正在为孩子购置口罩。

脏兮兮的大雾

大雾充斥于伦敦的大街小巷，给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种种不便，更摧残着他们的身心健康。工厂源源不断的生产，民众烧煤取暖的生活方式依然继续，大烟囱、锅炉、壁炉都在不断地冒着浓烟，其中裹挟着大量未能充分燃烧的煤粉、灰尘。伴着大雾，这些残渣在不久后飘然落下，屋顶、街道、轮船甲板、行人衣物帽子上……到处都是它们的身影，有些直径较小的颗粒物悬浮在迷雾中，随着人流到处乱窜。

帝国理工学院的名誉退休教授理查德·斯科勒当时已经博士毕业，正在一所大学任职，每天需要骑7英里的自行车往来于温布尔顿和南肯辛顿。有一天，他按部就班地从位于南肯辛顿的学校出发，行至途中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历：他的眉毛被黑色的泥团覆盖，头发间夹杂着各种颗粒，紧握车把的指间缝隙集起了不少黑色的煤屑……他说，当回到家时，他整个人就像跌进了一个满是泥泞的水坑，全身脏兮兮的。这样的场景着实令人震惊，因此，即使过去几十年，他也无法忘怀。



伦敦，一对情侣戴着口罩走过街头。

有人指出，从12月5日到9日，每天有大约1000吨的粉尘、2000吨二氧化碳、140吨盐酸和14吨氟化物被排放到雾气腾腾的空气中，同时，还有370吨二氧化硫通过化学反应转化成了约800吨的硫酸。迷雾不但非常脏，还透着煤烟味，窜进肺部，让人们难受至极。当时，美国卫生教育部空气污染局局长普兰特正好访问伦敦，由于大雾，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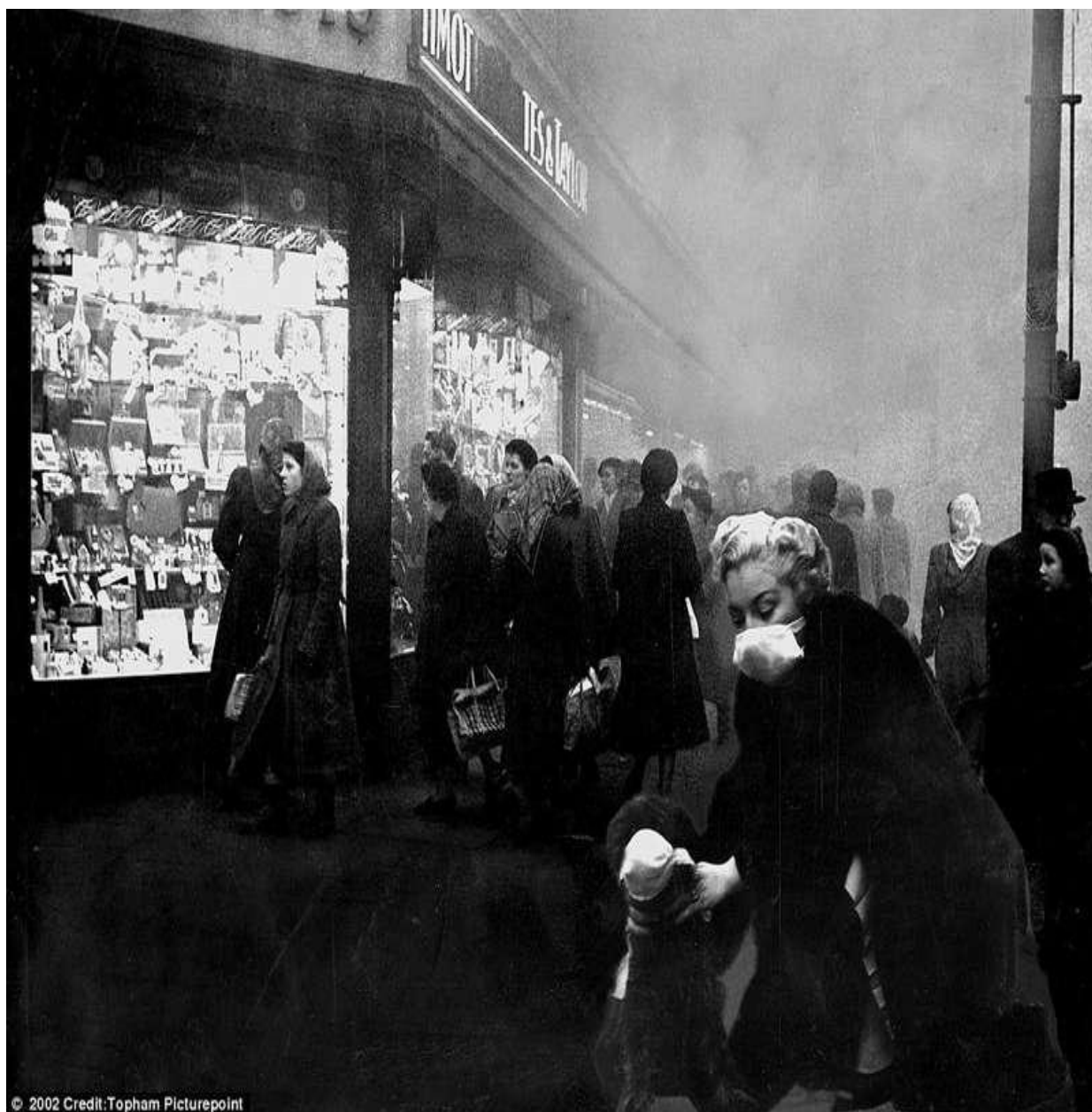
不得不降落在离目的地30千米以外的多依奇机场。然而，当舱门打开，一股伴着刺鼻味道的浓雾扑面而来，使他未至伦敦却先闻其味。罗伊·帕克也想起了那个周末他对父亲的印象。他发现身为蒸汽机车司机的父亲陷入了极大的呼吸困难之中，上气不接下气，不停地喘息。不止这位父亲，还有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伦敦居民感到胸闷，感到窒息，并伴有咳嗽、喉咙疼痛等症状。作为当时伦敦一所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唐纳德·艾奇逊对那几天的场景印象深刻。“1952年12月5日到10日正好轮到我值班。雾非常大，能见度特别低，有一次我到附近三四百米的地方去办事都迷了路。”而在他所工作的医院，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绝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小孩。艾奇逊回忆，患有急性呼吸性疾病的病人特别多，超过了相应科室的床位，于是不少病人住进了外科病房等其他病房，其中的一些男性病人甚至不得被安排在妇产科病房。与此同时，病房里的环境也相当糟糕。伴着雾气，一些煤尘也渗进室内，在洗脸盆、浴缸上留下了层层黑灰，多得让人可以写下自己的名字。这种恶劣的条件，让医院也无法治愈受到严重创伤的伦敦市民。不少人死在了病床上，以至于医院的太平间满员，不得不借用解剖部门的实验室，而市政府在了解情况后甚至在好几个地方安排了临时停尸所。一时间，负责殡葬事务的工作人员用光了储备的棺材，花店用于编织葬礼花圈的鲜花也脱销了。



由于能见度极低，交通警察需要用火焰指挥交通。

据统计，在12月5日之后的一周时间内，伦敦死了4703人，远远高于前一年同期的1852人，而在大雾之后的两个多月时间内，又有约8000人相继死亡。有科学家对烟雾期间的死者年龄和死因做了分析，其中45岁以上死者最多，1岁以下其次，分别为正常时期的3倍或2倍；同时，有704人死于支气管炎，281人死于冠心病，77人死于肺结核，这些数据均为正常时期的数倍。还有不少人因为心脏衰竭、肺炎、肺癌等病去世。此外，成千上万的幸存者患上了比较严重的后遗症，如

支气管炎、心脏病、肺癌……可以说，整个伦敦都沉浸在迷雾带来的悲痛与咳嗽声中。



伦敦浓雾导致的大面积停电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

除了人的死伤，动物们也未能幸免。1952年12月初，伦敦西部的史密斯菲尔德区举办了一场家畜展览会，选出了一些体形硕大、健美的优质牛。它们在伦敦市郊的乡村养得肥肥胖胖，刷洗干净后被活动

主办方牵到了伦敦市中心附近的伯爵宫展览中心（Earl ' s Court），供城市居民欣赏。然而，这些牛来到市中心没多久，便齐刷刷地倒在了地上，舌头像狗一样向外伸出.....在这起事件中，一头亚伯丁安格斯牛死亡，另外十二头遭到宰杀，此外，有六十头需要得到兽医的重点治疗，还有大约一百多头牛需要给予少许治疗。而所有的这些牛都相当年轻，且非常膘壮。值得注意的是，与那些广受关注的获奖牛相比，普通牛幸存下来，算是躲过了死劫。后来人们发现，普通牛之所以存活下来，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心肺功能有多么强大，而是由于获奖牛的“特殊”的待遇。原来，牛的尿液含有大量能够抵消煤烟中酸性物质的氨，但是氨气非常臭。为了维持良好参观环境，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更换获奖牛牛棚中含有牛尿的褥草，进而使其丧失了中和空气中酸性物质的机会。然而，普通牛的臭味却无人介意，因此在氨气的保护下，幸存了下来。



1952年，伦敦，英格兰银行外的警员在大雾弥漫中维持秩序。

政府主导的控雾

一场普通的大雾，却成为致数千人死亡的灾难，这让“神秘的雾杀手”成为当时许多报纸的头条新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指出，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成为英国环境史上的转折点，“英国人

在饱尝了因烟雾毒魔对生命的大量吞噬而带来的恐惧之后，不得不痛定思痛，汲取无数生命换来的教训”。

起初，对于事件的发生，英国政府一味地推卸责任，否认众多的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与烟雾之间的直接联系，这引起许多人的不满。事件发生后一个月，一位议员在议会质问当时负责空气污染事宜的住房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部长（原译文有误，应为大臣。——笔注）先生，您难道不知道上个月在伦敦地区因空气污染窒息而死的人比1952年整个国家因交通事故而死的人还要多吗？”这位议员认为，一场大雾之时，一周之内比头一年的正常情况下多死了2851个人，这样的数字显然高得有些离谱。不过，麦克米伦似乎并不买账，他反驳道：“议员们不能因为天气原因就责备我的同事。”他之所以会坚决抵制几乎所有针对伦敦烟雾事件的质询，原因在于他的立场。由于战争的破坏，伦敦，乃至整个英国的房子短缺问题特别严重。1952年，正是麦克米伦为实现保守党竞选时许诺的“修建30万套房子”大显身手的时候，因此，烟雾等其他问题都不是他考虑的重点。同时，对于公众关于削减烧煤量和改造现有工厂烧煤效率的呼声，麦克米伦表示根本无法负担其成本，“我不确信目前有必要进一步普遍立法。我们会竭尽全力。但是，尊敬的先生们，你们必须认识到为此不得不考虑进去的众多广义经济因素”。麦克米伦指出，为了归还310多亿英镑的战争债务，英国政府几乎将所有的优质无烟煤卖给美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来创汇，把低质煤留在国内，同时，当时大约有1200万的家庭壁炉无法燃烧污染较少的无烟煤，有两万辆集中于城市的蒸汽机车使用烟煤，而这些燃煤设施的改造成本将是一笔很大的支出。



1952年，伦敦，街头售卖的报纸上可以看见雾霾新闻上了头条。

政府的冷漠激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批评质疑政府之声不绝于耳，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许多重要人物也纷纷劝说麦克米伦对空气污染加以管控。在巨大的压力下，为了避免在接下来的几年重演1952年冬季的悲剧，麦克米伦终于在1953年5月妥协，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空气污染问题，由工程师休·比弗担任委员会主席。

经过21个月的辛苦调查与分析，比弗领导的委员会于1954年底提供了临时报告和最终的事件报告。委员会指出，从家庭和工厂排出的烟、沙砾、灰尘以及有害气体造成了每年250亿英镑的财产损失，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同时，委员会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甚至认为如果采纳了这些建议，英国，尤其是伦敦将在10至15年内减低80%的烟浓度。在一份议会讨论记录中，比弗委员会的建议被归纳为以下五点：

1. 除若干例外情况，黑烟的排放应被法律所禁止。
2. 工厂修建新厂房时，应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防止砂粒和灰尘的排放。
3. 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下，地方当局有权指定“无烟区”和“烟控区”。
4. 地方当局具有检查和执法的职责，但某些本应由中央政府检查员督察的工业对象除外。
5. 限烟区的户主应要求只能燃烧无烟煤，同时，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应该承担绝大部分因更换家庭壁炉而产生的费用。

通过这些建议，比弗委员会实际上提供了一幅具有现实意义的治污蓝图。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政府并没有马上采取大刀阔斧的治污行动，而人们期望已久的治污立法也迟迟没能顺利出台。此时，一些关注公益的人们站到了历史的前台。杰拉德·纳巴罗，一位保守党的无公职议员，对于政府表现出的拖沓态度表示强烈不满。他不断向政府施压，凭借个人的影响通过了私人议案《纳巴罗空气清洁条例》。一般来说，这种无公职议员提出的私人议案很少有机会成功地转变为法律，但是，它们却可以提醒官员，敦促政府采取应对措施。1956年，经过与政府的协商，纳巴罗收回了自己的私人议案，但他却大大推动了1956年《空气清洁法》的问世。



1956年，伦敦，《清洁空气法案》颁布后处于停产状态的陶窑。

作为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空气污染防治法，英国议会于1956年出台的《空气清洁法》要求大规模地改造城市居民燃煤炉灶，减少煤的使用量，实现冬季集中供暖。同时，在城市设立无烟区，禁止在区内使用产烟燃料，并将排烟大户发电厂和重工业强制搬迁到郊区。它的出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从此，英国政府开始真正走上了一条治理空气污染的大道。

《空气清洁法》先后于1964年和1968年两次进行修订。其中，1968年的修订过程与1956年极为类似。鉴于1956年《空气清洁法》的缺陷，议员艾恩·麦克斯维尔亦提出私人议案，强烈要求对其修改和完善，提出“赋予大臣直接命令地方当局呈递烟雾控制计划并敦促实施的

权力”。经过努力，麦克斯维尔取得了成功。这些修改，使《空气清洁法》赋予了地方政府负责防治污染的重要权力，并得以定型。

除此之外，英国政府还颁布了多项法律。其中，1961年、1969年颁布的《公共卫生条例》和1974年颁布的《污染控制条例》由地方政府负责实施。中央政府的碱业检察机关及其下属的制碱业总检察官则主要负责工业污染的防止和治理，其负责实施的法律囊括了1966年、1971年出台的《碱业工厂规程》以及1974年颁布的《工厂安全和卫生条例》。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英国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并在执行层面上予以重视。



巡警依靠携带的手电筒做路标，为迷路的摩托车指路。

不过，法律并非万能，政府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空气污染的治理绝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单方面行动和若干法律条文的颁布与实施。实际上，后来英国空气质量的治理与提高，还离不开民众环境保护意识的日益高涨，离不开国民清洁空气协会等民间环保组织的奔走与行动。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的普通民众对环境保护工作的参与愿望渐趋强烈，不仅对清洁的空气和河水，而且对清洁的地表和海洋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例如碱业检查团就在将近50个地区建立了地方联络委员会，其成员还包括地方政府环境卫生官员、公众代表以及工厂代表。他们每年举行3至4次会议，为受工业污染影响的民众和工业界提供公开交流的平台。

在英国将空气污染作为治理重点的同时，它还不得不与欧洲的其他国家保持合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瑞典、挪威所处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饱受酸雨侵袭，当地森林和渔业受到很大影响。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上，瑞典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带来酸雨的物质来自邻国。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结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11个成员国联合开展了一项远程空气污染迁移的研究。其结果估计，在瑞典的酸雨事件中，英国的排放物份额为16%。尽管对此表示异议，但是英国为了治理好空气，还是积极与其他欧共体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谈判，最终就《远程越界大气污染公约》等协定与他国达成一致，同意采取措施，以降低硫排放。



伦敦市民在泰晤士河大桥边畔为天鹅喂食。

在这些努力的合力之下，尽管后来的伦敦依然发生过烟雾事件，但到1980年，其“雾日”降到了5天。这说明英国的空气污染治理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从20世纪80年代起，伦敦基本上摘掉了。

四日市： 让公害成为公敌

1964年4月，一位在盐浜地区工作并退休的市民古川喜郎（当时62岁）患哮喘病住院，他曾疾呼：“这难道都不能被认定为公害吗？如果从医学学术角度无法弄清病理，那么就拿我的身体做解剖，弄清这一切吧。”第二年，古川喜郎病逝，盐浜医院按照古川的遗愿对他的尸体进行了解剖，得出结论是古川喜郎病症与伦敦烟雾事件中的患者十分相近。这一事件在媒体报道后，加速了四日市对哮喘病患者进行公害认定的进程，同年12月平田市长在市议会上宣布：从1965年起，哮喘病患者的医疗费用由市政拨款负担。1965年5月，四日市正式确立了公害认定制度，而已经去世的古川喜郎也成为四日市被认定为公害病患者的第一人。

文/陈祥

日本三重县的四日市作为“二战”前日本海军燃料厂所在地，因地理位置优越，被政府选定为发展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企业的“领头雁”地区。随后大量的化工企业入驻四日市，导致大气污染、水质污浊、噪音、震动、地表沉陷、恶臭等环境问题的爆发。当地居民觉醒后，发起了公害诉讼，促使政府、企业纠正地方经济发展的错误路径，最终夺回了“碧海蓝天”的国民生活基本权利。



航拍的鸟瞰四日市东南部盐滨区工业区全景。

“高度成长”的石油化学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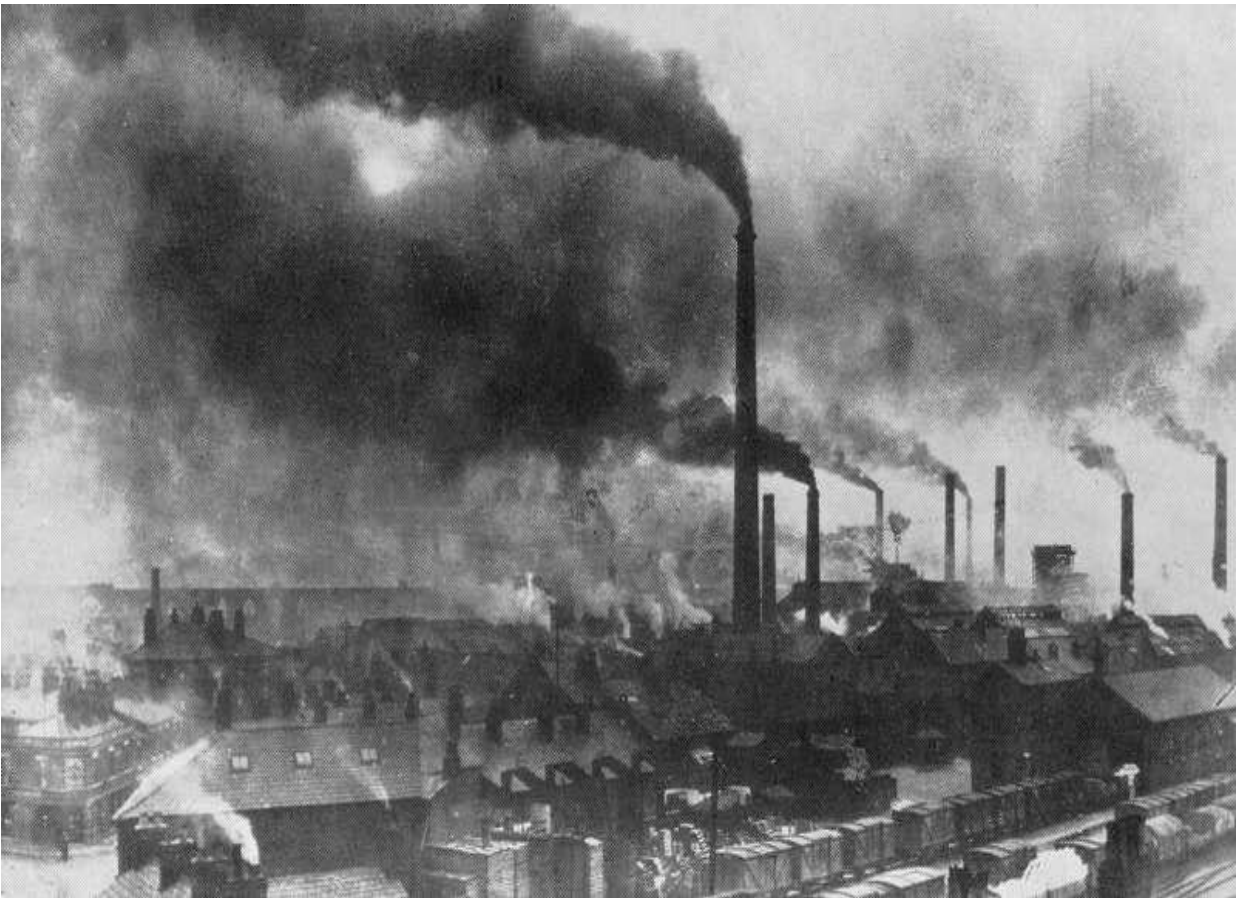
石油化学工业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二战后美国为向驻日美军提供石油，于是对日本的石油精炼工业进行松绑，促成了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诞生最初的石油化学工业。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市场对农药、化肥的需求，进一步刺激了该产业的发展。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国际市场上，合成树脂和合成纤维的需求出现了持续增长的趋势，为日本的化工厂商提供了重要的商机。但面对国际市场，当时的日本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与欧美企业竞争。为此，通产省于1955年制定了《石油化学工业育成对策》（第一期），最终内阁以国家政策的形式通过了将原日本海军燃料厂所在地（四日市、岩国、德山）用以发展石油化学工业的决议。1960年，通产省又制定了“石油化学第二期计划”，目标是完全实现乙烯关联产品全部国产化，同时建成石油化学联合企业群。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乙烯产量从1960年的8.05万吨迅速提高到1969年的241万吨，超过欧洲仅次于美国。日本石油化学工业

在政府主导之下，成为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产业，并得到政府在外贸出口、财政金融与税收方面的特殊照顾。

如图所示，四日市在石油化学第一期计划中。四日市南部的盐浜地区于1956年成立三菱油化，该企业从昭和四日市石油会社购入粗汽油，然后进行分解生产乙烯以及其他衍生产品，随后这一地区形成了三菱油化为核心的化学联合企业群。同时该地区还入驻了其他相关企业，比如有以化学工业为基础的日本合成橡胶和以重油为燃料的中部电力三重发电所等。三菱油化经过数次设备改进，到1968年发展成为具备年产乙烯30万吨的企业，四日市也随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化学工业基地。第二期计划实施时，四日市于1963年在北部午起地区围海造地打造了以大协石油 - 大协和石油化学 - 中部电力四日市火电为产业链的新联合企业群。不过由于这几家企业缺少三菱这样大财阀的支持，乙烯的产能只有4.1万吨。四日市鉴于午起地区的乙烯产能是当时日本最小规模的重汽油分解企业群，于是不顾市民的反反对，市议会于1967年强行通过了在霞浦地区建设第三化学工业联合企业群的决议，以期整合第二与第三期化学工业联合企业群。此后，东洋曹达工业和新大协和等企业通过重组与合并，将产能提升至年产乙烯40.9万吨。

臭鱼、白雾、公害自杀

自化学工业投产之日起，四日市就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问题，但直到“臭鱼事件”爆发，这一问题才引起了公众的关注。1955年起，盐浜地区的电力、化学工业将生产过程的废油排入大海，大量的油性颗粒黏附在鱼鳃上，市民们抱怨四日市伊势湾海域捕获的鱼有油臭味，无法食用。1960年，东京市的筑地鲜鱼批发市场宣布“伊势湾的鱼未经检查不得购入”的通告，四日市的渔业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三重县的渔业协会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并组织300渔民包围了三重县厅三天三夜，还组建了“伊势湾污水对策渔民同盟”，要求三重县、四日市等地政府与联合企业共同赔偿30亿日元。最终，迫使政府于1962年以1亿日元的赔偿金与该同盟达成了和解，联合企业负担了其中3000万日元的赔偿。



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可以看到日本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厂区浓烟滚滚。

和解达成后，政府与企业认为万事大吉，并没有对形成臭鱼事件的原因进行深入调查与解决。渔民们的愤怒在积累。矶津是四日市南部大约只有3000人口的小町，紧邻盐滨地区的联合企业群，这里的人们大多从事渔业相关的行业。1963年6月矶津的渔民和同县楠町的渔民一同将捕获的沙丁鱼卖给富源洲渔协，楠町的沙丁鱼以高价售出，而矶津的沙丁鱼却一文不值。渔民们被激怒了，怒吼道：“我们被欺骗了，这是把工厂引入我们这里的市长的责任，应该让市长也吃一遍这些鱼！”随后，300多名渔民包围了市长家，时任四日市市长的平田佐矩是一位人情练达之人，于是应渔民的要求买下了全部沙丁鱼。渔民们面对市长的举动不知所措，认为“市长是有诚意的，但工厂却依然没有表态”，怒火于是转向了中部电力三重火力发电所。渔民们封锁了电厂的排污口，用泥土将排污口封死，并与奉命前来阻止的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闻讯赶来调解的盐滨地区联合自治会长一再动之以情的劝说，渔民们才解除了对排污口的封锁，此后在自治会长的协调下，矶津的渔民们于1964年12月与中部电力达成了3600万日元的赔偿协议。事件发生之后，平田佐矩市长加速推进调查臭鱼形成的原因，在实验基础上将原水产厅制定的海水含油基准浓度从50ppm（ppm表示百万分比浓度）下调至30ppm，但是根据当时对伊势湾的调查显示部分海域的海底含油量高达40000ppm。

石油化工业联合企业建成之后，还向空气中排放了大量的废气。当时的日本，在城市规划中完全没有考虑工厂对环境的影响，因此这些火力发电厂、石油精炼厂、硫酸工厂的企业群的周围两公里以内，往往居住着3~4万的市民。第一期的盐滨地区联合企业全面投产之后的1959年，大气污染的问题就十分严峻了。加之当时的企业大多没有安装除尘设备，使得煤灰漫天，盐滨地区晾晒的衣服、摆放在店面的蔬菜和食品上都蒙上了一层煤灰，甚至是煤尘反射夜里的月光使得黑夜变成了白昼。

1960年4月，盐滨地区联合自治会就工厂所排放的煤烟、恶臭、噪音等，正式向市政府提出整改申请。在没有得到市政府任何回复之际，四日市的产业结构在这一年有了重大变化，大量的企业从煤炭能

源转向了石油，使得煤尘问题不了了之。不过，随着能源结构的迅速升级与转变，企业向空气中排放的硫化物废气却明显增多。矶津地区处于四日市的南部，正好处于这些企业群的秋冬季下风口而首当其冲，1961年该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哮喘病患者，重症的患者往往因心肺功能衰竭而死。根据当时的记录，矶津在1964年冬的空气中含硫化物达2.5ppm，而与此同期震惊世界的伦敦烟雾事件（1952年12月）的硫化物浓度也仅达到0.6-0.8ppm，可见当时四日市的空气污染之严重。空气中的硫化物被雨水溶解后，极易形成酸雨，1962年盐滨地区的降雨PH值达到4，成为日本第一个降下酸雨的地区，在1965-1966年前后，雨水的PH值一度达到3。1963年，四日市继续建设午起地区的第二期化工联合企业。至此，四日市大约出现了哮喘患者2000人，然而日本政府面对公害频发的事实，拒绝认定他们为公害患者。1963年起，盐滨地区的居民开始通过自发的组织向町自治会和联合自治会等申诉，还组成了公害对策委员会与工厂进行交涉，日本政界的革新阵营（劳动党、共产党、劳动组合协议会）也开始介入四日市的反公害运动。不过，最终促成四日市反公害运动与市民觉醒的却是连续几名患者的自杀事件。



被酸雨腐蚀的有白斑的花朵。

1964年4月，一位在盐滨地区工作并退休的市民古川喜郎（当时62岁）患哮喘病住院，他曾疾呼：“这难道都不能被认定为公害吗？如果

从医学学术角度无法弄清病理，那么就拿我的身体做解剖，弄清这一切吧。”第二年，古川喜郎病逝，盐浜医院按照古川的遗愿对他的尸体进行了解剖，得出结论是古川喜郎病症与伦敦烟雾事件中的患者十分相近。这一事件在媒体报道后，加速了四日市对哮喘病患者进行公害认定的进程，同年12月平田市长在市议会上宣布：从1965年起，哮喘病患者的医疗费用由市政拨款负担。1965年5月，四日市正式确立了公害认定制度，而已经去世的古川喜郎也成为四日市被认定为公害病患者的第一人。



与化学工厂紧邻的居民区。

如果说古川的死促成了政府对公害患者认定的补偿与治疗，那么患者木平卯三郎和大谷一彦的死则促成了整个日本社会对大气污染的觉醒。木平卯三郎（76岁）是一名汽车司机，他和儿子一家、女儿等一起生活，一家共8口人。他因大气污染而患上哮喘病，成为四日市第一批认定的公害患者，后担任民间组织“四日市公害患者守护会”的副会长。生病期间，木平卯三郎看着一家人为了照顾自己的病情而不停奔波，同时每个月还要为此花费数千日元的药费，老人日益感到于心不忍。1967年7月初，老人再次哮喘发作，终于在7月10日写下了遗书：“代子女儿，你照顾我已经很久了，因为我而不能出去工作，每次吃饭都给我盛那么多菜，父亲真的谢谢你了。我死了就能去一身田（日本真宗高田派的本山）了，南无阿弥陀佛。死后若能成佛，我应该能在西方世界得到解脱。”随后，老人念着因自己患哮喘病而耽误女儿工

作、多吃了饭菜的愧疚，上吊而死。这一事件被媒体报道之后，加之老人在患者当中的影响力，事件的影响超出了四日市范围，整个日本的民众通过他的遗书看到了一个公害患者的无助与绝望，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如图所示，捧着木平卯三郎遗像进行反公害游行的正是第二个自杀的患者大谷彦一郎（60岁）。1968年6月13日，大谷和家人说：“今天的空气又很糟糕”之后，喃喃自语地走向自家的点心加工厂上吊自杀而亡。大谷在自杀前10天哮喘病发，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5点之后雾霾更严重了，亚硫酸气体害得我咳嗽不止。做好便当后赶紧离开家。很遗憾啊，虽然我很想待在家里，但那里环境实在待不下去。真是后悔啊。应该让九鬼市长也得哮喘病。我真不想因为公害而活不下去。”



大谷彦一郎手捧木平卯三郎遗像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这两个人自杀前的共同特点就是哮喘病发作，一个希望能得到解脱，一个烦恼于空气的糟糕，可以推断两人都是希望能够以死获得人生的解脱。日本社会面对两名患者的自杀身亡，一石激起千层浪。6月16日，四日市的公害守护者之会、社会党、共产党等组成了四日市公害对策协议会，还组织了规模达1500人的大游行，市民们喊出了“还我蓝天、杜绝污染、保障生活”的口号。

患者们以死推动反公害的运动并没有因此而结束，1971年8月29日，又有一个哮喘患者广濑十太郎（50岁）在发病住院后，上吊自杀于医院的露台。面对接二连三的患者自杀，社会舆论开始转向，迫使当时日本的厚生相在上任后都要到四日市进行视察与调研。1972年日

本环境厅从厚生省分离出来后，改由环境厅的长官赴四日市调查，从而在政府与患者、公害地域之间建立起了直接交涉的渠道。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中后期的十年时间里，四日市经历了臭鱼、大气污染、噪音、恶臭等环境污染，经过媒体和左翼在野党的支持与帮助，最终促成了哮喘患者扩大反公害运动，拿起法律武器将政府支持的企业推上被告席。

四日市的“田中正造”

四日市哮喘病事件发生后，产生了不少地方性反公害运动的民间组织。但是，这些组织过于分散，未能形成统一的组织战斗力，使得四日市的公害斗争远落后于当时另一大公害地区——熊本县水俣地区。面对这种情况，四日市议员前川辰男以“新左翼”的姿态出现，希望整合原有的运动组织，通过各住民运动组织的合作，成为彻底解决四日市公害的社会原动力。1964年受厚生省委托，日本从事环境问题研究的一桥大学教授都留重人组织调查团赴四日市调查，前川议员和都留重人以及调查团成员的戒能通孝律师进行了深入沟通，探讨能否参照当时的劳动损害的方式进行诉讼。在专家与辩护律师团等的帮助下，患者们和协会初步达成了根据日本宪法第25条和国家赔偿法提起诉讼的决定。

但在这关键时刻，公害运动组织一方却自乱阵脚，当初加入四日市公害对策协议会的三重县化学产业劳动组合协议会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该组织成员认为如果通过法律诉讼方式，那么他们所处的企业将成为被告企业。这种做法在日本会被视为“背叛自己的会社”，将不为社会所容忍，加之联合企业也极力阻止患者们的诉讼，这使得三重县化学产业劳动组合协议会率领1万多名运动参与者脱离了阵线。此后，随着诉讼前的准备工作的陆续展开，在明确将化工联合企业推上被告席之后，地区劳动协会、县劳动协会、社会党等陆续退出了四日市公害对策协议会。由于构成反公害运动最重要的民众基础的退缩，四日市的反公害运动只剩下日本共产党、患者及部分运动支持者还继

续战斗，运动基础的削弱导致募集诉讼费用也变得捉襟见肘，前川议员为了能够顺利实现反公害诉讼，发出了“就是借钱也要进行到底”的豪言壮语。

与此同时，四日市市长平田佐矩于1966年病亡，新上任的九鬼喜久男市长则是一个十分重视石油化学工业发展的人物，走马上任之后便于1967年初在市议会强行通过了第三期联合企业计划（霞浦地区）。他对市民煞有介事地诡辩解释说：“走过大酱店门前能闻到大酱味，化工联合企业建成后能闻到化工企业的味道，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面对这种运动形势的转变，前川辰男议员转而与地方教育组合、母亲联络会、共产党、个人等加强了联络，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周密的前期筹备工作。1967年9月1日，四日市反公害运动受到诸多挫折之后，矶津地区的9名患者终于将四日市石油、三菱油化、三菱化成工业、三菱monsanto化成、中部电力、石油产业等六家会社告到了矶津地区的裁判所，根据日本民法第719条追究企业的共同违法行为责任，要求向全体患者赔偿200586300日元。这次诉讼成为日本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气污染诉讼事件。



大量排放工业废气的矶津地区。

在诉讼过程中，患者们及其支持者们指出了企业方面的故意过失罪与违反宪法罪。日本东海地区的律师们为了维护患者的权益组成了“四日市公害诉讼辩护团”，他们共同认为：“导致人员死亡之后，还继续推进第三期联合企业的建设。宪法第二十五条已经被扼杀于亚硫酸气体中了。这其中的责任无人承担，继续让被害者人数不断扩大。必须让这种无责任的状态结束，对于现实的受害者，必须尽快要求加害企业支付赔偿，在混沌的公害运动中冲出一条追究责任的道路。正是

这种最朴素、最单纯、最直接地追究加害者违法行为的斗争之中，终会将国家、地方自治体的政策置于刀俎之上。”



矶津地区起诉哮喘病诉讼的9名患者

原告患者9人的职业：

- 前排左一：石田katu，时年62岁，家庭主妇，1988年老死；
- 前排左二：今村善助，时年77岁，渔夫，1966年死于肺气肿；
- 前排左三：石田喜知松，时年73岁，渔夫，1979年死于肺癌；
- 前排左四：藤田一雄，时年61岁，种植业，1976年死于肺气肿；
- 前排左五：柴崎利明，时年40岁，渔夫，1993年死于交通事故；
- 后排左一：濑尾宫子，时年34岁，家庭主妇，1971年哮喘病发作窒息而死；
- 后排左二：中村荣吉，时年56岁，渔夫，1987年死于肺气肿；
- 后排左三：野田之一，时年31岁，渔夫；
- 后排左四：盐野辉美，时年35岁，造船木工。

法庭上，患者与企业两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企业一方主张哮喘病是人类千百年来固有的疾病之一，如何从工厂的废气与患者的哮喘

病之间确立起法律基础上的事实依据？这使得“病理学上的因果关系”成为诉讼的焦点。也正是这种无法确定污染源与患者直接关系的原因，使得四日市的大气污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害”问题，律师团以突破传统的公害诉讼方式从“盖然性与病理学的因果关系”对制造公害问题的企业一方进行了批驳。盖然性指的是“如果是常识性地可以判断因果关系，则无需严密的论证过程”，据此反问企业“从常识性的因果关系看，如果真的没有关系的话，那应该是被告企业方拿出证据。”而根据法学家加藤一郎的“民事事件无论原告或被告的胜诉判断，只需判断盖然性是否超过50%即可”的研究成果，就病理学上的因果关系而言，可以明确企业必须承担责任。这一理论正好可以补充盖然性，使得证据充实。同期日本发生的其他三个公害事件均没有在法理上突破以往传统框架，只有四日市的大气污染在对公害问题的解释上进行了法理的创新，也为后世的环境污染事件提供了案例依据。该诉讼案件历时四年五个月，前后进行了54次庭辩、三次检证，期间原告9人中有2人病发身亡。最终，矶津地方裁判所四日市支部于1972年7月判决六家企业附有连带责任，赔偿原告88210823日元。



哮喘病患者藤田一雄住进空气净化间进行治疗。

这一判决意味着日本在环境公害事件中确立起了对病理学上的因果关系、共同违法行为的认定。日本环境公害研究名家宫本宪一指出：“这既是对战后日本‘四日市型地方开发’模式的审判，也是对战后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审判！”四日市的公害诉讼胜利之后，对日本的公害（环境）行政、大气污染的企业责任追究、被害人救济制度的确立、环境基准的设定、总量规制的实施等都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1973年日本国会正式开始讨论确立“公害健康被害补偿等相关法律”。



胜诉后作为原告证人的环境经济学专家宫本宪一教授发表感言。

四日市的公害运动不仅仅限于法律层面上促成日本环境意识的觉醒，还直接促成了环境问题成为日本政治选举的重要砝码，开启了现代日本环保政治选举的先例。诉讼结束之后，九鬼喜久男得到九鬼财阀和执政党自民党的全力支持，并挟其在任期内获得GDP增长业绩出马参选三重县知事，志在必得。但是，三重县的民众并不买他的经济

数据账，九鬼终因其任四日市长期间对公害问题的放任，名声已然败坏而落选。反而是革新派的在野党在反公害运动中与民众一起而大获民心，在三重县知事选举中获胜。在公害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前川辰男议员此后则在四日市议会中发挥重要作用，担任四日市议会议长之职，被四日市的民众视为“四日市的田中正造”。

来之不易的“碧海蓝天”

四日市公害诉讼胜利之后，三重县新上任的田川知事对三重县内化工企业实行总量排放的限制措施，同时对整个城市的功能进行了整体改造，搬迁了大批居住于工厂周边的普通民众，对四日市周边海湾地区进行了疏浚。还建立了严格的环境监测机制，要求企业改进技术设备采用脱硫、脱硝等技术。通过这一系列的环保举措，到1980年时，重化工企业所排放的氮氧化物只占全部排放的20%左右。此后，随着日本交通与经济的发展，汽车为首的交通工具的尾气排放成为该市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1978年日本国家标准规定当地区内的氮氧化物浓度“一天平均值在0.04-0.06ppm”时，就应该启动限制总量排放机制。四日市则进一步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日平均达到0.04ppm即可限制企业排放。

在四日市大气污染事件中，化学工业联合企业最终也为此付出了昂贵的经济代价。以四日市海湾疏浚事业为例，在大约总额为55亿日元的花费中，被追究责任的企业达到48家，企业一共承担了83.3%的费用，最大的一家企业承担了11.4亿日元的疏浚费用。诉讼胜利之后，四日市的市民及运动团体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下来，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之下，化工联合企业最终同意市民可以进入工厂进行实地调查。为了让世人不忘却这惨痛的教训与斗争的经验，还组织了市民学习公害（环境教育）等。四日市大气污染是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公害事件，直接促成了日本人对环境问题思考的转变：



四日市市民走上街头庆祝诉讼成功。

首先是对大规模工业化与环境破坏之间关系的认识。今天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当地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然而在四日市大规模招商引资发展重化学工业之时，日本正处于战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工业化时期，对此问题几乎没有任何意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地方不能只关注工厂的规模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而忽视工厂开始运营后对周边环境影响等因素。四日市的重化学工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对四日市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每年向大气排放10万吨的硫化物，最高的1967年排放了24万吨硫化物，严重破坏了地方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

其次是对环境影响评估重要作用的认识。在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时期，1972年的四日市判决书当中就指出被告企业没有对周边环境影响进行任何的预测、评估，然后就上马项目并投产。判决指出企业违反了日本民法中的“提醒注意的义务”，企业如能正确进行投产前的调查、评估，或许能够对四日市的公害防患于未然。这一事件发生后，三重县制定了日本第一个《公害事前审查条例》，确立起今天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



1967年1月17日，四日市三重县哮喘盛行，儿童戴着口罩前往学校上课。

第三是对公害问题解决与社会运动、社会批判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四日市在公害运动中，一直滞后的大气污染对策，究其原因就是石油化学联合企业对于安装昂贵的脱硫装置采取了不积极态度。但四日市的诉讼事件，促使这些企业开始全面正视环境污染所带来的严重惩罚。在长期的诉讼过程中，媒体通过对案件的报道，将环境污染问题社会化，促使日本整个社会对环境保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社会在公害运动过程中开始接受总量排放限制的做法。同时，由于环境问题涉及每一个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使得日本民众能够更加自由地发表个人意见以维护人的生存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战后日本的民主化进程。随着四日市和日本整体环境的改善，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多的日本社会公害运动转而以一种环境史教育的形式展开。通过对环境污染历史经验的总结，让年轻的社会群体加入到社会批评当中，不断地监督企业以促使企业能够更好地融入地方社会、关注环境变化。

第四是对环境政策与环境征税的良性循环的认识。日本在四日市大气污染事件后，开始对企业排放废气导入课税制度，在实行该制度之初，社会普遍担心企业交完税金后是不是就可以自由排放废气了？但实际情况是四日市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从1971年的10多万吨骤减至1975年的2万吨。诉讼结束两年后，《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得以实施，日本向企业增收排放二氧化硫的税金，并将这些税金用于补偿那些像四日市被认定为患者的医疗费用与补偿费。日本对各地的排放征税有所区别，最高的地区平均每千克的废气征收600日元，以四日市1971年排放超过10万吨为例的话，该市的化学工业联合企业（占总排放的50%以上）共要被征收300多亿日元。通过税收的经济手段，使得四日市这样重度污染地区的企业争相改进过滤装置，减少排放。时至今日，这种环境税的征收问题在中国也为人们所关注，比如是否全面实施“碳排放税”的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四日市大气污染问题逐步演变而来，包括在重度污染期间的总量限制排放、污染权交易等措施。



现代四日市三重县化工厂夜景。

最后是对日本政府在环境污染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在四日市公害事件的发生与解决过程中，政府并没有成为关键的核心力量。不过，就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而言，行政长官在地区内拥有强大的权限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60年代的平田佐矩市长时期，四日市政府开始对哮喘患者实施免费治疗；九鬼喜久男任市长时期，大力发展重化学工业并给予税负方面的优待政策，九鬼被冠以了公害市长之称。在四日市判决下达之后，三重县的知事采纳了排放总量限制的政策，

成为日本政府在近代环境污染问题上的重大转折点。此后，政府以四日市的判决与社会舆论为基础，通过行政力量配合《公害健康补偿法》的顺利实施，以及政府转而实行节约能源的发展道路，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治理亚硫酸废气的成功奠定基础，这也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污染事件中处理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关系提供了经验。

在日本四大公害事件当中，四日市哮喘病事件是第三个被民众与媒体所认识的环境污染事件。这一事件的处理与社会运动对日本国家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和召开公害特别国会、乃至是促成日本社会环境政策与意识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PM2.5与中国空气保卫战

PM2.5，如何从隐形杀手成为全民公敌？

文/陈阳

北京2011年10月起的灰霾天气让PM2.5成为南都评选出的“2012中国人最关心的十大问题”，各路新闻媒体科普公益组织都纷纷给出名词解释、有何危害及如何防护；表面看来，从2011年10月到2012年1月短短四个月内，国家环保部和各地环保局面对公众的压力迅速把PM2.5纳入国家标准、公布检测数据，但是，“公众”都包括了谁呢？事情究竟是怎样发展的呢？公众的力量又如何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去的呢？

PM2.5进入公众视野

早在2008年4月2日，媒体《南方周末》就因广州的灰霾天气做出《城市灰霾天年夺命三十万，专家吁严防雾都劫难重演》的报导，提出国内空气污染已经逼近1952年12月伦敦的那次世界上最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5天内4700余人因呼吸道疾病死亡。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引起公众足够的重视。

直到2011年10月22日，地产商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是民间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的发起人之一潘石屹，在微博上转发了美国使馆PM2.5的监测数据，在700多万粉丝的近5000次转发下，PM2.5的概念才在微博上迅速流传开来。2011年11月13日结束的名为“呼吁环保部尽快出台PM2.5的强制标准”的微博网络投票中，共有42188人参与，38447人赞同今年出台，占91%。同样是在微博上，2011年11月1

日，童话大王郑渊洁七问北京市环保局，掀起了更大的波澜。其中“劣质空气对未成年人伤害大。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必须重点保护。沿海城市遇台风时为保证学生安全学校会停课。我建议北京环保局在北京空气质量极度恶劣时通知教育局学校停课，以使孩子们待在门窗紧闭的家中规避毒气，或者通知学校停止室外体育课。请问可以吗？”引起反响最大，网友转载讨论的沸沸扬扬。



2014年2月23日，潘石屹在微博上图文发布：“下午2：06，我在北京CBD，PM2.5为261”。



2014年1月9日，上海，潘石屹在上海公共场所做PM2.5测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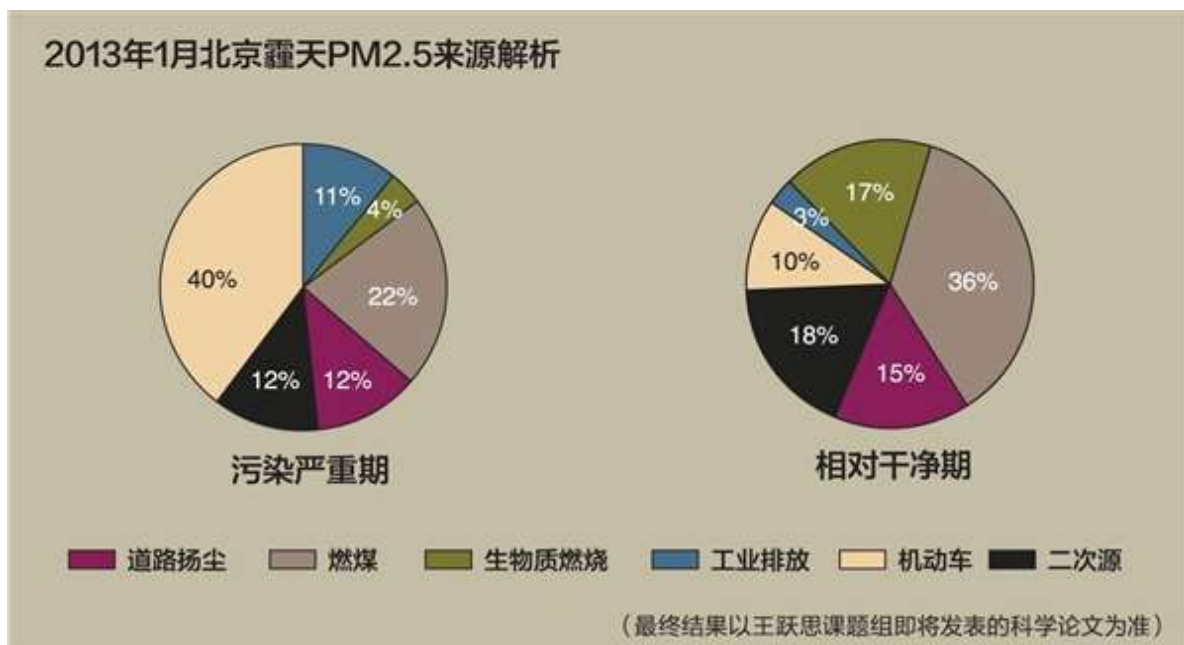
政府的回应

2011年1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开始向全社会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同日，国家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负责人就《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答记者问，其中说到：

“在PM10和总悬浮颗粒物（TSP）污染还未全面解决的情况下，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域PM2.5和O3污染加重，灰霾现象频繁发生”，另外，“依据现行环境空气质量评价体系，我国部分区域和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结果与人民群众主观感受不完全一致”。所以，“大气环境形势的变化和现有标准的局限性要求我们必须尽快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但是，政府并不是在公众发觉了空气质量问题后才开始关注的。认真看国家环境保护部的文件可以发现，对空气问题的关注已有较长期的累积。

国家环保部2008年便下达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项目，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在此过程中就多次涉及对PM2.5的讨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接受项目任务后，成立了由大气科学、大气化学、环境科学、环境健康、环境管理等专业领域的科研人员组成的编制组，在2008年5月到12月，收集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以及我国香港特区、台湾地区等国家、地区和组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相关资料文献资料。2009年1月到8月期间，对收集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撰写《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GB 3095-1996)空气质量标准的初稿。



2013年1月，北京霾天PM2.5来源解析。

2009年9月到12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就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1996)的有关问题，向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共计193家单位、部门，并在国家环境保护部网站征集意见。征集意见其中一条就是“污染物项目应增加PM2.5、重金属、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恢复NO_x，增加二恶英等有毒有害污染物项目，以及氨气、硫化氢等恶臭污染物项目”。

2010年1月到5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对回函的意见进行汇总和分析，形成了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等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公开征集意见汇总表，6月17日，国家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在北京召开《城市空气质量周报、日报和预报技术规范》暨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研讨会。会议期间，编制组就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公开征集意见情况向与会领导和专家进行了汇报。

2010年10月9日，国家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标准处在北京主持召开《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研讨会。会议认为，当前国家制定实施PM2.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时机不成熟，国家实施氟化物等具有区域特征的污染物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必要性不大，同意发布PM2.5及氟化物等污染

物环境空气质量参考限值，地方省级政府可参考其制定地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直至此时，专家建议列为强制性标准的PM2.5参考限值变为参考推荐性指标。



中国民间发布的首张PM2.5地图。

2011年5月，国家环保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办法（试行）〉试点监测工作的通知》，在全国26个省份各选取一个城市，试点新增监测项目。新增内容就包括：PM2.5、一氧化碳、臭

氧、铅、苯并芘（一种致癌物）等。2011年6月份，国家环保部已在全国26个城市开展试点检测工作。2011年8月，在国家环保部常务会议上，周生贤部长已听取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情况汇报。国家环保部2011年9月8日已经发布了1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环境空气PM10和PM2.5的测定重量法》的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就对PM2.5测定方法和标准进行了规范。

“我为祖国测空气”

2011年12月27日，民间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创始人冯永锋在微博发起了“我为祖国测空气”行动。打开达尔问求知社的网站，发现在2011年5月29日和6月2日，达尔问求知社已经开始召集志愿者分别在青年政治学院校园内和朝阳区安慧里小区进行PM2.5的检测；6月12日，也组织了面向公众参加的科普讲座：“灰霾杀手——细颗粒物PM2.5及其健康危害”。同时检测中心也在北京设立了任何人都可以申请的“空气质量PM2.5检测”，有不少志愿者申请检测并作出检测报告上传达尔问求知社网站。而这次的“我为祖国测空气”，扩展到了全国。冯永锋在微博上号召：每人捐助25元或者25元的倍数金额，筹款购买2.5万元一台的监测仪，支持民间监测大气质量。不到一周时间，供上海、广州民间环保组织使用的便携式PM2.5监测仪便已到位。随后，南京、温州乐清、武汉、长沙等城市的环保组织也行动了起来。



中国民间掀起空气自测运动“我为祖国测空气”插画。

虽然从第二部分可以看出，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法》是酝酿已久的，经过严谨的科学研究讨论，参照先进的世界标准，再三修改而成的。但是最终让PM2.5纳入强制标准，民间环保组织的有力行动和媒体的支持功不可没。

但是民间力量的参与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11年12月21日达尔问求知社给广州公益环保组织“拜客广州”募捐到一台便携式激光粉尘检测仪之后，广东省一位专家对于民间的PM2.5监测大泼冷水，称官方每台专业检测仪器要70万元，民间监测是儿戏。民间监测确实可能没有实验室的精准，但不同的声音更为可贵。而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这个2009年才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经历过这次事件后迅速被公众所认识、了解；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推崇的理念“每个人都能成为公民环保专家，每个人都能为中国环境的改良做出贡献”也在实践中得到了肯定和证明。

但是除了被批评监测不科学外，一个更严重的质疑出现了，就是民间监测陷入了法律困境。公益律师安翔指出，根据《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内容：个人和境外组织从事环保监测需要审批，同时不能涉及国家秘密和国家安全。不过PM2.5是否属于国家秘

密，目前难以定论。但是一般情况下，个人监测需要国家环保部门审批才能做的，否则可能是非法活动。

2011年12月19日，21家国内环保NGO公开致信国务院法制办和国家环保部，吁请明确该条例（征求意见稿）的适用范围，修改“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涉及环境质量的环境监测信息”等规定。包括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在内的21家民间环保组织，认为环境质量关系公众健康，公众对环境质量信息具有知情权。

律师胡玮在《南方周末》绿评上给予法理上的支持：在法治社会里，政府公权力机关行为的基本准则应是“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而对于公民的行为则刚好反过来，应奉行“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在我国，不仅法律从未禁止公民从事自发的环境监测和信息分享（实质是一种科研活动）。



北京天安门广场，电子显示器上的标语在浓烈的雾霾中相映成趣。

2011年12月2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就要求要进一步加强空气污染防治，修订并发布空气质量标准，抓紧做好增加PM2.5监测指标的准备。12月21日，在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大会上，国家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公布了PM2.5和臭氧监测详细时间表。2012年，中国将先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PM2.5和臭氧监测。此外，国家环保部环境监测司副司长朱建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旦新的污染指标（PM2.5和臭氧）开始监测，并形成常规监测能力后，会要求所有城市都要实时发布每个点、每小时的数据，接受公众监督。

这场战役无疑是胜利的，但设立标准仅仅是个开始，之后的空气治理更要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此外，对污染物二恶英有深入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博士后毛达指出，单纯地强调PM2.5减排,并不能达到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的预期效果，应该做好多项污染物协同减排的工作，尤其要控制二恶英的空气污染。



在这里记录中国



关注信睿微信 了解变化的中国

我们的历史 our history



你从何处来?
入中国记

新历史合作社



新历史出版社 PACIFIC PRESS

新历史合作社出品

《我们的历史》总第8期

主编：唐建光

购书平台：多看阅读、亚马逊、掌阅、拇指阅读、字节社
豆瓣阅读

互动平台：

新浪微博：我们的历史-OURHISTORY

腾讯微博：我们的历史

公众微信：我们的历史

联系我们：

编辑部：010-57423216

传真：010-84084564

邮箱：ourhistory2013@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8号（附图）



关于我们

我们的历史
our history

“我们的历史”是新历史合作社推出的历史产品品牌。由这本数字杂志开始，您将会看到以“我们的历史”为统一品牌的网络产品、图书产品、活动产品、纪录片、电视节目，以及微信、微博等多种媒体形态呈现并传播的历史内容。

从纸张到电子，从文字到影像，从眼睛到心灵，无论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的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新历史合作社

我们关注历史，我们致力传播；我们执着真相，我们求索答案；我们回望过去，我们前瞻未来。

这是一个专注于历史记录与传播的同人平台，欢迎您的关注、参与和加入。

联系我们：

新浪微博：我们的历史-OURHISTORY

腾讯微博：我们的历史

公众微信：我们的历史

编辑部 010-57423216

产品部 010-57423217

市场部 010-57423218

传真 010-84084564

公共邮箱：ourhistory2013@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8号

目录

你从何处来？

追寻人类足迹计划：我们都有共同的根

“从哪里来”

遗传学研究的黎明

口腔上皮细胞与人类祖先的联系

走出非洲：一首数万年的迁徙史诗

“线粒体夏娃”

“Y染色体亚当”

寻找基因地图

出非洲记

入中国记

X女孩

从西伯利亚到中国

我们都有一个家

画一张亚洲人起源迁徙的地图

从南向北：我们都是南方人

由北向南：我们都成了中国人

交锋：缺失的五万年

解密田园洞人

我们是“北京人”后代吗？

非洲来客

“人种间基因差别只有8%”

被消解的基因多样性

追寻汉语的祖先

语言的足迹

东亚同源？

稻米的密码

来自基因的答案

隐藏于昆仑神话中的汉藏语族始祖源流

“西王母”真相

寻找汉藏语族的共同父系始祖

羌族源流：西北族群与南方族群的混合

汉族源流：炎黄都可能是古羌？

寻找丢失的密码

数千年前的遗骨再说

“侏罗纪公园”的幻想与现实

拼出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地图

后记

中国故事

你从何处来？



图一：1904年绘制的亚洲各国人民的种族多样性画像。

中国人来自哪里？谁是我们最早的祖先？

这个问题，必须从远古人类出非洲开始讲起。早在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中就写道，“人类的早期祖先曾经生活在非洲大陆，而不是别的地方。”

但是，正如“人类是‘猴子’变的”这一命题曾经引起几乎全人类的抵制一样，人类——包括中国人——来自非洲，最初也同样不会为人们所顺利接受。

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陆续发现的远古猿人化石，尤其是东非的猿人化石，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个事实。

于是，科学家据此推测出了这样一幅图景：较早前的发现是，自“人类”从200万年前走出非洲，进而散布在各地之后，我们的先祖就各安其所，各得其命，他们在旷古洪荒的原野上采摘，在泥沼溪流中渔猎，在幽暗的岩洞中繁衍，生生不息，延绵至今。

然而，正当这一图景渐渐为学界所接受之时，科学家们又有了新的发现：15万年前，人类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非洲祖母”，今天的所有人都是她的后代。我们的先祖从东非出发走走停停，直到6万年前才到达东亚南部，而后渐次进入到我们如今生息的这片广阔大陆。

中国人从非洲来，与我们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其实也不矛盾。在20世纪20年代的考古发现后，我们一度曾有新的答案：我们来自“北京人”。但是后来水帘洞人的发现，证实我们跟北京人没有血缘关系。

反而是“炎黄子孙”这个说法，隐藏着远古人类自西部进入中国大陆的事实：昆仑神话中的汉藏民族远古图景、汉藏语系中的语言传承密码……所谓炎帝、黄帝，大约就是远古青海一代古羌部族的首领。

我们的迁徙路线图正越来越清晰，但科学家们却并永远不会驻笔，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或许正在于他从不会停止从各种角度探索一个命题：我们从哪里来，又向何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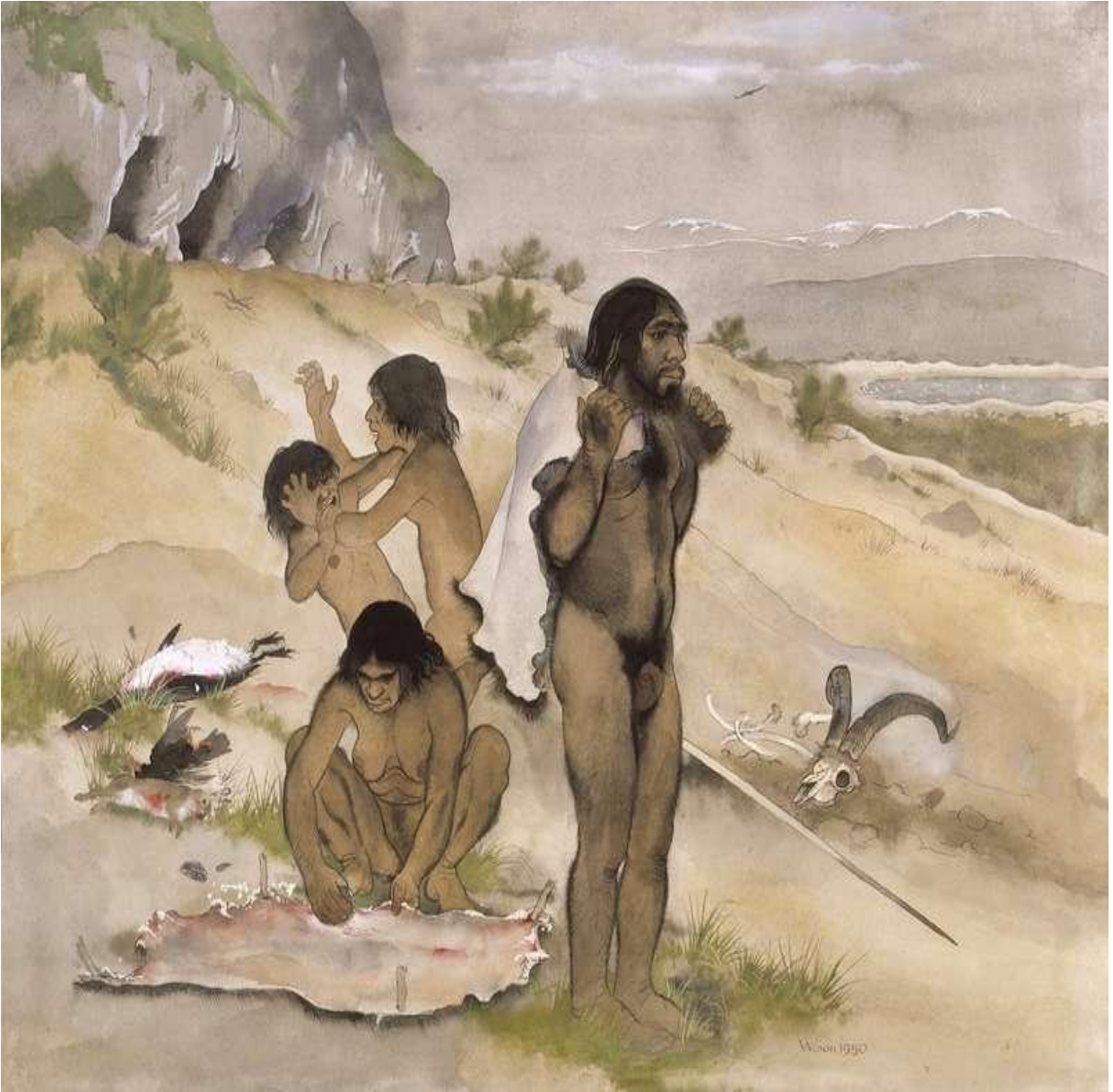
追寻人类足迹计划：我们都有共同的根

人类为什么会有体形、外貌、肤色的区别？《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诗》一书的作者斯宾塞·韦尔斯，描绘了这样一棵人类大家族的谱系之树：从前，人类大家庭成员很少，并都居住在非洲大陆，因为干旱与饥荒，一群人离开了家乡，登上了冒险旅程。他们这些分支散布开来，一直延伸到世界的尽头。我们都是他们的孩子，我们都有共同的根。

文/邸笑飞

“从哪里来”

1856年8月，两名采石工人在德国杜赛尔多夫市郊区一个石灰岩洞清理碎石时，起出了一片骨盆、一个眉棱隆起的头颅骨以及一具骸骨的其他部分，两人把这些骨头拿给他们的领班看，领班以为这是一头熊的遗骨，而当地一名教师兼业余博物学家鉴定后认出，这是一种不同于现存人类的遗骨。这具遗骨后来定名为尼安德特人。



图二：尼安德特人生活复原画像。

尼安德特人发现三年后，1859年，达尔文就发表了《物种起源》，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学说。达尔文宣称，也许人类不是由一个全能的神所创造的，而是由比较早期的生命演化而成的，这些早期生命可能包括穴居的原始人类。达尔文的想法使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乃至现在的基督徒觉得可怕极了。伍斯特主教夫人甚至说：“我们是

猿猴的后裔？希望这不是真的。假如是真的，那我们就得祈祷这事别让人家知道。”

但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科学界终于慢慢接受了“人类是由猿类进化而来”这一理论。然而人类起源于哪里仍然存在很大争议。达尔文曾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中推测，非洲是人类的摇篮。另一位进化论者海格尔则在《自然创造史》一书中主张人类起源于南亚，还绘图表示各人种由南亚中心向外迁移的途径。为了证明人类的起源地，考古学家纷纷致力于发现猿和人之间的缺环。



图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

1890年，在爪哇工作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医生欧根·杜波斯在爪哇中部特里尼尔一条河岸挖到一个头骨，次年又在同一地点发现一块大腿骨，这个化石颅骨低平，额骨倾斜，股骨长直，适于直立行走，杜波

斯相信自己发现了猿和人之间的缺环，将这种新发现的化石命名为“直立猿人”。“爪哇直立猿人”的发现使人类起源南亚说为之一振。然而1927年，中国发现“北京人”化石，中亚起源说流行起来。

但从20世纪起，在南非和东非，有不下20个地点发现了早期人类化石；匈牙利、土耳其、希腊、肯尼亚都发现了原始人类化石或遗骸。这样看起来，世界各地都曾有人类祖先出现，因此多地区起源说逐渐开始占上风，这一学说认为，世界各地的人类是独立起源，即由各地的非洲直立人、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东亚直立人各自独立进化为现代人类的几大人种。

但是，这一学说亦有缺陷，比如不能证明同一地区的化石之间具有直接亲缘关系，因此在人类学家内部也有持不同意见者。但是，对多地区起源论提出最大挑战的是分子人类学界。

遗传学研究的黎明

1944年，一名叫做路卡·卡瓦利·斯福扎的意大利人考入帕维亚大学学习药学，不久他放弃了这个专业，开始了遗传学的研究，师从著名果蝇遗传学家布扎提·特拉维索。

为了解读不同人群的相互关系，从1951年开始，斯福扎开始研究血液多态性，他带着几名助理，在乡间收集血液。这次，研究者得到教区神父的帮助，他们常常在周日弥撒后，在教堂的圣器保管室内为参加弥撒的村民们抽血。对这次收集的血液进行研究后，他们发现山区村庄血型分布有很大差异，而山谷中村庄差异没那么大。

此后，斯福扎和合作者爱德华兹分析了世界各地15个人群的血型类型。研究结果显示：非洲人处于最靠树根的位置，欧洲人和亚洲人“丛生”在一起。这一结果，首次清晰、直接、令人震撼地反映出了非洲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被后来的遗传学家们称为“经典的多态性”。

斯福扎开始对人类的遗传关系进行研究之时，正是遗传学迅猛发展的时期，1953年4月25日，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在《自然》杂志报道了DNA双螺旋结构，1962年，他们通过X射线确定了双螺旋结构。



图四：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在展示DNA双螺旋结构。

这时，确定人与人的遗传关系最适合的样品已经到手——DNA。DNA是长串复合分子，它能够记录人的演化，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一份历史记录。

这是分子生物学的巨大进展，也使得一个新的学科出现：分子人类学。顾名思义，这一学科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引入人类学研究领域，试图通过研究人类DNA中所蕴藏的遗传信息来揭示整个人类的形成与演化过程。

其中基因的变异，是研究人类多样性的关键。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携带着约30个全新的变异。这些突变的发生是随机的，就如同博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突变”所“抽中”的个体，而进化实际是由基因变异引起的。要确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或者说他们是否属于同一物种，重要的一点就是了解他们的基因。

同时，基因的这种快速频率可预测的中性突变还具有分子钟的作用，它就好比时钟转动时的滴答声。通过中性突变频率和两个族群间DNA突变的次数差，就可以计算出基因突变距离现在的时间，也就是说此项变异能够追溯到的“祖先”生存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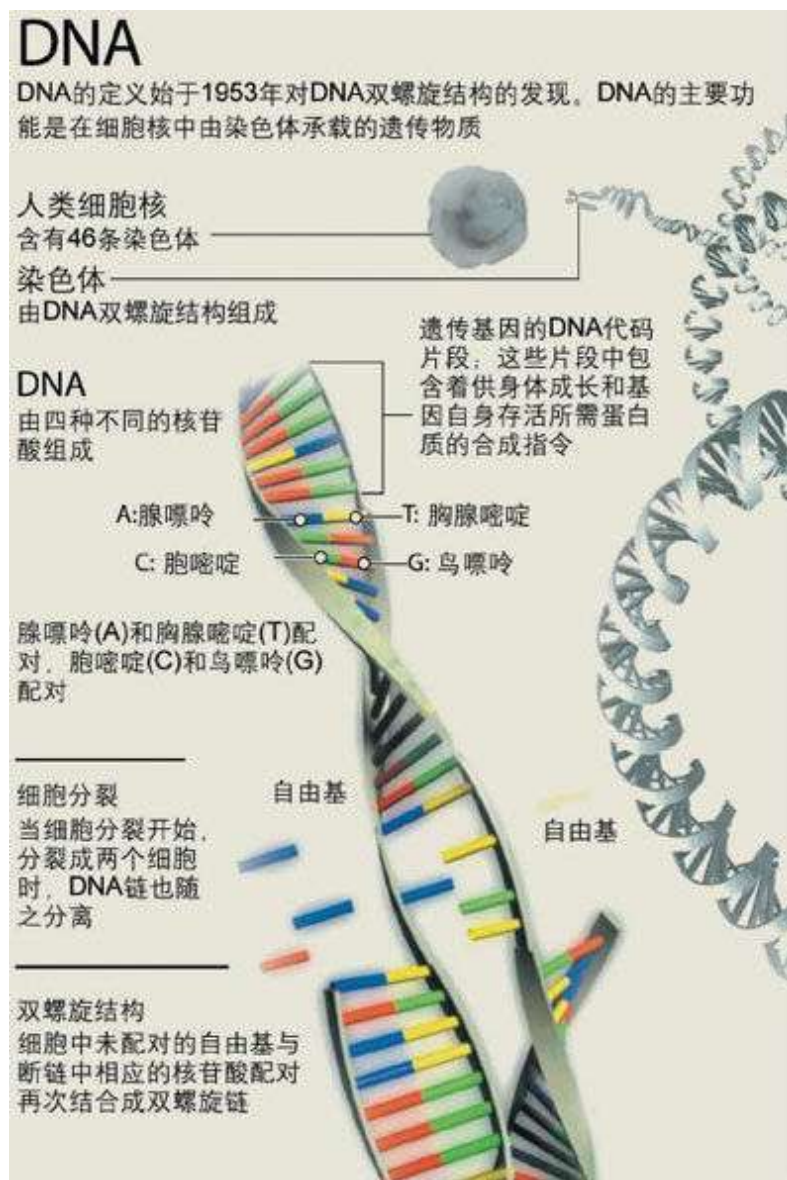
口腔上皮细胞与人类祖先的联系

但20世纪60年代，在实验室操作DNA就如同大象弹钢琴一样困难。因此研究者只能使用蛋白质，通过研究蛋白质的氨基酸顺序（这个顺序由DNA的核苷酸顺序决定），可以稍窥DNA的差异。

直到1973年，生化学家斯坦利·柯恩和赫伯特·博耶发现了如何切割DNA，如何把不同生物体的DNA接合在一起，以及如何在细菌体内培养接合的DNA，这些研究使得人们可以对DNA进行精细研究，遗传工程的时代终于开始了。

如何操作DNA的问题解决后，分子人类学家们面临另外一个问题：染色体重组。每当精子和卵子结合，染色体总是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这种重组使得我们染色体上的DNA如同一副被反复“洗牌”的扑克，不断地发生变化，最后很难找到其最初的图谱。而如果找不到最初的图谱，就难以推算共同祖先的出现时间。

20世纪80年代，遗传学家有了新思路，研究线粒体DNA。这些位于线粒体内的DNA，与一般位于细胞核内的DNA有不同的演化起源，可能是源自早期细菌。而线粒体的DNA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重组。



图五：环形线粒体DNA图谱。

这样，我们可以开始阅读每个人的血液中流淌着的关于我们自身历史的大书，发现我们的祖先是谁，他们从哪里来。

如今，只要用一个棉签擦拭面颊，获得口腔上皮细胞，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究竟与世界上哪个地方的人拥有共同的基因，了解自己家族进化的历程，比如，你是不是和英国女王或者成吉思汗有亲戚关系。

2005年，美国原住民万帕诺亚格族族长迈克尔·马克雷就试了试，他想了解自己家族拥有文字记载之前的族系史。尽管考古学提出，万帕诺亚格族祖先几个世纪前从西伯利亚而来。但DNA能够更好地揭示他们的祖先何时从亚洲跨越大陆桥来到北美，和哪些部族有血缘关系。除他之外，上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贡献了自己的口腔上皮细胞样本。

口腔上皮细胞和人类的祖先，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这便是《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个专题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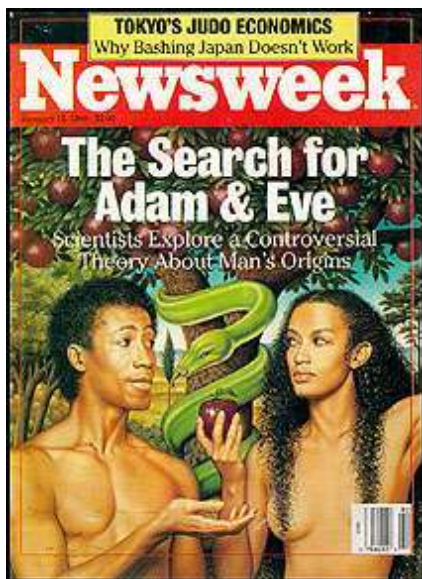
走出非洲：一首数万年的迁徙史诗

科学家早就发现150万年前，直立人第一次“出非洲”，它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到达东亚的进化为爪哇猿人、北京人等，留在非洲的一部分在10万到20万年，进化成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也就是后来走出非洲的那批人类。

文/邸笑飞

“线粒体夏娃”

1987年，美国《新闻周刊》封面上，一个半裸的黑皮肤夏娃把一个苹果拿给一个黑皮肤的亚当，其内文介绍道：“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生活在15万年前的非洲祖母，今天所有的人都是那个她的后代。”



图六：1987年，美国《新闻周刊》有关“线粒体夏娃”的封面。

这无疑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得出这一结论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瑞贝卡·卡恩和艾伦·威尔逊。

这是线粒体DNA研究中所得出的最著名成果之一，卡恩为此曾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胎盘，因为其中含有丰富的线粒体。他们研究了147个样品的相互关系后，画出它们的线粒体DNA谱系。卡恩的研究思路是：如果两个人的线粒体DNA在一个多态性位点共享一个变异，那么它们便有共同祖先，这样分析所有样品的相互关系后，分子人类学家就可以构建一棵家谱树，进而追踪到所有族群的共同母亲——所谓“线粒体夏娃”。现代人的基因可以追溯到大约15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女性（实际上，夏娃的生存年代是一个区间，在大约15万到18万年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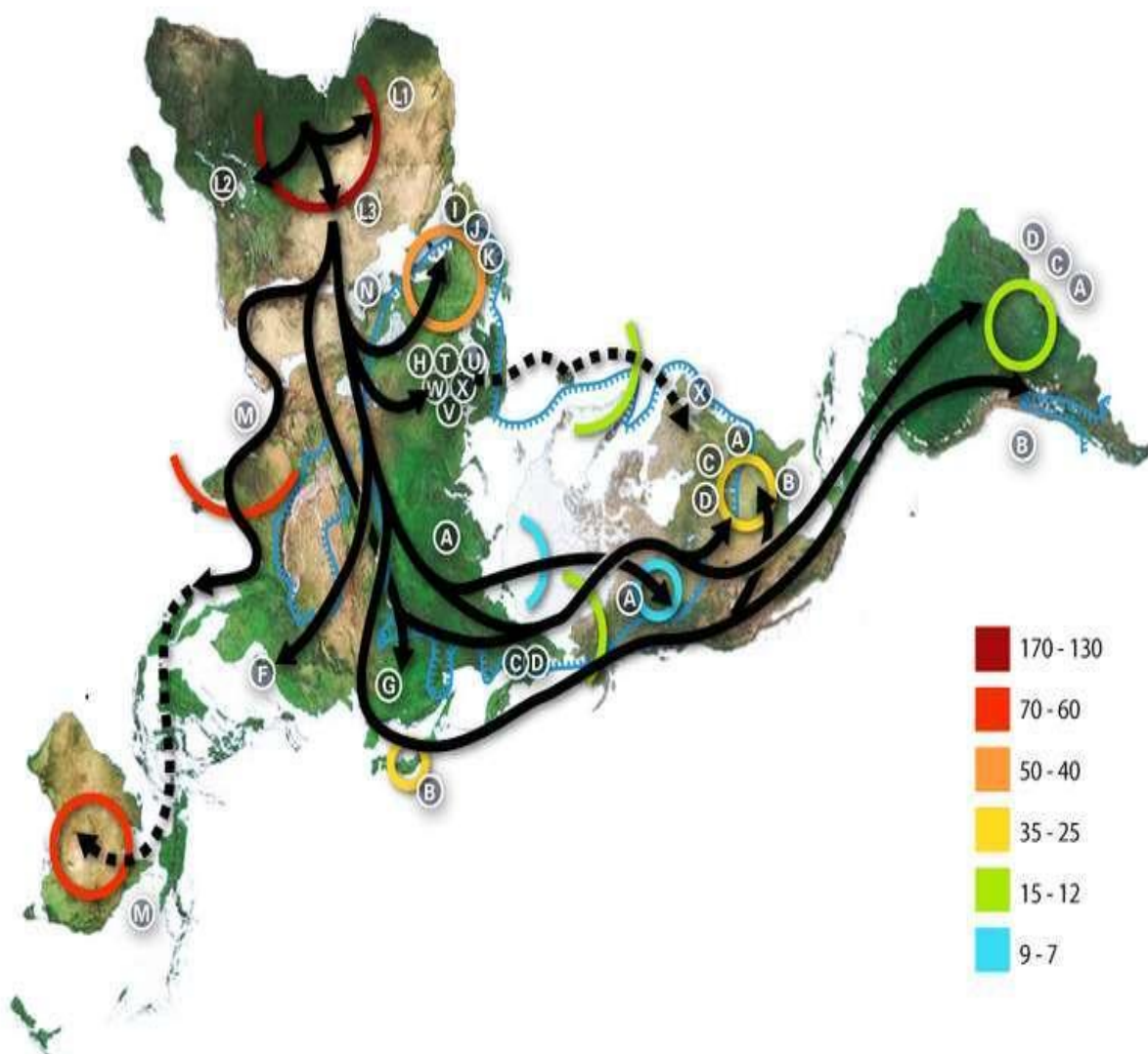
“非洲起源说”刚刚出现时，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却在人类学家中遭到严厉批判，他们找出一些分析漏洞，比如有人指出，这个研究使用的黑人基因是来自加勒比海，而不是非洲，因此基因上可能已经产生混杂。

但随后遗传学家分析线粒体以外的DNA的时候，亦发现了溯祖现象；后来试验者使用非洲人的基因进行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证实了人类的“夏娃”确实在非洲。

1994年，根据线粒体DNA特征的分组结果，英国科学家布莱恩·赛克斯又提出，几乎每一个有欧洲本地血统的人都是由4.5万年前迁入欧洲的7位女性祖先繁衍而来的，这7位女性被他称作“夏娃的七个女儿”。

因此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是无可置疑了：我们所有人共同拥有一个生活在大约15万年前的非洲祖母。她的后代走出了非洲，有了我们。

这并不是人类的第一次“出非洲”，事实上，科学家早就发现150万年前，直立人第一次“出非洲”，它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到达东亚的进化为爪哇猿人、北京人等，留在非洲的一部分在10万到20万年，进化成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也就是后来走出非洲的那批人类。



图七：根据粒线体DNA之群体遗传学推断出的早期人类迁徙路线。（图例中的数目表示距今年代，单位为千年）

或许还可以加上较近的一次：奴隶贸易所引发的非洲人口向外迁移。在16世纪初期，首批非洲奴隶被送往新大陆，后来的岁月中，约有1200万名非洲奴隶横渡大西洋，在彼岸安家。尽管出于人为因素，这也成为一条基因迁移链，在他们的身体里留下了痕迹——很多欧洲、美国黑人身体上带有典型的欧洲标记——M173，就是这次移民所留下的基因标记。这我们将在后面讲到。

“Y染色体亚当”

通过线粒体找到的一定是“夏娃”，而非“亚当”，是因为线粒体所含DNA全部来源于卵细胞，因此其DNA分析只能追溯母系谱系。

所以，人们接着会提出一个问题：找到了夏娃，那么亚当在哪里？科学家们也是如此，在发现人类基因历史的“夏娃”之后，随后便试图去寻找基因历史上的“亚当”。

发现夏娃使用的是在母系之间传递的线粒体DNA，那么研究男性，可以用什么呢？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有Y染色体。

X、Y染色体是性染色体，而男性的“XY”两条染色体只能在小区域内配对，而在绝大部分区域都不能和X重组，这样在细胞分裂形成染色体时，Y染色体永远避免了被洗牌的命运。同时，Y染色体携带的核苷酸数量远高于线粒体DNA，因而研究人员拥有更多的多态性来区分不同的人类族群。

当时对Y染色体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很多，包括两个彼得——彼得·昂德希尔和彼得·欧芬纳。昂德希尔最初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海洋生物，毕业后进行了一段商业研究，后来转而进行分子生物技术研究，在斯坦福大学的路卡·卡瓦利-斯福扎实验室；而欧芬纳则是化学家，也在斯坦福大学应用高效液相色谱技术分离DNA，他对Y染色体很感兴趣。

正如沃森和克里克合作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这又是一个跨学科的优秀合作的典型。欧芬纳所掌握一项可以快速检测DNA变异的手段——“高效液相色谱技术”。而昂德希尔则通过对这些变异进行分析，建立“家谱树”，从而得出人群之间相互关系。

2000年11月，《自然遗传学》杂志发布了彼得·昂德希尔、彼得·欧芬纳以及其他19位研究者的成果。长达21人的作者名单，即使在共同署名成为惯例的学术期刊，也是很少见之事，这说明了这项工作的突破性意义，以及它所集中的研究成果之多。

这项研究对全球1062个具有代表性的男性Y染色体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欧洲和亚洲等地的现代人群都起源于非洲，而美洲和澳大利亚现代人群又都起源于亚洲人群。这就是与“夏娃假说”相互印证的“亚当假说”，这位亚当，生活在距今5.9万年。



图八：有关亚当与夏娃的油画作品。

然而根据线粒体DNA，最早的现代人基因出现在15万年前的非洲夏娃身上，而亚当Y染色体的年代距今有5.9万年，这近10万年的时间差距该如何解释呢？实际上，迟到亚当出现的时间是在4万到14万年之间。而且在基因序列表中，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是独立的，因此它们是不是在同一时间相遇没有什么意义——从遗传学上来说，“亚当”和“夏娃”不必相遇，只要他们的基因分别流传下来就够了。

亚当和夏娃都有所属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他们还关心夏娃和亚当的子孙是如何散布到五大洲的。这，马上就会揭晓。

寻找基因地图

2005年，一项庞大的多国合作计划启动：“追寻人类足迹计划”。这项计划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IBM和韦特家庭基金会共同出资4000万美元，全球10个研究机构参与了研究。项目的目标是，在2010年前，在全球范围内收集10万人的DNA，从而描绘人类的迁徙地图。

10个参与研究机构分布在世界各地——中国、俄罗斯、印度、美国、英国、法国、黎巴嫩、澳大利亚、巴西、南非，各国分别收集本地区数据，并集中上报给项目总部，由IBM公司的一个科学小组运用高级数据分类技术来揭示样品中蕴含的新模式和联系。

如果找到了人类迁徙的地图，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一群群人是什么时候离开非洲大陆的；一路上，他们碰见过谁，谁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亚历山大大帝进军亚洲大陆、成吉思汗大军西进中亚、十字军东征这样著名的历史事件在基因上的“痕迹”。

这并不是异想天开。2008年黎巴嫩美国大学的皮埃尔·扎罗瓦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已经发现，黎巴嫩人的DNA中发现了通常在西欧人群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基因段：R1b，而且这一基因段只在黎巴嫩的基督徒中高频出现，而在穆斯林的基因中则看不到。同时参与这一研究的

科学家斯宾赛·韦尔斯，也是基因地理计划的总负责人解释说：“最可能的答案是这是十字军东征的结果”。

出非洲记

研究组发现人类起源的具体位置是东非，也就是今天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一带。而目前地球上最古老的人种之一则是生活在非洲西南部的非洲原住民布希曼人，也被称为桑族人——也就是电影《上帝也疯狂》中所描绘的民族，他们长得并不像常见的非洲人：个子矮小、拥有浓密的卷发、肤色较浅、眼皮较厚。也许通过他们，人们可以遥遥望见我们祖先的背影。这是否意味着，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南部，而不是东非大裂谷？一些古人类学家提出了南方起源说，但是这并不足以成为结论，桑族人曾经分布十分广阔，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也曾发现过和桑族人特征类似的化石。



图九：桑族人肖像。

非洲人大约10万年前开始外迁，也许是气候变化导致。15万年前，地球处于里斯冰川期的结束期，地球平均温度比现在低 10°C ，大约13万年前，气候开始变暖，因为海平面的上升以及大气湿度的提高，非洲降雨量增加，12万年前，地球又开始逐渐变冷，至7万年前迅速变冷。美国地球物理学家罗伯特·沃尔特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认为非洲大陆在上一个冰川时期出现的大范围干旱，使现代人迁徙到了沿海地区。

如果把几万年前的人类比作旅行者，他们的迁移过程，就像在一系列相互交联的线路上移动，只是速度非常缓慢。在某一特定线路上，当地人都拥有共同的遗传标记，因此科学家利用字母和数字，为这些线路编号。

大概10多万年前的，非洲人开始向外迁移，第一个发现的非洲以外的，是生活在10万年前的男性远祖基因，科学家给它起了个数字化的名字为M168，在女性远祖的基因谱系上也找到了线粒体L3，就是他们的后代走出了非洲。

大约9万年时，M168上分出一个新的标志，叫做M130，同时还有一个线粒体M，M130和线粒体M相伴随踏上了旅途。他们最有可能的路线是沿着海岸前进，因为海滩容易找到高蛋白质的食物，在非洲之角东部的厄立特里亚，我们发现了距今12.5万年的蛤和牡蛎壳化石，混杂着人类的石器，这说明人类曾以这里的海洋资源为生。



图十：男性迁徙图。

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低很多，澳大利亚和伊利亚以及美拉尼西亚许多岛屿连在一起。他们在沿海捕捞的过程中，学会了使用木筏，木筏帮助他们从非洲到印尼半岛，再到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等地，他们一代代向前推进，可能是为了寻找食物、水或者制造工具的石头。这次离开的人群，形成了我们后来所称的棕色人种，他们到澳洲的时间可能是6万年，在东亚大陆散布开则是4万多年前，被称为早亚洲人。

棕种人到美洲还没有遗传证据，尽管在南北美洲都发现了M130标记，但是由于缺乏时间估算，不能确定是棕色人种留下的还是后来的移民带去的。但许多古人类遗骨和考古遗迹的发现证明棕种人曾到达美洲，比如美洲古老的奥梅克文明留下的石刻头像，很可能就是棕色人种留下的。如果他们到达美洲，应该是使用木筏，因为当时白令陆桥一片冰雪覆盖，人类无法通行。

这些棕色人种文化相对较低，没有精湛的狩猎技术保证每次捕猎都有收获，因此他们不浪费任何食物来源，从安达曼到伊利安，棕色人种始终有着食用人类死尸的传统，也许外人听来毛骨悚然，对棕种人来说却是自古流传下来的部落生存必需的准则。

大约与M130同时，出现了一个标记M89，表明人类通过北非由陆路进入了欧亚大陆。不久M89上分出了M9，这是所有欧亚人的祖先。M9的后代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向东移动时出现变异，分化出了M20、M45和M175，M20主要在印度，M45向东迁徙时遇到了天山的障碍，无法进入中国的西北地区，成为中亚人和部分印度人的祖先……

近十几年，科学家分析了大量DNA，人类的出“非洲记”已具备了大部分的细节，但对人类迁徙史的回顾，仅开了一个头。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是怎样来到东亚，进入现在中国的，下面即将展开的是另一场旅途——入中国记。

入中国记

“X女孩”的DNA检测结果显示，她既不是早期人类，也不是穴居人，而是一个此前未知的人类种群。这一发现，意味着人类族谱至少有3个截然不同的成员：现代人、丹尼索瓦人和穴居人。

文/叶毓蔚

黄色人种的近祖之一，是3万~4万年前出现在中亚或南西伯利亚的Y染色体M242，它是M45的后代，他们被天山阻挡后，转向中亚和印度，然后一部分人移民进入了美洲。这批移民至少分为三批，在不同时间到达美洲：第一批是3万年前，由中亚来的部分人走过白令陆桥，到达美洲后南下，成为南美和北美南部大部分的印第安人；第二批在2万年前，从南向北经中国东北到白令陆桥，占据了北美北部；而大约3千年前，爱斯基摩人和阿留申人从白令海峡到美洲，是第三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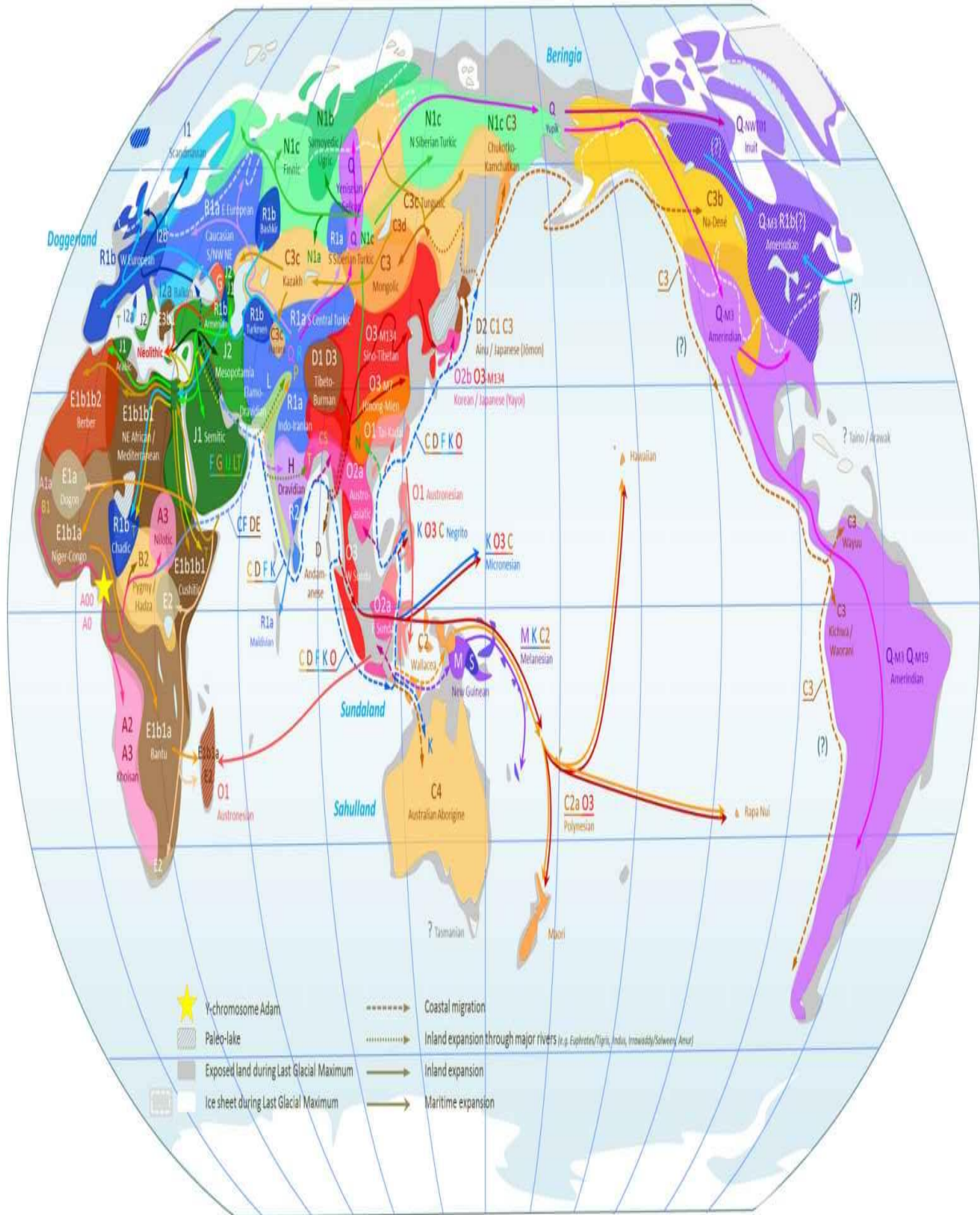
另一支近祖M175，则继续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向东、向北迁徙，绕过中南半岛进入中国，他们是从东非来到东亚的第二波亚洲人：晚亚洲人，也就是黄色人种，他们的扩散速度很快，从西亚进入印度河流域，穿过南亚次大陆北端，大约3万~4万年前到达东南亚地区，只用了棕色人1/5的时间，在两万年前的玉木冰河盛期，黄种人进入中国，由南往北分布，整个扩张开来。

由于棕色人种到达较早，最初到达的黄色人种还没有能力和棕色人种抗争，后来黄色人种逐渐与棕色人种争夺地盘，由于黄色人种先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在技术和体力上都占优势，他们逐渐得以对棕色人种进行屠戮和驱逐。

World Map of Y-Chromosome Haplogroups

Dominant Haplogroups in Pre-Colonial Populations

with Possible Migrations Routes



图十一：人类Y染色体迁移分布图。

尽管这一事件已经非常久远，我们仍能从考古或者历史记载中发现蛛丝马迹，和DNA的分析结果暗合——在商代的人骨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棕色人种的成分，殷墟的祭祀坑里有大量异族俘虏的头骨，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棕色人种；同时地方史料记载，清代广东官宦家庭曾养过“小黑人”；在台湾，最早到达的南岛语系原住民有着灭绝“矮黑人”的传说。这些传说或史料，都是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忆。黄种人对棕种人的屠戮和驱逐导致现在东亚人群中，棕色人种的标记M130非常少见，但现在仍存在的少量棕色种人可以证明他们曾经的历史——比如菲律宾吕宋岛中部、马来半岛北部的山地、安达曼群岛的亚洲黑人，印度半岛的达罗毗荼人。

X女孩

此前，线粒体DNA检测结果还表明，非洲来的人类没有与其他古人类通婚。但在2011年，古人和现代人细胞核DNA的重新分析对比表明，大多数现代人，都携带了当地古人类的DNA痕迹。

事实是，现代人的祖先在10万年前离开非洲后，先后遇到了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并与之交融繁衍。

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因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河谷的人类化石而得名。3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生活的足迹，曾遍布整个欧洲和亚洲西部。并且经历了此后的几次冰河期考验。但在2.8万年前，尼人却消失了。



图十二：根据骨骼骨架重建的尼安德特人标本图。

现代基因组测序研究表明，大约10万年至5万年前，尼安德特人曾在中东地区与走出非洲的早期现代人发生过交融，而后，他们的后裔散居欧亚各地。

至于丹尼索瓦人，那是3万年前上一个冰河时代的神秘人类种群。2008年，在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脉的丹尼索瓦洞，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人类的牙齿和指骨，一同发现的还有一些装饰品和珠宝。



图十三：丹尼索瓦人画像。

指骨的主人，是一名5到7岁的小女孩，她被称为“X女孩”。其DNA检测结果显示，她既不是早期人类，也不是穴居人，而是一个此前未知的人类种群。这一发现，意味着人类族谱至少有3个截然不同的成员：现代人、丹尼索瓦人和穴居人。

丹尼索瓦人在身体结构上与穴居人和现代人存在差异，但他们也是用两条腿直立行走。他们的牙齿，与100多万年前灭绝的直立人等生存年代更为久远的人类祖先类似。

之后，科学家们从新几内亚地区的居民中取得基因样本，对比发现美拉尼西亚人至少有4%~6%的基因来自丹尼索瓦人。而东亚大陆上的彝族，受丹人血统影响也较大，与美拉尼西亚人相当——东南亚人群普遍与丹尼索瓦人有亲缘关系。

这意味着，当时他们一定在亚洲广泛分布。然而丹尼索瓦人对中国人（北京组）、日本人等的血统贡献，则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极为微弱。

从西伯利亚到中国

证实远古人类曾从西伯利亚南下进入中国的另一个证据，是宁夏水洞沟遗址发现的石叶石核。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使用的石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通常都比较粗糙，且修理加工简单，北京猿人遗址也属于这一时期。

但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东西方文化面貌出现了较大差异。普遍认为，当4万年~5万年前，欧洲旧石器向具有中石器时代特征的狭长细石器形状过渡时，东亚大陆同时期的石器技术，仍然停留在旧石器时代。1923-1924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石叶石核，它既具有华北旧石器的传统，也包含了欧洲旧石器的风格。人们由此联想到，这是

否可以说明它与西方文化有联系呢？生产这些石叶的人群，是否来自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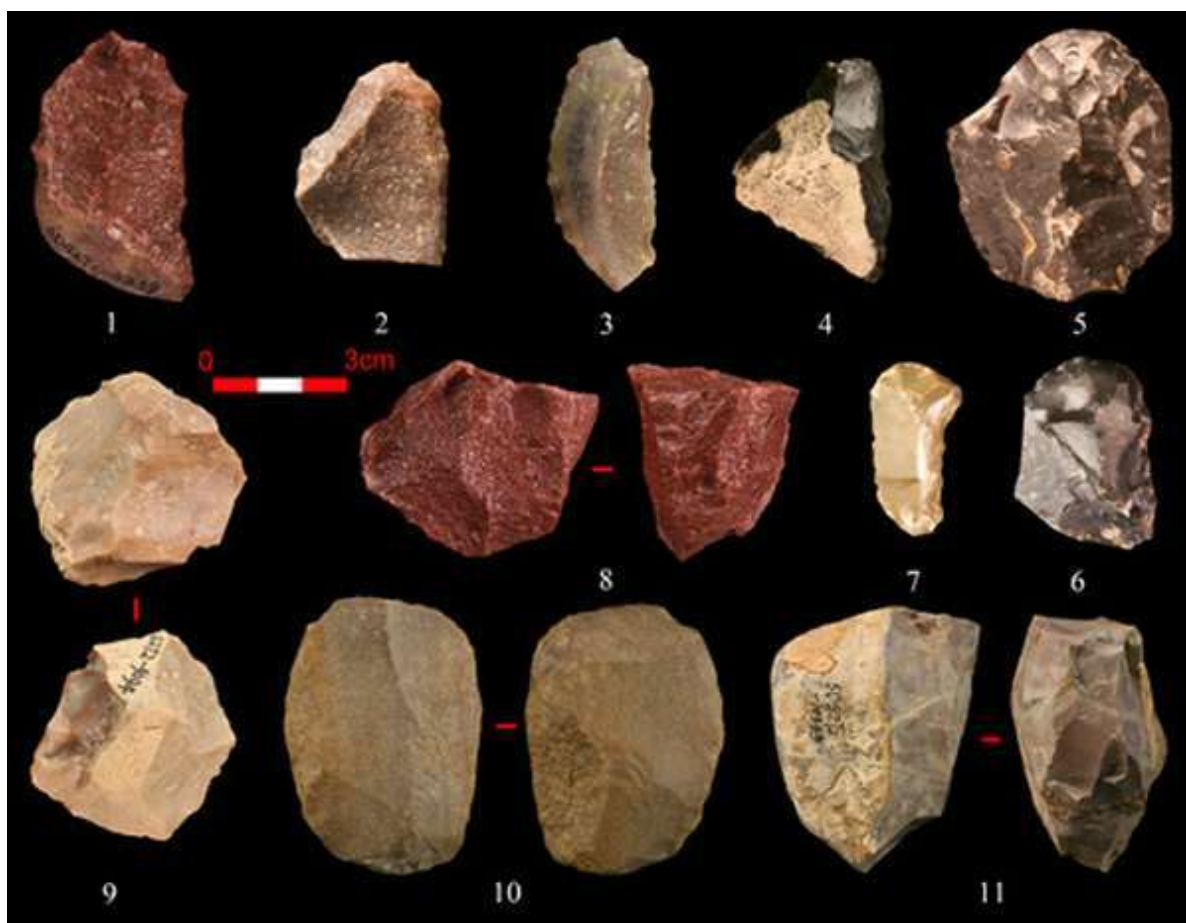
图十四：水洞沟古人类居住遗址。

当他们详细观察了阿尔泰地区、中亚几处重要旧石器中晚期遗址的标本后，终于信服：水洞沟人的源头在北边，确切说在西北；阿尔泰地区和中亚即使不是水洞沟先人的始发站，也是重要的驻足地。

在这里，8万年前就出现勒瓦娄哇技术与石叶技术的混合体，前者最初发现于法国巴黎近郊勒瓦卢瓦-佩雷的一种石器制作技术，因为在打下石片之前，要对用来打石片的石核进行精心的修理，所以也称为修理石核技术。

修理后的石核像个倒置的龟甲。打下的石片薄而规整，常常不加修整便可当作工具使用。石片背面布满石片疤，台面上也有许多小疤片，这些是修理石核留下的痕迹。

因此，在遥远东方的水洞沟遗址中发现修理石核技术，无疑是当时的震惊性新闻。



图十五：20世纪20年代，发现的水洞沟第二地点出土的石核。

5万年前石叶的生产，已是如此系统、成熟和规范，一些产品与水洞沟的出土物惊人地相似。不仅如此，在丹尼索瓦等遗址，还出土了精美的刻有螺旋条纹的鸟骨和带有钻孔的兽牙、石珠、骨珠，最令人惊喜的是，这里竟然还找到了用鸵鸟蛋片制成的带钻孔的环珠，而这正是水洞沟人最明显的族群特征。

由此，一条伴随着石叶工业扩张的人类迁入中国之路渐渐清晰：大约在4万多年前，最早在西亚欧洲出现的石叶工业开始扩张，首先扩散到南西伯利亚；在距今约2.5万年前，石叶工业又逐渐演变成细石器工业，开始在远东地区广泛传播，先后进入蒙古、东北、日韩和新疆，最后到了宁夏水洞沟。甚至，近些年在中原腹地也发现了石叶工业遗存。

我们都有一个家

数万年前，现代亚洲人的一支，身上带着O3型的染色体，开始向北迁徙；数千年前，O3-122这一支种小米起家的人，开始向东向南扩展，最终遍布中国大地。

文/黄艾禾

9月初，是新学期开学的日子。复旦大学校园里，到处是报到的新生，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谭婧泽老师则带了几个助手忙着给新生做体检。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健康检查，她是要配合课题，对学生们进行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取得一批数据。“学生们来自全国各地，正好是不错的数据来源”，而建立庞大的全国范围的人群数据库，是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近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工作。

复旦大学的新生们以来自江浙一带的为多，但也有一些学生是从云南、江西、河南、山东等省考来。而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主任金力是上海人，李士林是吉林人，其他同事分别来自新疆、甘肃、江苏、湖北……谭婧泽自己是宁夏人。

谭婧泽是18岁离开宁夏的。到上海之前，她先到北京，在那里上大学和读研究生。毕业后，她又到了上海自然博物馆，再到复旦。从宁夏到上海，相隔“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故乡，已成为户口本或登记表上的“籍贯”，而对于她的下一代，宁夏只是母亲的老家，是自己的上一代向上海迁徙的一个源头。

那么再上一代呢？谭婧泽的父母都是宁夏人。父母的父母呢？他们怎么到宁夏的？再一代代追上去，他们的祖先又是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总有孩子向自己的父母问起，一代一代问了好多年。

我们在学校读过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人是从猿进化而来，进化是从数百万年前开始的。我们也都知道，北京的周口店曾出土了生活在6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似乎顺理成章的，我们都是“北京猿人”的后代。



图十六：北京猿人复原雕塑。

如果问今天的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也都知道黄帝大战蚩尤的传说，知道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是，具体来说，上古的猿人是怎么变成今天的中国人的？我自己又怎么成为今天的我的，会呆在这个地方？这中间的环节又是怎样一环环连接起来的？

从前的人们，有几种途径来回顾自己的来路：或是从洪荒年代口口相传下来神话传说；或是古墓遗址中挖掘出的文物器物及化石；或是前人留存下来的古籍记录。古籍记录非常有限，神话传说又太玄虚，而文物出土常常支离破碎，使我们对于我们的前世总是感觉扑朔迷离。

最近20多年，人们又多了一条认识自己的路径：分子遗传学，从DNA上找自己的源头。

画一张亚洲人起源迁徙的地图

199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褚嘉祐教授等人的一篇论文《中国人群的遗传关系》，在《美国科学院学报》上发表，在中国科学家中首先提出现代亚洲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

现代亚洲人类，当然包括中国人在内。也就是说，亚洲地区不存在从一两百万年前的直立人到现代人类的连续进化过程，“北京人”不是中国人的直系祖先。文章中的观点在今天看来都具有爆炸性。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这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近年来已经大致被学术界接受（当然还不时有一些不同的质疑之声），但在中国，尤其是在古人类学领域，一种观点仍然持“多地区起源说”，也就是说，中国人是从东亚地区已经发现的那些古人类化石的后代，是独立起源的。

“一想到今天，这篇文章已经发表10年了”，褚嘉祐回忆当年的一幕，“那篇文章，本来是想投《科学》的，结果《科学》觉得这个结论太大，想放一下，谈家桢院士就建议投给《美国科学院学报》。发表后，《自然》做了长篇转载。还发了一个评论。”



图十七：复原的人类迁徙途中生活场景。

褚嘉祐与他的合作者金力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是从医学研究开始进入分子人类学领域的。他们发现，同是病人，不同的民族或族群对同一种病的易感程度和抵抗能力都不同，这样就开始了对不同人群的基因的研究。“开始，我和金力一起，用中国28个群体的样本，看是不是有中国人自己单独的而非洲人没有的基因，结果没发现。我们也希望找到中国本地的直立人与非洲来的现代人基因融合的证据，但是也找不到。我们的‘非洲起源说’是这样来的。”

2001年，金力等人的一篇论文《东亚现代人的非洲起源：12000个Y染色体的故事》在《科学》上发表，为现代中国人的“非洲起源说”

又添了一枚重磅炸弹。具体说，褚嘉祐等人的第一篇论文，是应用“微卫星”标记（STR）来研究基因的，而金力等的那篇论文，是以父系遗传Y染色体标记来做研究的。金力说：“在做2001年的那篇论文时，我心想我是中国人，祖先是从非洲来的？我非要找出一个人，不是非洲人的后代。做了覆盖整个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的12000人、163个群体以后，我都傻眼了。我都不信这个结果。我对学生说，你把数据拿来看一下，看上去比较模糊的，你给我重新做一遍。又有400多个样本重做了，结果，还是这样子，那我没办法，我只能说，大概就是这样是对的。”

这两篇论文及其相关的研究，分别在2005年和2007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

2005年，金力和他的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加入了由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和IBM联手赞助的“基因地理计划”。“人群迁徙是个全球范围的项目。因为迁徙的人群，不仅跨国界，还要跨大陆的。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人在做，工具和手段也在发展中。结果导致各地各实验室用的分类方法和分子标记多有出入，许多数据不可比较。现在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参加这个项目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与各国的实验室相互很好地交换数据了。”

金力觉得，加入这个计划以后，视野更广了，“会从全球的角度去关心我们的研究”。三年来，他们采样的地区，伸延到东南亚的老挝、柬埔寨等国，因为东南亚是东亚现代人类的摇篮。在中国境内，他们大致沿两条路线去采样：一条是东南沿海一直往北上去，直到胶东半岛，到达东北；一条是从内陆的川、藏、青往北走。许多数据尚在整理分析之中，论文会陆续发表，但中国人的迁徙路线，已经大致可以勾勒出来了。

从南向北：我们都是南方人

2008年8月底，江苏淮安传出一条消息：该市开始兴建“南北地理分界线”，这个分界线的标志物呈球状，就建在穿淮安城而过的淮河大桥桥墩上。消息一传出，引起一片热议，新浪网上就该不该建这个南北分界标志举行投票，参与投票的155477人中，竟有145537人反对兴建，占93.6%，理由是：“完全是劳民伤财，有制造南北隔阂之嫌”。



图十八：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标志物。

其实，人们不必为中国的“南人”“北人”间的隔阂过分担忧。

按分子人类学家们的看法，现在的中国人，无论是看起来相对个子矮、人却显得更精明的南方人，还是相对个高，性格却更粗犷的北方人，最早都是从南方来的。

这里先要讲一点遗传学上的原理。遗传学家们发现，遗传基因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其实也就是人类起源所在的地方。这个道理是，人的基因的一些位点，在一定时间段里，是会发生突变的。这种突变积累得越多，就说明这个人群的历史越长。当人群的分化产生时，常常只是一小群人走了出去，这样他们携带的基因遗传多样性就不如原来的人群高。科学家们发现，在东非的人群，遗传多样性积累得最高，这是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特别是东非的重要证据之一。多样性最低的，实际是美洲的印第安人，因为他们走得离非洲最远，实际是现代人类迁徙的末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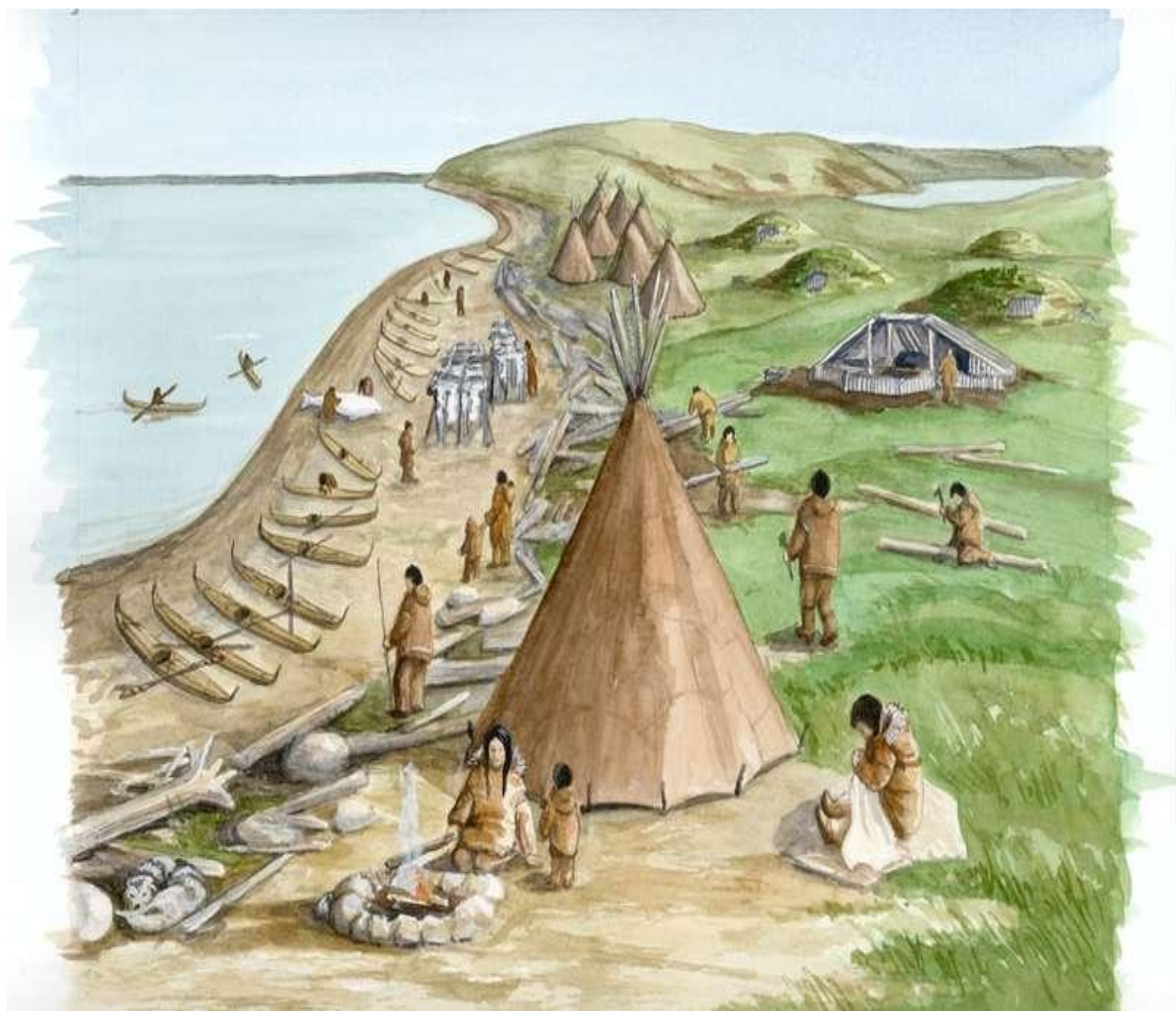
同样，分子人类学家们看到，在中国南方的人群中，基因遗传的多样性，是高于中国北方的人群的。这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从南向北扩展的证据。

在这里，分子人类学家们用Y染色体的标记，来描绘中国人的迁徙图，每一种标记，都是由于人群开始分化时，有一部分人带了这种新产生的基因位点走了，这种位点，就成了行进的人群的标记。“国际Y染色体命名委员会”把全世界的Y染色体分为从A到R的若干大的类型，而中国人所带的，主要是O型、D型，其中D型比较古老，属于“早亚洲人”，他们大概是至少6万年前就来到亚洲了；O型属于“晚亚洲人”，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身上都带有这种基因标记，他们大概是三四万年前来到亚洲的。

O型染色体又可以分为O1、O2、O3等亚型，相对应的，有M122、M95、M119等基因位点。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三万年前了，看看从基因图谱里展现出的我们的先民们的迁徙图景。

三万年前的时候，亚洲大地刚刚经历了一次冰川期。当携带着O型染色体的先民们来到这里时，他们可能已经发现，在他们之前，有一批现在被分子人类学家们称作“早亚洲人”的携带D型和C型染色体的人群，已经早在几万年前就在亚洲居住了。这些“早亚洲人”，当年可能是沿着海岸线前进，那里相对地形平坦，又方便捉鱼虾来吃。在冰川期的时候，海平面比今天低，许多今天的海岛当时都可以走过去。其中带有C型染色体的“早亚洲人”一直走到了今天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甚至澳大利亚。



图十九：复原的人类迁徙途中生活场景。

不过，今天的亚洲，“早亚洲人”分布得零零散散，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一些岛屿上还有一些个子矮小，肤色之黑不逊色于非洲黑人的“小黑人”，他们的染色体基本是D型。日本的虾夷人也是D型，大家普遍猜测是氏人后代的白马藏族人和藏族人，也有相当多的比例为D型，但是，他们的外貌与“小黑人”差距相当远，这是怎么变化过来的，至今还是未解的谜。在今天看来，亚洲大地上，经历过一次“晚亚洲人”与“早亚洲人”的竞争之战，技术和体力都占上风的“晚亚洲人”胜出，而“早亚洲人”，只在边边角角还有留存，剩下的，融入各地的人群中。

携带O型染色体的“晚亚洲人”们，到达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之后，慢慢扩张。这种扩张，并不像我们想象的，每天朝着一个目的地不停行进，而是一种人口的自然扩散。按正在耶鲁大学医学院遗传学系做博士后的李辉的说法，当族群人口发展到一定规模，这一块地区的资源消耗差不多了，就要分出一支人，向另外的地方去。所以这种迁徙，并不以从此地到彼地的步行速度为标准，它往往要经历上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历程。

“晚亚洲人”们分了两路走。

往南往东的一路，绕过老挝的崇山峻岭，进入了越南。在北部湾地区形成了侗傣语系祖先。这一支先人的Y染色体出现了O型的亚型，即O1和O2。O1型就是带有M119位点突变的那支。后来他们又从越南、广西方向进入中国，沿着海岸线往东北走，形成了百越民族。今天的黎族、侗族、水族、仡佬族、仡佬族、高山族、壮族、傣族等，都是他们的直系后代。这些民族在语言上、文化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所以也统称越人。那支带O1的人群，后来又继续向东北走，其中有一支在距今约1万年前时，到达山东的胶东半岛，形成为东夷人。

让金力非常高兴的是，经过三年的艰苦采样，他们在山东采到了非常有价值的样品，“把这条线接上了”。

晚亚洲人的另一支，是沿云贵高原的西侧向北走。他们主要是携带O3-M122型染色体的人们。在距今两万年的时候，这支人群中分化出了O3a3b型的一支，即是苗瑶语族的祖先，这支人，后来就往东去，

到达湖北湖南一带。而其他的人，继续向北走。他们身上仍主要是O3的基因，实际上，他们是汉、羌、藏等人的共同祖先。



图二十：羌、华族系分化和迁徙图。

到了距今8000到6000年前的时候，有一支人又从这个O3的队伍中分化出来了，从甘肃一带进入了河套平原。这支人身上出现M117的基因位点突变，他们开始从事农耕，种小米。这支人，就是今天的汉族的祖先。

而若干没有进入河套的羌人部落，在距今约3000年的时候，又调头向南向西，与在西藏的土著居民融合，形成了今天的藏族。

在2008年8月号的《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繁体）上，金力和李辉写了一篇文章《重建东亚人群的族谱》，其中画了一幅图，把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中国，分为“梁、雍、荆、扬、青（兖、徐）、豫、冀、幽、并”九个州，分别对应在各州境内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可以看出，当时在中国大地上，汉族的祖先，带O3的华族，只在河南

的裴李岗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他文化，如在湖北的大溪文化、在浙江的良渚文化、在内蒙古的红山文化，根据对文化遗址中古尸的古DNA的测定，分别是属于苗瑶族群、百越族、通古斯与古西伯利亚族群。当时的百越族和苗瑶族群，占据着南中国的大片土地，苏北和山东是东夷人占着，北边是通古斯人群，而华夏族只是河南甘肃一带一支不大的人群。



图二十一：中国主要古人类化石列表。

由北向南：我们都成了中国人

汉族成为今天世界上的第一大民族，是最近几千年的事。这几千年的事，在中国的古籍中开始有了记载，而近几年在中国人基因图谱上的发现，又和这些记载——开始衔接。

首先的发现，是中国人中，南方人和北方人确实存在不同。在金力、褚嘉祐主编的《中华民族遗传多样性研究》一书中，讲到中国的北方汉族、南方汉族、北方少数民族和南方少数民族间的平均遗传距离。这种遗传距离在北方汉族人群间最小，其次是南方汉族人群间的。再次，是北方汉人与北方少数民族间的、南方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而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之间的遗传距离明显高于以上的距离，南方少数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间是遗传距离最大的。

然而，在中国汉族中，无论北方人还是南方人，他们的Y染色体实际上都是以O3型为主，而且绝大部分是O3a3c。金力与李辉、文波合写的一篇论文《汉族的遗传结构：文化传播伴随人口扩张》中指出：根据对基因样本的比较，他们发现，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中，带有O3-M122基因突变的，北方人平均是53.8%，南方人平均是54.2%，但是，在南方少数民族中普遍出现的O1-M119和O2-M95，在南方汉族人中出现频率（平均19%）要比北方汉族人的（平均5%）要高。

九州出土新石器遗址及Y染色体类型对照表

州名	区域	族群	代表文化	Y染色体类型
梁州	秦陵以南至云贵南	孟高棉族群向藏缅族群过渡的人群	李家村文化	O2,O3
雍州	陕甘青藏	藏缅族群的古羌人	仰韶文化	O3a5
荆州	湖广	苗瑶族群	大溪文化	O3a4
扬州	北越至苏南	百越族	大盆坑文化、良渚文化	O1,O2
青兖徐州	苏北和山东	东夷族	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	未知
豫州	河南	华族、青州的夷族、荆州的蛮族	裴李岗文化	O3
冀州	河北	豫州、青州向幽州过渡的区域	磁山文化	O1
幽州	燕山以北	通古斯族群、古西伯利亚族群	红山文化	O1,O2,O3
并州	山西与蒙古部分地区	匈奴、突厥、乌拉尔族群	陶寺龙山文化、细石器文化	O3a5,N

图二十二：九州出土新石器遗址及Y染色体类型对照表。

这是说的Y染色体，即父系遗传的情况。如果看线粒体，即母系遗传的情况，则南北方汉族有很大不同。“东亚北部的主要单倍体在北方汉族中的频率（平均55%）比在南方汉族中（平均36%）要高得多。”如果不用专业术语，通俗地说，在母系遗传中南方汉族中的“南方成分”比北方人更多。

其实这里说出的历史史实，我们是可以想象的，而且也得到很多历史记录的佐证了。

在迄今的两三千年前中，发源于河套地区以种植小米开始进入农耕社会的汉族，是一个从西北向东向南的扩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携带O3-M122的汉族，人口大量增长，从北向南向着整个中国大陆蔓延开来，与南方种水稻的O1-M119交融。而这个过程中，两千多年间，又经历过几次因战争和饥荒带来的人口大迁徙，大规模的有三次：即发生在晋时的“永嘉之乱”，那次的迁徙，到了南朝刘宋初年时，南渡人口已达到90多万，占当时南方总人口的1/6；第二次，是发生在唐末的“安史之乱”，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北方地区；第三次，是北宋的“靖康之变”，随着北方大量劳动力和先进垦殖技术的南迁，原先的

“蛮荒之地”大都变成了“鱼米之乡”，在风俗习惯上南北方互相融合，经济上南强于北的局面完全确立。

人们判断，当时南迁的中原汉人，男性多于女性。这个民族迁徙与融合过程中，有相当多的汉族男性娶了土著的南方女性为妻。用李辉的简洁说法：在南方混合进南方少数民族成分最多的两个地区是浙江和广西。浙江汉人混入本土越人的成分大约 $1/4 \sim 1/3$ 。广西某些汉族群体则更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生活在中国南方的若干著名的汉族人群，如客家人、潮汕人。

2003年，李辉、潘悟云等人曾对客家人做过基因上的测试，写成《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指出客家人与中原汉族最近，基因结构中汉族结构占80.2%，类畬族结构13%，类侗族结构6.8%。人们一直在说，客家人是从北方中原移居过来的，这从基因上得到了证实。当然，这个迁徙不是一次完成，中间又渗进了不少当时地处湖南湖北的苗瑶语族人的血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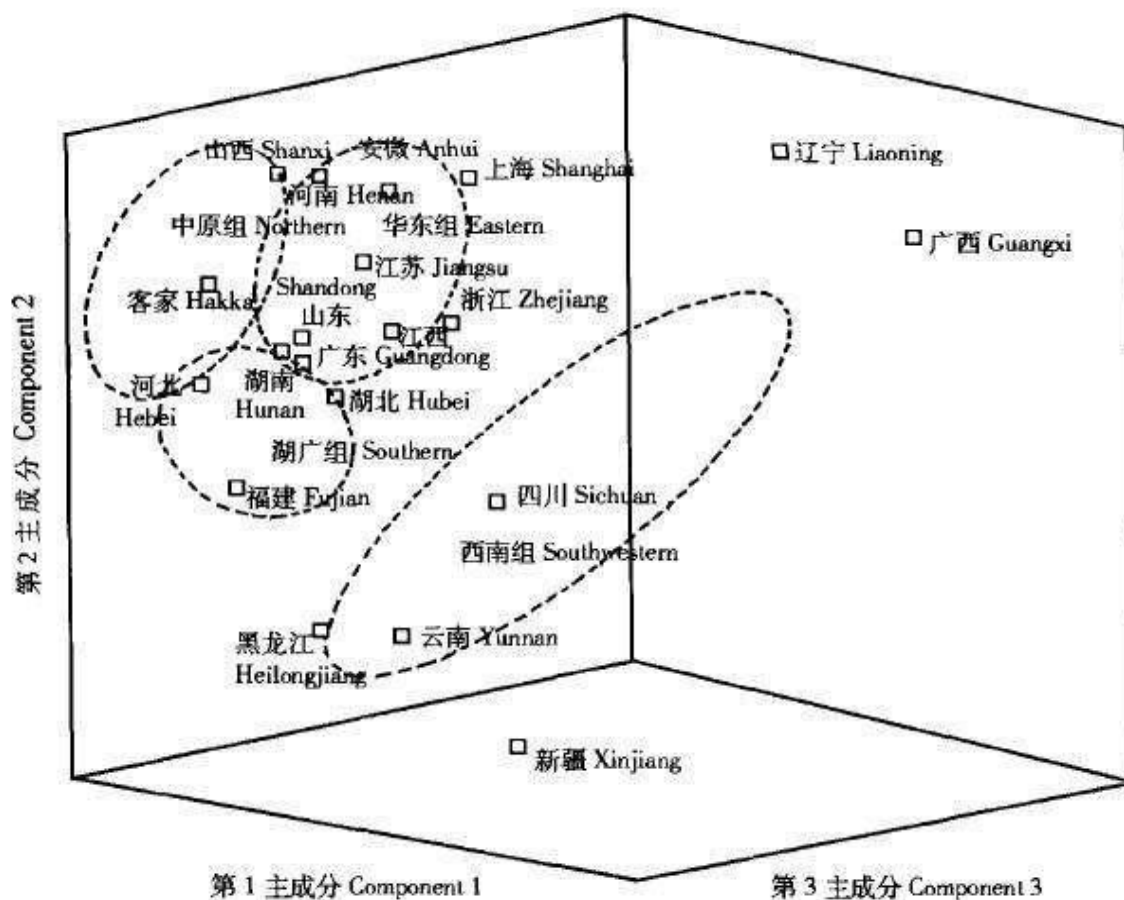


图2 客家人与各地其他汉族群体主成分分析前3主成分三维散点图
Fig.2 Principle component map of Hakka and other Han Chinese populations

图二十三：客家人与各地其他汉族群体主成分分析三维散点图。

那么潮汕人呢？最近也有研究论文出来。由许丽娜、冯国英等人写的《常染色体STR的证据支持潮汕人的中原汉族起源》一文就是讲这件事的。文章说，潮汕人与闽南人亲缘关系最为接近。而今天福建的汉族，“在父系方面几乎完全来自北方，母系方面明确来自南方的成分也很少（大部分是不明确来源）。广府人父系方面80%以上来自北方，母系中也不低。所以全国汉族的遗传一致性是相当明显的。”李辉说。而更早在福建居住的百越族群，在今人的基因中完全看不到了，这恐怕是汉代的强制移民的结果。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当年民族融合的另一面。

这里多谈一点南方汉族的语言。人们都觉得福建汉族的方言最难懂，广东人的粤语对许多人来说也如同一门外语。而李辉说：福建的方言来自于太行山两侧的上古汉语方言，又在福建孤立发展了这两千年。广东话主要来自中原西部的中古汉语，可能更接近长安音。“这些都是汉语内部的流变。语言的分化和遗传的分化是不同的过程。”

为了更好参与“寻找人类起源计划”，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团队成员每人都测试了自己的基因。李士林是纯粹的北方汉人，携带O3-M122，不过，他母亲是满族人，祖籍浙江的金力发现自己带了古越人的M119。

今天走在上海的街头，熙熙攘攘中你可以听到各地的口音，说上海是个移民城市，一点不错。只不过，有谁会从李辉脸上那两条弯下的眉穹中，看出他遥远的与云南傣族同源的血缘？

宁夏人谭婧泽已经适应了上海的生活，虽然她的普通话中还略带一点西北口音。当年潮汕人迁居到南方时，要克服相当大的不适应，“北方来的中原汉族人群在迁到南方定居以后，在人群基因库对于环境的巨大差异的适应过程中，会产生各种代谢的不协调。在潮汕地区某些疾病的高发可能就是这种不协调的结果……”许丽娜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不过，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谭婧泽适应得很快，“我现在也不太吃很辣的东西了。要听懂上海话，半年时间就够，当然现在讲上海话还不行。不过，在复旦，大家通常也都不讲上海话，都讲普通话”。

实际上，在今天的上海，川菜、湘菜相当流行，上海人也不热衷吃“本帮菜”，倒开始吃辣的了呢。

我们从哪里来？这问题千百年来一直在搅动着我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而我们往哪里去，似乎已经看得清楚。用金力的话说：“再过二百年，我们肯定都混合得一样了。”

交锋：缺失的五万年

在中国古人类的化石链上，出现了距今10万~5万年的一段缺环，而这被认为是涉及中国人起源的关键所在。这意味着，著名的“北京猿人”根本没有后代延续到现在，更和目前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

文/孙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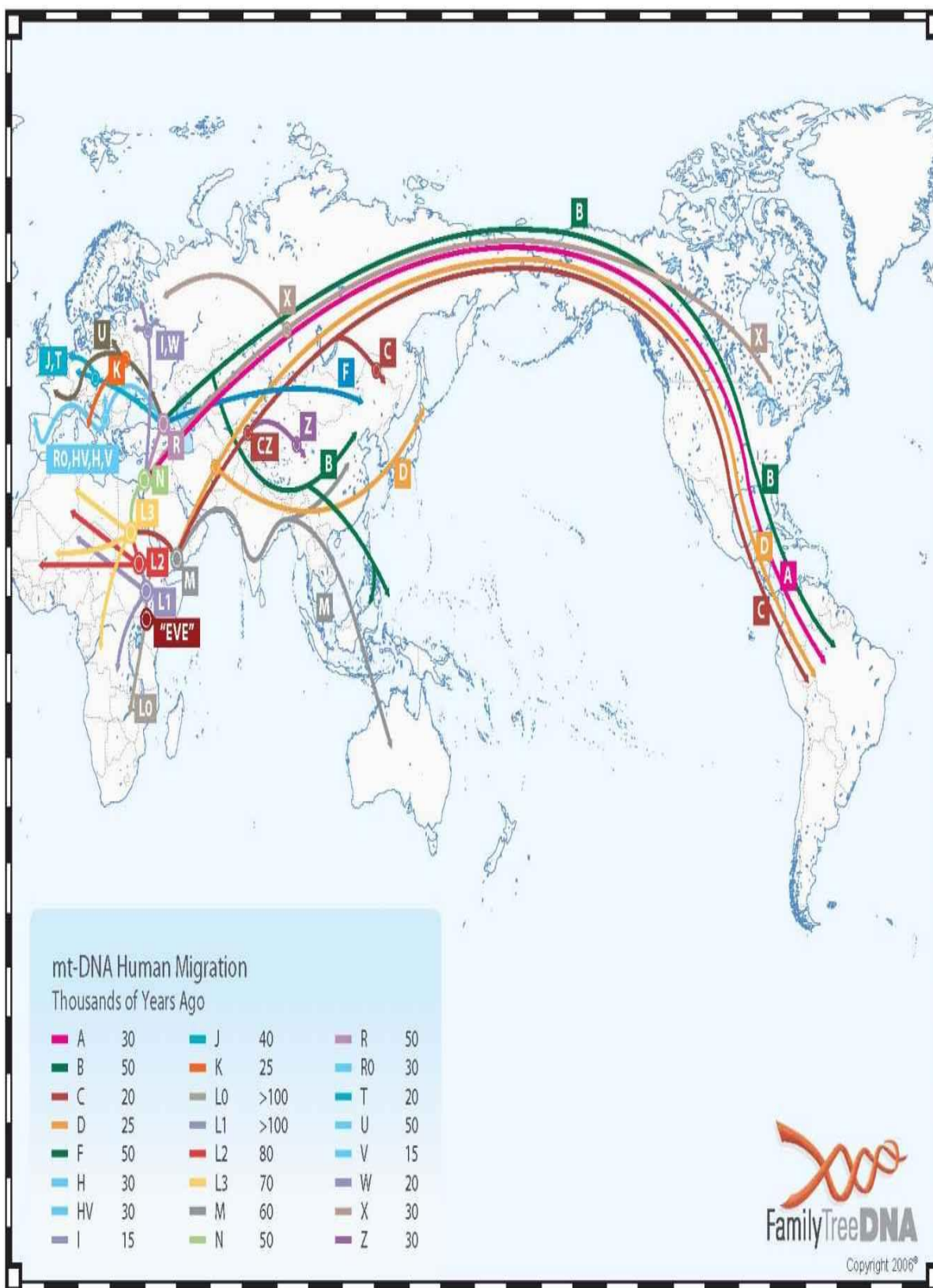
除了非洲以外，世界其他地区还没能找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人类学家们推测，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左右，古人类开始从非洲迁徙，进而散布到世界各地。

但是，这些早期人类到了各个大洲之后，命运又是如何呢？20世纪40年代，德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提出了自己的假说，那就是在这些古人类以欧洲、非洲、东亚和东南亚几个地区为中心，开始独立的进化过程。

这似乎很能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这些地区会出现早期古人类化石，而又会在时间上比非洲晚些。但是一个新问题出现了，从各地区早期的化石形态来看，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如果人类是按照多个地区独立进化的话，那么在长达数百万年的时间里，这种差异只能是越来越大，而不是相反，但从世界各地的现代人来看，他们之间的差异似乎比他们的“祖先”还要小，这又是为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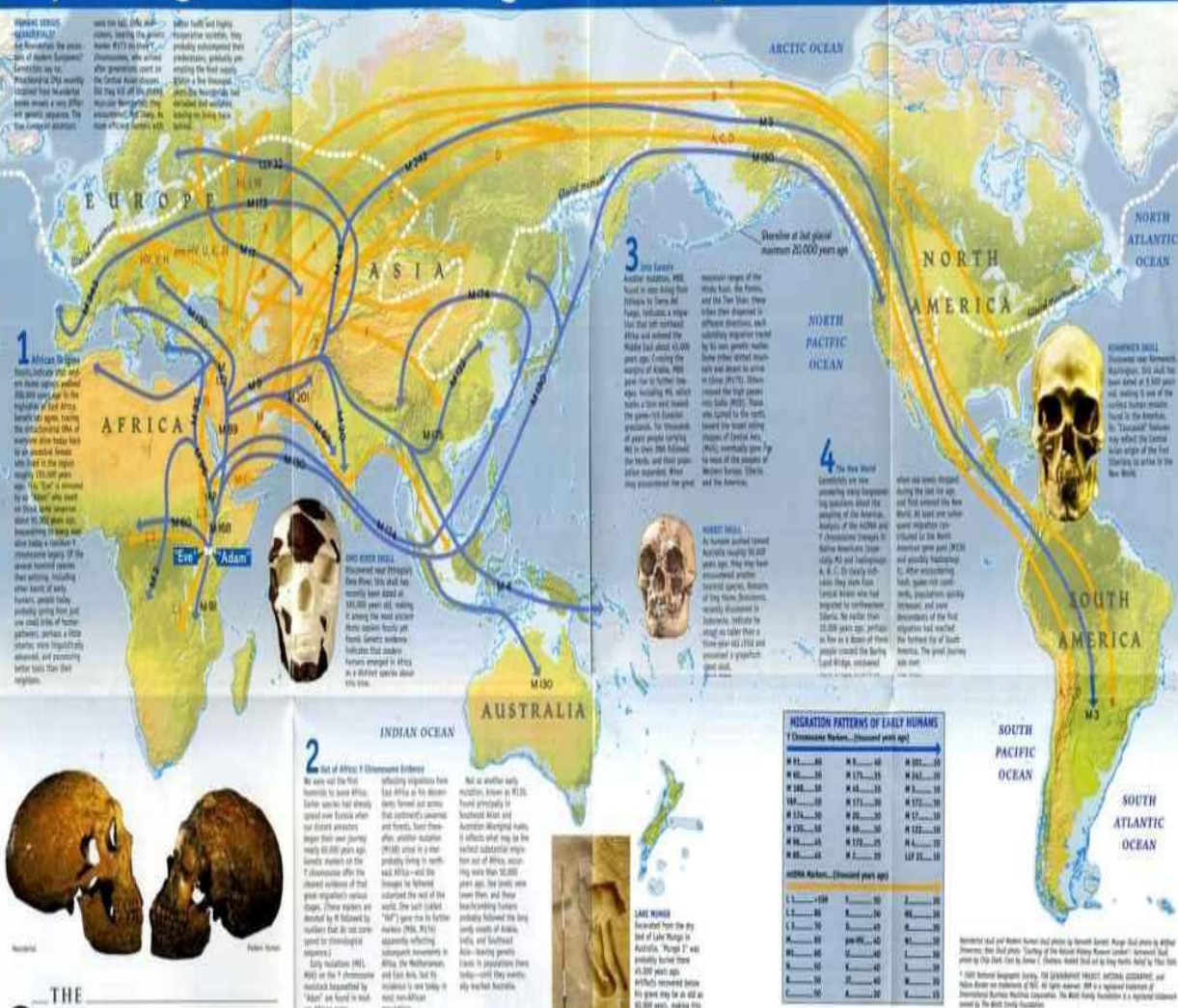
自1987年以来，遗传学家们通过检测世界各地现代人的DNA发现，世界各地的现代人都来自于一个大约20万年前的“非洲祖母”。大约从15万年左右，这位“非洲祖母”的后代开始走出非洲，向外扩散，进而演变成目前世界上的现代人群。也就是说，人类曾经有两次走出

非洲，一次是200万年前的古人类，另一次则是10多万年前的现代人祖先。



图二十四：DNA记录的人类迁徙路线示意图。

但如果按照这个理论，那批200万年前走出非洲，散布在各地的远古人类的后代哪里去了呢？按照遗传学家们的解释，经过数百万年的沧桑巨变，他们要么根本没能生存下来，要么就是被更加适应环境，更加聪明的现代人类祖先所替代。



THE
GENOGRAPHIC
PROJECT

National Geographic Maps the Human Family Tree

[illegible]

IBM

WWW.NATIONALGEOGRAPHIC.COM/GENOGRAPHIC

The Humboldt Family Tree

Although the human family tree cannot be described in detail, general outlines are apparent. Some extremely ancient fossils, such as *Australopithecus* 3.5 million years old, resemble the great apes but appear to have been bipedal, the distinctive trait of humans. Nearly four million years ago the *Australopithecus*

find apartment. They imagine they can make more than \$100,000 a year, but two million years later, to the gods come the human family, frightened with larger brains and better hand tools, only humans were the first humans to leave Africa and conquer the world. At least four distinct species, ranging from the curly-haired mannikin of Europe to the olive-skinned Neanderthal of Southwest Asia, still lived at the time our ancestors, Homo sapiens, emerged on the scene. We proved more adaptable and resilient, our tools were the only weapons left.

The Mitochondrial DNA Evidence

hazards left by mitochondrial DNA (mtDNA) are not as clearly defined as those left by the Y chromosome. Nevertheless, mtDNA lineages, each tagged with a letter of the alphabet, broadly shadow Y chromosome ones. U, an early lineage originating from the "Ia" outbreak, probably arrived in northwest North America 70,000 years ago, and branched into two major lineages by the time the Ice Age began. U1, a lineage known to prehistoric people from a 10,000-year-old jaw bone in Oregon (1), was found in Canada

Italy occurred in west Africa around 10 years ago. There it had, reflecting two dispersals of humans, its closest relative is found by the sea known as R, which is found in Australia but not along the way to Italy (C, D, E), also in Central Asia and Siberia. The other is traced by the lineage A, reflecting movement up through the Middle East into Europe, where subsequent lineages (J, A, B, and F among others) branched out toward the Arctic, west toward Europe, and east toward central Asia.

A Genetic Odyssey

HOW DID HUMANS LEAVE TO POPULATE THE WORLD? For years paleoanthropologists and archaeologists sought the answer in the only clues they could find, the scattered remains of our distant ancestors. Yet ancient bones and artifacts could only tell a fragmentary tale. Today, however, geneticists have discovered complete records of prehistoric migration inscribed deep within our genes. Mutations in certain components of DNA have accumulated in sequences like the layers of an archaeological dig. By comparing these sequences across global populations, and then plotting the results on a map, scientists have revealed the broad outlines of early human movements—the genetic footprints left by our ancestors as they ventured out of Africa to colonize the world. Long, intersecting arrows have been charted, each marking the passage of a distinct genetic lineage. Hugging coastlines, skirting deserts, drifting across grasslands, these people wandered in a seasonal ebb and flow,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following the rhythms of hunting and gathering. Progress was imperceptible, but after 50,000 years humans had occupied every habitable continent on Earth. Along the way they gave rise to the diverse populations found around the world today.



图二十五：人类起源和远古迁移路线的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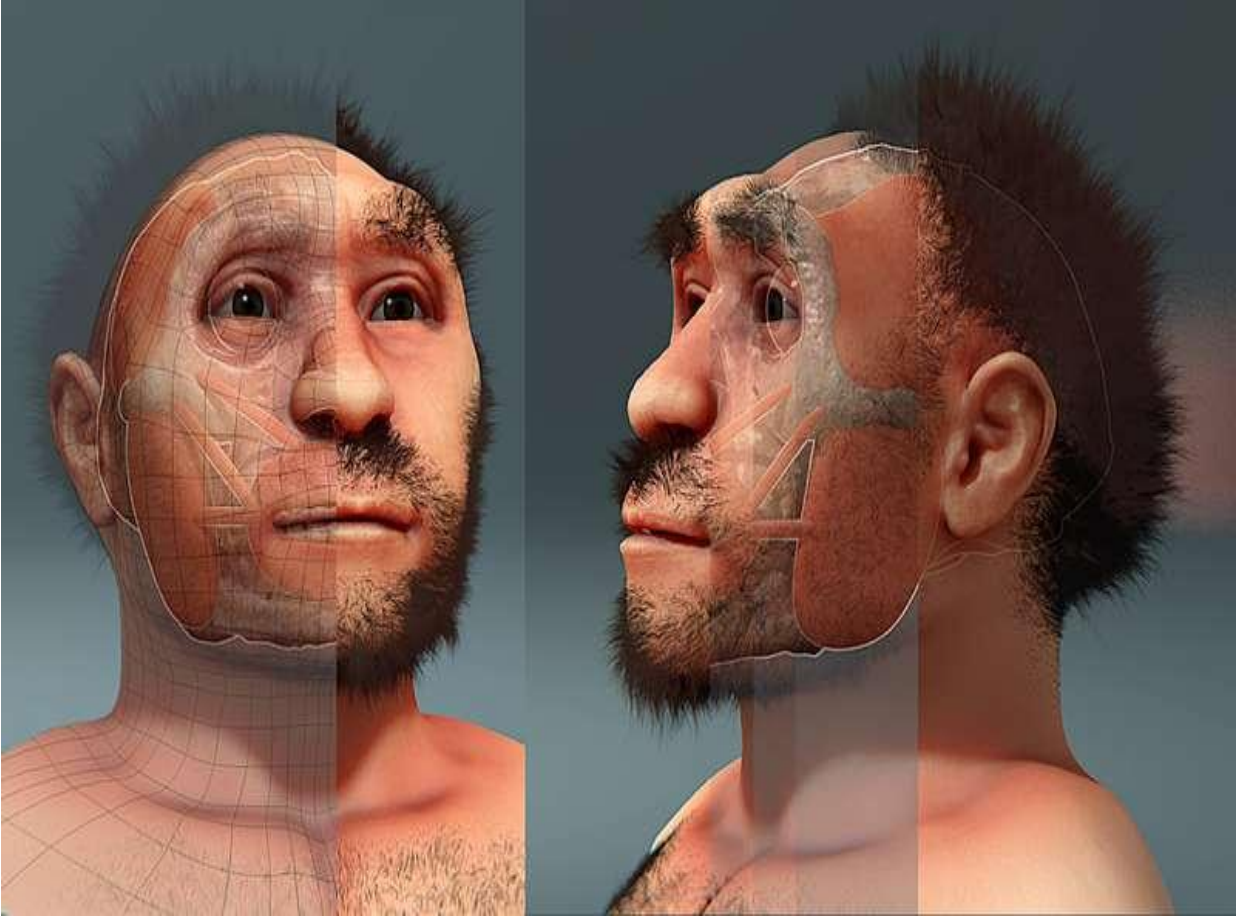
然而，中国的人类学家们却并不支持这一说法。自上世纪20年代，“北京人”化石发现以来，中国就被认为是人类持续进化的中心之一。这似乎已经被中国境内发现的大量早期人类化石所证明。按照人类学家们的分类，人起源分为四个阶段：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而与之相对照，这个链条上的所有化石几乎都能在中国找到。

自1998年以来，中国的遗传学家们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国人DNA与中国人起源的论文，通过检测，中国的遗传学家们找到了支持现代人中国人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并推测，这批人在约6万年前达到东亚南部，其中一些分支陆续进入现在的中国境内，进而演变成中国目前的各个民族。

遗传学家们还发现，在中国的古人类化石链条中，存在一个巨大的缺环，那就是10万~5万年前这个区间，很少有人类化石存在。尤其是，目前发现的晚期智人，也就是现代人祖先的化石几乎都没有超过5万年。

遗传学家们说，出现这种空档，显然不是偶然的，这恰恰是由于这个时间正处于第四纪冰川期，东亚地区的远古人类大都没有存活下来。而就在这个时期过去之后，从非洲而来的现代人类才进入了中国境内。

也就是说，著名的“北京人”根本没有后代延续到现在，更和目前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



图二十六：北京人头部复原画像。

但人类学家们依然不愿承认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出现这种空档并非是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上的问题，而更多的原因与目前的测年技术有关。精确度较高的碳14法能测的范围超不出5万年，而钾氩法又不适用于我国现有的人类化石地点。

另外，从目前发掘的中国古人类化石形态来看，无论是直立人还是智人，都存在一些共有的特征，如上门齿的铲形结构、颧骨位置、阔鼻、下颌圆枕等等，而这些特质正是连续进化的表现。与此同时，从这些古人类的石器制作技术来看，也具有连续性。但在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过程中，并不排除有外来基因。中国古人类的进化过程，应该是“连续进化并附带杂交”。

尽管多年以来，在中国广阔的境域内，曾经发现的旧石器遗存达1000多处，但真正伴随有人类化石出土的并不多。因此，遗传学者对中国各阶段古人类表现出的一些体质连续的特征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些少量的化石并没有严格的统计学意义，而类似“铲型门齿”的特征，并非中国古人类化石特有，在非洲人群中也并不是不存在。从基因研究来说，这个特征也不能确定是一个稳定遗传的性状。

至于石器制作方式，更是与石材的分布，食物的来源，以及居住方式有关，所以不能简单地以技术传承来解释。

2008年1月，河南考古学者宣布，在许昌又发现一处古人类头骨化石，经过初步的测年，这处人类头骨被定在距今10万~8万年左右。如果这处人类化石属于晚期智人，并的确是处于“10万~5万年的断层期”的话，那么将大大挑战遗传学者关于中国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理论。



图二十七：新发现的“许昌人”头骨化石断块。

但直到目前，“许昌人”的归属问题依然是个难解之谜。

解密田园洞人

距今1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开始走出非洲，迁徙各地。他们跋山涉水，行踪万里。所以现在尽管各大洲的人们在文化、体型、相貌、肤色上各不相同，但事实上85%的基因是人类共有的，只有约不到8%的基因可以作为划分人种的依据——人与人在遗传上的差别只有8%，并无种族优劣之分。不同的肤色，犹如化妆舞会上人们所戴的不同面具，无法改变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

文/吴臻

寻水寻来的古人类遗址

2001年初夏，北京周口店黄山店村。

正逢大旱，当地“田园林场”承包者田秀梅，正在烈日下匆匆奔走。几天来她一直心急如焚，在为寻觅水源而四处奔波。

下午三点，在半山腰处，他们发现了一个仅能容纳一人出入的小洞口，洞口寸草不生，但她伸手往洞穴里摸去，却颇感湿润。“既然洞穴入口比较潮湿，里头是否会有泉眼呢？”田秀梅想得再简单实用不过。



图二十八：位于周口店镇田园林场内的田园洞遗址地形。

令他们失望的是，里头并没有植树造林最需要的水源。然而，他们在洞穴深处挖掘时，发现了一些细碎的骨头片。因为这里毗邻周口店遗址，田秀梅留了个心眼，她将这些骨头片带回了林场，并在不久后把一些骨骼化石样品送到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那时的她，并没有预料到，这次的寻水之旅，竟会意外打开一扇中国古人类研究领域的暗门。两年后的2003年6月，田秀梅发现碎骨的山洞正式开始考古发掘，眼前的一切惊呆了考古学家们：这里不仅有大量古动物化石，而且还出土了丰富的人类遗骸，虽支离破碎，却琳琅满目：下颌骨、锁骨、肱骨、桡骨、脊椎骨、股骨、腓骨、跟骨、趾骨……



图二十九：“田园洞人”骨骼残片。

考古学家们总结说：假如能够发现价值可以与“山顶洞人”媲美的头盖骨，那就十全十美了。

7月7日，中科院、北京市政府联合发布消息称，这些人骨化石距今约2.5万年，它们与山顶洞人处于同一时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智人化石。这个洞穴，即以发现者所在的“田园林场”命名，“田园洞”遗址由此得名。

我们是“北京人”后代吗？

受制于古DNA保存状况，“田园洞人”重现天日十年后，科学家们才对它的分析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一段“田园洞人”腿骨，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德国马普进化人类研究所共同建设的古DNA实验室完成了基因分析。

早在2009年，德国马普进化人类研究所，就已经初步完成了尼安德特人超过30亿碱基对序列的基因组测定。他们认为，作为与现代人基因类型最接近的已灭绝旁系亲戚，尼安德特人无疑是研究人类进化过程的理想对象。

于是，他们再接再厉，三年后又完成了对丹尼索瓦人基因组序列的测定。生活在亚洲的丹尼索瓦人，是一种与尼安德特人有亲缘关系的已灭绝人群。这些前沿研究，都为“田园洞人”的测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图三十：丹尼索瓦人生存遗迹。

“田园洞人”基因的检测结果是：携带着少量古老型人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DNA，但更多表现的是早期现代人的基因特征，且与当今亚洲人和美洲土著人（蒙古人种）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与现代欧洲人（欧罗巴人种）的祖先在遗传上已经分开，分属不同的人群。

这颠覆了中国科学家对现代中国人起源的基本认知。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家一直坚信古人类起源多地区起源说的正确性。据此，他们认为，现代中国人源于在东亚生存的较早期人类。

这一观点的自然延伸就是：现代中国人由“北京人”演化而来。这里的“北京人”，指的是北京猿人，生活于数十万年前，生物学分类属于灵长目人科人属里的直立人。直立人已经可以直立行走，能制造工具，脑容量较少，但头部还保留了较多的原始性质。



图三十一：尼安德特人头骨化石。

已经逝去的北京直立人，与现代中国人有怎样的关系，则正是“单起源说”和“多起源说”争论的焦点所在。这两种假说都认为直立人起源

于非洲直立人，然后大致在200万年前走出非洲，迁移到欧亚大陆。

但区别在于，“多起源说”主张现代人是在4个地区出现并连续演化，而且在各个地区之间都有基因交流，也就是说，北京人和我们有“血缘关系”。而单起源学说则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20万年~15万年前的非洲，然后在大约10万年前走出非洲，并完全淘汰了其他地区的直立人们。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北京直立人的后代，而是他们的“终结者”。

其实，在田园洞人现世之前，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宿兵在查阅了中国现有化石的年代后，已经发现：从10万年前到4万年前，中国没有发现人类化石，也就是说，北京人、蓝田人与现代人存在着断层。前者的子孙们，由于冰川的原因早已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从非洲不远万里来到亚洲的现代智人。

非洲来客

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理论。2001年，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金力教授带领的团队，就中国人的遗传分子进行研究，本想利用这一成果证明中国人并不是非洲人的后代，实验结果却完全与初衷背道而驰。

金教授说：“我们做了覆盖整个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的12000人、163个群体以后，我都傻眼了。我都不信这个结果。我对学生说，你把数据拿来看一下，看上去比较模糊的，你给我重新做一遍。又有400多个样本重做了，结果，还是这样子，那我没办法，我只能说，大概就是这样是对的。”

另一方面，宿兵研究员则勾勒出了非洲来客的大概迁徙路径：他们可能最先到达的地点是东亚的南方，包括东南亚大陆，比如柬埔寨、越南、泰国以及中国的南方。这些人在南方定居以后，估计在6万年前到1.8万年前之间，又由南向北迁移。

根据遗传学家给出的图谱，我们的祖先在10万年前到6万年前开始走出了非洲，逐渐迁移到欧洲、亚洲、澳洲，最后是美洲，而且完全取代了当时在亚洲和欧洲生活着的原有人类，因此，现代中国人不是“北京人”的后代。简而言之，中国人的祖先是山顶洞人和柳江人等晚期智人，他们是4万~5万年前从非洲千里迢迢而来，取代了中国更老的古人类。

“人种间基因差别只有8%”

遗传学也证实，周口店北京人不是今天中国人的祖先，正如在欧洲的著名的尼安德特人也不是今天欧洲人的祖先那样。

1997年，正在斯坦福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的韦尔斯，有一天从学校开车回家时，与往常一样随意听着电台新闻。当他听到“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史旺特·帕博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发表了对尼安德特人的DNA排列测序，证明尼安德特人并不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时，韦尔斯一时走神，甚至没有注意到迎面而来的汽车，差点出了车祸。他迅疾意识到：人类学上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就要来临了。



图三十二：尼安德特人生活场景复原。

帕博领导的小组，从一个最早出土的尼安德特人头骨中提取到了足够的线粒体DNA，为了确保这不是实验室的污染物带来的结果——比如自己的唾液飞沫，他们又与其他大陆的实验室对结果进行了验证。当他把它们拼接到一起时，他在工作日记中记下了自己当时的心境：“凝视着第一个出现的顺序，我感到脊背阵阵发凉。”

因为，从世界各地的人群中，得出的线粒体的排列顺序，没有一个能与克林斯得出的顺序相联系，在人类所有发现的基因变异中，没有一个能上溯到尼安德特人，结论毫无疑问：尼安德特人并不是现代欧洲人的直系祖先。这个研究结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自从1856年尼安德特人化石在德国出土后，世界上从未挖出过3万年内的尼安德特人化石。

人类学家们根据现有的资料推测，也许是现代人的祖先，通过自己的技术或是社会优势把尼安德特人挤走，他们流落到了环境恶劣的偏远地方，终至灭绝。但无论如何，3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的时代悄然落幕，未来属于从非洲走来的新人类。

结合1964年斯坦福大学教授斯福扎提出的“吝啬原理”，也就是基因随着时间有规律变化的频率由基因“漂移”决定，人群关系越近，基因速率联系就越紧密。他据此画出了人类家族的谱系树，结果显示非洲人最靠近“树根”部，东亚人与他们分离的时间是在4.1万年，欧洲人与之分离则在3.3万年。



图三十三：尼安德特人复原画像。

由此，事实渐渐清晰：距今1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开始走出非洲，迁徙各地。他们跋山涉水，行踪万里。所以现在尽管各大洲的人们在文化、体型、相貌、肤色上各不相同，但事实上85%的基因是人类共有的，只有约不到8%的基因可以作为划分人种的依据——人与人在遗传上的差别只有8%，并无种族优劣之分。不同的肤色，犹如化装舞会上人们所戴的不同面具，无法改变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

被消解的基因多样性

更具体地说，大约15万年前，在东非分化出了很多人种与部落，其中就已经包含了现在的黑、棕、黄、白四个人种的祖先。Y染色体上的M168是目前发现的一个很古老的突变位点，这是人类在要离开非洲时产生的突变，大约发生在10万年之前。

那些棕色人、黄种人就是带着这个古老的突变开始向世界扩散。除了非洲以外的现代人都具有这个位点的突变。10万年前，地球处于冰川期，大部分陆地被冰川覆盖。整个海平面比现在低120米左右，许多海床裸露在地面。在东非，各个部落拥挤在这块炙热的土地上，抢夺着有限的食物。资源有限，一部分人开始走出非洲。

1987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坎恩教授破译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的线粒体DNA，发现现代女性的线粒体DNA都来自一位妇女，她大约生活在15万年前的非洲。线粒体包含少量遗传物质——DNA。

每个人的线粒体都来自母亲，因此线粒体是从母系遗传的角度研究人类进化的重要工具，就像Y染色体是研究父系遗传的工具。随后，分子人类学家再次成功破译了男性遗传密码的Y染色体。



图三十四：复原的人类迁徙途中生活场景。

通过研究，他们得出结论，现代男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他生活的年代也应该在大约15万年前的东部非洲。“DNA中的遗传密码让亚当、夏娃离开了神话世界，变成了有血有肉的非洲人。他们成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人的祖先”。复旦大学的李辉教授如此评价。

故事到此并未结束。在今天的科学家利用基因技术无所不能的检索古代人类发展线索的同时，全球化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混淆传统人群的基因库。不同人群之间的互通有无，不但正在消灭语言、传统、风俗的差异，也使本来清晰可辨的基因谱系变得芜杂混乱。

在基因多元化消失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下，韦尔斯以莫可明辨的心情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过去永远不能相遇的人，现在就住在你隔壁。……人类正如基因数据所显示的那样，人群与人群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融合正在消解古老的、地区性的基因多样性，取代它们的是世界主义大熔炉的标记。”

追寻汉语的祖先

分子人类学关于东亚人群DNA的研究，给了语言学家们莫大的启示，这也许为破解汉语起源之谜提供更多的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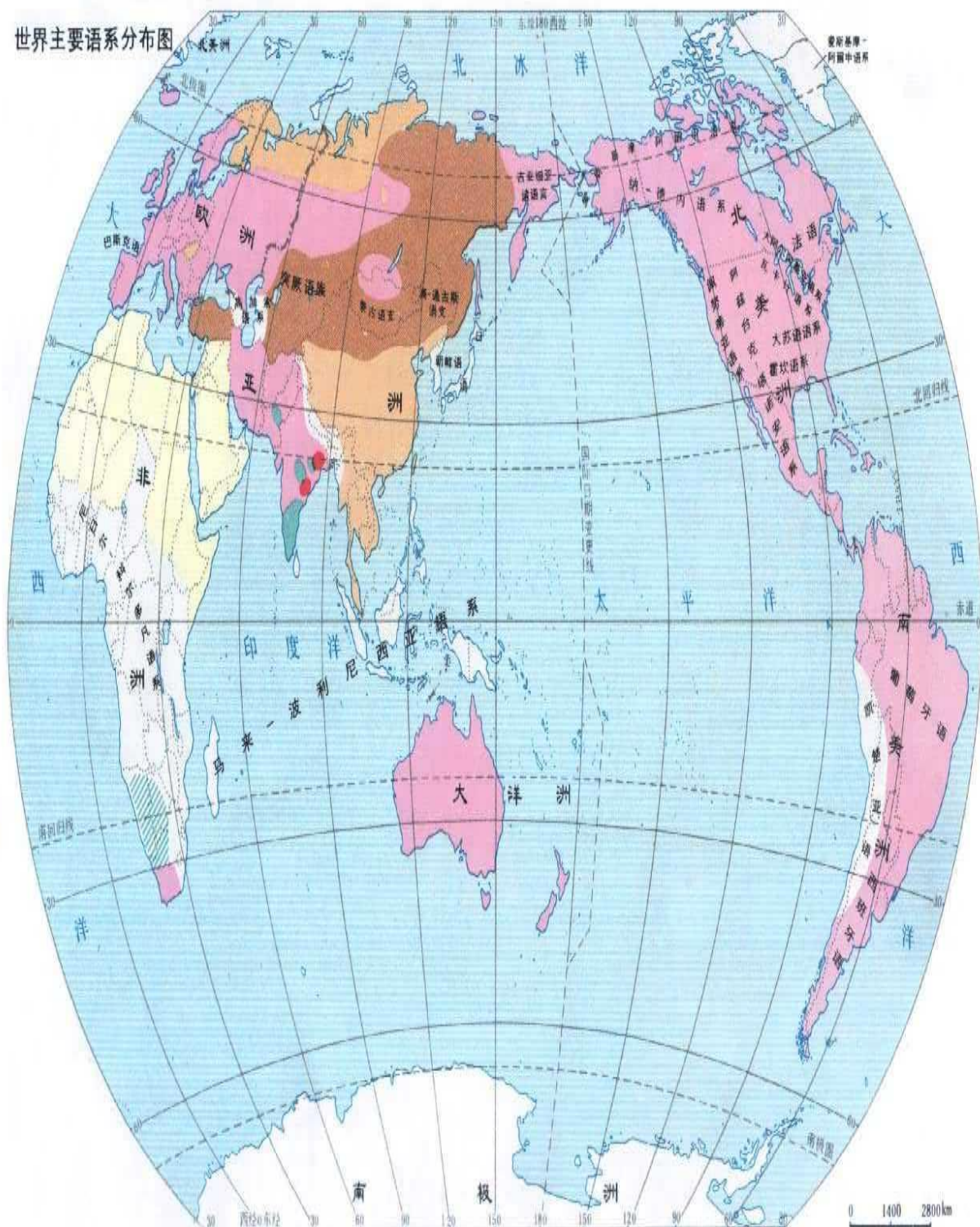
文/孙展

汉语从哪里来？一直是个谜团。

17世纪，一名叫做韦伯的学者写道，“汉语是伊甸园中所讲的最初语言。”而另一位想象力丰富的学者干脆说，汉语是“被称为中国的那个伟大国家的某位圣贤一下子发明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居住在周围的不同民族的人群之间能够用这种语言进行口头交际。”

实际上，在中国人内部，这样富有想象力的说法也同样代代相传。直到最近100多年，由于现代语言学的兴起，汉语才被用来和其他语言类比分析，但有关汉语起源的种种假设却总是扑朔迷离。而近年来，分子人类学者们有关东亚人群迁徙的分析，似乎正在接近这个谜底的答案。

世界主要语系分布图



- | | | | |
|--------|-----------|----------|-------|
| 印欧语系 | 阿非罗-亚细亚语系 | 汉藏语系 | 阿尔泰语系 |
| 达罗毗荼语系 | 南亚语系 | 芬兰-乌戈尔语系 | 科依桑语系 |

图三十五：世界九大主要语系分布图。

语言的足迹

1600年，一艘荷兰商船路经马达加斯加前往印尼。在经过了数月的航行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令船员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发现，虽然相聚遥远，但当地的马来语与他们途经的马达加斯加的土著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难道在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这些分布在各个海岛上的人群就早已横渡大洋，穿梭在广袤的海域中了吗？难道这些相隔万里的海岛居民竟然是比自己更加能干的航海者？水手们百思不得其解。

水手们并不知道，自己无意中的这个发现，竟然触碰到了语言的核心秘密。400年来，一代一代的语言学家追随着这个秘密，开始了伟大的发现历程。

1786年，英国的琼斯爵士通过对比研究关注到：意大利语、凯尔特语、日耳曼语以及波罗的语、斯拉夫语，与远在亚洲的印度雅利安语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之处，会不会这些语言有同一个源头？他提出了自己大胆的假设——这些广泛分布在欧洲和印度的语言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假说被称为“印欧语系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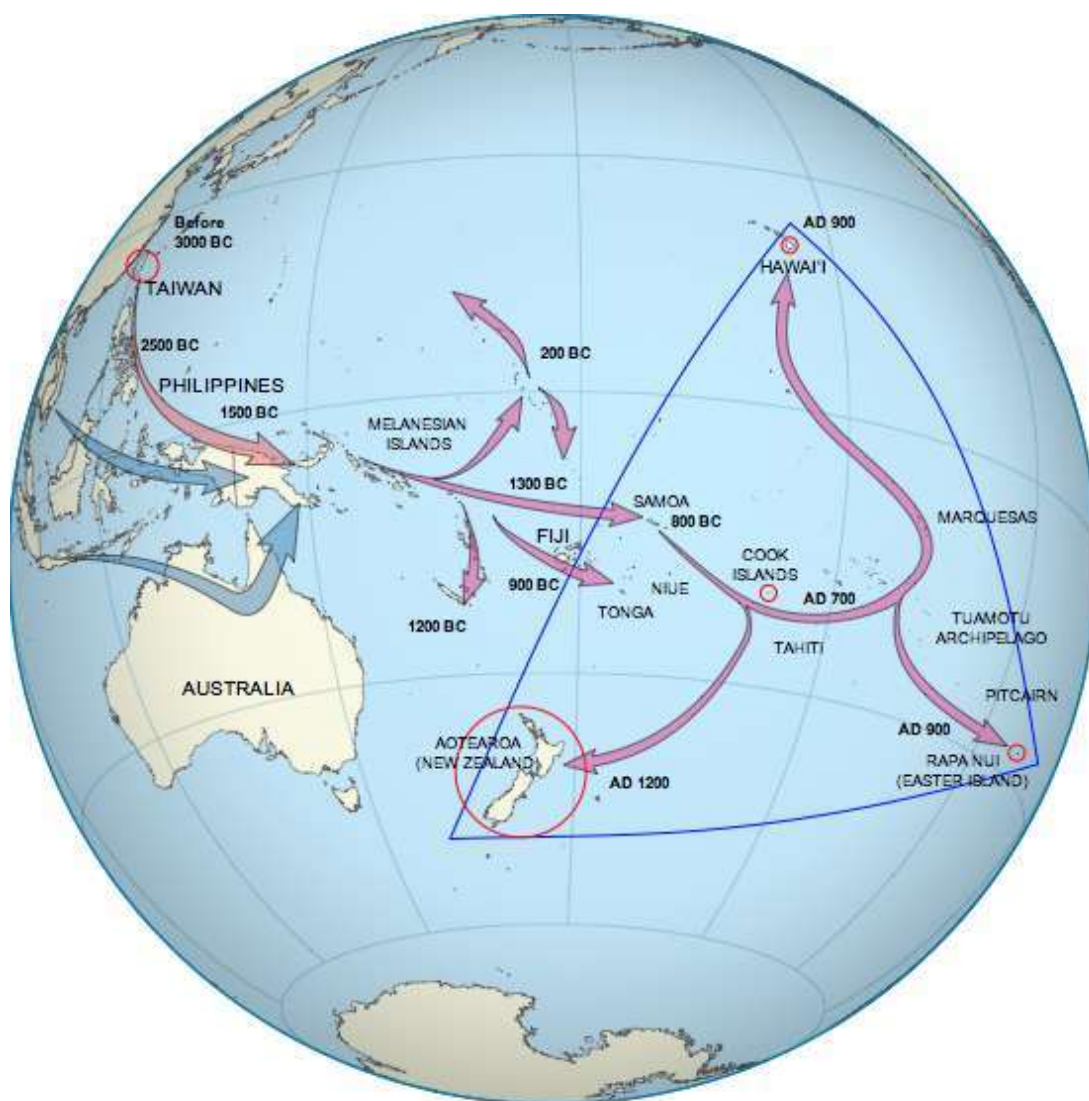
图三十六：印欧语系树。

琼斯的假设，让语言学家们开始尝试着对比、分析这些有着共同关系的语言之间的亲疏远近。1861年，德国语言学者施莱歇尔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启发下，推导出语言也有着类似生物进化的过程，并给印欧语系画出了一棵“谱系树”，在这棵语言的谱系树上，原始的“印欧

语”处于最底端，是“树干”，这个树干分出两个“树枝”，一枝是“斯拉夫-日耳曼语支”，另一枝是“雅利安-希腊-意大利-凯尔特语支”，这两个“树枝”再分别分出众多“小树杈”，如日耳曼语、立陶宛语、斯拉夫语、凯尔特语、意大利语、希腊语、伊朗语等语言。

尽管施莱歇尔推导的这棵“印欧语系大树”并不完全精确，但他的方法立刻成为语言学家们观察这个纷繁复杂世界的利器。他们反过来去研究印欧语系之外的语言。

1600年那些荷兰水手们的疑惑，也得到了部分的解答。在北到台湾岛，南到新西兰，西到马达加斯加，东达复活节岛，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广袤海域上，的确存在一种共同渊源的海岛语系，尽管这种覆盖2亿人口，有着959种语言的语系内部形态千差万别，但它们却有着明确的同源关系，学者们将之称为“南岛语系”。在欧洲人进行海外殖民扩张之前，“南岛语”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语系。



图三十七：台湾是南岛语系波利尼西亚人的原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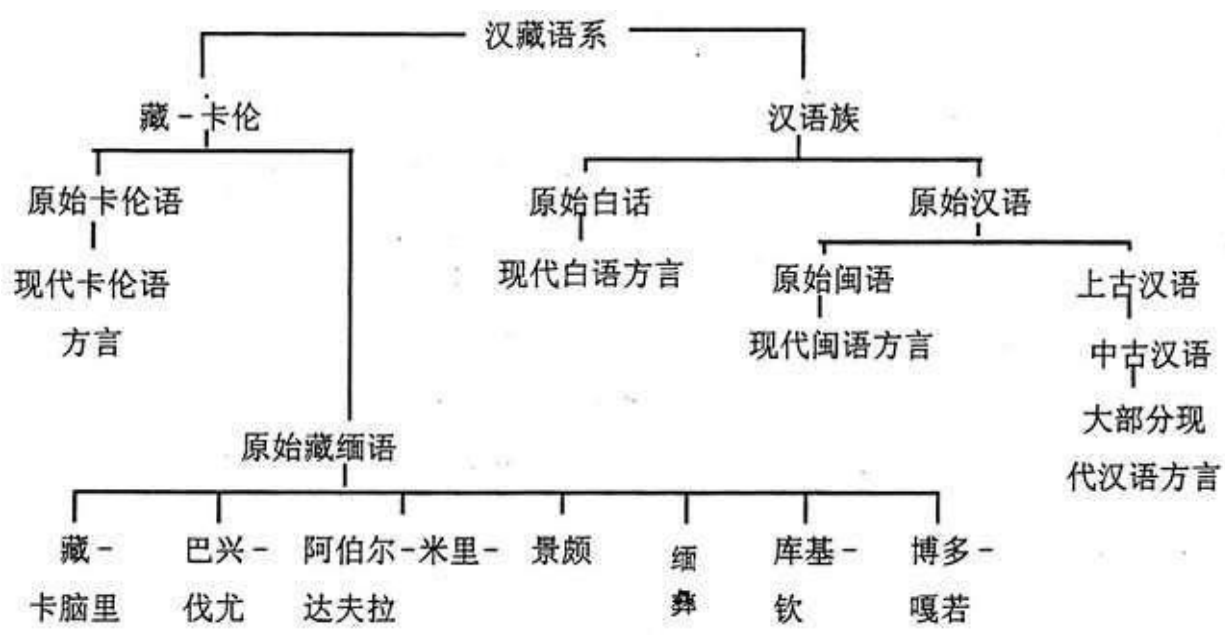
那么古老而神秘的汉语是否也遵循这样的规律——同样是另外一种更加古老的语言分化而来，还是像学者们最初想象的那样，是由中国的某位圣贤独立创制而来？

从19世纪开始，语言学家们逐步发现，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里面的语言也能像其他语系一样，描绘出一棵“谱系树”。在这棵谱系树上，汉语、藏语、缅语等有着亲缘关系，语言学者们提出了“汉藏语系”的假说。

东亚同源？

如果汉语真的和藏缅语有同源关系，那么它们来自何方，又是如何分化而成的呢？

上世纪50年代，美国语言学者斯瓦迪士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不同语言，得出了约200个核心词，几乎每种语言都包括这些核心词汇，它们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根据对比分析不同语言之间核心词的同源关系，就能大致判断出语言之间的亲疏远近，同时，这些核心词汇的变化具有一定的速率，而分析两种语言中核心词汇的不同比率，则可以推算出它们之间分化的大致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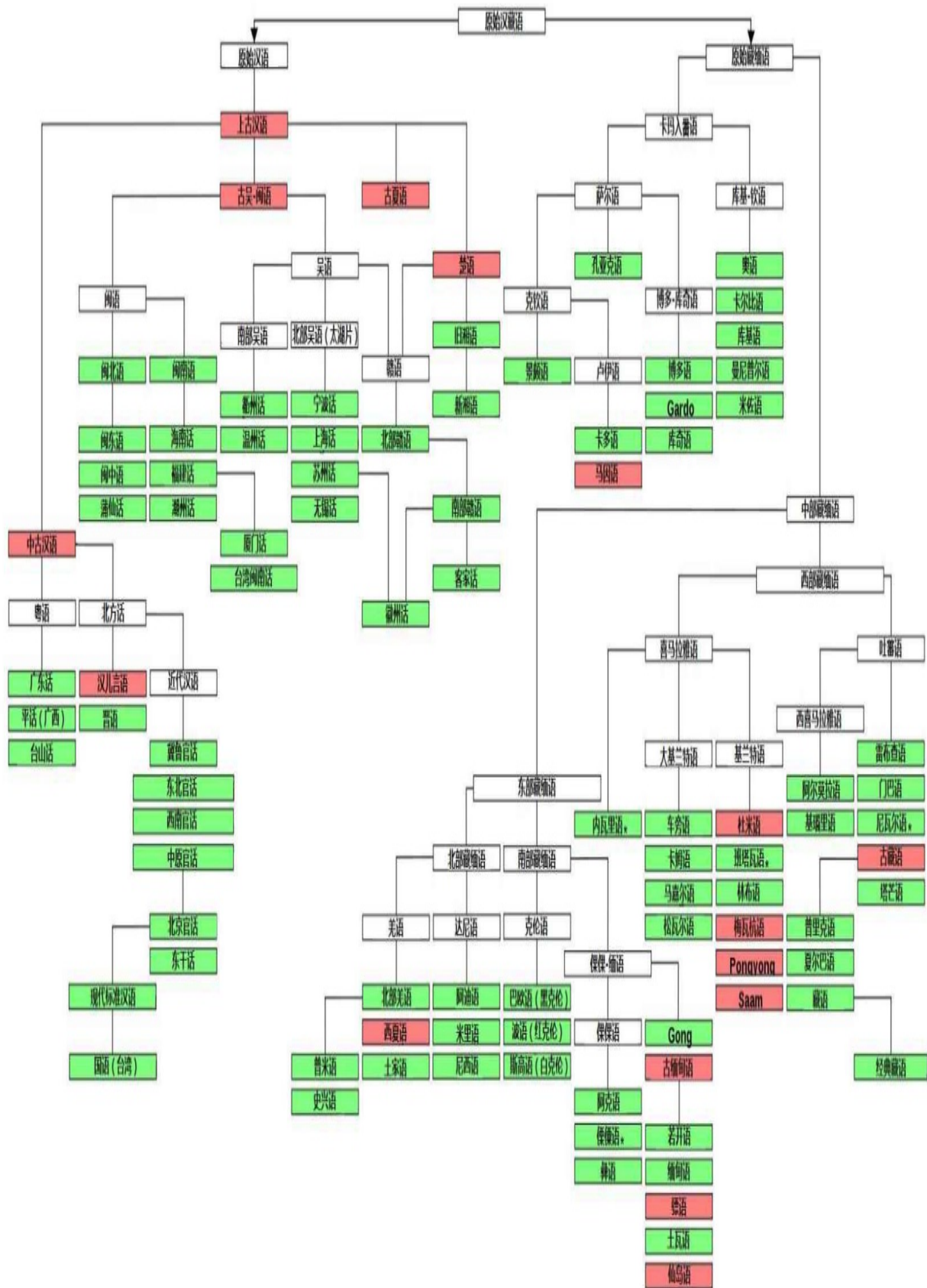
图三十八：汉藏语系列表。

在对比汉藏缅语言之间的同源词时，学者们发现，汉语和藏缅语之间有共同的数词一至十，但“千”和“万”却并不相同，而在汉语中，“千”和“万”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那么汉语与藏缅语的分化必定早于殷商时期。语言学家们大致推断，这个时间距今约4000 ~ 5000年左右。

但在这种粗略的勾勒中，依然有很多矛盾难解之处。东亚地区语言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印欧语系。尽管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研究，语言学家们大致能够接受“汉藏语系”这种假说，但其间的分歧依然很大。

中国的语言学家李方桂早在1934年就提出，汉语不但与藏缅语有亲缘关系，同时和苗瑶语、侗台语也有亲缘关系，而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则认为，苗瑶语、侗台语与汉语关系不大，反而与日语、南岛语有着亲缘关系。

颠覆性的观点来自1990年。当年，第23届国际汉藏语会议召开。就在会议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时，法国东亚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学者沙加尔提交了一篇名为《汉语南岛语同一起源论》的文章。这篇文章刚刚公布，就立即引发轩然大波。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这份标记有各种语音符号及绕口的学术名词的论文不亚于一篇“天书”，但在座的学者们却明白，这份论文的观点一旦成立，将是对传统的“汉藏语系假说”的最大挑战。



图三十九：原始汉藏语系分支列表。

沙加尔认为，汉语与南岛语之间存在着不少的同源词，而这些同源词有着规则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汉语与广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岛上的南岛语系，也就是400年前荷兰水手发现的马达加斯加和印尼人所讲的语言都来自于一种更加古老的“母语”。

沙加尔的观点极富挑战性——如果按照传统的理解，各个语系独立起源，互不隶属，那么该如何解释汉语和南岛语之间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沙加尔的观点得到了中国学者邢公畹的支持。他认为存在一种“汉藏—南岛”的同源关系。中国学者潘悟云也注意到，不仅仅是汉语存在这种联系，在东亚这片大陆上，侗台语就像是各种语系的交集，它既与汉藏语系有关，又与南岛语系、南亚语系有密切关系。沙加尔的汉语南岛语同源的说法，让潘悟云产生了一个更大胆的联想——这些语言会不会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起源？

稻米的密码

在如此广大的语言区域内，有一个词语引起了语言学者们的关注，那就是“稻米”。在东亚人群中，稻米与人们的饮食和生产息息相关，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语言学家们发现，稻米在南岛语系中有着相同的来源，这个范围覆盖了马来-印尼语、西太平洋上帛琉群岛帛琉语、台湾的赛德语、卑南语、鲁凯语、越南的雷德语，菲律宾马诺波语，台湾巴则海语，道卡斯语，阿美语。而它们又与藏语的稻米有着明显的同源关系。另外，上古汉语的“稻”，则与侗台语和南亚语同源。

语言学家郑张尚芳也发现，在汉语里，“粃”本意为“粗米”，其同音词“痂”有“恶疮、麻风”的意思，而藏语中相对应的词，同样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米”、一个是“疮、疖”，同样，印尼语中“米”与“麻风”也几乎同音。这种大跨度地区里连续出现的相似性难道只是一种偶然吗？

但是，如果单单凭借语言学本身来破解这些谜团，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语言总是在不断变动中，根据测算，每1000年左右，就能独立分化出来一种语言。尽管那些语言的核心词汇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但超出2000年，甚至更加久远的时间，要想判断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就非常困难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语言学家总在争吵之中的原因——那些在一名语言学家眼中，看上去具有密切关联的词汇，在另一名语言学家眼中，可能会是毫无意义。

这时候，其他学科的介入就变得不可避免。考古学的研究发现，在这些拥有稻米同源词汇的语言区域，存在着悠久的稻米种植历史。在浙江河姆渡遗址，曾经出土了距今约7000年的稻米遗存，长江中下游也因此被认为是稻米的起源地之一。而在其他区域同样也发现了稻米的遗存，在中国台湾和云南分别是距今5000年和4000年；泰国距今4000年，菲律宾距今3700年。考古学家们推测，会不会存在两条稻米传播路线，一条从长江中下游—台湾—菲律宾，一条是长江中下游—云南—缅甸、泰国？如果是这样，这又和语言学家推断的南岛和南亚语系的发展路线有许多重合之处。



图四十：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和谷壳堆积层可以看到七千年前的金黄的稻谷。

语言学家解释说，之所以会出现稻米的传播与语言的传播有相似之处，是因为农业社会比采猎社会更能有效而稳定地增加人口。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群的分化和迁徙，这也就是语言传播的动力之一。

除此之外，早在1959年，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张光直就曾根据出土的早期考古资料论证，黄河流域前石器文化当中有一个尚未显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他认为从这个群体从新石器时代起，开始向中国南部移民的活动，结果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难道这依然是个巧合？

来自基因的答案

越来越多的发现似乎在暗示着，在远古时期，东亚语言的确是从一种最古老的“母语”分化发展而来。但是由此产生的疑问却更多，如果存在这样一种假说的话，那么，这个“母语”的起源地到底在哪里？内部这种千差万别的语言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化？它们之间的亲疏远近如何？这似乎又完全超出了语言学目前所能解释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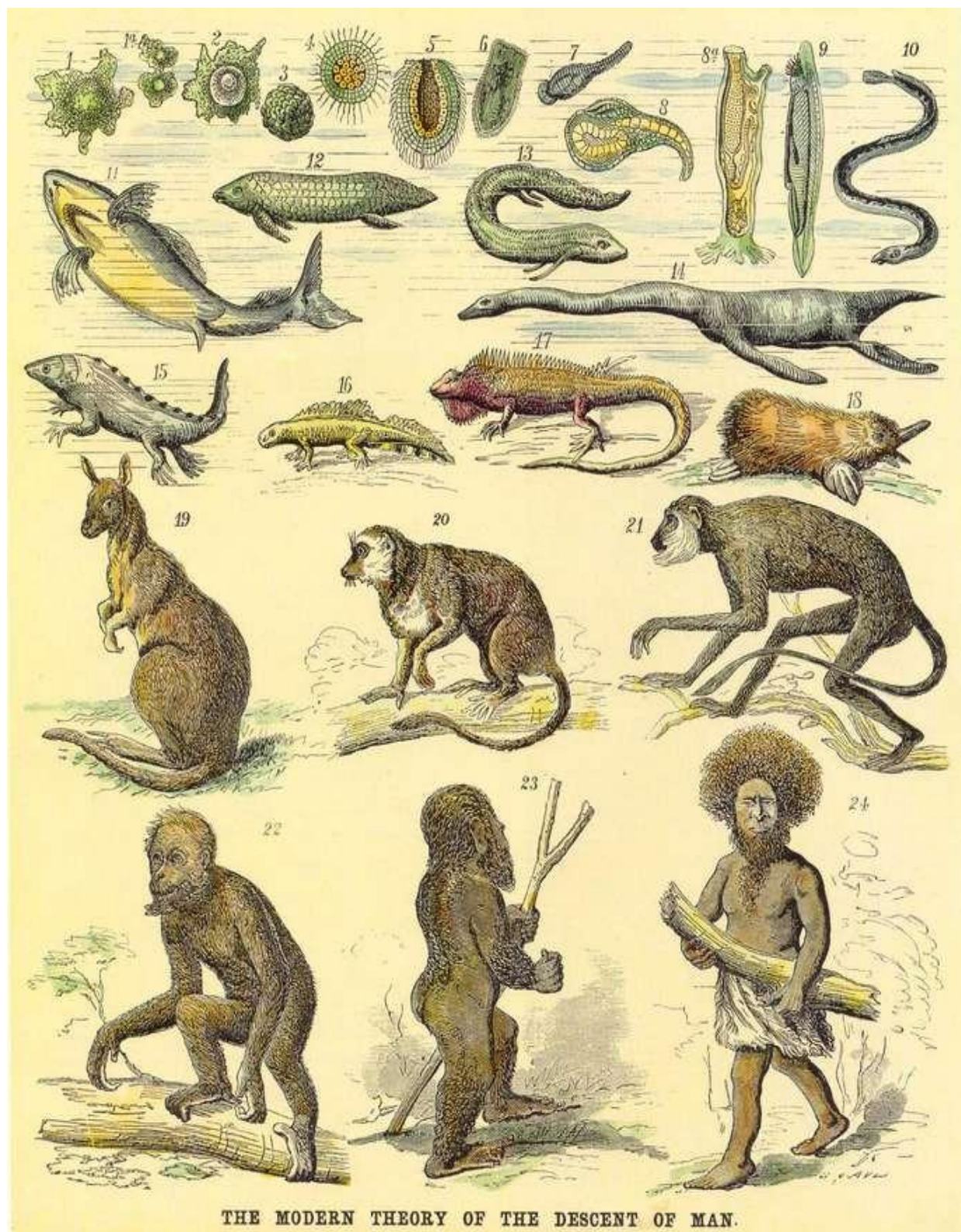


图四十一：距今七千多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人类劳作复原模型。

同时，语言学家内部反对这种假说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每当支持东亚同源的证据多一分，似乎就会出现更多的相反意见。

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潘悟云看到了一篇文章。这是一个生物学家介绍分子人类学家们关于东亚人群起源的最新观点。在这篇文

章中，遗传学者用DNA证实，东亚人群是距今4万年左右由非洲迁徙而来，然后从南向北迁徙分化，最后形成东亚大地丰富的民族。而此前，学界的普遍看法是，东亚现代人是本土直立人、智人连续进化而来。



图四十二：1876年绘制的人类进化图表。

潘悟云马上联想到，这与语言学家争论的东亚语言的问题息息相关。“同源”、“自南向北”这两个来自DNA的结论，居然和之前语言学界的那个东亚语言同源的假设一致。

早在1859年，达尔文就曾在《物种起源》中写到，“如果我们拥有一份完备的人类谱系图表，那么人种的形成序列将为全世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语言提供最好的分类。”而这句话，现在听上去，就好像是在为分子人类学家们今天所作的工作做注解。

随后不久，一篇从分子人类学角度更加详细的论述东亚人群起源和迁徙的论文出现了。在这篇文章中，学者们认为，东亚族群的祖先最初达到了东亚南部，大约在约2万到4万年前开始分化，一支自越南进入中国，并沿海岸线向北，成为百越和东夷的先祖，其中一个亚群在北部湾一带就转而南下，最终成为南岛语族的先祖。

而另一支则向自云南穿过四川一直到达黄河中上游盆地，成为汉藏羌的祖先。其中一个亚群在约8000~6000年左右向东向南扩展，最终成为华夏族群的先祖。而另外的一些亚群则调头向西南发展，最终成为藏缅语族的祖先。

尽管这个来自基因的迁徙路线也仅仅是一个草图，但那些在语言学界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似乎都能得到合理解释了。

例如，为什么差异巨大的东亚各个语系之间，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按照基因图谱来解释，那的确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但由于早在数万年前就开始分化，所以才会呈现出迥然相异的面貌。

而曾经长期存在归属争论的苗瑶语和侗台语看上去也各自有了结论——苗瑶语族群是约1.5万年前从北上过程中的汉藏羌那一支分化而来，最终到达了中部。而侗台语则是从沿海岸线北上那一支中分化而来，自然会与南岛语系有更紧密的关系。



图四十三：现代羌族族群群像（摄影/陈海汶）。

那么汉语呢？那支从古汉藏羌分化而出，沿黄河流域而下的亚群所讲的语言就是上古的汉语吗？显然没那么简单！还记得有一支沿南中国沿海一直上行达到山东的族群吗，他们成为东夷部落的先祖，而东夷部落的一部分沿黄河流域上行。最终两个族群在中原地区遭遇，在这其间，甚至还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从南方北上而来的部分苗瑶族群，以及从北方南下而来的部分阿尔泰语系的族群，他们征战并相互融合，无论是族群还是语言。

语言学者李葆嘉是这样描述这个复杂的过程的，“原始的华夏汉语就是一种伴随着多种文化撞击整合为强大中原文明的历史互动过程

中，所产生的多元性，层叠性混合语言”。

而这就是为什么语言学家们在汉语中，既能与藏缅，又能与苗瑶、侗台、甚至与南岛、阿尔泰都找到亲缘关系的原因。

这听上去似乎清晰了不少。但对于那些仍然还未能解答的谜团来说，显然还有更漫长的路要走。

隐藏于昆仑神话中的汉藏语族始祖源流

对远古人类自非洲迁徙到亚洲的路径考察之外，以本土各民族神话传说、歌谣、文献印证其基因源流考察，则提供了中国人起源研究的另一个角度。

文/王冰

“西王母”真相

在《山海经》里，西王母是一位“穴处”于昆仑之丘的上古女神，其形象是“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并且“虎齿、善啸”。从这段记载看，西王母很可能是西北昆仑山野穴洞之中的上古部族之女性首领。



图四十四：西王母塑像。

事实上，在汉藏语系民族中，穴居荒野而又形象类似西王母的女性主神，并非汉族独有。如滇西北的普米族以白额虎为图腾，他们视虎年为吉年、属虎日为吉日，习惯以属虎之年或虎日出生的孩子为贵人，还要为此而宴请村邻亲友。

他们信仰的主神“巴丁拉木”，意即“西番土地上的母虎神”，是当地最高的女性保护神。普米人说这位女神喜欢“穴居”，所以将其供奉在山野洞穴中。

不仅普米族，当地藏族、纳西族、摩梭人等，也都会定期对其进行隆重祭祀。

对此，日本学者小南一郎认为，“巴丁拉木”女神与西王母之间，应有着直接关系。据本民族传说及历史记载，普米族先民为远古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周围地区的古羌人。这个地域，正是汉民族上古传说中的昆仑之地。

后来，为寻找更适宜生活的乐土，普米族先民从高寒地带沿着金沙江、雅砻江谷地，渐渐向南迁徙到温暖低湿的川滇边境。他们逐水草而居，曾在四川西大渡河两岸及雅砻江流域形成号称“百余国，户百三十万，人口六百万以上”的白狼般木等氏族部落联盟。

普米族 | ETHNIC PUMI

· 摄影：陈海汶 · 拍摄时间：2008 年 10 月 22 日 · 拍摄地点：中国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河西乡菁花村玉狮场

· 海拔：2421 米 · 经纬度：东经 99° 25' 北纬 26° 27'



和德瑞 (42 岁) 杨晓光 (45 岁) 杨福英 (18 岁) 和金华 (53 岁) 和金开 (42 岁) 和国顺 (69 岁) 杨珍美 (19 岁) 和瑞梅 (20 岁) 杨香兰 (44 岁) 杨同星 (27 岁)

图四十五：现代普米族群像。

普米族之外，西南边陲滇川黔桂的彝族，同样是一个忠实的崇虎畏虎敬虎奉虎的民族，他们甚至有支系自称是“虎”：滇西楚雄彝族以“罗罗”或“倮倮”自称，“罗罗”即虎之意。而《山海经·海外北经》也记载：“有青兽焉，状如虎，名为罗罗。”



图四十六；彝族老虎笙。

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记载：混沌时代，宇宙间有一只硕大无比的老虎，它的眼变成日月，皮变成天，故银河似虎斑纹，肠胃变成江河湖海，筋骨变成山脉，虎毛变成花草树木。这与汉文献《三王历记》等记载颇为相符：盘古氏，天地万物之祖也。盘古死，其血肉筋骨等分别变成天地万物。



图四十七：现代彝族群像（摄影/陈海汶）。

而据藏族学者岗-坚赞才让考证，传授《格萨尔》史诗的藏族女神贡曼杰姆，与汉族神话女主神西王母之间也有关联：“贡曼杰姆和西王母，是古时居住在我国西部的同一历史人物，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中不同形象的再现。”

在《格萨尔王·门岭篇》中，贡曼杰姆吟唱道：“若是不认识我是谁，在藏汉两地边界处，东北方木里碧湖里，是三友时间一主母，是母系空行之主尊，是无明众生之主宰，是格萨尔的保护神。”又云：“阿斯白岩石洞中，智慧空行静坐地，乃乃天幕是我名。”显见，贡曼杰姆女神也是穴居于荒野岩洞中的女神。

与之可能有直接关联的地名，是川甘青三省交界的甘肃省碌曲县郎木寺。该寺全称“达仓郎木”，在藏语是‘虎穴仙女’的意思。传说称，当年有位大师在当地一洞穴中修行时，教化了一只老虎，后来使之变为仙女。



图四十八：碌曲县郎木寺。

而《汉书·地理志》载：“金城郡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侧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对此，大多数学者认为，昆仑山当为积石山，瑶池则为青海湖，青海湖的古藏语名称为“赤雪杰姆”，汉语则将“杰姆”译作“王母”。

从这些民族古老传说的互相印证，我们似乎可以推测，起源于西北地区古羌人的汉民族始祖，应该是一路向东迁徙到中原腹地，与土著的蚩尤等族先民融合，历经三皇五帝时代的经营，最终融合形成华夏族；而另一支古羌人，则沿藏彝走廊南下，与地区土著的百越诸族融合，形成各系藏缅系民族。

寻找汉藏语族的共同父系始祖

而遗传学研究，同样印证了汉藏语族的血统同源性。

汉民族和藏缅系族群在向中原地区、西南地区的历史大迁徙过程中，分别融合了大量当地的土著血统成分，各自的母系血统组成杂驳，但甘宁青等西北地区的古代族群母系基因组成，与其他北方古代民族的差异性却不是非常明显。这一来，解析古羌人母系血统源流就变得非常困难。人类学家发现的汉藏语系族群同源性特征，主要是父系。

此前，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个名为M117的Y-DNA遗传标记，这一遗传标记，定义了一个名为O3a2c1a的基因部落。其广泛分布于从北亚到东南亚的庞大东方族群中。但它更高比例地出现在汉藏语系族群之中，尤其是藏缅语系族群。



图四十九：现代藏族群像（摄影/陈海汶）。

在藏族中，此基因部落比例可以高至28.8% ~ 52%，而藏缅语系小民族云南怒族中的比例，更是可高达62%；在汉族中同样比例高达15%以上，是汉族中最庞大的基因部落之一。

除此之外，汉民族与藏缅语系族群之间，其他普遍共享的高比例父系基因则很少。如一个名为D的父系基因部落，在藏族等很多藏缅语系族群中比例都很高，其中四川平武的白马藏族最高，达75%，比例最低的则是青海藏族，但也可达22.8%。然而在汉族人群中却非常罕见，反而高频于日本列岛，尤其是琉球人、阿伊努人。

人类学家们据此推断，O3a2c1a-M117基因部落，最有可能与昆仑山、瑶池之地的西王母部落相关。

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当前中原、西北等地的古代DNA样本中，仍未检测到此基因类型，使得O3-M117类型起源仍显神秘。

目前发现此基因型的唯一古代族群，是春秋时代生活在今天内蒙古东南部赤峰市地区的山戎民族，出土于赤峰市喀喇沁旗的大山前晚期青铜时代遗址。



图五十：春秋战国时代山戎民族使用的绿玉管子。

人类学家们发现，从更细致的基因点位来看，这例名为大山前2号人骨的古代样本，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则显示，它与今天的华北汉族非常近似，只是面部扁平度等少量种系特征与北方民族接近，且与数例藏族样本、数例尼泊尔样本和1例彝族样本所分享，还有浙江、广东、四川、辽宁、福建、山西等地的汉族样本；东北亚地区的数例韩国样本、日本样本及1例蒙古国样本，还有东南亚的几例孟高棉语族样本。

不过，人类学家们同时表示，因为研究人员成功测出的Y-STR位点较少，所以并不排除某些样本只是偶然巧合，如果可比对的位点更多，其差异可能非常大。

如此一来，西辽河地区还是此基因部落最早的故土吗？

事实上，大山前遗址更多的人骨，是所谓的“古东北类型”，因其许多特征很接近今天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人，古代DNA测试则显示，他们主要属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基因部落N，而不是O3-M117。

对此，考古学家给出的解释是，“古华北类型”最早出现在西辽河地区的年代在青铜时代早期，与中原地区的夏商之际基本重合。而属于此类型的古代居民，最早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因此，西辽河地区出现的此类型种系族群，很可能起源于西部地区。



图五十一：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地考古发掘现场，可以看到古戎人豪华墓葬。

这与历史学家对戎人源流的考察结果是一致的：古戎人分布在黄河上游及甘肃西北部,后逐渐东迁。其中緄戎，也就是犬戎，于诸戎中尤强。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犬戎与申侯联合攻杀周幽王，迫使周室东迁。而西辽河地区的山戎族，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一戎人族群民族大迁徙过程中，逐渐迁徙而来。由此，寻找西北地区的汉藏民族始祖人群，仍需要检测更多西北地区古DNA样本。

羌族源流：西北族群与南方族群的混合

从时间节点看，首先应当考察的西北古族，应是羌族。这是东方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古老民族之一，在甲骨文里就已经有“羌”字了。

根据汉族上古神话，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考古上，对应仰韶文化末期），黄河中游出现了炎、黄两大部落。炎帝姜姓，姜、羌本一字之分化，是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不同表达，甲骨文中亦常互用。

姜、羌均像头戴羊角头饰之人，代表以羊为图腾的起源于我国西北的原始游牧部落。《晋语·国语》：“昔少典娶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炎帝属古羌族部落，部落众多。



图五十二：现代羌族妇女头饰。

但《诗地理考》又云：“羌本姜姓，三苗之后，居三危，今叠、宕、松诸州皆羌地。”《后汉书·西羌传》则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

可见，羌人起源又与三苗民族集团相关，并非西北地区土著民族。现在研究者一般认为，于青海河湟地区，渭水上游草原一带的羌

族，早在西周时期就活动于甘肃临洮一带，而现代羌族，则是当地土著与外迁来的苗民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最后形成的。

羌族的Y染色体基因部落，也证实了这一点。其组成较为复杂，其O3-M117基因型的比例，通常在10%上下，并不是特别高。而根据《从Y染色体遗传结构看藏缅语族人群的起源》一文，其高频出现D基因型，由于此基因类型在苗族中比例也较高，而四川藏族比例也相对西北方更高，那么，是否此基因型代表汇入古羌人的三苗集团呢？人类学家的回答是：目前还尚不能做出定论。

羌族样本中还出现高过30%的O2基因型，这一类型在华南地区民族中更为常见，这或许暗示着，羌族南下过程中融合大量南方土著血统成分。

此外，羌族容貌通常处于一种介于北方民族、南方民族之间的混合状态，这同样暗示着西北族群与南方族群较高水平的血统混合。

只是，考虑到汉族D基因型普遍低频或者缺失，且除青海之外，甘肃、宁夏等其他西北地区比例通常很低，这可能意味着，在汉藏分离之前的古羌人，较少这个基因部落，或者仅在青海地区常见。于是，汉族的古羌人始祖，便可能是在甘肃、宁夏等西北区域一路迁徙到中原地区的，而非青海等地。

但在考古学上，甘肃、宁夏与青海等地新石器时代直到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这似乎又并无法明显区分假定的D基因部落和O3a2c1a-M117基因部落，而且，一组汉代青海陶家寨遗址的（或汉化的）古羌人，还是另一个O3*类型，与上述两个基因部落均不同。

由此，古羌人的具体血统组成依然神秘。

汉族源流：炎黄都可能是古羌？

而根据汉族上古神话，疑似古羌的炎帝部落，与黄帝、蚩尤部族集团共同关联着华夏族的渊源。

黄帝族的起源众说纷纭，但他们与炎帝族的关系显然较为密切，或也是起源于西北地区的一支古羌人。至于蚩尤族，则可能是炎黄二族迁徙而来之前的中原土著民族，它更早的源流，也可能与南方族群相关。

汉族神话中有黄帝梦西王母授符一说。传说中的《黄帝出军决》，是根据黄帝梦中西王母授符来进行战争决策的，据说：帝伐蚩尤，乃睡，梦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于是黄帝备之以征，即日擒蚩尤。



图五十三：天鼋——周人心目中黄帝族图腾。

由此可见，黄帝部族集团是在西王母部族的帮助下，打败了中原的世居民族蚩尤集团，从而成功入主中原。这也暗示黄帝集团的最初起源地，同样可能接近西北地区的西王母部族，或者就是从这些西北古族中分离出来的支系。

前文所述，汉族中普遍存在，且相对高频的大基因部落，便是与其他藏缅语系族群共享的O3a2c1a-M117基因型，这一类型，最可能标记西北起源的古羌人部落，且很可能伴随上古传说中的炎帝族、黄帝族东迁入主中原，而汇入后世的汉民族。

这一基因部落在汉族比例通常略高于15%，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比例甚至更高一些。而在目前解析的长江流域古代DNA中，都没有发现此基因部落，且兄弟类型（除苗瑶系族群常见的O3-M7外）也极为少见，由此推测，O3a2c1a-M117基因型当与秦汉之后，逐渐向南方迁徙的汉族人群相关。

另外，藏语支常见的D类型，彝语支常见的F2，在汉族中普遍罕见，可见汉藏语族在分离之后，分别汇入了不同的始祖成分。而汉族除O3a2c1a-M117基因型以外的血统组成，也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差异。如：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北方地区的汉族，与北方民族分享的C基因型比例普遍高于其他地区的汉族；华东、华南地区汉族与南岛语系族群分享的O1基因型比例则更高，同时，北方汉族的O1基因型则非常罕见。另一个高频出现在东南亚南亚语族的O2a类型，在南方汉族中也更普遍一些；西北地区汉族则相对多一点西域血统成分。

依据人类学特征的不同，汉族人群可以归入两个大的类型，即东亚类型的华北组，以河北、山西两地汉族为典型，另一个为华南组，以福建、海南等地汉族为代表，其他汉族人群大体介于二者之间。

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古族，种系特征非常接近壮族等南方少数民族，也即大体介于华南汉族和东南亚族群之间；到了青铜时代，中原地区的古代民族开始多了一些北方因素，与华南汉族接近程度较高；现代华北汉族则更接近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西北和华北地区的古代民族，也就是先秦典籍中的戎狄系族群。种系特征的变化似乎

暗合西北地区古羌人起源的炎帝、黄帝集团与接近南方种系特征的蚩尤集团的融合相吻合。



图五十四：仰韶村仰韶文化遗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西北族群与中原族群在上古年代的融合现象显然不是在大约5000年前（也就是仰韶文化晚期）一蹴而就完成的。因为就考古证据而言，仰韶文化晚期中原人骨特征与仰韶文化中早期人骨并无实质差异，人种特征非常接近，即使偶见一些细微变化，也是与大汶口文化所代表的东方族群的混血有关。可见，炎黄集团东迁大战蚩尤集团的上古神话，可能只是一个数千年历史进程的缩影而已。

寻找丢失的密码

1993年，电影《侏罗纪公园》描绘了一幅从古琥珀中提取恐龙DNA的美妙幻景。在今天，从三万年前的古人类遗骨上获得基因组完整图谱，已是现实。

文/黄艾禾

公元前210年，陕西关中尽是大工地。在咸阳，新朝宫阿房宫已经开工两年，而骊山脚下，秦始皇陵的修建已经进入第37个年头。



图五十五：2012年，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对兵马俑头部进行挖掘。

秦陵是从秦始皇13岁登基那年就开始修建的。“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这是李白的诗。秦陵修建时间之长，恐怕是中国历代皇帝陵中之最，最多时征用人力70万。考虑到秦朝当时人口只有2000万，除去一半女性，再除去北筑长城征夫30万，南戍五岭发兵50万，还有修驰道、筑灵渠等巨大工程动用的人力，历史学家的估计，当时各种徭役征用的人丁达300万。修皇陵投入70万人，真是惊人的数字。怪不得中国人会留下“孟姜女哭长城”这样凄惨的民间记忆。

修秦陵的，基本是四种人：戴罪服役的刑徒；因犯法而被罚钱又没有能力缴纳钱财的人；官府和民间工匠；定期服劳役的人。这里面，人数最多的，当是刑徒。他们身披锁链，采石、运土，在监工士兵的毒打下，干着极重的体力活，死了就随便扔进旁边的一个坑里草草埋葬。

两千多年以后，到了公元2003年，他们中的几位，惊现于今世，当然，早已经都变成了白骨。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徐智这样描述他们：“是在兵马俑旁的一个坑里挖出来的。一百多具很散乱的骨头，层层叠叠，没有一定的埋葬方式。考古学家把一个个个体给分出来。这些骨头上，有非常强的体力劳动后才会出现的症状：磨损、骨折，或琵琶骨上有穿过的痕迹。那坑里共121具遗骨，他们平均年龄24岁，都是男性。”

陕西考古所把样品送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他们是当年修秦陵的劳工，这应该是不错的，但是，这些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新闻媒体一时将消息炒得很热，甚至有发现“具备‘欧亚西部特征’的2200年前‘洋劳工’”之说。

想知道这些两千多年前的遗骨究竟出自何方，最确凿的办法是直接测试他们的DNA——这个听起来有点像个科幻的技术，现已日臻成熟。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能够测古DNA的地方，另一个做这项工作比较多的机构，是朱泓教授率领的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数千年前的遗骨再说

测古DNA，是个技术活。第一步，先取一块骨头，磨碎，注入一些化学溶液，从里面提取DNA。在我们这些外行人眼中，DNA应该都存在于活的生命体中，死去几千年的人骨，还有DNA？



图五十六：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对兵马俑身体躯干进行清理。

“DNA不一定存在于活性物质中，”徐智解释说，“DNA其实是一种化学物质。生命是有活力的，很奇妙的是，这些本身没有活力的化学

物质，组装来组装去，就有生命了。人死之后，你身上的DNA也不会立即都消失光。不过因为没有活性物质保护，外面的东西会侵蚀它，这是一个递减的过程。在较好的保存环境下，比如，不那么湿，温度也比较低，这里的DNA就是可以利用的。”

秦陵劳工们的DNA损失很大，这个坑也曾遭遇过雨水的冲刷。“不过，因为可利用的DNA量比较大，还在承受范围内。”这里说的DNA，主要是线粒体DNA，而像Y染色体这样的，已经基本保存不下来了。“一个细胞里，只有一条Y染色体，但会有一千至两千个线粒体。所以现在的古DNA论文，一百篇中有九十几篇讲的是线粒体DNA。”徐智说。



图五十七：兵马俑坑内地层环境。

再往下的步骤，就是传统的遗传学的操作手段了。从测试得到的结果中，判断他们的来源。

徐智共做了50具遗骨。其中有一半以上不能提出DNA。最后做出的是19个个体。在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有一个采自今天全国范围内两千多个样本构成的基因库，徐智把这些遗骨的DNA去一一与样本库中的样本比照。

因为样本都是今人的，只能有个大致的判断。徐智将中国人的基因类型大体分为四种：北方汉人，南方汉人，北方少数民族，南方少数民族。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秦陵劳工中，南方人稍多于北方人。看来当时从南方征调了不少人。还有，汉族和非汉族，人数差不多。至于“洋劳工”，是没有的。

“侏罗纪公园”的幻想与现实

1993年，全世界的电影观众都从美国科幻大片《侏罗纪公园》中看到，生物学家从距今一两亿年前的包有吸了恐龙血液的蚊子的琥珀中，提取出了恐龙的DNA。那个时候，正是古DNA技术风头最健的时候，人们相信，再古老的人和动物，都能提出DNA来。



图五十八：《侏罗纪公园》生物学家正在从距今一两亿年的包有吸了恐龙血液的蚊子的琥珀中提取出恐龙的DNA。

古DNA技术的兴起至今只有20多年的历史。1984年，英国《自然》杂志首次报道了美国科学家Higuchi从一种灭绝了150多年的动物斑驴身上成功提取了DNA，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古DNA在古生物学、考古学、进化生物学和法医学上的重大意义。1985年，又有消息传出，有人从距今约2 400多年的埃及木乃伊中克隆出古DNA分子。从此，古DNA技术一发而不可收，不断有新的爆炸性消息传出，直到1993年有人宣称从距今约1.2~1.35亿年白垩纪琥珀中获得象鼻虫DNA和从距今2 500~4 000万年琥珀中的孢子中获取的古细菌DNA。

但是，1994年以后，许多科学家开始怀疑古DNA的真实性，因为人们开始觉得不对，这些古生物中的DNA，怎么和人的那么相像？人们发现，1994年有人从恐龙骨骼碎片中得到的“古DNA”序列，其实是人类的线粒体DNA片段——这些古生物化石被科学家自己的DNA污染了。原

来，活着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散布自己的DNA，你的触摸，甚至你的呼吸都有可能侵染到古物的表面。

从此以后，古DNA的提取技术才开始逐步规范，操作流程也日益严谨起来。徐智描述说，一般来说，如果是男性的遗骨，就由女性工作人员来拾取。现场不能触碰到遗骨，戴手套和口罩是起码的要求。在实验室里，工作人员的穿戴更是如同在SARS期间的隔离病房。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事先测过DNA，这也是识别出可能的污染的措施之一。

现在国际古DNA学界普遍认为，古DNA的理论保存年限只有10万年，除非这个样本是保存在西伯利亚冻土带中，也许可以保存数十万年。“现在你要再说我能做一两百万年前的恐龙DNA，论文扔出去人家编辑都不信。”徐智笑道。



图五十九：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提取古DNA。

不过，古DNA的最辉煌业绩，是对尼安德特人的DNA的提取。这支已经灭绝了的现代人类的近亲，曾经引起人们巨大的关注，许多欧洲人认为，自己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至少身上混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1997年，德国科学家帕波斯和他的学生马提亚·克里金斯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测出了距今3万多年的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中的379个碱基对。他们发现这些碱基对序列和现代人的对应序列很不同，这个结果实际说明，尼安德特人和现代欧洲人没什么传承关系，他们在50万年前从共同的祖先进化开来，两者没有发生融合。

当时，许多人不同意这些德国科学家的结论，他们认为帕波斯才得到379个碱基对，太少了。从心里说，许多欧洲人也情愿祖先是独立起源的尼安德特人。

但是，到2000年，又有奥奇尼科夫等人成功提取了尼安德特人256个碱基对，这些DNA的序列与帕波斯测出的只有3.48%的差异，而且这次实验分别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同时进行，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它证明了古DNA存在的可靠性。



图六十：尼安德特人的复原图。

到2006年，美国和德国的几个实验室从古DNA提取物中获得了65万个碱基对和100万个碱基对长度的尼安德特人的古DNA序列，另外，由加拿大、美国及德国科学家组成的一个研究小组，从猛犸象化石中获得了1300万碱基对的古DNA序列，这一年，《科学》杂志将古DNA技术的进展评为“2006年度世界10大科技进展”之一。

到这个时候，欧洲人对于现代欧洲人是从非洲起源，已经没有什么大的争议了。

拼出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地图

在中国，今天测试的古DNA样本，都在几千年前左右，基本还没有超过一万年前的。这一方面是受限于技术，一方面，是古样本不容易得到。

金力领导的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在测古DNA方面有密切合作，他们也同各地的考古学家互通往来，先后在新疆的古丝绸之路（包括“楼兰美女”）、在三峡工地、在内地出土的许多新石器文化遗址上对古尸的DNA进行测试。



图六十一：楼兰美女古尸。

他们得到的结果相当有趣。比如在新疆。大家都知道，当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东西方的交流应该是相当频繁的。其实，对古DNA的测试表明，这种交流，包括文化的也包括人群的基因交融，用金力的

话说，就是来自亚洲和来自欧洲的不同种族的男女开始结合，在三四千年前就非常多见，比我们想象的早了一两千年。

有的时候，古尸明显呈现欧洲人种的特点，考古学家也认为这是欧洲人。但DNA测出来的结果，却是亚洲人的基因。这说明什么？参与过古DNA测试的金力的助手谭婧泽解释：因为提取的是古尸的线粒体DNA，也就是母系的遗传，这个结果是说明，样本是一个混血人，恐怕父系是来自欧洲人种，而母系来自亚洲人种。



图六十二：距今约2800年的且末男尸。

2005年，复旦大学的一位本科生闫鹏荣曾经对著名的四川悬棺中的古尸进行了古DNA的测试，得出结论是悬棺古尸是古百越人的后代，而不是广泛传说的巴人。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也曾试图对人们疑惑不解的三星堆之谜进行探索，可惜对其古尸的DNA提取没有成功。“那里太湿了，头骨和土都在一块。把土弄掉，骨头就碎了。DNA没有提出来。”徐智说。

而对一系列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古DNA测试，让金力、李辉及其团体成员收获不小。他们不但将基因地图中的五六千年前中国人群的迁徙路线与考古学、历史学中的研究资料与成果——开始衔接，而且可以更清晰地确定，这些灿烂一时的古代文化，当时是哪一个族群创造的。比如，良渚文化，那么优美绝伦的玉器，五千多年前就由古百越人，也就是带M119基因位点的那支人创造出来的；而距今四千多年的大溪文化，创造者是苗瑶族群，他们与汉族人群同样都带O3型染色体，但他们的已经有点变异，是O3a4型，是在2万年前开始与汉族分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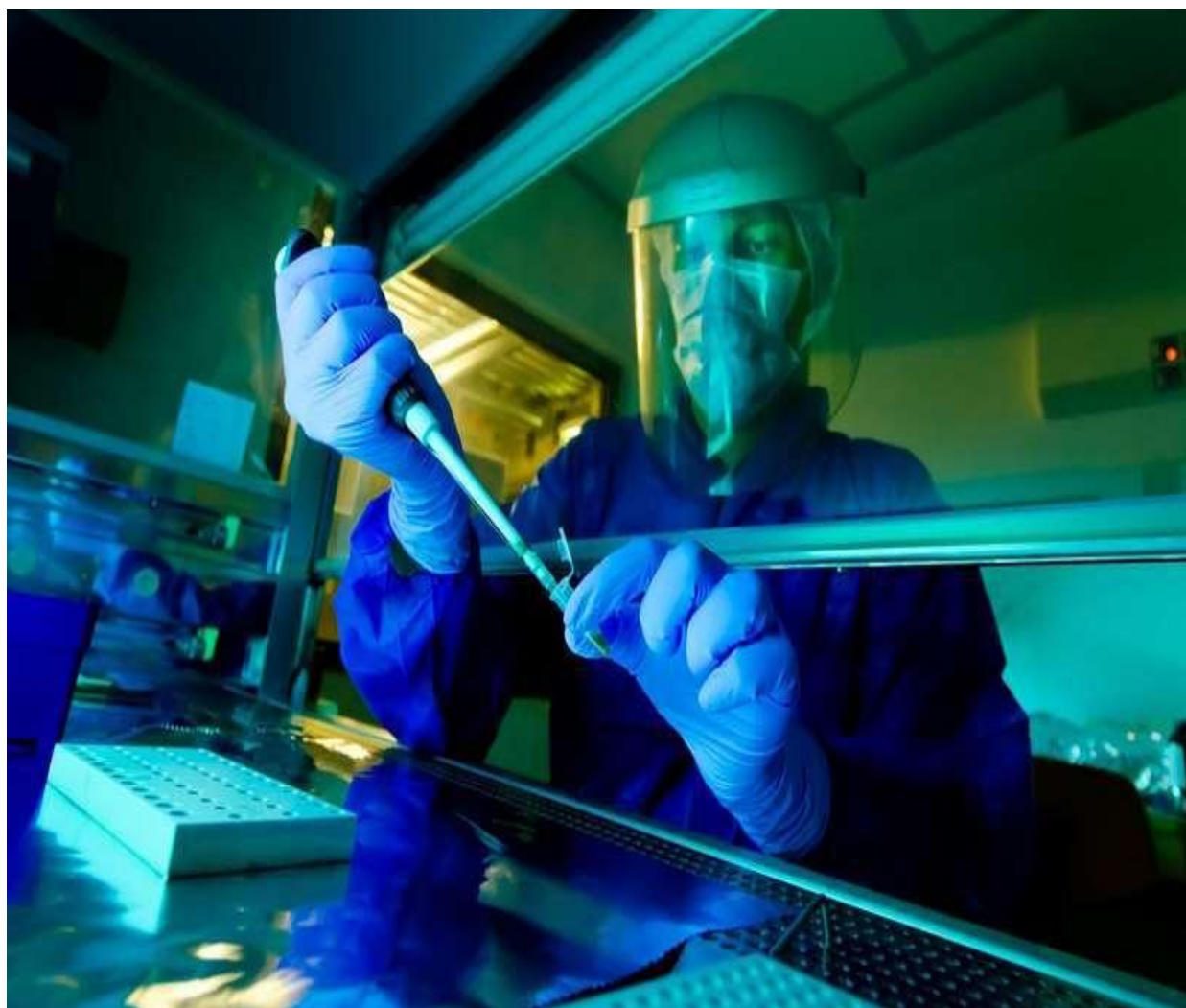


图六十三：精美的良渚文化素面玉璧。

根据对古DNA的测试结果，李辉绘出了一张五六千年前处于新石器时期中国的族群分布图。人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汉族祖先华夏族，还只占着中国的一个小角。“当时各个考古文化区域里的人群，相互是隔绝的，隔离程度相当高。良渚文化中都是M119，没看到M122。在大

溪文化中，有很多属于苗瑶族群的M7。在山西陶寺文化中，就没有看到南方人的任何基因。不像今天，大家已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997年，当克里金斯将尼安德特人的DNA拼接出来时，他写道：“我心里知道结果就会是这样的.....凝视着第一个出现的顺序，我感到脊背阵阵发凉.....”。而到了2008年8月，人们得知，第一个对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的完整基因组的测序工作已经完成。据《细胞》杂志报道说，来自德国、美国、克罗地亚和芬兰的科学家，在一个1980年从克罗地亚出土的生活于3.8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骨样本上，获得了一个完整线粒体DNA基因组序列。



图六十四：科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正在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提取古DNA。

所有这一切，在30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

后记

分子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颠覆着人们对过往固有认知的同时，不断出现的新技术、新发现也不停在颠覆着自身：仅仅一两年时间，刚完成的看似圆满的推向，或是刚得出的结论就可能被推翻。于是，我们对于我们祖先迁徙流播之路的探索，也在不断修正，永无止境。

并且，在走过蒙昧的远古、文明初露曙光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祖先有了文字。于是，那以后的“我们从哪里来”探索，除了分子人类学技术之外，我们就多了一种手段：历史文献学。史书、家谱、笔记种种……虽然，浩如烟海的故纸堆，记载的也不尽然全是真实的历史，但当它与分子人类学结合时，一种更为精准的“我们从哪来”研究方法便诞生了。

因此，接着《你从何处来》，我们将在华夏弥生的时刻，试图以文献和科技融合的方式，去完成远古中国的族群版图描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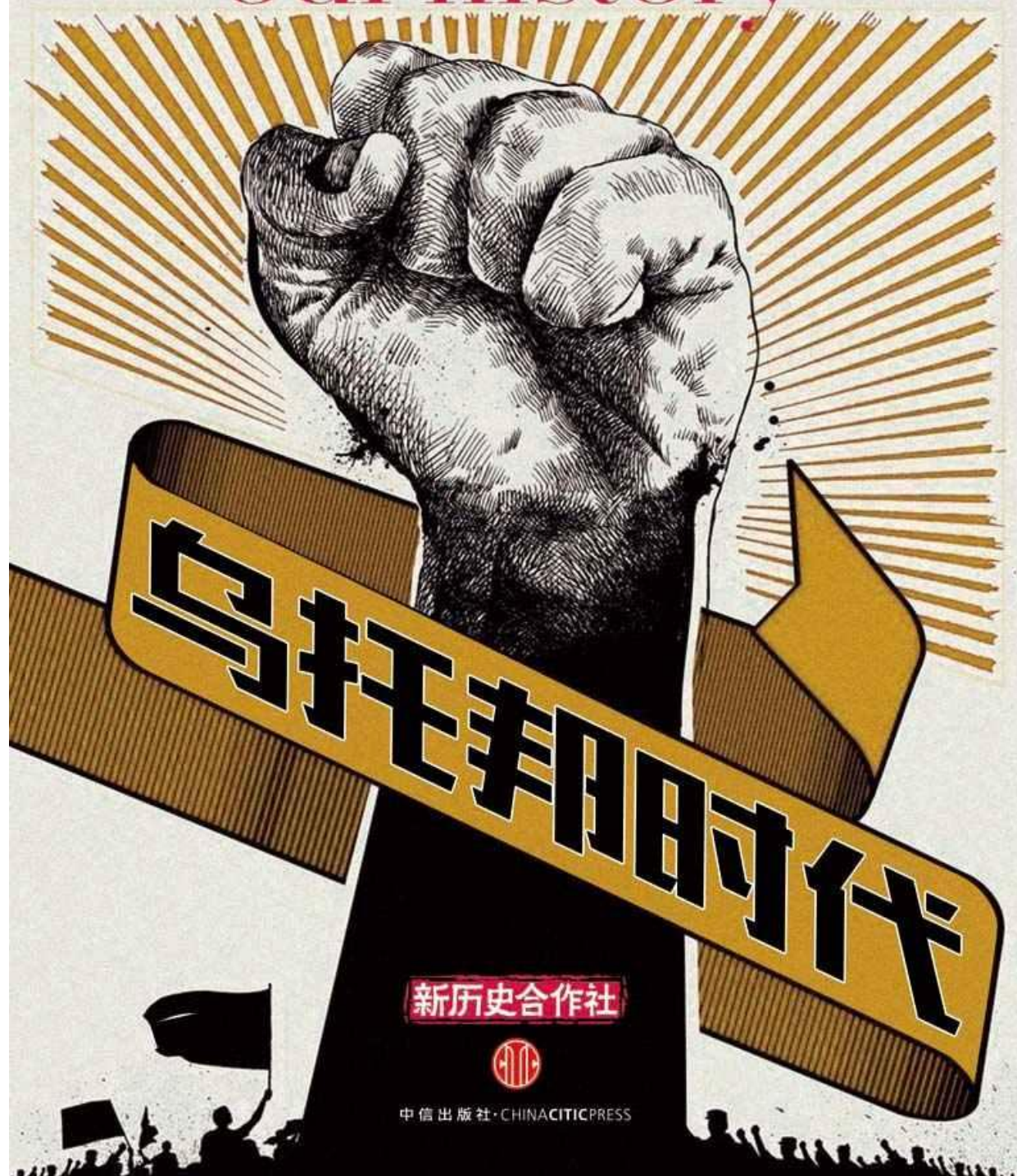


在这里记录中国



关注信睿微信 了解变化的中国

我们的历史 our history



新历史合作社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新历史合作社出品

《我们的历史》总第8期

主编：唐建光

购书平台：多看阅读、亚马逊、掌阅、拇指阅读、字节社
豆瓣阅读

互动平台：

新浪微博：我们的历史-OURHISTORY

腾讯微博：我们的历史

公众微信：我们的历史

联系我们：

编辑部：010-57423216

传真：010-84084564

邮箱：ourhistory2013@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8号（附图）



关于我们



“我们的历史”是新历史合作社推出的历史产品品牌。由这本数字杂志开始，您将会看到以“我们的历史”为统一品牌的网络产品、图书产品、活动产品、纪录片、电视节目，以及微信、微博等多种媒体形态呈现并传播的历史内容。

从纸张到电子，从文字到影像，从眼睛到心灵，无论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的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我们关注历史，我们致力传播；我们执着真相，我们求索答案；我们回望过去，我们前瞻未来。

这是一个专注于历史记录与传播的同人平台，欢迎您的关注、参与和加入。

联系我们：

新浪微博：我们的历史-OURHISTORY

腾讯微博：我们的历史

公众微信：我们的历史

编辑部 010-57423216

产品部 010-57423217

市场部 010-57423218

传真 010-84084564

公共邮箱：ourhistory2013@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8号

目录

乌托邦时代

先声：晚清短暂的文人幻梦

“小说界革命”

科幻奇谭

“新中国”的遐想

康有为：“大同”世界幻游记

大同犹有道，吾欲渡生民

大同世界遐想

矛盾的一生

吴稚晖：西方桃源与“机器之国”

“前去看看抽水马桶亦好”

“革命党之中心点也”

西方桃源与“机器之国”

“名誉的伤痕”

女子社会的幻想

何震其人

天义报与复权会

稍纵即逝的何氏女权乌托邦

参考文献：

阎锡山：山西王制造的“公道社会”

[村治的萌芽](#)

[老家试验场](#)

[河边村的制度范本](#)

[进山会议与公道社会的畅想](#)

[有一千元资产的才能选村长](#)

[模范省的诞生](#)

[种种试验在山西](#)

将军村长的西北梦

[将军村长](#)

[移民西北](#)

[武训小学](#)

[影响力扩大到全国](#)

[集团婚礼](#)

[梦破战火](#)

傅柏翠：不国不共二十年

[一名青年的“新村梦”](#)

[大革命后的“农村共产团”](#)

[“新村”一梦二十年](#)

中山：“总理县长”的“自由港”

[总理遗志](#)

[纸上蓝图](#)

[小走私与大走私](#)

[在政治的夹缝中](#)

武力遣唐

卢作孚：民国NGO史上的失踪者

灾难面前的考试

社会企业家和社会自治

多重身份下的NGO标识

中国故事

乌托邦时代



图一

辛亥，革命摧毁旧邦。在旧国的废墟上，一些人开始做着新的中国梦，站在旧中国与新世界的十字路口，寻找未来中国的新入口。

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向何处去”的雄健追问为先声，或舶自欧美，或源自传统，或出乎空想，种种观念和理念，开始喷涌撒播。或许得益于新政权的势弱和无暇，在战火的硝烟和政争的纷扰中，新的社会实验从缝隙中纷纷勃生。

万类霜天竞自由。天空地阔中，留洋的精英，本土的军阀，或是乡间的士绅，做着各种各样中国梦的人，进行了各行其是、天马行空的设计和践行。

直到1937年，伴随着卢沟桥的枪声，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社会实验嘎然而止，一同没入御侮的硝烟中。

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努力，都从此埋葬在历史的尘土中，在他们的呼喊和足音中，仍然回响着历史的先声。

先声：晚清短暂的文人幻梦

当梁启超将自己蓄意已久的第一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发表在《新小说》创刊号上时，似乎就已经为这场“小说界革命”定下了基调，那便是：将从残酷现实而来的无限感喟，寄托到对未来的向往中去。将现在对政治、道德的观念，所有的目标和幻想都统统投射进未来，投射进一个乌托邦的“新中国”、“新世界”。

文/刘永峰

1902年冬，在《新小说》杂志第一号上，梁启超发表了他平生唯一的一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图二：《新小说》杂志封面。

这部小说一开卷便进入了60年以后的时空，设想出中国到1962年时的盛况。书中这样描述：“大中华民主国”的公民正庆祝政治改革五十周年纪念，在上海博览会上，备受尊敬的孔子第七十二代后人——孔宏道，应邀讲解中国如何缔造民主。他的演讲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热心听众，包括全球数百个地区的留学生。这一幕讲座的构想是如此庄严盛大，学者夏志清甚至将其与《法华经》开篇佛祖说法的场景相比。

这部很奇怪的作品，是近代中国第一部乌托邦小说，而它的缘起却可追溯到五年之前。

1898年秋，维新变法失败以后，受到朝廷通缉的梁启超，在日本公使馆的保护下趁夜出走京城，并由天津登上了一艘前来接应的日本军舰。在驶往日本的军舰上，梁启超心事惶惶，为了给他消遣解闷，舰长拿了一本日本作家柴四郎的《佳人奇遇》给他，希望这本在当时日本极为畅销的小说，能够让这位亡命天涯的年轻人稍微舒缓一下紧张的神经。

舰长无心的好意，却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奇效，翻开一读，梁启超顿时就被这本日文的小小说深深吸引了。不仅如此，一个更令其振奋的念头，也开始在他的脑海里闪现出来。因政治失败而正感到穷途末路的梁启超，却在他手上的“小说”里发现了极大的能量。他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自此，梁启超“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终于，到了1902年冬，从未放弃以“小说”来改良政治、启蒙民智的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当时中国唯一一本文学报《新小说》。而在其创刊号中，五年来“夙夜志此不衰”的梁启超，为了“发表区区政见”也作了一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开始定期连载。

“小说界革命”

那年，梁启超三十岁，他在自述中写道，“笔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其办《新小说》自然不是以文学寄托“闲情”，而是梁启超在另一战场，以另一方式所继续的“维新变法”罢了。



图三：青年梁启超肖像。

梁启超在《新小说》所做的广告中，便开宗明义地讲道：“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不难看出，从《新小说》诞生的第一天起，这就不是一份纯粹的文学刊物，而是政治的、功利的，是别有意旨的。

《新小说》一创刊，梁启超便以一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吹响了高亢的号角。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毫不掩饰他“欲为中国说部创一新境界”的野心。文章一开始，梁启超就开门见山地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接着，“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这样一句传统文论里前所未有的表述随即横空出世。继而，在梁启超的滔滔雄辩里，我们看到，下自人心、上至教化，下自风俗、上至国势，皆与小说得失不无相关。而最后，梁启超并藉由此文向世界郑重宣言：“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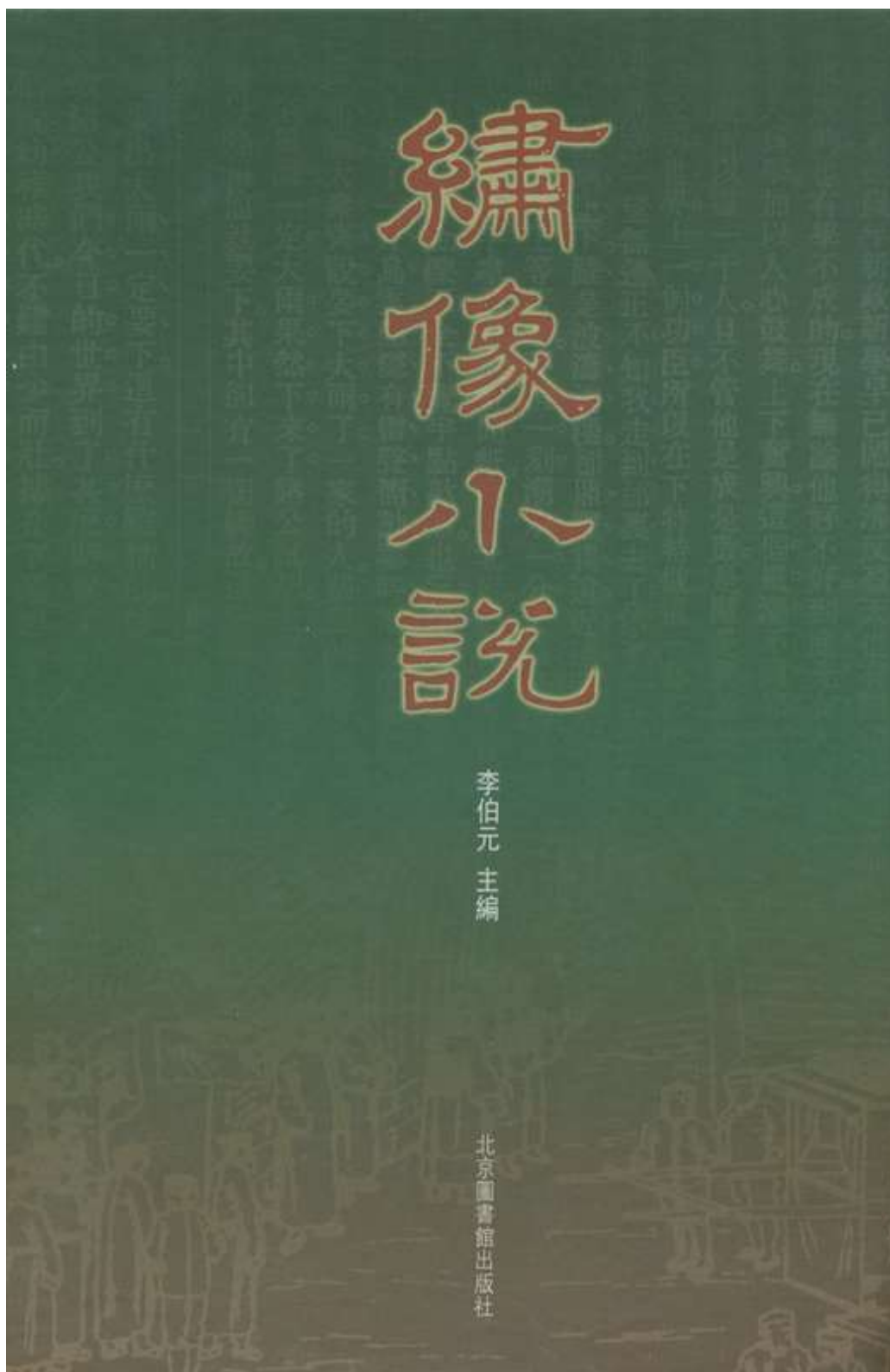
而以此为标志，一场以文字为利刃，以小说为战场，致力于改良政治、开启民智、激励精神的“小说界革命”，由此拉开了序幕。

那时，在东京，一位刚到日本半年、来自中国浙江的青年周树人，自创刊号起便订阅了这本杂志。他在写信时，兴奋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弟弟，而此后，他定期寄给弟弟的进步书籍中，这本《新小说》更是必不可少的读物。到了来年，这位24岁，还未有从事文学打算的青年，也开始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着自己翻译的外国小说。

几乎同时，37岁的吴趼人也注意到这本新出的杂志，辞去了《汉口日报》主笔的职务回到上海，从第8号起开始给《新小说》投稿，后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吴趼人说：“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牛万栋，犹复有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吴趼人外，又比如，李宝嘉、包天笑等，他们绝意仕途，同时又大致认同着梁启超的观点：小说是一件神圣的事业，也开始以全心致力于小说的翻译与写作，并由此起家，成为清末红极一时的小说作者。

《新小说》第一号印出后不到半个月就已“销售殆罄”，不得不“加工急速再版”，而得益于清末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新小说》的名声很快就蔓延至全国。新思想在大城市里的迅速传播自不必说，一些偏远的县镇都已有了《新小说》的身影。郭沫若在《我的童年》里提到，癸卯年（1903）清廷实行废科举建学校以后，在成都入了东文学堂的大哥常会将许多新学的书籍采集回家，“其中《新小说》等书报差不多是源源不绝地寄来，这是我们课外的书籍”。《新小说》创刊不到一年，就已经流入峨眉山下大渡河边一个偏僻的乡镇——沙湾。到了1904年6月，《警钟日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因有人到书店冒名索取《新小说》还曾引起了一场小的纠纷，事件的地点更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会感到陌生的地方——河南省祥符县。梁启超的追忆，反映了《新小说》杂志在全国的风靡：“国人竟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

一时，天下云集景从，仿效者层出不穷。就在《新小说》创刊的那一年，另一位在戊戌变法中深受牵连，而“永不叙用”的人物——张元济，也投身出版事业，来到商务印书馆。1903年，《新小说》迁到上海广智书局刊行后，商务见其蓬勃之势而深受触动，便延请寓居上海的李宝嘉，也来编辑一种小说杂志，取名《绣像小说》。而小说的热潮又何止如此？紧接着，其他小说杂志，更是泛如雨后春笋，知名的如，《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据统计，清朝末年共有三十种以上的小说杂志刊行，而直接以“小说”为名的期刊就有21种。



图四：《绣像小说》封面。

短短数年间，小说转眼便成了盛极一时的事物。1906年，一名叫寅半生的读书人，感慨道：“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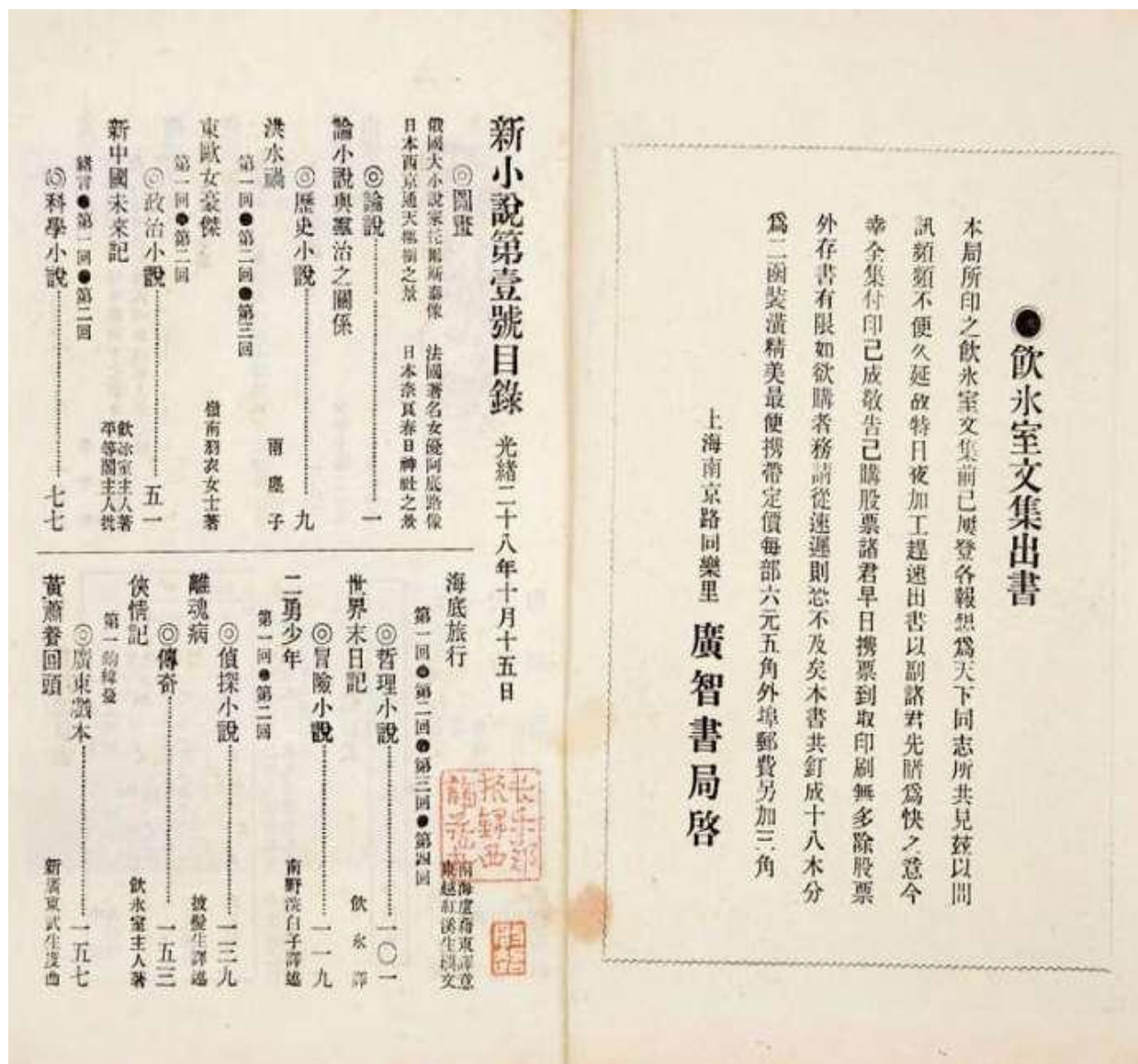
而与此同时，知识界对“小说”这一文坛新宠的追捧更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1907年，清末小说评论家陶佑曾以激昂的情绪写成《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一文，他说，小说“有无量不可思议之大势力”，“列强进化，多赖稗官；大陆竞争，亦由说部”。该文更是写道“小说者，实学术进步之导火索也，社会文明之发光线也，个人卫生之新空气也，国家发达之大基础也”。在他看来，小说简直如万能良药。

然而，这些看似荒唐、夸张的种种表述，不就是梁启超最初的动机吗？其实，这种用心，又何尝不是整个时代的立场？我们在《〈绣像小说〉缘起》中可以见到醒民耳目，开化下愚的字眼；在《月月小说》的宗旨中可以看到辅助教育、改良群治这样的表达。于是，在满清的最后十年里，在几乎所有与“小说”相关的人们眼里，无论呼吁的，编译的，还是写作的，评论的，启蒙民智、改良政治、激发爱国精神这些概念几乎就与“小说”二字天然同义。

那么，在梁启超及其追随者的设想中，什么样的小说才能拯救这个国难当头的时代？什么样的主题才是医治时弊的良药呢？

科幻奇谭

在《新小说》的广告介绍中，梁启超将所刊小说按内容分为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写情小说等等诸多种类，但毫无疑问的，“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的政治小说，以及“发明哲学及格致学”的哲理科学却更令人期待、更契合时下救亡的主题。



图五：《新小说》第一号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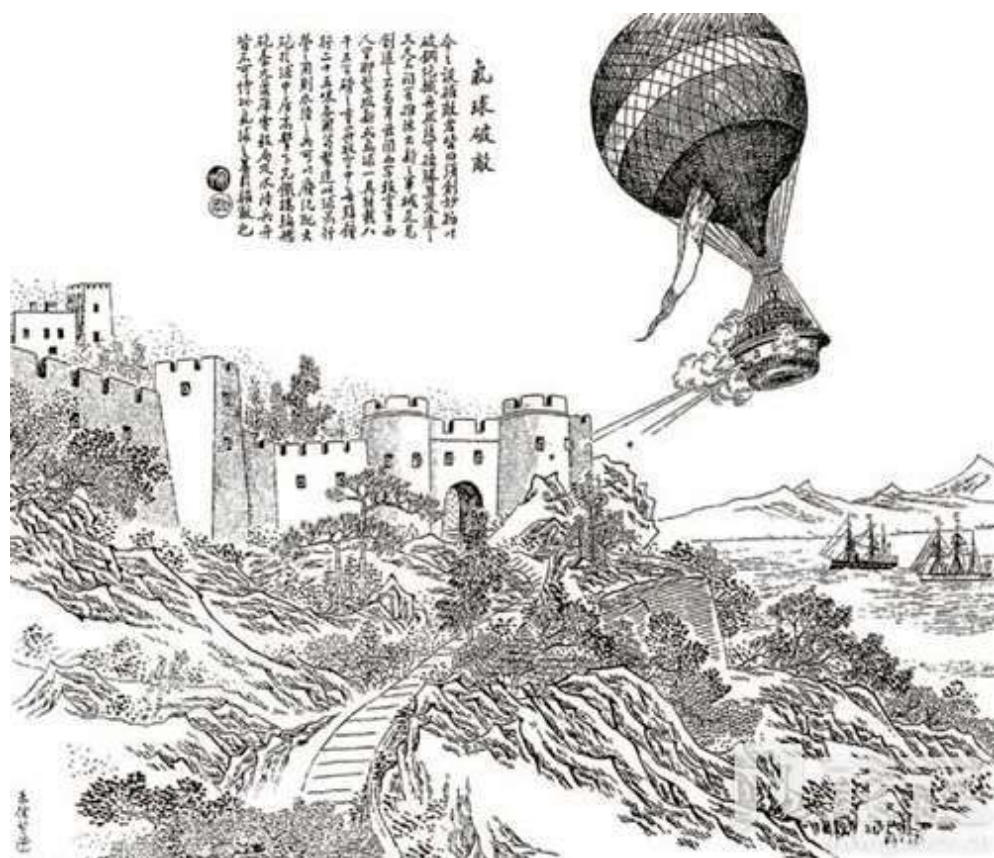
科幻小说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并在19世纪末成为西方读者最欢迎的文类，它在中国的最初亮相，是1891至1892年间报刊连载的爱德华·贝勒弥的小说《百年一觉》，随后儒勒·凡尔纳、威尔斯等作者的作品也相继问世，《新小说》第一号即刊登有凡尔纳的小说《海底旅行》。

“小说界革命”开始后，正如“小说”被赋予神奇一般，“科学”这一来自泰西的陌生事物，也被寄予了众望。1906年《新世界小说社报》第

二期上一篇文章，诉说了时人最普遍的愿望：“立宪成而专制废，科学进而宗教衰。科学之不可思议如此。从今而后，倘科学大进，思想自由，得以改良小说者改良风俗，则将和四万万同胞鼓舞欢欣于二十世纪之新中国。予日望也。”

那时，还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的周树人就已注意到科学小说的价值，他说：“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若科学“假小说之能力”，则必能使读者，“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于是，1903年10月，周树人将凡尔纳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的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钟》翻译为中文，并改名《月界旅行》由东京进化书社出版。两月之后，他又将凡尔纳的《地底旅行》第一二回译出发表在第十期的《浙江潮》上。

当时的周树人尚是一位准备去学医的留日学生，科幻小说更重要的开拓工作还要由另外的一群人来完成。1904年，《绣像小说》开始连载荒江钓叟所著的《月球殖民地小说》，这是第一部中国人写的科幻小说。1905年，徐念慈写成《新法螺先生谭》，与包天笑所译的《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三书合刊发行，此外，徐念慈还是《小说林》杂志一位才华出众的编辑和翻译，很早就将《新舞台》、《黑行星》等国外科幻小说译成中文。《小说林》的另一位主要撰稿包天笑亦有《世界末日记》、《空中战争未来记》等小说发表。而清末最有名的小说家之一吴趼人也参与到科幻小说的创作中来，并在1905年开始写作他最重要的一部科幻小说《新石头记》。



图六：《月球殖民地小说》内页插画。

“小说界革命”开始不久，写作、翻译、刊行科幻奇谭已经蔚为风潮。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中这样写道：“乌托邦或恶托邦的历险，月界或太阳旅行，星际迷航，以及地心或海底探险等，林林总总都出现于晚清说部。晚清作家所构造的世界，也充斥着前所难以想象的机器人、魔术师、飞天气球、潜水艇、空中飞行器、导弹与太空船等。他们创造了空前绝后的时空幻境，而其笔下的人物则轮番摧毁或拯救中国。”

在清末科幻小说作家的肆意想象中，科学的作用也被无限地神化，借助“飞车”“飞舰”等工具飞天遁地、星际旅行还是尚可理解的事情，然而，有时小说作者却将科学使用得如同妖术一般。比如：在陆士谔所著的《新中国》一书中写道，“我”在宣统二年(1910)大年初一入梦，来到立宪四十年后(宣统四十三年，即1951年)之中国。此时的中国已经由积弱变得强盛，到处是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到了南洋公学，“我”

发现该校兴旺非常,细问才知该校的苏汉民发明了两种惊人的学问:其一是“医心药”:那医心药,专治心疾的。心邪的人,能够治之使归正;心死的人,能够治之使复活;心黑的人,能够治之使变赤。亦能使无良心者,变成好良心,疑心变成决心,怯心变成勇心,刻毒心变成仁厚心,嫉妒心变成好胜心。另一重大发明是“催醒术”:“那催醒术是专治沉睡不醒病的。有等人心尚完好,不过,迷迷糊糊,终日天昏地黑,日出不知东,月沉不知西。那便是沉睡不醒病。只要用催醒术一催,就会醒悟过来,可以无需服药。”中国人的种种劣根性,利用药物便被轻而易举地消除了。除此之外,小说中还开设有洗脑院,能以医学手段祛除中国人脑中的恶劣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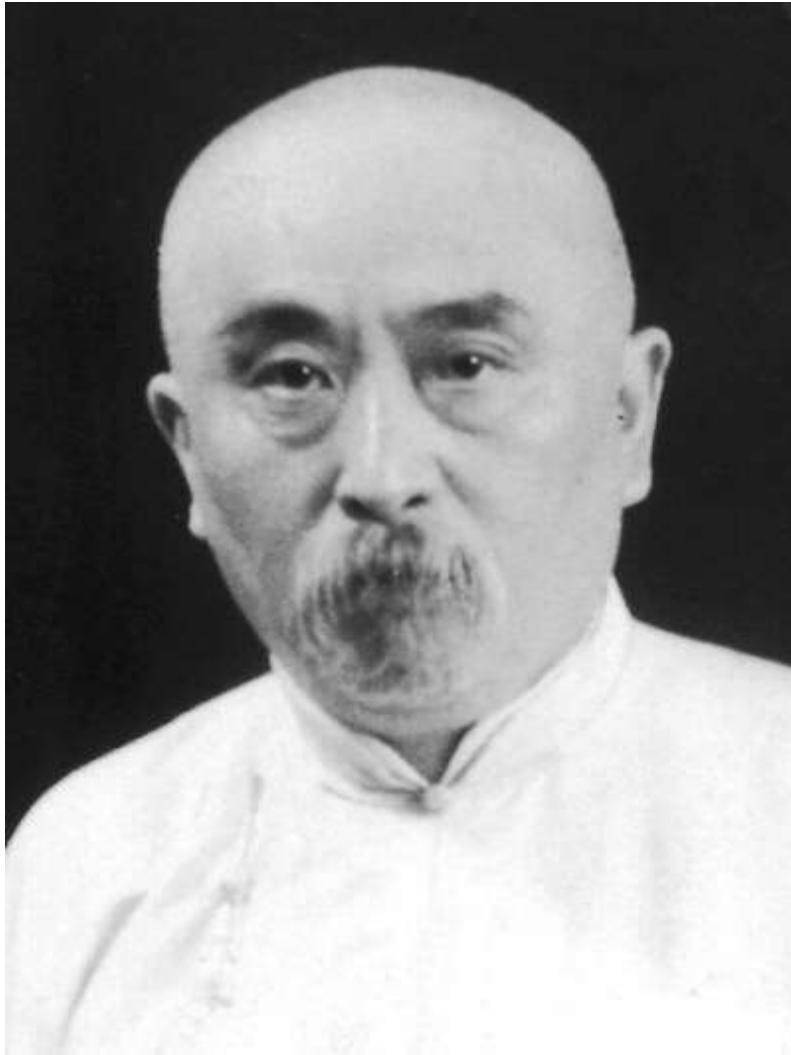
在科幻小说里,晚清作家们无所顾忌地描写着无所不能的灵魂、医心药、催醒术、洗脑、换脑等异想天开的东西,书写那些难以置信和不切实际的事物,或许从来就没有留心过如何普及科学,相反,科学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个道具,借此“瞎想新的政治愿望和国族神话”罢了。

“新中国”的遐想

当梁启超将自己蓄意已久的第一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发表在《新小说》创刊号上时,似乎就已经为这场“小说界革命”定下了基调,那便是:将从残酷现实而来的无限感喟,寄托到对未来的向往中去。将现在对政治、道德的观念,所有的目标和幻想都统统投射进未来,投射进一个乌托邦的“新中国”、“新世界”,并通过对“新”的设想来实现对“旧”的影响与救赎。

受《新中国未来记》的激发灵感而出现的许多作品中,陆士谔的《新中国》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小说又名《立宪四十年之后之中国》,描述叙事者1950年造访在各个方面都已繁荣昌盛的中国。发达工业开创不久;高等教育遍地开花;妇女享受与男人同样的权利;外国租界已经无影无踪;而且西藏也成为中国之一省。对“新中国”的居

民来说，旧中国的社会丑恶听起来如一杜撰的小说；困扰他们的唯一问题竟是国家财富过剩。



图七：陆士谔

而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则在“文明境界”这一乌托邦里想象着未来君主立宪后的一切美景。这部写于1905至1908年间的小说，是作为《红楼梦》的续集出现的，主人公仍然是贾宝玉，但吴趼人却从爱情的故事中挣脱出来，成就了他对一个现代理想社会——“文明境界”——的尽情想象。小说全面详尽地描绘了“文明境界”的政治体制、科技制度和社会风俗。这里的人们吃的是流体的营养液，穿的是全机械制成的衣服，医术昌明，百岁不在话下。能控制四时气候，农艺一年四熟，

可在夏日赏飞雪。日常生活有司时器、地火灯、助明镜、助聪筒。上天有飞车，下海有潜水艇、水靴，入地有隧车。军队强大，武备高明。学堂教育发达，人人敬业，各司其职，老有所终。百姓谦逊有礼，没有盗匪没有娼妓，也没有警察。这样一个美妙的理想社会，使外来者贾宝玉不禁好奇它“是用什么政体治成的”。导游“老少年”的回答令人惊异，他首先比较当世的“专制、立宪、共和”三种政体，认为共和体党派纷争，最野蛮，立宪体实质是“富家政权”，而专制体实分文明专制和野蛮专制，“野蛮专制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基于德育普及、道德完善的“文明专制”，则“有百利没有一害”，所以文明境界采用的实际是一种“文明专制”，政权仍归皇帝领导的好政府。



图八：吴趼人

小说大量铺陈的物质技术信息，各种高科技产品令人眼花缭乱。在第一部分中，宝玉参观制造局的各种制艺工厂——锅炉厂、水雷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厂，待入了“文明境界”，吴趼人更是泼开笔墨，放肆地描绘各种物质机械各种高科技产品更是应接不暇，宝玉甚至上天下海去猎奇，搜寻各种稀奇古怪的珍物——乘飞车猎大鹏；坐潜艇抓鳅鱼、人鱼、貂鼠、“其音如鹊”的鲛鱼、会放冷气的透明的珊瑚、翠石。小说满篇都是光怪陆离的奇物的堆积。“文明境界”的博物馆、众多现代工厂、空军水军操练、四时皆备的花园，无一不显示着数量、速度和庞大，这是“文明境界”的基调，更是晚清小说家们为现实中国开的“药方”。

在晚清小说家的“乌托邦”，里往往含混着中西制度，混合了种种错位的殖民想象与帝国想象，从军事复仇到改良主义，从千禧年的渴望到末世论的警告，也都无所不包。尽管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是含混不清的，对“科学”的掌握是模棱两可的，视野更是错乱无章，但他们的创造力和热忱却不应被轻视，无论如何，这次科幻奇谭的热潮，都是一场千姿百态、光怪陆离的美梦。短短数年之后，随着“小说界革命”的落潮，就突告沉寂了。

1909年1月，《月月小说》停刊，至此，盛极一时的清末四大小说杂志全部停刊，标志着近代小说期刊第一个发展高潮的落幕。很快，随着满清覆灭，“革命”目标的消失，“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便失去存在的基础。而民初政局的动荡黑暗，也使梁启超借几本小说就可以救国救亡的神话不再为世人所信从。清末人们还在争相描绘着中国成为“共和国”若干年之后的美好图景，但当“共和国”真正建立以后，就没有人再去写这类小说了。



图九：《月月小说》封面。

康有为：“大同”世界幻游记

客观地说，康有为并不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只是他的思想太过超前，太不接地气，就连他自己也知道，有关“世界大同”的遐想，只是一个美丽的梦。要实现这个美丽的梦，中国还有很长的路。

文/黄加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图十：康有为肖像。

这段出自《礼记·礼运》的文字，历来是中国文人对理想社会的遐想。虽然，康有为理想中的人类终极社会与大同社会相去甚远，但当他完成了对完美世界的勾画后，仍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大同书》。

清末，通往世界的大门轰然打开。不但老大帝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也面对着从未有过的知识大爆炸。君主立宪、革命、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思潮，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士人自古便怀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济世情怀。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这种使命感便愈加强烈。

不过，由于个人性格、知识结构、认识水平和处境的巨大差异，他们对中国未来的设想和探索也各不相同。正如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中写到的那样：“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帮助我们解决的资料却没有，我们便靠主观冥想，想得的便拿来对吵，吵到意见一致的时候，便自以为已经解决了。由今回想，真是可笑。”

不论这些观点是否可行。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探索，仍然值得我们敬重。

大同犹有道，吾欲渡生民

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重新垂帘听政，仅仅实行了103天的维新变法仓皇落幕。慈禧太后虽然轻松地夺回权柄，却没有抓到罪魁祸首康有为。

康有为有如神助，出北京、到天津、经青岛、至上海，一路向南，逃到香港，并最终在友人的帮助下流亡海外。从此，他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流亡生涯。这16年间，他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

里”。在当时，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像他那样，足迹遍布全球。康有为周游世界，当然不是为了观光。他在《欧洲十一国游记序》中把自己比作“耐苦不死之神农”，希望“遍尝百草”，寻找能够医治中国的“神方大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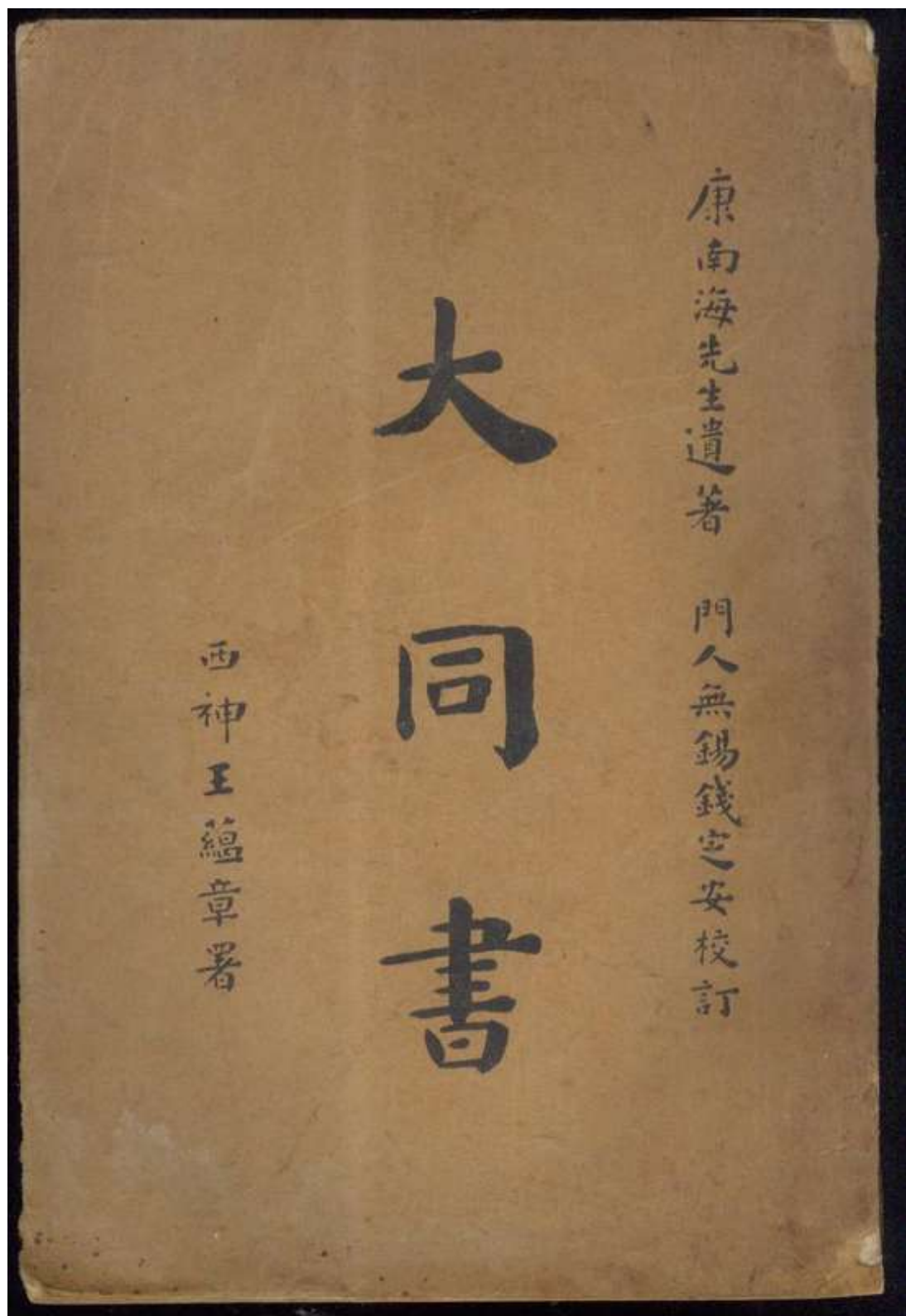


图十一：康有为在美国芝加哥。

其实，康有为自青年时代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1876年16岁的康有为因不善写八股文而落第。学业受挫的他决定寻访名师。正好他父亲的老师朱次琦在离南海不远的九江镇办学。朱次琦是一位理学大师，认为读经的目的是为了“济人经世”。他的思想对康有为影响很大，康有为立志在30岁前读完群书，做一个当代圣人，救国家于危亡。然而，两三年后他便对“日埋故纸堆中，泯其灵明”的学习生活感到厌倦和怀疑。照这样下去即便遍览天下群书，又对现实有什么裨益呢？此

时，21岁的康有为出现了一次精神危机。“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看到他歌哭无常，以为他发了疯。只有康有为自己知道，这些反常的表现皆因“求道迫切”。

1879年初春，康有为离开朱次琦，进入家乡附近的西樵山研究佛学。从日后《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设想可以看出许多西方极乐世界的影子。这段研究佛学的经历对他的影响很大，不过影响更大的还是他在西樵山耳闻目睹的惨相。“或寡妇思夫之夜哭；或孤子穷饿之长啼；或老夫无衣，扶杖于树底；或病妪无被，夕卧于灶眉；或废疾隆笱，持钵行乞，呼号而无归。”世界在他眼中，“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现实与极乐世界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怎样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随后的香港之行令他大开眼界。



图十二：《大同书》封面。

英国人治下的香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道路宽敞整洁，人来车往，井井有条。赛珍会（即博览会）上的各种新奇玩意儿令他眼花缭乱，欧洲马戏团的表演更是精彩绝伦。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西方文化，使康有为从小接受的封建传统观念发生了动摇。他突然感到，原来中国早已经不是“天朝上国”，而成了传说中自大的“夜郎国”了？自此以后，康有为开始钻研西方文化，寻找救国之法。

1901年底，变法失败逃出中国的康有为，在女儿康同璧的陪同下，来到印度北部山区大吉岭。山高雪深，孤城寂客。康有为在这个距中国不远的世外桃源，开始了他对心中完美世界的勾画。不过，此时他已不满足于仅仅为中国开药方，而是试图为全人类找到共同的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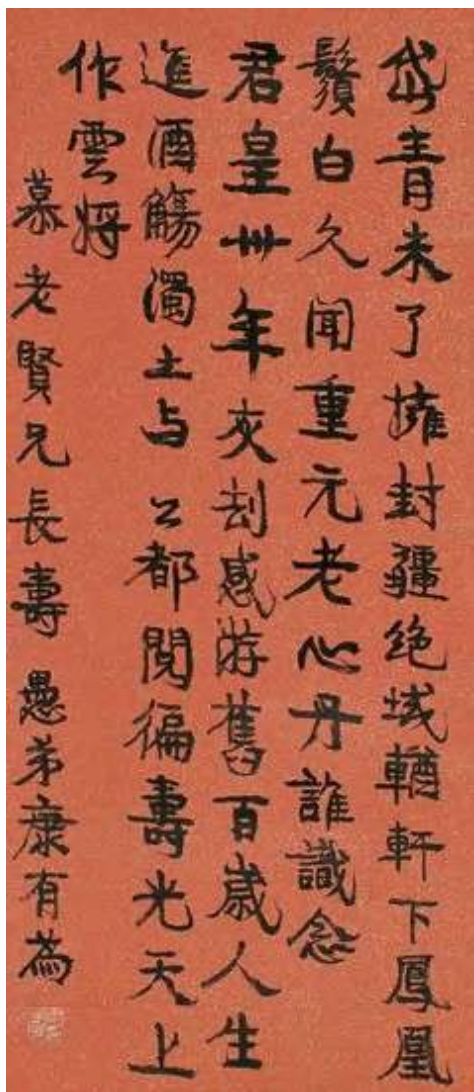
大同世界遐想

世界何以乱象丛生？康有为认为，都是因为国家的概念。纵观人类历史，无非是大国吞小国，强国欺弱国的循环往复。战争的惨祸都是因为人们自私其国而攻杀他国的缘故。康有为想，如果没有了国与国的差别，不就可以永久摆脱兵戈之苦了吗？

为此，康有为设计了一个世界通行政体。取消国界后，在全世界设立一个公政府，把地球分为一百个度，每度设度政府。他设想的大同世界是“无国种、无险要，故分治之域，不以地势为界，而以度为界”。度与度的边界用石碑标注。全球公政府乃是全世界统一的总政府，度政府是地方政府。度政府通过地方自治局与居民保持联系。在他的设计里，这些行政设置并没有官民、大小之分，纯属是为了服务社会生活。

康有为还为公政府设计了详细的施政纲领。因为没有国度，也无须国防，所以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没有军队的。既然没有国与国之分，各国君主的世袭爵号也就一概免除了。康有为设计将地球分为10个州，即欧罗巴州、东亚州、北亚州、中亚州、西亚州、南美州、北

美州、中美州、澳州和阿非利加州。各州又分为数十界。分大地南北为一百度，东西为一百度。公政府由选举产生，政府首脑是总统，任期一年，且不得连任。这个总统其实并无实权，他只是负责接受度政府的报告、处理会计、奖励等方面事宜。这种行政区划，虽然听起来有点儿“换汤不换药”，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努力想把州、界、度等概念，变为单纯的地理概念。



图十三：康有为 楷书条幅 立轴

没有了国，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康有为看来，家庭是人类苦难的一大根源。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家族为基本社会单位的国家中，家族对个人意志的束缚比他国更甚。如何摆脱家族的束缚？

康有为给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在他的设计中，个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男女婚姻纯属为了满足性的需要，而不肩负伦理纲常职能。婚姻采取合约制，而且合约期不能太长。到期如果合得来可以续约，“若有新交，听其更订”。当然，他特别注明，采取这种方式的前提是男女绝对平等，女性有独立的经济来源。

家庭没有了，社会组织肩负起抚育后代、赡养老人的重任。孩子出生以后一律送进育婴院，由专业人士抚养。6岁入小学，11岁入中学，16岁入大学，直至20岁毕业。在此期间，孩子们由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教授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毕业后，他们可以按照自己所学专长的不同，服务社会。到了晚年，老人们进入公立的养老院颐养天年。人死了，送进化人院，化作肥料滋养农田。一个人的从生到死，都在严格的组织下进行。这样的家庭观和婚姻观，别说是在100多年前，即便是在今天也够离经叛道的了。

不过，即使经济、文化、受教育程度等一切外在因素都平等，各个族群之间仍然存在差异。于是康有为开动脑筋，设计了四种“去种界同人类”的方法。一曰迁地之法，他认为让居住在赤道附近的有色人种，迁到纬度高的寒带生活，可以改良人种。其二是杂婚之法，鼓励各个族群之间通婚。第三是改食之法。他看到一些久居欧美的中国侨民，学洋人吃半生牛肉，不久也“面如涂脂”。因此他断定改变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可以改良人种。不过，他认为黑种人很难用以上的方法改良。在《大同书》中他描写道：“惟黑种之人，铁面银牙，目光眈眈，上额向后，下颏向前，至蠢极愚，望之可憎可畏”，与白种人和黄种人相比，“有若天仙之与地狱之鬼也”。若要改良黑人人种，非得经历千年才有可能。对于个别性情太恶、状貌太丑的，他主张由医生服以断嗣之药，以绝其种。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思想，不禁让人想起二战时期法西斯的做法。以今天的价值观来看，这既不人道，更不可取。

康有为为大同世界设计的经济模式是公有制。他认为只有一切归公，才有可能做到平等。在大同世界里一个城市设立一家商店，大市大店，小市小店，万品必陈，物价不二。每个月人们只需要给商店开列清单，工作人员到时候就会把物品送货上门。商部根据当地人民所

需要的商品作出预算，交给农部和工部进行生产。工部制定出精细计划，确保工厂生产的产品正好够居民的需求。这样既不会重复生产造成浪费，也没有短缺之虞。

今人看来，这种统购统销的生产模式并不陌生。从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到苏联的集体农庄，再到中国的人民公社，一脉相承。在共产主义盛行的20世纪初期，这种一切归公的生产模式，无疑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关系。然而，当空想变成现实后，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大概是这些古圣先贤们始料不及的。

矛盾的一生

康有为杂揉着儒家仁义传统和西方共产主义理念的《大同书》终于脱稿了。可是当梁启超要求将它付梓时，康有为却拒绝了。对此，梁启超大惑不解：“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



图十四：梁启超写作肖像。

事实上，康有为很清楚《大同书》完全不接地气，纯属他坐在书斋中的空想。不但当时不可能实现，几百年后能不能实现，也要看运气。他的学生张伯桢就曾解释说：“书成，既而思大同之治非今日所能骤及，骤行之恐适以酿乱，故秘其稿不肯以示人。”不但书稿一直不肯示人，康有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做法，也与书中的理论背道而驰。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一再强调的是平等。他主张取消一切国家中的世袭皇室和爵位。然而在现实中，他逃到加拿大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保皇会”。康同璧曾回忆，“保皇会”的定名颇费周折。起初他们想为这个组织取名为保商会，因“华侨十九皆商，保商即保侨”。但有人说：“保皇乃可保国。”于是，定名为“保皇会”，其全称则是令人忍俊不禁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保皇”乃是贯穿康有为后半生的主要思想。

后来，光绪皇帝驾崩，辛亥革命胜利。康有为已经到了无“皇”可保的境地，但他对君主立宪仍念兹在兹。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采用民主共和政体。大多数立宪派都顺应潮流，拥护共和，只有康有为一口气写了好几篇文章表示反对。他反复强调，中国已行帝制数千年，不可骤变，欧美国家除美、法外，“妄立共和政体者，未有不乱无已者也”。康有为的理论不能说毫无道理，后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也证明，革命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安宁。然而，他对君主立宪的过分执著，后来竟然陷到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两出闹剧中。



图十五：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携南京临时政府官员谒祭明孝陵。

康有为虽然极力推崇男女平等，尤其反对“一夫可取数妇，一妇不能配数夫”，认为这与“公理不合，无益人道”。可是他自己却先后娶了6名妻妾。直到62岁，还娶了一个刚20岁的黄花闺女为妾。

虽然他曾大谈，屈抑他人为仆婢“大背几何公理”，可晚年他家中使用的仆婢达数十人之多。虽然他一再表示老师与弟子应各有自主权，

反对弟子绝对服从老师，但看到门下弟子一个个倾向共和后，他大发淫威，不许弟子自立，不许有言论自由，更不许革命。

康有为的种种言行不一，不但令世人侧目，就连他的弟子也颇多微词。弟子陆乃翔在《南海先生传》中写道：“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极好西学西路，而礼俗器物语言仪文皆坚守中国；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事中国。凡此皆若甚相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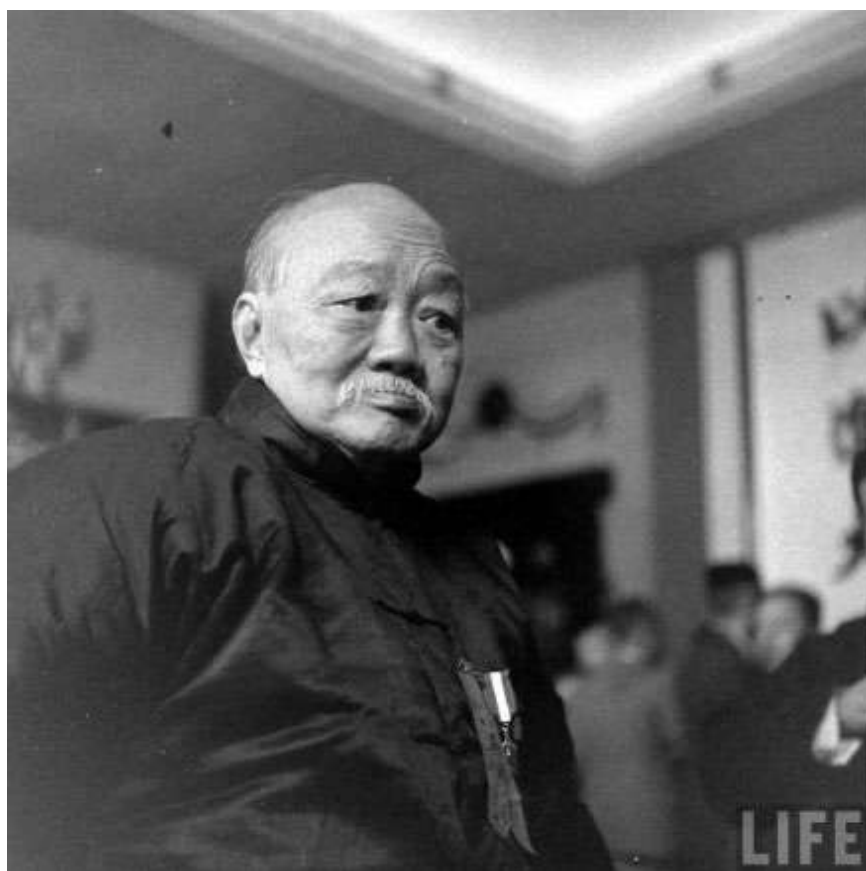
客观地说，康有为并不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只是他的思想太过超前，太不接地气，就连他自己也知道，有关“世界大同”的遐想，只是一个美丽的梦。要实现这个美丽的梦，中国还有很长的路。

吴稚晖：西方桃源与“机器之国”

大变革潮起的1900年后，吴稚晖尽弃旧学，游历欧洲诸国，与《新世纪》刊同仁将“无政府主义”传回了中国，在设计理想国时，他心中的“乌托邦”是何种样子？

文/凡歌

怀揣“绝命书”，38岁的吴稚晖纵身跳入护城河中。



图十六：吴稚晖

八月的日本成城，河水并不冰冷刺骨。但对清朝举人吴稚晖来说，令他感到寒冷、绝望的是他的祖国，是大清政府的主政者们。

这是1902年的8月6日，吴稚晖、孙揆均等人此前与清政府驻日公使蔡均多次沟通，欲让纽璜等9名自费生进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却屡遭拒绝，蔡均最后更召集日本警察逮捕吴、孙二人，并准备遣送其回国。

被羞辱的吴稚晖在路过日本皇城护城河时一怒投水，在他衣袋里发现绝命书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吴虽被日警救起自杀未遂，但却一跳成名。此事引发轩然大波，留学生们群起抗议，酿成轰动一时的“成城入学风波”。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大声谴责“蔡均者，文明之敌也”。“盖惧吾国之多才而欲牧其萌蘖也”。其时日本媒体也都支持中国学生的抗议，声浪之下蔡均随后被调离驻日公使之任。

旧传统的好学生吴稚晖，经此一变，开始痛斥“满洲皇猪皇狗”。嗣后他得以游学英、法等国，观察世界各国之变化，更全面否定孔孟之学，转而相信科学救国。“在甲午以前，但慕咬文嚼字之陋儒，经过甲午惨败，始觉中国不能不学西方工艺，对于兴学实刻不容缓。”

这个旧世界的叛变者，想要寻找一个新世界。

“前去看看抽水马桶亦好”

法国巴黎，成为吴稚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地。

在日本留学遇阻后，吴稚晖辗转前往英国，在那里俭学两年，其间最值得一提的事是与孙中山会面，并加入同盟会。但真正使他思想观念发生转变的则是他前往法国之后。

被称为“中国留法第一人”的李石曾，在1903年出国前曾拜访吴稚晖。后者对他说：“到国外吸取新知识，人不厌其多，但也需有人引荐。你们此去，等于打前锋。”李石曾深以为然。



图十七：李石曾

40岁始出国门的吴稚晖，曾以“白发青年”自嘲，对他来说西方世界的一切都是新鲜而充满活力的。在伦敦，吴稚晖大开眼界，开始鼓吹科学。在吴稚晖的日记中，记载了大量他阅读西方经典，研究天文、地理、进化、照相一类新知识的内容。他后来鼓吹机器革命，可以从他痴迷摄影术中窥见一端。

“4月13日，以15磅9先令自购照相机，连日为人照相，放大翻照。”

1906年，一直坚持“勤工俭学”的吴稚晖竟以重金购买照相机，开始“如发疯然”的狂练摄影术。他日记中有大量购买照相器材、药液、布置暗房的记录。晋永权研究发现；他拍照地点多为公园、海边、街道，拍摄题材广泛，包括建筑、风物等。日记中吴稚晖的熟人经常出现，政治人物如孙中山，另有朋友、家庭主妇、孩童等。1906年8月30日的日记中甚至还记下了“裸照，照照暗房”等内容。

吴稚晖的狂爱机器并非偶然，他的挚友李石曾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科学爱好者。

在法国巴斯德学院学习时，李石曾尝试以化学方法研究大豆，发现其营养成分与牛奶相差无几，并可以替代肉食。李为此颇为欣喜，称之为“极伟大之功用”。仅有研究还不够，李石曾又萌发了在巴黎开办豆腐厂的念头，这一计划得到了技术狂吴稚晖的大力赞同。李石曾后来为此专程回国，筹募开办豆腐厂的资金，最后从其父昔日门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那里募集到了30万元，并由天津海关道拨给李石曾在法国建立的“远东生物学会”经费每月450两银子。同年，他们的豆腐厂即在巴黎郊区开工，其时每月能赚到500法郎，其豆腐产品甚至还在1909年参展巴黎万国食品博览会，轰动一时。

无论学照相，还是做豆腐，这些尝试都只是这群青年人试图改变社会的开始。

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巴黎，吴稚晖与李石曾、张静江等“以节俭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以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为宗旨，发起留法俭学运动，提倡国人出去留洋。用吴稚晖的话说，“即前去看看抽水马桶亦好”。吴稚晖身体力行，与李石曾、褚民谊同住宿，把生活费减少一倍，规定：每月房租15法郎，饭费60法郎。之后蔡元培到柏林，也实行俭学。这项试验后来被他们带回国内，中共早期领导者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皆受惠于此活动而留学法国。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叫做——无政府主义。

大革命发源地巴黎的社会政治风气，对吴稚晖等一代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王子”的克鲁泡特金，1902年在伦敦出版了其名著《互助：进化的一种因素》。李石曾在巴斯德学院结识了地理学家邵可侣，后者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埃利赛·邵可侣的侄子，在其影响下，李石曾渐成无政府主义者。

张静江、吴稚晖亦先后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当时法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大师格拉弗在巴黎创办的杂志名为《新世纪》，影响甚大。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三人遂共同组织世界社，亦编印《新世纪》周刊及《世界画报》，后来蔡元培亦加入其中。

在《新世纪》发刊宣言中，他们宣称“故无所谓武备，更无所谓政府；无所谓种界，更无所谓国家；其卒也，更无所谓人我界。含哺而嬉，鼓腹而游，无争无尤，无怨无竞；怡怡然，四海皆春；熙熙然，大同境象也”。

他们对这个大同社会的构想，注入自己的心血，开出的却是另外的花朵。

“革命党之中心点也”

打碎旧世界的最好办法，就是否定旧世界的一切，从价值观到权力的正当性。



图十八：1909年孙中山（左一）在伦敦与吴稚晖（右一）父子合影。

20世纪初以来的社会风潮中，诸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军国主义等等，各领风骚，那些力图推翻旧世界的人们则各取所需。孙中山在其革命策略中选择“排满”，是同样的逻辑，以“民族主义”来啸聚力量，其目的则在于颠覆当局。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接触这些新鲜观念，感到“无一不使人骇，使人快，使人钦羡，使人崇拜。”

风云际会之时的吴稚晖们，在巴黎成立的“世界社”，是这股风潮中的引领者。

“世界社与世界社团绝不放弃自由独立革命的精神，故博爱合作互相的组织，奋斗到底，以期有理智有道义的社会，永久存在于宇宙之间。”1907年，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发起世界社，吴稚晖具体负责编务及印务，他之前狂热练习的照相术及写真铜版均派上用场。在《新世纪》周刊长达五年的出刊期内，吴稚晖从始至终参与其事。他所用笔

名多达五十种，计有：燃、燃料、夷、敬恒、希、留欧学界一分子、中国之一人、凭良心者、留此读者、留英一客、无政府党一人、革命党一分子等等。

以“燃”为笔名者最多，吴稚晖想把这点新知火炬传回国内的心思一目了然。他学何典体创“吴氏”文风，有时候甚至“鸡巴”、“牛屎”连篇累牍，令时人瞠目结舌。从《猪生狗养之中国人》、《蛆虫全盛时代》、《残同胞阻进化之悍贼死》这类文章标题，就可以看出其文风之彪悍，不过这挺对年轻人口味，而他所要传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就不胫而走。

张静江有时甚至比吴稚晖、李石曾二人走得更远，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世人过分重视性的关系，最为错误。盖社会所以划分男女关系，如此明显，乃传统的习惯使然，而种种罪恶即缘是产生。此种习惯未尝不可改革，譬如我们的手可行握手礼，口可以行接吻礼，则性的关系又何尝不可用以行礼乎？”

此番言论放在今天，也可以说惊世骇俗。更何况是在20世纪初民智稍开之年代。

来看看当时的读者来信，颇有意味。有问“西洋纸币如何兑换的”，有问“邮票有何用处的”，有问“酒店之式状与上海之马上候言茂源相同否”，有问“英国于酒店之外尚有加非馆乎？欧洲大陆上加非馆为状若何”，还有人关心“英国酒店之当垆女子亦如何……坐柜妇人有何淫之意乎”。

新事物，新观念，成为《新世纪》小伙伴们不遗余力宣传的中心。

在潮流之下，他们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暗杀”、“革命”，更将西欧各国的革命事例、民主制度，包括地理风俗，科技发明都介绍给国人。这一时期的《新世纪》，与同盟会在日本的《民报》遥相呼应，影响了一大批年青人投身革命。在中共早期的50多位党员中，包括毛泽东、李维汉等人，有超过一半的人曾被无政府主义所吸引。

颇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一封清政府给法国政府的公函，函中称“革命党之发生，乃由巴黎《新世纪》报之提倡；巴黎者，革命党之中心点也”。在1908年，革命党人曾在云南、越南等地起义，打死几名法国士兵。法国政府曾打算借此要挟清政府，而清政府则向法国政府提出，只要法方查封《新世纪》报，清政府就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浪潮汹涌，这些弄潮儿们能够打破一个旧世界，但他们能建立一个新世界吗？

吴稚晖对此相当乐观地称：“一旦无政府之到来，私产制度自然废除，至于各取所需，各尽所能乃为新世界上人与人之相互主义。”

西方桃源与“机器之国”

他很快就看到了一个榜样。

1906年，吴稚晖亲自到法国无政府主义实验营地“鹰山村”参观访问。随后刊发于《新世纪》上的一篇文章对其进行了翔实的描写，称“舍南舍北，园蔬菜植，鲜美之瓜果四时不断；有清泉一泓可供食饮，甘美逾常，下流汇而为塘可习凫水。四周环以野林，其密如织，中有幽径；其中马一头司拽车挽草，牡牛、山羊一头产乳供自用，野兔数尾，鸡二十只，日产鲜蛋十余枚供晚膳，犬两头司林外之奔走；林中各人各司其职，女治庖、洗涤，男耕地、治园蔬，田野间自由工作之趣味浓深”。

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桃花源记》！

无怪乎吴稚晖发出“无政府三个字乃世间最为吉祥之名词”的感叹。无政府主义阵营中的另一员大将张继，更是进入这个“鹰山共产村”，与“同志十余人，国籍七八种”的各国理想主义者过了三个月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半工半农的生活。



图十九：世界社三位创办人：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合影。

不过，切莫以为吴稚晖想要回到农耕社会的田园时代，那不是他所追逐的理想社会，他觉得无政府社会“另有不可形容之安乐美满”。因为“以旧道德之名词，不能描写其时之道德；以旧社会之环境，不能描写其时之社会”。即便吴稚晖，也未能“罄其胸中所想象者”，只是“标得几个庄重无味之名词，曰无政府，曰共产，曰某某，如此而已”。

在长篇游记后边，他写出了自己的感受是“文明野蛮之分安在，惟学与不学耳”。在他看来，“学也者，用器物，用演讲，用书报，三者尽之矣”。他认为用器物教不过是“老猴子教导新猴子出把戏”，普及之力甚小。“因未到无政府时代。则物各有其所有主，不相通用，则仅辨匪易。（科学器械厂与机件器械厂。货物山积，而穷乡之学校不知试验

之具为何物，野蛮之人民国，不知制造实习为何事。此亦足证不行共产主义，阻碍世界进步之甚多）”他主张用书报来传播，因为“于器物则图其形绘其声，立表以御其繁，附数以通其积”。

在吴稚晖看来，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国利民福”的社会。他进一步解释称“民福者，非特家给人足，含哺而嬉，鼓腹而游而已，而且所居为人境，所行使者为人权，所享受者为人格，乃为民福”。

对于“国利”，这个无政府主义者一句话就概括了：“民福充而国利自普”。

当然，对于未来的理想社会，吴稚晖并非没有想象。他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畅想了一通，勾勒了一幅相当令人艳羡的生活图景。

住——“居宿处中间联以长林广衢，繁花之野圃。凡一居宿处有憩息睡卧室、饮食、读书通信研究、工作所之组织，而养病室则组织于居宿处外。所有一切宇舍，皆建一层楼，或建平房，位置于前花后木之间，其高大登眺之建筑皆在园林。”不仅是当时之中国，且置之于今日中国，如此理想化的住宅设计，恐怕房地产商们都很羡慕。

行——“往来交通除远道旅行，别为电车飞船之途径另有组织外，凡广衢之专供人行者，地底皆有机路而造以极厚橡皮之类之物，每三五十长为一截，终日终夜色循环不息，人便于两面相续处略一举足，由此而换向彼面，如是而已。”查一下历史资料就会发现，尽管电梯发明已近50年，但是直到1892年以后才在欧美渐渐流行开来。吴稚晖显然见识过西洋发明的这一先进之物，他进而设想到人不走路走，也算是奇思妙想。但这一构想显然直到今天都未变成现实。

衣食——“至于衣食服用之物，另有牧场耕地制造物，尽各人之所能自由工作。改良野蛮肉食之品物，精究卫生与医理，使年寿增加。地球上的全人类都吃极卫生的饮食，都穿极舒适的衣食。”为何在衣食方面，吴稚晖不再发挥想象力，所提供的先进理念仅在于“卫生与医理”。不重衣食，这与吴稚晖本人不讲究穿戴，奉行节俭的理念有关。他曾在文章中讽刺那些奔走于场面上的留学生“不料从什么东京，什么

伦敦，什么嘉利福尼，走了一转，重回中国，前后竟成两人。不但事事模仿那最腐败之八股家生活，并且恨不得将中国向来乡党自好之士，所鄙夷不屑为之习惯，亦一一尤而效之。盖此辈寒乞儿，实皆不曾见过十面也”。

无论如何，吴稚晖相信自己描画的这幅图景“曾无几时可以必到”。在这位信仰“科学”的怪人看来，理想的社会实现路径如下：工人知识愈高，合作工厂将代用资本工厂，业组之社会主义可不烦流血而成。铁柱日铸万枝，水泥日出万桶，实验仪器充积厂屋，精铁油木之桌椅满贮仓库；三十里而峨焕完备之大学已在面前，二十里而崇闳富丽之书库博览室又堪驻足；一动车而千亩云堆，一开机而万卷雪叠，人皆为适量之节育，亦各操两小时之工：如此而生产，庶几名实两符。……于是在每天余下的二十二小时内，睡觉八小时，快乐六小时，用心思去读书发明八小时。在这二十二小时睡觉、快乐、使用心思之中，凡是对于温厚、鲜洁、轩敞、飞速等条件的享用东西，应有尽有，任人各取所需。到那时候，人人高尚、纯洁、优美。屋舍皆精致优雅，道路尽是宽广九出，繁植花木。珍禽奇兽，豢养相当之地。全世界无一荒毁颓败之区，几如一大园林。彼时人类的形体，头大如五石瓠，因用脑极多之故。肢体皆纤细柔妙，因行远升高入地，皆有现成机器，遍设于道路，所需手足劳动甚少之故。”

在1906年的中国，这种充满想象力的勾画并不多见。概而言之，吴稚晖所描摹的是一个理想化的工业化社会，人们会注意到他文章中出现的“水泥、铁柱、大学、节育”等等都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实际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英法两国工业文明在他脑海中形成的镜像，所以他坚决不认为自己这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他说：“这并不是乌托邦的理想，凡有今时机器较精良之国，差不多已经有几分已经实现。这明明白白是机器的效力。”

“作为自封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巴黎小组吸取了1898年大同空想家们预言未来的热忱。吴稚晖作为一个技术方面的理想家，表现出特别的活力。他称赞创造性的制造工具的才能是人类天赋的本质，他号召以一种具有灵感的运用精神，通过机器来拯救世界，这半是宇宙论的空想，半是科学的虚构。”德国汉学家鲍吾刚认为，吴稚晖所勾勒的

“是将传统中国式由道家、佛家要求的回到较原始发展阶段的欲望要求，与具有坚实基础、技术的未来的概念并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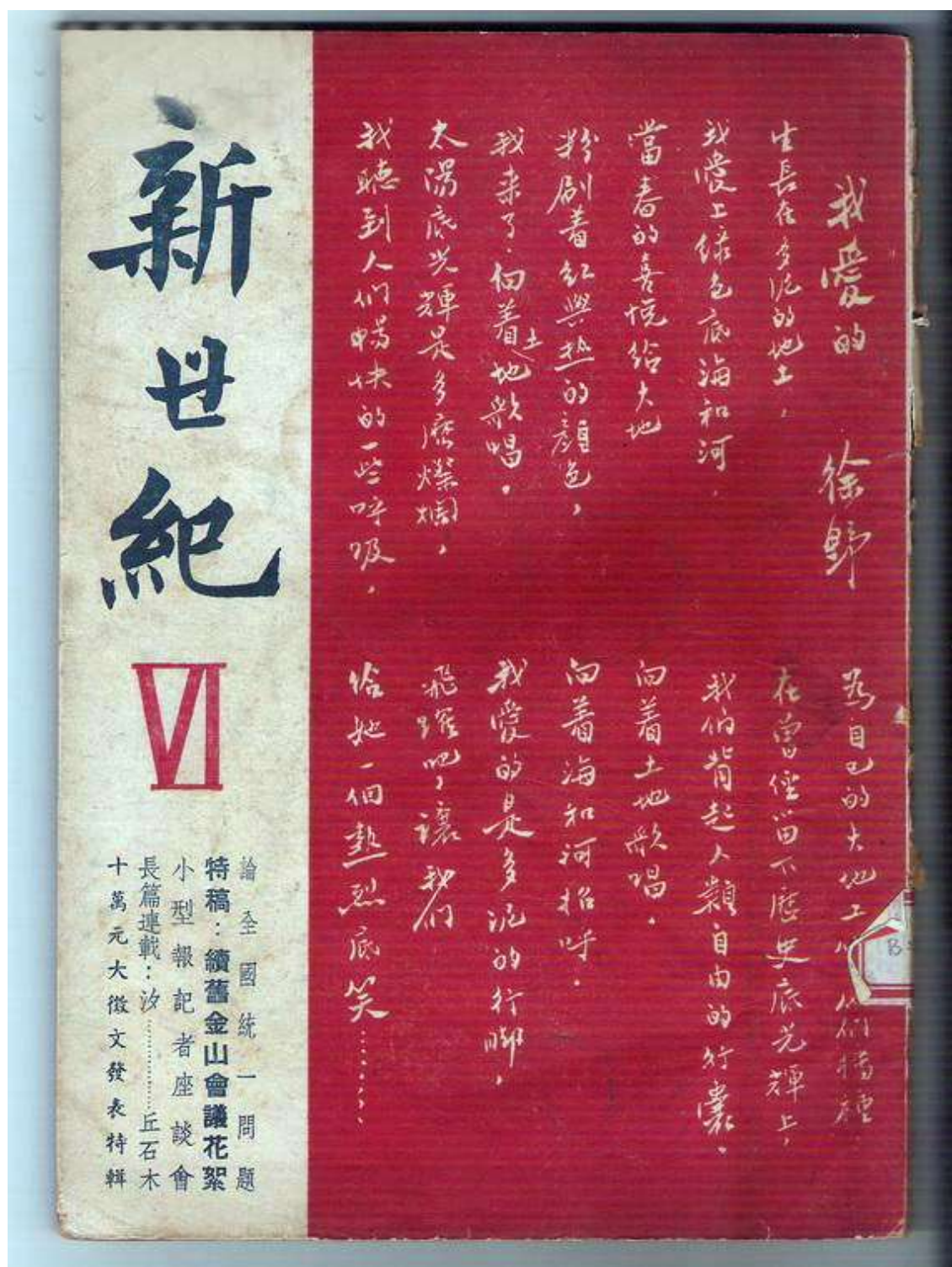
当然，这个机器社会的到来，离吴稚晖设计的时间点尚有距离，而残酷的现实则让无政府主义者面临新的抉择。

“名誉的伤痕”

1912年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吴稚晖出人意料地拒绝了孙中山请他担任的民国教育总长一职。

这位无政府主义者说：“我愿任奔走之劳，做官我是做不像的。”吴稚晖确有自知之明，但之后他从未远离政治中心，其无政府主义之主张亦屡遭质疑。

除了褚民谊后来跟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巴黎小组其他人的友谊终其一生。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也被称为“民国四老”。除张静江致力于经商外。其他三人在民国初年都将注意力放到了“教育”上。吴稚晖在《新世纪》一篇“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的文章中，曾具体阐述道：“除以真理、公道所包含之道德，即如共同博爱、平等、自由等等，以真理、公德所包之智识，即如实验科学等等，实行无政府之教育，此外即无所谓教育。”



图二十：《新世纪》第一卷第四期。

在法国时，他们四人就曾醉心于推广“世界语”，由波兰语言学家柴门霍夫创造的这门新语言，在法国和德国风头正劲。旅欧诸人第一时间就将之传播到了国内。无独有偶，无政府主义的另一支力量，刘师培在日本创办的《衡报》和《天义报》时，也大力宣扬有关世界语的记事和学习方法。

吴稚晖们热追“世界语”的目的则在于“欲求万国弭兵，必先使万国新语通行各国。盖万国新语，实求世界和平之先导也。亦即大同主义实行之张本也”。因此他们高声呐喊“废除汉字”。这影响无远弗及，在五四一代中有多人持同样主张。吴稚晖死敌章太炎的两个学生钱玄同、鲁迅，在这点上却都是吴稚晖的同道中人。在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更激烈地发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他后来回忆称：“记得当年吴老头儿反对汉语改用拼音，说这是‘三汉七洋的怪物’，他是主张根本不要汉语，采一种外国语作国语的，故有此论。他的话自然很有道理，而我却以为‘三汉七洋’也很好，我的野心，是由此而‘二汉八洋’，‘一汉九洋’，‘无汉全洋’。呜呼，吾盖欲由此怪物而引之使趋于全用外国语也。”

不过，这股狂热的“世界语”风潮，仅止于北上广等一些大城市，在知识青年中成为时髦。即便后来热血青年巴金用这种语言写下了几十部小说，但他最畅销的书仍是《家》、《春》、《秋》。在中国更为广大的乡村中，“世界语”仍然是世界上最遥远的一门语言。

吴稚晖不愿意做官，蔡元培却愿意“跳入苦海”。

归国之后的蔡元培不仅参与南北和谈，更在民国初年出任首任教育总长，之后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大力扶持新人，使“五四一代”从旧环境中脱胎而出。他邀吴稚晖来主持国语注音工程，并与吴、李、张等人共同发起了“勤工俭学”运动，使1700多人得以留学法国。

李石曾，则选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他们最初的梦想。1918年，李石曾在北京西山开始自治试验村，其所设立的合作社几乎包含了后来乡村建设运动的所有主要内容，如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地方自治、公共卫生等。这一尝试与梁漱溟的邹平乡

村合作社、晏阳初的定县合作社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乡村建设实践。

《剑桥中国史》评价这一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们的努力，称“1912年后，这些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对中国激进主义的贡献，更多的是通过教育宣传和社会实践而不是通过学说上的革新”。

无论语言、科学还是制度，吴稚晖们的理想在现实中遇到的阻力都远超想象。

一口无锡腔的吴稚晖自创“豆芽字母”，在民国初年专注于推广注音工程。他说：“我们要知道，造这注音字母的主要目的，是为着中国十分之九的目不识丁的国民，增加知识，灌输教育。”这听起来已经比他的“世界语”工程更为务实。他自己打比方将注音符号比为草鞋，将正经文字比为皮鞋。意思先教人穿上草鞋，然后慢慢适应穿皮鞋走路。



图二十一：吴稚晖旧藏贺卡、启示等资料。

但这一路程曲折漫长远超想象。迟至1941年，在参加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时，他再度向大会提出大量印刷发行注音汉字通俗读物；积极推行注音符号运动，计划五年内普及注音文字，扫除文盲。这一主张才得以获得通过，不过却已经没有时间来普及。

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之时，在中国5.5亿人口中仍有超过80%的人是文盲。1960年，执政党中共发出《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

示》（并非吴氏版本的注音），后来的官方数据显示，经过50年的努力，共扫除文盲2.03亿。

教育之改变艰难，显非一时一世之事。

在最初的设想中，吴稚晖曾言：“至于理化博物种种进化之科学，当时既以文字简易划一……百出新法，以求易知而易解。园林清游时，可以随便在花间树底，口讲而指画。道途间与绝未见面之人相遇，亦可姑出其所学于夹袋中，问难而质证。如此，其时即十许龄之童子，已能共有现在科学家之知识。”

但科普之进展未及如他所料，社会形势已急转而下，军阀混战，国共对峙，日本侵华。

无政府主义最初的锋芒逐渐被更为激进的列宁主义所代替。在吴稚晖首倡的里昂中法大学中，比他更为激进的留学生们发起一场运动，令校长吴稚晖黯然去职。1926年，吴稚晖坚决地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支持反共，盖在此时已经种下种子。当然，他也会不无得意地骂道：“共产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灰孙子。”

但无政府主义者们则认为民国之后他已经叛变了这种信仰，他的同道中人刘师复在报上写公开信，质问他：“张继与吴稚晖皆中国提倡无政府主义之先进，前数年在《新世纪》操笔政时，持论至激烈。

（辛亥革命后），乃张继既作议员，吴稚晖亦周旋于国民党间。既与政治日益接近，即无异与社会党、无政府党日渐疏离。及讨袁事起，其原因本由于政治之竞争原为社会主义所不取。而张氏既竭力主持，吴氏亦日日著论鼓吹。以主张无政府主义之人，提倡有政府之战斗，尤足骇人听闻。记者于此，不禁为无政府主义痛苦。”



图二十二：1952年，辛亥革命元老吴稚晖在台湾与老友重逢，倍感愉悦。

此外，他一生的论敌章太炎嘲讽他为国民党走卒，冯玉祥斥他“变节为一人之老狗”；他不得不自我辩解道：“从十三年(按即1924年)到今，我是在党(按：指国民党)里走动，人家看了好像得意……”一腔苦闷，无处诉说。

乱世春梦，主义纷争，在现实的风吹雨打中消散弥尽。多年后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里尖刻地说道：“有几个主张救国之道在研究使用机关枪，有几个主张简约，穿芒鞋草履。另有几个主张跳舞救国，把西洋生活全盘地介绍过来，有几个则主张提倡国货，有几个则主张提倡国术以锻炼体格，另有人主张提倡世界语，提倡佛经，提倡复兴

孔教经书，也有人主张把四书五经抛入茅厕坑中让它过30年。听听他们讨论的救国之道，宛似听了庸医在死人榻旁开了一个榻前会议。”

不过，庸医们总归尝试过治病救人之路，尽管方子不对路。

后世的人们只管看戏，却忘记了他们也有一腔热血曾喷洒在历史的空白处。在嬉笑怒骂的文章与方正传统的书法后面，掩藏着的仍是一个骨子里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恰如他自己一再声称“把我吴稚晖烧成了灰，也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同时又是一个相信无政府主义者”。

只是，他梦想中的机器国要来得更晚一些。

女子社会的幻想

建立在“国粹派”理论基础之上、依托丈夫的“江湖地位”的社会资本之上的何氏女权，一旦国粹被打破、地位不保，女子复权会为女子复仇的女权梦想，也只能是持续不到一年的黄粱一梦了。

文/任珏

何震其人

何震原名何班，字志剑，江苏仪征人，自幼读书诵诗，生卒年份大致为1886-1919。1903年嫁与刘师培为妻，1904年随夫赴上海，入爱国女校，改名何震。1907年她与丈夫东渡日本，同年，她在东京创办女子复权会及《天义报》，大张旗鼓抨击封建礼教，宣传女权思想，倡导“女界革命”。1919年刘师培逝世后，何震去向不详，有说其精神失常，有说曾见她在北大校外伏地痛哭，有说其削发为尼，法名小器，后不知下落，也有说其已去世。



图二十三：1908年刘师培（右四）、何震（右二）与柳亚子、苏曼殊等在上海合影。

何震在《女子宣布书》中提出女性需要争取的七项新的权益：一、实行一夫一妻制；二、实行父母姓并重；三、父母对儿子和女儿应一视同仁；四、男女受同样的教育，妇女应参与各种社会生活；五、夫妇不谐则告分离，在分离之前则双方均不能以任何形式与第三者结合，否则，就被视为违背第一条；六、“以初婚之男配初婚之女”；七、“废尽天下之娼寮，去尽天下之娼女，以扫荡淫风”。

她也将从父姓看作是封建礼教对女性压迫的最直接证据，因而将自己的署名改为：何殷震，示身先士卒地践行自己的女权理想。

何震的成名，一方面在日本自组女子复权会，创刊《天义报》，振聋发聩地批判封建文化，令当时各界颇为震惊。另一方面来自于“夫贵妻荣”的社会风气，其夫刘师培家学渊源深厚，又与蔡元培、柳亚子等当时的知识界名流交往密切，加之刘师培后期“变节”，何震更成为被众人指摘的祸及夫君的风流“女侦探”。

天义报与复权会

1907年6月10日，《天义报》在日本东京开始发行，何震作为“编辑兼发行人”指这本刊物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学者刘慧英指出，《天义报》在《发刊词》中说《天义》是一份旬报，实际上是一份半月刊，从1907年6月到1908年的3、4月间，《天义报》一共出版了19卷（参见刘慧英《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女界革命：何震与〈天义报〉》，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194-213页）。何震在《天义报启》中说到：



图二十四：《天义报》封面。

夫以男女阶级之严，行之数千载，今也一旦而破之，则凡破坏社会之方法，均可顺次而施行，天下岂有不破之阶级哉！夫居今日之世界，非尽破固有之阶级，不得使之反于公；居今日之中国，非男女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于真公。

《天义报》创刊发起人为：陆恢权、何震、徐亚尊、周怒涛和张旭，他们也是女子复权会的主要人物。其中与周怒涛、何震同时，或者先后时期的爱国女学生，在校期间曾秘密加入同盟会。（参见罗苏

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126页)

复权会的宗旨中，强调复权会的职责在于“力挽数千载重男轻女之风”，通过使用“以暴力强制男子”、“干涉受压抑之女子”两种办法，遵循不尊信政府、不服从男子、不为妾，未婚女子不“数女事一男”、初婚之女不得为“男子之继室”的规律争取女权，并宣称，加入女子复权会之后，凡婚后受到男子压制的女性，均可由该会出面为之复仇。将压迫女性的男人视为女性之敌，成为女子复权会的核心价值，也令何震及其《天义报》名震一时。

根据夏晓虹的研究，何震的复权会将“男女革命”中的“女界革命”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上，何震认为“破男女阶级”是打破现有阶级压迫的关键，而现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男性压迫女性的现实，又使“男女革命”的命题自然转化为“女界革命”。

刘慧英则认为，何震一方面强烈抨击风间礼教对女性的压迫，早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十多年便指出“礼教杀人”的真相，但其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另一方面，何震的“国粹派”的立场，使得她倾向于从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寻找“女界革命”的理论根源，例如在创刊号开篇以《女娲像并赞》将女娲作为何氏女权主义的源头，虽然也批判孔教吃人的现状，但何震的女权思想依然植根于传统文化的脉络之中，具有时代的局限性。

面对那些将女性解放付诸于“放浪形骸”的观点，何震依然持保守态度，尤其是对纵欲主义的“解放”和“自由”并不认同。不论是《天义》第一卷中的《震致留日女学生书》、第七卷中的《女子解放问题》，何震对下层女性和娼妓依然存在看法，她认为她们虽然肉体解放，但这种肉体的解放为女性的“至辱”、“至贱”。何震自身的女权主义观点的局限性，也为《天义报》后期的立场转变，埋下了隐患。

稍纵即逝的何氏女权乌托邦

当时的知识界并没有给予何震应有的社会地位，大多认为《天义》乃刘所做，最多也不过是夫妻二人合办。例如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指“君(按：指刘师培)创《天义报》”(《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宁武南氏1934)。杨天石也认为《天义报》的“实际创办人为何震的丈夫刘师培”(《天义报、衡报》，《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334)。柳亚子在《我和南社的关系》一文中提到刘师培与何震时，指出“他俩是当时有名的革命夫妻，曾在日本发刊《天义杂志》，提倡无政府主义，表面上主干是志剑(何震字)实际却是申叔在揽。(参见《南社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4页)



图二十五：刘师培肖像。

夏晓虹深入细读《天义》文本后认为，虽然在编辑的用心程度上，的确存在投入程度逐渐减弱的情况，但是亦很难断定天义并非何震主导。夏晓虹认为，从文本的阅读经验来看，在创刊初期，何震投入较大的精力，除了撰写文章之外，她也会在其他人的稿件后面以“震附记”按语形式出现，但越到后来，带有明显的何震个人风格的按语被“记者识”所取代。即使关涉到何震本人提出的“双姓”话题，最该出来回应的何震，也只在“记者识”中留下了“本社另有答函，载州（于）附录中（《东京五六居士来函》之“记者识”《天义》8-10卷合册，1907年10月的许诺，却到底没有下文，由此可见，其在编辑方面已不那么上心。

另外，夏晓虹认为美国学者沙培德（Peter Zarrow）1988年11月发表在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7卷4期上的题为《何震与中国无政府女权主义》，“尽管该文仍将《天义》作为何与刘师培、张继一起创办的刊物”，但依然认定其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女权主义杂志”，因此沙培德的文章对提升何震在《天义报》的作用最为有力。

除了何震自己在刊物投入上的力度减弱，刘师培等人所创办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也开始逐渐侵蚀女子复权会在《天义报》上的话语空间。刘慧英指出，当年与刘师培一起在东京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发起人张继于1908年初赴欧洲。他在1908年4月给东京友人的信中写到：“《天义》总需接续出版，因东方吾党之机关，除日人所刊《平民新闻》外，唯有此报。惟需将女子复仇诸语稍加改变，当以自由恋爱为最确当，且西方革命党舍英国外，亦鲜有男女之界者，惟以社会革命为主而已。”刘慧英认为，何震的女权主义倾向和女子复权会的宗旨引起了“这些以正统社会主义自居的男性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是革命阵营中的男权专制主义者的不满”。

刘慧英将何震与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视为两个不同的理论流派，两者在《天义报》中比重的此消彼长，看作是何震向丈夫妥协的结果。到了《天义报》的后期，更是将女性视角作为支持、应和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论述的工具。而学者焦霓、郭院林（2010）认为何震从

《天义报》第一期开始，甚至更早时期便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不应该将她视为女权主义者。柳亚子对《天义》的盛赞也是出于其“无政府主义”的属性，而非“女权主义”的属性，他说：“抑记者旷观女界之机关，以东京为盛，若《天义》，则创无政府主义；若《中国新女界杂志》，则创国家主义。二者宗旨颇不尽合，而《天义》尤翩然高举不可一世。”

何震发端于“国粹派”的女权思想，并没有在反抗封建礼教与接受无政府主义之间，为她的无政府女权主义找到一个合适的栖身之所。加之崇尚“夫妻之道”的伦理命题，随着刘师培等人逐渐将《天义报》变成无政府主义的推广渠道，何震的女权主义声音也慢慢被挤压、消失。

直至刘师培“叛变”新文化运动，何震与汪公权的艳情故事除了从一些当时男性精英分子的论述中，很难再找到其他的史料佐证，是否真有其事已很难考证，但从一众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的文字中，不难看到他们对何震的负面态度。1908年初，刘师培与章太炎关系恶化，章氏从刘宅搬回民报社，据说是因为章太炎无意中发现了汪公权与何震私通的秘密，转告刘师培后，刘师培怒及章太炎，遂而两人交恶。就连赞扬过《天义报》的柳亚子在1928年的《曼殊的思想问题》一文中，更是将何震说成是“女戏子”，厌恶之情尤甚。



图二十六：章太炎

蔡元培的《刘君申叔事略》一文中，指何震受小人影响，“劫持君为端方用”，陶成章则指刘师培“内惧艳妻”，何震与汪公权成为侦探一流，怂恿刘师培进入官场。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更直指“何汪不独从此入于侦探一流，且形同夫妇，宣言公夫公妻不讳”，指摘何震与汪公权有染。实际上，根据刘慧英的考证，何震在《天义报》上并没有公开提倡过“性解放”或“公夫公妻”。

从最初的不认可她对《天义》的刊物主导权、到后期夺取《天义》的女权阵地，再到丈夫在政治上变节之后，受到的各种基于性别政治的艳情故事的打压，何震的乌托邦女权主义在文化史上尚未正式扶正，便已随着丈夫政治地位的一落千丈而瞬间崩塌。建立在“国粹派”理论基础之上、依托丈夫的“江湖地位”的社会资本之上的何氏女权，一旦国粹被打破、地位不保，女子复权会为女子复仇的女权梦想，也只能是持续不到一年的黄粱一梦了。

参考文献：

焦霓、郭院林，2010，《〈天义报〉宗旨与刘师培、何震的妇女解放论》，载《云梦学刊》7月刊，36-41页。

夏晓虹，《何震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论》，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期，311-350页。

刘慧英，《从女权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何震的隐现与〈天义报〉的变迁》，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194-213页。

汪东，《同盟会和《民报》片断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30页。

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284-285页。

阎锡山：山西王制造的“公道社会”

“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

文/李梓

1917年，阎锡山以督军兼省长，赶跑了孙发绪，开始了他军政一体的山西王的生涯。从孙发绪这位垫脚石式的人物那里，阎锡山继承了一样东西，这就是被认为“开创了中国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地方自治的先河”的翟城村自治。



图二十七：上世纪初，阎锡山与孙中山合影。

民国时，中国有三个地方的村治探索深为称道，分别是1914-1916年孙发绪主持的河北定县翟城村自治、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的山东邹平村治探索，以及30年代由民国政府一手推动的江宁实验。

1914年，上任不久的孙发绪见翟城村教育发达，提出仿效日本模范村，创办中国的自治模范村。翟城村治的顺利推动，与乡贤米迪刚的名字不可分割，同时也得到政府拨款300元支持。同年9月，翟城村自治公所落成。10月，翟城村村民议举的村长、村佐、区长等就职，自治公所正式成立。11月，孙发绪将该村标为模范村，呈直隶省巡按使公署和教育部、内务部立案，并被北京政府内务部称为“直隶全省乡村自治之模范”。

从翟城村治的试验，阎锡山看到了一个变革中国社会的新思路——乡村自治。

村治的萌芽

1917年的阎锡山，在世人眼中，仅仅是一个靠替考作弊考进军校，靠投机骤得高位的旧式军阀。

但阎锡山很快用两条路稳固了他的统治。于武，1917年，借助反对张勋复辟的东风，他很快将军队扩充到2万人规模，并支持段祺瑞上台，初步建立起了山西军阀势力的体系。于文，他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统管山西“六政三事”，所谓“六政”是指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三事”指：种棉、造林、畜牧。1918年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

此时的他，为展现其思想的新潮与革命性，在家乡颇做了几件石破天惊的“革命行动”：其一，将庙里的神像搬走，改做学堂，其实只是搬掉了偏殿中的两座神像，主殿根本没动；其二，成立剪刀队，将村绅官吏骗到一处，强行剪发；其三，要求其亲戚带头开展放足。

几件事情一做，家乡父老群忿难平，河边村几个武师，带着徒弟一呼百应，聚集两千多人，包围阎家，将老太爷揪出来游街。后阎锡山带兵弹压，将带头的人砍头，这件事情轰动一时。

阎锡山统治山西的岁月，持续了整个民国时期，中间历经了北伐、中原大战、蒋介石“削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大时代，成为民国军阀中独一无二的不倒翁，“对于山西人来讲，阎锡山就是民国”。后代研究者多认为，这应归功于他在上世纪20年代广泛推进村治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7年10月，山西省署颁布《各县村制简章》，进行户口调查，编行村制，划定村界。具体方法是，一村村民300户者设村长1人，村副1人。多于300户者酌增村副，至多不得超过4人，少于三百户者只设村长1人。后来在编村的基础上又设立了闾和邻：每5家为一邻，设邻长一名；每25家为一闾，设闾长一名，闾长在村长副之下，受其指挥。至此，建立了村—闾—邻—农户四级的村级组织管理体系。村制的推行，使得山西建立了上下贯通、应用自如的行政网络，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皇权不下县”的施政局限。

1918年后，相邻的河北、山东等地乡民纷纷涌入山西定居，让山西人口有了明显的增长。但“官办村政”建立起来后，阎锡山却觉得效果很不理想，具体体现在“六政三事”的推广阻力上，社会风气之保守与经济缓慢，让阎锡山产生了“将政治放在民间”的念头。他说：“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

老家试验场

河边村隶属于山西五台县，是阎锡山的老家，其村位于五台山西麓，滹沱河南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在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三十多年间，不停地往河边村投资，使这样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拥有了专用铁

路、公路、工厂、学校等，以满足阎锡山在此停驻时的办公需要，以及作为各项社会改革的试验地。



图二十八：阎家老宅。

早在1917年，河边村便进行了村制建设，有了村长，村副（四人）、闾长，书记（会计）一人，村警数人，1922年又加选邻长。整治对象包括贩毒者、吸毒者、窝娼者、聚毒者、盗窃者、斗殴者、游手好闲者、忤逆不孝者、家庭暴力者以及失学儿童等10种人。整治手段是设在村公所里的公堂和刑具。

除了完善村治外，阎锡山还出资修建了太原到河边村的公路，修建石桥，兴修水利，在当地提倡栽种棉花、葡萄等经济作物，修建女子学校，并将其五妹送到改学堂读书以提高女童入学率等等。

到1921年，河边村的教育体制已经形成了从初小到中学的全覆盖，这些教育设施的投入完全是阎锡山自己出的钱，学校除校舍外，还有完善的操场、书籍、仪器设备。

教育体系完善后，阎锡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又逐步完善了其他社会设施，包括慈幼院、劝业厂、国术馆、医院等，逐步形成了阎锡山心目中理想的村制体系。

阎锡山对于在家乡推进其施政改革，可谓倾尽心力：推广苹果与棉花种植时，他家里育有十几亩的幼苗，乡邻可以随意去拔了引种；推广放足运动时，他从自己的亲戚家入手；推广女童入学时，他让堂妹阎慧卿、姨妹阎竹梅入学示范。他所兴建的川至中学，除免收学费外，还另发制服皮鞋给学生。此外，阎锡山还有一习惯，进入河边村后，便改穿便装，以拉近与村邻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他还在河边村成立娶妻助进会，帮助村里的光棍找老婆。

河边村的制度范本

河边村村长李复天，起草有《河边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收录在《五台县河边村·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中，其村中的常设自治组织共十个：

- 1、村民大会或家长会议。
- 2、闾邻居民会议。
- 3、闾邻长会议。
- 4、村公所。

- 5、调解委员会。
- 6、考评委员会。
- 7、监察委员会。
- 8、保卫团及公安团。
- 9、经济建设董事会。
- 10、各项合作组织。

其中规定：“村政权属于全体村民，由村民大会行使，在村民大会不易集合期间，暂由家长会议代之。”

选举办法为：“村民每五家应合议推选邻长一人、候补邻长一人。凡常住村中之识字男子，年在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热心公益者，皆得当选为邻长。每五邻应合议推选闾长一人，候补闾长一人。凡常住村中之识字男子，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热心公益者，皆得当选为闾长。每六闾应合议推选村副一人，候补村副一人。凡常住村中之识字男子，年在三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热心公益者，皆得当选为村副。选举单位闾邻家等之配组，由村公所预定之。”



图二十九：阎家老宅院内一角。

其监督机制为：“谁来制约村民大会的权力呢？是村监察委员会。每五闾或四闾应合议推选监察委员一人，候补监察委员一人。凡常住村中之士绅，年高望重能主持公道者，皆得当选为监察委员。邻长闾长村副监察委员之任期，均为一年，并得连选连任。一闾之事，由全闾居民会议解决。一邻之事，由全邻居民会议解决，但不得与村务会议之决议案抵触。监察委员会设委员五人，掌管纠察弹劾审计事项。按闾数平均推选公正士绅组织，该五委员互推一人为委员长，召集开会之责，并为开会时之主席。监察委员会的职权是：监察村公务人员溺职等行为；初审村预决算；审计村财务事项；监察委员会每月开会一次，如有特别事故，得开临时会。村财政收支及事务执行有不正当

时，监察委员应提出弹劾于村民大会。监察委员有探询村公所所处置之一切事件经过及列席村公所会议之权。监察委员会检举村长副、及各公务人员违法失职情事时，得自行召集村民大会。监察委员会在村民大会未组织前，对家长会议负责，失职时亦由家长会议依法定程序罢免之。请特别注意这一条：现任村公务人员不得当选为监察委员。”

关于村政之实施，由村长召集闾长会议，由闾长召集邻长会议，或径由村长召集闾邻长行之。村公所是村民大会的行政机关，由村长一人、村副四人组织之，掌握全村政权。在实行自治的初期“村长暂由外聘，以资指导”。

以当时的社会条件，这一套村治制度堪称完善，明确地规定将村长的选任权让渡给一般村民，并对选举、权利、监督、废止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阎锡山回乡后，李复天将这个计划案献给阎锡山审阅，阎锡山读后大加赞叹，责令将河边村计划案作为榜样，印发各村，以资各自编定计划案之参考，“所望全省各村，分别各就本村实况，就应兴应革，编拟十年建设计划，并脚踏实地，照所定计划确实办理，将来村建设必能有成也”。

1922年后，河边村的村治制度被当作范本，在山西全境推广。

进山会议与公道社会的畅想

民国十年（1921年），阎锡山对治下各地进行高调出巡，检阅各地“六政三事”的推广情况，并为村治改革造势。

同年6月21日，他主持发起“进山会议”，广泛邀请全国各地的学者、当地军政要人、商人、乡绅等参加，第一次开会时有25人，以后以每周两次的频率，逐步增加到上百人。

进山会议前，在俄经商的山西商人被列宁全部驱逐，晋商返回太原后，向阎锡山反映苏俄社会如“洪水猛兽”，所以，阎锡山在会议中，多次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变革和实现民主，预先消灭马列主义在中国蔓延的土壤。



图三十：阎锡山主政时期发行的货币。

进山会议，以每周两次的频率，一直开展到1923年10月，讨论“中国最佳的社会形态究竟是什么”，会议规模，从最初的二三十人到五百多人不等，形成的研究成果，包涵政治、社会、人生与家庭、政治制度等方面，达两百余万字。最后得出的结论，如对于家庭的结论：“人是有我见的”，故共同生活以不生“窒碍”、维持和睦为界限；男女应固定一夫一妻制。如对于政治的定义：政治在于“维持生活已有之幸福，增进生活未来之幸福”。“政治为人类共同组织，以求真富真强真文明也”。

在进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共产主义正在山西生根发芽，在高君宇的指导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5月1日秘密成立，并印发了《共产党宣言》3000册。阎试图在各种主义中找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虽然他最终也未能真正实现。在《进山会议录》的序言中，阎锡山说：“余以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来说，应产生一个适中的制度。”阎锡山认为，共产主义之弊则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强人作圣贤，又强人作禽兽”。“违背人性，反乎人情，不适合生产，不利于人生”。唯有“公平制度”，既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又能预防共产主义之流传。这就是阎锡山的公道主义的来源。

进山会议吸引了民国诸多的学者前往山西，甚至还有外国学者和记者。其间，梁漱溟曾多次访问太原，也加入了这个讨论之中，1922年，阎锡山专门向梁漱溟请教如何编制一个能实现平等民主的制度，梁漱溟认为“为时过早”。而阎锡山此时已经印发了推进村治的文件，选拔了干部，准备大干一场。

在《督军兼省长阎告语各县街村长副闾邻长及人民举办村民会议文》中说：有人说同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甚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或是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远者何贵乎？

在讨论中，阎锡山对山西村治的强力推进，也启发了梁漱溟，他赞同了阎锡山的观点，即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并组织了

持有同样见解的华北绅士，组成颇有影响力的“村治派”。

有一千元资产的才能选村长

1922年6月20日，“六政”考核处印发了阎锡山亲拟的改进村制办法，并在山西各地选派人员督办村制改革。

小册子上这样写道：“村治是什么，就是把村子编成个活体，有管事的人，有管事的权，县里区里管不到的事，应该交村办，村里能自了的事，不必到区里县里办。可见村治乃是自治根基、政治起点。要想教人民们安生，非从村治着手不可。”



图三十一：阎锡山题词。

对阎锡山和山西省政府来说，推行乡村自治有几重重要意义：其一，稳定乡村，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其二，政府不用给村闾办公经费，而能实现政务到达；其三，可以减少恶吏对乡村的盘剥，促进各项新政的实施。

1922年春，这套施行办法先在阳曲、榆次、太原三县及省城市区试办，6月又推广到平定、寿阳、太谷、忻县、定襄等五县。1922年9月，阎锡山在省长公署内增设村政处，同时，还将全省划分为几个区，每区大约管辖八九个县，在考核股下，设置区主任，三个月轮换一次。各县按村庄的距离远近以及人口多寡分为若干小段，设小段主

任，由区长、承政员、承审员、主任员、实业技士、宣讲员、视察员、警佐、巡官等兼任。小段主任可以直接管到村、闾、邻，一直到户。至此推广到全省范围，通过召开会议，村民也得到了一些民主体验，一些不识字的村民会请识字的村民代为投票。

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由省级政府推动的乡村自治改革，其制度设计上，具有很大的诚意，但也有着明显的相互矛盾。

阎锡山曾说，推进村治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官治和绅治”，但他拟定的这套制度又规定：村长候选人要有1000银元的不动产，村副候选人要有500银元的不动产，理由是有恒产的村长才能真正为当地负责。村长虽然是村民选出来的，为了慎重，最后却要拿到县长那里去批。乡村民主最后还是集中到了政府那里。

为了利于新政推广，阎锡山指示编撰有《人民须知》、《家庭须知》、《村长副须知》，印发到每家每户，又印发《河边村暂行自治公约》、《河边村暂行村禁约》等，张贴在村里的公共场所。为避免文盲不了解，又雇佣教师每星期利用一个晚上，为商店的伙计和村里的农民讲解，又让小学生排练活报剧，到各个堡子宣传演出。梁漱溟曾面呈阎锡山，对山西城乡到处刷满了道德标语表示不满。

最早在河北定县倡导村制的乡绅米迪刚认为，山西村治纯“系自上而下，凡属村民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米迪刚的看法有例为证，1932年，阎与其父为无房的农民修了5个居民区，解决了270多户居民的住房问题，但不少人家怕惹是非，真正搬进去的并不多。

模范省的诞生

改进村制的推行，使得山西在两个方面发生了立竿见影的变化，其一为匪患断绝，其二为义务教育普及，此外，对于推进“六政”、移风易俗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图三十二：阎家老宅内使用过的物品。

在“人民须知”的宣传册中，这样写道：“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1925年，陶行知在实地考察之后，评价山西的义务教育：“我们不能不佩服山西人民对于义务教育之忠实努力，自从民国七年开始试办，到了现在山西省100学龄儿童中已有70多人在国民小学里做学生

了。山西之下的第二个省份（江苏）只有20%多。可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1928年，山西省政府检验对推进村制工作的总结，认为已经初步普及，并在移风易俗、推动经济、普及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教育为例，山西男童普及4年义务教育的比例为80%，女童为40%。同年，阎锡山上书南京政府，呈报7年来工作经验及成就，希望南京政府以山西经验为范本向全国推广。

与此同时，民国其他正在进行乡村自治实验的改革家，对阎锡山的推进村制工作并不认可，以梁漱溟为例，他于1930年考察山西村治后，得出了“有其名，无其实”的评价。

除山西以外，民国再无第二省能如此大规模地普及倡导村治。梁漱溟从1928年开始在山东推进乡村试验，因为山东政局的不稳定而中途夭折，南京政府虽然于1932年以后开始大规模地倡导村治，并树立了江宁实验的样本，但为应对随之而来的抗战大规模动员，又重新启动了保甲制度，中国结束封建社会后全国普及村治的梦想遂化为泡影。

种种试验在山西

除村级自治以外，阎氏还尝试过推广家族自治，1931年，阎锡山亲编《阎氏家族自治规章》，分十一章，二十三节。章节条款繁多，有族训、族规、组织、族祭、教育、族产等，应有尽有。



图三十三：阎锡山军装照。

此外，为了对抗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对其冲击，阎锡山还曾在1935年试验过土地公有制度，“我们可以搞一套农业社会主义，堵住农民奔向共产党的去路”。

阎锡山设计了试图实现以村为单位的“公有私种”，“土地村公有”办法宣布后，曾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境外舆论界支持者少反对者多。“当时我即选择了3个县的7个村，作过‘真调查，假分配’的实验，惟因人民数千年私有观念太深，干部训练宣传等技术亦不成熟，且因收公在前分配在后，故75%左右的人民均表不快，遂即中止实行”。

当时有叶民的《土地村公有方案的实际意义》及《谈谈‘土地村公有’》等文章，中有：“村公所是地主阶级的御用机关”，‘地主富农就是村公所，村公所就是地主富农’，‘村公所的公田在实际上——定成为地主豪绅的私产’”等尖锐批评。

将军村长的西北梦

作为军人，他希望通过移民实边巩固国防；他更想在边荒之区开拓出一个“合理生活”的新社会。但随着战火弥漫全国，他的理想“建立二万个新村”成为这片土地上永远的遗梦。

文/杨东晓

1931年的后套平原上，四个骑骆驼的喇嘛，一路说着蒙语从东蒙古而来，并要往后套去。晚上，他们和退伍将军段绳武住进了扒子扑隆的同一个客栈。段绳武好奇地向牵骆驼的人打听，原来他们当中三个是日本人，一个是中国人。此时，是九一八前夕，在这个每方里只有两三个人的广袤区域，段绳武听说还常有乔装的日本人在活动。



图三十四：段绳武和夫人在五原。

与四个“喇嘛”不期而遇这件事，使军人出身的段绳武坚定了他在中国西北建新村的信念，“如果新村多了，就成了活的长城，就可以保卫边疆，开发边疆”。

想在西北进行移垦，是段绳武深思后的结果。

段绳武是孙传芳的嫡系，后被蒋介石收编为47师师长。在等待收编的日子里，他的部队驻在泰安，那年黄河泛滥，饥民遍野。他曾希望蒋介石将他派往绥远去军垦，但这一要求并未获准。段绳武的二女儿曾回忆说，听家族老人讲，段绳武原是直系的嫡系，蒋介石可能担心他自立王国或者拥兵边疆生出事端。

1929年，在直系打了18年仗的段绳武已生厌战情绪。这年他退伍后回到北平，从西直门站一下火车，就看到一位被众人从房梁上救下来的自杀者，这是一位刚刚退伍的士兵。这位年轻人向他哭诉，自己拿着退伍时发的生活费到银行兑换，银行说，这家发钞行已经倒闭了，年轻人顿觉没了生存的希望，遂生轻生之念。

如何让人手中的钱在动荡时期能够持续保障生活，段绳武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段绳武在北平置有房产，但他并不想当寓公度过余生，厌战退伍时，正值国内各种新生事物蓬勃发展：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搞起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有乡村建设运动、陶行知在南京办了晓庄师范。以开发西北为号召的农垦社团约有二十来个。他开始琢磨如何赶上这种民间新兴的大势，这也是他在泰山时最初的想法。

段绳武辞官的第二年，即1931年春，他请了学农的陈峻岩，和他一同来到西北。他们看到沿途几十里路才有一户草房人家。地广人稀、间谍出没，使这位军人出身的投资者，决定投身于边疆地区的农垦事业。

当时最著名的就是豳风社垦务公司，豳风社垦务公司也是当时发展最好、坚持时间最长的一家。还有一些有名的农垦企业如山东移垦社、中华垦殖公司、湖南移垦社等，但大都没有存在多长时间，段绳武专门访问了每个失败的团体，得出的结论是，太急于功利或用人不当。他探访到这样一些投资失败的故事：

董事会把农垦当成短期内能赚钱的项目，住在大城市的董事们只管出钱赢收，雇一个不下地的经理，经理再把农事转包给当地的人，

当地管事的才不管民国已颁布了禁种大烟的法令，还是偷偷地种大烟，而上报项目如经理所望却是粮食。当一位经理终于下决心到农场去看看粮食长势时，当地管事的知道瞒不住了，挖决河道淹没大烟田，再上报经理，河堤决口，路被冲断了。这种的农垦只能草草收兵。

还有一个管事的当地人，为了得到更多好处，先是拿自己的亲生女儿“招待”经理，女儿出嫁后，又拿儿媳妇“招待”经理。结果儿媳妇不能使经理满意，他竟休了儿媳，专门给经理选了使他“如意”的姑娘。

段绳武在了解这些蹊跷后，看到了农垦事业若能坚持下去，就一定得自己把根扎到农村，自己一家人先“移民”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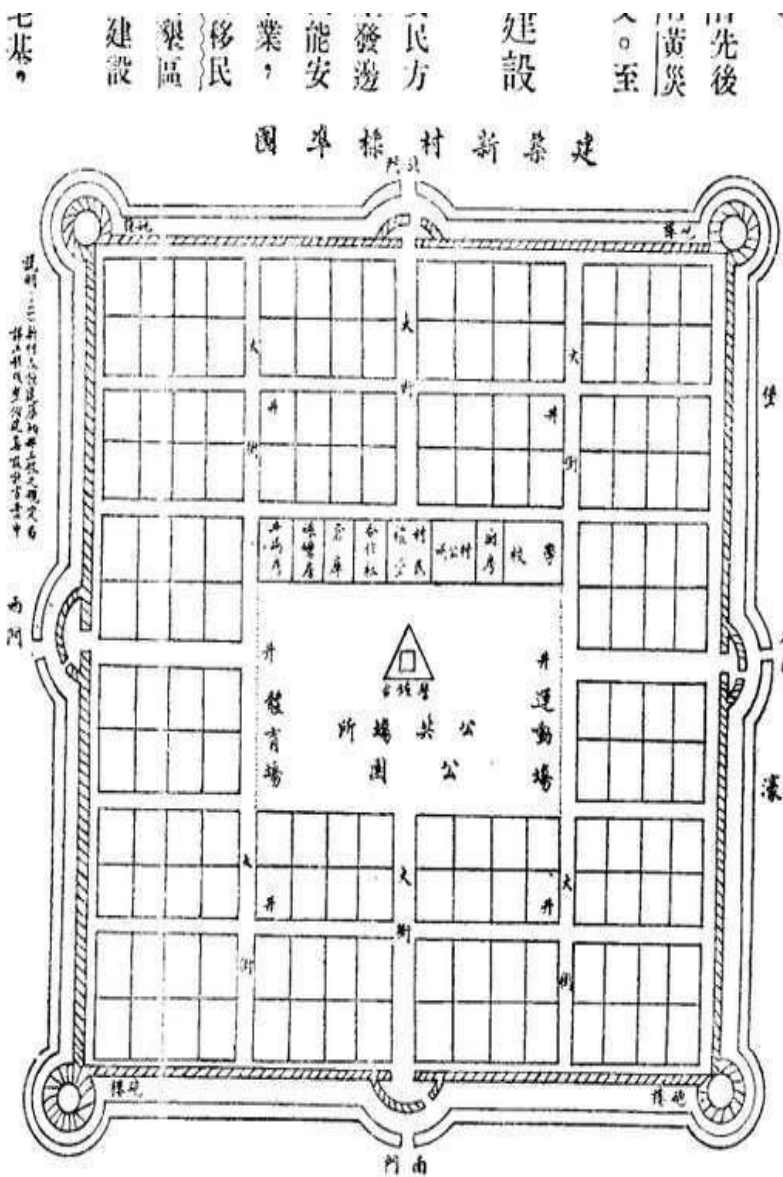
将军村长

1931年年初，还有二十几天就要过春节了，段绳武夫妇带着6个孩子，告别了热闹的北平城。此后他们将与荒原和盐碱地为伴，与河北、河南两省的灾民做乡亲。北平城里叮叮咣咣的电车、汽车、人力车以及车上喇叭、铃铛，百货商场喧闹的减价广告、糖果店的各色点心都将成为一种城市记忆被抛在身后。

从西直门火车站踏上平包通车的，除了年底到西部收账的商人，就是过年回家的绥西人。只有头等车里的段绳武一家，是举家往西北移民的。他两万七千多块钱卖掉了早年在北平城里买的一座王府，又卖了老家的田产，将换得的十几万大洋全都投到了移民事业中去。

五原，于城西
。計劃中分建
鄉，命名「明

9. 新村建築，應按新村建設標準圖，分三年施行完
成之。
新村建築標準圖，根據原書，轉錄如下：



此外並規定以百戶為標準單位新村，其經費總計如下表：

图三十五：侯仁之手绘河北新村地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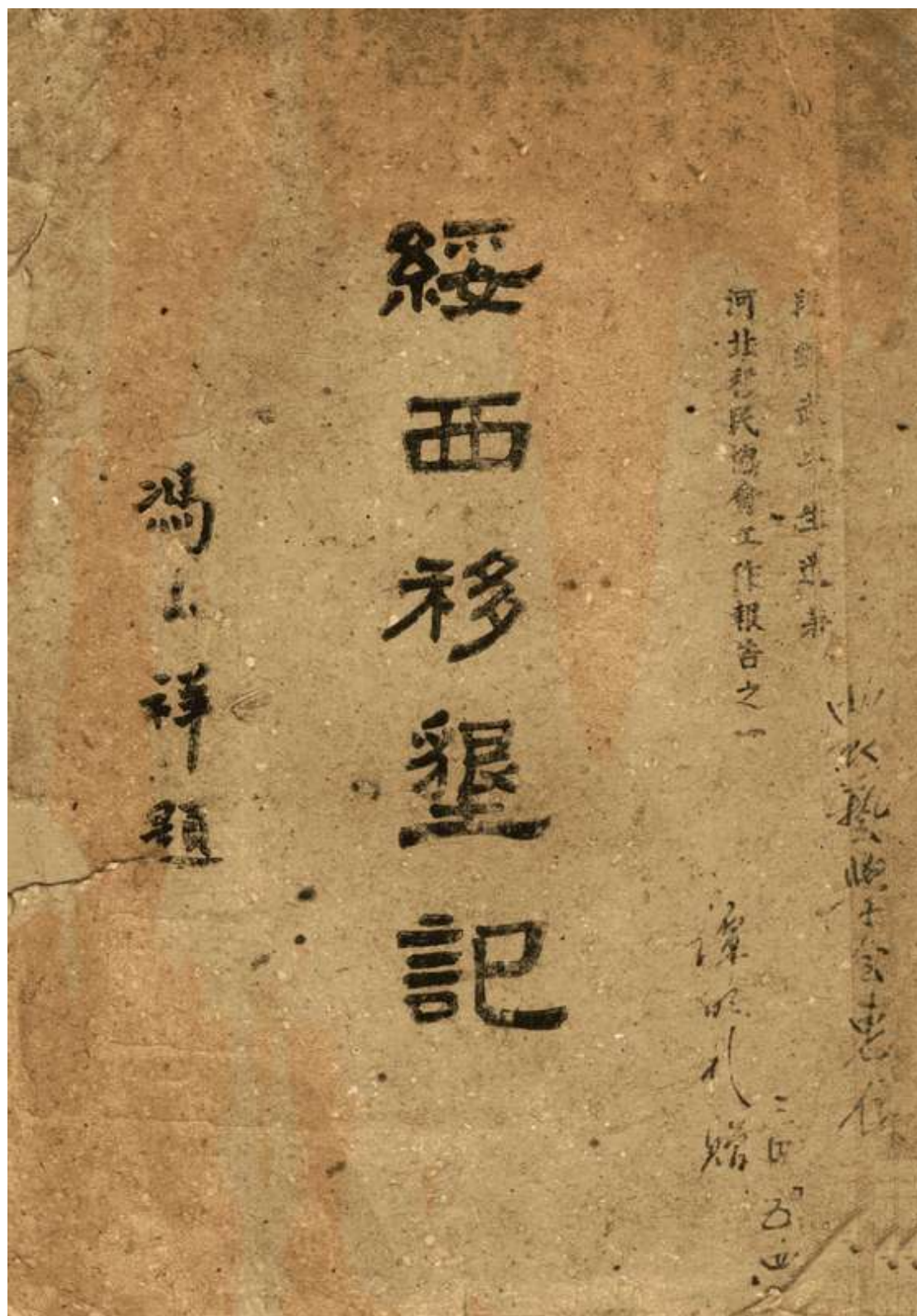
绥西移垦种什么？初到包头时，大家吃着进口的仰光米和西贡米，段绳武总觉得惭愧，认为这么辽阔的土地上应该供应本国人吃中国米。1932年冬，他提出互助社在包头西南十多里的黄草洼荒地里搞试验田，这样可以为以后的移民打基础。在这种每亩20元钱的土地上，他们试种了二十多顷水稻。试种品种为小站稻和北海稻。1933年还专门请了一位金姓的韩国人主持试验，因为他有高纬度地区种植水稻的丰富经验。这次试验在当年就获得了好收成。绥远从此开始种

稻，绥远省政府给段绳武颁奖：“奖给河北新村村长段绳武。”段绳武觉得这张奖状，比当年接到委任状还光荣。

招募移民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开始了，1933年，从定县移来的30户农民刚刚来到包头，就有一半变卦了。他们发现绥西的土地状况比家乡的地不知道差了多少，要求段绳武给他们找工作。他们在移民之前听说每户可分到80亩地，按照他们家乡定县的地价，每亩150元，80亩就是一个富农了。没想到这里80亩地每亩的地价是16块钱。几乎是定县的十分之一，所以想一夜发财的，又拿着段绳武许下的200元移民补助，当夜离去了。

段绳武的第一次绥西移民工程，以损失6000元而告终。

第一次移民失败赔钱，并没有影响段绳武继续向西北移垦的决心。考虑到绥西偏远，人力稀少，他定下一个移民新村进驻100户至200户之间这样一个数字。户数太少，就无法举行公共事业；户数多过，耕地面积相应增加，耕地离村子太远，工作上不便利。于是一村100户成为新村的标准单位，一个新村一年的建设预算也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来。



图三十六：《绥西移垦记》封面。

进行第二次移民时，段绳武吸取前次的教训，定下了几个条件：在本村有保人的精壮男丁年龄在24~40岁、体质强壮无残疾无嗜好、有耕种经验与能力，勤俭诚实而又坚决志愿赴西北移垦，最后以携带家眷为原则，其主妇须得有纺花织布技能。新村在段绳武的设想中，是一个男耕女织且共同生产的社会。

段绳武还要求做移民工作的人员，向灾民们宣传他的移垦的概念，是帮助穷人吃饭谋生，不是放赈；垦荒是一种吃力的工作，肯工作才有饭吃，好好工作才会有好饭吃，绝没有行险侥幸发洋财的机会；检测应征者必须能举得起百斤的米袋子；在软性条件上，还要考查移民者的性格，一对一地与应征者谈话；跟妇女谈话最好由妇女担任，至少应有一个女性陪着谈话。

移民西北

老友谷九峰、张清廉等人对段绳武的移垦事业不仅出钱而且出面到处宣讲，河北省民政厅厅长魏镜如很支持这种对河北水灾地区和垦区两利的事业。魏镜如视察灾区时宣布了“河北移民协会”的移民办法，并安排了区长、村长们向灾民们详细介绍移民条件和办法。

但是这些具体办事人员只是照本宣科，并没有认真地宣传移民办法，他们简单地用有吃有钱来鼓动灾民们：“省政府办理移民，到绥远去开荒，有人管吃管穿，有地种，一家还给400块钱。多么便宜的事啊！”

听说这种有吃有住有地有钱的好事，这一下子就报了760多户。吸取了第一次招募失败的教训，段绳武顶着七月的太阳蹚着灾后还没下降的齐腰深的水，亲自到每户报名者家中复核审查。出乎他的意料，这些灾民要么体格不强壮，要么就是没有种地经验，或是根本没有垦荒兴趣。合格的人家只有7户。所有来报名的人都说，只听说每家给400块钱，当移民就能有吃穿有钱花。

这时，又有人造谣说，他是来招兵的。段绳武问灾民：“你们见过招兵还非叫带上老婆孩子的吗？”

段绳武亲自到灾区寻访，一户一户地谈话、测体能，征到100户移民。

1934年10月19日，100户移民拖家带口，共有312人来到道口火车站，他们将转三次火车，才能到达那令人充满向往和神秘的绥西。

就在他们站在月台上候车时，又一群拖家带口的灾民团团围住段绳武，要求他把他们全部带走。这是一群河南滑县的灾民，听说河北移民计划后，要求加入到垦荒的队伍中。

这使段绳武一下子处在两难之中，一批快饿死的人眼巴巴地看着他，希望能给一条出路，而他的资金原是为了解决河北省灾民的出路。这位武将有一颗仁慈之心，能从这件事上得到证明，他在致电河北移民协会征询意见的同时，其实已经咬了咬牙，私自答应了这批河南滑县灾民的要求，至少他会在绥远为他们找工作。

河北移民协会发来了令人欣慰的电报，一行120户，坐上道清线，又换平汉路，再转平绥段，驶往他们未知的命运。

河北村在1934年11月1日移民到达包头之后，就成立了。她是河北移民协会第一个移民村的名字。

段绳武从一个定居邢台的蒙古人那里买了一万多亩碱地，此地距包头只有5华里，交通还算方便。

一望无边的白霜般的东西覆盖在西北大地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盐碱。河北村选地离包头不远，交通便利，地价便宜，为了避免水灾，段绳武特地选了这块地势高的地方。对待碱地也有了办法，当地农民告诉段绳武，用夏季黄河里的伏水来浇地，可以借黄河水中的大量泥沙，盖住盐碱。浇一次水能在田里淤积五六寸至1尺左右的黄土层，用以改良土质。

武训小学

新村的生活是集体制的生活，大家共同劳动，先是盖简易房过了冬，1935年4月开春，村民们全体出动，盖起了每户的坚固住宅、公共用房。村公所，大礼堂，学校磨房共48间。

学校叫武训小学，武训是段绳武从小就景仰的人物。平时给学生上课用的，就是村里开大会用的大礼堂。河北村的教育方针，学以致用，所以，课本也是自编教材。从农业生活入手，周围的垦殖环境就是为学校而设，以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文化、农业和数字计算为教材内容，以体力劳动代替运动课。



图三十七：段绳武在五原建的“血肉长城”。

段绳武认为当时的通行教材脱离实际太远，为此专门延请赵伯庸、王泽民、杨莆、姬子平等人组成教育委员会，按照村里实际情况自编教材，试验他心中的教育制度。他对聘请来的老师说，在河北新村里当先生，要在课堂内教有字的书，在课堂外教无字的书，把有字的死书跟无字的活书结合在一起教。村里的一切工作都能当成书来教，他的教育原则是：一切生活都是书。他的目的就是力求把死书活书打成一片。

段绳武这种教育原则和教材要求下的武训小学，教学方法自然超出常规学校而具有独家特色，学生除学习文化，还有组织地进行大量的家庭及田野劳作。每天早餐过后，全村儿童聚到学校之前，教员告诉他们一日的工作安排。劳作课程是室内授课的两倍：学生用三分之二的时间从事家事训练和农事训练，学生割草，打草鞋，修儿童马路。等到日暮之后，又由教员检查他们一日的工作。

要求从小学生开始就过集体生活，是因为段绳武发现，他之前的不成功之处，在于没能纠正移民中泛滥的小农经验思想，每家自顾自，在允许自留地、打草卖钱归己的政策下，移民都在忙自己发家致富，缺乏集团作战的觉悟和行动，也缺乏相互之间的协调和照应。

影响力扩大到全国

河北村生产有序之后，段绳武开始建设另外四个新村，较之其他在农村建立垦殖基地的社轩，他有独特的优势——一批掌握军政大权的朋友，这是他新农村实践的社会资源。

对于曾经力挺段绳武新村实践的几位直系将领和政界老友，段绳武在建立新村后，都将他们的字镌刻在村名上。明轩村用的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字；仰之村取自河北省省长冯治安的字；幼青村则从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名号中来。



图三十八：1937年7月18日，河北五原县乡仰之村新村朝会，段绳武将军对持械儿童团及抗日青年团训话，激发抗日斗志。

1936年7月22日，侯仁之教授随禹贡学会河套水利调查团到包头去，顺便访问了五原的新村。侯仁之在田垄上找到段绳武，听了他的远大目标，再加上十天前他来访不晤时已先行在村子里各处遍访，回京后写下了对这个村庄的调查和感受《河北新村访问记》，介绍河北新村兴建始末，村务、政务、财务全部涉及并公开，并附以手绘新村

地形图，刊载于《禹贡》1936年第6卷第5期(后套水利调查专号)上。同期专号上还刊发了段绳武的论文《开发后套的商榷》。

不仅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专业文章，段绳武还曾在张季鸾的《大公报》星期论文栏中发文《西北移垦与国防之关系》，称：我国边地广阔，人烟稀少，帝国主义者最垂涎而且首先掠夺的就是这些地方，西北一带，每方里居民平均不过二三人，内地每方里七八十人，这差数太大了。光有土地，没有人民，当然不会有生产，不会有建设，更不会有国防了。移垦是充实边防的最好办法。这样，不驻一个兵，但人人是兵。不带一颗粮而随地有粮。

昔日武将，他的思想、文采与社会创造能力在此期间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许多个人、团体到西北来考察，段绳武也经常应邀到高等学府讲学，宣讲他的移垦实边的观念和建设管理经验，一时间全国各界知名人士都到他的新村来调查参观。他的关于移民垦殖西北，以图救国救民的理想引起广泛认同。

集团婚礼

尽管段绳武在做移民宣传时，强调男子移民要带会纺织的女眷，但是新村里仍是男多女少。1932年和1937年，他两次跑回北平去挑选女青年，并带着北平市市长充作娘家人的几十位姑娘，来到村里，举行热烈的集体结婚仪式。

1932年，段绳武到北平找社会团体介绍了10位姑娘，在河北新村举办了集体婚礼。这是新村的第一场集体婚礼。

1937年6月，段绳武再次回北平为新村的男村民们寻找结婚对象，这一次他是为五原仰之村的村民相亲。他带着妻子和当时只有8岁的二女儿段至诚回到北平。段至诚记得父亲先到北平救济院去，能到这里宣讲他的新村以及替村民相亲，是因为段绳武有位好朋友秦德纯是北

平市市长。秦德纯从一开始就支持段绳武的移垦事业，他愿意亲自出面“嫁女”到五原。

段绳武和夫人一同到救济院和姑娘们见面，跟她们讲如果想嫁到绥远去，就要能吃得起苦，那里气候不如北京，但是有广阔的土地和强壮忠厚的小伙子，她们可以找到好人家，会有自己独立的家庭，而且新房都准备好了，村里统一盖的新房，每家还能分100亩地。勤劳、参加集体劳动就能创造出自己的新生活。



图三十九：1937年7月18日，河北乡仰之村中的优秀分子与北京女知识青年举行集团婚礼，由段绳武将军主婚。

在让大家报名之前，段绳武给姑娘们几天考虑时间，让她们先想好了再报名。

几天后，想离开救济院独立门户的姑娘们就开始报名，段绳武夫妇也按他们的标准开始挑选，这一次选了20位姑娘。她们都是吃过苦的女孩，有不堪虐待跑出来的使女、有街头流浪过的姑娘，还有从良的妓女。

她们来到仰之村后，大家按她们年龄大小，叫做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段至诚曾回忆起大人们挑选新娘时说过：“我母亲她们都说老四最漂亮，老八皮肤黑一些，后来随我父母一起到五原考察的‘西北考察团’成员们，也公认老四最漂亮。给她取个绰号叫新娘‘皇后’，她的本名叫吴爱德。我还小，不过我也觉得她最漂亮。”

这些姑娘在北平救济院时，接受的是半工半读的教育。她们有文化基础，然而掌握得更多更熟练的是家政课程，女红、手工、家务家政。救济院教会了她们安身立命的本领，对于她们未来的生活和生产非常实用。这20位女子受过政府机构的正规教育，都比较有教养、行为举止端庄大方。考虑到自己一生得有个独立自主的出路，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她们表示愿意嫁个正经男人跟着走，比一辈子待在救济院里要强。

带着对西北陌生生活的向往，姑娘们要起程了，救济院院长也同意段绳武给姑娘们一个全新的生活和完整的人生，秦德纯市长兑现了他作为娘家人的诺言，1937年7月1日，他像嫁女儿一样给20位姑娘准备好嫁妆：一只柳编箱、一身新衣裳。

选择了命运的年轻女子，就这样跟着“西北考察团”经过近两周的跋涉，到达五原县仰之村，迎接她们的新生活很快就热情地扑面而来，段绳武夫妇主持的相亲会，马上就开始了。

地处西北僻壤的仰之村一下子热闹起来。

段绳武夫妇将媒人的角色扮演到底，从他的角度来当个旁观者，替双方把一把关。8岁的段至诚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她还记得相亲时

的场面：她的父母在一间屋子里，男女青年挨个被叫进去互相看一番。

段绳武先向双方介绍各自的情况，然后段绳武带着男的到屋外，问他同意不同意。段夫人在屋里，问女方同意不同意。很多对当时就同意了，但他们都不会开口说出来，男的大都是使劲地点头，女的会使用眼神示意一下，或害羞地轻轻点头。只有一位姑娘不大愿意，她觉得男人眼睛有点斜，段绳武大笑起来，说她：你脸上还有瘡子呢。这样一说，姑娘也就不再坚持了。

新生活紧锣密鼓地向吴爱德们敞开，在她们来到新村的第四天，就迎来了自己的婚礼。7月18日早上6点，仰之村的钟声像平时一样敲响，段绳武一手缔造的另外两个移民村的村民们，都赶到仰之村来参加每天例行的功课，在大礼堂前举行升旗仪式。

礼毕，开始了喜气洋洋的一天，当时时兴的集团婚礼即将举行。

这珍贵的绥西集团婚礼能被影像记录下来，多亏了金陵大学摄影教师孙明经，他当时正随“西北考察团”考察，在那个边境已闻炮声的时期，孙明经用镜头留下了《1937年：战云边上的猎影》这本图册，也留下了仰之村这天所有的幸福记忆。



图四十：1937年7月15日，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包五路上。人多车小，有的团员们只能坐在车顶和站在车边。

这一天，20位新娘统一着装，穿着娘家人北平市市长秦德纯赠送的素雅旗袍，参加升旗典礼，然后每4个人乘一辆披红挂彩的牛车，车上铺着用红柳编的席子，新娘胸前戴着红花，高高兴兴地来到礼堂。

从孙明经珍贵的影像上，能够看到新娘们低头笑着，有的还俏皮地露出一颗小虎牙。她们像上海和北平的时尚新娘一样，手里捧着鲜花。不同的是，她们手捧的是刚刚从地里摘来的鲜花，那是一捧捧新鲜的豌豆花，如她们朴素的生活般绽放。段绳武在致词中说：“我们重义不重物质，这些豌豆花在新人手中的确不比康乃馨差，因为它们充分表现了农垦的意义。”相亲时的婆家人段绳武，在婚礼上又成了娘家长辈，他亲手把新娘们交到新郎们的手上，就像父亲那样。

这是一场中西合璧的婚礼，新人们要对孙中山像鞠躬，还要对武训像鞠躬、对主婚人鞠躬。一对对新人挽着手入洞房时，全体村民一起欢呼，扛枪荷锄绕村一周欢呼游行，以为庆典。

拍过各种大场面的孙明经写信告诉远在南京的妻子：最初我以为救济院女择配垦民是不值一笑的事，可是经过实际的考察，便观点大异。每一对新人我们都亲自拜访了，我们问遍几个新郎：“你喜欢她吗？”“咋子不喜欢呀！”新娘的答话虽不如新郎的爽快，但也在羞答答的表情之下默认高兴。每一个新家庭有一间土屋，屋内的桌子凳子都是土的，端庄而大方，炕面铺着用红柳条编成的席子，舒软不亚于钢丝床；门是枳棘草编织的，美观而适用，这一切都是土产。因为后套盛产红柳和枳棘，凡无庄稼处，差不多遍生此种植物，为修渠筑堰的重要材料。有了这些初步的设备，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就顺利地开始了。

今天在内蒙古还有当年移民的传闻，但已很难找到移民村的后人，虽然有侯仁之等人的文章传世，但人们无法想象当年新农村鲜活的盛景，而这些照片成为移民新农村建设的有力证据。段至诚虽然亲历了新村的成长，但是她父亲从包头到五原搞新农村建设时的所有笔

记、文件都在战火中消失了。上世纪90年代，段至诚和姐姐曾寻访过五原，当时找到的几位新村村民已经80多岁，可惜后来联系不上了。

在被称为新娘皇后的吴爱德的结婚照上，她的丈夫的形象像她手捧鲜花一样时尚、端庄和得体，右手拿着一顶白色的西式礼帽。但他的左手，却握着一把钢枪——战云已在眼前，就在他新娘从北平来五原的路上，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了。尽管信息不畅当地人尚不知道，然而地处边区的人们，早已有警觉。他们在来移垦之前，就知道段绳武的用意，也知道自己的使命，他们就是一道活的长城。

梦破战火

九一八事变后，这里是较早受到日本进犯的中国国土，在明处，傅作义的部队在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以前，就在这里与日军交火四年多了。



图四十一：1937年7月3日摄。傅作义为1933年5月昌平战役抗日阵亡官兵建立的纪念碑，胡适著碑文钱玄同书。1933年5月31日屈辱的何梅协定规定中国人在公开场合不得说写印唱抗日二

字，此碑却把抗日二字刻于巨碑，史称“抗日第一碑”。由于何梅协定限制，当时报刊对此鲜有报道。此碑今已不存。

暗地里，日本的特务机关在此地的活动也颇为频繁。

就在段绳武为新村举办集团婚礼两个月后，全国抗战使段绳武不能再当他的村长了，他重又回到军界，他的理想“建立二万个新村”成为这片土地上永远的遗憾。

来自新村的信件向他哭诉：他的村庄成了前沿阵地，男性村民中有几人已经在抗战中牺牲了，新村也被来犯者尽毁。

7年前随段绳武来绥西的6名儿女，只有两个女儿回到北平，4个儿子全因肺病离世，永远睡在绥西的土地上。

重归军队后，段绳武任傅作义部兵站站长，1938年在武汉任军委会后勤部政治部中将主任，负责全军伤兵安置和救治工作。患有严重糖尿病的段绳武不顾自己安危，在前线各战区都设有“伤兵接待站”，每站相隔30华里。1939年的重庆高滩岩、唐家沱，都能看到后方医院和重伤兵医院。

抗日当前，段绳武广泛延请各界人士共赴国难，郭沫若被他聘为高滩岩残废军人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他还为伤残军人首创了“荣誉军人”称号，并促使国民政府军委会通令全国，在各地设“荣军之友社”、“荣军职业协导会”等，出版《荣军之友》杂志。军队尊他为“中国荣军之父”。

1940年7月，在重庆举行的纪念抗战3周年大会上，带着重病工作的段绳武突然倒地，弥留之际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要回河北村，回去当村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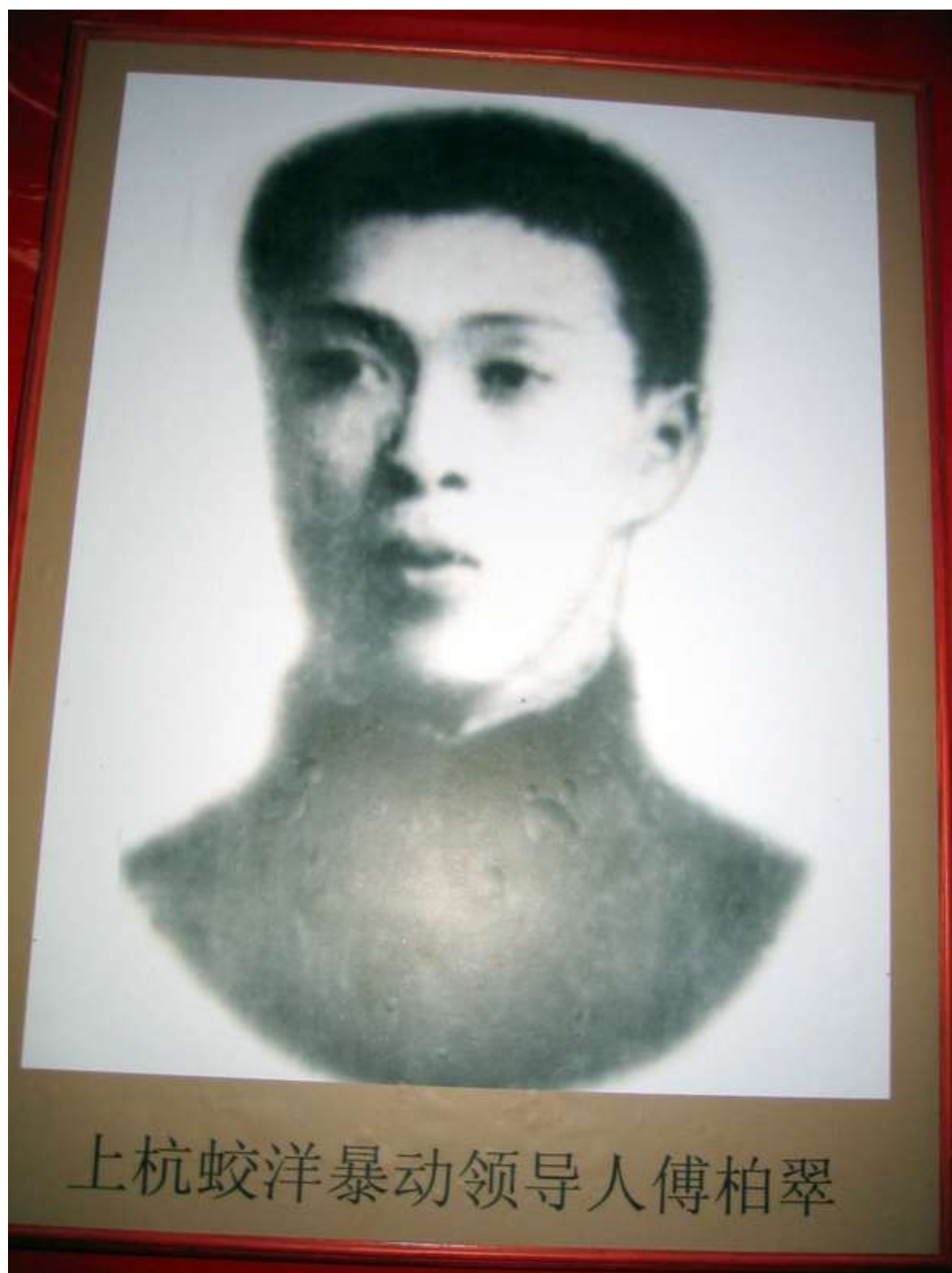
段绳武辞世后，中国无分党派、军系，都向他表达了敬意和哀悼，除了国民党和军队内部隆重追念以外，延安驻重庆的周恩来送了花圈，与直系打过多年的冯玉祥写了悼诗，《新华日报》发表了悼念文章。

傅柏翠：不国不共二十年

他在自己控制的41个乡村共计4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实施“要自由，要和平，不要阶级斗争”的“农民独立革命”，希望走出心目中的第三条道路。

文/何书彬

1928年，在闽西上杭县的蛟洋村，一名叫做傅柏翠的地主子弟，主动说服家人减租退租，随后他又组织当地农民发起了“蛟洋暴动”，在上杭县的东北部建起了一个农民自治政权，展开了一场“共生产、共消费”的“农村共产团”新村建设实验。



图四十二：“龙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内的傅柏翠照片。

如果要为这场实验寻找一个源头的话，那就是曾经在欧美和日本风行一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新村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前后，这种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思潮曾在中国盛极一时，大批的青年学生仿效欧美、日本等地的做法，组成了各种工读互助团，期望着以此为切入口，消除阶级和政治的界限，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

但这却是一场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风潮，1920年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宣告解散，其他地方的工读互助团和自助新村也都因为经济等原因难以为继。随着一个后“五四”时代的到来，无政府主义很快在中国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这使得闽西大山里的这场“农村共产团”实验注定是一场不合时宜的“新村梦”，然而，令时人感到诧异的是，这场实验却奇迹般地坚持了下来，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当中国的多数地方都难以走出动荡不安的泥淖时，这场实验却在闽西的大山里创造了一个无赋税、无征兵征粮、自立自保的特殊区域，时人称之为“新桃源”。



图四十三：1937年3月，烟台蚕丝改良委员会青年女工读学会女会员合影留念。

一名青年的“新村梦”

在发起这场“新村梦”之前，傅柏翠乃是一名受到南京方面通缉的国民党左派。“四一二政变”宣告了国共两党的分裂，众多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成为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对象。1927年5月7日，上杭县也发生了政变，得知消息的傅柏翠在深夜跳下城墙，化妆逃回蛟洋家乡。

那一年，傅柏翠31岁，但却已是一名颇有资历的革命者。

1896年，傅柏翠出生在上杭县蛟洋村，其家为当时闽西一带的大地主之一，每年可收租四千担米谷，在晚清的大变局中，“衣食足而知革命”成为许多富家子弟的风尚，傅柏翠也不例外，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他才15岁，刚刚从上杭县城的琴冈高等小学堂毕业，少年意气的他立刻加入了这场革命洪流，不但在第一时间剪掉了辫子，还和几名要好的同学“每人交了一元大洋的会费”，加入了同盟会。

1914年，傅柏翠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法政专科，同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斯时的日本，也在“一战”爆发后进入了一个思潮澎湃的时代，热衷于乌托邦式运动的日本小说家、剧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展开了新村实验，力倡新村主义，这是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杂糅在一起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武者小路实笃看来，只要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那么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就能战胜资产阶级，建成理想的自由社会。

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新文化运动，新村主义很快成为影响无数中国青年的一种学说。1919年，周作人实地考察了日本的新村实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访日本新村记》一文，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新村实验热潮，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仿效日本的新村实验，组成了各种工读互助团，期望着以此为切入口来改变中国，以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人物高一涵为例，他曾以“涵庐”为名著文说，新村运动的目的是要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新村，“不单没有阶级的界限，就连那政治的界限也渐渐地化除了”。



图四十四：1937年3月烟台蚕丝改良委员会青年女工工读学会全体合影。

但这一场热潮在1920年即以北京工读互助团的解散为标志，宣告结束。也是在这一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文说，在城市里，无论是地皮还是房租都很昂贵，无法安放青年们做新村实验的理想，但他同时也说，新村实验在城市的没落不代表完全的失败，“如果回到农村，或许还可以维持”。

傅柏翠从留学日本起就是一个坚定的新村主义信仰者，他曾经对友人说到，当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曾和同学们一起讨论过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和英国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出身于乡绅家庭的他

很关注在农村实行生产和分配社会化的问题。1919年，当五四运动正值高潮时，傅柏翠也前往北京寻觅同仁，他肯定看到了新村运动在北京的快速起落，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这一运动的信心，或许是李大钊在《新青年》上的文章给了他以鼓励，他曾试图邀集一二十个朋友到他的上杭家乡做新村实验，但众人都认为他这是书生意气，得不到支持的傅柏翠只好暂时作罢。

在上杭，傅柏翠虽然是最早一批的同盟会成员，但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地方的政局动荡也令他一度失去了对这个组织的信心，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使它再度焕发活力，随后傅柏翠也出任上杭县临时参议员，并以律师身份，把上杭的两大贪污案公之于众，一时间，傅柏翠在家乡名声大振，痛恨他的官僚豪绅则咒骂他是喜好挑起事端的“学生皇帝”。

大革命的失败，让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傅柏翠在瞬间成为一名政治边缘人，那时的他或许不会想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第一次遇上了把曾经的“新村梦”付诸实践的机会，而这场新村实验的展开，将使他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游走于国共两党之间。

大革命后的“农村共产团”

1927年9月4日，在福建西部的长汀，当地居民好奇地看着一群外省口音的军人扛着枪从宝珠门进入了汀州城，那一天长汀下了几场小雨，但天气却依然很炎热，这群军人一进入汀州城，就开始在墙上用石灰水粉刷“实行土地革命”等标语，一些政工人员还拿着小红旗站在板凳上演讲，号召人们起来打倒土豪劣绅。

这是一路南征来到闽西的南昌起义部队，正被通缉的傅柏翠在第一时间成为这支部队的发展对象，9月9日，部分起义队伍离开长汀前往上杭，傅柏翠成为上杭第一批接应南昌起义军的中共党员。

1928年，傅柏翠在蛟洋创办平民学校和农民夜校，这个富家子弟想尽办法让农民认识“封建剥削制度”，比如他写了《农民苦》一歌，让当地农民传唱，在这首歌曲里，农民的生活是“朝晨起来做到暗，衣食都不足饱暖”，而地主的生活则是“快活收田租”；同时，傅柏翠一家作为当地最大的地主带头退租，其他中小地主也不得不效仿。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蛟洋农会就成为当地最有力量的组织，并建起了农民自卫军，由傅柏翠率领。

1928年7月，龙岩的国民党旬刊《狂涛》声言：“上杭的白砂、苏溪坡、高车、蛟洋等处，共逆啸聚，党首系留学生，即军阀统治下的一个大土劣傅柏翠，借蛟洋之农民协会为总机关。”

但让时任上杭县委宣传部长的邓子恢感到不解的是，傅柏翠这个国民党眼中的“土劣”却不赞同红军的土地革命路线，二人为此发生争论，邓子恢认为革命是暴烈行动，应立即展开土地革命，但傅柏翠却认为革命应该是渐进式的，不应当是暴风骤雨式的。



图四十五：邓子恢

上杭县文史学者陈赛文在分析这一时期傅柏翠的思想时这样说道：“傅柏翠仍然带着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一心想在家乡搞这种实验。”

1929年，继主动劝说家人向农民减租、退租之后，傅柏翠又说服家人，将他家的每年可收租四千担米谷的田地交给农会分配，蛟洋一带其余地主的土地也纷纷或效仿傅家主动交出，或被农会没收。

1930年，傅柏翠和邓子恢等人的分歧公开化了。当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傅柏翠拒绝出席。随后，邓子恢以中共闽西特委名义致信傅柏翠，历数他“不接受上杭县委的指示起来做杀土劣、烧契据等工作”等种种过失，并批评他坚持实施“农村共产团”乃是“不明白土地革命意义”。

1931年，傅柏翠被开除党籍，此时的闽西苏区，又发生了“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上杭县也出现了“傅柏翠是社会民主党的党魁”的标语。

早先的意见冲突，至此发展为军事对抗，当两千多名红军夹击蛟洋一带时，傅柏翠拥兵反击。事后，傅柏翠控制的蛟洋、古田遂成为闽西苏区的一片特殊区域。

1933年“闽变”前后，身为闽西地方重要人物的傅柏翠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在“闽变”中，蒋光鼐任命傅柏翠为闽西善后处主任；“闽变”后，福建省主席陈仪也承认了傅柏翠对蛟洋、古田一带的实际控制权。不再有外界插手的傅柏翠，得以在蛟洋、古田一带专注地展开他的“新村梦”。



图四十六：蒋光鼐

斯时的傅柏翠，既不赞同中共武装暴动、土地革命的路线，对蒋介石的独裁也不以为然，他在自己控制的41个乡村共计4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实施“要自由，要和平，不要阶级斗争”的“农民独立革命”，希望走出一条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具体做法如下：

在政治方面，傅柏翠放弃了组织政党，而是组织了“自治委员会”，作为农民自治的机构，实施民主选举，凡16岁以上的农会会员，无论男女，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经济方面，“农村共产团”在蛟洋、古田成立后，所有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都收归集体所有，实行“共生产、共消费”，但并非是大锅饭，而是实施“计口授田”，即将集体土地平均分配给包括原地主在内的各户耕种，同时留一部分作为公田，由村农会派工耕种，收获的粮食用以照顾鳏寡孤独、残疾人 and 无劳动能力的村民。

蛟洋、古田一带的粮食本来就可以自给，在这一“新村梦”实施之后产量进一步增加。傅柏翠还动了很多心思鼓励村民的热情：每年正月二十九日，蛟洋、古田举行农副产品展览交流大会，对优胜者给予奖励，一名叫傅赞谟的农民带着杆径2寸的大蒜参加比赛，当即获得8块肥皂的奖励。此外，傅柏翠还创办了“上杭县蛟洋农民银行”，后改为信用合作社，向农民发放小额贷款；同时，他还发起创办了松香松节油厂、樟脑厂、酒精厂、造纸厂、炼铁厂等集体企业。

在军事方面，当时的蛟洋、古田有一支农民自卫军，凡18岁以上的青壮年，实行轮班服役制，每人每次服役3到6个月，以维持一支500人的常备军事力量，村自治会对服役战士的家庭给予优待，派劳力代耕。

此外，蛟洋、古田还成立了乡村警察所，邮政代办所，并架设了电话线路；傅柏翠还极力推行婚姻自由，在他的倡导下，凡青年男女相互了解、恋爱成熟的，只要到农会办理证明文件就可以结婚。

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闽西一带仍有红军游击队活动，傅柏翠率领的农民自卫军和这些红军游击队保持一种互不侵犯的关系，红军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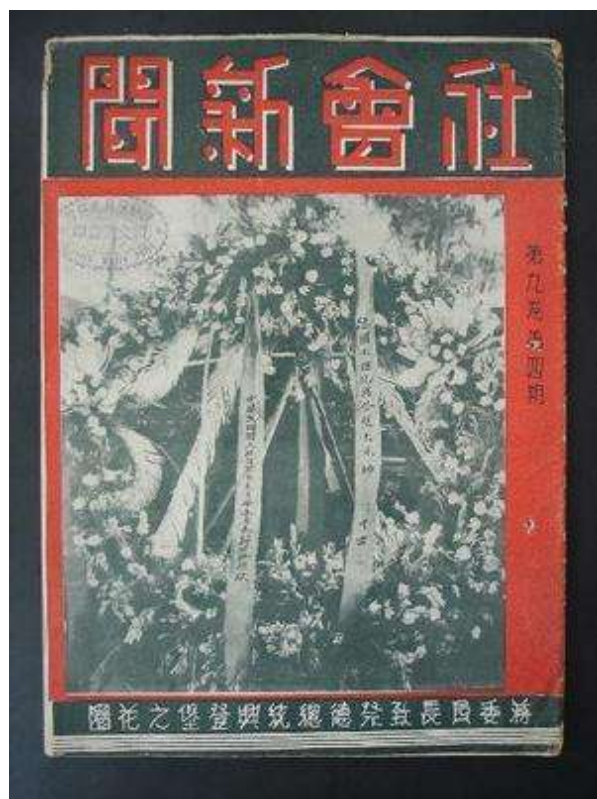
击队不攻打傅柏翠的武装，不到蛟洋、古田活动；作为回报，傅柏翠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对红军游击队不禁粮，不封锁物资。重新来到闽西的国民党力量，则从未真正有效地控制这一片区域，尤其是在上杭，无论是地方军阀势力，还是国民党当局派驻的县长，都不敢在蛟洋、古田一带征兵征粮，使得这一带成为极其罕见的一片“不共不国”的完全实施农民自治的独立区域。

“新村”一梦二十年

淳朴的农民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来念叨傅柏翠的好处，至今，在蛟洋、古田一代，一些老人还相信，傅柏翠是“豹虎神下凡投胎出世的”，凡是傅柏翠走过的地方，“一定会五谷丰登”。

对于乡民们的这些说法，傅柏翠自然不会当真。在他的辛苦经营下，蛟洋、古田的“农村共产团”实验一直坚持到1949年，差不多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其间，为了保持这一局面，他也不得不与多方力量进行周旋，而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为了获取他这个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也对他的做法采取了至少是表面上的支持态度。

1933年，国民党中统主办的刊物《社会新闻》登载《闽西社会主义实验区护持者傅柏翠》一文，对傅柏翠的“新村实验”大加称赞。



图四十七：《社会新闻》封面。

1934年，时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准许蛟洋、古田的农民把分得的土地陈报备案，确定了傅柏翠实施的“计口授田”的合法性。

1947年，在国共两党的交锋中，全国许多地方成为两党交锋的战场，而蛟洋、古田一代仍然像往日一样平静，不受外界的干扰，这使许多人将之比拟于现世的桃花源。这一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赖琤令其秘书撰文介绍蛟洋、古田一带的情形，刊登在《东南日报》副刊上，文章题为《新桃源记》。



图四十八：蛟洋中学学生旧照。学校前身是1938年春由傅柏翠先生倡议创办的“私立古蛟初级中学”，蛟洋中学现有近2000名学生。

当然，也有不甘心失去大片土地的地主不断控告傅柏翠——他们算是遇到了对手，傅柏翠既有法律专长，又有政治声望，他不慌不忙地与这些地主折冲尊俎于法庭之上。1935年，一名叫黄永滋的地主控告傅柏翠是“白皮红心”的共产党，要求他立刻把已分配的土地物归原主，官司从福建一直打到南京，让黄永滋惊诧的是，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居然很快就判决他败诉，原因是被告的辩护词实在是太有力了。傅柏翠在驳回控告时这样说道：他自己家也曾是拥有四千担谷田的地主，这些田地早已分配给农民，因为只有这样方可忠实执行孙中山先生“平分

地权”的遗训，黄永滋也是国民党员，难道不应一起遵守国父的遗训吗？

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仓皇退往台湾，傅柏翠在闽西宣布起义。这一年年底，古蛟区人民民主政府成立，蛟洋、古田一带持续了几乎二十年的“不共不国”的状态正式结束。

1950年9月，傅柏翠离开上杭，到福州出任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1950年12月，上杭“土改”开始，上杭县政府认定蛟洋、古田一带“保持了土地革命的果实”。这一结果让傅柏翠稍稍感到心安，但到了195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来到上杭，蛟洋、古田一带又被认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区域，需要进行“补课”，导致以往追随傅柏翠做“新村实验”的许多人都被划为地主、富农或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叛徒和坏分子；傅柏翠一家也未能幸免，傅柏翠的长子傅翔欧被划为恶霸地主遭到审讯，傅柏翠的次子傅翔亚则被判处劳动改造，在福州的傅柏翠也为划为“小手工业主”。

晚年的傅柏翠又开始了四方奔走，为自己一家人和战友们鸣冤叫屈，但他仍不断地遭到审查。“文革”爆发后，造反派强令傅柏翠揭发所谓的“闽西叛徒集团”，将目标指向了中央苏区时期的许多老干部，傅柏翠拒绝写诬陷材料，造反派在盛怒之下抄了傅柏翠的家，又把他押送到闽西的农场劳动改造。



图四十九：1988年春节，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右三）等领导探望福建省文史馆馆长傅柏翠先生（右二）。

一直到“文革”结束，傅柏翠才等来历史冤案解决的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福建省委和闽西地委对闽西苏区发生过的“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做了调查，认定此为一起重大的历史冤案，应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并对1955年“民主革命补课”错划成分的问题进行了纠正，傅柏翠的名誉得以恢复。

1986年，傅柏翠以90岁高龄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傅柏翠在福州去世。

中山：“总理县长”的“自由港”

在权与利争夺的漩涡中，唐绍仪以前总理之尊出任县长所推进的中山自由港，竟不似一个国家工程，而似唐绍仪个人的事业。。

文/李梓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移灵香山碧云寺，有30万人自发为其送灵。此后几个月，中国陷入了对孙中山的纪念狂潮之中，有人提议把南京改名中山市，上海大学和广东大学争相要求改名中山大学，那些从未服从过孙中山领导的各地军阀，则争相用各种各样的纪念仪式，来企图证明，他们是孙中山志同道合的同志，而非总理遗嘱中“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对象。

1925年4月，由廖仲恺等人提议的将孙中山的故乡广东香山县改名中山县的提案，获得了通过。1929年2月，由孙科提议的将中山县上升为中央直辖模范县，将国父的故乡建设成为中国现代民主自治之典范的提议，在南京获得通过。

这一年，已经67岁的国父同乡、民初首任内阁总理、广东护法军政府七总裁之一、南京国民政府委员、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唐绍仪，出任中山模范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长，他到任中山后，提出了建设中国第一个无税口岸的宏伟目标。



图五十：唐绍仪

在近代中国，虽然香港、广州湾、青岛、大连等地先后有过开辟自由港、无税口岸的计划和历史，但那些都是列强在中国的殖民地、租借地上进行的殖民主义事业，唯中山港无税口岸是中国人自行提议开辟的，虽然其最终未能实现，却仍在历史中有其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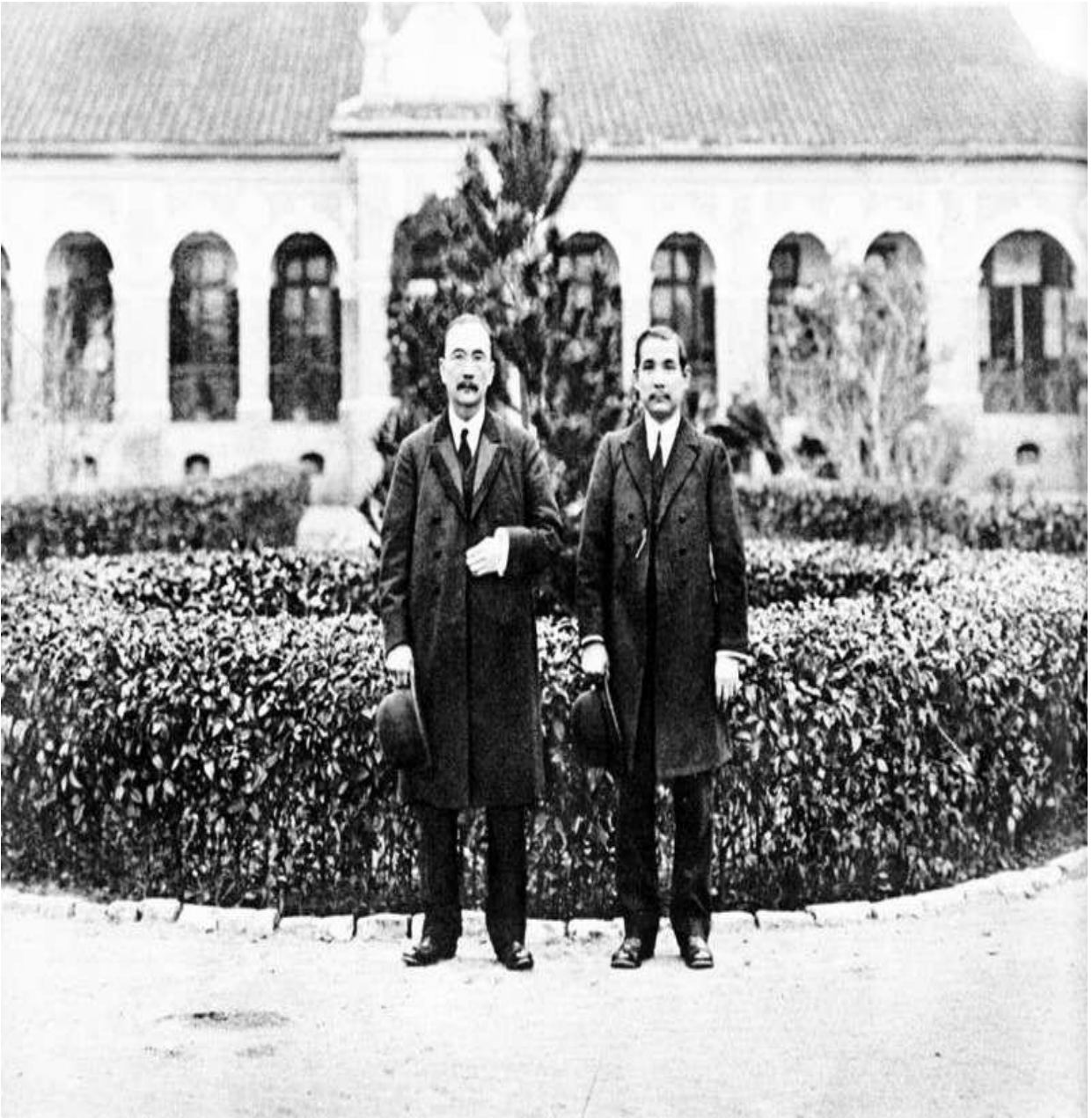
总理遗志

唐绍仪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长袖善舞的人物，他作为第三批留美幼童，学成归来后，就职于朝鲜海关，其后又出任税务处会办大臣，后与孙中山交好，民国成立后成为两任总理，与孙中山的关系逐步变淡，孙中山去世后，他选择淡出南京政坛。

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第19次国务会议决定将中山县作为模范县，并颁布《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组织大纲》，设立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直隶中央，在全国率先试行“训政”。并规定，中山县县长和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须由资望甚隆的中山籍人士充任，这样一来，唐绍仪就成了不二人选。1931年3月起，他又兼任中山模范县县长之职。

上任后，唐绍仪抛出了开辟中山港无税口岸的计划，对于他说，这是人生所办的最后一件大事。

唐绍仪的祖上，曾是海客出身，其家乡唐家村，濒临珠江口出海深水干道金星门，有建造良港的地理优势，所以又称为唐家环。



图五十一：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总统府会见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

孙中山生前，多次与唐绍仪等人商榷在此地修建良港的可能性，并写入《建国方略》中。这篇文章直接用英文写成，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的文章，首次发表于1919年6月号《远东时报》。

1929年，唐绍仪向南京国民政府报告，以孙中山曾与程璧光商讨在此建设军港等五个理由，呈报建造中山港无税口岸的可能性，并计划以之取代香港和广州港的对外贸易地位。在报告开头说：“窃查职县唐家环位于珠江下游及西江支流终点，而西江支流又为香港与西江交通之孔道。该环实握珠、西两江交通要枢，复与陆地毗连，公路衔接省道。以之辟作无税商港，对外开移香港之商业而置澳门于死地；对内以与滇、黔、桂各省沟通，为西南诸省出海之要道，亦即我粤自有之门户。”

在规划上，唐绍仪计划中山港不但要建成华南第一良港。而且“陆路交通，将来建成铁路，直达广州，接粤汉铁路，直通中国北部及东北部，可以联络西伯利亚到达欧洲。至于机场，将来亦有地点可以筑”。

此外，他还说：“开辟中山港实为国家百年大计，而又为纪念中山先生。”并计划以“60年为期，期满归省政府管理”，其提案声震朝野。



图五十二：中山县政府大门。

上世纪20年代末期，民国政权逐步稳定后，民国政府开始试图收回沦落在列强手中的国家利益，例如恢复关税主权、司法主权、铁路主权、收回租界等，并通过谈判的方式，在抗战开始时陆续收回青岛、威海等地。中山无税港的提议，正顺应这种思想和潮流，既有挽回民族权利，与英、葡等列强抗争的商战思想，又有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意义。

在此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5月下行政令：“兹指定广东省中山县唐家环开辟为无税口岸，以六十年为期，定名为中山港，由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负责经营办理。”

纸上蓝图

开辟中山港无税口岸的申请报告一经批准，唐绍仪马上着手规划筹建并付诸实施。为便于筹建中山港，他指派黄居素县长，把中山政府从石岐镇迁到唐家环，唐家环仅仅是一个7000人的小镇，如何容纳政府办公。唐绍仪自有办法，把唐氏族的各个祠堂腾出来作为临时办公地点。

对无税区的勘址也很快完成，从总理的家乡唐家环到国父的家乡翠亨村的地界，被容纳了进来，很快绘成图纸，承包给南京政府。



图五十三：位于唐家镇山房路99号唐绍仪故居。由并连成一整楼的前后两座组成，后座为唐绍仪祖父于清朝所建，前座为唐绍仪于1929年所扩建。

中山港建港所需资金，大致由两块组成，一块来自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包括资金划拨和税收支持。中山县上缴中央和广东省财政的税收，可以截留25%归县政府支配。另外一块，则来自民间筹资。

为此，唐绍仪在广州和香港等地召开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山港无税口岸计划，以他的威望，及为中山港无税区描绘的蓝图，很快获得海内外华商捐款100多万元。

1930年7月20日，中山港对外宣布开港。

1931年10月10日，中山港正式举办开港典礼，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前来主持开港仪式，国内外嘉宾云集。中国空军创始人张惠长和陈庆云，以中山人和训政委员的双重身份，率13架战机前来助兴，这场广东历史上第一次大型航空表演，把开港气氛带至高潮。



图五十四：中山港开港纪念章。

从宣布开港到举办开港典礼中的一年时间，唐绍仪又随着民国政坛的跌宕起伏而经历了一次身份转换。

小走私与大走私

1930年，在获得批示后，为了拓展规模，唐绍仪将中山港免税区的面积，从唐家环拓展到方圆60英里的地界，并呈报南京政府。又在宣传上大加造势以利于筹资，不料却埋下两个隐患。

其一是英国政府的反弹施压，因为建设中山港的声势很大，又在宣传中处处表达与香港争利的意图，英国政府恐其夺去香港远东第一自由港的地位，开展外交施压。



图五十五：1931年唐家前环“中山港海关”。

其二，是在各项建设尚未完成之时，就贸然行使零税区的职能。零关税区划得过大，以当时的条件而言，海关缉私都难以完成。1930年，民国财政部关务署报告说：中山港海关监管办法未定，商人借名无税，由该港私运火水，转售内地，时有所闻，其他油炭、布匹、火柴、百货，也为数不少，走私日趋严重。中山港尚未建成，而走私猖獗，直接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部长宋子文亲自到广东调查后，算出每日损失上万元：“中山港自定为自由港后，走私日多，关税大受影响。此次子文赴粤实地调查，国税损失每月有数十万之巨。”

广东的走私情况，被唐绍仪私下分为“大走私”与“小走私”。

“大走私”为半官方的走私，用船只从香港走私物品，海关船只若上前拦截，敢开枪示警，如此嚣张的气焰，非军队莫属，背后的大老板就是“南天王”陈济棠。陈济棠的胞兄陈维周，担任盐务局长，从法国买的退役扫雷舰两艘，装有火炮，名为盐务缉私，实为走私之用，海关的船看到了根本不敢上前，只能记录汇报。

而“小走私”，则是民间一些百姓，从陆路到香港，随身带回一些糖、油等日用品，回乡贩卖后度日，海关对这群穷哈哈也只好半睁半闭。有时候唐绍仪遇到被警察查获的“小走私”民众，还会代为说情发还物品，还曾说过“小走私可以打击大走私”。

陈济棠坐拥广东，其走私哪是海关查得了的，宋子文将此罪怪到唐绍仪修建免税区上，无疑也是“老太太吃柿子”，其后果是，南京政府以中山海关无力监管那么大面积的免税区为理由，重新核定了免税区面积，从60英亩缩减为3英亩。

在政治的夹缝中

1931年2月，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蒋介石因立法之争扣留胡汉民，引发宁粤对立。汪精卫、孙科纠集陈济棠、李宗仁等各派反

蒋势力，于5月在广州宣布另立国民政府，成立常务委员会，唐绍仪赫然位列，并成为轮流坐庄的国务会议主席五人之一。

同年秋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内关于“共赴国难”的呼声高涨，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蒋介石上演了他的第一次“下野秀”，广州国民政府只好迫于形势宣布解散，唐绍仪又回到了中山当他的县长，继续建港大业。

此时，陈济棠与唐绍仪的矛盾重重，1931年10月，唐绍仪邀请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来主持开港仪式，也是希望借助这位大佬为中山后盾，顶住陈济棠的侵蚀。



图五十六：陈济棠

1931年底，中山港第一期工程正式开工。第一期工程包括：一、建筑唐家前环、后环两个大型深水码头；二、在前环“急流仔”经槟榔石至蛇洲尾一带建造一个避风塘和一条防浪堤；三、开辟从唐家至前环、后环的道路；四、在前环制高处的“炮楼仔”修建一座50平方米的信号台。

中山县政府预计，该期工程完成后，即可开辟唐家至石岐镇、省城广州、香港、澳门、西江沿海各港口和南洋各埠的客货运航班，计划开港成功，巨轮可以进出中山港，直达外洋，与香港争吐纳贸易之利。

唐绍仪进行中山港建设时，规划不可谓不完备，细节不可谓不完整，除港口外，还着手修建公路、电灯、电话、自来水、驾驶学校、银行等配套设施。然而，唐绍仪是理想家而非干才。在中山港建设中，陆续发生偷工减料、贪污华侨捐款等事。前环码头、岐江桥、开港观礼棚等建筑项目，久久未能竣工，劳而无功，又发生工程质量问题，对唐家环是否适宜建港，也产生了怀疑。唐家环一代，由于地理环境影响，泥沙堆积太快，势必在建成后产生清淤难题。

在推动中山港无税区这样的大项目同时，唐绍仪还推动社会变革，实行义务教育，推动社会改革，不仅遭遇巨大的社会压力，也让中山县的财政每年亏空10万余元。

更重要的是，处于权利争夺期的南京政要，对于唐绍仪所推进的这样一个划时代项目，其态度暧昧不定，中山港项目逐渐竟不似国家项目，而似唐绍仪个人的事业。此外，“约法之争”时唐绍仪持反蒋态度，在地方上又与陈济棠矛盾重重。在这样一个既缺乏中央支持，又缺乏地方支持的局面下，下面发生的这件事似乎就理所应当。

武力遣唐

1930年前后，广东正处在陈济棠时代，中山县这一直属中央的“特区”出现，大大影响了陈济棠的利益。其一，中山划归中央直辖，等于把陈济棠的地盘划出去一个县；其二，虽然南京国民政府规定中山县每年可以截留25%的税收归地方支配，但因建设中山港而资金缺乏的唐绍仪，却将该县的国税、省税一律截留，分文没有上缴，等于从陈济棠的口袋里掏走了一大块。

唐绍仪以前总理身份出任中山模范县县长后，为抵御军阀侵蚀，特令各级政府不得在中山驻军，又自行组织“县兵总队”。唐绍仪出任县长之初，陈济棠派人告知唐绍仪，以中山地方不靖为理由，拟派军队驻防，被唐绍仪以“中山模范县隶属中央地方不得干扰”的理由拒绝。

中山县有沙田200万亩，沙田税是中山县最大的收入支柱，陈济棠曾指示广东省财政厅插手沙田税，却被唐绍仪所拒。孙科筹建中山纪念中学，唐绍仪又截留应上缴省府的16万元护沙费，并把属于中山县大、小霖（现珠海市）辖广仁围十顷沙田划为校产，帮助学校顺利建成运营。种种行为，让“南天王”气得咬牙切齿。

后唐绍仪在中山推行“自治”，推进乡村政治改革，清查田亩，意图实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得罪了当地地主豪绅，频频发动倒唐运动。给了陈济棠以可乘之机。后遂果然发生武力遣唐事件。

1934年10月7日，陈济棠策动中山县县兵“兵变”事件，荷枪实弹的县兵包围了县衙，要求县长清发欠饷，实际是将唐绍仪软禁了起来。中山县县兵索饷事件，从头到尾都是个阴谋，唐绍仪所信任的公安局长林树巍，其实早已投靠了陈济棠的胞兄陈维周，两人在走私上相互合作，唐绍仪不查而将中山的兵给林树巍带，给人可乘之机。



图五十七：1930年，广州长堤大马路（西向东方向），图中箭嘴所指为海珠石。

县府秘书长派人往石岐致电广州告急。陈济棠遂得计，派人乘坐江防司令部浅水舰“坚如”号开赴唐家湾，冠冕堂皇地说是迎接县长回广州主持西南政务，实际则是武力遣送唐绍仪离境。唐绍仪脱困之后，气恨难平，避居上海，南京政府有意回避此事，不闻不问。此时他已72岁，正是本命年。

陈济棠“收复”中山县后，事实上中断了中山县独一无二的“模范县”直辖地位，中山县政府不久便迁回石岐镇，中山县和中山港建设工程戛然中断，中山港无税口岸计划就此告终，唐绍仪在中山所作的各项社会改革也难逃夭折。4年后，唐绍仪更以一个糊里糊涂的理由，被蒋介石当作汉奸暗杀掉。

对于唐绍仪晚年在中山的这段奋斗史，毛泽东曾在1957年的中共省委书记会议上评价说：“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

卢作孚：民国NGO史上的失踪者

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理念，看上去的确不错，但没有个人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这个维度作为前提，难免走向自己所提倡之事物的反面。这当然是他及他那一代人急欲国家强大，而最终必然堕入把自己锁牢的乌托邦。



图五十八：卢作孚肖像。

文/冉云飞

灾难面前的考试

1933年8月25日下午三时半，四川岷江上游的叠溪古镇发生7.5级大地震，霎时间，天崩地摧，巨石与尘沙齐下，整座古城陷落，二百多户人家的古镇生还者所剩无几，加上周边死伤者，据常隆庆的调查达六千多人。河水被阻断而成堰塞湖，后来形成大小不等的14个海子。道路不畅，信息闭塞，没有经验，救援人员缺乏，使得更大的次生灾难在四十多天后的10月9日再度发生，堰塞湖溃堤，给岷江下游都江堰等地造成了本可以避免的灾难，淹死了两千六百多人。



图五十九：茂县叠溪古镇远景。

据学者李德英、高松《地震灾害与社会反应——以1933年四川叠溪地震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所言，这么大的灾难，除了获得成都少

数媒体的关注外，像《大公报》、《申报》这样的外地重量级媒体，只是在隔多日后有只言片语的小豆腐块报道，其轻描淡写可以想见。

与中央政府的漠视、外地新闻报道对叠溪地震的关注不够相比，中研院及地质所也对川大校长王兆荣要求调查叠溪地震的求助，以院方人手不够等原因而拒绝来川。四川大学只好派几位学生在老师周晓和的带领下，作了些不太深入的调查。倒是西部科学院地质所所长常隆庆带罗远正等人，到叠溪做了真正实质性的科学考察，而西部科学院则是由卢作孚创办、并自任院长且刚成立三年的民间科研机构。1933年10月16日地质学家常隆庆等一行到达灌县，随即赴叠溪调查，彼时地震刚过不到两个月，堰塞湖也溃堤未久，所以得到大量第一手关于叠溪地震的史料。常隆庆调查回来后，撰成了整个西南地区第一个对严谨的科学考察报告，据研究地震的学者洪时钟等在文章《大地震的考察、研究和救灾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几位前辈》里说此次现场科学调查，在时间上仅次于1920年翁文灏所做的海源地震调查。

1938年冬天武汉快要陷落，大批人员三万多人和近十万吨物资滞留宜昌，亟待运输到重庆，为国家留下抗日之资——特别其中所包含的航空、兵工等工厂、工业。卢作孚临危受命，以交通部次长的身份，于10月23日亲自到宜昌督促民生公司22艘船只和另两艘挂法国国旗的中国船只日夜搬运物资，最终赶在枯水期前把人员、物资运完，为国家保留了可贵的抗战翻身的元气与力量，后被晏阳初誉为“中国工业上的敦克尔刻大撤退”——其实时间上比敦克尔刻大撤退早两年，难度上远超过它，其意义也不亚于它。但此次民生公司损失惨重，被炸毁轮船16艘，牺牲116人。



图六十：1939年9月24日，卢作孚在汉口航政局改良木船试航典礼上发表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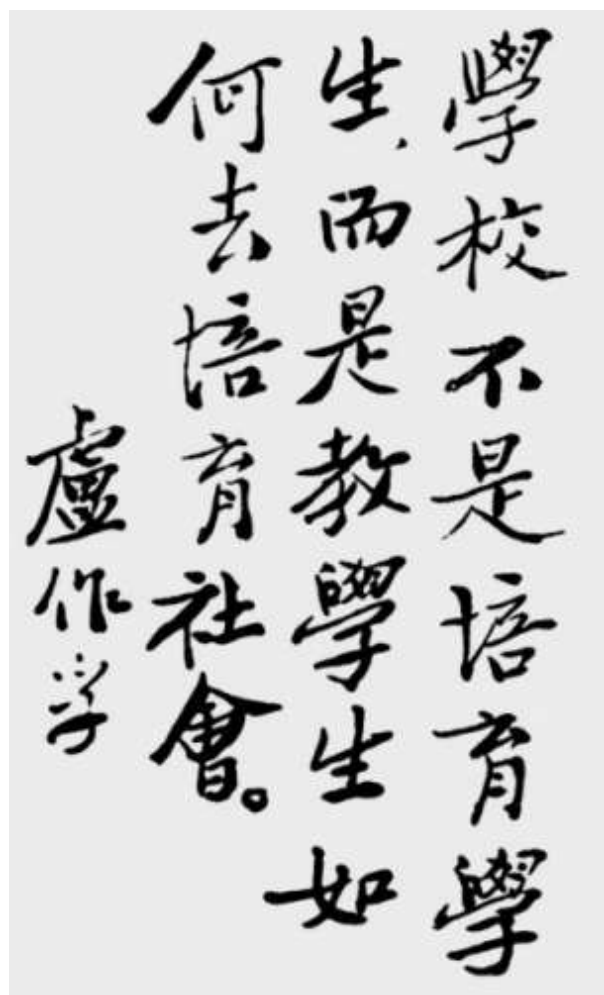
别以为卢作孚是趁一个交通部次长的位置为民生公司牟利——卢一生不想当官，此次若非到抗日紧急关头，他亦不屑于出来当官。但几次都是格于当时形势，不得不出来任职，比如1935年曾短期任过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是为了出来在军阀混战刚平息的四川做恢复民生建设的工作——民生公司的运费低廉到只有外国船只的百分之十。担任过交通部次长一职，后来却成为他含冤自杀25年，其后人上书中共高层领导想为卢作孚平反时的一个“污点”。1977年5月10日吉林省委统战部复函卢作孚女儿卢国仪所在单位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时说卢作孚“曾任蒋帮伪交通部次长，解放前夕逃香港，在我党争取下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回国”（参见卢国仪《卢作孚恢复名誉的曲折经过》）。完全不看卢作

孚短期出任国民党交通部次长（包括后来的全国粮食局局长）是非常时期为抗战之大义，就像胡适亦是因此出任战时驻美大使一样。

在国家和社会的灾难面前，像卢作孚这样做得好的个人不多，而他所领导的机构亦做得这么好，那就更是寥若晨星。没有他对民生公司训练得那么好，组织和治理（包括员工自治）得那么出色，那么需要经过一年才能完成的撤退不可能40天就完成。在官方的科研机构没有人前往的时候，是他主政的民间科研机构不顾震后的安危与不便，毅然前往，拿出像样子的报告来，以让世人了解灾难发生的真实情景，以便在将来救灾和灾害预防上做出更多的贡献，这包含着卢作孚什么样的社会实践和思想理念？

社会企业家和社会自治

1925年，卢作孚在经历了两次半途而废的教育实验后——1921年泸州川南教育的尝试与革新、1923年成都通俗教育馆的办理都因彼时提供庇护和资助的军阀杨森下野而不得不舍弃——而自行组织民生轮船公司。卢作孚开始信奉有了钱，才能办自己想做的社会事业。用现在的新名词来说，卢作孚绝对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家之一。什么是社会企业家呢？用社会企业研究专家戴维·伯恩斯坦在《如何改世界——用商业手段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一书里的定义：“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构建一个理想世界的人。”直言之，盈利并非社会企业家的最终目的，而是运用商业的眼光观察社会，并用商业手段和规则来解决社会问题。用这样的定义来看，卢作孚是20世纪上半叶当之无愧的社会企业家。



图六十一：卢作孚先生遗墨。

对于一个杰出的社会企业家来说，要解决与回答的问题无非如下三个：一是想解决的社会问题是什么？二是解决方案是什么？三是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如何？原创性如何？持续性如何？如果我们用这几个问题来对比一下晏阳初、梁漱溟等同样做乡村建设的人，就不难看出他们与卢作孚的很大区别。卢作孚想解决的社会问题是乡村及国家的现代化，因此要组织起来用商业的办法自救自治，做社会建设，其解决方案是兴办各种商业（航运、煤矿、纱厂、铁路、造船、机械、水电等），通过持续的创新与盈利的可行性，来为自己所做的一系列社会建设事业不断输血。

而晏阳初想解决的“贫、愚、弱、私”、梁漱溟想解决的传统乡村儒家治理与现代社会的对接，而他们所用的解决办法是传统意义的募捐和靠有钱士绅的捐产奉银。当然晏阳初、梁漱溟都是非凡的人，其募捐能力和社会各界包括政界的支持能力，都远非他人可比。但要一直靠社会募款来作长时期的社会建设事业，其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真正能坚持下来的，可谓百不得一。这也就是为什么乡村建设只有卢作孚能坚持23年（1923—1949）之久而不中辍的原因。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中辍得最早，后来他主要精力用于教书和从事政治评论，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后来更多集中于平民教育领域，而不是大规模的社会自治实验。

北碚小三峡地区，位于重庆与合川之间，地处巴（县）江（北）壁（山）合（川）四县交界地带，呈现几不管的状态，加之军阀易帜频繁，因此匪患成灾。1916年此地方曾举办团防欲杜绝匪患，但收效不大。1923年巴江壁合四县士绅倡议成立以胡南先、熊明甫为正副局长的峡防团务局，以治匪患，保靖安民。虽有一定成效，但离治标效果差得还很远。驻合川、铜梁等地的二十八军陈书农部，以及驻巴县、江北、璧山的二十一军王书舟部，均欲安置自己的亲信以掌控峡防局，双方争执不下。1926年合川士绅耿布诚、江北士绅王序九托人向两军推荐极孚民望的卢作孚，双方均表同意（卢子英《怀念二哥卢作孚》，见《卢作孚追思录》29至41页，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关于峡江防务资料同此）。于是卢作孚于1927年3月出任峡防局局长，以“经营三峡”、“保障三峡”自励并号召众人，开始其长达23年的乡村自治、建设及管理的历史。



图六十二：民生公司万县分公司大门。

由于民生公司的总部和创办时许多事业的根基都在合川，卢作孚是以民生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兼峡江团防局局长。在主政者易帜频繁的巴蜀大地上，如果仅靠哪位军阀任命其当峡江团防局局长，那么其命运就会和前两次半途而废的教育实验一样。卢作孚是合川人，在本地有很深的人脉，其初组民生轮船公司时差钱都是靠当地朋友耆旧提供的，这样一来，他组织招募人员保靖安民，就有了较大的民望市场和凝聚力。卢作孚组织防务队，由其在黄埔军校学习过的四弟卢子英担任军事教官。清理土匪由卢子英带领训练过的士兵和学生队进行清剿，同时用“以匪治匪”，鼓励自新，给以出路的策略——出路就是通过培训在他开办的一系列企业里干活儿，自食其力，加入建设新北碕的团体——到后来基本完成清剿任务后，这些士兵和学生队本身也要进行文化学习，作为一般警察维持社会秩序之用。闲暇他们会巡回各乡

镇，帮助宣传卫生，送种牛痘，开周会，演话剧，帮助调查户口、开展民众教育运动。使得北碚、合川一带呈现欣欣向荣的现代景象。

更为重要的是，他不是一味地强硬治理，而是通过商业的手段来达成社会管理，讲究效率、有利与公平。联合当地的小煤矿而创办成大型的天府煤矿，修建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降低煤矿运输成本。就地办理纱厂，解决外地布袜等销到巴蜀地区，运力成本高昂而不能让普通百姓购买的窘境。通过办理一系列厂矿，扩大了合川、北碚附近的就业人数，使得附近的人收益有所提高。不特如此，他还让团防局组织起来办免费的民众学校、管理治安，贴自办的《嘉陵江日报》让大家知道发生在中国、四川以及北碚的新闻。不仅办社会及民众教育，还办学校教育比如实用小学、兼善中学，同时号召大家的事情大家办，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组织自治机构来解决民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

民生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卢作孚在北碚、合川所做的实验涉及范围越来越大，建立北碚图书馆、辟办温泉公园、北碚公园，创立北碚农村银行（很有点像今天尤努斯所做的小额贷款的样子）、修建北碚民众会堂（既可议事，也可以演戏放电影等），还创办西部科学院这样独立的民间科研机构。更重要的是通过像文化基金会这样的办法，来积累专门进行社会治理的经费。此一文化基金由出任峡江实验区（后改为北碚管理局）的局长卢子英进行管理，以期做长久的乡村自治与建设。

文化基金的钱最初通过从通江、南江、巴中贩运木材所得本金积累起来，后来又将自来水公司、北碚建筑公司、北碚印刷厂及民众会堂划归文化基金会经营，经营所得利润拿来建设北碚医院、为北碚图书馆购置图书、替西部科学院添置研究器材、扩充研究经费。正是如此，成就以卢作孚为核心的乡村建设和自治大业，从对一地的影响来说只有清末状元张謇所建设的南通能与其媲美。但就搞乡村自治与建设的方方面面的广度（不是指地域大小）和深度来说，截至目前，在中国历史上，至今堪称空前绝后。



图六十三：民生公司汉口分公司。

为什么以卢作孚为核心的民生公司集团，搞乡村建设和自治，能够存续如斯之久？除了他善于用社会企业的运营方式，加上募捐所得款项的混合运用，来进行社会改良外，重要的是，他的政治理念与提倡暴力革命者有很大的区别。1921年他在川南办教育与共产党人恽代英就有过“微生物”与“子弹”之争。社会改进是“微生物”之慢慢变化过程，他不同意恽代英用“子弹”来进行的革命。这确定了卢作孚一生面对社会的基准，他甚至说建设胜过救亡，你若把自己的家建设得好，那建设的力量自身就具有救亡的力量。他也不同意只在言语上或者行动上搞空洞启蒙，而是要用商业的手段，使得所做的事可以持续，同时具有向前慢慢推进的内在逻辑。于此，卢作孚痛切地陈述道：“我们的责任绝不是救亡，而是将一个国家经营到像一个国家——像一个现代的国家，还不够，应当经营到比现代好的国家还要好……如果真能够把这

样一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营得比别的国家更好的时候，谁还能亡这一个最大而又最好的国家呢？如果我们长时间不能将国家经营好，总有人会亡我们的，纵没有甲，也会有乙。”（转引自刘重来《论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思想》，见周永林、凌耀伦主编的《卢作孚追思录》P444，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这既是卢作孚“乡村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思想的具体实践与体现，也展示了他主张用社会企业方式处理社会问题的典型理念。

多重身份下的NGO标识

卢作孚是个学历不高的小学毕业生，但其自学能力却是相当的惊人。超强的自我学习能力，与其说来自于他对生活和事业的危机感，毋如说来自于好奇心、求知欲、探险精神和责任感。从大类上分，卢作孚当过教师（含教育官员）、记者（编辑、主笔）、商人（董事长、总经理）、官员（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交通部次长），至于说他在自办机构的兼职如西部科学院院长等，那就非常多了。这种社会兼职很多时候是荣誉性的，非具体行政性乃至非实权性的。著名人物的荣誉兼职对于机构运作效率的提高、交易成本的降低、信誉地位的提升、融资合作能力的扩展，都有好处。因此卢作孚在这个庞大的以民生公司为中心的事业团队里，有着多种兼职是可以理解的，具有相应的公司商业运营管理的内在逻辑。



图六十四：1945年2月，卢作孚（右三）参观美国大古力水电站。

卢作孚经营社会事业的款项来源有募捐，有机构捐助如其西部科学院曾经得到任鸿隽主政的中基会的支持，当然更多的是自身创造的利润。款项来源的多元，以及社会事业的多元化，使得卢作孚需要有广大的人脉和社会交往能力，从而使他多重兼职变得有相当的实用价值。他一生有多重身份，但以企业家特别是社会企业家的身份，使其非政府组织的成分得以因此标识出来。多重身份使得卢作孚在政、军、商、学等方面的人脉极广，这为他从事几乎遍及各个领域的（乡村）建设——教育（学校教育、民众教育、图书馆）、科研（西部研究院、博物馆）、市政建设（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等）、医疗卫生（医院、卫生教育及调查等）、商业（北碚银行小额贷款、民生公司、天府煤矿等）、文化建设（基金会、北碚民众会堂、印刷厂等）、公司演讲会（曾请郭沫若、马寅初、茅盾、胡焕庸、魏时珍、黄炎培、李济欧、左舜生等人来演讲，见我根据六十年前民生公司职员何现伦的日记所写的长达三万字拙文《民生公司职员六十年前的日记》）、乡镇治安（训练青年组建峡江团防局以尽军警之责）、职业介绍所、新闻媒体（《嘉陵江日报》、《新世界》等）、战时救援（帮助西来之机关团体及人员之安置）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身份的多重，使得卢作孚看问题的角度与他人有异，既能盱衡全局又能体察细微之处，既注重广阔性和深度，亦注重可行性。他既有从政经验，也有经商的实践，还有处置重大急务如宜昌大撤退的领导经历，还具有办理许多民间团体的发起组织、经营管理的历练，也就使他与各个阶层的人打起交道来都得心应手。一般说来，企业家与科学家的合作，是颇不易的，尤其是许多科学研究不能直接带来收益的时候。但卢作孚看得远，所以他自从想要探明四川的诸多资源——土地、地质、矿产、植物等方面的资源后，就立即着手与秉志、任鸿隽、胡先骕等科学家联系起来，并用民生公司的利润于1929年接待科学社到四川来开年会。不仅让科学社的科学家带领民生公司稍有训练的科学爱好者采集动植物标本，而且让科学家们给四川科学建设提供切实的建议，并资助其成立西部科学院。其中最重要的资助之一，就是让秉志、胡先骕等著名科学家给西部科学院推荐常隆庆、李春昱、郑万钧、俞德浚等青年才俊，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各自领域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如我手上藏有1941年《四川省地质调查所矿产专报》第三号《四川省煤矿概况》，封面上即标识着“与中国西部科学院合作”的字样。其编者为李陶，此前曾在卢作孚领导的四川省建设厅工作（前述四川省建设厅的《叠溪地质调查记》后面附有借阅者二人名字，一为李陶，二为邓少琴，这些都是追随卢作孚多年而后有成就的人），后来又回到西部科学院，再到四川省地质调查所的。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昱春在《弁言》里说：“自从民国十八年夏赵亚曾及黄汲清先生由陕入川为我们人士研究四川地质之始，于今凡十有二年”，这也与卢作孚邀请科学社来开年会是同步的。



图六十五：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

多重身份使得卢作孚在资源整合上，有人脉及资源诸方面的支持，这应该是使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民国能持续达23年，直至国民党败退大陆才消亡的原因。但无论怎么样，他所做的乡村建设运动，其发力的核心是其社会企业家解决社会问题的理念。而社会企业应该是最近十几年才在全球开始流行开来的一种属于NGO型态下的新理念、新的运营方式，但并不是说这些理念与经营方式没有流行起来以前，就没有人这样做过。如今一些有名的大企业都有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这些企业社会责任部门，有的与比较有名声的传媒如《南方周末》等合作做社会救助，有的则与专业的NGO组织合作，有的则干脆由自己的人利用公司休假小范围内实施，有的则变成了一种拿钱买企业美誉度的方式，有的甚至成了替企业做危机公关、发放封口费的部门，这后一种情形当然不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而是企业没有社会责任。

而我们必须明白，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企业家运营的旨在改善社会诸多方面问题的社会企业有很大的区别。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在解决股东分红后，将企业利润一部分拿来投资，另一部分拿来做社会事业，改善社会的一些弊端，增加就业机会，使其企业的壮大与社会事业的运行相得益彰。如今像美国有名的阿育王基金会，作为社会公众服务变革的推手，就是扶持社会企业起步，从而成就改善社会诸多领域的事业。

卢作孚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之路》一文中，强调了他的组织建设和公司运行的集团思想。他举了自己所经营的三桩事业之试验：如1921年的成都民众教育馆、1925年民生公司、1927年峡江团防局的乡村建设与集团的关系。单举他对民生公司个人与集团关系的说法，以概全体：“我们的预备是每个人可以依赖着事业工作到老，不至于有职业的恐慌；如其老到不能工作了，则退休后有养老金，任何时间死亡有抚恤金。公司要决定住宅区域，无论无家庭的、有家庭的职工，都可以居住。里面要有美丽的花园，简单而艺术的家具，有小学校，有医院，有运动场，有电影院和戏园，有图书馆和博物馆，有极周到的消费品的供给，有极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习惯。”（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P340，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卢作孚一直阐述人应该从只注重家庭到注重组织和社会，这样才能造就良好的社会与事业，这当然是他受日本新村运动的影响所致。为什么如此说呢？卢作孚1919年在《川报》当记者、编辑，又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自然不免受彼时《新青年》上周作人所写关于日本新村实验的影响。加之他作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对国家兴亡的看重，以及他的乡村——国家现代化情结，使得他对团体的作用看得异乎寻常地重，而这样的社会尝试与理念一直贯穿着他在1949年以前所实施的乡村建设。

新村运动理念，加上劳工神圣的口号，对底层的关注——起于底层的卢作孚办力夫学校、张贴于报纸集市栏等——使得许多人对集体主义乃至民粹主义的力量非常崇信，同时也使得许多人对公平的重视远胜于效率的重视。由此影响像卢作孚这样的企业家，对于计划经济的理念有不少认同，而对市场经济的伟大力量认知出现偏差。因此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公司建设成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小社会”，所以他提倡职工的问题公司解决，公司的问题职工解决，就一点

也不足为奇了。说明卢作孚虽然想通过社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但其办法却在某种意义上有反市场经济的作用，这当然是他及他那一代人急欲国家强大，而最终必然堕入把自己锁牢的乌托邦。



图六十六：2012年5月2日，北碚卢作孚纪念馆开馆。

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理念，看上去的确不错。但没有个人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这个维度作为前提，难免走向自己所提倡之事物的反面。这是我们这些后来真正的行动者和思考者，不能不为之惋惜的。但我必须清醒地指出，这不是卢作孚一个人的“阿卡琉斯之踵”，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傅葆琛等杰出人物，他们的视野并不狭窄，眼光并不短浅，但他们爱国爱到把国家置放在个人之上的做事与思考维度，使得他们的建设不免呈现国家压倒个人，或者国家主义掩盖个人主义的残酷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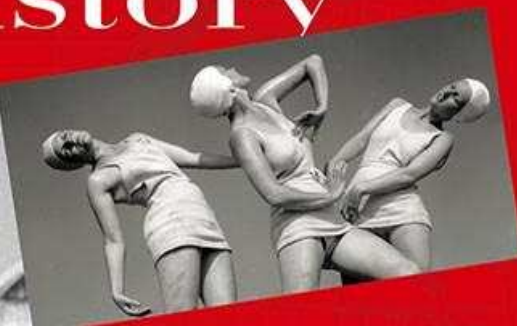
在这里记录中国



关注信睿微信 了解变化的中国

我们的历史

our history



最恶的美
纳粹极权的精神大法



新历史合作社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品：新历史合作社
总第4期

主编：唐建光
副主编：杜兴
责任编辑：潘晶
主笔：庄秋水 杨东晓 刘永峰 毛剑杰 何书彬
图片编辑：卫超
封面设计：刘杰

市场总监：夏茉茉
品牌推广经理：石晓倩
产品经理：赵凌子
行政专员：刘美玉

唐建光 (tangjianguang@vip.sina.com)
杜兴 (duxing722@163.com)
潘晶 (racine93987@hotmail.com)
庄秋水 (zhangling0301@126.com)
杨东晓 (cnydx@163.com)
刘永峰 (13671399840@163.com)
毛剑杰 (maojianjie999@hotmail.com)
何书彬 (yurangqiao@yahoo.com.cn)
卫超 (dawei781022@126.com)
刘杰 (jieliu1998@sina.com)
夏茉茉 (cskbzhy@126.com)
石晓倩 (ziyeshiwodi@163.com)
赵凌子 (yikubaobao@163.com)
刘美玉 (422646834@qq.com)

关于我们

我们的历史 our history

“我们的历史”是新历史合作社推出的历史产品品牌。由这本数字杂志开始，您将会看到以“我们的历史”为统一品牌的网络产品、图书产品、活动产品、纪录片、电视节目，以及微信、微博等多种媒体形态呈现并传播的历史内容。

从纸张到电子，从文字到影像，从眼睛到心灵，无论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的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新历史合作社

我们关注历史，我们致力传播；我们执着真相，我们求索答案；我们回望过去，我们前瞻未来。

这是一个专注于历史记录与传播的同人平台，欢迎您的关注、参与和加入。

联系我们：

新浪微博：我们的历史-OURHISTORY

腾讯微博：我们的历史

公众微信：我们的历史

编辑部 010-57423216

产品部 010-57423217

市场部 010-57423218

传真 010-84084564

公共邮箱：ourhistory2013@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8号

目录

开篇

来自历史深处的希特勒美学

音乐：瓦格纳奏出的主旋律

建筑：坍塌的“日耳曼尼亚”

电影：帝国的浮尸

莱妮·里芬斯塔尔：希特勒的御用导演

艺术品：为了元首的画廊

极权艺术的时代同志

开篇



开篇图（图一）：1939年4月20日，纳粹为庆祝希特勒50岁生日举行大规模阅兵式集会，党卫军和空军追随者以及数千名市民参与。

1932年5月，女演员莱妮·里芬斯塔尔中断新片拍摄，去密会她仰慕已久的领袖希特勒。令她喜出望外的是，她的偶像希特勒亲口对她说，他看过她的全部电影，等纳粹一上台，一定请她为纳粹拍片。

这场密会象征性地开启了纳粹“文艺革命”的序幕。里芬斯塔尔既是《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这一法西斯美学代表作的创造者，她本人也被希特勒称为“我的完美德国女人”，其一生从此与纳粹美学联系在一起。

与莱妮一样，一批听命于纳粹的导演被网罗在宣传部周围，包括“战争片贩子”卡尔·里特尔、“巴洛克法西斯”维特·哈尔兰、金发碧眼的瑞典女星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以及具有吉普赛野性魅力的莎拉·莱安德。他们为纳粹炮制出一部部轰炸式的军政宣传片和洗脑式的娱乐片。

《意志的胜利》是戈培尔、里芬斯塔尔和施佩尔的联袂演出。“帝国建筑总监”施佩尔为片中纽伦堡大会设计了宏伟的会场，他更是希特勒演讲阳台、新总理府和柏林奥运会主体育场的设计者。如果不是被战火打断，他还将与希特勒共同筑造新柏林——“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

希特勒坚信，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地位与国家政治强弱成正比。他将个人品味标榜为官方的权威艺术，将现代主义艺术流派斥为“堕落艺术”。希特勒更从攻占的各个都市里购买、抢占艺术品，装扮他家乡林茨的博物馆，宣告艺术上的征服。

1945年5月，在电台广播瓦格纳歌剧乐章《众神的黄昏》的主旋律中，希特勒与纳粹帝国走向了休止符。然而纳粹美学远没有落幕。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甚至变成了殿堂级的电影经典，让那些偏爱史诗的导演们暗自模仿。

邪恶如何将美丽锻造成武器？极权主义艺术的魅惑从何而来？观众为何痴迷或者臣服于它？

来自历史深处的希特勒美学

一个来自林茨的年轻画家流落艺术之都的街头，一遍遍摹画奥地利新古典主义时代的绘画，勾画心目中象征德意志精神的教堂的草稿。他仍能观赏到席勒的《威廉·退尔》和瓦格纳的《黎恩济》，手边也许就有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做注解。有朝一日，这位名叫希特勒的艺术家（至少他自认为是）将把世界版图作为自己的画布，创造出不可一世的“艺术”奇观。同时，毁灭掉更多的美好。

文/邱实

1784年，“太阳王”路易十四向画家达维特订做了《荷拉斯兄弟之誓》。与他的要求不同，画中的三兄弟向父亲手中的宝剑平伸出右臂行礼。这种庄重的敬礼在被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使用之前，是古罗马人的礼仪。三兄弟以此表明为城邦牺牲的决心。



图二：《荷拉斯兄弟之誓》

这幅油画向来被视作新古典主义的代表，这是一个致力于扫除巴洛克与洛可可艺术的奢靡风，复兴古希腊罗马艺术凝重、高贵风格的仿古流派。从法国波旁王朝到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绝对主义君权空前壮大的欧陆帝王们聘请画师装点宫廷，而他们仿效的古典主义，不乏来自令人战栗的罗马暴君。

“我接受了一座砖砌的罗马，却留下一座大理石的城市。”罗马帝国的开创者奥古斯都曾骄傲地宣告。他在罗马城内竖立80尊自己的雕像，为新兴的帝制壮声威。高耸的罗马廊柱、引水渠和华丽的浴堂，成为他的绝对权力凝固的注脚。而他的后代尼禄，一个有着狂热艺术执着的皇帝，又从大火灰烬中重建出巍峨宫廷。当18世纪的帝王仰慕尼禄的建筑时，已经忘了他如何死于民众的愤怒。

罗马人也在模仿希腊，尤其是奥林匹斯山上无与伦比的众神雕像。罗马人将死者的面容制成肖像，将和谐而健美的肉体凝固为大理石雕像，这些被18世纪后的德意志艺术家反复赞美。从《浮士德》到《威廉•退尔》，歌德、席勒这一批“狂飙突进”运动艺术家，将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于超凡的帝王与英雄。面对拿破仑的大军，德意志人只能向天空中仰望自己的统一国家。

当普鲁士终于统一德意志时，从巴黎迎回了曾被拿破仑夺走的胜利女神雕像，将之装上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勃兰登堡门。“德意志精神”终于获得肉身。史诗是第二帝国的特产，瓦格纳创作出演出时长十多个小时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重写日耳曼的英雄传奇。



图三：《尼伯龙根的指环》演出场景

同时代的尼采批评道：“隐藏在千百种象征中的捉迷藏，五彩缤纷的理想，把青年人引诱到瓦格纳身边了”。尼采不愿被歌剧征服，却执迷于征服别人。他说“人应该被超越”，强力旺盛的生命应当消灭虚弱萎靡的存在，“（只有）战争能正在衰弱的民族灌输粗犷的精力、无情的憎恨……震耳欲聋的灵魂激荡。”

于是，在1913年的维也纳，我们见到了这样的一幅图景：一个来自林茨的年轻画家流落艺术之都的街头，一遍遍摹画奥地利新古典主义时代的绘画，勾画心目中象征德意志精神的教堂的草稿。他仍能观赏到席勒的《威廉·退尔》和瓦格纳的《黎恩济》，手边也许就有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做注解。



图四：希特勒于1912年绘制的教堂

有朝一日，这位名叫希特勒的艺术家（至少他自认为是）将把世界版图作为自己的画布，创造出不可一世的“艺术”奇观。同时，毁灭掉更多的美好。

音乐：瓦格纳奏出的主旋律

瓦格纳肯定无法想象，他的极具感染力的表现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反抗暴政精神的音乐作品，竟然这样成了他死后6年才出生的一个人的精神向导，这一个人叫希特勒。

文/杨东晓

1945年5月1日的晚上，正在播放《众神的黄昏》中一个片段的德国电台突然插播了一条新闻——希特勒的死讯。这出希特勒最喜爱的歌剧，曾经无数次在纳粹党大会召开或群众集会上响起，这一次，是为他送行。

头天下午，在苏军的重重包围下，阿道夫·希特勒消失于卫士点燃的火海中，他本人、他的大德意志帝国，一如他所热爱的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众神的黄昏》里最后一幕，连天大火吞没了瓦尔哈拉天宫，众神同归于水深火热之中。



图五：理查德•瓦格纳

62年前，也就是希特勒出生前6年，瓦格纳的遗体经慕尼黑运回他的家乡小镇拜罗伊特时，慕尼黑车站上，瓦格纳的崇拜者演奏的，正

是瓦格纳的巨作《众神的黄昏》中的“齐格弗里德的葬礼进行曲”。

瓦格纳的左手与右手

“太阳神，到目前为止，已经分别以右手给了我们诗歌的天才，以左手给了我们音乐的天才。可是我们依然热切等待一个人，他集这两种才艺于一身，他能自己写剧词，又能自己谱曲”，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先驱让·保罗说这段话的时候，那位令他期待的人已经出生6个月了，他就是理查德·瓦格纳。

瓦格纳像保罗所期待的那样能左右开弓写歌剧(他自己将它们叫做乐剧)，他是继贝多芬之后，将浪漫主义音乐推向极致的人。他的左手和右手，创造了西方歌剧的一个高峰时代。瓦格纳的歌剧，通常取材自德国古老的传说和神话，它们有着日耳曼民族悠远的北欧祖先、有着高贵的血统、有着神圣的使命(如保护耶稣最后晚餐中所用过的杯子武士)、有着革命精神的护民官和民众。

生于19世纪的瓦格纳，钟情于史诗的音乐创作，他年轻时漂泊于巴黎几乎走投无路时，仍在拼命展现他理想中的崇高世界和人物：14世纪中叶，带领罗马市民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国的黎恩济。但这是一个悲剧人物，民众对黎恩济的误杀，导致自由与共和的毁灭。在1840年12月写给德累斯顿奥古斯特二世的信中，他表露了自己内心：“总是有一团火样的愿望时时在沸腾，这就是把我最好的艺术创造力献给我的德意志祖国，受这种心愿的驱使，我在巴黎完成了一部大型歌剧，《黎恩济》。”(赵鑫珊：《瓦格纳·尼采·希特勒——病态人格分析》)



图七：1869年，《黎恩济》演出场景

瓦格纳肯定无法想像，他的极具感染力的表现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反抗暴政精神的音乐作品，竟然这样成了他死后6年才出生的一个人的精神向导，这一个人叫希特勒。

理查德·瓦格纳还是一位将荒诞、神话般幻想同哲学混杂在一起来体现日耳曼精神的哲学家。而这种由艺术体现出来的哲学，也为希特勒的政治哲学所用。

怀有英雄情结的少年

阿尔道夫·希特勒初一学习不好，留了一级。在留级的这一年里，他依然故我，对各种艺术充满兴趣。1901年，这个12岁的奥地利日耳曼少年买站票在兰德斯剧院听了场早已听说过的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



图八：绘制于1880年，《罗恩格林的降临》

德国中世纪传说、童话中由天鹅牵引而来鸽子牵引而去的贝壳船、银甲武士、圣境般的前奏曲、英雄的悲剧、激扬爱国主义的歌词“不论是东部，不论是西部，利益都是相关的：只要是德意志的人，就应该起来作战”，深深地感染着少年，使他对古代德国曾有过的崇高和壮丽的世界无比神往。

他当时的伙伴奥古斯特·库比席克曾经回忆说“瓦格纳对于我朋友而言，远不止是一个偶像或者追赶的榜样那么简单。我只能这么说，他的言行举止无不‘显现’出瓦格纳的性格特征，简直犹如被瓦格纳灵魂附体一般。”(奥古斯特·库比席克：《我所认识的青年希特勒》)

此后十多年里，即使食不果腹，希特勒也会每周买站票去听瓦格纳的歌剧。瓦格纳那些取材德国古老传说和历史故事的乐剧，洋溢着德意志民族主义精神，主题总不外乎“民众拥之为首领，共同反抗异族统治，祖国终得自由”，

史诗性与英雄情结牢牢地抓住这个少年，“被瓦格纳灵魂附体”的希特勒突然变了，在这一学年结束时，留级生课程全部及格、操行成绩为“良”、勤奋程度得了“优”。这是他学生生涯可以圈点的一年。

瓦格纳这位右手写诗、左手谱曲的天才，从此走进希特勒的生命。对瓦格纳的崇敬从此时起，随希特勒生命而终。库比席克回忆中，已成元首的希特勒曾叫人在拜罗伊特为他专门演出瓦格纳的作品，当时他感动得流泪，恨不得与这位上个世纪的天才执手亲谈。

1939年，希特勒专程到拜鲁伊特欣赏了歌剧《黎恩济》，演出结束后他郑重地对瓦格纳的后人说，“蜕变就从那一刻开始。”他指的是，他17岁那年，站着看完了瓦格纳的《黎恩济：罗马最后一个护民官》的时刻。



图九：绘制于1848年，油画作品《黎恩济发誓要获得正义》

库比席克认为，希特勒从瓦格纳的作品中不仅看到了他相信的，所谓“古今德国，精神轮回”的证据，而且这些作品还巩固了他这样的信念：远古世纪的某些风俗或精神必能为今所用。

两个贫穷的年轻人，希特勒与库比席克合租房子共同生活，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珍藏着一本《德国英雄传说》。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毫不含糊地指引着他，“民族主义思想根植在他脑中，成了他坚定不

移的政治信仰”。从他16岁到56岁自杀，他始终都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音乐中的“邪恶血液”

瓦格纳对犹太人很反感，发表过不少反犹太人的主张。

他的反犹主张，恰恰又与自己死后6年才出生的希特勒不谋而合。

希特勒30岁那年，正逢德国在一战败仗后签订了凡尔赛和约，他的志向是再造德国的俾斯麦时代，他要降低失业率、打击贪污，打击“为富不仁”的犹太人。这些政治主张得到广泛支持。给他赢得不少好名声，民众投票结果，“民族社会主德意志义工人党”(纳粹)成为第二大党。

希特勒1923年发动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入狱，在口述他的第一本书《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后改为《我的奋斗》)时，明白地提出：要是犹太人靠了马克思教义的力量，战胜了世界各民族，那么这皇冠便将成为人类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将空无人类而运行于太空之中，和数百万年前一样。

他发愿“谨遵造物的意旨，和犹太人奋斗，这就是我在代上帝行事。”与犹太人势不两立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德奥，国内商业和国外贸易几乎都被会做生意的犹太人所把持。

在希特勒向马克斯·阿曼口述他的《第二本书》(也作《希特勒的第二本书》或《通往崛起之路》)时，希特勒又提出了一条主要结论，“自我保存”与“生存空间论”是紧密联系的。他认为“纯血若与劣血相混合，灭亡也就近在眼前了。到那时，犹太人便可用任何形式登记，这个国际放毒者和腐蚀者就会不遗余力地将这种民族连根拔掉，腐蚀掉。”

从歌剧所表现的遥远古代，瓦格纳寻脉日耳曼民族那些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祖先，这也成为希特勒在血统上认祖归宗的法宝。他认为雅利安日耳曼的高贵血统只能纯而又纯，不能被犹太人所混血。

这是希特勒第一次将种族、人民和血缘的价值与排犹联系在一起：犹太人的最终目标是非民族化，使其他民族变劣，降低高等民族的种族水平，以及通过铲除某一民族的知识阶层并用其成员予以代替的办法，统治混种的民族。

在希特勒看来，犹太人就是人类的威胁，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全世界，那么，“反犹斗争就不单是为了德国而且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

不仅排犹，希特勒还要拓展德国人的生存空间，他拓展的依据，同样来自古老的历史故事，也来自歌剧，那就是“朝向那东方的土地”。

在他极具鼓动性的演讲中，希特勒不止一次地要求年轻人温习英雄史诗般的东进，1942年2月13日在柏林体育馆对后备军官团的讲话时，他再次提到：在我们现在所做的，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先例，我们的先辈早就跟我们做得一模一样。

他的这些东进的妄想，有可能来自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里面曾有写道：“弗里德利希把眼光注视着东方”。给德意志民族留下一块丰碑，是瓦格纳心中最崇高的艺术，被英雄情结所震撼的希特勒，则认为自己“一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回向瓦格纳。”

这是希特勒剑指东方的开始，东方就是苏联。到东方去征服更大面积的生存空间、以及让犹太人灭亡，成为希特勒时期的“德意志精神”。

德国中世纪的神话和传说，就这样病态地成为希特勒的政治哲学。

希特勒用他的强力意志和号召力，裹胁了整个德意志的意志。

第三帝国的主调与杂音

由于希特勒本人对瓦格纳音乐和哲学的偏爱，使得瓦格纳从第三帝国时期到大德意志时期，一直被奉若神明。

德意志民族是个热爱音乐的民族，瓦格纳音乐本身所有的崇高、庄严、壮丽，也正是德意志精神的体现。

被音乐感染了的希特勒，再次用这些音乐去鼓动德国民众。

行进的德军古德里安装甲师中，长龙般的重型坦克向苏联东进，持枪的步行军人和架有高音喇叭的装甲车一道行进，高音喇叭中播放着瓦格纳昂扬的序曲；在纳粹党召开大会或发动群众集会时，都要演奏希特勒偏爱的《众神的黄昏》中的片段；1933年，希特勒开始他12年执政的国会就职典礼上演奏的是《纽伦堡的名歌手》。《黎恩济：罗马的最后一个护民官》，这个原本表现爱民如子的护民官形象的音乐，更是响彻第三帝国的各种正式仪式。



图十：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现代版《纽伦堡的名歌手》舞台场景

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播报德军空袭时，配乐就是《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女武神之骑》。对于征战的双方，在空袭将要来临之时，听到这首乐曲，感受可是天渊之别：掌握制空权的一方，从铜管乐为主的乐队于各声部上奏出急促的波音音型，以及圆号时隐时现主导动机中，能听到女武神的华丽和英姿，从女高音在High C的持续盘旋能激荡出听者内心的不可遏制的激昂。然而，四处奔突的一方，则会觉得急速的波音音型就像催命的马刀或炸弹，而High C的女高音，更像追

魂的啸叫。这种不同的音乐效果，在战争中起到截然相反的心理催化作用。

但是，整个纳粹德国并非如他们的元首所希望的那样沉浸在瓦格纳的音符中。《瓦格纳家族》的作者乔纳森·卡尔认为，即使是忠心耿耿的纳粹党徒，也未见得像希特勒那般热爱瓦格纳。

尽管希特勒在拜罗伊特的讲话以及瓦格纳作品公演盛况的纪录片，让后人以为，瓦格纳音乐即纳粹音乐，但事实上，就连希特勒的秘书特雷德尔·琼格在回忆中也有透露，很多纳粹成员并不像他们的元首那样热衷于瓦格纳的音乐，他们其实很反感那些一演出就是4个多小时的“宏大史诗”。但是希特勒活着的时候，这种反感谁也不会表现出来。

纳粹德国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回忆，有一次希特勒去观看《纽伦堡的名歌手》，发现坐席稀稀拉拉，不胜愤怒，将巡逻队派到街上，见人就拉，拉来过一些听众。

纳粹德国并不只会用瓦格纳的音乐来凝聚民众，只要是能起到聚众效果的音乐，他们都不会抛弃。

爵士乐风靡欧洲时，纳粹德国对这种通俗音乐非常不屑，认为这是堕落的东西，会毁了德意志精神，会破坏日耳曼的纯洁。戈培尔说爵士是“罪恶巴比伦”。

他们同时明白，即使是被巡逻队拉进剧院的人，也有在剧场里睡着的可能——的确曾发生过包厢掉下来的事故，而里面的听众全在睡觉。收音机中轻松的爵士乐倒是有不少听众。这倒可以利用爵士乐，再吸引一批民众。

于是戈培尔着手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爵士乐队，这样能够保证在政治上与纳粹保持高度一致。与纳粹高官关系熟络的次中音萨克斯管演奏家卢茨·滕普林成了戈培尔宣传项目中“爵士乐攻势”的首选人物。几个月后，第三帝国的收音机里已经能听到新组建爵士乐队的作品。

这支乐队的阵容也称得上强大，乐手本来就是人们所熟悉的鼓手和号手。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德国爵士乐队演唱的曲目，只有第一段，从第二段开始，就开始“为我所用”：不是骂丘吉尔，就是骂罗斯福；而盟军是在妄图为犹太人造福，这样，德意志爵士乐的目标算是达到了。



图十一：1938年5月，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激情讲演

“德意志精神”的后遗症

12年零4个月的纳粹运动和希特勒排犹、东进的生存扩张，在《众神的黄昏》中落下帷幕。存活下来的德意志人，对当初曾令他们疯狂的那些东西，有了另外的感受。

1993年6月，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赵鑫珊受艾伯特基金会的邀请到德国访问。在科隆电视台采访部主任的家宴上，这位50年代北大德语专业的老大学生，表达了他从青年时期起就敬佩德国的科学、艺术和哲学伟大传统，他说自己“强烈感受到了里面有一种德意志精神弥漫，那是德意志民族魂”。

突然间，他发现主人表情变得既严肃又尴尬。他意识到，“德意志精神”这个术语引起的误会——因为纳粹经常用它。希特勒将“德意志精神”直接表达为德意志灵魂，他本人和他最忠实的仆从、一家八口随他自杀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经常把“德意志精神”挂在嘴上。

赵鑫珊马上解释：德意志精神这个术语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看谁作出什么样的解释。比如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叫法本来是没有问题，但一些纳粹分子认为有一种叫犹太科学的东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便是犹太物理学。纳粹科学家说，纯正的物理学是“德意志精神”的产物，所以为了同犹太科学划清界线，在纳粹德国时期居然出现了这样一荒诞的叫法，德意志数学、德意志物理学、德意志化学(赵鑫珊：《瓦格纳·尼采·希特勒——病态人格分析》)。这番细致的解释，才使晚宴的主人恢复了先前平和、微笑的状态。

希特勒死后，德意志被两个世界所分裂。

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又从分裂走向统一。

德国在忏悔和反思中复活。

建筑：坍塌的“日耳曼尼亚”

“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能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希特勒

文/芮虎

2013年二月，在哈佛大学建筑设计学院举行了一次名为“关注柏林”的学术论坛，为期三日，参加者多达百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著名的建筑学专家和历史学家。大会由著名的建筑艺术研究专家摩斯（Stanislaus von Moos）主持，讨论了柏林从二次大战后到今天的建筑发展过程。哈佛建筑艺术学院院长斯特恩（Stern）在开幕词中说：“柏林城市每一幢建筑几乎都是政治论争的结果。”

出人意料的是，这次论坛的讨论高潮竟然是关于柏林纳粹时期的建筑。来自卢森堡的建筑艺术家克里尔（Léon Krier）认为，由希特勒及其首席建筑师施佩尔（Speer）等人设计的柏林老建筑之所以不为人注意，是因为它们出自于纳粹之手。克里尔说：“希特勒是一个魔鬼，但是，他也是一个懂得建筑艺术及其品级的人。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赞扬一个伟大的建筑设计师，虽然，他同时也是一名罪犯。”克里尔还认为，纳粹时期的建筑比其它部门，比如大众汽车或生产战争所用炸弹的工厂更遭致人们的批判。

纳粹时期的建筑艺术，与希特勒本人在战后德国所遭到的命运何其相似：整个社会对此几乎是三缄其口。随着希特勒《我的奋斗》即将解禁，纳粹建筑也日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为恶魔筑城

说到纳粹建筑，除了希特勒，有一个人至关重要，这就是希特勒的“帝国建筑设计总监”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

施佩尔出生于一个建筑设计世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曼海姆的建筑设计师。施佩尔先后在德国的几所大学攻读建筑设计，最后，投师于柏林工业大学建筑设计教授特塞诺夫（Heinrich Tessenow）门下，毕业后留校做其助手，直到1932年。1930年底，施佩尔听了一场希特勒的政治演说，被希特勒的政治激情所征服，次年三月，他即申请加入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劳动党（NSDAP），简称纳粹党。



图十二：施佩尔与希特勒探讨柏林新轮廓建筑方案

后来，施佩尔认识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并为他的宣传部大楼做改建设计。那时，正值1933年，适逢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的第一个5月1日。戈培尔又命施佩尔为庆祝大会设计主席台旗帜。施佩尔设计了几条45米长的旗帜，如一张张巨大的船帆高高地飘扬在主席台上，气

魄非凡。对此，法国驻德国大使弗兰索瓦-彭瑟写道：“聚光灯停止之处，元首闪亮登场，看起来，他好像站立在一艘童话船上，立定在波涛起伏的人群之上。顿时，如教堂一派寂静。元首开始讲话。”这是施佩尔的设计首次在希特勒面前亮相。

后来，通过为纳粹政府设计包括纽伦堡运动场等一系列建筑，施佩尔受到了希特勒的青睐。1934年1月，希特勒的建筑设计师特鲁斯特（Ludwig Troost）去世，希特勒就将第三帝国的主要建筑都交给施佩尔负责设计。1937年初，希特勒还专门为施佩尔量身定做了一个职位——“帝国建筑设计总监”，简称“GBI”，并亲自为施佩尔选定位于柏林巴黎广场4号，原属教育部的大楼作为总监办公大楼。



图十三：1938年9月8日，纽伦堡体育场举行的体操表演

这一年，在巴黎国际博览会上，德国与苏联的展馆被安排为相对而立。在展馆建筑实施之前，施佩尔不经意看到了苏联展馆秘密置放的模型，见苏联展馆上方有一群人的雕塑，在欢呼胜利似地朝德国展馆迎面走来。于是，施佩尔就在德国展馆屋顶上设计了一支箭，带着沉重的立方体，仿佛要挡住对方的冲击力，又仿佛是迎面走来的人看到了德国展馆上饰有纳粹十字符号的鹰而停住了脚步。结果，在这次博览会上，施佩尔和苏联人设计的展馆都获得了金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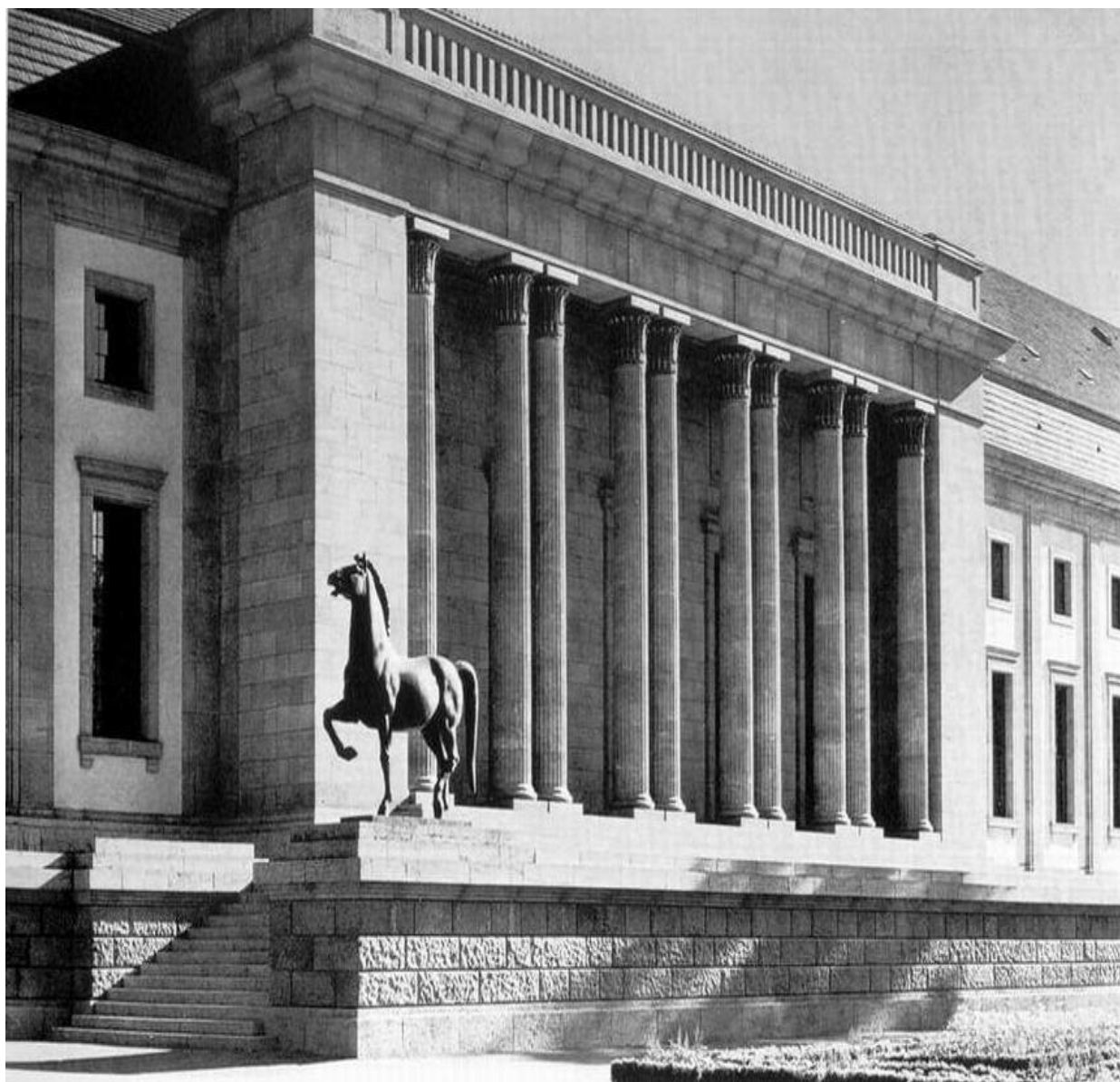
图十四：1937年巴黎国际博览会德国与苏联展馆相对而立



图十五：1937年巴黎国际博览会苏联展馆设计图

到了1938年秋天，施佩尔属下已经拥有一个包括87名成员的设计团队。施佩尔月薪高达1700帝国马克，比柏林市长还高一些（柏林市长薪金1650马克）。并且，施佩尔的工作直接隶属“元首”，在第三帝国权力机构中，后来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在希特勒自杀之前，还亲自选定施佩尔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建筑总监部所在的大楼是一幢古典建筑，十八世纪修建的小宫殿，十九世纪有所改建，高贵而简洁，其普鲁士古典主义建筑风格还保存良好。更重要的是，与帝国首相府中间仅仅隔着一座大臣花园（Ministergaerten），两边来往可以不必引人注目。在后来的几年中，希特勒几乎每天都要在夜幕降临之后，光临施佩尔的设计室。他们常常对着设计台，讨论着柏林城市的未来。希特勒在各式各样的建筑中提出自己的设想，他还把自己亲手画的草图挂在墙上与施佩尔进行研究，两人长时间地沉浸在未来的建筑梦想之中。



图十六：施佩尔建筑总监办公大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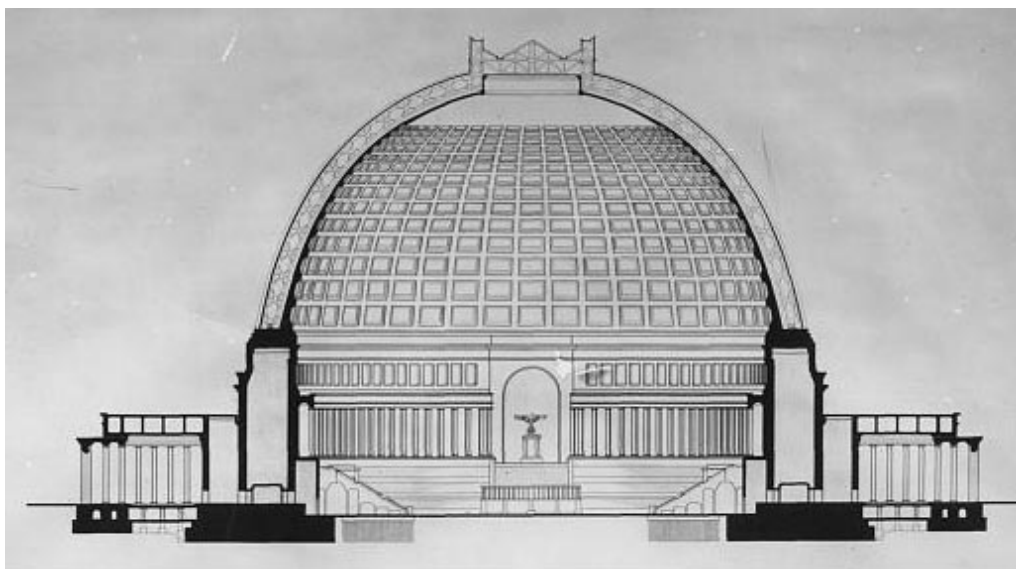


图十七：希特勒在施佩尔设计室讨论设计方案

希特勒的艺术梦

其实，希特勒也是一个建筑艺术家。

早在1925年，希特勒就为柏林穹顶大厦（Große Halle）绘制了一张草图。在1926年7月，他的宣传大师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他谈到这个国家未来的建筑设计图景，简直就是一个建筑师。其中，他为之画了一个崭新的德国形态图，他简直就是一个国家艺术家！”



图十八：穹顶大厦草图

在1929年4月的一次讲演中，希特勒从政治与心理层面阐释了雄伟建筑的重要意义。他坚信：国家只有通过“整个思想和感觉的重新塑形，国家观念与观点”才能留存下来，“如果只有百货商店与工厂建筑，只有高楼大厦和酒店，我们是难以想象第三帝国的，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个必须显示出第三帝国艺术与文化的文档，使之千年长存……我们看看以往的古典城市，看卫城，帕特农，斗兽场，看中世纪的城市以及那宏大的教堂，以及……应该知道，人类需要这样的中心，如果他们不想被摧毁的话。”

1933年1月30日，对于希特勒是一个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登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夜晚，当欢呼庆祝的声音逐渐消失，人群离去，希特勒和几个亲信在帝国首相府聚会，直到晨曦降临，希特勒还在进行永无休止的独白，叙述他这十多年来的努力奋斗，今日的成功。他以转世说的图景来描述，如果没有来到德国，这里将会如何。帝国建设百端待举，不过，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改建他的帝国首相府。他认为，目前首相府的状况“没有尊严”，“纯粹是一个香烟盒”。希特勒坚信，柏林有朝一日将成为世界首都。



图十九：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的首日在窗边向支持者致意

其实，根据施佩尔的回忆，希特勒常常感叹道：“我如果是一个建筑设计师该多好啊！”他早年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时，就对欧洲古典建筑，特别是维也纳和巴黎的城市建筑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甚至对这两个都市的标志性建筑的一些细节都了如指掌。在与施佩尔讨论柏林建筑设计时，他常常会举出巴黎的凯旋门、维也纳的霍夫堡、市政府、音乐厅、国会大厦等建筑来加以佐证。

在施佩尔的设计室里，希特勒告诉他：“这些草图我十年前就画好了。我总是在不断完善它们，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总有一天我会

修建它们。现在，我们要实现它们。”他还告诉施佩尔，在1853-1870年间，法国城市规划师奥斯曼对巴黎街道的改造，耗资25亿金法郎，使他成为历史上伟大的城市设计师，希特勒也希望施佩尔像奥斯曼那样，在打造柏林城市的工作中做出贡献，成就千古美名。

1940年6月22日，法国向德国投降，希特勒迫不及待地率领以施佩尔为首的艺术建筑设计师们飞到巴黎参观那些辉煌的建筑，其中包括拿破仑的陵墓。为了进行这个建筑艺术的考察，本来计划在香榭丽舍大道举行的胜利阅兵式也取消了。希特勒称去巴黎是“他生命的梦”，现在，梦已成真。他在飞回柏林的途中，对施佩尔说：“巴黎不美吗？但是，柏林将比它更美！当我们修成了柏林，那时，那里将只是一个影子。”



图二十：1940年6月22日，希特勒与施佩尔（左）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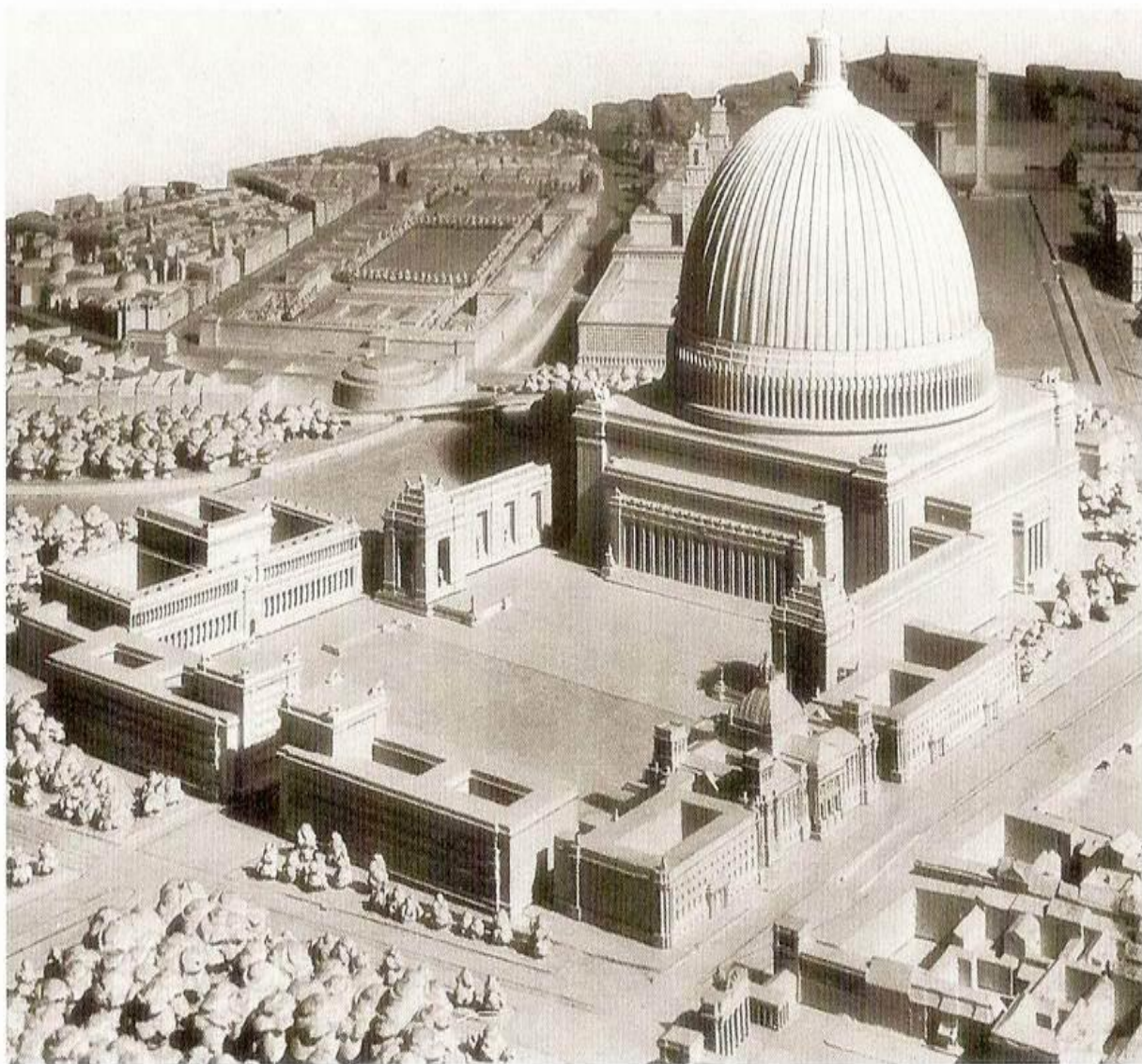


图二十一：“日耳曼尼亚”规划模型图

1942年3月，希特勒正式对柏林的城市规划指定了目标：“柏林将成为世界首都，只有古代埃及，巴比伦或者罗马才可以相提并论！而伦敦、巴黎则将望尘莫及！”6月，他正式使用了日耳曼尼亚（Germania）这个名称来替代建设设计中的未来柏林。

未来帝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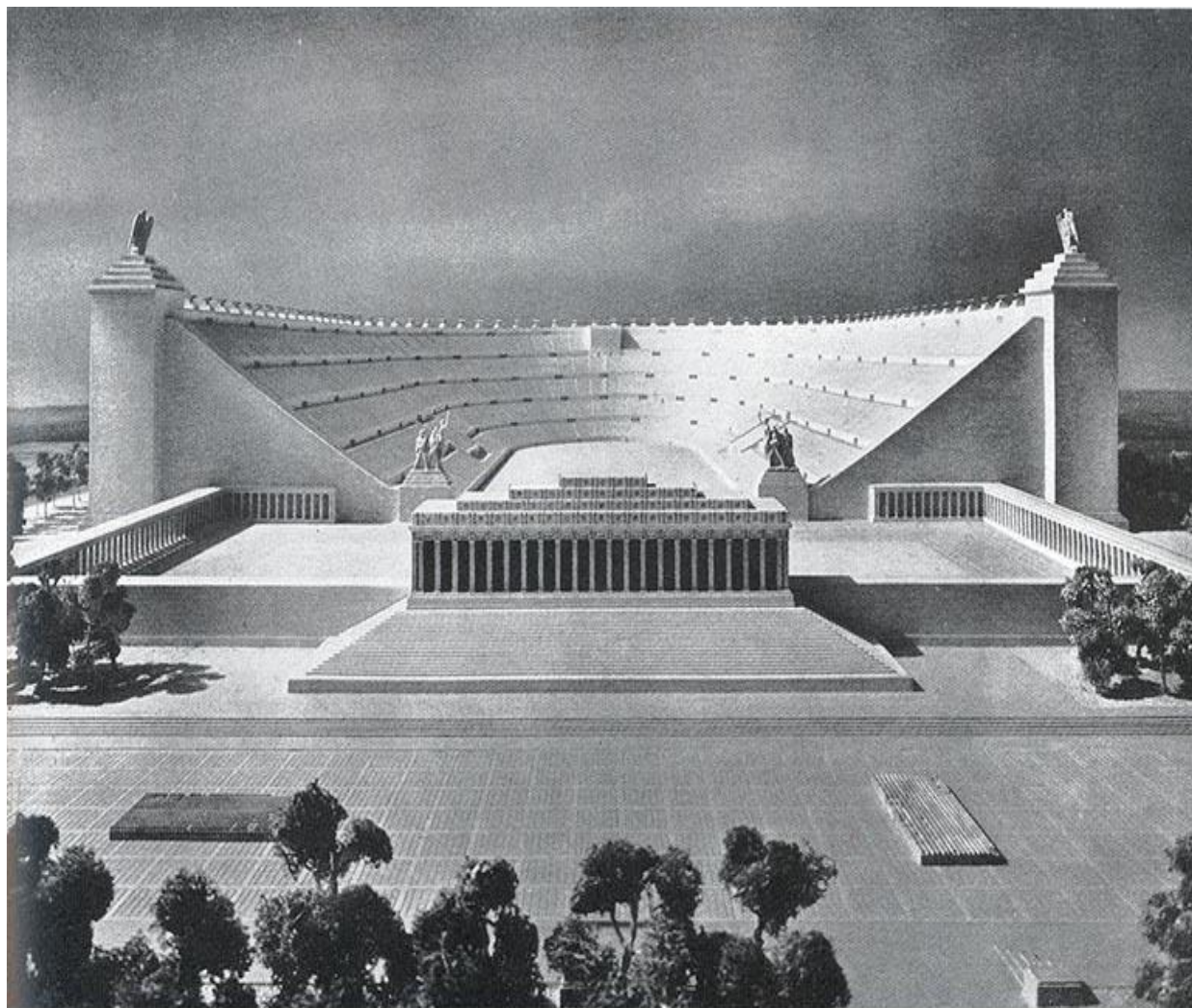
在施佩尔就任帝国建筑总监时，希特勒就明确告诉他，柏林作为未来世界的首都，应该像纽伦堡那样，设计一条“天堂大道”，作为城市道路的中轴，应该至少分别有5公里长，宽120米。当时的柏林市长考虑到现有建筑的保留，坚持只能修90米宽，被希特勒私下痛骂，最后，被希特勒撤掉了市长职务。在大道两旁是帝国各部门建筑，以及纳粹党中央、大企业、豪华酒店、博物馆、科学研究所等。之间，还要有一些文化建筑，比如歌剧院、音乐厅、话剧院，一座可以容纳6000名观众的大电影院，一座多功能剧院、小歌剧院和一些公共浴场等。在这所有的建筑中，最雄伟壮观的是穹顶大会堂。



图二十二：穹顶大会堂

“日耳曼尼亚世界帝国首都”的最终设计是：东西中轴大道长达50公里，东边是伍斯特马克（Wustermark），穿越勃兰登堡大门，抵达西边的法兰克福林荫大道。南北中轴大道长达40公里，北边是莫阿比特（Moabits），南端是滕佩尔霍夫（Tempelhof）。当施佩尔于1938年1月将这个计划公之于世时，媒体反响激烈。美国《纽约时报》称之为也许是当今世界“最具有雄心壮志的规划”。

作为“日耳曼尼亚”的标志性建筑的穹顶大会堂，早在1925年，尚未发迹的希特勒就开始着手设计了。当年，在他描画穹顶大会堂设计图时，显然是以罗马圣彼得大教堂（Peterdom）与万神殿（Pantheon）为蓝本的。外形模拟了圣彼得大教堂巨大的穹顶与廊柱。通过屋顶没遮挡的空间进行自然采光，则是万神殿的特色。12年后，施佩尔根据希特勒当年的构思，加以修改，并与之日夜斟酌讨论，得到希特勒的首肯。新的设计图上，承载穹顶的立方体明显比希特勒的原图降低，而穹顶至少扩大了三倍。作为建筑支撑物是34根廊柱，分别高达30米。施佩尔在大楼四角增加了四座具有承载作用的塔楼。大楼前，他还设计了两尊分别高达15米的雕塑，象征着“天空负载者”与“地球负载者”。这座大会堂高达300米，相当于近100层的大楼，其中穹顶部分直径250米，里面的大会堂可容纳18万会众。施佩尔制作的主体建筑模型高大雄伟，使下方的勃兰登堡大门（Brandenburger Tor,29米高）和国会大厦（Das Reichstagsgebäude,75米）的模型与之相比，好像两块小小的积木。施佩尔还将其设置在老政府部门大楼群之间，并让其三面环水，通过其水面之映衬，使其雄伟感觉倍增，在火把光亮的照射下这种效果更加强烈。穹顶大会堂前面的广场也非常宽广，足可以容纳百万民众，将作为人们欢庆五月节、国庆节以及第三帝国胜利的地方。



图二十三：象征着“天空负载者”与“地球负载者”的穹顶大会堂广场前雕塑



图二十四：勃兰登堡大门



图二十五：国会大厦

在穹顶大会堂的设计图纸署名之处，施佩尔只注了三颗小星星，表示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作品。当希特勒要求他写上施佩尔的名字时，他不置可否。

这座日耳曼尼亚的标志性建筑于1940年的某日，在“元首”的见证下，节日般地举行奠基典礼，计划是在1950年竣工。



图二十六：博物馆收藏的穹顶大会堂模型

在穹顶大厦附近，施佩尔设计的元首宫（Palast für den“Führer”），以佛罗伦萨的碧提宫（Palazzo Pitti）为蓝本。堡垒式的建筑，沉重而粗拙的方石基座，没有窗户，只有两排廊柱集阵挡在前面，上面安装了可以推拉的防弹窗板，以及一座金属大门。在施佩尔的工作室里，希特勒用一种悲剧的声调假设，并激动地说，如果有民众突发骚动，军队将盾牌作为防御，在宽大的街道上推进，将无人可以抵挡。从宫殿门厅往里行，是一排接待室以及一道长廊，直到一

个庆祝大厅，可以容纳上千人。里面有八个公共空间，占有15000平米的面积，另外还有一个剧场，可容纳近千人。而通往元首办公室的“外交长廊”，长达500米。如果按照设计修建出来的元首宫，将比俾斯麦的首相府，即希特勒当选为总理所入驻的地方大15倍。

作为穹顶大厦的对应建筑，希特勒和施佩尔在大道最南边，接近滕佩尔霍夫（Tempelhof）的地方，安置了一座高达120米的凯旋门（Triumphbogen），其中，廊柱规模之高大，超过巴黎凯旋门的近五倍。在墙上，要镌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180万全部德军将士名单。在凯旋门的近处，是战士大厦，是辛克尔的新卫楼（Neue Wache）放大的巨型建筑，拱形的地下室用原始的花岗岩石块装饰，设置了巨大的照明盆盏的墓穴，将供奉过去以及未来战死沙场的德军前线元帅的棺椁。



图二十七：拍摄于1890年和1905年之间的新卫楼

在1940年之前，希特勒对于柏林的建筑未来，还只是一个不太清晰的宏大构思，正因为如此，施佩尔获得了一个机会，来总体规划一个与时代合拍的柏林城市建筑。要感谢希特勒所给予他的特殊权利，使他可以向帝国政府各部门乃至柏林市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自己的要求，并达到统一规划的目的。接下来的几年内，柏林的城市建设不仅仅是局限在“元首”的宏大构思上，还进行了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建筑设计，比如商业中心、住宅区、交通基础建设等规划。

位于帝国各部的办公楼群之中的戈林的帝国航空部大厦（Reichsluftfahrt-ministerium），高七层楼，里面设有2800个房间，多达4000扇窗户，走廊总长达7公里。1935年由设计师萨格比尔（Ernst Sagebiel）设计修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办公建筑。今天，这幢大楼成为联邦德国财政部所在地。



Bundesarchiv, Bild 146-1979-074-36A
Foto: Hagemann, Otto | Dezember 1938

图二十八：拍摄于1938年，原戈林的航空部大厦

希特勒新首相府（neue Reichskanzlei）是在旧首相府基础上重修的建筑物。对外宣称是1938年1月11日交付设计施工，1939年1月10日竣工。其间，于1938年3月中旬之前拆除旧建筑，8月1日举行奠基典礼。希特勒在奠基典礼上骄傲地宣称：“我的人民同志们，这不再是美国速

度，而是德国速度了！”据称，从设计、图纸、拆除、修建、内部装修、家具、装饰绘画以及地毯安装，一共只花了12个月。外界称之为“组织天才”、“闪电建筑”，同时，它也被视作一个神话。前不久，这张帝国首相府的施工图纸在慕尼黑国家档案馆被发现了，上面署名日期是1934年设计的。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这幢大楼从1935年就开始购买周围的土地，直到1937年，已经为此支付了六百万帝国马克。在1937年9月，施佩尔开示了还需要大约二千七百五十万帝国马克的预算。施工图纸是1937年年中就已经画好了。这个神话直到今天才被戳穿。新首相府里的长达145米的过厅特别令希特勒欣喜若狂，因为它比法国凡尔赛宫里的镜厅长两倍。从接待门到希特勒的办公室之间长达220米。希特勒说：“从接待门到接待厅这么长的路程，他们面对德意志帝国的威力与伟大已经会有所胆怯了！”希特勒称之为“伟大的新德意志帝国的第一座建筑”。首相府建成两个月后，捷克总统哈查在这里签署了降书。1945年7月，帝国首相府建成6年半后，被炸成废墟，希特勒本人自杀在大楼下的地下室。战后，这个建筑被拆毁，其大理石及别的石料用来修建位于柏林的苏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Bundesarchiv, Bild 146-1991-041-03
Foto: o. Ang. | 1938

图二十九：拍摄于1938年，新首相府施工现场图



图三十：新首相府大门



Bundesarchiv, Bild 183-K1216-501
Foto: Hoffmann | 10. Januar 1939

图三十一：新首相府内部过厅



图三十二：1945年7月，攻入柏林的苏联士兵抬起帝国首相府里的纳粹标志作为战利品



图三十三：炸毁的帝国首相府院内一景

“都完全疯了”

面对未来柏林的建筑模型、建筑、广场和廊柱，希特勒只有一次发出感言：新柏林“将使世界上唯一的竞争对手罗马相形见绌”，他相信，“日耳曼尼亚”将充满神奇与魅力，远远胜过麦加或者罗马。希特勒

的柏林将是 他为大日耳曼帝国臣民修建的，在日渐沉沦的世界尘土中书写的原则，是“比三次胜仗还更有价值”。同样，凯旋门是人民永远铭记死亡思想的地方，记住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耻辱。当人们走进领袖宫时，必须具有这样的感觉：拜谒世界之主人。正如1939年初夏，当希特勒面对穹顶大会堂模型建筑时，指着穹顶离地300米的尖顶对施佩尔说：“这里，不再是帝国之鹰站在十字上面，作为世界上最雄伟建筑的皇冠，鹰必须站在地球之上。”



图三十四：希特勒与施佩尔未完的梦

这样争做世界第一的建筑模式，不仅仅是体现在对柏林的都市设计上，还具体表现在其它城市建筑之上。按照希特勒的规划，柏林是世界首都，汉堡是世界贸易中心，慕尼黑是纳粹运动首都，纽伦堡是纳粹党代会之城，而他的陵墓所在地林茨（Linz）则被称为“元首教父之城”。还有其它许多别的城市，纳粹都有新建筑，以展示其留存千年的大而无当的“石头的言语”。比如已经在纽伦堡建成的最雄伟壮观的运动场，计划在汉堡动工的世界上的最高的大楼，为吕根岛（Ruegen）设计的巨大的海滨浴场，还有下劳西茨（Niederlausitz）世界上最强大的电台发射中心，以及在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有史以来最大的可升降的窗户。对此，希特勒说：“这并非来自于我的伟人之瘾，而是来自最冷静的思考，一个民族只有通过这样才能抵达自我意识。这是一个负有历史责任的民族所必须具备的。”当他听说苏联为了崇拜列宁，将在莫斯科修建一座更高大的穹顶大会堂，甫闻之初，他对此反应激烈，近乎歇斯底里。不久，当他通过计算，得知莫斯科的大会堂比柏林的要低20米，才平静下来。



图三十五：1938年9月，纽伦堡纳粹举行盛大的党代会阅兵式现场



图三十六：希特勒在慕尼黑官邸内的大厅议事



图三十七：1938年，德国纳粹举行纽伦堡帝国大会现场

希特勒所倡导实施的建筑理念不是他所成长的哈布斯堡王朝所流行的帝国巴洛克以及新巴洛克风格，也不是普鲁士的古典主义，是一种妄想，是一种他所称之为所谓的“永恒的风格”，不过是用石头诠释的他的感情大杂烩：对戏剧性布景的要求，对令人陶醉的象征永不停歇的欲望以及具有震慑效果的意志。对他而言，罗马是对历史伟人的纪念，法国巴黎是对民族英雄的呼唤，而华盛顿的建筑则是美国之父的共和国神话，第三帝国的建筑应该是可以持续千年的永恒。



图三十八：元首行馆，是希特勒与国内外政要的宴会场所，今为慕尼黑音乐戏剧学院的院馆

希特勒认为，第三帝国的建筑是“伟大的建筑设计，可以留住时间。”1938年1月，在慕尼黑德意志艺术馆的建筑设计及艺术展览会上，希特勒说：“如果人民从内心经历了伟大的时代，必将在外部构建这个时代。这种言语构建将比言说更具有说服力。它就是石头呈现的言语！”（引自H. Weihsman: Bauen unterm Hakenkreuz. Architektur des Untergangs. 1998,S.19）

希特勒还在别的地方说过：“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能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我们的敌人和朋友一定要认识到这些建筑巩固了我们的政权。”这道出了纳粹建筑的精神主旨。

对此，施佩尔后来总结道：纳粹建筑的特征是“洁净与纯粹”、“坚硬”、“清晰”、“高贵”。后来，施佩尔将他与希特勒设计的日耳曼尼亚世界首都的建筑风格冠之以“纯粹的新帝国风格”（reines Neoempire），是与125年前法国拿破仑时代的建筑风格相对而言的。拿破仑时代的帝国风格表现在装饰繁缛，沉迷于金，奢侈豪华，衰败堕落，而纳粹的新帝国风格则不仅仅是表现在风格上，更表现在希特勒对光的不加掩饰以及对建筑体积超大号的追求。

事实上，纳粹建筑的特征是超大的建筑，无限宽广的阶梯，巍峨而沉重的石柱，漫长而直线型的广阔大道以及毫无尺度的建筑设计，冷漠无情，缺乏实用价值。



图三十九：纳粹政府众议院大楼

对于施佩尔而言，他的建筑构思来源不仅仅是古希腊、古埃及、亚述帝国以及尼尼微，他常常梦想成为柏林城市的设计师辛克尔（Schinkel）的后继者，自以为其在建筑领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美国导演塞西尔·德米尔（Cecil B. De Mille）在电影界的影响。他到意大利观摩过不少古建筑，其中，帕埃斯图姆（Paestum）的带多里克廊柱的古希腊神庙给他启示甚大，他后来写道：“帕埃斯图姆征服了我，它就那么简单地立在那里，雄伟而理所当然。”

对于希特勒提出的日耳曼尼亚世界首都的建筑设计，施佩尔也觉得大而无当，认为它完全没有顾及柏林的历史建筑状况，只是希特勒个人自尊自大的意志表现。如果要实现这样的城市建筑，首先要拆除市中心多达五万座住房与商业楼房。施佩尔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设计有代表性的建筑的同时，也考虑到整个城市计划。而希特勒却不这样，他的对永恒建筑的雄心勃勃，使他对另外一些东西不感兴趣，比如交通规划，住宅区安排以及绿色地带设置：社会公众的维度对他而言无关紧要。”

德国战败后，施佩尔在纽伦堡法庭受审，被判处20年监禁。他在柏林斯班岛监狱服刑期间，再次对法国早期文艺复兴建筑风格进行深入研究，并发现，当初他与希特勒的日耳曼尼亚世界之都的设计，是“比较宏大，却不合尺度。”



图四十：包括施佩尔在内的纳粹重要战犯在纽伦堡法庭受审

当年，在施佩尔柏林的建筑设计模型大厅里，不无炫耀地向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建筑设计师展示了他的设计。看完之后，他的老父亲摇着头，耸耸肩，说道：“你们都完全疯了”。后来，意大利著名建筑设计师内尔维（Luigi Nervi）看到了施佩尔设计的戈林宫的楼梯台阶的图片时，说“真是不可置信！这一定是疯子所为！”

阿尔伯特·施佩尔曾经说过：“为了一座伟大的建筑，我会像浮士德那样出卖灵魂。现在，我找到了我的梅菲斯托。”这个魔鬼梅菲斯托就是希特勒。1934年希特勒对施佩尔的妻子说，“您的先生为我设计建筑，4000年来都不曾存在的建筑。”后来，施佩尔对他所设计的建筑加以清点，发现多数没有实现，已经建成的辉煌建筑几乎皆成为废墟，只有在柏林城里还剩下几打街道路灯，稀稀落落，发出暗淡的光。



图四十一：1943年，希特勒为施佩尔颁奖。

废墟的价值

其实，整个第三帝国曾经辉煌一时的建筑多数都已经灰飞烟灭，或者只剩下一堆石头废墟。在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柏林处于冷战中心。一边是社会主义的东德，一边是资本主义的西德，希特勒曾经执掌的成为废墟的首相大厦正好处于无人地带，荒凉冷落，直到90年代，东西德统一之后，这里才又大兴土木，一个德国新的首都呈现在世人面前。对此，一位出生在前东德地区的诗人写道：

“阿尔伯特，着眼未来！”千年后依然

留在建筑材料里，坍塌中的雄伟

废墟的魅力，在于废墟本身的价值。

（格仁拜因“关于德累斯顿的诗”，芮虎译）

2008年3月，在柏林展出了纳粹时期的建筑图片及相关档案，题为“日耳曼尼亚神话——帝国首都的阴影与痕迹”，以锋利的目光审视柏林斯普雷河湾及过去的大臣花园周遭的历史建筑。

在“欧洲被害犹太人的纪念碑”与“恐怖统治的地貌图”的展览上，从档案中选出与纳粹国家政权的建筑技术，社会和政治背景有所联系的建筑残留，重点在于展示其毁灭性的结果，特别是对柏林犹太人而言的“决定性的设计”。展览展出了希特勒对帝国建筑总监的任命书，它是1937年1月30日由希特勒签发的。对纳粹政权而言，这个职位属非政府建构，指定由建筑设计师施佩尔（Albert Speer 1905-1981）担任，直接对元首负责。

展览还展出了东西大道上的铁路大桥在1933年中期的设计图，当时的设计师预计，1943年后柏林市的高速公路上将会增加到三百万辆汽车行驶，时速最多可以开到每小时180公里。



图四十二：劫后余生的勃兰登堡门及菩提树下大街

参考及原文引用来源：

Abert Speer: 《Erinnerungen》 Ullstein 1969

Abert Speer: 《Spandauer Tagbuecher》 Ullstein 1975

Joachim Fest: 《Speer: Eine Biographie》 Fischer Verlag 1999

Heinrich Breloer: 《 Speer und Er : Hitlers Architekt und
Ruestungsminister》 Propylaeen 2005

电影：帝国的浮尸

在第三帝国最高导演戈培尔的主导下，整个纳粹德国时期共生产1363部影片，绝大部分是军政宣传片和娱乐片，前者发挥向民众灌输纳粹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后者则是为了让民众逃避现实，以便更容易服从管理。

文/邱实

1933年3月，德国大导演弗里茨·朗被刚上台半个月的戈培尔叫到办公室谈话。他的新作《马布斯博士的遗嘱》刚刚杀青，讲述神经错乱的马布斯博士用催眠术控制他的病友实施有组织犯罪，却当即因“危害公共秩序”遭纳粹禁映。



图四十三：导演弗里茨·朗

戈培尔对弗里茨·朗只字未提禁映的事，却说希特勒和他多年以前看过朗先生的影片《大都会》，非常喜欢，希望他能领导环球电影有限公司（UFA），为纳粹拍片。

会谈当晚，弗里茨·朗就带着电影拷贝逃离了柏林。他是犹太人，此外，他不得不与迷信纳粹党的夫人离婚。与朗同期逃离德国的还有导演派伯斯特（Georg Wilhelm Pabst）、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杜多夫（Slatan Dudow）、西奥德马克（Robert Siodmak）、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等等，整整一个世代的文艺精英。那个风云际会的魏玛文化落幕了。



图四十四：《马布斯博士的遗嘱》海报（1933）

总导演戈培尔

如果1927年的弗里茨·朗没有拍成《大都会》（Metropolis），后来的纳粹电影史也许会完全改写。《大都会》是当年科幻大片的顶峰，也是魏玛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和无声电影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片中呈现了未来世界的摩天楼都市、轨道列车、空中机场以及女机器人和机械假手，成为后世无数科幻电影的鼻祖。史诗的气魄打动过希特勒，但因为它空前的510万马克投资，以及同年有声电影的冲击，欧洲最大的电影公司UFA血本无归。



图四十五：戈培尔慷慨激昂的演讲

环球电影股份公司（Universum Film A. G）即UFA，成立于一战末期，是整合了德国多家电影公司的大集团，后来发展为魏玛德国乃至全欧洲电影创作的发动机，可与同时期的经典好莱坞相媲美。直到1927年，因《大都会》破产的UFA被右派分子胡根贝格（Hugenberg）收购，转拍音乐剧和英雄史诗电影。

要掌控德国电影，必须要掌控UFA。1933年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成立“国民启蒙与宣传部”，下设“帝国文化厅”和“帝国电影厅”。胡根贝格在出任纳粹经济部长后，UFA电影的内容已完全在戈培尔控制下。1937年宣传部所属公司开始收购UFA，至1942年将其完全国有化，接管包括制片、发行乃至胶片印制等所有部门。除了里芬斯塔等三个亲纳粹公司，德国电影公司全部被统合进UFA集团。

戈培尔曾宣称：“只有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土壤里，艺术才是可能的……我们无意容忍那些即使是最轻微的、在德国要被连根拔除的想法，无论以何种形式，或隐蔽或公开地被重现在电影中。”1934年2月纳粹通过电影法，规定官方须审查从电影剧本到演员挑选、影片拍摄的全过程，以“防止与当时国家精神相背离的情节主题会出现”。1936年戈培尔禁止了电影批评，理由是它“展现犹太人性格特征”。电影评论重新定义为“影片观察”，成为宣传部指令的附庸。

戈培尔成了第三帝国最高的制片人和导演。整个纳粹德国时期共生产1363部影片，绝大部分是军政宣传片和娱乐片，且无一不经过宣传部的审查，前者发挥向民众灌输纳粹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后者则是为了让民众逃避现实，以便更容易服从管理。

戈培尔如是宣告：“（政治）就是现存的最高级的和最综合的艺术，我们在制定现代德国政策时，感到我们自己就是艺术家……艺术和艺术家的任务在于成形，定形，消除有害的东西，为健康的人创造自由。”

所有商业体制下的旧明星必须听命帝国文化部的领导。正如纳粹刊物常说的，“只有那些真实的、诚实的艺术家，那些将自己融入集体

并成为全体演出者中的一个有用的人时，才能够享受这样的殊荣。……将明星病从电影中根除掉：明星必须死，这样电影才能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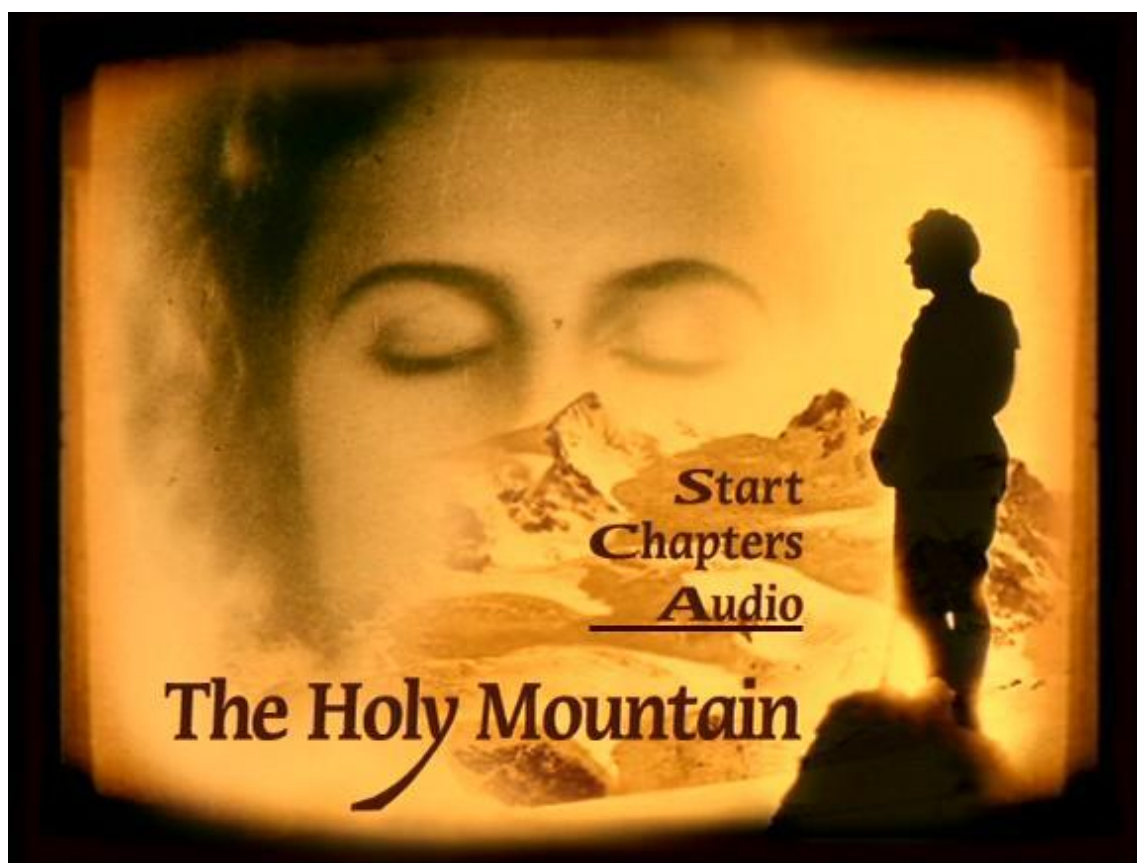
一批新的听命于党的电影人被网罗在宣传部周围，包括导演卡尔·里特尔、维特·哈尔兰，瑞典女影星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莎拉·莱安德。戈培尔那位深色皮肤的演员情妇丽达·巴洛娃也使他增色不少。整个纳粹德国的文艺界只有一个人不受戈培尔掌控，那就是莱妮·里芬斯塔尔。



图四十六：莱妮·里芬斯塔尔

雪峰의诱惑

1927年UFA破产前后，莱妮出演“高山电影”教父范克执导的《圣山》并一举成名。她扮演一名强健、纯洁的少女在海边翩翩起舞，笑问登山者“你来找什么”，后来她获得登山者求爱，投身于攀登阿尔卑斯山的运动中。此后，她相继出演同类题材的《大跳跃》、《匹茨帕吕的白色地狱》、《勃朗峰上的风暴》、《冰峰呼救》，并自导自演了影片《蓝光》。片中莱妮的形象一次比一次高大，从远离尘嚣的牧羊女、无性别的探险者（对自然的敬畏）演化为征服自然的女英雄，雪峰和白云开始由攀登的目标变为衬托主角的背景。



图四十七：《圣山》海报

在《蓝光》（1932）中，一道神秘的蓝光从山巅放射出来，只有莱妮饰演衣衫褴褛的流浪少女旺塔能够在夜幕下安全攀上山巅寻到蓝光所在，而她却只是沉醉于光的美丽。当她透露出发蓝光的其实是颗宝石后，贪婪的村民上山夺走宝石。满月之夜再次登山的旺塔由于失去蓝光而坠崖身亡。借用苏珊·桑塔格的分析，片中的少女是象征自然性的生灵，同时是理想化色欲的化身，村民则是庸众的代表。当少女与高山交叠，形成了一种诱惑，色欲的目标从女性转向那个崇高神秘的峰巅，达成了精神的“升华”。

正如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在高山电影萌芽期就指出的，整个爬山场面寓意着为美好而可怖的高远目标奋斗的渴望，“闪烁的冰镐和夸张的情绪”，让人感觉到“一种类似于纳粹精神”的“英雄理想主义”开始挣扎着争夺权力。“不成熟与对山脉的迷恋是一样的，都是反理性主义的征兆，也是纳粹主义得以发迹的资本。”这种迷恋后来转化为对元首的崇拜。

里芬斯塔影片借助身体呈现“超人”意识、人对天空的征服、对极限的挑战，是从早期她参演一系列“高山电影”起一脉相承的叙事模式。当莱妮自称还“分不清左派右派”时，就已经与希特勒信奉的尼采哲学不谋而合了。

1933年莱妮成为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并在1934年纳粹纽伦堡大会上拍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开场中雪峰、云朵以及元首救世主般降临的场景，希特勒的形象、帝国铁鹰与纽伦堡的古雅建筑反复出现在蓝天白云的前端。这都明显是来自高山电影的技法。城市里飘动的卐字旗海洋、游行中照亮夜晚的火把、难以计数的人群在欢庆广场上组成“活人造型”，则是纳粹凭借其权力为电影注入的魔力。



图四十八：1933年，莱妮成为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

曾经也是滑雪和登山运动员的施佩尔担当纽伦堡会场的总设计师，为列队欢迎的人群和行进的队列做足了准备。这让这场阅兵式与纪录片拍摄，更像是一次屡经彩排的盛大演出。那一场被排练数十次的劳工组织检阅场面，在影片中格外动人：

劳工组织官员高喊：“你们来自哪里？”

队员：“我来自费里斯兰！”

“你呢？”

队员：“来自巴伐利亚！”

“你呢？”

“来自凯撒施图尔！”“康尼斯堡！”“西里西亚！”“波罗的海！”“黑森林！”“德累斯顿！”一个个队员被投以大特写镜头，骄傲地喊出一个个德国地名。最后官员喊道：“一个民族，一个元首，一个帝国！”鲜活的人拼成帝国的版图，而都效忠于一个领袖，纳粹所标榜的“血与祖国”的主旨喷薄而出。

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纪录片《奥林匹亚》中，莱尼再次展现“雪峰的诱惑”。影片第二部最后15分钟里，她用特制的防水摄影机记录下跳水健儿从蓝天背景中翻滚落入水下的画面。天空中泳装健儿的线条，正如她当初登上雪峰的剧照一样，展示着对“力与美”的膜拜。这正是纳粹需要的精神。

牺牲多壮志

1933年，刚刚得宠的莱尼曾拒绝希特勒的一个拍片邀请。希特勒要她把威塞尔（纳粹冲锋队小队长，皮条客和打手）的故事拍成影片。后来这部影片由别人拍完，名为《豪斯特·威斯特玛》，片中流氓威塞尔一变而为被共产主义者杀害的传奇英雄。一首相传为其生前所作的《豪斯特·威塞尔之歌》还成了纳粹党歌。

这是纳粹上台伊始的献礼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分别是歌颂纳粹冲锋队的《冲锋队：男人的热情》和《希特勒青年奎克斯》，讲述被共产主义者杀害的青年团团员的故事。

《希特勒青年奎克斯》的制片人是卡尔·里特尔（Karl Ritter），一名狂热的战争片导演，也是UFA的制片主管和电影厅委员，他拍摄了《爱国者》（Patrioten，1937）、《蓝十字勋章》（Pour le Merite,1938）、《休假宣言》（Urlaub auf Ehrenwort,1938）等大批军政战争电影，且屡获殊荣。通过《叛国者》（Verräter，1938）和反苏联电影《赤色恐怖》（G.P.U，1942），他还在德国引入了谍战电影。



图四十九：卡尔·里特尔



图五十：1938年拍摄的《蓝十字勋章》海报

里特尔明确宣告电影应为纳粹意识形态服务：“德国电影的道路将没有任何妥协，其结论就是每一步电影必须致力于服务我们的社群、民族和我们的未来。”

他的电影“如坦克一般处在宣传战线最前沿”，经常展现“战斗机飞行员的英勇死亡”，但也偶尔“用力过猛”，比如在一部影片中，他让一个步兵纵队为了引诱敌人进入己方火炮射程而壮烈阵亡，军方人士质疑这种战略是丑化德军。

战争开始后，戈培尔没有缩减电影投资，因为宣传战的意义不亚于正面战场，此时更需要宣传来鼓舞士气。播报吞并波兰、进军法国的新闻短片不断从前线传来，被强制贴在每部电影之前放映。当宣传

部发现观众频繁延迟入场来逃避影片之前的新闻短片时，戈培尔下令新闻开播后观众不得再入场。

纳粹的战地新闻片素材全由前线记者拍摄于真实的战场上，由飞机载着底片飞离前线第一时间送到后方，成片的胶片装上货车派往全国，有时降价安排放映。由于画面暗示的时机必须恰到好处，戈培尔要求战地新闻片必须在同一天在全国发行。尽管大西洋阻隔重重，UFA驻纽约办事处仍然平均每两周能引进一部德国影片到美国。希特勒驻各国的外交官们也把大使馆的宴会当作战争片观摩场所。

《西线的胜利》（Sieg im Westen, 1941）是纳粹战争片中的典型。片中的图像、炮火和解说声交叉轰炸，在平面版图上以若干箭头指向行进方向，配以德军阅兵行军时的整齐步伐和野战炮的整齐开火。血肉横飞的画面不见了，中弹倒下的画面不见了。当解说宣布胜利时，画面已切换成了在巴黎的阅兵式，依旧是整齐的步伐。观众不会看到阵亡，只有歼灭敌军的数字。因为“省略”才象征着闪电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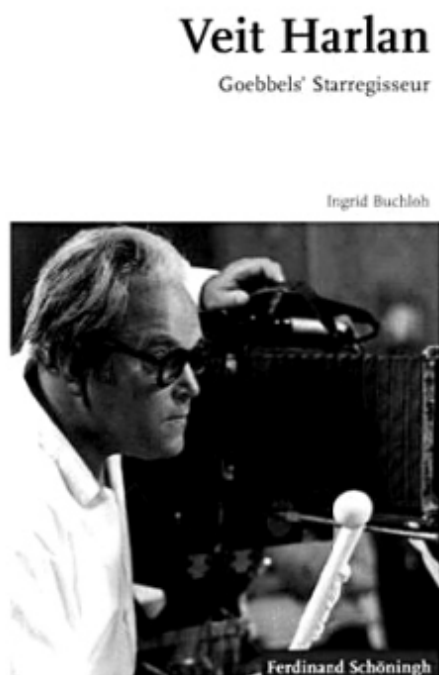
图五十一：《西线的胜利》海报

影片还省略了侵略者造成的毁坏，而却表现德国人修复被炸毁的桥梁和教堂的情景。当然影片不忘把马其诺防线中的法军刻画成嗜酒堕落的邪神。

影片中的领袖不再有《意志的胜利》那般活灵活现，他很少出现，隐身成为了“战神”或战争艺术本身。唯有解说热情重复着元首的“天才计划”。间或有一幕希特勒看望伤员的情景，他的手就仿佛拥有神力，摸摸伤员就能让他们复原。

犹太人居斯

正如那些反英、反法、反苏电影，戈培尔也命令导演维特·哈尔兰 (Veit Harlan) 拍一部给大众看的反犹电影。



图五十二：导演维特·哈尔兰

1935年，纳粹颁布“纽伦堡法案”，强调“雅利安人”的纯正血统，剥夺犹太人公民权。1938年“水晶之夜”起，纳粹团体开始大规模袭击犹

太人。戈培尔也早有蓄谋，保存了一份1933年焚书时的禁毁书目——历史小说《犹太人居斯》（Jud Süß, 1925）。

小说中故事发生在1733年，居斯精明能干，能识时务，担任德意志符腾堡公爵的财政顾问，帮助公爵聚敛钱财，扩充军备以准备推翻议会独揽大权。而公爵贪财好色，想要霸占居斯的女儿，导致她反抗而死。决心复仇的居斯同公爵鱼死网破，向议会泄漏了政变计划。公爵中风身亡，居斯投案入狱。在被告知改信基督教就可以活命时，他反躬自省，仍然坚守犹太教的价值，被处死刑。这本是一个资产阶级悲剧故事。



图五十三：2010版德国电影《犹太人居斯》剧照

但戈培尔交给导演哈尔兰的是一个面目全非的剧本。犹太人居斯是片中唯一的坏人，趁着符腾堡公国的腐败，对公爵阿谀奉承，篡夺经济大权，搜刮民脂民膏，让犹太人大举进入议会，欺压本地居民。他更强奸了“雅利安少女”多萝西，“玷污”雅利安的纯洁血统，致多萝西投河自尽。影片《犹太人居斯》的最后，居斯被处绞刑，多萝西的父亲警告道：“但愿我们的后代始终不渝地坚决贯彻这部法律，这样我们就能免遭许多苦难；这样就可以保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善良，保持我们子孙万代血统的纯净！”

虽然戈培尔夸哈尔兰“对剧本精益求精，一改再改”，但从演员选定、剧本定稿到镜头剪辑，都由戈培尔自己拍板。他还特意选择哈尔

兰的妻子、瑞典女星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Kristina Söderbaum）出演“雅利安少女”多萝西。

影片是对“排犹法案”的完美图解，为屠杀犹太人虚构了历史依据。在其公映的1940年，两千万德国人被要求观看这部影片，尤其是全体盖世太保。影片放映后，维也纳的犹太人遭到殴打，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甚至在街头将犹太老人虐待致死。真正的大屠杀启动了。

但人心不是靠宣传电影就能征服的。影片公映后，扮演坏蛋居斯的斐迪南·马里安收到了无数女观众写来的求爱信。因为相比于腓特烈大帝这种脸谱化角色，抑或完美无个性的德国英雄战士，情欲饱满的居斯显得更有男人味。因为“坏小子”这种荧幕形象，早就在清除好莱坞影响的运动中消失了。

帝国的浮尸

一方面，戈培尔用战争宣传片密集轰炸观众，令其难以恢复理智思考，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明智的鼓动家，戈培尔经常说过分的政教宣传反而会减弱纳粹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力。他提倡UFA多拍些娱乐片和历史题材电影（神话传说或战争胜利），让人逃避现实，同时，有意通过娱乐片将某些意识形态“内化”。

泽德尔鲍姆被戈培尔所看好，被塑造成一位纳粹理想中的女性。她生于瑞典，属于纳粹神话中的北方日耳曼人，是纯血的雅利安人。她一头金发，身材健美，举止简约，身体裸露时也不会引发性欲。在一幅纳粹媒体为她推出的海报中，她穿戴大衣围巾，在山中拉着雪橇娱乐，脸上绽放两朵红晕。这是纳粹为了向英法资产阶级“大小姐”纤弱习气宣战，着力塑造出的雅利安健壮而美丽的女性形象。

1942年9月，UFA公司也是纳粹德国最赚钱的电影《黄金城》（Die goldene Stadt）在威尼斯首映。泽德尔鲍姆出演一个向往城市的乡村女孩，身着纯洁而鲜艳的彩色衣服，戴一顶黄色大草帽，与周围

的山水融为一体。她在遇见城里来的工程师时坠入爱河。但恋人被父亲赶走，她独自来到向往的大城市布拉格，与表哥相恋，换上了时髦的都市服饰。而当她怀孕后，却因为父亲再娶而丧失继承权，被表哥赶出家门，终于投湖自杀。尸体浮出水面，洗尽铅华，又如天使般洁净。溺死之地，金黄的麦浪在风中摆动。



图五十四：《黄金城》电影海报

尽管是一部乡村/都市题材的情节剧，寓意却十分明显。纯净的祖国乡村与暗藏危险的异国都市，女主人公从叛逆父权，最终回归故土，相较之下自然前者才是正路。如纳粹所宣传的，乡村里孕育着“德意志精神”，而都市是充满犹太人和资产阶级的堕落之地。另外，布拉格也代表了非日耳曼种族。戈培尔甚至坚持改动剧本结局，把原著中父亲之死改为女主人公必须死，因为她怀上了“异国杂种”。

泽德尔鲍姆的角色尸体再次洁净地浮出水面，与《犹太人居斯》中的多萝西一模一样。民间也送给她“帝国的浮尸”的戏称。

与这种取向相反，女星莎拉·莱安德（Zarah Leander）被要求屡次扮演由堕落到赎罪的角色。比如《到新岸去》（To New Shores, 1937）中，她的角色是英国淫乱的舞女，而必须在“新岸”澳大利亚里靠诚实劳动谋求新生。显然，这里的新澳大利亚，正与《黄金城》中德国乡村是同一物。



图五十五：莎拉·莱安德

然而生活中，哈尔兰夫妇不像宣传中那般“纯净”。哈尔兰结了三次婚，第一次还是跟犹太女人，而与第二任妻子尚未离婚时，泽德尔鲍姆就已经怀孕了。UFA极力将哈尔兰夫妇描绘成勤劳的艺术家庭。而婚外情频繁出现在哈尔兰的剧本中，迫使戈培尔不得不频繁干预。试想在一个百万战士搏命前线而让妻子守空房的国家，婚外情是多么大的灾难。如果有，出轨的妻子应当愧死。

史诗的终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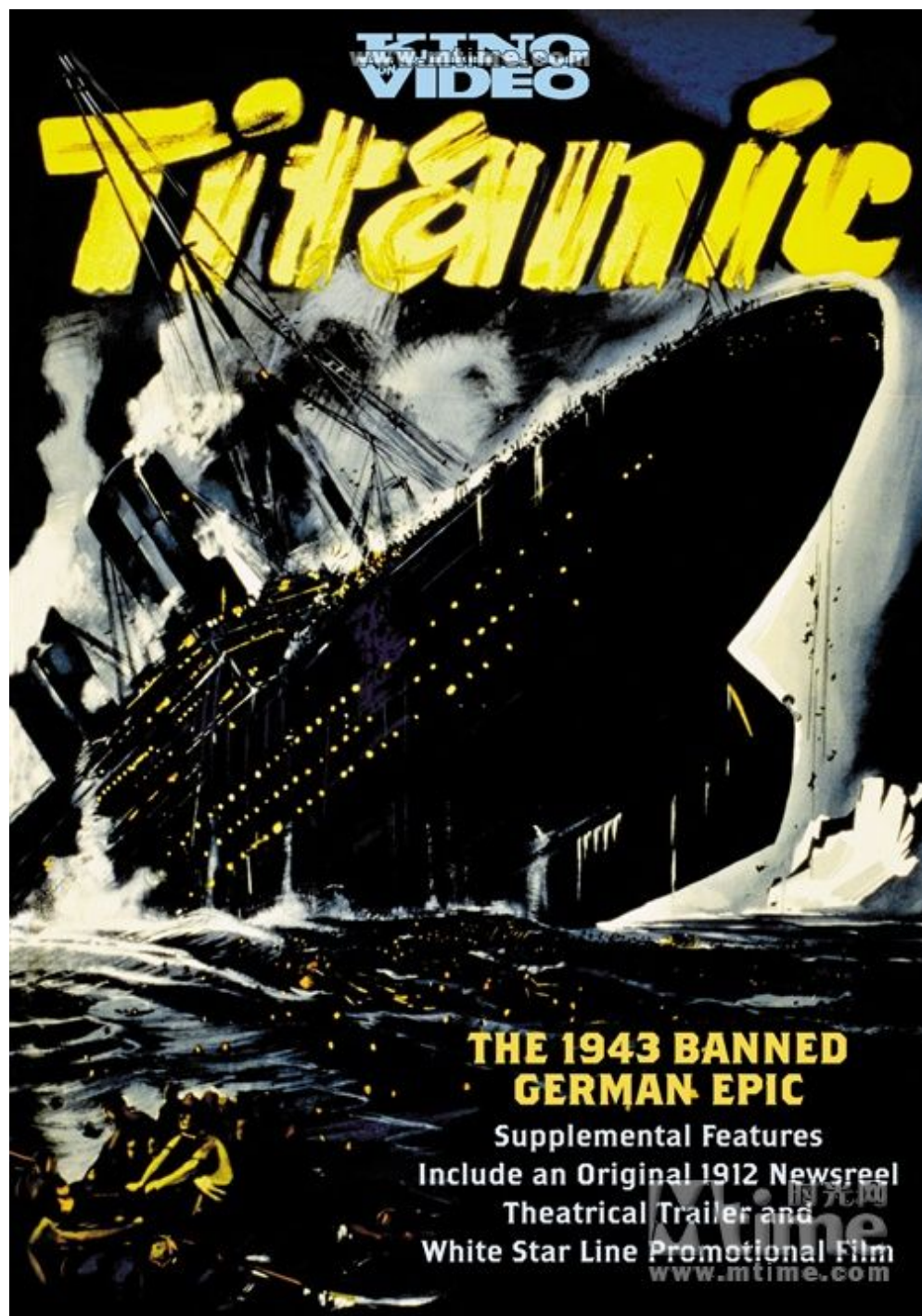
随着战争的僵持，纳粹电影开始回避现实，转而拍摄腓特烈大帝、俾斯麦时期的战争往事，哈尔兰执导的《伟大的国王》和里本埃勒执导的《俾斯麦》等电影便是这一“精神胜利法”的产物。



图五十六：《伟大的国王》电影海报

继续倡导“勤劳主妇”式的家庭妇女形象让纳粹陷入窘境，因为成百万的后方妇女必须被动员起来支援前线军需。泽德尔鲍姆在《伟大的国王》（Der große König, 1941）中、莱安德在《伟大的爱情》（Die große Liebe, 1942）中都被要求出演随军妻子的形象。

1943年，战局开始不利于德国。为了重振士气，戈培尔命令导演拍摄他所喜爱的《泰坦尼克》。这是史上第一部“泰坦尼克号电影”，片中虚构和历史杂糅，着重表现英美资产阶级的堕落导致“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突出船上德国人的英勇无畏和舍己救人的美德。影片于1943年11月在德占区上映。令戈培尔不安的是，沉船影片不但没有振作士气，反而让观众情绪更低落。他连忙禁掉了电影。



图五十七：1943版《泰坦尼克》电影海报

戈培尔仍谋划拍些振奋人心的东西，他授命哈尔兰拍摄一部反映“普鲁士战胜拿破仑”胜利的影片《科尔贝格》（Kolberg）。故事核心是1806-1807年在普鲁士小城科尔贝格，军民一心抗击拿破仑大军的故

事，然而关键的史实中的失败变成了胜利，另糅合以其他错乱的史实。戈培尔坦言，片中的故事是一场“头脑中的战争”，但必须展现悲剧性的牺牲和抵抗的决心。彻底遁入虚幻，说明纳粹的文化权力已近崩塌。



图五十八：《科尔贝格》电影海报

这部戈培尔最后的作品花费近900万马克，哈尔兰夫妇全情投入，历时近3年，动用18.5万名临时演员和6000匹战马。出演影片最后一幕战争场面的几处部队是刚从被包围的前线撤退后，换上古代衣装直接进入电影拍摄的，而苏联大军已经集结于不远处。这种庞大的开销只能导致《大都会》一样的破产。当1945年1月公映时，德国大部分的电影院已经化作瓦砾了。

战后，里芬斯塔尔和哈尔兰相继被盟军抓捕和审判。他们的上司戈培尔，已经在1945年5月1日杀死六个孩子和妻子后饮弹自尽。



图五十九：1944年，戈培尔夫妇与六名子女合影

哈尔兰因为拍摄反人类的《犹太人居斯》受审，他称自己是“迷失自我的艺术家”，他也是纳粹暴行的受害者，如果他不按戈培尔的意思拍一样会被枪毙。“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曾为魔鬼做事。”他用人人都有份的理论推脱责任。经历了一场险些丧命的心肌梗塞，哈尔兰最终被无罪释放。而《犹太人居斯》成为战后唯一被判有“反人类罪”的电影。

尽管哈尔兰获准继续执导，他的妻子泽德尔鲍姆却被禁演。人们对女人的“过错”总是更为严苛，更何况她的“雅利安少女”形象那么深入人心。

里芬斯塔尔被盟军反复抓捕和释放，还曾被关进疯人院，1952年终因为并非纳粹党员而无罪释放。1953年，她拍摄于战争时的影片《低地》终得上映，影响平平。1955年，她的《奥林匹亚》终于登陆纽约并广受好评。纽伦堡三部曲仅存的《意志的胜利》至今仍是影视学院的教学材料，但教师不敢给学生们播放完整的影片，因为它的威力太强大了。

欧洲最大的电影公司UFA被民主德国接收，改造为“德意志电影公司”（DEFA）。1991年两德合并后，UFA重建，成为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现在是贝塔斯曼跨国集团的一部分。

参考书目：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从加里加利到希特勒》，2008

斯蒂文·巴赫：《极权制造——莱尼·里芬斯塔尔的一生》，2010

安特耶·阿舍得：《希特勒的女明星》，2009

泰勒·唐宁：《奥林匹亚》，2012

Eric Rentschler, The Ministry of Illusion: Nazi Cinema and Its Afterlif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Ingrid Buchloh, Veit Harlan: Goebbels' Starregisseur, Schoeningh Press, 2010

莱妮·里芬斯塔尔：希特勒的御用导演

莱妮·里芬斯塔尔既是《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这一法西斯美学典型代表的创造者，她本人也被希特勒称为“我的完美德国女人”，因此成为这种美学的具象。无论她对自己“追求的是艺术而非政治”的辩护是否属实，她的一生已经与纳粹美学联系在一起。

文/邸笑飞

1932年2月27日，一个女人在体育场聆听希特勒的演说。她这样描述当时的震撼：“那感觉如同感受闪电，我眼前一亮，神谕出现，永生难忘。大地在我眼前无尽地延伸，地球从中间砰然裂开，喷射出一条巨大的水柱，直冲云霄，地球因而为之颤抖。当时的我似乎瘫痪了。”

她就是莱妮·里芬斯塔尔，出生于德国柏林威尔区一个工人家庭，是一名电影演员。她野心勃勃，正逐渐在银屏上崭露头角。

这个拥有无穷冒险精神的女人不久给希特勒写了一封求见信。三天之后，她接到希特勒的副官打来的电话，元首邀请她进行私人会谈。她立即抛下正在拍摄的电影去和希特勒会面。希特勒与她在海滩上漫步，尔后派了一架直升机送她回到拍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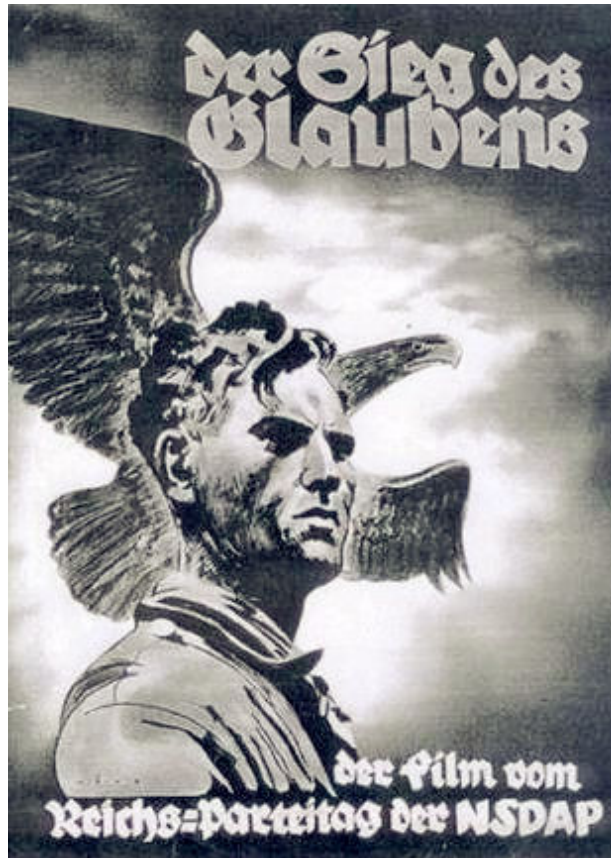


图六十：上世纪三十年代，莱妮•里芬斯塔尔与希特勒留影

在这次会面中，希特勒对她印象极好，称：“我在电影中见到过的最美的东西就是《圣山》里里芬斯塔尔在海边的舞蹈”，并对她说“一旦我们掌权，一定让你给我拍电影”。这句话一语成谶，莱妮一年后就开始为希特勒拍摄电影，并且一生都与此纠缠不断。

成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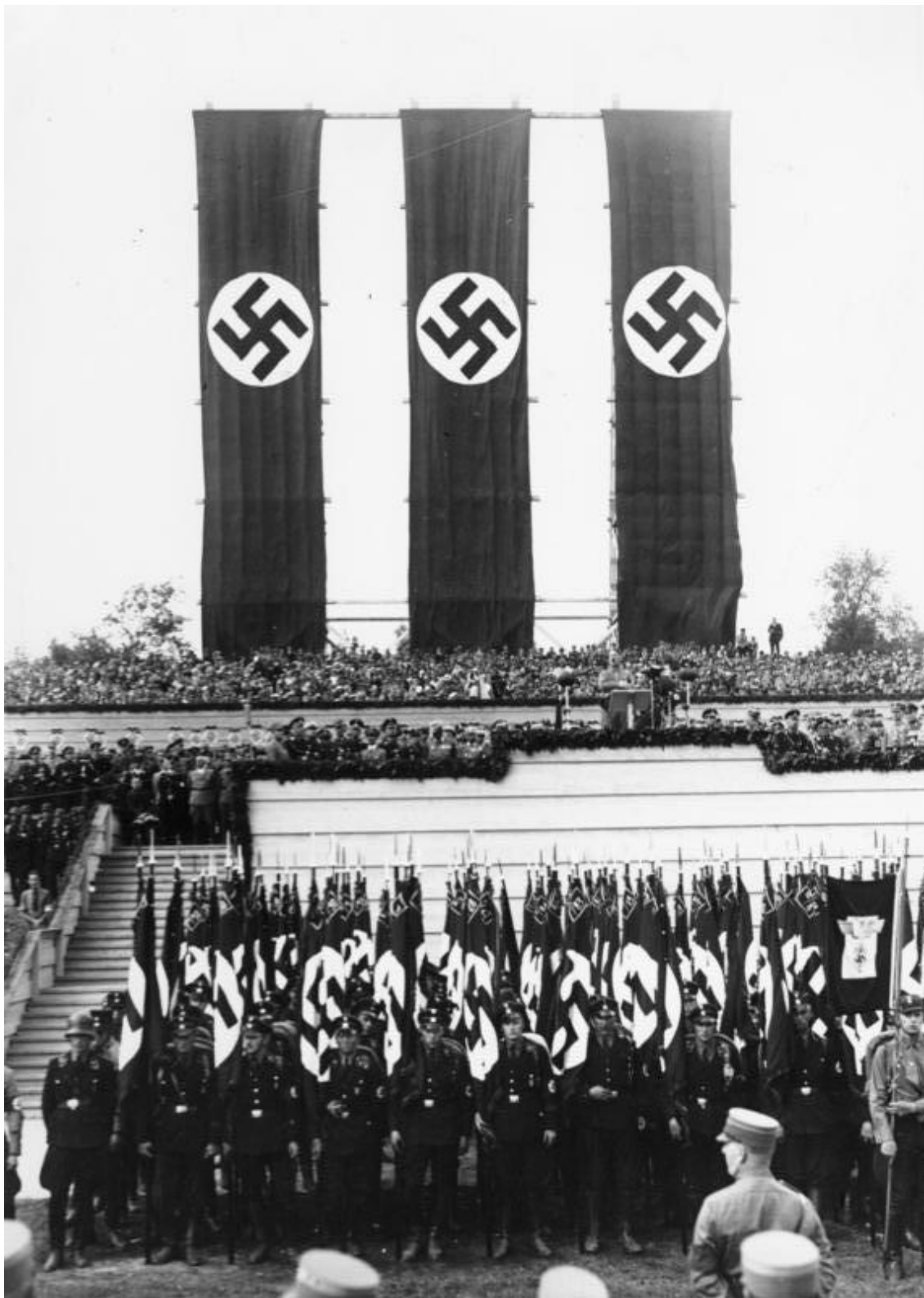
令希特勒的诺言成真的影片是《信仰的胜利》，拍摄内容是纳粹掌权后第一次纳粹党国会大会。



图六十一：《信仰的胜利》海报

在解释为何选择莱妮时，希特勒这样说：“我不希望党代会纪录片索然无味，或者成为新闻简报，我想要一部富有艺术性的纪录片”。

从这一点说，希特勒选对了人。莱妮虽然只有零星的导演经验，却对画面有一种敏锐的察觉力。她制作出一部充满美感的影片——她拍摄刚刚睡醒的城市，拍摄薄雾在哥特式教堂的塔尖上旋绕，也拍摄希特勒青年团、纳粹冲锋队、党卫队充满热情的面庞，但最主要的角色是站立在巨大演讲台上，被弧光灯光芒笼罩的希特勒，他背后是两面高达50英尺的万字旗——这个布景设计是纳粹建筑师艾伯特·施佩尔的杰作——这样的布置使得希特勒看上去好像“沐浴在耀眼的光芒里，召唤着民族的觉醒、团结和一致对外的力量”。这个宏伟的形象和慢镜头摇出的风景结合在一起，显得既抒情又煽情。



图六十二：1933年，希特勒在纽伦堡党代会上讲话

这部片子在德国上下被要求观看，并受到当时已为纳粹党掌控的德国媒体一致好评：“一首电影圣乐”、“记录了一个政党向一个政权的转变”、“全体人民的力量源泉”。但英国媒体上有则评论揭露了其讴歌希特勒的本质，“这部电影是凯撒精神的长篇颂歌，在里面，希特勒先生扮演凯撒而军队就是罗马帝国的那些奴隶。”

高峰

莱妮的第一部片子还有不少不成熟之处，比如镜头的凌乱、剪辑的不规则和不连贯，摄影机的摇动，甚至对希特勒本人的拍摄也不协调：某些时候他像个英雄，而另一些时候他则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

她很快有了机会弥补——她的第二部影片——1934年开始拍摄的《意志的胜利》，内容是关于1934年纽伦堡军队集结仪式，其目的在于安抚因为在兴登堡辞世及血腥清洗而变得不安的民众，为此为纳粹党的上位扫清障碍。



图六十三：《意志的胜利》海报

为了拍摄这部影片，莱妮从希特勒那里获得了绝对的支持——无论是人力、还是各个机构的配合。她组建起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多达170人的摄制队伍，光摄影师就有16位，著名摄影师泽普·阿盖尔及瓦尔特·弗伦茨都在其中，每位摄影师专门配备一个助手，还有9名空中摄影师，17名负责照明的工作人员，26名司机，37名警卫员……而莱妮自己，则穿着她标志性的白色长大衣奔走在纳粹党员和党卫军中，发布命令，不时突发奇想冒出新的拍摄点子。



图六十四：1935年，莱妮·里芬斯塔尔拍摄《意志的胜利》宣传片现场工作照

她拥有独一无二的资源——希特勒的亲自过问。因此她的摄影师在纽伦堡期间可以占据各个制高点，运用各种角度进行拍摄而未受到阻拦。在这种便利条件下，莱妮天才的组织能力和艺术感觉得以淋漓展现。她大量使用滑动轨道，甚至在40米高的旗杆上安装了一个升降电梯，帮助摄影师取得完美的鸟瞰镜头。

片子一开头就响起庄严的军号声，然后出现近乎宗教意味的解说词：“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二十年，德国苦难开始已十六年，德国重生了九个月，阿道夫·希特勒飞来纽伦堡检阅他忠诚的追随者”。

随着解说词的结束，一架仿佛来自天国的飞机从云海中穿出，穿过云层，逐渐下降，从空中俯瞰着纽伦堡——整饬的房屋、街道，屋顶、塔楼上装点着纳粹党旗、教堂尖塔上也飘扬着纳粹旗帜，这个城市仿佛装扮完毕，正等待希特勒的降临。飞机悠然自得地滑行，再度降低，镜头中出现整齐的军队在一条条街道上列队而行。最后，飞机着陆，镜头摇出无数热情地欢呼但又有序的人，行着举手礼，众口一声地迎接着元首。接下来，希特勒站在自己帐篷的梅赛德斯奔驰上沿着道路前行，所到之处整齐地排列满了军队和群众，他们都狂喜地呼唤，向希特勒致敬。其中不时闪现出一些面庞的特写——美丽的母亲和胖胖的小女孩，表情虔诚的年轻人，坚毅的士兵……挥舞的旗帜汇成汹涌澎湃的海洋，旗帜上彰显着纳粹党徽。整个片子塑造了作为德国未来和希望的领袖希特勒，以及团结一心的德国民众。



图六十五：莱妮·里芬斯塔尔在为希特勒拍摄纪录片时拥有独一无二的资源

因为资源的丰富，摄制组到结束时总共拍摄了13万米长的胶片，莱妮用了几个月时间，从无比浩瀚的资料里剪辑出了3000米。因此这部影片在剪辑中显示出更强的力量和流畅感，这3000米胶片之中，莱妮将纳粹主义物化成了具体的、活泼的、盛大的和庄严的图像。

由于认为效果不好，莱妮去掉了大多数国防军训练的镜头，还因为“不能容忍任何不美在她的电影中存在”而删掉了“妇女代表大会”的画面，因为其中几个纳粹女党徒长得不够好看。这一点或许可以说明为何《意志的胜利》中出现的特写镜头都优美而文雅。但这也可以显示出这部电影的非客观性——它并非纯粹历史记录，不光镜头经过大量的筛选和重组，片中井然有序的状况也并非现场气氛，而是演练所得。这一点，施佩尔的原话这样说“这当然演练过，五十次，上百次”。



图六十六：1934年，莱妮·里芬斯塔尔（左二）在纽伦堡为身着黑色军装的希姆莱（左一背向者）拍摄电影素材。

《意志的胜利》1935年3月28日晚上在乌发动物园电影宫举行首映，其后进行全国公映。关于这部影片的作用，以戈培尔的赞美最恰当：“无论是谁，只要他看到或感受过《意志的胜利》中元首的面孔，就永远不会忘记。那张面孔会不分白天黑夜地萦绕在他的脑海或睡梦中，就像无声的火焰一样，在他的灵魂静静地燃烧。”

不仅在德国，《意志的胜利》还获得国际赞誉——先后荣获德国国家电影奖和威尼斯展览会电影金奖。但是在更多人眼里，因为这部影片，莱妮·里芬斯塔尔彻底地与纳粹主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欧洲的许多媒体从此开始以“第三帝国的电影天使”称呼她了。

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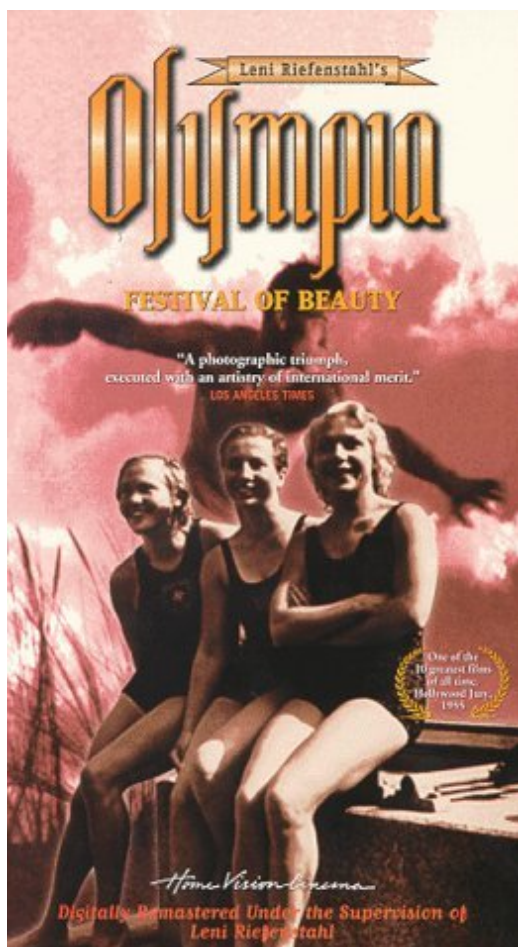
《意志的胜利》在德国人面前宣扬了希特勒的力量和他带来的美好愿景，而下一步，则是全世界——这次，机会是1936年柏林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希特勒希望能够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场景，让全世界为第三帝国的现代化、高效和友好而赞叹，并在“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的鼓舞下，潜移默化受到纳粹的“优等种族”理论影响。



图六十七：1934年，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莱尼·里芬斯塔尔拍摄列队行军。

很多人以为关于夏奥运会的纪录片是莱妮·里芬斯塔尔应国际奥委会要求而拍摄，实际其后隐藏着第三帝国的影子——希特勒为此片拍摄提供了150万帝国马克的资金，并且专门建立了奥林匹亚电影公司，以形成纳粹政权与此片毫无瓜葛的印象。



图六十八：电影《奥林匹亚》海报

从技术层面讲，《奥林匹亚》比《意志的胜利》又前进了一步。复杂而更具挑战性的竞技体育拍摄，给了莱妮无数尝试新摄影技巧的机会——拍摄赛跑和投掷项目时使用同步滑轨；拍摄跳高和跳远等项目时挖掘拍摄坑，摄像师在坑中向上仰拍运动员的动作；自制防水相机拍摄潜水和游泳比赛；在水中设置透明盒子以拍摄运动员入水到浮出水面的全过程；为了取到主体育场的全景，莱妮甚至还把摄像机绑到气球上放飞，使其在空中拍摄，很多都成为开创性的艺术手法。

而整个《奥林匹亚》的风格带有明显的古典主义色彩，竭尽全力展示人体的力与美。最典型的就是由莱妮策划，威利·齐尔克拍摄的序幕：“古老的奥林匹克运动场的废墟慢慢地从成团的云霭中隐现出来，然后一路途经希腊神庙和许多立体雕像，如阿喀琉斯、阿芙罗狄德、阿波罗和帕里斯，然后画面上出现了掷铁饼者的塑像，他变成了一个

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接着所有塑像都在神庙中翩翩起舞，火炬点燃了圣火，从古希腊传达到大都市柏林，这是一座从古代到现代的桥梁。”



图六十九：1938年拍摄的电影《奥林匹亚》古典主义色彩镜头画面

这个序幕后来被纳粹与“优等种族”理论联系起来，不过在莱妮看来，这只是她所崇尚的“美”。三十多年后，莱妮在这几部片子中所展示出来的美学概念，被苏珊·桑塔格评述为一种法西斯美学：“法西斯主义

的戏剧表演集中在强权与其傀儡之间的狂欢交易，它们身穿统一制服，人数呈现出不断膨胀的势头。其编舞术不断的变幻与定格的、静止的、雄性的造型来回切换。法西斯主义艺术歌颂服从，赞扬盲目，美化死亡。”

虽然莱妮一再强调该片的非政治性，但其最终所定的首映日，或许映射出它与纳粹政权的联系——1938年4月20日，希特勒49岁生日。那一天，大量纳粹高官出席，希特勒还为莱妮送上鲜花，似乎为了感谢莱妮为他献上此片。



图七十：1936年，柏林奥运会现场观众台民众行纳粹手礼

此后，莱妮携《奥林匹亚》巡演欧洲——慕尼黑、维也纳、苏黎世、巴黎、布鲁塞尔、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罗马……到处都掌声雷动。莱妮声称：“这部非政治化的电影征服了所有的偏见”。但在她11月4日到达美国后，情况改变了——此后五天，“水晶之夜”发生，全世界对犹太人的境地开始有清醒的认识，并对纳粹德国的印象急转直下。她受到了抵制，专业性报纸《好莱坞报道》甚至刊登了反对她的广告，声称“好莱坞没有莱妮·里芬斯塔尔的容身之处！就在此刻，就在

几百万我们的同胞正在等待着注定的死亡的时刻，拒绝所有的纳粹代表登门。”



图七十一：1936年，柏林奥运会颁奖台只有德国选手行纳粹手礼

而《奥林匹亚》在好莱坞的试映，也只能选择小范围的地下方式。虽然仍有一些电影人冒舆论指责的危险，在灯光熄灭后偷偷溜进来观看。但总体而言，莱妮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甚至她以前的朋友都没有来拜访。

这恰恰是她的电影日后际遇的缩影：人们无法抵挡影片的魅力，却也不忘记与拍摄者保持距离。

纠葛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拉开。莱妮曾前往波兰前线拍摄战争纪录片。然而，战场上残酷的现实令她受到了极大冲击，不久便返回了德国。此后整个“二战”期间，她没有参与任何宣传片的拍摄，只是创作了一部故事片《低地》。

“二战”结束，莱妮的资金被冻结，朋友众叛亲离，甚至连电影胶片都不再属于本人所有。她住过一段时间监狱，后来被关在一个狭小的旅馆里，必须每周两次向法国警察报告。不久，她面临战后法律诉讼，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她制作的是纪录片，而不是宣传片，她被希特勒强迫拍摄《意志的胜利》；她对于纳粹党利用她的作品不承担责任；《奥林匹亚》是全世界的计划，与纳粹政党无关；她有许多犹太朋友，但工作之外没有纳粹党内的熟人；她没有要求她的雇员向她行希特勒式的敬礼。她不是纳粹党员。”最后，莱妮仅被定性为“纳粹同情者”，这或许与她的极力自我辩护有关。

即使如此，她也被迫远离了电影工作，为此她沉寂了十多年，直到1950年代初期，联邦德国政治气氛松动。但这些年里，她仍忙着与那段过去的岁月划清关系——或者说，其实将自己更紧密地与那段岁月联系起来。她控告战后制作其他电影或纪录片时使用了《意志的胜利》片段的电影导演，要求从其收益中获得分成。她赢了，这些收入不但保证她余生可以源源不断获得收入，还不断提醒人们她与纳粹政权的联系。她还忙着以诽谤罪将出版称她为“纳粹或希特勒的情妇”的出版商告上法庭，以显示自己的清白。

1950年代后，她也开始进行新的电影拍摄，只是不断地失败。就像没有了希特勒那样的倾力支持者，她再也无法达到《意志的胜利》那样的高度，她的一部部关于登山、关于舞蹈的创意都无法实现，似

乎大家始终没有忘记她与第三帝国的关系，而对她的其它创意支持不够。或者习惯了以最铺张浪费的方式进行拍摄的她无法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完成作品。

1955年，她看到了《国家地理杂志》上罗杰所拍摄的努巴人的照片，希望去一个“没人知道我是莱妮·里芬斯塔尔的地方”，因而随几位人类学家前往非洲考察。或许部分是因为不堪外界对她当年的非议。在遥远的非洲大陆，她再一次被她所谓的美蛊惑——那强壮、健美的努巴人。但她对其美不美是极其挑剔的——她不欣赏穿着破烂衣服的非洲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建筑、农业也不感兴趣，唯一吸引她的是部落中的舞蹈、角力、纹身、葬礼等仪式，充满了身体的仪态，原始的张力，以及肌肉、动作的美感。



图七十二：莱妮·里芬斯塔尔在非洲考察

她拍下大量努巴人的照片，这些图像在桑塔格看来，依然是她战前拍摄的影片的一种延续——对高贵的野蛮人的痴迷，对强壮体魄的颂扬，对裸体和肌肉美的展示，都预示了法西斯美学的延续，“通过将完美的肌体包裹在伪善的对美的倡导之中”，“渗透出有毒的意识形态”。

桑塔格的评论激起新一轮对莱妮作品的讨论，有人维护他，也有更多的人批驳他。比如德国《明镜》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鲜血与睾丸》的文章，谴责莱妮作品中法西斯主义的延续：“于她，努巴人最终成为更好的纳粹，更纯洁的野蛮人，真正的日耳曼人。”

莱妮对桑塔格的评论十分气愤，她为自己辩护：“我有什么错？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害人的意图。如果我必须后悔的话，我后悔拍了《意志的胜利》这部纳粹片，但我不能后悔我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从来没有发过反犹太人的言论，我也没有加入过纳粹党。”“如果艺术家完全献身于他的工作，他就不会考虑政治，以前每个有所作为的艺术家都证明事实如此。米开朗其罗、罗丁、鲁本或其他印象派作家，他们中没有一个在任何时候感受到了政治的，即便有他们也不能预见未来。”

这位“希特勒的电影天使”极其长寿，她在不断地与笼罩在自己身上的纳粹光环的奋斗中，活到了21世纪，在1987年8月，莱妮·里芬斯塔尔85岁生日时，她还出版了《回忆录》。她在其中为有关自己的种种争议进行了“辩护”。并且抗议：“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7个月而否定我的一生！”

但这无疑是一种奢望。2003年9月8日，101岁的莱妮·里芬斯塔尔去世。全球诸多主流媒体发表的悼念文章，其中心都离不开她与希特勒的关系——或称她为“希特勒的情妇”，或说她是“希特勒的御用影人”，连最严谨的报纸也以“跟希特勒相关的影人”称之。

可以看到，在她长达101年的一生中，无论她之前和之后拍了多少片子，但是大家的眼睛看到她，首先想到的还是《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而她在其中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对力与美的单纯追求，还是受政治力量驱使，就如电影评论家安德鲁·萨里斯所写：“所有的证据都消失在第三帝国的泡沫中了。”

艺术品：为了元首的画廊

不仅是希特勒，许多历史上的政治强人都曾经坚信，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地位与国家政治强弱成正比。正如资助文艺复兴为美第奇家族赢得了政治上的尊贵荣耀一样，希特勒也寄希望于在艺术中表达政治意图，用“合乎官方品味的”艺术繁荣彰显国家政权。

文/宿亮

1945年4月29日凌晨，德意志帝国首都柏林，大厦将倾。

苏联军队已经摧枯拉朽一般向柏林市中心推进。由退伍老兵和平民组成的“帝国第五军团”成了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正在惨烈的巷战中逐步后撤。苏军已经逼近希特勒藏身的地堡。



图七十三： 1945年7月,苏军占领柏林，街头的德国市民列队在炸毁的建筑边

在几名亲信的见证下，希特勒签署了政治遗嘱并口述私人遗嘱。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对这份私人遗嘱做了评论：“希特勒倒是没有像戈林那样利用他的权势为自己捞一笔大财。”

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就在于希特勒在遗嘱中对自己收藏品的处理。希特勒说：“我的所有财物，不论其价值多少，都属于党，如果党

不存在了，就归国家。假如国家也灭亡了，那我就用不着再交待了。我这些年来所收集的绘画从来没有打算作为私藏，而完全是为了在多瑙河畔的故乡林茨建立画廊之用。”

绘画？画廊？希特勒搜集了哪些藏品，价值几许？既然不是为了积累个人财富，那么这些收藏是出于艺术欣赏，还是另有政治目的？

独裁者的艺术旨趣

如今林茨城堡博物馆的展厅里，一幅希特勒的老照片格外醒目。在已经泛黄的胶片上，希特勒托着腮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盯着桌子上的林茨城市模型思考。



图七十四：希特勒观看林茨城市模型

希特勒脑海中的图景是这样的：第三帝国有5个“元首的城市”，即柏林、汉堡、纽伦堡、慕尼黑和林茨。其中，林茨是“元首的艺术首都”，将建设一座巨大的戏院、一座歌剧院以及以希特勒本人命名的高级宾馆，最为重要的则是藏品足以与法国巴黎卢浮宫、意大利佛罗伦萨乌非兹媲美的“第三帝国艺术博物馆”。

这个元首心中的艺术殿堂是由哪些艺术品来装扮呢？是哪些艺术品符合独裁者的艺术喜好和品味呢？

在解答这一问题之前，或许可以先看看希特勒看不上哪些艺术品。

1937年7月，由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主持的名为“堕落艺术”的展览在慕尼黑举办，囊括从印象派以降的现代主义艺术作品。其中包括德国表现主义雕刻家和戏剧家恩斯特·巴拉赫、画风奇异的著名画家马克斯·贝克曼、象征主义造型大师保罗·克利、现代主义先驱犹太画家马克斯·利伯曼等人的作品。



图七十五：1937年7月，“堕落艺术展”现场展品

在希特勒看来，这些“堕落艺术”是与“伟大的德国艺术”相对立的，换言之，这是“奇技淫巧”。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以及野兽派、未来派，甚至建筑中的包豪斯风格在纳粹美学中都被标记为难以理解、缺乏美感，是对伟大日耳曼精神的“强奸”。

除举办“堕落艺术”展览外，希特勒还授意下属在整个德国境内的博物馆中寻找并没收这些“堕落艺术品”。以德国艺术品委员会主席阿道夫·齐格勒为首的甄别委员会在短时间内收缴了一大批现代主义艺术品。

在这些艺术品中，少部分价值较低的1939年前后在柏林遭到焚毁，而大多数则以在国外拍卖的方式获取大量的财富。根据史学家罗尔的记载，瑞士画商特奥多尔·费舍尔1939年在一次拍卖会中就卖出德国博物馆收藏的125件顶级现代主义艺术品。截至1941年12月，218幅油画、2700幅版画被卖到国外。



图七十六：1939年,卢浮宫众多油画搬离后剩下的画框

为了响应元首的“号召”，德国各地的纳粹基层组织积极争取这一展览的巡展机会。他们在展览设计上故意诋毁那些现代主义艺术品，例如把梵高或毕加索的作品与疯人院病人的涂鸦放在一起，让参观者进行分别。

创作这些艺术品的艺术家们也在这一阶段受到迫害。表现主义雕刻家和戏剧家巴拉赫被纳粹定名为“颓废艺术家”，大约381件雕塑作品被收缴，而他本人也失去了人身自由。1937年，这位名躁欧陆、年仅70岁的艺术家被赶出柏林学院，第二年在德国北部港口城市罗斯托克遭迫害致死。

画家贝克曼和克利都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到美国和瑞士。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活跃的艺术界还从未遭遇如此的灾难性打击。

尽管不欣赏“堕落艺术”，但希特勒用起这些艺术品换回的金钱却绝不含糊。除拨出象征性资金用于弥补博物馆的损失，大量金钱被用于购买希特勒所赞赏的艺术品，特别是投入为日后在林茨建立博物馆而启动的收藏活动中。

与“堕落”的现代主义艺术相比，希特勒的收藏集中在古典现实主义艺术领域，他从政早期收藏的19世纪德国现实主义艺术家作品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就是其统治下纳粹美学的主要内容。

综合多部希特勒传记的描述，可以想象早年生涯中希特勒是如何在求学过程中萌生希望做一个画家和艺术家的想法。20世纪最初几年，希特勒在家人的资助下前往维也纳学习绘画，但最终不得不沦落街头，靠画素描和水彩画为生。

从现存为数不多的希特勒画作来看，他的作品以静物和风景为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创作技巧。事实上，类似作品也成为他日后搜罗的主要油画作品题材。



图七十七：希特勒早年的静物作品

20世纪30年代早期上台前，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家中就已经开始了自己收藏。他当时已经拥有多幅19世纪德国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包括弗朗茨·冯·伦巴赫创作的俾斯麦画像、卡尔·施皮茨韦格和海因里希·布克尔的风景画。另外，文艺复兴时期荷兰尼德兰画家彼得·勃鲁盖尔和德国画家小卢卡斯·克拉纳赫的作品也包括在希特勒的收藏品中。

从那些收藏看希特勒的美学趣旨，能够发现他对19世纪日耳曼民族画家的写实作品格外青睐。一些历史学家估算，希特勒收藏的油画中60%都是德国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超过20%来自奥地利同时期画家。另外，希特勒对荷兰和如今归属比利时的弗兰德斯地区画家的油画作品也有一定兴趣，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也受到元首的推崇。

就这些作品而言，共同的特征在于尽可能地描述真实、贴近自然。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画家们往往描述宗教，人物细节呆板，而文艺复兴运动似乎是给这些画作注入了生命，对人物的描写更加写实、生动。

相比希特勒定义的“堕落的艺术”，现实主义艺术品没有太多抽象的概念和象征，让人一目了然，没有受到太多艺术教育的人也可以做到雅俗共赏。

从希特勒收藏艺术品的题材来看，独裁者偏爱的题材往往是风景、静物和传统家庭生活场景。这与希特勒早年为数不多的绘画创作题材相近。按照他的说法，艺术“是大众真实心灵的最深刻的表达”，因此题材也应接近、贴近普通人。

纵览元首收藏的绘画作品，看不到宗教、文学和历史方面的题材，至于描绘抽象概念、魔幻风格或是贵族生活的作品因属于“堕落艺术”，更不可能出现在元首的仓库里。希特勒很少对肖像画感兴趣，除非模特是某位日耳曼人的先贤。他也不关注当时新型城市生活和以现代大工业的经济生产为背景的艺术品。

当时，西方主流艺术界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变。自文艺复兴以后，工业革命导致以塞尚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艺术流派出现；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触发了毕加索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艺术，打破古典艺术的窠臼，赢得万千关注。

在这种时代艺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希特勒的收藏题材显得保守陈旧。用罗尔的话说，希特勒“体现出……对那个时代世界倾向置之不理的审美偏好”。

从希特勒收藏艺术品的作者来看，专门钻研风景画的海因里希·布克尔所画作品数量最多，而弗朗茨·冯·伦巴赫也有将近30幅作品入围元首钦定的收藏品队伍。另外，希特勒对格吕茨纳、费尔巴哈、马卡特都格外着迷。

不过，希特勒在买画的过程中经常把同一画家的同题材作品重复购买，在他所收藏的伦巴赫作品中，以同一座乡间房屋为主题的油画作品就有三幅之多。有人怀疑，希特勒办公室所悬挂的画家阿诺德·勃克林的名作《死亡之岛》并不是他所拥有的唯一一幅同题材作品。



图七十八：阿诺德·勃克林的名作《死亡之岛》

由此可见，希特勒的艺术品收藏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是题材和作者，而非画作本身。他重复购买同一创作者的同题材作品，是为了在其中挑出最好的放在身边。

“雅利安人的荣光”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曾经说过，希特勒执政时期体现出一定艺术家的气质，执行的是一种“法西斯美学政治”。与独裁者同时代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也曾经说过，希特勒骨子里是一个“搞艺术的”，而不是什么政治家。如果将这些评论与希特勒的艺术品收藏结合在一起，就能够看出纳粹政治与那些藏品之间的内在逻辑。

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斯波茨在《希特勒与美学的力量》艺术一书中总结道：“希特勒的问题，或者说是他的悲剧，在于混淆了审美的驱动力与审美的天赋。”换句话说，服务于政治才是希特勒收藏艺术品真正内在动力。艺术的确在希特勒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样也在纳粹政治框架中“居功至伟”。

独裁者推崇19世纪德国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艺术杰作，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作品都体现了纳粹政治所推崇的雅利安人的优越性，是“雅利安人的荣光”。在希特勒看来，雅利安人是正统古典文化的创作者，他们的作品精确反映了世界的艺术性和真实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犹太人的艺术，特别是犹太艺术家主导的现代主义艺术流派，这些艺术作品放弃了对自然界的真实艺术表达，而是采取“畸形的瞎涂乱抹”，是艺术的“堕落”。

希特勒指示其追随者公开诋毁“堕落艺术”、焚毁或贩卖那些艺术作品，同时却高度推崇自己喜爱的艺术作品的行为，很容易让人与二战期间犹太人的遭遇联系起来。犹太人与现代艺术在希特勒的概念里都属“堕落”，需“抛弃”。

在希特勒的解释中，犹太人之所以“颓废、堕落”，从其艺术品中“没有对故乡的联系”就能够体现，所以才出现了抽象派、野兽派等普通人难以欣赏的作品。而第三帝国的美学观念应该是一种忠于自然的复制，艺术应当牢牢把握自然、顺从自然，也就是古典现实主义推崇的艺术风格。

仅从艺术家人种上来分析希特勒美学政治观念并不全面。从艺术品题材上而言，不少人认为，希特勒如此关注于艺术的真实也是服务于纳粹大众政治的需要。

纳粹的崛起源于德国在承担一战战争责任和债务过程中经济衰退，导致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希特勒批评国内各政党脱离民众，发动底层民众和困境中的中产阶级支持。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希特勒所推崇的艺术形式必须具备一种能够被普遍理解的特征。换句话说，希特勒政治美学中的现实主义“金科玉律”是出于政治上巩固统治基础的需要。德国历史学家哈恩斯-克里斯蒂安·罗尔在《第三帝国的艺术博物馆》一书中写到：希特勒经常期待一种“朴实的、简单的、诚实的艺术”……对简单化的追求表现在他建立起来的收藏中。同时，希特勒指责表现主义艺术一味追求“轰动效应”和“趣味”。

第三帝国的多数艺术品收藏都是不需具备艺术专业背景知识就可以一眼看懂的，可以被所有阶层的民众广泛接受。

希特勒就此曾经说过：“德意志的就是明了的。”这种把复杂事物简单化、单一化的观点在艺术上就是追求现实主义表现的写真；在政治上则是独裁、反犹以及对个人的盲目崇拜。

英国艺术史学者格里夫雷·维特克拉夫特同样认同希特勒通过艺术巩固其群众基础的观点。维特克拉夫特认为，第三帝国时期的艺术风格大多是刻意迎合底层民众趣味的，包括建筑、绘画收藏。纳粹民族主义对于艺术有着敏感的神经，总是能够在政治中利用艺术。



图七十九：希特勒生日收到的雕塑、鲜花和花瓶等礼物。

在希特勒的“美学政治”中，艺术品除对德国内部的政治动员产生作用，还有一种对外宣示地位的含义。不仅是希特勒，许多历史上的政治强人都曾经坚信，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地位与国家政治强弱成正比。正如资助文艺复兴为美第奇家族赢得了政治上的尊贵荣耀一样，希特勒也寄希望于在艺术中表达政治意图，用“合乎官方品味的”艺术繁荣彰显国家政权。

事实上，这一观点决定了希特勒把渗透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艺术作为其纳粹民族主义的重要工具，预言“一个德意志前所未有的艺术盛况”即将诞生。而他计划在林茨修建的那座艺术博物馆就是试图向全世界证实这一点。

这种把艺术品与政治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学政治”渗透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建筑、音乐等各个方面。

其实，这种“美学政治”并不是纳粹首创。德意志最后一个皇帝威廉二世就曾经批驳德国画家创造悲剧题材的油画，称这种行为是“对德意志民众的罪恶”。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希特勒当年的建筑早已烟消云散，但他为林茨艺术品博物馆准备的那些收藏的追回、收缴和定性工作一直没有结束，其中有一些油画已经在战火中遭到破坏，或是逸散在历史的尘埃中。对于那些受到纳粹推崇的艺术家和艺术品而言，如今谁也说不清这究竟是他们的幸运还是最大的不幸。

“艺术的劫难”

2009年，林茨获选欧洲年度“文化首都”。与其他城市获选这一荣誉的情形不同，一些艺术历史学家认为，在林茨以9结尾年份兴办文化活动不合时宜。

那一年距离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0年，距离在林茨长大的战争发动者希特勒出生120年。不少人指责，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份把林茨定为欧洲“文化首都”是对希特勒在酷爱的故乡建立文化中心愿望的“回应”。

“林茨2009”的策展人、艺术家马丁·海勒坦言：“在林茨讨论艺术总是意味着讨论政治。”

林茨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争议，与希特勒建立林茨博物馆的想法有关，也与独裁者建立这一“雅利安人圣殿”的方法有关。

攫取第三帝国最高权力后，希特勒的收藏行为愈发活跃。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投其所好的艺术品掇客。希特勒委托这些人为他联系购买艺术品事宜，并代表他参与各国画廊的拍卖活动。



图八十：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纳粹德国党卫队全国总队长海因里希·希姆莱送给他一幅画作为生日礼物。

《第三帝国的艺术博物馆》一书中曾经提到一个名叫卡尔·哈伯施托克的柏林画商。哈伯施托克在希特勒执政早期曾经替独裁者收购艺术品。这名画商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一次在希特勒位于巴伐利亚地区的贝尔格霍夫城堡面见独裁者，汇报艺术品收购情况，但谈话中途被军事报告打断。希特勒在与哈伯施托克道别时说：“如果没有艺术来使我放松，我会变成什么样啊。”

真正把在林茨建立第三帝国最伟大的艺术博物馆提上日程，时间大概是在1938年。这一年，希特勒访问意大利，在佛罗伦萨著名的美术馆乌非兹宫流连四五个小时。回国后他就希望在德国也成立一个收藏品级别与乌非兹比肩的博物馆。另一方面，奥地利在当年并入德

国，寄托了希特勒青少年记忆的林茨也进入了由从这里走出去的独裁者控制时期。

为了在林茨建立博物馆，希特勒1939年成立了直接由他个人控制的机构“林茨特别任务”，负责搜罗他心仪的艺术品。德累斯顿美术馆馆长汉斯·波色被希特勒任命为特使，并召集不少艺术品专家负责艺术品的鉴定。



图八十一：1939年，“林茨特别任务”时期拍摄的转用艺术品的历史照片

希特勒曾经先后给波色大量资金用于在意大利、瑞士等地参加艺术品拍卖会，其中一部分钱来自自传《我的奋斗》的出版版税。同时，对于那些逃出第三帝国控制的犹太人被没收的大量艺术品，希特

勒提出“元首优先特权”。波色能够根据这一特权优先挑选供给希特勒本人的收藏品，并使用较低的价格或印有希特勒头像的邮票购买。

波色先前因为一度反对希特勒处置“堕落艺术品”而遭到停职。但希特勒看重波色的经验和艺术鉴赏能力，要求他为自己服务。在之后的任务执行中，波色表现出与早期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积极收集希特勒看重的油画。

“林茨特别任务”是希特勒纳粹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起初，波色在德奥合并后来到维也纳挑选那些逃往国外的犹太富商留下的艺术品，选择符合希特勒审美的作品作为第三帝国艺术博物馆的储备。

随后，由于德军战线的推进，他得到在波兰古城克拉科夫和首都华沙、法国首都巴黎以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地挑选艺术品。

由于纳粹政出多门、德军战线过长，为了避免遗漏有价值的艺术品，波色在行动过程中多次与党卫军合作，提前控制占领区艺术收藏，并由其优先挑选。

1942年，波色因病去世。截至那时，他已经为希特勒收集了不少一流油画，其中不乏提香、伦勃朗等名家之作。

就艺术品的获得，不同的历史学家存在争议。德国史学家汉斯·勒霍尔估计，波色为希特勒收藏的艺术品中，只有大约12%是强制购买的、2.5%的艺术品来自没收。但荷兰历史学家杰拉德·埃尔德斯认为，这些艺术品购买“代言人”使用威胁的方式，用大量无法兑现的德国“金马克”购买油画，等同于没收。

不过，根据战后处理艺术品的官方委员会的记录，的确有一些奸商高价出售艺术品给希特勒，战后却声称那些艺术品被纳粹强占、要求索回的现象。



图八十二：希特勒喜爱有加的达·芬奇于1506年创作的装饰画《丽达与天鹅》

波色死后，“多瑙河画派”学者赫尔曼·福斯继任“林茨特别任务”主管。有趣的是，福斯是一名对纳粹主义和德军的侵略行为极其反感的艺术史学家。一些历史学家怀疑，希特勒任命福斯的原因很可能是利用福斯的声誉，让艺术品“收集”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

在福斯的管理下，艺术品超出了油画的范畴，扩大到几乎所有类别。不过，由于所有占领区没收和无主艺术品数量巨大，直到第三帝国覆亡，福斯都没有完成林茨艺术品博物馆展品收集和编目工作。

“林茨特别任务”收集的艺术品大多存放在慕尼黑的“元首大楼”，还有部分藏品在盟军登陆欧洲、轰炸德国时被运至矿井、修道院等处藏匿。至于艺术品的数量，考证难度极大。罗尔列举了一些相关说法，其中维也纳文物保护所所长赛贝尔博士在1945年给美军提供的目录中认定，希特勒收藏的绘画、雕塑、家具、壁毯、瓷器、古典金属器物等艺术品总计6577件。

根据战后的粗略统计，希特勒及其艺术品代言人收集的艺术品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最终归还给主人，接近10%的艺术品遗失。大部分艺术品留在德国，分散在各地的博物馆中，还有一些名作被奥地利、法国、荷兰以及美苏两国“保管”。

这些艺术品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纳粹统治时期的情形。不少物主在战争中不仅失去财产，连生命也被剥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的艺术品流落在时代的颠沛命运中。纳粹美学政治的背后，丑陋的残忍比比皆是。

建立第三帝国艺术博物馆的梦想在盟军的炸弹声中破灭，希特勒也自尽身亡。希特勒最后艺术品主管福斯没有机会完成“林茨特别任务”。他战后曾被捕，后来撰写回忆录，声称自己是为了保护艺术品才接受希特勒的任命。

希特勒喜好艺术品，其下属也纷纷上行下效。独裁者以下最著名的“收藏家”是元帅戈林。



图八十三：希特勒与戈林都非常钟爱的19世纪的奥地利画家汉斯·马卡特的作品《福尔克纳》

与独裁者带有纳粹政治色彩的美学品味相比，戈林的收藏显得没有“章法”。在戈林的收藏中，既有伦勃朗、雷诺阿的油画，又有珍稀邮票、雕像、钟表、勋章、古金币、钻石袖扣和别针、金银烛台和盘子、古董盔甲和兵器等。美国大兵们攻入戈林的别墅，打开密室，还以为是一个杂货铺老板的仓库。

戈林巧取豪夺的艺术品总计有1500多件，其中不少是难以估价的珍品。不过，戈林的藏品无法反映出这名纳粹“二把手”的艺术兴趣或收藏规律，但表达了纳粹头目对价值的推崇。他的藏品中甚至有希特勒所定义的“堕落艺术”。

战争期间，戈林多次调用军队、火车为其运送艺术品，每打到一个重要的欧洲首都，总不忘在希特勒挑选完艺术品后把有价值的藏品纳入自己的仓库。

如果说希特勒的“林茨特别任务”是有目的的收集艺术品，那么戈林的行为多半可以视作军阀式的强盗行为。他并没有为艺术品收藏拨付太多金钱，而是多次通过行政手段让这些艺术品“凭空蒸发”。



图八十四：“林茨特别任务”时期士兵搬运艺术作品

除戈林外，不少纳粹要员也参与了这场针对欧洲艺术品的劫掠，例如德国时任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尽管纳粹收揽的艺术品数量巨大，但这些艺术品最终没能像纳粹美学政治所希望的那样巩固法西斯统治。这些艺术品中不少在战火中被焚毁，很多珍品散佚到欧洲各个博物馆。如今，当人们带着艺术的

眼光去审视这些艺术品的时候，难以想象它们曾经被什么样的人端详，以及它们身上那种美学政治意义。

极权艺术的时代同志

极权主义美学的真正意义是，它框范了统治者与艺术家之间的主仆关系。铁蹄踏过一个个艺术名城、在世界版图上肆意涂抹的独裁者，是极权政体中最高的“艺术家”。他们有权决定谁配做艺术家，谁只适合去集中营和古拉格。

文/邱实

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学者伊戈尔·戈洛姆斯托克（Igor Golomstock）为一群参观莫斯科普希金艺术博物馆的学生担当向导。当他提问馆藏纳粹艺术品与苏联斯大林时期艺术品之间的区别时，答案令他惊讶和猛醒。学生答不出有什么区别。

当人们比较同一年代的斯大林苏联和纳粹德国宣传画，不难发现两者在构图上都几乎雷同：带红领巾或袖章的微笑女学生肖像、扛起铁锤的工人形象、脚踏英美资产阶级的健壮男人、平伸右臂向民众示意的领袖侧身像……

斯大林也并不掩饰自己被纳粹艺术品所吸引。1939年，他特地托前来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带给里芬斯塔耳一封信，称他很喜欢《奥林匹亚》。

极权的品味

遍布世界各地的极权主义美学很难说是一种美学风格，其派系繁杂，也不乏不驯的艺术家们偶有的突破性发挥。极权主义美学的真正意义是，它框范了统治者与艺术家之间的主仆关系。铁蹄踏过一个个

艺术名城、在世界版图上肆意涂抹的独裁者，是极权政体中最高的“艺术家”。他们有权决定谁配做艺术家，谁只适合去集中营和古拉格。

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一样标榜自己是艺术家和建筑师。他不惜摧毁无数历史古迹，开辟出一条从罗马大斗兽场直达他所在的威尼斯宫的大道，象征他的权力贯通古今。墨索里尼称其城市改造方案为“提纯的罗马风格”，粗糙地仿造奥古斯都时代，舍弃柔和线条，代之以直线和弧形的整齐图案。他下令建造的“意大利文化广场”是缀满古罗马斗兽场般拱门的方形大厦（俗称“方形大斗兽场”），装饰性拱门整齐划一，冷漠而空洞。如果战争没有阻止，他将把罗马城南的沼泽建造成“新罗马”，一直延伸到地中海边。此外，墨索里尼是威尼斯电影节的创造者，尽管后期获奖的多是德国UFA的影片。



图八十五：1938年9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火车站

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也创作过两本小说和多部绘画，作品描绘摩洛哥人的生活，带有着西班牙征服者的闲情逸致。

“祖国”与“乐土”

1937年，里芬斯塔尔的伯乐——范克导演来到日本，与日方合拍电影《武士的女儿》。这位高山电影之父无节制地展现日本山河的壮丽画卷，令片中的爱情故事变成了点缀。戈培尔命评论家写下讨好友邦的文字：“幸观此片，惊叹德日民众感性上的相通。”影片的日本片名叫《新土》，指的是男主人公最终投身的“满洲”大地。

大日本帝国在其征服的东亚各国分别创设现代电影公司，其中最著名的是新京（长春）的“满洲映画协会”（满映）。“满洲”出生的日本女星李香兰成为日本公司打造“大东亚共荣”想象的杰出产品。李香兰先是出演“大陆三部曲”——《白兰之歌》、《支那之夜》、《热砂之誓》，扮演中国女子与来华生活的日本人相恋，又出演朝鲜题材的《君与仆》和台湾题材的《莎韵之钟》。这些电影用（脱离现实的）爱情迎合东亚“皇民化”政策，又展现从北方冰河到热带岛屿的广袤风光，在日本广受好评。纳粹电影中运用风景展示“血与祖国”的技巧，被日本运用于宣传“五族协和，王道乐土”。



图八十六：李香兰



图八十七：李香兰（右）主演的电影《莎韵之钟》剧照

日本早已仿造纳粹德国颁布了《电影法》。《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在日本上映后广受好评，小学生被要求排队观看；纳粹导演里特尔的战争片更激起了日本导演们的探讨和模仿。《上海陆战队》、《马来战记》、《缅甸战记》、《夏威夷·马来近海海战》……越来越多的地名被映入日本电影的风景画。日本首部战争大片《燃烧的天空》更成了与英美“电影战”的工具，展现健美的男青年成长为优秀飞行员，最终在中日大空战中牺牲的故事，他在高喊了“天皇陛下万岁”后才断气。壮美风景、男子气概，糅合成为帝国无悔献身的豪情。

现代性与法西斯

从施佩尔、里芬斯塔尔，到法西斯意大利、日本帝国的艺术家们，在战后并没有为从事极权主义宣传承担多少责任。他们辩称只是在从事艺术，然而独裁者赋予这些绝非顶尖的艺术家的，是他们在自由政体下绝得不到的权力。当里芬斯塔尔指挥170人的摄制组或挥霍150万马克时，她与一个独裁者的区别何在呢？

极权艺术家们还说，他们只是运用了极权主义前后都有的艺术形式。是的，不得不说，正是现代社会本身孕育出了极权主义及其美学。阿多诺批评美国文化工业如同纳粹，然而，是纳粹首先学习了美国。



图八十八：就像今天的人们不断用最新的影像技术将希特勒的肖像完美化，催生极权主义的因素过去存在，至今仍然存在且愈演愈烈。

是美国传入的泰勒制和流水线将魏玛德国的工人束缚在机器上，对现实的苦闷让大众走进了影院，幻想着国家复兴。是“机械复制”时代的大众媒体赋予希特勒和斯大林大批量印刷、放映低劣作品的的能力。德国UFA和日本东宝的导演们时刻不忘模仿和赶超好莱坞，希特勒对现代大都会的幻想也来自于导演弗里茨·朗对于纽约摩天大楼的见闻。

这些催生极权主义的因素过去存在，至今仍然存在且愈演愈烈。为此，我们要警惕那些收编艺术家的体制和赋予艺术家过大权力的资本，警惕那些迷醉于奇幻片、历史剧的观众正在逃避怎样的现实。

正如分析家埃里克·伦齐勒在《幻象之媒》一书中指出的：“如果一个国家在社会沟通和集体身份问题上过分依赖于媒介和大众文化，那这些真实生活中的影像制造者仍可能制造噩梦”。



在这里记录中国



关注信睿微信 了解变化的中国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由我而史](#)

[版权页](#)

[关于我们](#)

[目录](#)

[历史，始于“我”](#)

[父亲的“交代”](#)

[发现土地的秘密](#)

[反思历史始于疑](#)

[在历史的苍天下](#)

[最后一个“托派”](#)

[谁来书写“小草”的历史？](#)

[我的历史观：五栋楼的故事](#)

[国家记忆2013·致敬历史记录者 致敬名单](#)

[中国故事](#)

[美丽岛足印](#)

[版权页](#)

[关于我们](#)

[目录](#)

[美丽岛足印——台湾转型地理](#)

[第一部分 穿过历史的河流](#)

[这座岛屿的暗黑与光亮](#)

[在台北寻回“中国”](#)

[第二部分 来路寻踪](#)

[东台湾行走地图](#)

[安平古堡后的历史肌理](#)

[台北之心](#)

[恋恋西门町](#)

[第三部分 转轨地标](#)

[二·二八：台北街头的撕裂伤口](#)

[紫藤庐的几代客人](#)

[我的眷村](#)

[金门：因战而兴 因和而变](#)

[高雄：“美丽岛”往事](#)

[第四部分 图腾与碑石](#)

[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野百合](#)

[鹿港风潮：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第五部分 寻路未来](#)

[回首海天相接处 ——内在于绿岛的台湾史
和历史正义](#)

[真相 和解 审判](#)

[中国故事](#)

[家•国•天下](#)

[版权页](#)

[关于我们](#)

[目录](#)

[写下我们的历史](#)

[家史](#)

[父亲的“交代”](#)

[我的眷村](#)

[余美颜：第一欲女的性与情](#)

[国史](#)

[这座岛屿的暗黑与光亮](#)

[商务印书馆：出版帝国的易帜](#)

[上海大亨的血色黎明](#)

[天下史](#)

[电影：帝国的浮尸](#)

[红色十月的主角与配角](#)

[家国梦](#)

[睡眠：逝去的长梦](#)

[中国故事](#)

[叛道者](#)

[版权页](#)

[目录](#)

[叛道者 风气初开时的民国另类](#)

[吴虞：时代的逆子](#)

[张竞生：一纸初开性教育](#)

[生育：种族使命与个人自由](#)

[乳房问题：束放谁做主？](#)

[余美颜：第一欲女的性与情](#)

[男女争权：盛七小姐的财产官司](#)

[工读互助团：叛道之梦与寻路之困](#)

[雾霾百年](#)

[版权页](#)

[关于我们](#)

[目录](#)

[雾霾百年：重新呼吸的城市](#)

[马斯河谷：追寻空气杀手](#)

[多诺拉：被烟雾淹没的小镇](#)

[洛杉矶：雾锁六十年](#)

[伦敦：“雾都”摘帽记](#)

[四日市：让公害成为公敌](#)

[PM2.5与中国空气保卫战](#)

[中国故事](#)

[你从何处来](#)

[版权页](#)

[关于我们](#)

[目录](#)

[你从何处来？](#)

[追寻人类足迹计划：我们都有共同的根](#)

[走出非洲：一首数万年的迁徙史诗](#)

[入中国记](#)

[我们都有一个家](#)

[交锋：缺失的五万年](#)

[解密田园洞人](#)

[追寻汉语的祖先](#)

[隐藏于昆仑神话中的汉藏语族始祖源流](#)

[寻找丢失的密码](#)

[后记](#)

[中国故事](#)

[乌托邦时代](#)

[版权页](#)

[关于我们](#)

[目录](#)

[乌托邦时代](#)

[先声：晚清短暂的文人幻梦](#)

[康有为：“大同”世界幻游记](#)

[吴稚晖：西方桃源与“机器之国”](#)

[女子社会的幻想](#)

[阎锡山：山西王制造的“公道社会”](#)

[将军村长的西北梦](#)

[傅柏翠：不国不共二十年](#)

[中山：“总理县长”的“自由港”](#)

[卢作孚：民国NGO史上的失踪者](#)

[中国故事](#)

[最恶的美](#)

[版权页](#)

[目录](#)

[开篇](#)

[来自历史深处的希特勒美学](#)

[音乐：瓦格纳奏出的主旋律](#)

[建筑：坍塌的“日耳曼尼亚”](#)

[电影：帝国的浮尸](#)

[莱妮·里芬斯塔尔：希特勒的御用导演](#)

[艺术品：为了元首的画廊](#)

[极权艺术的时代同志](#)

[扉页](#)